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中国近代战争史 (1)

 **eBOOK**
内网资料 非卖品

说 明

这部《中国近代战争史》，是我们对中国近代史上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期间发生的各次主要战争进行初步研究的结果。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开始的中国近代史，是中国由独立的封建国家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历史，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艰难地进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这是一个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充满着战争与革命的历史大变动时期。从一八四〇年（清道光二十年）英国发动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中经以太平天国革命战争为主的各族人民起义战争，反抗英、法、日、俄、美、德等国单独或联合侵华的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反对八国联军侵略的战争），以及资产阶级领导的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辛亥革命战争，和反对帝国主义扶持的封建军阀的讨袁、护国、护法战争等，到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的八十年间，大小战争不下五十余次。这些战争，从性质上区分，基本上是两类：一类是帝国主义国家武装侵略中国，中国被迫进行的反侵略的卫国战争；一类是国内封建势力残酷压迫人民，人民被迫进行的反对封建压迫的战争。毋庸置疑，战争给中国社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和灾难，但它在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旧制度和保卫国家独立方面，却有着巨大的革命意义。通过这些战争，彻底暴露了清王朝所代表的封建贵族阶级及封建专制制度的反动腐朽的本质，证明其灭亡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也清楚地显示出在封建主义长期统治下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反动社会势力及其总代表清王朝，绝不是一、二次冲击可以推翻和消灭掉的。经过七、八十年反复多次的武装斗争，最后才推翻了它，而要完全消灭封建势力，则是下一个历史阶段——无产阶级通过其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任务。通过这些战争，既暴露了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残暴性，也暴露了它们炮舰政策的虚弱性。它们在腐朽的清王朝面前，是气势汹汹不可一世的强者，但在中国军民的坚决抵抗面前，却显露出强盗的虚弱本质。当帝国主义者发觉不可能用武力霸占中国时，便进一步勾结和扶持清王朝，使之成为“洋人的朝廷”。与此同时，中国人民进一步觉醒起来，不但认清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是压在自己头上的两座大山，而且逐步认识到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既互相区别又互相统一，因而不断加强团结，坚持用武装斗争回答侵略者和压迫者。在一系列反帝反封建战争中，中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历史上形成的不畏强暴、勇于抵抗外来侵略的为国献身的精神，和敢于反抗压迫剥削的革命战斗精神；但也反映出，人民及其军队的英勇战斗，没有先进阶级和先进政党的正确领导，并实行广泛的联合，要使斗争持久地发展和取得彻底的胜利，也是很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通过这些战争，还深刻揭示了军事思想、装备、训练和指挥落后的军队，即使数量甚多，也难以形成强大的战斗力，战胜数量虽少，但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指挥有方的军队，从而说明建设一支有战

斗力的军队，对争取战争的胜利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诸如此类的经验教训，在中国近代战争史上是很多的，也是很值得研究的。我们编写这部书，就是试图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和总结这一历史阶段的战争经验，探索其规律，使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人民如何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不屈不挠地为反帝反封建而浴血奋战，前仆后继地为新中国的诞生创造条件，以加深对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同时，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反侵略战争的经验教训，为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增强自卫能力，提供借鉴。

战争是敌对双方在一定社会生产方式基础上进行的军事、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等各种斗争的集中表现。作为战争史，自然不能仅限于军事方面，但军事斗争毕竟是战争的主要形式，况且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的斗争，在通史和专史中都有较系统的叙述和分析，因此，本书以军事斗争为主要内容。当然，在军事斗争方面，战争史也不可能对所有大小战斗及一切军事活动都详加叙述，只能以关系战争双方全局的军事活动和指导战争全局的战略为重点。由于每次战争都是在特定的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因而本书力求将战前及战争进程中敌对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等概况，作扼要的记叙，以期对战争爆发的原因及其必然的发展过程，作出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揭示其特有的规律性。又由于战争是关系到国家、民族、阶级、政治集团命运的生死搏斗，是一种以特殊的组织（军队）和特殊的方法（战略战术）进行的特殊的社会活动形态，它与敌对双方最高领导层的活动紧密相联，并强烈地表现出双方军队及一切参战人员的特殊的主观能动性，这种从上至下的主观活动的正确程度和努力程度如何，往往对战争的进程和结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本书对每次战争的叙述和评论，不仅注重对战争的客观物质条件的分析，而且特别重视对战争双方主观指导和主观努力的研究，以期从中找出经验教训。但战争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而且许多有关战争情况的第一手资料，或因相互保密、事后销毁而无从查考，或因毁于战火而不复存在，现存史料又多为当时中外统治阶级的官方记述，其中多有虚假不实之处，有的甚至是出于未经战阵的文人之手的不经之谈，这都增加了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困难；加上我们编写人员的理论水平、写作水平和历史知识有限，因而本书难免存在不少缺点和错误，热忱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根据中国近代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发展变化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战争发展变化情况，本书分为三册。第一册主要叙述 1840—1873 年间反对资本主义列强侵略的战争和以太平天国为主的各族人民起义战争。第二册主要叙述 1873—1905 年间反对各帝国主义国家蚕食和企图瓜分中国的战争。第三册主要叙述 1905—1919 年间资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推翻清王朝和反对帝国主义扶植的封建军阀的战争。每册之后附有若干彩色作战示意图。第三册后面附有战争大事年表。

本书是由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研究部中国历代军事理论研究室的同志在田地同志主持下集体编写的。参加编写的有：施渡桥、梁巨祥、张一文、谢健、温国华、刘廷良、王楚良、邱心田、王兆春、王式金、毛振发、李硕之、吴如嵩、谢国良同志。牛俊法、王东明、戴学速、魏天柱同志也曾参加部分初稿的撰写或资料收集工作。第一、二册由施渡桥、梁巨祥、邱心田、王楚良同志统稿，第三册由施渡桥、毛振发、梁巨祥同志统稿。全书由高锐同志最后审定。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中国第一、第二历史档案馆和其它史学单位曾提供过不少资料，一些史学工作者提过不少宝贵意见，此外，本书还吸取了史学界一些研究成果，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者

一九八三年八月一日

中国近代战争史

第一章 第一次鸦片战争 (1840年6月—1842年8月)

1840—1842年，英国殖民者对中国发动了一场侵略战争，其导火线是由于英国强行向中国推销鸦片，故称鸦片战争，也叫第一次鸦片战争。这次战争以后，中国由封建社会一步步地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1840年成了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第一节 鸦片战争前的世界与中国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世界资本主义正处于迅速发展时期。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英、法、美等）经过以机器代替手工劳动为主要标志的产业革命，社会生产力大幅度提高，创造了过去任何时代无法比拟的巨大的物质财富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日益加深了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资产阶级为了摆脱经济危机，贪得无厌地追求利润，对内加紧剥削、压迫工人和广大劳动人民，对外不断发动侵略战争，大规模地掠夺殖民地，开辟新的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

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在争夺殖民地的过程中，经历了许多次战争，建立了强大的武装力量，并随着工业的发展，不断改进军队的组织编制和武器装备。

由于战争频繁，战争的地域和规模不断扩大，欧洲各国的常备军不断增加。至十九世纪上半叶，整个欧洲约有二百万军队（战时倍之），其中为数五十万以上的有法国和俄国。英国当时主要是海上强国，陆军约有十四万，连同用于内卫的国民军，共二十万左右。鸦片战争前，欧洲除英国外，各主要国家已普遍实行征兵制，英、法等国还招募外籍雇佣兵。各国普遍设立培训军官的军事学校。法国曾规定所有军官都要经过军事学校训练。平时，大多数国家军队的最高编制单位通常是团，也有的编基干军；军（军团）、师、旅的建制多半在战时才采用。步兵一般以营为基本战术单位，编制人数在八百至一千之间。英军每营有十个连，每连九十至一百二十人；法军每营六个连，每连人数不等。骑兵一般以连为基本战术单位。

在武器装备方面，到十九世纪初，欧洲各国都能用生铁和铜铸造各种滑膛前装火炮，并依其口径与炮管长度之比例，区分为加农炮、榴弹炮和臼炮；炮身重量从几百斤、几千斤直至万余斤；口径从几英寸到十余英寸；炮弹有实心弹、霰弹、燃烧弹和爆炸弹（英国已发明空中爆炸的榴霰弹）；火炮的有效射程达到千余米。随着炮车的不断改进，火炮的机动性能大大增强，逐渐成为西欧各国作战的重要武器，有的在在一次会战中，双方各自动用的火炮达四五百门之多。步枪的改进则比较缓慢，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始终以前装滑膛为基本型式。英军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使用的博克式和布伦司威克式

步枪，也都是滑膛枪，有效射程为三百米左右。

为适应对外贸易和掠夺海外殖民地的需要，西方国家十分重视发展海军。自1807年美国发明第一艘用蒸汽作动力的客轮¹以后，英国于1827年首先将蒸汽机装在军舰上。这种舰只可以不受风向和水的流向的影响，从而加快了航速，增强了机动性。但由于蒸汽机体积庞大，机器和燃烧用煤占了很大的面积和重量，以致装载火炮的数量大受限制，加以机器和划水轮都暴露在外，作战时易被敌方炮火击中，因此，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前后，装有蒸汽机的明轮舰只一般只用于巡航、侦察、通信和短途运输。第一次鸦片战争时，英国的战列舰仍全部依靠帆力，大型战列舰有二至三层甲板，分别装备有七十到一百二十门火炮，发射三十二磅炮弹，舰首和舰尾装有可发射五十六和六十八磅实心弹的加农炮，或装有可发射爆炸弹的大口径加农炮。英国是海军发展最快的国家，1836年时，已拥有大小舰艇五百六十艘，并积累了许多海战和登陆作战经验，成为称霸世界的最大的海军强国。

英、法等资本主义列强，正是凭借装备有先进的军舰、大炮和具有战争经验的侵略军，实行炮舰政策，到处横冲直闯，打开了一个又一个经济不发达国家的大门。至第一次鸦片战争前，中国的一些邻近地区和国家，有的已经变成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有的正在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和威胁。中国也早已成为它们觊觎的对象。

当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向世界各地猛烈侵略扩张的时候，中国正处于封建制度没落和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由盛到衰的时期。

自康熙（1662—1722年）到乾隆（1736—1795年）年间，清朝封建统治者从王朝的“长治久安”出发，采取了一些客观上有利于休养生息的措施。经过各族人民的创造性劳动，使明末清初陷于崩溃的社会经济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人口不断增长，社会渐趋安定。与此同时，清军经过断续百余年的征战，平息了分裂叛乱，巩固了清王朝的统治，并使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封建国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统一。但是，从乾隆后期开始，清王朝的统治趋向腐败，整个统治机构变得因循守旧，死气沉沉；官场贪污成风，豪门贵族巧取豪夺，皇室骄奢淫逸，挥金如土，加上浩大的军政开支，造成国库日益空虚。到嘉庆（1796—1820年）时，国家财政已陷入捉襟见肘的困境。而解决财政困难的唯一办法，自然是加重对劳动人民的剥削。

土地兼并不断扩大，贵族官吏贪污腐化，和日益苛重的封建剥削，使社会危机不断加深，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加之满族统治者虽然口称“满汉一

¹ 1800年，亨利·贝尔在克莱德河上试制一艘汽船；1803年，富尔顿在塞纳河上试建明轮艇；1807年，富尔顿向英国伯明翰公司定制引擎，安装在“克莱蒙”号轮船上，在赫德森河试验成功。

康熙中后期至乾嘉时，财政岁入均多于岁出。康熙四十八年，户部库存银已五千余万两，嗣后实行“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乾隆五十七年，岁入银四千三百五十九万余两，岁出银三千一百七十七万余两，约余银一千一百八十二万两。乾隆末年，人口已超过三亿。

家”，实际上是以满族为主，联合蒙族压迫汉族，联合蒙、汉贵族和大地主压迫各族人民，因而到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出现了以农民为主体的各族人民武装反抗清王朝反动统治的高潮。其中比较著名的有 1795—1806 年的贵州东部、湖南西部的苗民起义，1796—1804 年的遍及湖北、四川、陕西等九省的白莲教起义等。各族人民的起义，动摇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加速了它的衰亡。

清王朝的衰败和腐朽在军事上的表现，主要是军制的落后和军备的日益废弛。

鸦片战争以前的清朝经制之兵，由八旗和绿营两大部分组成。八旗兵在入关前后是比较骁勇善战的。但自满族地主阶级掌握全国的统治权以后，可以世袭的八旗子弟一生下来就享有优厚的薪饷，还有俸地和种种特权，养尊处优的特殊地位使这支部队迅速腐化。平定“三藩之乱”时，清政府先调用八旗兵，结果师久无功，最后只得改用绿营兵打头阵。清代中叶以后，征战之事，就全赖绿营兵了。绿营兵在清朝前期和中期所进行的一些战争中，曾起过显著的作用，但由于制度上存在许多问题，加之乾隆以后，承平日久，暮气日深，战斗力不断下降。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与白莲教起义武装作战表明，绿营和八旗一样，战斗力已经很低。此后，不得不由官吏、地主招募民壮，组成团练武装，对付人民起义。

清统治者长期把骑射奉为“祖训”，制造火器的技术停滞不前，这就使清军的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西方军队。西欧陆军在十八世纪已全部使用火器，而清军则仍然是冷热兵器并用，部队装备着大量弓矢、矛戟、刀斧、椎槌等原始武器。直至 1836 年，清统治者才提出“军储利器，枪炮为先”，但不久又继续强调“枪箭并重，不容偏废”。因此，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前，清军的装备始终处于冷热兵器并用的落后状态。

八旗兵是在满族部落军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早在 1606 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就开始建立一种兵农合一、军政一体的组织。他把满族各部落的人丁组织起来，每三百人为一牛录，五牛录为一甲喇，五甲喇为一固山。每牛录设牛录额真（汉名佐领）一人，每甲喇设甲喇额真（汉名参领）一人，每固山设固山额真（汉名都统）一人和梅勒额真（汉名副都统）二人。初建黄、白、红、蓝四固山，到 1615 年又增加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固山，共八固山。八固山各用不同的旗色相区别，故称“八旗”。1635 年以后，清太宗皇太极陆续将降附的蒙古人和汉人，按照八旗制度组建为“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合计二十四旗，由它们共同构成清代八旗的整体。

绿营兵由原明朝各省的军队改编而成，因以绿旗为志，以营为建制单位，故称“绿营”。绿营兵都是汉人，一人在伍，全家入兵籍，世代相袭，以兵为业。除京师巡捕营外，绝大部分散驻于全国各地，分为标、协、营、汛，由总督（包括河道总督、漕运总督）、巡抚、提督和总兵节制。总兵以下，设有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等官。

《宣宗实录》卷二百九十，第 11 页。

《宣宗实录》卷三百一十七，第 27 页。

清王朝一直保持七八十万常备军，可是，既不注重将弁的培养，又忽视部队的训练。提升将弁，片面强调行伍出身，对于武科出身的往往不予重用。这样，将弁的文化水平一般都比较低，加上缺乏严格的培训，不但平时组织部队训练难于胜任，战时指挥作战更是笨拙无方。至于部队训练，虽规定有春操、秋操、冬季行围等制度，但往往敷衍应付，而且只偏重于演阵图、习架式，近于演戏，基本上没有脱离冷兵器时代的密集阵式，对于实战毫无裨益。

除军队建设问题外，清政府在设防方面也存在不少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由于清朝是满族少数民族统治着一个多民族的大国，因而在设防的指导思想上，表现为防内重于防外。乾隆以前，清代用兵的重点一直在东南、西北和西南，因而这些地区逐渐成了设防的重点。固然，上述设防重点地区的军队也负有防外的任务，但主要任务还是防内。从水师建设和沿海设防情况也可看出其防内重于防外的指导思想。清政府虽建立了外海和内河水师，并在少数口岸筑有炮台等防御工事，以防外敌入侵。但就整个水师而言，主要任务在于防止走私和缉捕海盗。正因为这样，在战船的制作上不是侧重于考虑如何有利于海上作战，而是侧重于考虑如何更适于追捕走私船和海盗船。十九世纪初期，清军水师的外海战船共有八百九十余艘，数量比英国的战舰还要多，但质量却相差甚远。军事上防内重于防外的指导思想，还源于清政府长期闭关锁国，和盲目地以“天朝”大国自居的心理。由于对于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扩张政策缺乏认识，因而也就谈不上从军事上认真进行对付外敌的准备了。

正是由于清王朝政治和军事日趋衰败，又不重视对外设防，因此，当外国资本主义列强以武力入侵时，就难以作出及时而有力的反应，给侵略者以坚决的回击。

第二节 英国以武力推销鸦片，发动侵华战争

英国资产阶级为了牟取高额利润，最大限度地掠夺中国人民，除了向中国输出一般商品外，还大力倾销鸦片。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获得了印度鸦片出口的垄断权，即在印度大规模地生产鸦片，并以非法手段大量输入中国。鸦片贸易给英国资产阶级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在一段时期内，“印度的不列颠（英国）当局的收入当中，整整有七分之一是来自向中国人出售鸦片”。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清王朝从嘉庆初年开始，便正式宣布禁止鸦片进口。这对英国的鸦片贩子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打击。之后，英商在英国政府和印度的英国殖民当局的大力鼓励和怂恿下，贿赂和勾结清朝官吏，大规模地进行鸦片走私，一方面牟取暴利，一方面腐蚀清朝整个官僚体系。因此，尽管清王朝三令五申地严禁鸦片，年输入量仍由十九世纪初的四千箱左右，猛增到1838年（道光十八年）的四万余箱。

鸦片的大量输入，严重损害了中国人民的健康和经济生活，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严重危机。上至贵族达官，下至绅商百姓以及八旗绿营兵丁，吸食鸦片的人越来越多。据1835年统计，全国吸食鸦片者约在二百万人以上，而“现任督抚，嗜烟者约占半数”，这就加速了清朝统治机器的腐化。鸦片输入激增，使中国在中英贸易中迅速由年出超白银七百余万两转为入超数千万两，造成白银外流、银贵钱贱、国库空虚等严重的经济后果。而这些后果最终又都转嫁到广大劳动人民身上，引起人民的更大不满与反抗。道光帝迫于烟毒泛滥的严重形势，害怕有朝一日真会出现“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的局面，乃于1838年冬，改变了以往既畏惧鸦片之害，又不愿放弃因鸦片走私而受贿获利的犹豫摇摆态度，决定摒弃与鸦片走私有密切关系的“弛禁派”的主张，采纳了“严禁派”的建议。同时，

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600年。它名义上是英国的贸易公司，实际上是英国在印度、中国和亚洲其它国家推行殖民掠夺政策的工具。从十八世纪中叶起，该公司拥有军队和舰队，成为巨大的军事力量。在公司的名义下，英国殖民者完成了对印度的占领。1857—1859年印度的民族解放起义迫使英国人改变其殖民统治形式：宣布公司解散，印度成为英王的领地。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二卷，第7页。

林则徐：《与弟元抡》，《林则徐家书》（上海共和书局印行）第9页。

道光帝（1782—1850），姓爱新觉罗，名旻宁，嘉庆帝（顛琰）次子，1820年即位，年号道光。他虚骄自大，对世界情势懵然无知，处事动摇不定，很少了解下情。鸦片战争爆发后，他举棋不定，和战无计，最后妥协投降。1850年病死，庙号宣宗。

林则徐：《钱票无甚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端片》，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以下简称《鸦片战争》——（二），第142页。

鸦片贸易给清王朝造成了日益严重的统治危机，在朝野舆论的推动和压力下，清政府内部逐渐形成了主张严禁和弛禁两派。严禁派不满意对禁烟的因循敷衍，要求对贩卖和吸食鸦片者处以重刑。弛禁派则认为

任命在两湖地区禁烟卓有成效的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主持禁烟事宜，并节制广东水师。

林则徐于 1839 年 3 月 10 日到达广州后，立即与两广总督邓廷桢等整顿海防，严拿烟贩，惩处受贿官弁；同时晓谕外商，限

林则徐画像

期呈缴烟土，出具“永不夹带鸦片”的保证书。在当地人民的积极支持下，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在广东迅速开展起来。林则徐排除了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和鸦片巨商的阻挠破坏，于 4、5 月间，共缴得英美等国输入的鸦片二百三十七万余斤，并根据道光帝的命令，于 6 月 3 日至 25 日在虎门海滩上全部当众销毁。这一果敢的举动，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反抗鸦片侵略的坚强意志和决心，给了英国侵略势力以沉重的打击。自然，英国侵略者决不肯就此罢休，他们决心借机挑起战争，以达其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的目的。

英国决定发动侵华战争是蓄谋已久的。早在 1832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就密令大鸦片商胡夏米乘船自广州北驶，经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山东半岛、山海关等地，对中国沿海作了一次带战略侦察性的航行。1835 年 7 月 24 日，胡夏米在给英国政府的报告中提出：只要一支小小的海军舰队，就足以制服清王朝。他还对舰队的组成、兵力数量、集结海域和行动季节等等提出了具体建议。1838 年 7 月，英国东印度舰队司令马他仑遵照英国政府的旨意，率领军舰三艘，窜到珠江口，再次对中国进行武力威胁和侦察。同年，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训令义律利用任何有利的机会获取中国沿海贸易场所和海岛的情报，并要他在广州或澳门的公务人员中指定专人从事此项工作，返回后，把所到地方的商业、工业情况以及所获悉的任何有关地理、博物等方面的知识，写成详细报告，以便转呈英国政府。1839 年 4 月 3 日，义律以中国收缴鸦片为由，建议英国政府“立刻用武力占领舟山岛，严密封锁广

靠严刑重典不能禁止鸦片，主张弛禁征税，解决财政困难。弛禁派的主张为外国烟贩以及在鸦片贸易中获利的官吏所欢迎。严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林则徐、黄爵滋等。弛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许乃济、穆彰阿、琦善等。

林则徐（1785—1850），清末进步政治家和爱国主义者。福建侯官（今闽侯）人。1811 年进士。曾与龚自珍、魏源、黄爵滋等提倡经世之学，主张刷新吏治，扫除贪污，整顿军备，加强边防等。1831 年任东河河道总督，1832 年改任江苏巡抚。1837 年升湖广总督，任内提出六条具体的禁烟措施，在两湖地区成效显著。1838 年 9 月上奏道光帝，极力赞同黄爵滋以死罪重治吸食鸦片的主张，成为严禁派的著名代表人物。

邓廷桢（1776—1846），江苏江宁（今南京）人。1801 年进士。1826 年任安徽巡抚，1835 年升两广总督，1836 年许乃济奏请弛禁鸦片时，他开始甚表赞同，后受严禁派的影响，且目睹鸦片危害严重，乃由弛禁派转为严禁派，后成为林则徐的亲密同僚。

参见《胡夏米致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的信》，《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下同），第一分册，第 52—55 页。

参见《近代史资料》1958 年第 4 期，第 16 页。

州、宁波两港，以及从海口直到运河口的扬子江江面”，给中国“以迅速而沉重的打击”。林则徐虎门销烟后，义律命令英国船主拒绝在“永不夹带鸦片”的保证书上签字。7月7日发生英国海员在九龙尖沙嘴村殴毙中国百姓林维喜事件，义律又拒不交出凶犯。在此情况下，林则徐下令将英国人逐出澳门，并断绝其一切接济。义律离开澳门后，即派人驰报英印总督奥克兰，请求派兵船来华。不久，英舰“窝拉尼”号、“海阿新”号先后抵达广东海面。9月4日，义律率军舰“窝拉尼”号及武装船多艘，闯入九龙湾，炮击清军水师船只。清军水师奋勇还击，将其赶走。

1839年10月1日，英国内阁会议按照资产阶级中对华贸易关系密切的集团和鸦片巨商们的意见，决定派遣一支舰队前来中国海域，发动侵华战争。同年11月4日，巴麦尊正式训令义律和致函海军部，宣布英国政府决定派遣一支远征军前往中国，封锁沿海港口，占领几个岛屿，用炮舰政策迫使清王朝屈服。与此同时，义律又率军舰“窝拉尼”号、“海阿新”号在川鼻湾阻止一艘具结的英国商船入口。清军水师前往查究，遭到英舰炮击，不得不开炮还击，将英舰击退。11月3日至13日，清军又多次与入侵之敌交火，仅在官涌一地，十天之内就打了六仗，均获全胜。以上情况报到北京，道光帝下令永远停止同英国贸易，并驱逐所有英船，于是，中英关系更形紧张。这时，英国为强行向中国推销鸦片而引起的矛盾，已发展到非战争不能解决问题的地步。

1840年2月20日，英国政府正式任命好望角海军司令、海军少将懿律和义律为正副全权代表，并由懿律率领侵华远征军前来远东。4月7日，英国议会下院经过激烈辩论，以二百七十一票对二百六十二票的微弱多数，通过了政府的对华政策。就这样，英国侵略者“为鸦片走私的利益而发动了第一次对华战争”。

《义律致巴麦尊的密信》，《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上卷，第一分册，第58—59页。

马克思：《新的对华战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56页。

第三节 英国侵华部署与清政府的海防战备

一、英国远征军的组成和作战部署

英国政府作出发动侵华战争的决定之后，即着手组织远征军。至 1840 年初，这支侵略军基本组成。海军舰队以驻印度海军司令伯麦为司令，由十六艘军舰、四艘武装轮船和二十余艘运输船组成。这十六艘军舰中，三艘来自英国本土，三艘来自开普敦，五艘来自印度，另五艘已先期在中国海面活动。侵华陆军共四千名，其中包括从锡兰（今斯里兰卡）抽调的英军第 18 团，从印度加尔各答抽调的英军第 26 团和第 49 团，此外，还抽调了一个印度混合营和两个炮兵连、两个工兵连。所有陆军由布尔利上校统率。战争过程中，侵华英军以印度为主要基地，英国驻印度总督奥克兰受命筹组陆军，并对海军的行动予以合作。

1840 年 2 月，英国政府对懿律和义律下达了作战训令，给侵华远征军规定了如下任务和实施步骤：（一）到达广东海面后，立即封锁珠江口，扣留一切中国船只。由于广州距北京太远，所以不在那里进行任何陆上的军事行动。（二）封锁珠江口之后，立即北上，切断台湾和厦门之间的运输，封锁钱塘江口、长江口和黄河口，占领舟山群岛中最适于作司令站以便长期占领的岛屿，并扣留一切中国船只。（三）前往北直隶湾（即渤海湾），递送《巴麦尊子爵致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以武力为后盾，与清政府进行谈判，逼迫它接受英国政府提出的关于道歉、赔款、割地、通商等要求。（四）如果清政府拒绝谈判，或者谈判决裂，海军司令就应该根据他所指挥的兵力，采取最有效的办法进行更加活跃的敌对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派一支兵力进入黄河，在黄河与运河的交叉点切断南北诸省的交通；或派一支兵力进至长江与运河的交叉点，掳走那里的船只与货物；如果认为兵力足够，还可以占领厦门。训令指出：“给海军司令留有最充分的自行决断的余地，以便他根据他自己的判断，用最有效的办法进行他的敌对行动；在这样情况下，如果中国政府拒绝满足我们或中止谈判，或迫使陛下全权代表中止谈判，那么海军司令的敌对行动就不该停止，也不中断，一直等到中国全权代表签下足称满意的协定，并由皇帝诏准该协定的时候为止。”训令还给全权代表“保留广阔的自行决断的余地”。

二、清政府的海防战备

开普敦位于非洲南端，西临大西洋塔布尔湾，为南非（阿扎尼亚）重要港口和开普省首府。1652 年荷兰殖民者侵入南非沿海地带，始建该港。1806 年英国殖民者侵入南非，夺取开普，开普敦港便成了英国向南非内陆和亚洲各地扩张的重要基地。

《巴麦尊致海军部》，《近代史资料》1958 年第 4 期，第 70—72 页。

（一）清王朝的战备方针

清朝最高统治集团，对于收缴鸦片之后中英之间将会出现何种局面，是否可能爆发战争等，从未进行廷议，作出应有的分析判断，提出相应的政治军事对策，仅由道光帝及军机大臣们看奏报，下谕令。而道光帝既昏聩无知，又狂妄自大，他不准沿海疆臣丢失寸土尺地，又不愿为加强海防动用国库银两。清朝同西方各国通商近二百年，道光帝对欧美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政治经济制度，竟茫无所知。英国借口鸦片问题，已经在调兵遣将，决心武装侵略中国了，他还认为是“虚声恫吓”，“实无能为”，只要严防海口，“总不与之外洋接仗”，就足以使敌不攻自毙。在这种骄妄无知、盲目轻敌的思想支配下，清廷逐步形成了如下政治、军事战略性方针，即“先威后德”，“大张挞伐，聚而歼旃”，“沿海一体严密防范”等。所谓“先威后德”，即驱逐英商，收缴鸦片，必要时“示以兵威”，“使奸夷闻风慑服”；然后许以继续通商，“以示怀远羁縻”，认为这样，英人就会“感恩天朝”了。显然，这是既不知彼又不知己的骄妄自大思想的产物。至于“沿海一体严密防范”，由于没有提出明确而具体的措施，实行起来，只能是分兵把口，处处消极防堵而已。

（二）东南沿海的设防备战

东南沿海是清朝布防重点之一，其中广东驻军七万，福建六万，浙江四万，江苏五万。但是，由于清军的主要任务是镇压人民的反抗与起义，沿海水师主要是缉拿海盗，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武装侵略缺乏应有的警惕。1800年（嘉庆五年）以后，清政府查禁鸦片，英国的武装走私商船开始在广东沿海活动，特别是1830年以后，英国政府公然派出兵船前来中国沿海，保护鸦片走私，清廷和广东当局对西方列强的军事威胁，才开始有所警惕和准备，但仍然缺乏认真的战备措施。

1834年9月，两艘英国军舰强行闯入虎门并进抵黄埔的严重

关天培像

事件发生后，清廷任命关天培为广东水师提督。关到任后，亲历重洋，查勘要塞，整顿水师，加筑炮台，添铸大炮，使广东海防尤其是虎门的防务，得到了加强。

虎门位于珠江入海处，是从海上进入广州的咽喉要地，地势十分险要。沙角山、大角山夹岸对峙，构成第一道门户。由沙角、大角沿江上溯七里，

关天培（1781—1841），清末爱国将领。江苏山阳（今淮安）人，行伍出身。曾任江苏太湖营水师副将，1827年升江南苏松镇总兵，1833年署江南提督，次年任广东水师提督。

有上下横档岛耸立江中，将水道分隔为二。东航道可通大船，为洋船进入广州的唯一水道，两岸山峰雄峙，构成第二道门户。由横档岛再上溯五里，江中有大虎山岛，构成第三道门户。沙角山、大角山均筑有炮台（沙角炮台筑于1801年，大角炮台筑于1832年），关天培以两台间的炮火不能形成交叉火力，无法封锁海口，将其改为信号炮台，担负了望警报任务。上横档岛早在1717年（康熙五十六年）即修筑了横档炮台，其东岸之南山（亦称武山）修筑了威远炮台；1815年（嘉庆二十年）又在威远炮台北侧修筑了镇远炮台。关天培到任后，于威远、镇远炮台之间添筑了靖远炮台，于上横档岛西端添筑了永安炮台，西岸南沙山（即芦湾山）添筑了巩固炮台。到鸦片战争时，横档地区共有炮台六座，安置新旧火炮二百一十二门。此外，在两广总督邓廷桢的积极支持下，关天培还在横档岛和南山之间建造了两道铁链，以防敌舰阑入。对1818年修筑的大虎山炮台，关天培到任后也作了加固，并添置了炮位。

关天培不但添筑炮台，增加炮位，在炮台构筑方面也作了一些改进。旧的炮台均系石墙石地，一经炮弹轰击，碎石横飞，反而增大敌炮的杀伤力。新筑的炮台则以巨石为基，上筑三合土墙，并增加胸墙厚度，用沙袋或三合土围护火药库。此外，还部分改建旧炮台，以减少战时损伤。每门火炮还用增减木垫的办法，调整射距。但所有新旧炮台，仍未脱离古代城堡的结构形式，长墙高台，既无掩盖，又无交通壕，战时人员、火炮易受损伤。

福建也是重点设防的省份之一。全省六万驻军中，大体水陆各半，分别由水师提督和陆路提督统辖，下设南澳、漳州、台湾、金门、海坛、福宁等镇。福建沿海设防情况远不如广东，海口“旧设炮台，大者不过周围十余丈，安炮不过四位六位，重不过千斤”。英国鸦片走私船在广东被逐以后，自1839年冬起，就不断向福建沿海窜扰。1840年3月，新任闽浙总督邓廷桢由粤抵闽，立即增强沿海兵力，分饬水陆官兵加意严防，并自广东购得洋炮十四门，添筑炮台，加强福建防务。鉴于形势紧迫，永久性炮台来不及构筑，兵部尚书祁寯藻建议以炮墩代替炮台，于沿海险要处用沙袋筑成简易炮台，以资御敌。

祁寯藻：《议设炮墩控制英船及奸民贩烟船只片》，《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中华书局1964年版，下同）（一），第291页。

据祁寯藻《议设炮墩控制英船及奸民贩烟船只片》载：炮墩的构筑方法是：“用麻布袋，每个长四五尺，径尺余，实以沙土，层层堆积，高低自五层以至十余层，厚薄自两层以至三四层，长短自十余丈以至百余丈，相地势之远近、广狭斟酌为之。沙墩之外，用旧小渔船侧竖，船底向海，船舱向内，紧贴沙袋，牢固拴缚，以为沙囊保护。炮位安于墩内，炮口出于船外，其两船夹缝处所，即是天然炮洞。我兵在内瞄准施放，可以克敌，而全身藏于墩内，敌人炮子不能致伤。……沙性最柔，非如砖石可以摧裂，弹子打穿船底，遇沙即止，不能穿过，极为稳固。”

（三）林则徐的战备措施

林则徐抵粤后，在严厉禁烟的同时，陆续采取了一系列战备措施，以应付日益紧张的形势。这些措施是：整顿水师，严肃军纪，演练枪炮，以提高战斗力；在尖沙嘴、官涌等处新建炮台；秘密购置西洋大炮，使虎门各炮台的大炮增至三百余门；购置西洋大船，改装民船，招募渔民、蛋户（以舟为家的土民）丁壮五千余人，加以训练，准备杀敌；此外又抽调广东内地营汛防兵，加强第一线兵力，使虎门的水陆兵力增至三千余名，澳门增至一千三百余名，尖沙嘴增至八百余名。

林则徐还就如何对付英军入侵问题，提出过一些具体设想，概括起来，其基本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守为战，以逸待劳。他在 1840 年 3 月 7 日的奏折中写道：英人“妄夸炮利船坚，各夷船恃为护符，谓可沮我师之驱逐。臣等若令师船整队而出，远赴外洋，并力严驱，非不足以操胜算，第洪涛巨浪，风信靡常，即使将该夷船尽数击沉，亦只寻常之事。而师船既经远涉，不能顷刻收回，设有一二疏虞，转为不值，仍不如以守为战，以逸待劳之百无一失也。”

第二，在近海陆地歼敌，不在远洋接仗。林则徐于 1839 年 9 月奏称：有些被英吉利之名所震惊者，往往以其船坚炮利而称其强，而不知其兵船笨重，吃水深至数丈，仅能取胜外洋，只要不与之外洋接仗，其技即无所施。该兵船一旦进入内河，就会运棹不灵，一遇水浅沙胶，更难转动。其货船进口，尚需以重金雇请当地人导引，兵船则更不待言。“且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

第三，组织民众，军民配合，火攻英船。林则徐到广东以后，一直比较注意依靠民众，陆上则组织乡勇、团练，水上则招募渔民、蛋户等，以便配合军队作战。1840 年 3 月，他与关天培等密商，决定将平时所装大小火船，即雇渔蛋各户，教以如何驾驶，如何点放，每船领以一二兵弁，分赴各洋岛澳埋伏，候至深夜，察看风潮皆顺，即令一齐放出，乘势火攻环护夷船之各匪船，随烧随拿，“许以烧得一船，即给一船之赏，如能延烧夷船，倍加重赏”。

第四，与沿海各省协力筹防，共同对敌。广东封港以后，为防止英国侵略者北窜，清廷令沿海各省督抚严加防范，林则徐对此甚为重视。6 月下旬，大批英舰抵粤，他便“飞咨闽、浙、江苏、山东、直隶各省，饬属严查海口，

林则徐：《英船被逐出口仍在外洋逗留并拿获汉奸折》，《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 277—278 页。

林则徐：《英人非不可制请严谕查禁鸦片片》，《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 217 页。

林则徐：《英船被逐出口仍在外洋逗留并拿获汉奸折》，《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 278 页。

协力筹防”。

林则徐比较正确地认识到英军的长处和弱点，主张避免同英军在外洋作战，而待其进入内河，组织军民不断袭击和火攻，于近战中歼敌，这一指导思想，是颇有见识的。

林则徐是清朝官吏中了解“夷情”较多的一个，他到广东后，“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从中了解西方列强的情况。但由于时间短，手段少，翻译人才缺乏，对敌情的了解毕竟有限，因而有时作出的判断也不够准确。如他在 1839 年 9 月分析英国情况之后得出结论说：“彼万不敢以欺凌他国之术，窥伺中华”。1840 年 6 月中旬，已有英国舰船陆续抵达广东海面，林则徐仍向道光帝奏称：“英夷近日来船，所配兵械较多，实仍载运鸦片”，“借以扬言恫喝，冀可准其贸易之求”。现在各船“只在外洋往来游奕，此东彼西，总无定处。……此外别无动静，诚如圣谕，（该夷）实无能为”。当然，尽管林则徐对英国政府出动海陆军大举进犯中国的可能性估计不足，但其作战指导思想和一系列战备措施，是值得称许的。

林则徐：《英船来粤防守情形并咨各省协力筹防片》，《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 330 页。

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魏源集》（中华书局 1976 年版）上册，第 174 页。据冼玉清考证，《道光洋艘征抚记》的作者不是魏源，而是李德庵、李凤翎父子。（参见《学术研究》1962 年第 2 期《关于 夷艘入寇记》*）

林则徐：《英人非不可制请严谕查禁鸦片片》，《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 218 页。

林则徐：《火创英船办艇等情形折》，《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 315—316 页。

第四节 英军首次北犯与清军定海抗战 (1840年6月—9月)

一、英军封锁珠江口与首次北犯

英国侵华远征军由舰队司令伯麦率领，以舰船三十艘，载陆军四千人，在新加坡集结后，向中国南海进发，于1840年6月下旬陆续抵达广东海面，与先期到达的舰船会合。侵略军采取的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宣布从6月28日起，封锁珠江口。“都鲁壹”号等四艘军舰和一艘武装轮船，被指定执行此项任务。

6月28日，英国全权代表、侵略军总司令懿律率领由英国本土和好望角舰队抽调的三艘军舰赶到广东。懿律会见义律后，决定按照英国政府既定的对华作战部署，除继续封锁珠江口外，立即启程北上，夺占定海，并相机北上渤海湾，以武力逼迫清廷就范。6月30日，懿律和义律率领军舰十艘、武装轮船三艘、运输船二十八艘，由广东海面出发，开始了第一次北犯。

7月初，英舰队驶经福建海面，懿律以递送《巴麦尊子爵致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副本为名，派舰长包诅率“布朗底”号军舰闯入厦门港。

厦门是福建的重要门户，远控台澎，近接金门，水上交通相当发达。厦门及附近各岛驻有清军水师八百五十名，陆兵八百名，另水勇三百余名，在新筑炮墩及旧炮台内共安有火炮二百八十余门。

7月2日，当英舰“布朗底”号由青屿强行入口，并派出一名少尉军官偕翻译划着小船递交照会副本时，遭到岸上清军拒绝。次日，包诅再次派出舢板强行靠岸投送，又遭清军拒绝，英舰遂

发炮轰击，使厦门炮台和民房数处受损。包诅见厦门守军拒绝接收照会，便将它留在沙滩上，退出厦门港，北上追赶舰队。（留军舰及运输船各一艘封锁厦门港，不久又调往定海。）

二、第一次定海抗战

舟山群岛是英军北侵计划中的主要目标，其最大岛屿舟山岛南部的定海，被认为是最适于作司令站的地方。因此，英军舰队在1840年7月3日驶抵舟山海域后，立即派出轮船二只，进至定海城南之道头港水面，进行测量和侦察。

定海县城东、北、西三面都有山峦环抱，城南二里即道头港，其吉祥、竹山、大渠三口，为外洋入港门户。道头港以南，有大小五奎山、大小盘峙山、大小渠山等岛屿罗列海中。清军在定海设有水师镇，共有水陆兵勇二千八百余人。城东南设有炮台一座，安设火炮八门，配兵五十名防守。

7月4日，伯麦率英舰数艘闯进定海水域。清军水师竟毫无戒备，不仅未予拦截，还由知县姚怀祥登舰询问来意。伯麦交给姚一份事先准备好的中文照会，限次日下午2时前投降，将所属海岛、炮台一律交出，否则开炮轰城。姚怀祥返回后，即会同文武官员商讨对策。多数人认为英军所长在于船炮，宜将水陆部队的一半撤至离城一里的半路亭一带堵击，一半撤至城中防守。姚怀祥则主张撤兵入城，坚守待援。他向总兵张朝发建议：“夷未知我虚实，宜坚壁待外援；我兵毫无纪律，若浪战一败，城破矣。”张朝发却认为守城不是水师的职责，水师的本分是扼守海口，不让敌兵登岸。由于意见不一，只好水陆分守：张朝发将城外各营及水师齐集港口防堵；姚怀祥则率兵千余守城。二人并约定：“在外者主战，战虽败不得入；在内者主守，守虽溃不得出。”

5日下午2时，伯麦见清军无献城投降的迹象，便令“威里士厘”号等四艘军舰发起进攻。张朝发率水师进行抵抗。由于英军舰大炮多，射程较远（一千至两千米），清军船小炮少，射程又近，交战不久，清军水师损失甚重，张朝发也受伤，即率部向镇海方向退却。英军便在舰炮掩护下登陆，攻占了定海城东南的关山（亦名东岳山）炮台，并连夜炮击定海县城。6日凌晨，英军攻破东门，知县姚怀祥出北门投水自尽，守城兵勇溃散，定海遂告失陷。

第一次定海之战，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丧师失地的战斗。此次作战失利原因，主要在于清王朝对外敌入侵缺乏警惕，以致除广东外，沿海戒备不严，给了敌人以乘虚袭取的机会。诚如当时人夏燮所说：“当日之误，误于浙洋之全无准备，豕突而来，措手莫及”。其次，定海清军事先既疏于戒备，临战又互不协同，水师不顾彼己船炮悬殊而与敌正面对阵，结果迅速溃败，陆师则单纯守城，没有依托有利地形节节阻击敌人，也没有采取防敌炮击的有效措施，以致一遭炮击即兵溃城陷。

定海失陷后，浙江巡抚乌尔恭额于7月9日赶到镇海，会同浙江提督祝廷彪布置该处防务。此时，镇海各营汛仅有官兵二千余名，乌尔恭额急调湖州兵三千加强镇海防御，并建议粤、闽两省各派水师二千“星飞来浙，会同浙省各镇并力痛剿”。7月24日，清廷以定海失守，将乌尔恭额和祝廷彪革职留任。8月6日，命两江总督伊里布为钦差大臣，驰赴浙江查办和主持军务。

英军攻陷定海后，委任管理军民事务的官员，准备长期占领。同时，派出军舰、轮船各一艘，封锁甬江口；另以舰船五艘，前往长江口进行测量侦察，其余舰只则进行北犯渤海湾的准备工作。英军在定海四郊张贴布告，引

汪洵：《光绪定海直隶厅志》，《鸦片战争》（四），第374页。

参见姚薇元《鸦片战争史实考》第53页。

夏燮：《中西纪事》，《鸦片战争》（四），第653页。

诱逃匿民众回城，甚至诱以鸦片，但回城者寥寥无几。侵略军粮食困难，便组织抢劫队，搜抢粮畜，抓捕群众。定海附近的人民群众以各种方式进行反抗，岑港守军也始终坚守港口及附近岛屿未退，伺机袭扰敌人，给了侵略军以一定的杀伤和牵制。

三、英舰北犯渤海湾与中英大沽口交涉

1840年7月28日，懿律和义律率“威里士厘”号等舰船八艘，驶离舟山群岛北上，8月5日过山东半岛成山角，6日越过大小竹岛、高山岛和候鸡岛，侵入渤海湾，9日进泊大沽口外。

道光帝已于8月3日接到林则徐的奏报，得知英舰可能北上天津。他满以为天津海口防范严密，“果有夷船驶入，自可有备无虞”，因而态度比较强硬。他谕令直隶总督琦善：英舰“倘驶至天津，求通贸易，……断不能据情转奏，以杜其觊觎之私。倘有桀骜情形，即统率弁兵，相机剿办。”但当8月9日接到琦善的复奏，得悉天津炮位陈旧、兵力不足时，态度便立刻软下来，当日又改谕琦善：“督饬所属严密防范，临时仍相机办理，如该夷船驶至海口，果无桀骜情形，不必遽行开枪开炮。倘有投递禀帖情事，无论夷字汉字，即将原禀进呈。”8月10日，琦善接旨，次日即派游击罗应鳌前往大沽口外，探询英方企图。经道光帝批准后，琦善于8月15日（一说17日）派千总白含章前往英舰取回《巴麦尊照会》，并立即呈送北京。

道光帝接到《巴麦尊照会》后，得知英国侵略者要求赔礼道歉、偿还烟款、割让岛屿等。他对外慑于英舰的威胁，对内偏信“弛禁派”琦善等的谗言，便将“办理不善”的责任强加于林则徐、邓廷桢身上。他以为只要惩办林、邓二人，英国侵略者便会从此息兵。8月20日，他要琦善向英方表示：“上年林则徐等查禁烟土，未能仰体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蒙，措置失当。兹所求昭雪之冤，大皇帝早有所闻，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8月21日，又在林则徐的一份奏折上批道：“外而断绝通商，并未断绝；内而查拿犯法，亦不能净。无非空言搪塞，不但终无实济，反生出许多波澜，思之曷胜愤懑！”这不仅是对严正的禁烟运动和林则徐等“严禁派”的打击，也是对中国军民反对英国侵略的正义行动的否定。

8月30日，琦善与义律在大沽口举行会谈。他对英方所提无理要求，含糊其词地表示“定能代申冤抑”，多方劝说侵略者尽快“返棹南还，听候办

《廷寄二》，《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337—338页。

《廷寄》，《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359页。

《廷寄三》，《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392页。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393页。

理”。

9月15日，英方表示同意将谈判地点改到禁烟所在地广东，并即日起碇南返。英国舰队之所以在谈判未获任何结果的情况下同意南返广东，而不在渤海湾采取军事行动，主要由于当时“季节的将近终期，北季候风的到来，岸上部队和舰队水手间流行的病疫等”原因。懿律等认为，在来年春季到来之前，是不宜采取任何积极的军事行动的。

英军舰队的暂时南撤，道光帝竟认为是外交上的一大“胜利”。他在伊里布的奏折上得意地批道：“英夷如海中鲸鳄，去来无定，……好在彼志图贸易，又称诉冤，是我办理得手之机，岂非片言片纸远胜十万之师耶？”正是在这种愚蠢侥幸的心情下，他派琦善为钦差大臣，兼署两广总督，前往广东“查办”，对为严禁鸦片而建立了历史功勋的林则徐、邓廷桢，则都给予革职处分。与此同时，道光帝命令琦善“将应留应撤各兵，分别核办”，接着又谕令沿海各督抚也酌量裁撤防兵，以节饷糈。这种自拆藩篱的愚蠢行径，无异于开门揖盗。

琦善：《晓谕英人暨其登答情形折》，《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425页。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513页。

《廷寄》，《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466页。

第五节 广东军民的抗英作战 (1841年1月—5月)

一、广州谈判破裂

1840年11月中旬，懿律和义律率领“麦尔威厘”号等四艘军舰和一些辅助船只离开定海，于11月20日抵达澳门。英国驻印度总督奥克兰对大沽谈判的结果十分不满，责令懿律等采取更为强硬的态度。

11月29日，琦善到达广州，不久即与英方代表开始谈判。义律（懿律因病回国，全权代表由义律接任，远征军总司令由伯麦接任）遵照奥克兰的指示精神，坚持其偿还烟价二千万两，割让香港，开辟厦门、定海为商埠等无理要求，并一再以开战相威胁。

琦善对禁烟态度一贯消极，此次奉命赴粤，原只准备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他在赴粤途中就公开扬言：“现在办理夷务，在柔远不在威远”，“英夷强横，非中国可能敌”。他到广州后，非但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广东防务，反而将数千名义勇解散。虎门内外各隘口原有防兵万余，琦善抵粤前，林则徐在道光帝严斥下已被迫撤去二千名，琦善到任后，又大加裁撤，并将水师水勇船只或撤或裁，又拆除江底暗桩等障碍物，以迎合英国侵略者，求得早日达成和议。琦善还向道光帝谎报情况，说什么广东“船炮不坚，兵心不固”，“现在水陆将士中，又绝少曾经战阵之人，即水师提臣关天培，亦情面太软，未足称为骁将”，企图以此争取道光帝同意他在谈判中所持的妥协求和态度。琦善的所作所为，不仅打击了清军的士气，而且给了英国侵略者进行军事讹诈以可乘之机，加速了广州谈判的破裂。

英国侵略者为了加强其在谈判中的地位，于12月上旬，出动兵船二十余艘陆续驶抵虎门外，进行武力威胁。琦善见事出紧急，不得不把义律要求割让香港等事上报清廷。12月30日，道光帝在琦善奏折上十分恼怒地批道：“看此光景，该逆夷反复鸱张，恐难以理喻。必当一面论说，一面准备，多方羁縻，待其稍形疲惫，乘机剿戮，方可制伏也。”于是又下令琦善及沿海督抚严密防范，令四川备兵二千，湖南、贵州各备兵一千，听候调遣，令伊里布准备收复定海。在此情况下，琦善不得不抽兵二千分布于广州以东江岸。但义律认为，只要对琦善施加军事压力，便会取得满意的结果，因而在谈判过程中，悍然对虎门要塞区的沙角、大角炮台发起进攻。侵略者的大炮，

《会审琦善亲供》，《鸦片战争》（四），第210页。

高人：《琦善将白含章鲍鹏带往粤东或至别构事端折》，《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645页。

琦善：《照复英人并筹办防守情形折》，《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655页。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617—618页。

宣告了琦善“柔远”政策的破产。

二、沙角、大角清军抗击英军的侵犯 (参见附图一)

沙角炮台位于虎门口东侧的沙角山上，安有旧式铁炮十二门，大角炮台位于虎门口西侧的大角山上，安有旧式铁炮十七门。山上筑有了望台，炮位沿山环绕布置。炮台围有石墙，并有外壕环护，有些地方埋设了地雷。琦善撤兵以来，两台均仅驻有防兵数十名。虎门形势紧张后，才由副将陈连升率兵六百余名，临时加强两台的防御。

1841年1月7日上午8时，一千五百余名英国侵略军以及临时招募的流氓、游民数百人（一说二千人），分左右两支队，向沙角、大角炮台同时发起进攻。

英军以右支队担任主攻，计有一千四百余人，由“加略普”号等三艘军舰和四艘轮船运载，负责进攻沙角炮台。当三艘军舰驶达预定水域后，立即对沙角炮台进行炮击。与此同时，登陆部队在川鼻湾登岸，抄袭炮台侧后。由于守军大部集中在炮台及其周围，四周要隘和山顶兵力薄弱，因此，两小时后，英军即占领了各制高点，并安好了野战炮，俯击沙角炮台。在敌人水陆夹击下，守军腹背受敌，伤亡甚众。不久，英军突入炮台，守台清军英勇抵抗，大部伤亡，陈连升父子也英勇牺牲，沙角炮台遂被英

军占领。停泊在沙角附近的清军水师船十余艘亦同时被毁。老将陈连升年过七旬，曾在反击英舰挑衅的战斗中屡立战功，此次又督兵坚守沙角炮台，直至以身殉国，是清军中突出的爱国将领之一。

进攻大角炮台的英军左支队，主要由“萨马兰”号等四艘军舰组成。它们锚泊在距大角炮台很近的地方，用舷侧炮压制炮台火力，摧毁胸墙、炮洞、围墙多处。与此同时，部分兵力从南北两侧登陆包抄炮台。守军被迫将大炮推入海内，突围撤退，大角炮台随即失陷。英军放火烧毁营房，拆毁炮台，然后全部撤回舰上。

沙角、大角之战，清军伤亡六百余名，英军死伤百余人。在这次防御战斗中，清军凭借有利地形和要塞工事，给了进攻之敌以一定的杀伤，但由于防守兵力不足，战术呆板，炮台侧后暴露，经不起英军正面炮击与侧后登陆的包围攻击而陷入被动。当时，水师提督关天培和总兵李廷钰等各率兵数百防守横档、武山各炮台。关天培深感前线兵力单薄，派李廷钰回广州“哭求增兵”，全省文武亦请求派兵往援，而琦善却以有碍“抚议”为由，按兵不

陈连升（？—1841），湖北鹤峰人，行伍出身。1839年李部击退盘踞珠江口官涌之英军，因功擢三江口副将，调守沙角炮台。

动，坐视沙角、大角两炮台被英军攻占。

三、英军霸占香港

沙角、大角陷落后，琦善非但不从中汲取教训，反而把它作为妥协求和的借口，更加强调敌军船炮的厉害，并胡说什么广东地势无险可扼，军械无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坚，与敌交锋实无把握。1841年1月中旬，他照会义律，表示愿意“代为奏恳”，在尖沙嘴或香港地方择一隅（并非全岛）供英人寄居（并非割让）。然而，义律不待琦善“代为奏恳”，迫不及待地于1月20日单方面发布“公告”，诡称“和中国钦差大臣已经签订了初步协定”，“香港本岛及其港口割让与英王”。六天之后，即1月26日，英军便强行占领了香港。第二天，琦善与义律会于莲花城（今广东番禺县莲花山）。义律出示他拟定的条款，琦善不敢应允。对此，英方记载也很明确：“他们毫未达成具体协议”。2月10日，琦善与义律又会于穿鼻洋蛇头湾。琦善拿出了自己的“章程”草稿，其中包括“准就新安县属之香港地方一处寄居”。义律不满足于寄居一隅，“坚求全岛”，以致会谈仍无结果。英国殖民者声称义律和琦善签订了《穿鼻草约》，将香港割让给英国，纯属讹诈。

四、清廷对英宣战

1月27日，沙角、大角炮台失守的消息报到北京，道光帝甚为恼怒，当即决定对英宣战。他一面命令文华殿大学士穆彰阿等将英国侵略行径“通谕中外知之”，一面命令两江总督伊里布“克日进兵，收复定海”，令琦善“激励士卒，奋勇直前”，并令沿海各省将军督抚“加意巡查，来则攻击”。接着，又令御前大臣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和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前往广东主持军务。除催促湖南、四川、贵州、江西各省所派之兵共六千人迅速启程赴粤外，又增调四川兵一千、湖北和贵州兵各一千五百、云南和湖南兵各五百，兼程开赴广东。2月26日，道光帝接到广东巡抚怡良关于英军强占香港的奏报，立即下令将琦善革职锁拿，并查抄其全部家产。同时，补授原刑部尚书祁 为两广总督，未到任前由怡良署理。道光帝著怡良

[美]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一卷，第306页。

[英] 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鸦片战争》（五），第175—176页。

琦善：《筹防堵英船并酌拟章程底稿呈览折》，《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814—815页。

参见《光明日报》1983年2月2日第3版胡思庸、郑永福文章：《川鼻草约 考略》。*

《上谕二》，《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712页。

等“一俟奕山、隆文到粤，即行大张挞伐，极力攻剿”。

五、英军侵犯虎门，清军浴血奋战

早在2月中旬，义律在获悉清廷向广东调兵遣将和对英宣战的消息后，便立即命令英军备战，准备进攻虎门和广州，以先发制人。2月19日，英舰开始向虎门口集结。25日前，英军完成了进攻虎门的临战准备。

英军经过侦察，发现下横档岛没有设防，遂于2月25日下午派出炮兵分队，携带臼炮三门，在一百五十名步兵护卫下，由“复仇神”号轮船拖运至该岛登陆，并连夜选择阵地，安设炮位。

26日清晨，占据下横档岛的英军炮兵猛烈炮击上横档岛，压制横档、永安两炮台的火力。与此同时，英军派舰船阻断清军增援上横档岛的水道，另以四艘军舰由西航道驶入，对上横档岛形成半月形包围，用舰炮轰击，以掩护另外三艘大型舰船和三艘火箭船进攻东岸的南山。一个多小时后，上横档岛守军被压缩于炮台内，英军乘势在西端的永安炮台附近登陆。经过激战，守军阵亡三百余人，一部被俘，少数突围，上横档岛遂被英军占领。进攻南山的英舰由于风潮不顺，直到上午11时半，两艘最大的军舰“伯兰汉”号和“麦尔威厘”号才乘涨潮冒着炮火驶抵距南山一里左右的水域，以右舷炮向威远、靖远炮台轰击。关天培在靖远炮台亲自指挥守军沉着应战。不久，英军三千余人在炮台翼侧登陆，威远、靖远、镇远三炮台守军在敌炮猛烈轰击下，坚持抗击一个半小时，镇远台守军不支先溃。在靖远炮台的关天培受了重伤，仍坚持战斗，最后英勇牺牲（一说见大势已去，自刎而死），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靖远炮台守军随关天培阵亡者数十人。英军攻下南山各炮台后，用汽船拔除水中木桩，破坏铁链，疏通航道，以备溯江直犯广州。当日下午4时许，英军另一部进攻西岸南沙山下的巩固炮台，守军未予抵抗即四散溃逃。英军将炮台和营房毁坏后，撤回军舰。至此，虎门要塞各炮台除大虎山台外，全被英军攻破。

英军攻破虎门横档地区六座炮台之后，2月27日即由“加略普”号舰长率领军舰五艘、轮船二只溯珠江而上，进攻离广州仅六十里的乌涌。该处由署湖南提督祥福等率领湖南兵九百名（2月22日才赶到广东）和广东兵七百人驻守。由于工事尚未就绪，加之江水暴涨，炮位多没水中，只有东南角一炮，可以射击，但炮架笨重，土质又松软，不能转动，以致不能命中。英军立即换乘舢板登陆，直扑炮台。祥福等率部奋勇抗击，用鸟枪毙敌二百余人。后因火药将尽，清军且战且退。英军乘势猛攻，占领炮台。祥福以下五百余清军阵亡，其余溃散。3月2日，英军又西陷猎德炮台，逼近省城广州。

此后，英舰游弋于二沙尾、大黄滘内外，“或三五只，或六七只，距省

二十余里之间，零星停泊，聚散靡常”。

六、广州清军的抗英作战

（一）英军缓兵待援，清军布防广州

春季是广州进行中外贸易的旺季。自1月上旬英军攻陷沙角、大角以来，英国和其它国家的商船停泊珠江口外，迫切要求开市贸易。同时，英军也急需增加兵力，然后才敢进攻广州。清军方面，参赞大臣杨芳虽于3月5日到达广州，但主帅奕山和另一参赞大臣隆文尚未抵达，从各省调集的兵勇也未到齐。在此情况下，义律与杨芳出于各自的需要，达成临时休战协议。从3月20日起，广州恢复贸易。但是，杨芳等“先通商暂作羁縻”以待大军的主张，有违道光帝的本意。4月18日，道光帝大加斥责说：“现在各路征调兵丁一万六千有余，陆续抵粤（按：杨芳于4月3日奏称：奉调之贵州、湖南、江西、四川等省官兵，陆续到粤者已有八千余名），杨芳何以不痛加剿洗，乃迁延观望，有意阻挠，汲汲以通商为词，是复蹈琦善故辙，变其文而情则一，殊不可解。”并令奕山等到粤后“迅速督饬兵弁，分路兜剿，务使该逆片帆不返，俾知儆畏。倘夷船闻风远遁，空劳兵力，惟该将军等是问。”

兵力不足是英军面临的重大问题。为了集中兵力于广东，定海英军遵照义律的命令，于2月25日撤离南下，3月初先后抵达广东。这时，新任英国远征军陆军总司令卧乌古也率兵七百名赶到。即使这样，英军能参战的人员仍不过三千余人，不敷扩大侵略战争的需要。为此，侵略军总司令伯麦于3月31日离开广东，前往印度加尔各答，向奥克兰报告广东军情，并争取援军，以便加强进攻广州的力量。

广州城分新城和老城（或称外城、内城），均系明代建筑。它南濒珠江，北依白云山，沿江傍山筑有大小炮台十五座，防卫相当严密。

4月14日，奕山、隆文、祁 抵达广州。林则徐向奕山提出六条御敌措施，未被重视。奕山与隆文、杨芳等计议，判定英军进攻广州，“必由东南、西南两路而入。东南一带，水面较窄，中流亦浅；西南由白鹅潭直接大黄滘，水面宽阔，中流水深三四丈不等，此路最当贼冲”。接着，将本省

杨芳：《筹备攻守机宜折》，《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883页。

《廷寄》，《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956—957页。

林则徐提出的六条御敌措施：一，堵塞水道要口；二，洋面船只查明备用；三，炮位验演拨用；四，火船水勇，整理挑用；五，外海战船，分别筹办；六，夷情宜周密探报。（参见梁廷楠《夷氛闻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5页。）

奕山：《官兵渐次到粤分守要隘折》，《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1003页。

和外省调来的清军，作了如下部署：除原广东兵仍分守城垣及各炮台外，派江西、湖南、广西兵共一千一百名，在城上分段协防；派四川兵六百名，扎于外城西南靖海门外，以固西炮台后路，并在城南之东西两炮台安设新铸八千斤大炮二门，控制江面；于城北之东西得胜炮台等处，布置四川、江西等省兵四千名，以为犄角；以贵州、湖北兵四千一百余名分置于城东北与西北两处，以策应东、西、北三面的作战；以湖南兵一千二百名扎于城北，联络旧城北面守城兵，以壮声威；截留广西兵一千五百名于佛山，以保护粮台重地。同时，从广西购买大木，于韶关、肇庆制造木排，从江西、广西催造大炮，在香山、东莞一带招募水勇二三千人。此外，尚有两湖、四川、广西兵共约四千余人正在赴粤途中。

（二）英舰沿江上犯，清军三路反攻

在道光帝的严令催促下，奕山等决定于5月10日以后选择月黑潮顺之夜，对侵入广州附近的英军发起一次反攻，企图以夜袭取胜，进而收复各处炮台。当时，英军舰船早已占据大黄滢、二沙尾二要隘，并经常游弋于白鹅潭一带。

由于连日大雨，河水骤涨，清军未能“克期进剿”，而英军舰船却乘水涨之机，自大黄滢、二沙尾两路驶进，谋攻省城。奕山等“不敢坐失机宜，遂决计先发以制之”。5月21日，奕山等令陆路兵弁“加意防堵”，令都司胡倬伸、守备孙应照、千总杨泽等率领熟悉水性的义勇一千七百余名，暗藏火箭火弹，手执钩镰，于傍晚潜出城外，分伏三处：一伏西炮台为中路；一伏东炮台为左路；一伏城西北之泥城为右路。约定于三更后一齐出动，利用夜暗乘驾小快艇靠近敌船，用长钩将其钩住，抛掷火箭火弹，火攻泊于二沙尾和白鹅潭一带的英军舰船。英军对清军的反攻早有察觉和准备，21日白天，义律即通令住在广州的外国人于日落前秘密离开广州。当晚11时许，清军发起攻击。英军立即开炮还击，由于舰船较高，火炮死角较大，打不到附近水面，因而有的英船受创，少数侵略军跳水溺死。与此同时，清军西炮台和东炮台也向江中的英船射击，给英军舰船以一定杀伤。但整个战斗的战果不大，英舰未沉一艘，而中国民船却被烧掉不少。同时，当晚清军冲入商馆区搜捕义律等人时，也一无所获。次日黎明，英舰乘顺风发起进攻，对西炮台进行猛烈炮击，守军溃退。英军接着进攻泥城，数十只民船、木筏及大批造船材料被毁。奕山等筹划多时的广东反攻作战，由于谋划不周、敌已有备等原因，遂以失败告终。

奕山：《乘夜焚剿省河英船折》，《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1029页。

关于这次夜袭的战果，据奕山等奏称：共烧大兵船二只，大舢板船四只，小舢板数十只。英方记载：帆船“曙光”、“路易沙”号损失很大，兵船“摩底士底”号上三人受伤，两根护桅索被切掉。

（三）英军围攻广州，迫签《广州和约》

清军三路反攻失利，英军决定乘势进攻广州城。义律等根据侦察所得的情报，选定城西北为主攻方向。在此方向上，首先夺取西炮台，尔后绕道城西直插城北越秀山，夺取山上的炮台，控制俯瞰全城的制高点。同时，以一部兵力进攻城西南的商馆区，吸引清军注意力，保证主攻部队的行动。攻城英军共二千七百五十三人，其兵力部署是：以英军第 26 团为右纵队，配属炮兵二十人和工兵三十人，共三百六十人，担任进攻商馆区的任务。以英军第 49 团、第 18 团及水兵、炮兵等共二千三百九十三人为左纵队，在广州城西北清军防备薄弱的泥城、缙步一带登陆，担任主攻。左纵队分为四个大队：步兵大队由英军第 49 团、马德拉斯步兵团和孟加拉“志愿军”各一部编成（共六百四十六人）；炮兵大队由马德拉斯炮兵和皇家炮兵、印度工兵各一部编成（共四百一十七人），携各型野战炮十三门；水兵大队由“威里士厘”号和“宁得罗”号舰的水兵编成（共四百三十人）；预备大队由皇家海军陆战队和英军第 18 团编成（共九百人）。

5 月 24 日下午 3 时，英军右纵队开始在商馆附近登陆，未遭任何阻击就占领了商馆区。该区紧靠城南，对广州城威胁甚大，但广州城高兵多，进攻不易奏效。在右纵队登陆一小时后，左纵队搭乘的三十只船在铁壳轮船“尼米斯”号（即“复仇神”号）拖带下，溯江而上，于下午 6 时到达登岸地点。当晚，步兵大队和炮兵大队一部先后登岸，遭到当地壮勇的阻击，死伤数十人。但湖南兵为了争功，竟在后面乱放排枪，击伤壮勇多名，引起混乱。英军后续部队趁势大批上岸，占领了附近一座庙宇和一些高地，布置了警戒。25 日凌晨，英军全部上岸，经由西村、流花桥直扑北门外各炮台。

广州城北的越秀山一带，筑有炮台六座，自西至东分别为拱极、保极、耆定、永康（即“四方”）和东西得胜炮台，由四千一百名贵州、湖北兵防守。25 日上午 8 时，英军炮兵开始炮击最西端的拱极、保极炮台。9 时半，步兵开始进攻。英军第 49 团负责袭取炮台北侧的一个高地；第 18 团从左面迂回到炮台侧后，占领另一高地，以切断拱极、保极炮台后路，并掩护第 49 团的进攻。从正面进攻拱极、保极炮台的任务，则由水兵大队担负。

防守城北各炮台的清军，稍事抵抗，即放弃炮台和阵地，纷纷退入城内。广东按察使王廷兰欲乘敌立足未稳，带兵出城夺回炮台，奕山不允，清军只得依托城墙不断地炮击敌军。英军占领城北四座炮台和山冈后，居高临下，俯瞰广州全城。万余清军收缩城内，满城大吏惶惶无主。

26 日，英军正准备攻城，奕山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乞和。次日，即与义律达成了屈辱的广州停战协定，即《广州和约》。条约规定：奕山、隆文、杨芳以及全部外省军队，六日内撤至离广州城六十里以外的地方；于一周内交出“赎城费”六百万元；款项交清后，英军全部撤至虎门口外。条约没有

涉及香港的地位问题，但义律却于6月7日单方面宣布香港为“自由港”。

清军在广州城下打了败仗，并与义律签订了屈辱的《广州和约》，奕山等竟编造一套谎言，诡称英军乞和，“求大将军转恳大皇帝开恩，追完商欠，俯准通商，立即退出虎门，缴还各炮台，不敢滋事”等等，欺骗清廷。昏聩自大的道光帝，也明知打了败仗，却于6月18日下谕，以“该夷性等犬羊，不值与之计较”，“朕谅汝等不得已之苦衷，准令通商”为词，默认了《广州和约》。

七、三元里等地人民的抗英斗争（参见附图一）

英军侵入广州地区后，清军节节败退，而广州城郊的人民群众，却自动武装起来，用简陋的武器和农具等不断打击侵略者。广州北郊三元里一带人民轰轰烈烈的抗英斗争，更是成了百余年来中国人民武装抗击外国侵略军的先声。

英军攻占广州城北各炮台后，连日四出骚扰，无恶不作，激起北郊人民的极大义愤和反抗。三元里附近一百余乡的村民，在菜农韦绍光等的联络和号召下，纷纷拿起武器，组成义军，进行武装自卫。他们以北帝庙中的三星旗为“令旗”，相互约定，一村有事，各村支援，共同抗击英国侵略者。

三元里人民抗英战斗指挥旗

5月30日凌晨，卧乌古亲自率领英军第26团和马德拉斯第37步兵团约六百人，分左右两路向三元里一带进犯。在敌军进攻面前，义军主动撤向山冈，当英军停止前进时，则鸣锣击鼓，一齐向敌人进逼。英军复进，义军再退，最后将英军诱至牛栏冈附近。此时，伏众四起，漫山遍野，杀声震天，英军被迫转入防御，处境十分狼狈。下午2时，雷雨将至，英军为摆脱被动，再次发起进攻。义军依然不与敌军正面交锋。不久，大雨倾盆，英军火药尽湿，枪打不响。义军乘机从两翼包抄，迫使英军后撤。义军趁势追击，用长矛和钩镰枪刺死刺伤敌人十四名。在追击过程中，一路义军截住了英军第37团的一个连（共六十人），将其包围于稻田中，用刀矛毙伤三十四名印度雇佣兵。后英军派出两个水兵连，带着“雷管枪”前来增援，这个被困两小时之久的连队才抬着伤员，狼狈逃回营地。接着，抗英群众重重包围了四方炮台。

三元里人民缴获英军的军装、肩章等物品

奕山：《英船攻击省城并请权宜准其贸易折》，《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1044页。

《廷寄》，《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1046页。

当时，印度军装备的是比较落后的燧发枪，一遇雨淋便不能使用。但英军已部分装备了先进的用雷管击发的布伦司威克式步枪，子弹仍是球形，前装药，射程为三百三十米，雨天已不受影响。英军派到三元里增援的两个水兵连，即装备这类步枪，俗称“雷管枪”。

在三元里一带人民围歼英国侵略军的同时，三山村人民也拿起武器，毙伤另路英军多人，缴获火炮二门及枪械一部。广州附近其它各地的人民群众也纷纷自动参加抗英斗争。5月28日，佛山镇义民围歼占据龟冈炮台的英军，伤敌数十人，击毁舢板数只。新安县武举庾体群等亦组织群众，于5月24日深夜袭击泊于虎门的英船，烧毁一艘。所有这些，都表现了中国人民坚决反对外来侵略的英勇斗争精神。

5月31日，英国侵略者以进攻广州城相威胁，迫使奕山派余保纯出面诱骗和威胁抗英群众，解散了义军。6月1日，英军根据《广州和约》的规定开始撤离广州，6月7日全部撤至珠江口外。

英军此次沿珠江北进，孤军深入百余里，进犯广州，本为清军提供了极好的歼敌机会。当时，集中于广州附近的清军不下二万人，占有很大的兵力优势，又有纵横交错的江河港汊和山冈林木可以利用，有坚固的城池和众多的炮台可资依托，有广大民众爱国武装的自动支援，完全可以利用以逸待劳、以众击寡的有利条件，多方袭扰和打击敌人。特别是英军在广州登岸之后，基本上不再拥有“船坚炮利”的优势，清军更可以己之长，击敌之短，给敌人以重创。但清军不仅在水上敌不过英军，在陆上同样不能取胜，这是清廷昏庸、将帅无能的表现。清军军事思想保守，筑城落后，战法呆板，加以临时从各省抽兵参战，非但兵将互不熟悉，而且互相对立，互不支援，虽然数量上占有很大优势，却形不成一支组织严密、指挥统一、行动一致的军队，这些都是失败的重要原因。即使如此，仍有部分爱国官兵在战争中表现了不屈不挠的英勇牺牲精神，特别是手持简陋武器的三元里等地人民，凭着一腔热血，有勇有谋，使拥有良好武器装备的英军多次陷入重围，遭到重大杀伤，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

第六节 英军再次北犯与清军浙东反攻 (1841年8月—1842年3月)

一、英国决定扩大侵略战争

1841年4月，义律关于签订所谓《穿鼻草约》的报告送到伦敦。英国政府嫌义律勒索太少，责备他违背了政府的训令，在已经获胜的情况下，“同意了极其不够的条件”，尤其是不该同意撤出舟山。4月30日，英国内阁会议决定召回义律，改派璞鼎查为全权代表，主持和扩大侵华战争。

璞鼎查于6月5日离开伦敦，途经印度孟买，会同新任侵华海军司令巴加，于8月10日抵达澳门。璞鼎查离伦敦时，巴麦尊除了重申原给义律的训令依然有效外，要求他抵达中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新占领舟山。因此，璞鼎查到达澳门后，就立即准备北犯。8月21日，他会同海军司令巴加和陆军司令卧乌古，率领军舰十艘、轮船四艘、运输船二十一艘，装载陆军二千五百余人，驶离香港，开始了英军的第二次北犯。以军舰六艘和轮船二只，以及陆军一千三百余人留守香港。

二、厦门清军的抗登陆作战

英军退出虎门后，清廷误认为战争已经结束，乃于7月28日通谕沿海将军督抚，酌量裁撤各省调防官兵。8月上旬，专办浙江军务的钦差大臣裕谦接奕山、祁 等咨文，获悉英军即将再犯闽浙，乃要求清廷暂缓撤退江、浙两省防兵。道光帝竟于8月19日作了如下批复：“如果逆夷别有思逞，断无先行传播透漏之理。著裕谦仍遵前旨，会同刘韵珂、余步云体察情形，于镇海、定海紧要处所，酌量暂留弁兵外，其余调防官兵，即著奏明裁撤归伍。……不必为浮言所惑，以致糜饷劳师。”可是，事隔数日，英国军舰的大炮就在厦门开火了。

厦门的防务，自上年7月英军第一次侵扰以后有所加强：东面的白石头至沙坡尾一带，改沙囊为石壁，高一丈，厚八尺，长五百丈，每五丈留一炮洞；其它滨海之处，也增加了炮位和兵力，以防敌人登陆。鼓浪屿是咽喉要地，有数座坚固的石砌炮台，安炮七十六门，并环以沙墩炮台，以加强主炮台的防御能力。英军再次进犯前，整个厦门地区共安设大小火炮二百七十九门，有水陆防兵二千八百名，并有近万名水勇、乡勇可资调遣。

[美]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一卷，第306页。

璞鼎查（1789—1856），英国人。1803年随英国海军至印度，参与殖民活动近四十年。1840年在侵略阿富汗的战争中晋封男爵。因富于侵略亚洲“经验”，受到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的赏识。

《廷寄》，《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1129页。

8月25日晚，英舰队自广东驶抵厦门南之青屿附近碇泊集结，随即给福建水师提督龔振彪发出限期献出厦门城的最后通牒。这时，龔振彪正率水师出巡外洋，闽浙总督颜伯焘便督同道员刘耀椿，传令清军据守各要隘，准备抗击敌人。

26日晨，英军先以火轮数艘对鼓浪屿和厦门实施火力侦察，接着，大队兵船闯入。白石头、鼓浪屿、屿仔尾等炮台守军，以猛烈炮火三面环击。英军采取各个击破办法，集中七八艘舰船的二百多门火炮对各炮台逐一猛轰。下午1时，英舰三艘对鼓浪屿和厦门沿岸各炮台继续进行炮击之后，英军一部乘舢板首先在鼓浪屿登陆。由于敌人“势甚猖獗”，守军稍事抵抗，即行溃散，鼓浪屿遂于下午3时落入敌手。与此同时，另几艘英舰进攻厦门以东各炮台，守军坚决抵抗，有的击退敌登陆兵达三五次之多，副将凌志、总兵江继芸等牺牲，守兵伤亡数百名。下午4时左右，白石头及其以西各炮台被英舰炮火击毁，英军便由此登陆。此后，英舰延伸火力，轰击厦门城，守城清军向虎山退却。傍晚，厦门被英军占领，颜伯焘、刘耀椿等退守同安。

道光帝接到厦门失守的奏报后，急调江西兵二千援闽，并严令颜伯焘收复厦门。此时，道光帝才意识到战事并未了结，英军既占厦门，“难保不乘风北驶，扰及沿海各省”，同时，也感到英军并非只习水战，因而“陆路亦不可不加严备”，于是下令浙江、江苏、山东、直隶、奉天各省将军督抚停止撤兵，“悉心筹画，以固疆圉”。

9月5日晨，英军撤出厦门，以军舰三艘、运输船三只，以及陆军四百名留守鼓浪屿，其余舰船全部北驶。

厦门之战，是一次岛屿要塞的登陆与抗登陆作战。清军从英军第一次进窥厦门之后，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使该处防御工事有了明显的加强和一定的改进，火炮数量也有增加，并新添了少数八千至一万斤的大口径炮。此外，还制定了水师与岸炮协同配合，夹击敌舰，歼敌于近海的作战方案。但是，由于对敌情缺乏不间断的侦察，以致英舰进犯时，水师提督正率队出巡外海，使防御兵力减弱，加之缺乏纵深设防，因而尽管颜伯焘亲临前线督战，守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厦门最终仍不免失陷。

三、第二次定海抗战

早在1841年2月10日，道光帝以定海未能及时收复，命伊里布回任两江总督，以江苏巡抚裕谦接替伊里布为钦差大臣，驰赴镇海，办理浙江军务。

裕谦主持浙江军务之后，亲赴定海，勘察地形，督饬该处守军采取措施，加强防务。定海城三面环山，前有稻桶山、东岳山为屏障，左右有晓峰、青垒诸山为辅翼，形势颇为险要。裕谦督令守军于东岳山顶筑炮城一座，周长

《廷寄五》，《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1158页。

一百三十一丈，并于南面接筑半圆形月城一座，长二十一丈；东自青垒山经道头西至竹山脚，沿岸横筑土城一道，长一千四百余丈；又在青垒山、晓峰岭等山择要安设炮位。至英军再次进犯前，定海城周各山及土城上共有铜铁大炮二十二门，城垣周围有大小炮四十门，另拨给兵船铁炮十门。守军总数增至五千六百余人，由三个总兵分段负责防御：郑国鸿率部防守竹山；王锡朋率部防守晓峰岭；葛云飞率部防守土城。此外，在镇海、定海等地招募水勇一千二百名，并造买各种船只百余艘。

裕谦获知厦门失守及英军继续北犯后，下令浙江各地于炮台四周挖壕，以备守兵防炮之用，并增设铁蒺藜、木栅等障碍物，以加强防御。裕谦是旗人中少有的主张坚决抗英的大员，且具有一定的政治军事眼光。他曾建议再次起用林则徐参与浙江战事，赞扬林则徐“向为兵民所悦服，逆夷所畏惮，其一切设施，亦能体用兼备”。他在向道光帝奏陈敌己情况时指出：英兵船、货船四十余艘北犯，人员逾万（按：实际不到一万），而定海、镇海两处防兵总计不及万人。敌军飘忽不定，随时可集中兵力进攻一地，我则必须扼要分守，时刻防备。这就形成了“彼众我寡，彼聚我散，彼逸我劳之势”，且“我兵本皆未历战阵，又各存一炮火难御之见”。因此，对浙省防御，不无忧虑之处。但他坚决表示：“城存俱存，以尽臣职，断不肯以退守为词，离却镇海县城一步，尤不肯以保全民命为词，接受逆夷片纸。”并说明这样做，并非匹夫之勇，孤注一掷，“盖因镇海地方稍有疏虞，则逆胆愈张，兵心愈怯，沿海一带，必将全行震动”。

9月23日，璞鼎查、巴加和卧乌古等率领英舰七艘、轮船四艘、运输船十九只，装载陆军二千一百余人，到达舟山附近海面，接着于舟山、镇海一带探测航道，勘察地形，侦察清军设防情况，选择登陆地段。27日，英军火轮船、军舰各二艘，乘潮进入竹山门水道。葛云飞督军发炮，断其大桅一根。英舰当即由吉祥门窜出，后又绕入大渠门，复被守军击退。28日，英舰炮击晓峰岭，发炮数百发，并派兵乘舢板登陆，被王锡朋率兵击退。29日，英军携带臼炮三门，登上距道头最近的大小五奎山，并构筑了炮兵阵地。

10月1日上午，英舰队驶入定海城南海域，用舷炮向定海前沿阵地轰击，大小五奎山上的英军炮兵也发炮配合。随后，英陆军在炮火掩护下，分左右两纵队登陆。

左纵队由英军第55团和第18团共一千五百人组成，在道头港以西至竹山一带登陆，进攻竹山和晓峰岭。当面清军在王锡朋、郑国鸿指挥下，进行了顽强抵抗，连续击退敌人数次进攻。但清军的抗击终未能阻止敌人的前进，不久，竹山、晓峰岭即为英军占领，王锡朋、郑国鸿先后阵亡。

裕谦：《请派林则徐差使并拟驻扎嘉兴居中策应折》，《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1040页。对于裕谦的正确建议，道光帝非但没有采纳，反而将林则徐流戍新疆。

裕谦：《筹防镇海片》，《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三），第1226页。

右纵队由英军第 49 团和水兵、海员组成，在道头以东至东岳山附近登陆。这一带的清军，同样表现得很英勇。总兵葛云飞身先士卒，不幸牺牲。连侵略者也承认：葛云飞阵亡后，“他的僚属和我们的军队短兵接战，都英勇地与他同时殉节。高地上的旗手选了一个最显著的地位，站着摇旗，丝毫不怕落在他四旁的从轮船打来的炮弹。”经过激战，清军的左翼阵地也被英军突破。

由于守军连日苦战，伤亡甚众，虽击沉英军舢板数只，并击伤英舰“布朗底”号，终因风大浪险和英舰的封锁，镇海清军难以支援，定海城于 10 月 1 日下午 2 时陷入英军的包围。接着，英军登云梯入城，知县和守军撤离县城，定海再次被英军侵占。军需库中的大量物资落入敌手，其中有三十六门新造的铜炮，被敌人搬上运输船，后用以轰击清军。

第二次定海之战，守军官兵坚守阵地，顽强御敌，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热情。但在组织指挥上，有不少失误之处。如：敌人以数百门舰炮进行有效压制和步兵火器占优势的情况下，仍以密集队形与之对阵，致遭重大伤亡；在工事构筑上，不懂得构筑防炮掩蔽部，也未在城周围利用山地构筑二线防御阵地，以掩护县城；尤为失策的是，没有事先作出前沿阵地和县城失守后的作战方案，只有一手准备，没有第二手准备。舟山本岛面积较大，附近岛屿甚多，又大部为山地，即使县城失守，仍可利用有利地形，不断袭扰和牵制侵略军。但守军将领虑不及此，在武器装备处于劣势情况下，单纯地依靠阵地战同敌人硬拚，结果将士大部阵亡，兵溃城陷，无人招集溃散兵勇继续与敌周旋，使英军得以迅速转移兵力进犯镇海等地。

四、镇海、宁波的抗英作战

镇海位于甬江入海口西岸，东濒甬江，北临大海。甬江口西岸之招宝山与东岸之金鸡山夹江对峙，形势十分险要。裕谦在加强定海防务的同时，对镇海的防务也颇为重视，在招宝山、金鸡山加筑了炮台和工事，增设了炮位，并于甬江口填塞巨石，暗钉木桩。英军进犯前，各炮台共安设大小火炮八十六门，连同定海溃兵，共有防兵五千余人。其部署是：提督余步云率兵千余防守招宝山及其以西之东岳宫；总兵谢朝恩率兵一千五百防守金鸡山；总兵李廷扬率兵数百防守东岳宫以西之拦口埠炮台（该台控扼江口，与金鸡、招宝两山之炮台互为犄角）；沿江两岸停泊火攻船只，凡可登陆之处，均挖掘暗沟，密布蒺藜，分驻兵勇。裕谦率兵千余坐镇县城指挥。

英军攻占定海后，供应困难，急谋进窥镇海、宁波，为其冬季驻军夺取营地。

10 月 8 日，英军在镇海外海黄牛礁附近集结，9 日完成了临战准备。其

[英] 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鸦片战争》（五），第 264 页。

进攻计划和部署是：以舰炮摧毁金鸡、招宝两山的炮台和工事，并阻止镇海县城清军增援，掩护陆军登岸，攻占上述两山（以金鸡山为主要进攻方向）；尔后水陆并进，夺取镇海。登陆部队由陆军、水兵和海员等二千四百余人组成，分为左、中、右三个纵队。左纵队由英军第 55 团、第 18 团以及炮兵、工兵等一千一百七十三人组成，携山炮四门、臼炮两门，由卧乌古指挥，担任攻占金鸡山的任务。中央纵队由英军第 49 团以及炮兵、工兵等五百零五人组成，携榴炮、野战炮各二门，由马利斯中校指挥，协助左纵队夺占金鸡山。右纵队由水兵、海员以及炮兵、工兵等七百九十七人组成，携臼炮两门，由荷伯特舰长指挥，负责攻占招宝山。

10 日晨，英军左、中两纵队在三艘军舰的掩护下开始攻击。中央纵队在金鸡山东北的突出部登岸，占领竺山，随即向金鸡山前进。左纵队乘舢板驶入小浹江登陆，绕攻金鸡山侧后。守军在腹背受敌，并不断遭到英军舰炮和野战炮猛烈轰击的情况下，顽强抵抗，多次同进攻之敌展开肉搏战。终因伤亡甚众，总兵谢朝恩也受伤落海阵亡，金鸡山遂为英军所占。与此同时，英军“威里士厘”号等大型军舰四艘，以二百余门舰炮的优势火力，对招宝山实施猛烈炮击。浙江提督余步云贪生怕死，率先弃台逃跑。裕谦指挥镇海城守兵发炮拦阻，余步云仍率部绕山逃往宁波。上午 11 时许，英军右纵队在招宝山西麓登岸，不久即占领了招宝山炮台，居高临下，俯击县城。守军登城抗击，英军以排炮猛轰，掩护其步兵缘梯登城。裕谦见金鸡山、招宝山相继失守，镇海城危，为实践其与城共存亡的誓言，投水自尽。守军伤亡惨重，余部弃城逃走，镇海遂于当天下午落入敌手。

英军攻占镇海后，其海军司令巴加于 12 日乘轮船溯甬江而上，进行测量和侦察。他发觉宁波甚为空虚，即于次日晨率“摩底士底”号等军舰四艘和轮船四只，载兵七百余名，直犯宁波。当时，提督余步云和知府邓廷彩所率清军尚有两千多人，但他们不作任何抵抗，即率部逃往上虞。英军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浙东重镇宁波，夺获城中大批物资。

12 月底和次年初，英军派出小部队窜至余姚、慈谿和奉化，进行骚扰劫掠后又撤回宁波。

英军侵占定海、镇海等地并四出抢掠的罪恶行径，激起了浙东等地人民和爱国人士的强烈反抗。宁波、镇海等处人民自动组织各种群众武装，神出鬼没地打击侵略者。宁波“黑水党”屡出奇计，“四散隐伏，两月之中，擒斩数百”，引起“英人大恐”。同时，台湾人民也组织起了众达数万的自卫团体，抗击英军的侵扰。1841 年 9 月 30 日，英国运输舰“牛布大”号炮击鸡笼港（今台湾省基隆港）时，当地军民发炮回去，使其桅折索断，仓皇退出港口，触礁破裂，舰上人员大部被歼。同年 10 月，英兵船一艘再次窜扰

汪洵：《光绪定海直隶厅志》，《鸦片战争》（四），第 382—383 页。

台湾人民英勇抗击进犯的英军

台湾鸡笼并在三沙湾鼻头山登陆时，当地人民群众配合守军奋力抗击，经两日激战，将敌人逐往外洋。人民群众这种可歌可泣的抗英斗争，与某些清军的望风溃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五、清军浙东反攻（参见附图二）

英军第二次北犯以来，相继攻陷厦门、定海、镇海、宁波等地，不但东南沿海形势紧张，江苏、山东、直隶（今河北）、奉天（今辽宁）等省也纷纷告急，要求增加兵力、枪炮和经费。同时，朝廷内外交章奏议，有的评论失败的原因，有的陈述今后“剿夷战法”，有的名为奏报战防情况，实则认为一切防御皆无能为力，惟有妥协求和。京口副都统海龄把战败原因归于没有“跟踪追剿”，并认为南方各省军队锐气已失，应另调吉林、黑龙江、直隶、山东等省官兵，才能“一以当百，足敷堵剿”。御史黎光曙则认为，“前定海、镇海之所以失利者，由于兵阵单薄，未能层层设伏故也”。他主张海防炮位应分三层布置，“第二层务使坚于第一层，第三层务更坚于第二层”。浙江巡抚刘韵珂则道出了统治集团中妥协投降派的失败主义心声，他奏称：“伏查自古制驭外夷之法，惟战守抚三端，今战守不利，抚又不可，……实属束手无策。”言外之意，惟有妥协乞和一途了。

虽然前线处处失败，朝臣众说纷纭，浙江大吏束手无策，道光帝为维护其统治利益，仍决定再实行一次“大张挞伐，聚而歼旃”的大反攻，以挽回败局，显示“天朝兵威”。

早在1841年10月，道光帝即已任命吏部尚书奕经为扬威将军，副都统特依顺、侍郎文蔚为参赞大臣，并下令从江苏、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四川、山西、甘肃、陕西等省调兵遣将，驰赴浙东。

奕经离京后，一路游山玩水，蓄意迁延，直至1842年1月21日，才到达嘉兴，与文蔚等筹划反攻事宜。当时，浙江各处防御兵丁，已有四万余人，另有义勇乡勇九万余人。奕经、文蔚等表示，一俟各省援兵到齐，即克期进剿，“以正兵明攻其前，以奇兵暗袭其后”。奕经也和奕山一样，不信任当地人民群众。其幕僚臧纡青曾建议：从山东、河南等地招募勇士万人，于沿海及本地招募渔、蛋、盐民二万人，分伏宁波、镇海、定海，“人自为战，战不择地”，袭扰敌人，使其“步步疑忌惊惶，所在皆风声鹤唳，俟其魂飞气馁，然后蹙以大军，伏舟港口，内外交逼而尽歼之”；同时，派当地绅士

海龄：《请吉林等省官兵堵剿浙洋英军折》，《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三），第1328—1329页。

黎光曙：《筹备天津海防折》，《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三），第1421—1422页。

刘韵珂：《战守失利请派元戎速安海嶠折》，《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三），第1300—1301页。

各率兵勇分伏于定海、镇海、宁波三城，“预为内应”。对这样一个颇有见地的“散攻之法”，奕经虽奏报道光帝批准执行，但他们毕竟不敢依靠人民力量抗敌，因而只采纳了臧纡青关于里应外合的主张，而对于散战疲敌、先疲后打的方案，则摒弃不用。

2月10日，奕经等移驻浙江省城杭州。3月上旬，各省援兵到齐，共计一万一千余人，另有水勇、乡勇二万余人，陆续开赴浙东前线。奕经等认为兵力已厚，决定采取“明攻暗袭，同时并举”的方针，一举收复宁波、镇海和定海。其具体部署是：水路（即东路）以乍浦为基地，陆续渡海，潜赴舟山各岛及定海城内外，预为埋伏，候期举动。陆路（即南路）分为两支：一支以二千四百人在慈谿（今慈溪县慈城镇）西南三十里之大隐山集结，准备进攻宁波；另一支以一千九百余人在慈谿西门外的大宝山集结，准备进攻镇海。此外，还在宁波、镇海之间的梅圩预伏勇壮三千余人，准备中途截击英船。另由余步云率兵二千驻奉化防堵，文蔚率兵二千进驻长溪岭（慈谿西北）督战，奕经率兵一千三百余人驻于绍兴以东的东关居中调度，特依顺率兵一千二百余人驻万松岭（杭州南），作为后路应援，兼顾省城和乍浦等地。

奕经等计划虽较周密，但英军已有所察觉，“无日不水陆四出，远近搜掠，拆坏民房，捉拿乡民，追究屯兵处所”。3月6、7日，英军又分头搜索。奕经等鉴于“兵勇距敌较近，惟恐稍迟，致有漏泄”，便决定于3月10日夜发起反攻。

从大隐山出发进攻宁波的一路，由总兵段永福负责指挥。10日夜，都司李燕标带领前锋义勇四百余人，潜赴宁波南门，在内应配合下，杀死守门英兵，冲入城内，直奔府署。途中遭到英军阻击，不支后退。这时，段永福率领的大队赶到西门，由于英军已有戒备，城门紧闭，只得爬城而入，沿街进攻。英军从楼房上面抛掷火球、火箭，使清军进攻受阻。不久，天色已明，清军不得不陆续撤出战斗，反攻宁波遂告失败。

从大宝山出发进攻镇海的一路，由副将朱贵负责指挥。10日夜，都司刘天保率前锋数百人进抵镇海西门外，见城楼起火，知是内应，即冲门而入。由于守门英军拚死抵抗，清军三次冲锋，均未能攻入城内。时天色已明，而朱贵所率大队尚未赶到，刘天保恐英军断其归路，即撤出战斗，于是反攻镇海的战斗也告失败。

水路进攻定海的计划，由于风潮不顺等原因而一再推迟，直至4月14日，才由熟悉定海情况的郑鼎臣（已故总兵郑国鸿之子）主持，发动了一次小规模之夜袭。由于英军事先已有准备，因而亦未能达到预期目的。

清军反攻失败后，主力集结在慈谿大宝山和长溪岭一带。英军决定乘胜发动新的进攻。

梁廷楠：《夷氛闻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01页。

奕经：《剿袭宁波镇海未能即时克复折》，《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四），第1663页。

3月15日晨，卧乌古和巴加率领三艘轮船和数十只舢板，载兵一千二百余人，携带四门小炮，溯姚江而上。中午，行抵慈谿以南的大西坝，留下一艘轮船和少量兵力，以防清军断其退路，另两艘轮船载部分兵力继续上驶至余姚东面的丈亭一带，威胁清军后路。大队英军则由大西坝登岸，直扑慈谿南门。城内守军不战而逃，英军遂穿城而过，出北门，分路进攻大宝山清军营地。刘天保率兵五百余人，防守大宝山左侧，由于进攻镇海时火器大部丢失，稍事抵抗即行溃散。朱贵率兵四百余名防守大宝山右侧，与敌英勇激战多时，伤亡过半，请求驻长溪岭的文蔚派兵支援。文蔚畏敌犹豫，未及时派兵前往，待到傍晚才派出三百人，而此时英军已进至大宝山之西，切断了守军后路。最后朱贵父子阵亡，部队溃散，大宝山营地于当晚8时落入敌手。次日中午，英军开始向长溪岭清军大营进发，下午3时许抵达长溪岭。文蔚拥兵数千，在长溪岭“阻险而阵”，竟不敢与敌交锋，于15日夜即丢弃营地和大批军械给养，仓皇率部退往曹娥江以西的绍兴。英军将工事和火药库全行毁坏之后，撤回慈谿，17日又全部撤回宁波。

英军长于海战，定海地处海岛，清军欲一举驱逐该处敌军，确有困难。而镇海毗连大陆，宁波更属内地，清军如果指挥得当，同心协力，是有可能将其收复的。可是，清军浙东反攻的结果，不仅未能攻克定海、镇海和宁波，就连大军云集的慈谿营地也没有守住。其所以如此，主要是统兵将领指挥无能。宁波、镇海都是比较大的城镇，各驻英军千余人（当时英军已从印度新调来两个团的兵力），并控制着招宝山、金鸡山等炮台，浙东清军可用于反攻作战的正规部队仅万余人，且大部从外省调来，人地生疏，装备和战斗力均差。而这万余兵力，又未集中使用，大部留在数十里之外，仅以少数兵力采取轻装奔袭的战法，企图同时攻克浙东三城，实属轻率鲁莽之举。如此指挥反攻作战，焉能取胜？宁波、镇海反攻失利之后，清军主力损失不大，战事仍有可为。当英军以千余人冒险深入慈谿时，清军在数量、地势和社会条件诸方面都比英军有利，如能利用这些有利条件，集中使用兵力，各个击破敌人，不难将侵略军赶出浙东地区。但文蔚畏敌如虎，当英军进攻大宝山之际，他非但不派兵增援，反而闻风丧胆，未战先逃，致使清军又一次遭到失败，伤亡溃散千余人。

浙东反攻失败后，奕经以应援靠近省城的尖山为名，带领江南兵千人，于3月20日渡过钱塘江，逃回杭州。为推卸战败责任，他在奏折中除强调英军“船坚炮利”、诡谲异常外，还大肆诬蔑浙东“到处汉奸充斥”。刘韵珂则露骨地宣扬投降派的观点，在所谓“十虑”的奏折中，大谈什么清军“锐气全消”，“其势必难再振”，即使“续行添调，亦恐无济于用”，而英军

贝青乔在《咄咄吟》中，称颂朱贵所部给侵略军以重大打击，“英夷自进犯浙东以来，从未遇如此劲兵”。英人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中还说：朱贵“坚持得很好，守住了山”，经多次短兵接战，最后才放弃。

火器精良，“猛烈异常，无可抵御”。他还特别提醒道光帝注意国内人民可能趁机揭竿而起。道光帝鉴于广东和浙东两次反攻均遭失败，又害怕人民起而推翻其封建统治，于是在对英态度上，由过去的忽战忽和变为一意求和。他起用投降派，任命盛京将军耆英为钦差大臣、署理杭州将军，会同已被革职的伊里布赶赴浙江前线，办理乞和事宜，并准备释放英俘。而此时璞鼎查正野心勃勃地准备进军长江下游的镇江和江宁（今南京），对清廷的乞和根本不予理睬。

刘韵珂：《大兵在慈谿失利事势深可危虑折》，《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四），第1679—1682页。

第七节 英军侵入长江下游，沿江军民英勇抗战 (1842年5月—8月)

一、英国增兵及其新的侵略部署

早在1841年9月英军从厦门北犯舟山时，英国政府即决定再次增加兵力，进一步扩大侵华战争，以迫使清政府尽快签订一项满足其侵略要求的条约。清军在浙江的节节失败，更加助长了英国的侵略气焰。但是，其侵略野心又不能不受到其它因素的制约。同年11月4日，英国新任外相阿伯丁在给璞鼎查的信中说：“虽然女王陛下的军队可能已奏肤功，可是并不见得战争会宣告结束，……女王陛下政府已决定作必要的准备，以便继续从事于强有力的和决定性的战役。”他要璞鼎查向清政府勒索一大笔赔款，但是不能因此而使谈判破裂，或使战争无限延长。信中还指出，英国政府拟改变原训令中关于长期占领舟山或其它沿海岛屿的打算，之所以如此，主要是考虑到“把这些占有地永久保留在英国国主领域之内，却会使庞大而固定的开支随之而来”，而且会使英国人“在政治上同中国人发生更多全无必要的接触”。

这既暴露了英国政府贪得无厌的海盗面目，又反映出英国侵略者外强中干的虚弱本质。它吞不下中国这块大肥肉，特别是害怕占领中国领土后，引起中国人民长期的反侵略斗争，正是其侵略野心不得不稍加节制的根本原因。

基于上述各点，英国政府决定从英国、印度增派陆、海军来华，以期通过“决定性的战役”，尽早结束战争。由于这些军队是陆续抽调增运来的，需要时间，所以，从1841年10月起，侵华英军有半年多时间停留于浙东地区，没有大的军事行动。

在此期间，英国侵略者为寻求尽快实现其侵略目的之途径，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地理等情况，作了进一步的调查分析，认为：（一）北京虽为京师要地，但比较贫瘠，清政府的物资银财主要仰给于南方各省，并经由运河输送。如进攻北京，清政府必迁都于更远的内地，届时难以找到谈判的对象，势必迁延时日，达不到迅速结束战争的目的。同时，清政府正全力加强北京一带防务，对长江的防御则未予重视。（二）只要沿着长江攻入江苏、安徽，占领南京，控制大运河，并占领乍浦和上海，扼住主要的航道，清政府就无法拒绝英国的各种要求，这样，“不但所有作战的实际目标可以迅速达到，而且可以产生同等深刻的精神效果”。英国政府根据以上的分析，确定英军在增加兵力后，沿长江西进，封锁运河口，夺取南京。进攻发起时间选在

《阿伯丁伯爵致亨利·璞鼎查爵士函》，[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一卷，第755—756页。

[英]利洛：《英军在华作战末期记事——扬子江战役及南京条约》，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鸦片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罪行》第145页。

春夏之交，因为那时正是粮食等物资北运的季节。1841年9月底，英国政府训令其驻印度的殖民当局，在1842年4月间，集中一切可能调动的海陆军于新加坡，以便随时行动。这批奉调来华的海陆军，计有军舰七艘和陆军约七个团，从而使侵华英军共“拥有军舰二十五艘，载炮六百六十八门，轮船十四艘，载炮五十六门，医院船、测量船及其他船舰共九艘，运输舰还没计算在内。地面部队，除了炮兵以外，有步兵一万余人”。为集中兵力从长江口入侵，英军于1842年5月上旬主动撤出宁波，并将镇海守军减至二百人，主要控制招宝山。

1841年冬，道光帝即风闻英军可能进犯上海，曾谕令新任两江总督牛鉴加以防备。但牛鉴却认为，“下游之堵御既严，瓜洲之防护又密”，英舰“断不敢飞越数百里重兵驻守之地，冒险入江，阻我漕运”。牛鉴这种轻敌的估计，严重影响了长江下游的设防。

二、乍浦清军的抗击战斗

乍浦位于钱塘江口，是江浙两省的海防重镇。该城南临大海，东南有绵延的小山作为天然屏障。清军原有一名副都统率旗兵一千八百余人驻此。浙东战事吃紧时，增建了炮台，添设了炮位，并增加了兵力，总数达到六千余人。

1842年5月13日，英军舰队离开甬江口外黄牛礁海域，开始向长江口进犯，并决定于北上途中顺便摧毁乍浦港。

5月17日，英舰驶抵乍浦海域，随即派出轮船侦察乍浦设防情况。次日，即派军舰七艘，载陆军二千二百余人，对乍浦发起进攻。英军以三艘大型军舰对西山咀（灯光山西端）等炮台实施炮击，登陆兵在四艘小型军舰的掩护下分三个纵队登陆：右纵队九百余人首先在陈山西面的唐家湾上岸，遭清军抗击；左纵队八百余人由西山咀登陆，向清军阵地进攻；中央纵队三百余人由灯光山一带登岸，沿着山麓迅速推进，企图切断守军与乍浦城之间的联系，并协同左纵队夺占乍浦城。唐家湾等处清军抗击约二小时，发现乍浦城方向起火，以为城已失守，即向平湖方向撤退。驻守乍浦东南天尊庙的三百名旗兵，在退路已被敌左纵队切断的情况下，仍进行顽强的抵抗，连续击退英军数次冲锋，给敌人以重大杀伤，并毙敌中校军官一名。英军炮击无效，最后使用火箭进攻乍浦的英军在搬运同伙的尸体和火药包才将该庙攻下。守军苦战三小时，大部阵亡。英军占领天尊庙后，各纵队会合，直抵乍浦城下，由东门缘梯而入，占领了乍浦城。

[美]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一卷，第331页。

牛鉴：《防护漕船及江海情形折》，《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三），第1575页。

三、吴淞清军的英勇抗战

英军在乍浦休整十天后，将该城焚掠一空，于5月28日全部登船北驶，6月8日抵达长江口外的鸡骨礁一带集结，并派出轮船探测航道，侦察吴淞口设防情况。

清廷虽一再谕令加强长江口的防御，但在朝廷上下一意求和及牛鉴轻敌思想影响下，并未认真落实。时至6月3日，牛鉴还奏称：“惟夷目性多畏慎，又不志存疆土，故江省海防，止须扼定吴淞一口，由吴淞而入扬子江，逆夷虽有内犯之言，然相距数百里水程，亦不过虚词恫喝。臣反复体察，逆夷不犯内河，竟属确有把握。”前敌主将如此麻木，对英军的战略意图竟毫无所知，这就势必严重影响长江下游的防御作战。

吴淞位于宝山县境黄浦江与长江汇合处，是长江的第一道门户。自吴淞镇至宝山县城六七里长的江岸上，“筑有土塘，高约两丈，顶宽一丈七八尺，……缺口处安设大小炮位，既能御敌，亦可藏身，自外视之，俨如长城一道”。土塘上共安炮一百五十四门，统称西炮台。在吴淞口东岸，筑有一略呈圆形的炮台，安炮二十七门，称为东炮台。整个吴淞口，由江南提督陈化成和徐州镇总兵王志元等率兵二千四百名驻守。其中五百名由总兵周世荣率领驻守东炮台，其余则防守吴淞镇至宝山一线。战前，牛鉴也率兵千余驻于宝山，以为后援；宝山知县则带乡勇二千在东炮台后面接应。另在吴淞与上海间的东沟两岸添设了数十尊大炮，驻兵四五百名，防止英军进窥上海。

6月13、14两日，侵华英军陆海军司令率舰船六艘、运输船十二艘至吴淞口外进行临战侦察。6月16日晨，英军开始向吴淞发起进攻。针对清军设防情况，英军确定以“皋华丽”号等三艘重型军舰从正面进攻西炮台，以“摩底士底”号等四艘轻型军舰突入黄浦江，进攻吴淞镇炮台和东炮台，威胁清军的侧后，并掩护登陆部队于吴淞镇附近登陆。

当两艘重型英舰进入西炮台附近作战水域时，陈化成下令开炮。守军以猛烈的炮火阻击英舰，激烈的炮战进行了两个半小时，英旗舰“皋华丽”号及其它各舰被击中多次，死伤二十余人。英国一军官后来追述说：“我方舰队自与中国军队作战以来，中国人的炮火以这次为最厉害。”陈化成虽年已七旬，在近两年的战备中始终坚守职责，威望较高。在此次炮战中，他奋

牛鉴：《江苏洋面静谧现仍严防折》，《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四），第1877页。

牛鉴：《吴淞海口紧要情形折》，《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三），第1476页。

陈化成（1776—1842），福建同安人，行伍出身，历任总兵、提督。1840年由福建水师提督调任江南提督，在两江总督裕谦支持下，铸铜炮、制火药、修炮台，与士卒同甘苦，于吴淞积极设防，直至以身殉国。

[英]穆瑞：《在华战役记》，《鸦片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罪行》第228页。

不顾身地亲自操炮轰击敌舰，与士卒一起战斗。牛鉴三次派人持令箭要陈化成退避宝山，都遭拒绝，不得已从宝山率兵增援吴淞，但一见敌弹落于身旁，即返身后退，继而率兵西逃嘉定。王志元也跟着弃阵而逃。

当西炮台正面激烈炮战时，四艘轻型英舰驶入黄浦江，逼近吴淞镇南面的蕴藻浜，以猛烈炮火压制吴淞镇炮台（安有十门大炮）的火力，掩护登陆兵占领了该炮台。不久，吴淞镇清军实施反击，迫使英军退回堤岸。正当吴淞镇激战之际，西炮台正面被英军突破，大队英军随即登陆。接着，从吴淞镇登陆之敌也从侧后袭击西炮台。陈化成在敌军前后夹击下，仍率兵百余名坚守炮台，最后全部阵亡，表现了英勇顽强的牺牲精神和崇高的民族气节。英军占领西炮台后，随即占领了宝山县城。吴淞东岸的东炮台也被英军两艘轮船上的海员和陆战队占领。

吴淞口失陷后，该地区的大小火炮，一部被毁，大部为英军所获。这些火炮中，不少装有炮车和简单的瞄准具。英军对其中某些火炮质量的改进，甚感惊讶，而对于吴淞口的防御工事，则认为较广东、福建、浙江沿海均差。

吴淞失陷，上海大震，官吏和富豪纷纷出逃，引起上海人民的极大愤怒。6月16日晚，英舰“戴冕”号护送运输船队载着从印度来援的英军二千五百人到达吴淞口外，使英军兵力又有增加。于是，英军派出第18团和第49团以及炮兵、工兵分队共约千人，于19日由吴淞南下，另以八九艘舰船溯黄浦江而上，水陆两路向上海进犯。由于守军事先即已撤离，英军未遇抵抗就侵占了上海。上海制炮局新铸的铜、铁炮一百七十一门及大批存粮，均落入敌手。21日，英军一部乘火轮船二艘、舢板四五只进犯松江，在距城八里处遭到总兵尤渤率领的二千陕甘兵的阻击。英军发炮轰击，守军隐蔽不动。待敌接近时，枪炮齐发，予敌军以杀伤。激战半日，英军被迫撤退。22日，英军再次进犯，仍未得逞。英军在大肆抢掠之后，于23日退出上海，集中于吴淞口外，扬言北上京津，实则准备溯江西犯。

四、镇江保卫战

英军攻陷吴淞口后，清廷一面催促耆英、伊里布等由浙江驰赴江苏，会同牛鉴“办理夷务”，加紧议和，一面继续从华北、东北调兵遣将，并命工部尚书赛尚阿为钦差大臣，驰赴天津，会同直隶总督纳尔经额加强天津地区的防备，防止英军北犯。而对于长江下游的防务，仍未予以足够重视，只是同意由浙江调兵二千，协助江苏驻军（五六千名）防守沿江要隘及江宁府。耆英、牛鉴等一意求和，对防务只是虚应故事而已。

7月初，英军援兵全部到齐，璞鼎查、巴加和卧乌古随即于7月6日率领十一艘军舰、九艘轮船、四艘运兵船和四十八艘运输船，装载陆军一万余人，驶离吴淞口，溯长江而上。所有舰船编组成先锋舰队和五个纵队，每个纵队有八至十三艘运输船，由一艘战舰率领（第三纵队由一艘运兵船率领），

并接受该舰舰长的指挥。每纵队之间保持三至五公里距离。沿途以测量船为先导，边测量，边前进。另外，英军在吴淞口留有军舰两艘，用以封锁长江口，保证后路安全。英军西犯过程中，福山、鹅鼻咀和圖山等长江险隘处的炮台守军，因兵力薄弱，稍事抵抗，即弃阵而走。

7月14日下午，英军摧毁镇江东面五十里的圖山关炮台（有炮二十门）。之后，因风小暂停西进，只派测量船继续上驶，进行侦察。17日，大队英舰进入镇江江面，随即封锁瓜洲运河北口，阻断漕运。

镇江位于长江和运河的交会处，是运河的咽喉，江宁的屏障。镇江城雄峙长江南岸，西北有金山，东北有北固山、焦山、象山。战前，由副都统海龄率旗兵一千六百名、绿营兵四百名驻守。城内大炮因已大多调运吴淞，仅留下数门。英军侵占吴淞后，四川提督齐慎（4月授参赞大臣，赴浙防英）带江西兵千余名、湖北提督（6月署江南提督）刘允孝带湖北兵千余名仓卒赶到，驻扎城外，协助防守。但在英军兵临城下的危急时刻，将领间互不协同，各自为战，没有集中统一的指挥。海龄未派部队控制金山与北固山等制高点，而将全部旗兵收缩城内，紧闭四门，不准人民出城。

巴加和卧乌古曾亲自登上镇江西北的金山寺，察看周围地形。侵略者所见到的是：坚固的城墙上没有士兵守卫，只有城西南的半山坡上新建了三座军营。于是他们认为，清军主力可能已经撤至城外，进攻镇江城将不会遇到什么抵抗。

英军进攻吴淞时，主要由海军担任，这次进攻镇江，则主要由陆军负责。参战的陆军共六千九百一十五人，编为第一、二、三旅和炮兵旅。其进攻部署是：第一旅（二千三百一十八人）、第三旅（二千一百五十五人）和炮兵旅担任主攻，矛头主要指向镇江西南郊高地的清军；第二旅（一千八百三十二人）担任助攻，指向镇江东北，主要任务是牵制和分散清军兵力。

7月21日晨，英军开始进攻。右翼的第一、第三旅和炮兵旅在镇江西北的金山附近未遭抵抗即顺利登陆。第一旅上岸后，为分割城内外清军，直指西南山坡上的清军兵营。经过数小时激战，清军不支，齐慎、刘允孝率部退往新丰镇（今江苏丹阳北）。英军第三旅登岸后，则沿着西城根，直指西门。

与此同时，英军第二旅在北固山一带登岸，直薄城下，冒着清军的炮火，蜂拥爬梯登城。守城旗兵誓死抵抗，有的把敌人推下城去，有的扭住敌人一起跳下城墙。上午10时许，北门被打开，大队英军冲入城内，向西门方向进攻。

进攻西门的英军第三旅遭到清军的顽强抗击，城门久攻不下。中午，英军一个爆破小队在炮火掩护下，用三个火药包（火药一百六十磅）将瓮城门炸开。此时，由北门冲向西门的英军已将内城门打开，于是大队英军由西门

由吴淞上驶的英军舰队编组情况：

进攻镇江的英陆军编组情况：

蜂拥而入。

守城清军节节抵抗，与敌人展开巷战和肉搏战。许多旗兵宁死不屈，有的杀死自己的妻儿，然后与敌人拚死搏斗，直至牺牲。海龄督战到最后时刻，也自杀身亡。英军破城后，大肆奸淫烧杀，全城大火弥漫数日，繁华的镇江城遭到了极其严重的破坏。

镇江保卫战是鸦片战争中清军以劣势的兵力，落后的武器，打得最为英勇悲壮的一战。英军在这次战斗中投入的兵力，是鸦片战争开始以来最多的一次，所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死三十七名，伤一百二十七名）。事实再一次表明，只要清军将领决心抵抗，有敢于牺牲的精神，部队还是有一定战斗力的。恩格斯曾经指出：如果英国侵略者“到处都遭到同样的抵抗，他们绝对到不了南京”。

在英军西侵过程中，江苏沿江一带人民和东南沿海各地人民一样，对侵略者的入侵进行了英勇的回击。英军侵入吴淞口，占领宝山、上海等地后，曾多次派遣小股部队向内地探路搜索，当地人民自动组织起来，伺隙袭击侵略者。太仓州皋桥一带农民曾预设埋伏，诱敌上岸，以锄头等击杀敌人，侵略者终于不敢再行上岸。靖江人民也用抬枪等袭击英舰，迫使敌人撤走。镇江、扬州、瓜洲、仪征等地盐民和渔民蛋户，也纷纷拿起武器，杀鬼子，破洋船，狠揍入侵之敌。长江北岸人民在短期内就组织了八九万人的团练义勇，群众争献铜铁铸造大炮，准备迎击侵略军。

五、《南京条约》的签订

早在7月16日，道光帝就密谕耆英，只要英国息战退兵，便同意割让香港，并增开通商口岸。镇江失守后，道光帝决心专意“议抚”，授权耆英、伊里布“便宜行事，务须妥速办理，不可稍涉游移”，并令奕经所率援军暂缓由浙赴苏，“以免该逆疑虑”。然而，英军仍然不理睬清政府的“羁縻”，他们决心打到江宁，逼签城下之盟。

8月3日，英军留兵一部于镇江，舰队开始向江宁开进，9日抵达江宁江面。11日，英军在观音门附近登岸，军舰摆开了轰城的架势。当天，耆英自无锡赶到江宁，在英军大炮的威胁下，派人与英方开始了可耻的“和谈”，14日即全部接受了英方提出的苛刻条件。接着，道光帝先后发出了“不得不勉允所请，借作一劳永逸之计”和“各条均准照议办理”的谕旨。29日，耆英、伊里布、牛鉴等在侵略军旗舰“皋华丽”号上与英方全权代表璞鼎查签订了外国侵略者强加于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江宁条约》，即《南

恩格斯：《英人对华的新远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第190页。

《廷寄》，《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四），第2133页。

《廷寄》，《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五），第2277、2307页。

京条约》。条约规定清政府割让香港，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五处为通商口岸，赔款二千一百万元（等于当时清王朝全年财政收入总数的 36%，相当于全国旗绿各营岁饷用银总数的 70%）。签约后，英军舰船陆续撤往定海一带，第一次鸦片战争遂告结束。

《南京条约》签订后，美、法等国也趁火打劫，相继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等不平等条约。

第八节 中国战败的原因

第一次鸦片战争自 1840 年 6 月开始，到 1842 年 8 月结束，历时两年零两个月。这次战争，英国先后出动军舰二十八艘（装备火炮约八百门），各种船只约八十艘，兵员总数约一万五千余人。以这样规模的一支军队，竟把拥有四亿人口和近九十万常备军的中国打败了。清王朝虽从全国各地调兵遣将，动用了可能动用的各种武器装备，却未打过一次大的胜仗，也未守住或克复过一个重要城镇，最后不得不与英方签订屈辱的《南京条约》。这就告诉人们，经济、政治、军事落后的国家，其领土主权的完整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是很难得到有效保障的。

从作战双方条件的对比来看，各有短长。英国当时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工业生产和科学文化发达，国家富强。中国则是一个没落的封建帝国，没有机器工业，农业和手工业生产长期停滞不前，政治反动腐败，科学文化遭到窒息，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但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物产丰富，与英国相比，拥有人力物力资源的优势。军事方面，英国军队的数量虽然不多，但资本主义的工业生产为它提供了优良的武器装备，军事制度有了较大的改革，海军已称霸世界，陆军也属当时世界上战斗力最强的资产阶级军队之一。清军在数量上大大超过英军，但装备陈旧，军制落后，是一支战斗力相当有限的封建军队。鸦片战争是英国政府一手策划和挑起来的，中国是被侵略的一方，真理和正义完全在中国一边，容易激发官兵的抗战热情，并取得人民的广泛支持，加上本土作战，补给方便，情况熟悉，有利条件是不不少的。英军则出师不义，遭到本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的反对；加之劳师远征，兵力有限，远离后方，补给困难，异国作战，人地生疏，不利条件很多。英军在武器装备和军队素质等方面的优势，往往因受不利条件的制约而削弱；而清军的不利条件，可以由兵力上的优势以及有利的地理与人民条件予以弥补。所以，清政府如能充分利用和发挥自身的有利条件，克服不利因素，是有可能争取战争胜利的。但战争的结局却是清军遭到失败，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政治腐败，经济落后

恩格斯指出：“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因而是以‘经济力量’，以‘经济情况’，以暴力所拥有的物质资料为基础的。”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由于最高统治当局昏愤无能，穷奢极欲，因循守旧，固步自封，不但使整个国家机器（包括军队在内）弥漫着腐败气息，而且由于实行残酷的封建经济剥削和民族压迫，弄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 206 页。

得民不聊生，社会生产力不断遭到破坏，经济状况极端落后，从而大大削弱了战争赖以取胜的经济基础。在战争过程中，清廷又动摇妥协，仇视人民，打击主战派，重用投降派，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破坏了团结对敌的政治基础。这些，乃是中国在鸦片战争中遭到失败的根本原因。

二、闭关锁国，不明敌情

清王朝夜郎自大，闭关自守，以“天朝”大国自诩，视外国为“蛮夷”，对国外的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往往当作“邪说”、“淫技”而拒绝传入。清政府不仅没有研究外国的专门机构，而且反对任何人这样做，因而对西欧资本主义列强的社会制度、经济实力和军队状况等方面的了解甚微。虎门销烟后，英国政府决定调集军队，发动侵华战争，清廷竟毫无察觉，及至英军封锁珠江口，侵占定海，兵临大沽，对其侵略意图仍茫然无知。

在战争过程中，清廷对敌情仍不注意侦察和研究，往往根据各省督抚大臣的片面奏报，作出错误的判断。1840年秋，英军因季节和疫病等原因返棹南下，清廷却认为“夷情恭顺”，赶紧下令沿海各省裁撤防兵。时过不久，英军就进犯珠江，只好被迫宣战。1841年夏，广州反攻未成，却轻信谎报，复令酌撤沿海防兵。未几，英军又陷厦门、定海。1842年夏，英军侵入长江下游，也是出乎清廷意料之外的。反之，英军则随时注意对清军情况的侦察与研究，常能及时获得清军的情报，采取先发制人或防范措施。

清朝统治者既不了解英国发动侵华战争的真正目的，也不了解英军的战略意图，一再地作出错误的决策，焉能不导致抗英战争于失败？！

三、战守无策，指导无能

以道光帝为首的清朝最高统治当局昏庸无能，平时既不讲求治兵之道，也不深研战守之策。国防布局，因循防内重于防外的旧章，沿海兵寡力弱，又无战略机动部队。往往抽兵数千，牵动数省；且千里赴援，远水近火。战火临头，既不知敌，又不知己，仓卒应战，自然无法实施正确的战争指导。战争过程中，清廷先则轻敌如蚁，继则畏敌如虎；对于战守大计，只能笼统地提出什么“先威后德”、“大张挞伐，聚而歼旃”、“沿海一体严密防范”之类的陈词滥调，提不出任何切合实际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可是，军政大权却又高度集中，和战大事操于皇帝一人之手。前线作战，事无巨细，都决策于北京，而当时通信不便，上下情况隔膜，前方将帅无权根据具体情况机断行事，即使朝廷作出的决策明显落后于形势，也不得不遵照执行。道光帝颞顽无能，主观随意，时而言战，时而乞和，时而增兵，时而裁撤，弄得下面无所适从，严重地束缚了前方将帅的手脚。加之清廷对全国的战事又缺乏统一及时的指挥，以致各战区常常出现各自为政的现象，使英军有机可

乘。

四、将领保守，战术笨拙

清军将领军事思想保守落后，战术呆板，指挥笨拙，只知消极防御，不善于灵活击敌。英军虽有“船坚炮利”之长，但孤军远征，不持久战，更不利于深入内河内陆。当时有识之士有鉴于此，曾提出过引敌深入内河内陆，伺机予以奇袭、火攻等战法。无奈前线大吏和将领多数只知株守炮垒，待敌进攻，不知巧布险势，出奇致胜；只会一线设防，不知纵深机动。英军沿海沿江登陆进攻，多是利用清军设防的弱点，以舰炮正面轰击，以登陆兵侧翼上陆，行包围攻击。清军前敌将领不知认真研究敌人的登陆战法，改进自己的抗登陆战术，以致屡蹈覆辙。倘能以炮垒为中坚，设奇兵于侧后，待敌迂回接近时，出其不意地伏击或反击之，则不难收破敌或挫敌之效。英军深入广州和浙江慈谿等地时，兵单势孤，清军有过不少歼敌良机，却非但未能乘机歼敌，反为英军所败。前线将领指挥如此笨拙，岂有不败之理？！

五、军队腐朽，军民对立

受清王朝腐败政治的影响，加上承平日久，清军不仅武器落后，而且军纪废弛。将弁多同文官一样，养尊处优，耽于安乐，不理营务。他们或坐吃空名，冒领军饷，或勾结烟贩，走私贩私。军中酗酒吸毒、聚赌挟妓者比比皆是。遇有军事行动，公开勒索地方，强拉夫役，苛征暴敛，甚至强取豪夺，杀害良民。加以清朝统治者一向重八旗而轻绿营，造成军内矛盾，而驻守各省的军队调往有事省区时，又出现“主军”（本地军队）与“客军”（外省军队）的矛盾。这些矛盾往往发展成尖锐对立，遇战互不救援，见利竞相抢夺，彼此争功诿过，甚至自相厮杀。

此外，清军不但平时欺压人民，在外敌入侵的情况下依然与人民群众站在对立的地位。英军每入侵一个地方，当地的人民群众便纷纷起而自卫，打击敌人，表现出极大的抗战积极性。可是，清廷和各地统兵大员，除林则徐等极少数有识之士外，一般都仇视人民。他们动辄诬蔑沿海地区“到处汉奸充斥”，声称“患不在外而在内”，甚至滥杀无辜。由于无视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对于象臧纒青所建议的军民结合、游击战与正规战结合的“散战”之法，自然不可能付诸实施。更有甚者，每遇征战，军队便借机向人民群众

清统治者在节制军队方面也反映出民族歧视的特点。八旗兵半数以上驻于京畿地区，其余驻于全国各战略要地，一方面镇压各族人民的反抗，一方面起着监视绿营的作用。绿营兵分散驻于全国各地，除守卫边防、镇守地方外，还要担负河工、漕运、守陵以及其它各种繁杂勤务，而政治和物质待遇却远比八旗兵为差。

敲榨勒索。在浙东反攻作战前，有的旗兵竟“沿途掳丁壮，掠板扉，以四民抬一兵卧而入城”。军队纪律如此败坏，不仅很难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援与配合，其战斗力也势难维持。

总之，清王朝政治腐败，经济落后，闭关自守，不明敌情，战守无策，指导无能，将领保守，战术笨拙，军队腐朽，军民对立，所有这一切，正是它腐朽没落的反映，也是招致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

第二章 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前期） （1851年1月—1856年8月）

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终于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反封建反侵略的人民大起义，其中尤以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战争规模最大，影响也最深远，成为中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大体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1851—1856年）为革命战争爆发和胜利进军时期，后期（1856—1866年）为革命战争由进攻转入防御以至最后失败时期。在战争后期，还发生了英法联合侵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其后果之一，是中外反动势力公开勾结起来，共同镇压人民起义，加速了太平天国革命战争的失败。据此，本书对太平天国革命战争的叙述，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并将后期战争列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

第一节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国内形势

清王朝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耗费了数千万两白银的军费，战后又负担巨额赔款，财政更加拮据，于是大幅度增加地丁、漕赋（清政府两项最主要的财政收入），人民负担更加沉重。《南京条约》及其它几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敞开了大门。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向中国不断倾销商品，使通商口岸及其附近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受到打击，一部分农民、手工业者和运输工人因之陷于破产和失业，乃至一些中小地主和商业主也受到破产的威胁。同时，鸦片的输入量不仅没有减少，反而继续增加，由四十年代初期的每年两万余箱增到五十年代初的每年五六万箱，以致白银大量外流，银贵钱贱的现象更加严重（银价为十九世纪初叶的两倍多），鸦片烟毒更加泛滥于全国。农民和手工业者出卖产品和劳动力所换得的是铜钱，而缴纳地租赋税却要银两折算，这样一来，劳动人民除遭受直接剥削之外，又要承受新的变相盘剥。广大劳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被迫展开更大规模的反抗斗争。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到太平天国起义前夕的八年间，各族人民反抗外国侵略者和反对清王朝的斗争风起云涌。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广州城乡人民反对英国侵略者企图在广州河南地区强行租地的斗争（1844年），广州人民反对英国侵略者入城的斗争（1843—1849年），以及广东、广西和湖南等地的天地会起义和直隶（今河北）、山东、河南、安徽一带的捻军、白莲教起义等反抗清王朝封建统治的斗争。这些起义和斗争，表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后，社会阶级矛盾更趋尖锐，预示着一场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大风暴正在来临。

人民起义和反抗斗争声势最大的广东、广西、湖南等省，是当时全国阶级斗争最尖锐的地区，而广西又是三省反清力量的汇合点。广西地处南陲，历来赋税苛重，封建剥削特别残酷。太平天国起义前，广西连年天灾，人民生活困苦不堪，纷纷起来反抗。鸦片战争后，不少被裁撤的兵勇流入广西，湖南新宁等地天地会起义武装失败后也大都转入湘桂边界地区，他们和当地人民群众结合，成为一支强大的反清力量。对于两广地区，清王朝历来以广东为统治重点，在广西的统治力量则相对薄弱，两广总督、八旗将军均驻于广东，广西兵力仅及广东三分之一，加以广西吏治更加腐败，这就给了各种

据《大清会典》的记载推算，广西田赋特别苛重，比广东、湖南还高出一倍以上。参见《太平天国史研究文选（广西·1951—1980）》（广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7—28页。

据《贵县志》等广西地方志记载：“（道光）二十五年夏六月，大风雨，人有冻死于道者。”“道光二十八年戊申，飞蝗蔽日，……禾苗菽麦嚼食一空。”“道光二十九年，州境瘟疫流行，人死无数，并多豺狼。”“道光三十年，饥，道路饿殍相藉。”参见《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上册（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14—18页。

反清势力以生存和发展的机会。至 1850 年，散布于广西各地的天地会等反清势力，遍及全省十一个府中的八个府，多达三十股，使当地统治阶级惶恐不安。但是，天地会等旧式会党，组织松散，互不统属，缺乏集中统一的领导，因而易被统治阶级分化瓦解，各个击破。而洪秀全（1814—1864）等创立的“拜上帝会”，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与旧式会党不同的特点，既有较明确的纲领，又有较严密的组织，因而能在全中国日益高涨的反清斗争形势的推动下，崛起于广西，终于把分散的人民反抗斗争汇集成一股革命洪流，迅速发展成震惊中外的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

第二节 金田起义与太平军转战广西 (1851年1月—1852年6月)

一、金田起义

1851年(咸丰元年)初洪秀全、冯云山等领导的广西桂平县金田村起义,是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开端。洪秀全,1814年1月1日(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出生在广东花县的一个农民家庭。年青时的洪秀全,用功读书,并曾参加农业劳动,十八岁开始在家乡当塾师。他曾多次赴广州应考秀才,均未考取。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刚刚结束,他第四次到广州应

洪秀全

考,结果又落第。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广东及其它各地人民反对清政府和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以及洪秀全自己在科场中的一再失意,激起了他对社会现实的严重不满,产生了强烈的反抗思想。他研究了基督教传教士散发的小册子《劝世良言》,便利用基督教的一些宗教教义和仪式,加以附会解说,进行“传教”工作,并和他的同学冯云山等共同创立了后来名为“拜上帝会”的革命组织。1844年5月,洪秀全与冯云山去广西贵县等地传教。同年底,洪秀全回到广东花县,以教书为业,从事拜上帝会教义的创立工作。他先后写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和《原道觉世训》等诗文,奠定了拜上帝会的理论基础。这些诗文,表面上似乎是些关于基督教的迷信说教,但实际内容却包含着要求平均、平等,反对压迫剥削,实现“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等朴素的农民革命思想,因而为尔后发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作了舆论上的准备。同一时期,冯云山则转入广西桂平县的紫荆山区,同样利用教书之便,进行深入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在耕山和烧炭为业的贫苦农民中,发展了二三千名拜上帝会会员,其中不少人如杨秀清、韦昌辉和萧朝贵等,后来都成了太平天国革命的主要领导者。

1847年夏,洪秀全前往广西紫荆山区,与冯云山会合,共同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并在附近各县积极发展拜上帝会成员。参加者除贫苦农民外,还有不少失业的矿工等。

1850年7月,洪秀全下令“团营”(集中结营组军),各地会众纷纷向

冯云山(1822—1852),广东花县人,初为乡村塾师,1843年着手与洪秀全创立拜上帝会,积极开展革命活动,是早期太平天国革命杰出的宣传者和组织者。

杨秀清(?—1856),广西桂平人,以耕山烧炭为生,曾离家流荡,有智谋,好结交,是紫荆地区山民的领袖人物,金田起义时,他几率全族参加。韦昌辉(1823—1856),广西桂平人,地主出身,在洪秀全、冯云山准备和发动起义的过程中,他变卖家产,阖族从军。萧朝贵(1820—1852),广西武宣人,农民出身,为人忠实坦直,作战勇敢。

桂平县北五十里的金田村集中。会员们临行前将田产屋宇变卖，所得钱银悉数缴纳公库，衣食费用都由公款开支，一律平均。这就是“圣库”制度的开始。到同年底，远近前来“团营”的约达二万余人，均编入军事组织。这时，在拜上帝会内形成了以洪秀全为首，包括冯云山、杨秀清、韦昌辉、萧朝贵和石达开在内的领导核心。他们决心为推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而斗争。在军事方面，仿照《周礼》，制定了军队的编制，规定以军为基本单位。军设军帅，下辖五个师帅，师帅下辖五个旅帅，旅帅下辖

太平天国刻印的《太平军目》一书的封面

五个卒长，卒长下辖四个两司马，两司马下辖五个伍长，伍长下辖四个圣兵。军帅共辖一万三千一百五十五人。军帅以上，依次设监军、总制、将军、指挥、检点、丞相、主将、军师。另设御林侍卫（直辖），职位在指挥、将军之间。此外，还规定了五条军纪：“一、遵条命；二、别男行女行；三、秋毫莫犯；四、公心和雉，各遵头目约束；五、同心合力，不得临阵退缩。”

同时，在金田村以制造农具为掩护，赶制火器、刀矛等。至此，起义准备基本就绪。

当时，广西各地天地会起义武装活动频繁，吸引了清廷和广西当局很大的注意力，这对洪秀全领导起义是一种很好的掩护。

广西驻有绿营兵二万二千余人，大部星散于全省各营、汛，能机动作战的部队很少。为了镇压广西各地的起义，清廷不得不从外省调兵遣将。到1850年底，先后调往广西的有两广总督徐广缙与前云南提督张必禄（率兵一二千人）、陕西提督向荣（接替闵正凤为广西提督）、前云贵总督林则徐（授以钦差大臣头衔，因在赴任途中病歿，改由前两江总督李星沅继任）、前漕运总督周天爵（接替郑祖琛为广西巡抚）以及广东、湖南、贵州、云南兵勇共八千人。这样，连同原有驻军，广西清军的兵力达到三万以上。另外，还在广西各州县组织了大批团练，协助清军镇压天地会等起义军。

拜上帝会力量的壮大和活动的加紧，逐渐引起了广西地方当局的注意。他们不断派兵“搜剿”，妄图把这股革命势力扼杀于摇篮中。1850年12月底，浔州协副将李殿元等率部包围了洪秀全和冯云山的驻地——平南县花洲山人村。杨秀清在金田闻讯，立即派众往援，把洪秀全、冯云山等接往金田村。1851年1月1日，总兵周凤岐和副将李殿元、伊克坦布等又率兵进攻金田村。洪秀全、杨秀清于村东五六里的蔡村江边设伏，击败清军，杀死伊克坦布。

洪秀全等在起义准备过程中打了两次胜仗，大大鼓舞了会众的斗志，接

石达开（1831—1863），广西贵县人，地主出身，因属客家人，常受排挤，拜上帝会兴，乘势入会，倾家助义，时年仅二十，智勇兼备。

《天命诏旨书》，《太平天国印书》（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下同）上册，第119页。和雉，广东方言，和睦、团结之意。

着，便于1851年1月11日（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洪秀全的生日）在金田村正式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公开举起了推翻清朝、武装夺取政权的义旗。

二、转战广西

（一）西进武宣，北上象州

金田起义后的第三天，洪秀全即挥师东向，一举夺占广西浔江边上的大湟江口（今江口镇），准备向东南方向发展。不久，又接受了天地会罗大纲、苏三娘等部众二千余人加入太平军，声势更加壮大。

金田起义引起了清政府的震惊。钦差大臣李星沅急令广西提督向荣率兵二千，从横州（今横县）赶赴桂平一带，对太平军实行“围剿”。咸丰帝（清文宗奕訢）多次下谕，提出“围剿”起义军的方略：一是“聚集精兵全力攻剿”，各地团练“分段兜擒”，以期迅速就地歼灭；二是“解散胁从”，以便瓦解起义军。同时，决定从贵州再调兵一千进入广西，妄图乘太平天国发难之初，将其一举扼杀。

1851年2月18日，向荣会同总兵李能臣、周凤歧，率部自东西两个方向向大湟江口进攻。太平军暗设地雷，佯败诱敌，并出奇兵抄袭清军后方，共毙清军守备以下数百人。但是，清军继续取包围态势。太平军向东南方向发展的企图受阻，便于3月10日夜撤出大湟江口，向武宣县的东乡一带转移。19日，太平军与敌战于东乡西面的东岭村，击败清军。此后，太平军与清军在三里圩一带对峙。3月23日，洪秀全在东乡自称“天王”，并分封了五军主将：杨秀清为中军主将，萧朝贵为前军主将，冯云山为后军主将，韦昌辉为右军主将，石达开为左军主将。

4月3日，广西巡抚周天爵伙同向荣督军六千余人向三里圩进攻。洪秀全、冯云山亲自指挥太平军奋勇杀敌，再次打败清军。5月12日，钦差大臣李星沅因兵败于武宣忧郁而死（一说畏罪自杀）。5月16日，太平军乘机自东乡突围北上，后进占象州中平一带。清军尾随赶到，以新从广东调来的广州副都统乌兰泰所部千余人驻中平西北的梁山村，向荣部驻中平东北的界

据有关资料和多数论者意见，“太平天国”建号于起义当天。但据罗尔纲《金田起义日期再考》称：“太平天国的‘开国日’是辛开（即辛亥）元年二月二十一日（1851年3月23日），那一天，革命群众拥戴洪秀全在武宣县东乡即天王位，立幼主，封百官，留发易服，建立了太平天国。在这一天以前，太平军只高举‘太平’的旗帜，还未建立国号。”参见广西太平天国史研究会编《太平天国史研究文选（广西·1951—1980）》第9页。

《剿平粤匪方略》卷三，第1—5页。

岭，堵截太平军的北进道路。独鳌岭（梁山村北）一战，太平军予乌兰泰部以迎头痛击。但太平军多次向西北、东北方向突进均未成功，不得不于7月初撤离象州境，经原路退回桂平紫荆山根据地。在西进武宣和北走象州过程中，太平军招集了不少没能赶往金田参加起义的拜上帝会会众，起到了扩大队伍的作用。

（二）官村伏击，大败清军

早在同年4月，清廷以广西将帅不和，剿办不力，命首席军机大臣赛尚阿为钦差大臣，前往湖南广西交界地方督办防堵，并声援广西；同时，派都统巴清德、副都统达洪阿随同协助，又从湖南调兵千名，四川调兵三千名，统归赛尚阿节制。7月初，赛尚阿到达桂林，随即派巴清德、达洪阿率部赶赴紫荆山地区，增援尾随太平军的向荣和乌兰泰所部清军，企图就地围歼太平军。清军的进攻部署是：向荣和巴清德部从西北方向进攻紫荆山区，乌兰泰和达洪阿部沿黔江而下，绕至紫荆山区东南，直扑莫村、新圩等地。

7月25日，清军发起进攻，展开了激烈战斗。太平军于各重要隘口挖断道路，垒石架木，严密防堵，多次击退进犯之敌。至8月底，清军相继占领了紫荆山区西北部要隘双髻岭、猪仔峡、风门坳等处，对太平军的紫荆山根据地构成严重威胁。9月11日夜，太平军向东北五峒山方向突围，后转移至平南县思旺一带。

清军发觉太平军突围后，由乌兰泰部尾随东进，向荣部则经大湟江口、佛子村、横岭，于9月15日进至思旺东南之官村，企图拦截太平军南下。当时，萧朝贵、冯云山已率部在此设伏，乘向荣部扎营未稳之际，突然发起攻击。向荣措手不及，加之火药被大雨淋湿，枪炮失效，在太平军猛烈冲杀下，四处溃逃，军械辎重尽失。其后，向荣率残部逃入平南县城，托病不出，太平军得以从容地向永安州（今蒙山县）转移。

（三）占领永安，粉碎围攻

官村获胜后，太平军即北上大旺，然后分水陆两路向永安州进发。陆路为主力，由萧朝贵、罗大纲等统率，抄近路轻装急进；水路主要是辎重和妇孺，由冯云山、杨秀清等统领，沿大同江东下，再溯濛江北上。洪秀全随水路前进。太平军北进过程中，沿途不少贫苦农民踊跃参军，太平天国后期的优秀将领陈玉成、李秀成，就是这时参加的。

1851年9月25日，太平军一举占领永安城。这是太平天国起义后夺取的第一座州城。

永安是个小州，人口很少。州城位于南北东西长宽二十里左右的平坝中，四面崇山峻岭。太平军分兵防守城外各要隘：南守水秀（俗名水窠）、

莫家村；北守上阳村、龙眼塘；并于各险要处竖木栅，筑土垒，掘壕沟，建炮台，埋地雷，准备长期固守。这时，太平军已达三万七千人，其中精壮能战者约六千人。

太平军占领永安的次日，乌兰泰率领其本部及别部清军共约六千人追至城南二十余里的文圩，28日又进至佛子村一带。接着，总兵刘长清、李能臣等率云、贵等省兵四千余人赶至永安西北的古排塘一带。以后，清军又大量增加，众达三四万人，四面包围永安，主要取南北夹攻之势。向荣自官村大败逃往平南后，不久经藤县、梧州绕至昭平，当时已被清廷革职，但仍“随营效力”。10月19日，向荣派总兵李瑞率兵一部由昭平向永安逼近，在永安城东二十里之古苏冲遭到太平军伏击，大败而逃。向荣闻讯，丧魂落魄，不久即托病逃往桂林，所部各军暂由巴清德统率。

由于太平军防守十分严密，清军围攻永安数月，仍然不能得逞。1852年（咸丰二年）1月15日，咸丰帝下谕斥责赛尚阿“旷日持久，尚无制胜之谋”，令他亲赴前线，采取“层层逼近，前剿后应”的部署，聚歼太平军于永安。同时，令其严明赏罚，以“申纪律而振军威”；随时酌量裁撤勇团，以节饷糈；注意收买太平军中的动摇分子，以为内应。此外，还明令向荣复职。咸丰帝的上述谕令，既反映了清廷妄图围歼太平军的急迫心情，也反映了清军战斗力不强和清廷财力不足的困难处境。

太平军在永安一面抗击敌人的进攻，一面进行军政建设。1851年12月17日，天王洪秀全下诏分封五王：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诏令还规定，“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此外，在永安还颁行天历，并进行了内部肃奸工作，揭露和打击了内奸周锡能等人的破坏活动，进一步巩固了革命队伍，提高了太平军的战斗力。

太平军在桂平、武宣、象州等地与敌转战大半年之后，在永安停下来进行休整固然必要，但是，长期聚集于四面环山的小城市，很少积极出击，这在军事上是不足取的。当时，包围永安的清军众达四万余人，如果他们利用四周的有利地形，严密封锁各隘口，太平军就有被围歼或困死的危险。幸清

《文宗实录》卷四十八，第15—17页。按：向荣（1799—1856）系行伍出身，调任广西提督后，因与太平军作战屡吃败仗，先后受降级，革职留任处分；但由于他有镇压人民起义的经验，忠实地为清廷卖命，故革而复用。（1853年任钦差大臣，专办军务，率军从武昌追太平军至金陵，建江南大营，威胁天京。1856年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后，向逃往丹阳，忧愤而死。）

《天命诏旨书》，《太平天国印书》（上），第122页。

1851年12月21日，太平天国于永安揭露了周锡能反革命案件。周系广西博白人，金田起义时受封军帅。同年6月，当太平军北上象州中平时，周锡能经不起艰苦奋斗考验，脱离革命。后投降敌人，接受敌人密令，于12月13日混入永安，串通少数不坚定分子，诱惑军心，进行破坏活动，被杨秀清等识破，将其处死。

军统兵大员赛尚阿是个“未历行阵”的蒙古贵族，优柔寡断，缺乏主见，而前线主将向荣与乌兰泰又意见不一，以致南北两路清军各行其是，互不协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太平军才得以在条件并不有利的永安停留半年之久。

1852年2月中旬，赛尚阿在咸丰帝督令下，由广西阳朔赴永安前线督师，命令南北两路清军日夜轮番进攻。太平军顽强抵抗，与敌人鏖战月余。清军伤病交加，减员甚多，进展甚微。但太平军也因长期困守，“粮草殆尽，红粉（火药）亦无”，食盐更为短缺，决定突围。

永安的南北大道都有清军重点把守，但城东古苏冲仅有一千余团勇驻防，是清军包围圈的薄弱环节。4月5日，太平军冒着大雨从古苏冲突破清军的包围，向昭平西北之仙回前进。乌兰泰和向荣闻讯，立即提兵追赶截杀。太平军后队损失千余人。为了摆脱被动，太平军决定利用龙察岭大峒山谷地的有利地形，以重兵设伏，歼灭清军追兵。8日上午，清军进入伏击圈，太平军乘大雾迷漫，从四面八方突然向清军发起攻击。由于道路狭窄，天雨地滑，清军人马拥挤，不能列阵，枪炮亦无法施放。太平军将敌人前后围裹，左右冲杀，半日之间，歼清军总兵四人及兵弁二三千人（一说四五千）。事后，赛尚阿受到降四级的处分，向荣和乌兰泰则被革职留任。

太平军永安突围成功，为以后的胜利发展创造了条件，因而在太平天国前期战争中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四）北攻桂林，进占全州

大峒山伏击战胜利后，太平军取道山间小径，过牛角瑶山，然后出荔浦之马岭，经阳朔之高田、临桂之六塘，前锋于4月18日进抵桂林城下。桂林是广西的首府，城墙高厚，但当时清军守兵仅千余人。向荣自大峒山败后，判断太平军将进攻桂林，急率清军千余，日夜兼程，抢在太平军之前进入该城，督饬守城兵勇团练紧急设防。5月3日，乌兰泰也率前队数百人驰抵桂林南门外之将军桥，被太平军炮火击伤，8日死于阳朔。不久，清军各处援兵赶到，城内外兵力增至二万余人。太平军使用了大炮和吕公车等攻城器具，围攻月余，水陆二十四战。但因城坚，始终未能攻破，便于5月19日夜撤围北上，向湖南进军。

乌兰泰主张“围而击之”；向荣主张“纵而掩之”，即“宜开一路，放贼使走，我兵以追为剿”。在攻城上，有的主张先夺取外围要点；有的主张打开一个缺口，即行攻入。

《天情道理书》，《太平天国印书》（下），第520页。

四总兵为：长瑞、长寿、董光甲、邵鹤龄。

据光绪十五年《平桂纪略》卷一载：“吕公车，宽丈余，下用四轮，中貯火器，外施板障，上排云梯，高与城齐。”

5月22日，太平军攻破兴安。25日路过全州时，南王冯云山被守城清军炮火击中，身受重伤。于是，太平军决心攻下该城。

这次战斗中，太平军首次成功地使用“穴地攻城法”，于6月3日轰塌全州西门城墙二丈余，乘势攻入城内，杀知州曹燮培以下千余人。

全州为广西湖南两省交通孔道，在太平军围攻期间，广西清军约二万人（一说一万五千，一说七千人）陆续往援。湖南巡抚骆秉章也闻讯告急，咸丰帝命赛尚阿加强湖南衡州（今衡阳市）、长沙防务，以水路为重点，控制要地，以阻止太平军进入湖南。

6月5日，太平军撤出全州，分水陆两路沿湘江北进。全州北面十里之蓑衣渡，是湘江上游的一个险要渡口。这一带重峦迭嶂，树木参天，河床狭窄，江水湍急。湖南永州（今零陵）知州江忠源为阻扼太平军北上，在渡口北面三里的水塘湾江中竖木栅，构筑木堰，以楚勇千余在西岸设伏，并飞函在后追赶太平军的总兵和春派兵在东岸阻击。水路太平军在此遭到伏击，船队受阻，不少船只被击沉。幸和春没有派兵赶到东岸，水路太平军得以弃船登岸，但辎重尽失。陆路太平军亦于西岸遇伏，一面力战，一面夺舟东渡。太平军与清军在蓑衣渡附近激战两昼夜，彼此均有较大伤亡。这时，冯云山伤势恶化，10日不幸牺牲。太平天国失去了一位杰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太平军自金田起义以来，在广西境内转战了一年半的时间，攻城夺邑，屡败清军，极大地鼓舞了革命群众的斗志。洪秀全、冯云山等选择阶级矛盾特别尖锐、反清力量相当活跃，而反动统治相对薄弱的广西为发难地，以偏僻的山区为基点，秘密地宣传和组织群众，并在发动群众的过程中逐步形成起义的领导核心，进行了较充分的军事准备，趁清军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对付天地会起义武装之际，不失时机地点燃武装革命的火炬，这是金田起义所以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起义后，为了摆脱敌人的“围剿”，扩大革命声势，解决粮食军需等问题，决定立即向外发展，这也是正确的。不足的是，起义的领导者没有及时制定一个明确的战略计划，缺乏进一步动员和武装群众的有力措施，也没有主动联合天地会起义武装共同对敌。特别是全军在四面环山的永安小城停留了半年之久，与愈集愈多的清军就地对峙，以致丧失了

据陈徽言《武昌纪事》载：“其法于数里外开一巨洞（按：谭嘯云《守虞日记》谓‘贼之掘地道也，必离城数丈路，掘至城底’），……既达城足，堆满火药，或以枢盛之，而皆藏引线竹筒中，预刻其时为引线之长短，随迟随疾皆可预定，位置既毕，乃静俟轰裂，乘势攻入。”（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以下简称《太平天国》——第四册，第602页。）

江忠源（1812—1854），湖南新宁人，1838年中举人，1848年在新宁组织团练，协同清军镇压雷再浩起义，升知县。1851年赛尚阿督师广西，奏调江忠源赴桂。江便招募乡勇五百名以行，号为“楚勇”，这是湖南乡勇（实际上是早期湘军）第一次出境作战。以后，这支地主武装不断扩大，成为太平军的死敌。（1853年，江忠源率楚勇守南昌，旋升安徽巡抚，在庐州顽抗太平军。1854年1月，太平军克复庐州，江忠源投水死。）

群众条件和地理条件很好的广西地区打开局面，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有利时机，造成战略上的失着。尽管如此，太平军在转战广西各地的过程中，经受了战争的锻炼，队伍日益扩大，战斗力不断提高，为以后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三节 北攻湘鄂与东取金陵 (1852年6月—1853年3月)

一、道州决策

太平军撤出全州后，原拟沿湘江北进，直取长沙，因在蓑衣渡受挫，遂东渡湘江，由陆路进抵湖南永州城西。由于潇水阻隔，未能攻克永州城，只得挥师南向，取道双牌，于1852年6月12日占领湖南道州（今道县）。该地“四面山险，惟一线可通，鸟道崎岖，人力难逞”，利于守而不利攻。太平军占领道州后，广西布政使劳崇光与总兵和春虽带领清军一万二千余人尾随而来，但均系屡为太平军所败的疲惫之师，仅能围堵，不敢强攻。于是，太平军在此得到一个休整补充的机会，开始进入迅速发展壮大的时期。

早在广西全州时，太平军的领导者们对进军方向就有各种议论，占领道州后，对这一重大战略决策问题再次进行了商讨。洪秀全主张下广东，杨秀清主张出湖南，石达开主张入四川，还有一部分将领主张回广西。经过议论，基本上统一了认识，决定进军湖南、湖北，然后东取金陵（今江苏南京）。这就是所谓“道州决策”。当时，清廷从各省调集的重兵，大部仍在广西，而湖南则清军兵力空虚，且会党盛行，进军两湖，既可避实就虚，又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因此，道州决策是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

在道州，太平军领袖们除了决定进军方向外，还由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联名发布了三篇檄文，揭露清王朝的黑暗统治，列举其民族压迫和封建剥削的种种罪行；号召有志之士，同举义旗，“报不共戴天之仇，共立勤王之勋”，“务期肃清胡氛，同享太平之乐”。道州一带是天地会频繁活动的地区，在革命檄文的号召下，当地人民踊跃参军，使太平军迅速补充了二万余人，总数达到五万以上。太平军在这里整顿队伍，增修战具，制备军火，铸炮三百余门，军事实力较前有很大增强。

二、进攻长沙

清廷为实现其四面堵截，一举歼灭太平军于道州的企图，屡命钦差大臣赛尚阿、两广总督徐广缙等加强长沙、衡州及湖南水陆要隘的防守，在粤、

张德坚：《贼情汇纂》，《太平天国》（三），第290页。

湘军幕僚张德坚在《贼情汇纂》中就太平军领导者在道州讨论进军方向时的情况写道：“群贼怀土重迁，欲由灌阳而归，仍扰广西，秀清独谓非计，曰：‘……今日上策，莫如舍粤不顾，直前冲击，循江而东，略城堡，舍要害，专意金陵，据为根本，然后遣将四出，分扰南北，即不成事，黄河以南，我可有已矣。’洪逆等深然之”。（见《太平天国》第三册，第290—291页。）

三檄文为：《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救一切天生天养中国人民谕》。

桂、湘、赣边界要地派兵控扼，阻止太平军向北、东、西突进，又从河南、陕西、四川、江西等省调兵进入湘、鄂。

太平军明确了战略进攻方向之后，便积极准备向长江流域进军。8月10日弃道州，经宁远、蓝山、嘉禾、桂阳州（今桂阳），于17日攻占了湖南重镇郴州（今郴县）。太平军在这一带又扩军二三万人，并将其中数千挖煤工人集中编组为“土营”，专门担负挖地道、埋地雷、炸城堡和掘壕筑垒等任务，在以后的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太平军占领郴州后，和春、江忠源率清军二万余人尾随而来。赛尚阿也自永州移营衡州。由于他调度无方，清廷严旨斥责：“该大臣奉命出征一年有余，历次奏报军情，不过派兵尾追，并未迎头截击，出奇制胜，所谓调度者安在？”随即撤消其钦差大臣职务，改命两广总督徐广缙接替。

太平军探悉长沙守兵较少，乃于8月下旬由西王萧朝贵率总制李开芳、御林侍卫林凤祥以下二千余人，由郴州奔袭长沙。为避开清军主力，奔袭部队不走耒阳、衡州大道，而绕经永兴、安仁、攸县、茶陵、醴陵，于9月11日进抵长沙南门外妙高峰一带。这时长沙守城清军约仅四千人（后即增至万余），不敢出战，紧闭城门。太平军未能收到奇袭的效果，只得连日强攻，但因兵力不足，难以奏效。在第二天的攻城战斗中，萧朝贵中炮受伤，不久牺牲。太平天国又失去了一位重要领袖。

洪秀全、杨秀清等得悉萧朝贵等奔袭长沙受挫后，便于9月25日弃郴州，率大队往援。10月13日赶到长沙时，清军和春、江忠源和向荣部已先期到达，加上其它各路援军，敌人兵力已达五六万人。由于长沙城守渐趋稳固，太平军失去了乘虚攻取的战机。加之，清军拥有三千斤、五千斤大炮，置高处轰击，更增加了攻城的困难。清廷为加强统一指挥，命新任钦差大臣徐广缙立即赶至长沙，统筹军务，先解省围，然后并力“进剿”。

太平军大队驻扎南门外，北阻省城，西滨湘江，前有和春、江忠源部阻拦，后有赛尚阿部尾随，形势十分不利。10月14日、15日，太平军连续出动六七千人发起进攻，遭到清军的顽强抵抗，伤亡甚众。17日，石达开率领二三千人渡过湘江，控制西岸龙回潭等要地和湘江中的水陆洲（即桔子洲），并在江上搭造浮桥，使东西声势联络，初步改变了兵力密集城南一地，难以展开的被动态势。但向荣也跟着率部过江，并于10月31日率兵三千余人从

《剿平粤匪方略》卷十五，第33页。

据张德坚《贼情汇纂》称，太平军在郴州时，萧朝贵建议：“闻长沙城卑防疏，若假轻兵数千，倍道乘之，垂手可得。”洪秀全便给萧朝贵老兵二千，兼程前往。（《太平天国》第三册，第291页。）

太平军进抵长沙妙高峰一带后，即行攻城，因不明地形，误以天心阁（城内东南隅之高楼）为城楼而趋之，当发觉并非城门而改变进攻方向时，各门均已紧闭，遂不得入。

长沙城内有巡抚二，帮办一，提督二；城外有总兵十。但莫相统摄，令出多门。徐广缙拥兵万余，由桂入湘，沿途逗留，直至12月11日才抵长沙，实际上未起作用。

西岸渡江进犯水陆洲，企图截断太平军的東西联系。太平军埋伏于洲南树林中，而以零星骑兵佯败诱敌，待向荣部深入后，伏兵旁出，抄袭敌后。清军大败溃逃，死伤千余人。向荣乘马凫水过江，幸免于死。11月10日，湘江东岸的太平军采用穴地攻城法，轰塌长沙南门附近的城墙数丈，突击部队二三千人蜂拥而上。负责防守南门的清军副将邓绍良率部拚死抵御。太平军伤亡数百人，只得后撤。其后，太平军又多次穴地攻城，由于仅限城南一面，以及突击部队组织欠佳和清军防守顽强等原因，均未得手。太平军在长沙城郊旷日持久地与敌相持，形势日趋不利，乃于11月30日主动撤围北上，守城清军并未及时发觉。

三、攻克武汉

太平军撤离长沙后，于12月3日占领益阳，获船数千只，并吸收许多船户、水手参军。9日，太平军乘船出湘阴临资口，越洞庭湖。13日占领两湖咽喉要地岳州（今湖南岳阳），缴获大批粮饷、军械（其中有清初吴三桂部所遗大批火炮），武器装备得到了改善。在这里，又有五千船户带着船只参军。太平军将船户编组成“水营”，由“典水匠”（职同将军）唐正才统率。这时，太平军总数达到了十余万人。

咸丰帝闻岳州失守，严厉申斥徐广缙，将其革职留任，并命令他以重兵在岳州北面堵截，防止太平军进入湖北。但太平军已于12月17日撤离岳州，水陆并进，直趋武昌，其势甚盛，“艨艟万艘，帆帜蔽江，所过城镇，望风披靡”。前锋于12月19日进至距武昌仅六十里之金口。清廷深恐太平军占领武汉水陆要冲，然后北上河南或东下皖、苏，立命徐广缙亲率大军绕道援救武昌。

武昌是湖北的省会，西枕长江，东依洪山，城高墙厚，形势险要。当时武昌清军仅三千余人，湖北巡抚常大淳、提督双福以城内兵少，将城外兵勇全部撤入城内。12月21日，自湖南来援的总兵常禄、王锦绣所率千余名清

据张曜孙《楚寇纪略》载：新任湖北巡抚常大淳为阻止太平军进入湖北，曾亲赴岳州设防，“沉大船载巨石以塞湖口，归而侈然自得，以为片帆不能飞渡矣”。并声称“吾为此经月尚未竣工，贼欲通之亦非竟月不可，何虑焉”。因而仅以兵千人守岳州而不守湖口。太平军由湘阴攻岳州时，水陆军在湖口“役民夫数万人去沉船，一日而通”。清军“弃城而逃，岳州空无一人”，太平军“遂水陆长驱而下”。（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一册，第72页。）

唐正才，湖南祁阳人（一称广西人）。素以水运木材为业，兼贩米粮，在岳州为杨秀清收用。唐擅长维修船只、搭造浮桥等事，但不谙军事。至南京后，唐提督水营九军事务，兼管运输等事，后封航王。1863年11月在江苏无锡牺牲。

王定安：《湘军记》卷一，第13页。

军赶到，也全部入城，准备依城固守。为了防备太平军“潜挖地道”，常大淳等以“有碍炮路”为名，下令尽毁城外民房，大火延烧七昼夜，引起人民极大愤恨。

12月22日，陆路太平军六七千人由蒲圻直逼武昌城外，未遇任何抵抗即占领了城东洪山、小龟山、紫荆山诸要点，并向南北两翼展开，包围武昌城，同时挖沟筑垒，阻击敌人援军。水路太平军也于22日抵鹦鹉洲，经一昼夜激战，于23日占领汉阳，29日又占领汉口。攻占汉阳后，典水匠唐正才率部于汉阳、武昌间以船只相联，用巨缆横缚大木，上铺木板，架起两座可通人马的浮桥（是年长江水小，为数十年少见，更便于架浮桥），沟通汉阳、武昌间的联系，以便进攻武昌城。

向荣于12月24日率万余援军赶到武昌附近，随后对围城的太平军多次发起攻击，但始终无法突破太平军的包围线，与城内清军取得联系。

太平军自12月25日开始进攻武昌城，先后使用了大炮、火箭、云梯等武器。清军则用炮火、唧水筒、滚木、礮石等抵御。太平军攻城未下，决定采用穴地攻城法。1853年（咸丰三年）1月12日凌晨，埋在文昌门附近的火药轰发，炸开城墙，太平军先头部队立即由缺口冲入，大队相继突进，其余太平军也缘梯而上，纷纷攻入城内。守城清军丢下武器，四散逃跑，巡抚常大淳、提督双福等丧命，武昌为太平军占领。这是金田起义以来太平军攻下的第一座省城。

攻克武汉的胜利表明，太平军已经成为一支能攻克坚城的军队。它的编制内已区分为陆营、水营、土营，具备了正规军队的规模。两年内，清廷先后调集滇、黔、川、粤、桂、湘、鄂、皖等省三四万兵力，耗银千余万两，结果非但未能将太平军消灭，反而被太平军牵着鼻子，出广西，越湖南，趋武汉，一直陷于被动。

四、东取金陵

太平军进军湖北，尤其是攻克武汉三镇后，湖北及其邻近各省纷纷告急。咸丰帝不顾财政经济困难，进一步调兵遣将，妄图阻止太平军的前进，并进而将其歼灭于长江中游地区。由于摸不清太平军下一步的进军方向，只得分兵防堵，并企图把扼守要地与主动进剿结合施行。他接连任命三名钦差大臣，指挥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作战：以向荣代替徐广缙为钦差大臣，指挥二三万清军紧随太平军不舍；任命署河南巡抚琦善为钦差大臣，会同直隶提督陈金绶等，指挥从陕甘、直隶、山东、山西等省调来的清军一万九千名和从

常大淳、双福“恒怯软懦”，屡次拒绝按察使瑞元提出的分驻城外要点，互为犄角、战守相应的主张。

据记载，“火箭亦用竹竿造成，约六七呎长，径宽半吋，一端有羽毛，他端有镞咀重约数两。镞咀缚有爆炸弹药二三发。箭竿用人手瞄准，以火燃着射入敌军。”（参见《太平天国》第六册，第929页。）

吉林、黑龙江调来的马队四千名，于河南南部的南阳、信阳、商城一线防堵太平军北上；任命两江总督陆建瀛为钦差大臣，统筹苏、皖、赣三省军务，自金陵率兵赶赴九江一带，防堵太平军沿江东下。此外，命原云贵总督罗绕典与荆州将军台涌合力筹防襄阳；命署四川总督裕瑞选派将领酌带精兵，进至四川、湖北交界一带防堵。以上总兵力约计七八万之多。同时，还命令南北各省普遍组织团练，凡在籍官员和地方豪绅，均须筹银募勇，以镇压风起云涌的人民起义。

此时，在太平军内部，对下一步的进军方向又产生了争论：有人主张建都武昌，“遣兵道襄樊”，北进中原；有人主张东取金陵，“踞为根本，徐图进取”。两种意见一时统一不起来，最后杨秀清假托“天父降凡”，坚持其进军金陵的一贯主张，才结束了这场争论。当时，太平军无论“北走信阳，东下九江，西上荆襄，南回岳州之路，（清军）俱属空虚”。但从清廷的决心和部署看，河南方向兵力较强，长江下游则相对薄弱。从太平军本身来说，由于在益阳、岳州、武汉一带获得了数以万计的船只，并已编成“水营”，成为太平军的一支重要作战力量和运输队伍，因此，顺江东下，不仅可以直接威胁清王朝赖以生存的南北水陆运输线和江南财源要地，而且能充分发挥水营的作用（如果北上中原，就不能发挥水陆配合作战的特长）。所以，从双方实力和天时、地利等条件来看，太平军顺江东下的决策还是较为可取的。

在武汉，太平军又吸收大量群众参加自己的队伍，形成了湘南扩军以来的第二次扩军高潮。据称，太平军离开武汉时，武昌城中“男子从者十之九，女子从者十一二”。经过短期休整之后，太平军于1853年2月9日（咸丰三年正月初二日）放弃武汉。洪秀全、杨秀清等率领号称五十万之众（兵力约十余万）、船万余艘，水陆并进，浩浩荡荡地顺江东下。陆路由胡以晃、李开芳、林凤祥等率领，沿长江两岸推进；水路由东、北、翼三王及秦日纲、罗大纲、赖汉英等率领，顺流而东。天王洪秀全随水路行动。

2月15日，秦日纲、罗大纲所率先锋水师于鄂东广济县南的老鼠峡一带大败陆建瀛的江防军（约三千人），毙其翼长寿春镇总兵恩长。陆建瀛在九江闻败，仓皇弃师先逃，返回金陵。沿江防兵纷纷溃散。此后，太平军长驱直进，先锋水师于2月18日占领九江，24日攻破安徽省城安庆，杀巡抚蒋文庆，并缴获大批军需物资。2月26日至3月7日，又连克安徽池州（今

王定安：《湘军记》卷三，第3页。

向荣：《进攻武昌贼营并筹办各情形折》，《太平天国》（七），第26页。

佚名：《武昌兵燹纪略》，《太平天国》（四），第572页。

据向荣奏称：太平军破安庆后，“所有藩库饷银三十余万两、总局饷银四万余两，制钱四万余千、府仓米一万余石、太湖仓米二万余石及常平仓谷均已掳去。城上大炮自二千五百斤至数百斤，共一百八十九位，或抬于船上，或丢弃江中。”（《太平天国》第七册，第59页。）

贵池)、铜陵、芜湖、太平府(今当涂)及和州(今和县)。由于水路太平军进展神速,陆路太平军也未遇多大抵抗即顺利地进抵金陵城下。在进军途中,各地人民纷纷参军,使太平军的人数大增,号称百万。清廷在得知九江、安庆失守后,急命向荣率兵赶赴江苏,命琦善、陈金绶率兵急趋安徽(后又令其由皖北进兵江南),协助防守,并保卫南北漕运。

金陵当时称江宁,是江南的名城大都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它城墙高厚,周长九十余里,西北两面濒临长江,东依钟山,附近丘陵环绕,形势险要,向有“龙盘虎踞”之称。江苏清军共有绿营兵三万余人、八旗兵数千人,分守各要点,能机动之兵不足万人。太平军攻占武昌后,陆建瀛从全省抽调绿营兵四千八百人,其中三千名带赴上游防堵,一千八百名留守金陵。金陵设有江宁将军,辖旗兵三千余人。太平军进攻时,城内共有旗兵、绿营兵五千余人,另有江宁布政使祁宿藻临时募集的勇壮八九千人,协助防守。

陆建瀛于2月25日自上游逃回金陵后,数日不理政事。江苏巡抚杨文定借口防守镇江,也离城而去。江宁将军祥厚、江南提督福珠洪阿等将上述情况上奏参劾,结果陆建瀛被拿问治罪,杨文定被革职留任。可是,未等清廷的谕旨到达,太平军的先锋部队已进抵城下,陆建瀛、祥厚乃尽撤城外兵勇,依城防守。

3月7日晚,太平军陆路先锋部队进抵江宁镇的板桥。3月8日,大队太平军在李开芳、林凤祥等率领下,抵达金陵城西南的善桥一带,扎营二十四座。次日,李开芳率数百人占领雨花台,并乘势奔过吊桥,直薄城下。当天,水师先锋亦至,分泊大胜关至草鞋峡一带江面。3月12日,太平军水陆大队继续赶到。同日,分兵占领浦口,并完成了对金陵的包围。金陵城垣南北略长,太平军陆师攻南端的聚宝门(今中华门),水师攻北端的仪凤门,以便发挥水陆两军的优势,并迫使清军分散兵力。

陆建瀛于太平军到达前即将城外防兵尽撤城内,以土袋堵塞十三个城门,企图负城顽抗;同时,向清廷火急求援。清廷获悉金陵被围,大为震恐,不断催促向荣、琦善率南北两路清军兼程向江宁、浦口急进,另令山东、河南加强黄河各渡口的防务,严格控制公私船只,防止太平军北上。

太平军选定北面的仪凤门为突破口,并决定采用行之有效的穴地攻城法。仪凤门外约半里有静海寺,太平军以此为掩护,挖掘地道,埋设火药,准备攻城。与此同时,南面聚宝门外的太平军安炮于报恩寺塔上,猛烈轰城,夜间则搬出寺内五百罗汉,以为疑兵,诱使清军彻夜打炮,不得休息。其它城门外的太平军则派出小部队进行袭扰,掩护北门外的太平军进行攻城准备。

3月19日拂晓,太平军将火药点燃,炸塌仪凤门附近城墙约二丈,数百名将士冲入北城,然后分成两支,一向鼓楼方向进攻,一循金川门至神策门(今中央门),经成贤街直指小营,杀陆建瀛于黄家塘。此后,攻入城内的

太平军遭到满洲旗兵的猛烈反击，力战不胜，只得后撤，并由北门缺口退出城外。然而，防守南城的清军闻北城已破，总督被杀，便纷纷逃遁，不战而溃。于是，进攻南城的数千太平军在林凤祥、赖汉英率领下，乘夜缘梯登城，打开聚宝门、水西门、汉西门。次日黎明，大队太平军进入城内，直奔满城（明代内城，今城东南部）。江宁将军祥厚、副都统霍隆武等率旗兵及满人拚死抵御。太平军奋勇战斗，终将满城攻破，祥厚等被杀，金陵全城遂为太平军占领。

太平军自金田起义后，两年多时间内，转战六省，所向披靡。这次又一举攻占金陵，全歼守敌，取得了继攻占武昌之后的又一重大胜利。这一胜利，粉碎了清廷歼灭太平军于长江中游的计划，沉重地打击了清军的气焰和信心。在这两年内，清廷耗银二千五百余万两，动员近十万军队（不算团练），结果损兵折将，弃城失地，一无所获。太平军能在短期内取得如此重大的胜利，主要是采取了乘虚捣隙的方针，发扬了革命军队英勇善战的特长，特别是善于运用穴地攻城法，使不少坚城计日而下，加以太平军组织严密，纪律严明，士气高昂，其革命行动又反映了劳苦群众要求变革现状的愿望，因而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而清王朝方面，不仅兵力不敷分拨，而且士气低落，派系之间矛盾很大，统帅不和，事权不一，加之军队纪律败坏，军民之间势如水火，这就为太平军取得胜利提供了客观有利条件。但是，太平军在向长江下游进军时，却将沿途攻占的九江、安庆、芜湖等重要城镇一概弃之不守，这从发展与巩固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来说，是失策的；再者，太平军自武汉东下的过程中，对于尾随的清军，未能象撤离紫荆山区和永安时那样，有计划地组织几次伏击，寻机将其歼灭或给予歼灭性的打击，这也是作战指导上的不足之处。所有这些，均与道州决策“专意金陵”的指导思想直接有关，它对于尔后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第四节 定都金陵后的军政决策

太平军攻占金陵后，迅速肃清了城内残敌，建立起新的社会秩序。1853年3月29日，天王洪秀全进入金陵，以两江总督衙门为天王府，并改金陵为天京，定为都城，从而正式建立起与清王朝南北对峙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政权。

太平军对天京的防卫工作，进行了严密的部署。在全城遍设望楼，派兵日夜观察警戒，白天和夜晚分别以旗帜和灯火为信号，一方有警，城内指挥机构能迅速得知，及时作出处置。城上分兵驻守，各段设有巡守将军，日夜巡防。在各城门外建立营垒，营墙上开设枪眼炮门，营外挖有一至数道深壕，内竖竹签、木栅，离营一里半左右设有警戒哨，战士携带兵器、海螺守卫，并规定有口令，每日更换。

为了更好地拱卫天京，太平军于3月下旬发兵二支：一支由指挥罗大纲、总制吴如孝率领，于3月31日占领镇江；一支由地官正丞相李开芳、天官副丞相林凤祥、春官副丞相吉文元率领，于3月22日克江浦，31日占仪征，4月1日占领扬州。镇江、扬州等地的占领，既屏蔽了天京的东面和北面，又切断了南北漕运，予清王朝以严重威胁。太平军占领镇江后，原拟乘势攻取常州、苏州等地，由于向荣已率军追至金陵城外，乃停止东进，分军一部回援天京。

金陵城大而坚，形势险要。它地处江南富庶之区，供应充足，加之傍临长江，交通便利，利于水军活动。元末朱元璋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就是以金陵为基地进行灭元战争的。太平军胜利地占领金陵之后，正可效法朱元璋，据金陵以匡天下。况且太平军在转战两年多以后，不论在军事上、政治上，都需要建立一个有利的巩固的基地，以便继续发展。因此，洪秀全、杨秀清等决定久据金陵，是符合当时客观条件和主观需要的。但过早地宣布建都，却未必有利于尔后革命战争的发展。

清廷对太平军占领金陵后的军事行动，一时无法判明。它既怕太平军东下苏浙，占领其财赋之区，更害怕太平军北上豫鲁，进而威胁其京畿重地。在此情况下，咸丰帝严令向荣、琦善率所部迅速东下，截击、防堵太平军。3月28日，向荣部赶至金陵城外板桥，31日绕至城东二十里之沙子冈，4月

太平天国建都金陵问题，据《李秀成自述》：“此时天王与东王上[尚]是计及分军镇守江南，天王心欲结往河南，欲取得河南为业。后有一老年湖南水手，大声扬言亲禀东王，不可往河南，云‘河南河水小而无粮，敌困不能解救。尔今得江南，有长江之险，又有舟只万千，又何必往河南。南京乃帝王之家，城高池深，民富足余，上[尚]不立都，尔而往河南何也？’……固[故]而未往。”希 短 教旃 氛 榛惚哨返*486页。）

据《金陵杂记》载：“其楼高五丈，计三层，每层设一梯，缘梯而上，在楼上可以了望远处。楼上设大鼓一面，每楼派五人看守……。”（见《太平天国》第四册，第631页。）

7日移营孝陵卫，建立“江南大营”，共有兵勇一万七千余人。3月30日，琦善的先头部队四千人抵达江浦，4月4日攻陷浦口。16日，琦善、陈金绶率部进至扬州城外，扎营雷塘集、帽儿墩一带，建立“江北大营”，计有兵勇一万七八千人。清军建立江南、江北大营的目的，正是为了阻扼太平军向东、向北发展，并伺机夺取金陵。

太平军当时号称百万，实际上能战之兵不过十余万人。以这样一支部队对付近在咫尺的江南、江北大营，在兵力上自然处于压倒优势。但与全国八九十万清军相比，太平军仍处于劣势。其次，这时清王朝仍控制着全国政权和绝大部分人力、物力与财力；而太平天国仅控制金陵附近一隅，人力、物力、财力都极其有限。因此，就全国形势而言，敌强己弱的基本态势并未改变，太平军仍然处于被“围剿”的状态。可是，太平天国的领导者洪秀全等缺乏战略头脑，在面临重大战略转变（即由长驱直进、流动作战到奠都立业）的时候，过高地估计自己，过低地估计敌人，对形势作出了错误的判断，竟认为“我天王奉天伐罪，除暴救民，迅扫群魔，妖氛几尽”，因而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作出了一些不正确的决策，采取了一些不合时宜的措施。

一是大搞封官晋爵，加速了农民政权的封建化。太平天国的军制官制，在起义之初就粗具轮廓，在永安期间又作了增订。定都金陵后，洪秀全等为胜利所陶醉，大肆论功行赏。同时，扩充天王府和各王府的机构，增加礼仪、保卫和生活保障等各类人员。随着各王府的设立，天京城内大兴土木，建造宫殿。由于机构的扩充，各种礼仪称谓更形繁琐，内部的等级制度更加森严。天王洪秀全从此幽居深宫，更加神秘化，而军政实权则日益集中到东王杨秀清手中。总之，建都天京之后，太平天国上层的封建色彩与日俱增，领导集团日趋奢侈铺张，甚至腐化，以致日益脱离群众，内部矛盾也日渐突出。

二是对以后的军事行动作出了不正确的战略决策。太平天国定都金陵后不久，洪秀全等在骄傲轻敌的思想指导下，决定采取固守天京，同时分兵北伐与西征的战略。于是将全军分为三大支：东王为全军统帅，总管全部军事，领重兵留守天京，并在镇江、扬州等地分兵驻守，与天京互为犄角；二是编组北伐军，企图以劲旅疾趋北京；三是组成西征军，拟迅速夺取皖、赣、两湖等地。这个战略是不符合当时主客观条件的，它使太平军在多个遥远的战略方向和漫长的战线上分兵与强敌作战，往往顾此失彼，为清军提供了各个击破的机会。

三是不适当地将太平军的内部制度推广于金陵全城。建都金陵后，太平

《贬妖穴为罪隶论》，《太平天国印书》（下），第442页。

关于太平军如何形成和决定采取这个战略的详情，已难考证。据说，殿左指挥罗大纲曾提出：“欲图北，必先定河南。大驾驻河南，军乃渡河。否则，先定南九省，无内顾之忧，然后三路出师：一出湖楚；一出汉中，疾趋咸阳，以至皖豫；一出徐扬，席卷山左，再出山右，会猎燕都。若悬军深入，犯险无后援，必败之道也”。（《清史稿·洪秀全传》）今人认为《清史稿》所记罗大纲之建言不确，仅录以备考。

天国的领导者主观地将太平军内部的一套制度在广大群众中普遍推行。例如，将全城民众分别男行女行，实行男女分馆，夫妻分居。男子除参军者外，均分别编入诸匠营和百工衙，年老体弱者则入牌尾馆。妇女也大致与男子相同。这样一来，家庭制度实际上被废除了，全城民众全都过着军事供给制的生活。早先在太平军内部实行的圣库制度，也一度推广到金陵全城，城内各店铺的货物一概被收缴入库，商业也实际上被废除了。后由于种种不便，这些制度和规定才陆续有所更改。

当然，天京当局于 1853 年冬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则是太平天国革命的一个创举。这个文件对农民的理想社会作出了具体的规划。它是在早期太平军内部生活秩序的基础上，吸收了进驻金陵半年多来的社会实践经验而制成的。它既是太平天国的政治、经济纲领，也是以太平天国理想改造中国的蓝图。它否定封建土地制度，主张实行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还对农村组织形式、农副产品的分配原则、司法制度、农村官吏的保举升迁以及社会生活等方面的问题（如婚丧、礼俗、教育、民事纠纷的处理等）作了规定。

《天朝田亩制度》体现了广大农民群众渴望获得土地和改变贫富悬殊的社会现状的强烈愿望，也反映出在小生产基础上废除私有制、实行绝对平均主义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这个制度有它正确的进步的一面（在当时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中有着强大的鼓舞作用），但也有它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一面。《天朝田亩制度》基本上未能实行，其中部分内容如乡官制度等在太平军占领区实行了，而土地政策等则或未实行，或根据当时情况作了修改。

此外，天京当局还初步阐明了太平天国的对外政策。太平军挺进长江流域，特别是占领金陵后，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英、法、美等国的驻华代表，接连前往天京，与太平天国的领袖们进行接触，企图摸清太平天国对待西方列强的态度。太平天国的领导者在与他们的交往中，初步阐明了自己的对外政策。总的看来，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对外国侵略者缺乏应有的认识。他们对外国人一概笼统地认为，“既系同拜上帝，皆系兄弟”。但在与这些驻华代表的接触中，他们坚持了独立平等的立场，毫无媚外的表示。经济贸易方面，表示将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平时不惟英国通商，万国皆通商，天下之内兄弟也。立埠之事，候后方定，害人之物为禁。”明确表明了严禁鸦片的态度。对外国人屡次提出的是否承认鸦片战争以来所签订的各种不平等条约问题，天京当局未予正面答复，这是比较策略的。由于革命形势的继续发展和太平天国初期采取较灵活的外交政策，西方列强在一段时间内采取了“中立”观望的态度，这就使太平天国革命获得了较为有利的国际条件。

《殿左五检点罗大纲致上海英国领事馆书》，《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 295 页。

《东王杨秀清答复英人三十一条并质问英人五十条诰谕》，《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 300 页。

第五节 北伐 (1853年5月—1855年5月)

从1853年5月中旬太平军自浦口开始北伐，到1855年5月31日北伐军余部覆灭为止，太平天国为了夺取京津，进行了为期两年的北伐作战。其过程大致分为长驱北上、驻止待援、最后失败三个阶段。

一、长驱北上，挺进京津地区

1853年5月上旬，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和地官正丞相李开芳率军自扬州西进（扬州防务交由指挥曾立昌等负责），5月13日，会合自天京出发的春官副丞相吉文元、检点朱锡琨所部，由浦口北上，向清王朝的统治中心北京进军。北伐军共有九个军的番号，约二万余人。临行前，“秀全诏之曰：‘师行间道，疾趋燕都，无贪攻城夺地糜时日。’”洪秀全等还决定，待北伐军进抵天津后，

再派兵增援。

（一）由皖入豫，抢渡黄河

北伐军没有自扬州沿运河北上，而经由皖北进军。清廷对太平军的北进意图一时判断不清，不知北伐军是牵制和吸引进攻扬州的清军兵力，还是挺进黄河以北。咸丰帝只得施展其前堵后追的故伎，仓皇调兵南下黄河一线堵截，并把苏皖地区的作战行动交给琦善“统筹”。

林凤祥等率北伐军自浦口出发，在乌衣镇一带击败察哈尔都统西凌阿率领的黑龙江马队（由浦口败退者）后，一路长驱北进，连下安徽滁州（今滁县）、临淮关、凤阳、怀远、蒙城，于6月10日到达亳州（今亳县）。蒙亳一带是捻党活动的中心地区，北伐军路过时，吸收许多劳苦群众参军，扩

赵尔巽：《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872页。按：燕都即北京。1853年5月28日杨秀清、萧朝贵给林凤祥等人的诰谕中也有“至到北京之日，……”等语。（见《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175页。）由上可见，太平军北伐的最终战略目标系夺取北京。

李开芳被清军俘虏后供称：洪秀全“到南京意欲不动，打发我们过黄河，到天津扎住，再告诉他，再发兵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五辑第167页）。

当时的黄河系由开封以东之兰阳（今河南兰考）与铜瓦厢（今已坍入河中）之间东下，经刘家口、徐州、宿迁、清河（今江苏清江市）、安东（今江苏涟水）、陈家浦（今江苏滨海西北）流入黄海。1855年夏，中原大雨，洪水泛滥，黄河改道，由兰阳之铜瓦厢入山东境内，注入大清河（即北清河），流经济南，东入渤海，大体上即今日黄河河道。

大了自己的队伍。6月12日，北伐军放弃亳州，于次日攻克清军兵力薄弱的河南归德府城（今商丘），缴获火药四万余斤以及大量铁炮。之后，便北上刘家口（归德北），拟由此北渡黄河，取道山东北上。由于山东巡抚李德已在沿河布防，并将大小船只一律集中北岸，太平军无法北渡，只得沿河西走，连下宁陵、睢州（今睢县）、杞县、陈留，于6月19日进逼开封；因攻城未克，乃撤往中牟县之朱仙镇。林凤祥等在此发给北王韦昌辉一份禀报，告以归德战况及未能渡河的原因，以及北伐途中所遇到的谷米甚缺、通信不便等情况。这时，北伐军由于沿途大量吸收捻党和淮北各地群众参军，声势更大。

由于清军前线将领开始对北伐军的兵力和行动企图判断不清，以为不过二三千人，意在牵制扬州外围的清军，故仍以重兵围攻扬州，这就为北伐军的长驱北进提供了有利条件。及至北伐军进抵蒙亳地区，清廷才察知北伐军将渡河北上，并“已成蔓延之势”，便陆续令各路清军驰援河南：急调江宁将军托明阿率兵二千余人由江苏清江浦北上，并由都统西凌阿率滁州的残兵败将尾追；令山东、直隶督抚查禁河防，防堵太平军北渡，并继续从山西、陕甘等地调兵八千，开赴河南协防；命直隶布政使张集馨率兵一部驻扎临洺关（今河北永年），相机南下；命江北大本营帮办军务胜保带兵一千九百名北上追击。胜保迟至6月18日才自扬州附近启程，而此时北伐军早已攻破归德，正沿黄河西进中。

北伐军于6月23日撤离朱仙镇，经中牟、郑州、荥阳，26日到达汜水、巩县地区。这里是洛河归黄入口处，停有不少民船。北伐军利用这批船只，从28日起开始抢渡黄河。7月1日，托明阿率盛京（今辽宁）、吉林马队数千赶到汜水。北伐军一面阻击敌人，一面继续抢渡。7月4日，北伐军主力全部渡过黄河。担任

小卑职林凤翔、李开芳、吉文元、朱锡锬等回覆禀报后护又副军师北王六千岁千千岁殿下：

为回禀前情剿妖事：卑职等统带兵将，于五月初九日至归德府，城外有妖营盘三个，有妖前来接仗。圣兵争先，追杀得妖兵四百有余，连时破城。城内妖兵妖官尽杀，约杀有三千之多，得红粉贰万有余斤，铁炮无数，粮料不足，同众商议起程。卑职林凤翔、李开芳二位带五军兵将，连夜先往黄河四十里之遥，上下取船，并无船壹，有鞑妖对江把守，仍在河边小村驻扎一夜。有卑职吉文元、朱锡锬二位在归德府候齐兵将正行，于初十日午刻，有妖数千在归德城边东门，分作三阵，忽然而来对仗，卑职吉文元、朱锡锬各统兵向前追杀三十里之遥，不见妖踪胜回。满坡死妖如席，约杀得妖贰千有余，所有号衣系山东、甘肃、湖北三处之妖，得马骡五百余匹，得红粉又有贰万余斤，铁炮无计其数，牛车壹百有余架，大沾天父、天兄权能看顾，兵将吉昌。卑职吉文元、朱锡锬连夜布置，于十一

据尹耕云等《豫军纪略》载：北伐军多次攻开封，“城上枪炮轰击不得近”。太平军“攻城长技恃地雷，自牟工、祥工、黄水两溢，汴城外浮沙丈余，近郊无大村落，不能成隧道”，故未破城。（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捻军》第二册，第160页。）

日统兵往黄河会齐，斟酌在此无船，难以过江，于十二日，一同统兵前去杞县七十里之遥，扎宿一夜。十三日，七十里之遥至睢州扎宿一夜。十四日，九十里之遥至陈留县扎宿一夜。十五日，四十五里至河南省城外，深深沟两重，周围并无房屋，离黄河二十里亦无船只。卑职斟酌，四十里至朱仙镇，即时前往扎宿，近黄河七十里，亦点兵前去取船。

自临怀[淮]至此，尽见坡麦，未见一田，粮料甚难，兵将日日加增，尽见骑马骡者甚多。忖思此时之际，各项俱皆丰足，但欠谷米一事。临怀[淮]至此，着人带文回朝数次，未知至否？如此山遥水远，音信难通，兹今在朱仙镇酌议起程，过去黄河，成功方可回禀各王殿下金安，无烦远虑也。转奏天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太平天国癸好叁年五月十六日朱仙镇报。

林凤祥等给韦昌辉的禀报

阻击任务的数千人 被清军截断，未及渡河，后转战于河南、湖北、安徽，损失大半，最后于8月中旬攻下安徽太湖，东向与西征军胡以晃部会合。

（二）围攻怀庆，贻误战机

北伐军渡过黄河后，于7月2日攻破河南温县，7日进围怀庆府（今沁阳）。当时城内仅有清军三百人，连同团勇壮丁，总计不过万人，由怀庆知府余炳焘等督率，死守待援。林凤祥等本以为怀庆清军单薄，可以迅速攻克，补充粮食弹药后继续北上；不意屡攻不下，于是将怀庆城团团围住，在城外建营立寨，加筑木城，挖掘深壕，一面阻援，一面继续攻城。

对于太平军北渡黄河，清廷极度震惊，乃于7月13日任命直隶总督讷尔经额为钦差大臣，以理藩院尚书恩华和江宁将军托明阿帮办军务，所有黄河北各路清军，统归节制。7月中下旬，托明阿率部六千人，胜保率部一千九百人，恩华率部五千余人，李德率部二千余人，先后赶到怀庆外围。讷尔经额也由彰德（今河南安阳）移营怀庆东北的清化镇指挥。

北伐军久攻怀庆不下，消耗很大，而增援的清军却越聚越多（约近二

关于北伐军未及渡河的人数，众说纷纭：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上册第261页谓“未渡河者，约四千人”。陈善钧《癸丑中州罹兵纪略》谓未及渡河者“尚有千余人……折回巩县”。（《太平天国》第五册，第174页。）《张维城口述》则谓“过河者约有三四万人，未过河者亦约有三二万人”。（《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1期第14页。）

据《张维城口述》称：“贼围怀庆，屡次挖地道，因城内民人有缒城下来者，被丞相拿去，问知城内有壕，所以不敢再挖。初围怀庆时，贼用地雷打破城墙，因城内枪炮打得厉害，贼大受伤，所以不能再上。至贼中大炮止吃药十二两，不能及远。”（见《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1期第16页。）

木城厚二尺，高六七尺，城外有壕，壕中插竹竿、木棍，壕宽四尺，深约四尺。（参见《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1期第14页。）

万），为了摆脱被动，不得不于9月1日主动撤围西进。北伐军由于在怀庆滞留了两个月，使清廷得以在黄河以北厚集兵力，加紧布防，从而增加了进军京津地区的困难。

（三）绕道山西，转攻直隶

北伐军撤离怀庆后，便绕道济源，翻山越岭进入山西，连下垣曲（今垣曲东南）、绛县、曲沃，于9月中旬进至平阳（今临汾）、洪洞一带。清廷急命胜保和山西巡抚恒春等迅速率兵赶到霍州（今霍县）一带，迎头堵截；命讷尔经额调兵控制正定、井陘等要地，防止太平军东进直隶；命陕西、河南巡抚等控制黄河各渡口，妄图把北伐军消灭于山西南部地区。但北伐军自洪洞转而向东，经屯留、潞城、黎城，复入河南，攻破涉县、武安。9月29日，北伐军由山间小路突袭河南、直隶交界的临洺关，击溃立足未稳的讷尔经额所部清军（由怀庆回防直隶）万余人。接着，连下直隶沙河、任县、隆平（今隆尧）、柏乡、赵州（今赵县）、栾城、晋州（今晋县）、深州（今深县）。

北伐军绕道山西插入直隶的行动，使清廷满朝震动。北京城内的官僚豪绅纷纷逃散。咸丰帝立即将讷尔经额革职，以胜保为钦差大臣，随后又任命惠亲王绵愉为奉命大将军、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会同胜保“进剿”。10月15日，僧格林沁率领京营禁兵、蒙古马步军共四千五百名屯驻涿州（今涿县），屏蔽京师，并策应胜保军，企图在滹沱河南合击和消灭北伐军。

林凤祥、李开芳等在深州一带稍事休整后，于10月22日率军东走，连破献县、沧州，于29日占领天津西南的静海县城和独流镇，前锋进至杨柳青，从而使清王朝围歼太平军于滹沱河南的计划又告落空。

北伐军原想占据天津，以便进行休整和待援。当时，天津清军甚少，天津城内的官僚豪绅立即组织团练武装，并破坏运河堤岸，引水环城，阻碍太平军的行动；加之在北伐军占领静海的当天，胜保即率队赶到，并于11月5日进入天津，僧格林沁也移营于天津西北之杨村（今武清），因此，北伐军占领天津的计划未能实现。

二、驻止待援，被迫转入防御

（一）静海、独流之战

静海县城和独流镇均位于子牙河以东的运河线上，两地相距十八里。北伐军既无法占领天津，便退出杨柳青，在静海、独流两地驻扎下来，由林凤

祥、李开芳分别率部固守，同时报告天京，要求迅即派出援军。他们在这里筑木城，挖堑壕，建望台，埋地雷，竖木桩，坚守待援。

北伐军自 1853 年 5 月中旬从浦口出发，到 10 月 29 日占领静海、独流，近半年中，一直保持着进攻姿态，掌握着作战的主动权，队伍也扩充至四五万人。但到达静海、独流后，在远离后方接应的情况下驻止下来，等待援兵，从而陷入重围，被迫转入防御。这是北伐军进军中的一个明显的转折。至此，进攻北京的计划实际上已无法实现了。

围攻静海、独流的胜保军计有两万余人。胜保设大营于良王庄，以主力围困独流镇，由西凌阿带领少量部队围困静海县城。僧格林沁也自杨村移营独流镇以北三十余里的王庆坨以为声援，同时防堵太平军进袭北京。此外，在天津及其附近各县尚有二万七千余名团练武装，配合清军作战。

开始，胜保军凭借优势的武器（包括八千斤至万余斤的重炮）和充足的给养，连日进行围攻，企图迅速消灭北伐军。但北伐军依托木城、堑壕顽强抵抗，使胜保军屡攻屡挫，以致束手无策。北伐军有时也抓住有利战机，对清军实施反击，并击毙率领火器营的副都统佟鉴和天津壮勇统领谢子澄等。由于久攻不下，胜保多次受到清廷申斥，最后不得不要求僧格林沁移营前线，与之合力围攻。

北伐军在静海、独流一带凭借临时构筑的工事，忍受着严寒和饥饿，抗击三四万清军和团练的不断围攻，整整坚持了一百天，充分表现出坚韧顽强的战斗精神。但终因被围日久，粮食、弹药均感困难，援军又无消息，不得已于 1854 年（咸丰四年）2 月 5 日突围南走。

（二）束城、阜城之战

北伐军自静海、独流突围后，经大城县，于 2 月 6 日到达河间府之束城镇，并占据附近的桃园、西成、辛庄等六七十个村庄。这一带村落稠密，树木丛杂，太平军就地取材，迅速建造土垒、木城等防御工事。

僧格林沁和胜保企图歼灭北伐军于撤退途中，率领马队紧追不舍，当天就追到束城。不久，大队清军赶到，对北伐军继续实行包围。清军在四周挖掘深壕，设置鹿砦、木栅，防止太平军突围，并不时发起进攻。太平军凭垒固守，一俟清军接近，便施放枪炮，投掷火罐、火球，大量杀伤敌人。

束城是个小镇，粮弹给养难以补充，因此，北伐军在这里驻守一个月后，又于 3 月 7 日乘着大雾再次突围，途经献县，于 3 月 9 日抵达阜城。

北伐军出发前，洪秀全曾有“到天津扎住，再告诉他”的交代。李开芳在供词中说：“我自浦口同林凤详[祥]、吉汶沅[文元]统带丁旂硕、铃雯、坪又比胫绷、易场、易茂唇、捆煤、樵、闾、董代。信。后我给南京贼营中寄信三次，亦未见回信。”（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五辑第 169 页。）据此，李开芳所说的三次信中，当有一封是到达静海后写的。

阜城也是一个小邑，城内积水很多，房屋甚少。太平军除据有全城外，还占领城北的连村、对村、杜家场和城西南的塔露头村、红叶屯等村落，周围密布鹿砦、树栅，有的地方多达五六层，准备坚守。

北伐军到阜城后，很快又被三万多清军包围。不久，城北各村落入敌手。在3月25日的战斗中，吉文元受伤牺牲，北伐军的处境更加严酷。幸好这时北伐援军已过黄河北上，清廷为不使其与北伐军会合，即命胜保带领万余清军（内有马队二千），赶往山东防堵。这就减轻了对阜城的压力，使北伐军得以在此坚守两个月之久。

三、援军的北上与覆没

按照预定计划，天京当局于得知北伐军抵达天津后，应立即派出后续部队，北上增援。由于天京外围及西征战场的形势均较紧张，援军未能预先筹组和即时派出。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临时决定放弃扬州，以便腾出部队北上增援。但扬州被江北大营清军所困，守军曾立昌部难以撤出，于是由天京派出夏官副丞相赖汉英率部前往扬州外围接应。赖汉英于12月2日出发，26日才接出曾立昌部，放弃扬州。之后，留兵一部退守瓜洲、仪征，主力前往安庆，准备北援。北伐援军原拟由燕王秦日纲统领，秦日纲将这一艰巨使命交给了曾立昌等人，自己仍留守安庆。

北伐援军共十五个军，七千五百人，由夏官又副丞相曾立昌、冬官副丞相许宗扬、夏官副丞相陈仕保等率领，迟至1854年2月4日才从安庆出发，经桐城、舒城、六安、正阳关、颍上，于3月1日到达蒙城。援军在这一带吸收了大批捻党和游民等入伍。3月上旬，北伐援军入河南永城、夏邑，中旬转至江苏萧县西北的包家楼、蔡家庄一带，就地取材，扎木筏渡过黄河，并占领丰县，3月19日入山东境。但担任掩护任务的二三千人未能渡河，退回河南永城，尔后转入安徽六安一带活动。由于山东清军正集结于北部地区，防堵北伐军南下，鲁西地区兵力空虚，故北伐援军进入山东后，如入无人之境，连下金乡、巨野、郟城、阳谷、莘县、冠县，于3月31日直逼距阜城仅二百余里的漕运咽喉要地临清城下。这时，援军兵力已扩充至三四万人。

奉命阻击北伐援军的胜保率部自阜城出发后，经故城入山东，于4月4日到达临清外围。北伐援军一面阻击南下的胜保军，一面猛攻临清城。12日，用地雷轰塌西南城墙两处，攻入城内，但粮秣弹药已被清军全部焚毁，仅得一座空城。在援军攻临清期间，清廷调兵遣将，很快集结兵力一万六七千人（内有马队四千余名），加上团练等约有二三万人。援军入城后，清军随即对临清形成合围，并不断用重炮猛轰援军营垒及城垣。援军屡战不利，不得

参见《剿平粤匪方略》卷八十一第28页及卷八十二第20页。

不于4月23日放弃临清，南退至李官庄、清水镇一带，部队伤亡逃散者万余人。

北伐援军如果坚持北上，很快便能与北伐军会师。当时清廷甚为恐慌，咸丰帝惊呼“将毙之虎，又添双翼”。但援军在临清作战失利后，领导层中对下一步的行动发生了激烈争论。曾立昌认为清军已经疲乏，又屡胜而骄，主张“乘势趋阜城，僧营不虞后路之变，此转败为胜事也！”但许宗扬和陈仕保等置北伐军数万将士的安危于不顾，说什么“众心欲南趋，北行恐多逃亡。我则深入，不如南行，明旦迅发，官军未能追也。”双方争执不决，最后南返的主张占了上风。4月27日，援军南退冠县，在清军的追击和地主武装的袭击下，被杀二三千人，新附之众纷纷溃散。曾立昌渡黄河时淹死（一说自杀）。陈仕保渡河后在安徽凤台县境内阵亡。许宗扬只身逃回天京，杨秀清将其投入东牢。

北伐援军的失败，固然与本身兵力不足及同样是孤军深入有关，但主要是缺乏坚强有力的领导和集中统一的指挥。当援军进至山东、直隶之交的临清时，竟在清军已经逼近的情况下，强攻州城，不仅劳师费时，而且陷于被围的境地。撤出临清后，援军的主要领导者不敢绕道运河以东清军防守薄弱而又不便骑兵行动的地区，继续北上接应北伐军，而是迁就某些领导成员贪生怕死和新附之众留恋乡土的情绪，卷旗南返，结果非但未能达到驰援北伐军的目的，反而先于北伐军而覆灭了。

1854年5月，天京方面又决定派燕王秦日纲再次组织增援，但秦借口“北路官军甚多，兵单难往”，不愿北行。天京当局终因金陵、庐州（今安徽合肥市）以及湖南方面战事十分紧张，无力抽兵而作罢。此后，北伐军只得依靠本身的力量作最后的奋战了。

四、北伐军的最后失败及其教训

1854年5月5日，北伐军由阜城突围东走，占领东光县的连镇。连镇横跨运河，分东西两镇，分别由林凤祥、李开芳率部据守。当天，僧格林沁即率马队追来，不久步队也赶到，又将北伐军紧紧包围。北伐军为了“另择一处”牵制清军，便商定由李开芳率领经过挑选的健卒六百余人骑马突围南下。5月28日，李开芳率队自东连镇突围成功，过吴桥，入山东境，29日袭占高唐。胜保在歼灭北伐援军后，于5月19日返抵连镇外围，得知北伐军突围南下，立即率马队跟踪追击。

此时，留守连镇的太平军仅有六七千人，而僧格林沁则拥军二三万人。清军在连镇四周挖掘深壕，构筑土城，壕深宽各二丈余，土城高一丈五六尺，

《山东军兴纪略》卷一，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捻军》（四），第17页。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一，《太平天国》（三），第50页。

厚八九尺，上安抬枪、火炮，每隔一丈支帐篷一座，设兵十名，严密围堵，企图将太平军困死。可是围攻数月，清军不但未能取胜，反而损兵折将，士气越来越低，以致僧格林沁不断受到清廷申斥。太平军方面，也由于久据连镇，粮食匮乏，仅以黑豆充饥，及至年底，粮食几尽。于是，僧格林沁在加紧军事进攻的同时，乘机开展诱降活动，北伐军前后出降者达三千余人。1855年（咸丰五年）2月17日，太平军放弃西连镇，集中力量防守东连镇。林凤祥利用僧格林沁的诱降阴谋，于2月18日派萧凤山（原系清朝县丞）等九十余人诈降清军，以便联络降众为内应，配合守军出击，打破清军的围困。但这项计划被清军识破，诈降的九十余人全部被害。3月7日，清军对东连镇发起总攻，集中炮火轰击木城，北伐军将士拚死抵抗。林凤祥在督战时身受重伤，士气大受影响。不久，木城被攻破，清军纷纷突入。太平军将士与敌人展开白刃战，大量杀伤清军。最后，太平军大部阵亡，其余或被俘，或从运河潜逃。林凤祥受伤后藏于地道深处，后被清军搜获，解送北京，慷慨就义。

李开芳率领的六百余人（突围途中扩充近千人）占据高唐的当天，胜保即率马队三百名赶到，不久大队清军麇集高唐城外，使这支太平军又陷入重围。李开芳得知援军溃败，早已退出临清，而高唐城高池深，粮草尚多，遂组织居民在城外立栅筑垒，开掘壕沟，并在城内挖掘地道多处，直通城外，准备依城固守。这时，胜保拥兵万余，先后用云梯、吕公车攻城，均未得逞，便改用临时铸造的重炮轰击。太平军利用壕沟地道作掩护，保存自己，并于黑夜抢修被敌人轰塌的城墙。以后，清军又改取挖地道、埋地雷的办法，也未能破城。太平军凭借坚固的防御工事，利用夜暗袭击敌营，前后三十余次，毙伤不少清军。

高唐久攻不下，胜保先后受到拔去花翎和革职留任的处分。留守连镇的北伐军被歼后，清廷便命僧格林沁移师进攻高唐，胜保被解京问罪。

僧格林沁于3月11日选精兵八千余名，抵达高唐外围，使围城清军增至二万余人。此时，李开芳得知林凤祥部已覆没，决意突围南返。僧格林沁从俘获的太平军人员中得到李开芳等急欲突围的情报后，便于3月17日夜密令南面清军分开队伍，故作疏防之势，诱使太平军由此突围。李开芳没有识破敌人的诡计，于当日午夜率部突出，向南急走。僧格林沁以马队五百余名衔尾紧追，李开芳部遂入据离高唐约五十里的茌平县冯官屯。

冯官屯有三村相连，外有高墙。太平军占据后，又掘壕立栅，严密防守。18日，僧格林沁率马队赶到，首先占据西边二村，然后在四面安放大炮，向冯官屯轰击，将房屋尽行轰塌。太平军在屯内挖掘纵横交错的地道、壕沟和地窖，待敌人进至鸟枪射程以内时，通过工事射孔开枪射击，清军始终无法攻入屯内。最后，僧格林沁决定采用恶毒的水灌法，强迫大批民工挖一条全长一百二十余里的水渠（历时月余），引运河水至冯官屯。4月20日，开始放水浸灌，屯内平地水深数尺，壕沟地洞被淹，粮草火药尽湿。这时，僧格

林沁一面用大炮轰击，一面对太平军展开诱降活动。5月31日，清军围攻益急，太平军粮弹告罄，陷于绝境。李开芳率八十余人突围，被清军俘获（一说降于清军），后解送北京，于6月11日遇害。

至此，这支由数万精锐组成的北伐军，经过两年多艰苦卓绝的奋战，终于全军覆没。

北伐军及其援军的全部覆没，这是太平天国自金田起义以来在军事上所遭到的最严重的失利和挫折，对整个太平天国革命战争所带来的影响甚大，教训也极为深刻。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战略决策错误。太平天国的领导者在刚刚占据金陵一隅之后，就以区区二二三万之众，远离后方，进军数千里，深入清王朝的腹心地区，冀图控制一二个外围要点，坚守待援，然后再增兵攻占北京，这完全是一种轻敌冒险的战略决策。战略上的这种错误决策，又未能及时察觉和改正，以致前方将士虽然英勇善战，也难以挽回失败的命运。

第二，援军派出过迟。洪秀全等决定待北伐军到天津扎住之后，再发援兵，这在当时的交通、通信条件下，显然失之过迟。如果后续部队早日派出，与先遣部队互相策应，即使不能直下京津，也可与河北、山东、河南、安徽等地蓬勃发展的人民革命运动相结合，建立革命基地，与敌人进行争夺中原的斗争。这样，北伐军和援军仍有获胜的希望。

第三，机械执行指令。北伐军打到天津外围之后，即遵照出发前洪秀全等给予的指令，在静海、独流停止待援，从而失去了根据实际情况机动作战的特长，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困境。在从静海到冯官屯十五个月的被迫南撤过程中，一味单纯地进行阵地防御作战，虽然善于迅速构筑各种野战工事，但毕竟经受不住清军大炮的连续轰击，以致始终处于被敌军追赶、包围的不利状态。林凤祥、李开芳等如能根据前线实际情况机断行事，并通过机动作战，有计划地伏击尾追之敌，给敌军以歼灭性的打击，北伐军或不致全军覆没。

北伐军是失败了，但这支远离天京孤军远征的队伍，在地形、气候、民情均不适应的情况下，忍着饥饿和寒冷，与优势的敌军进行了近两年的艰苦奋战，大部分将士最后英勇牺牲或慷慨就义，发扬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在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史上写下了极其悲壮的一页。英雄们的鲜血没有白流。他们的长驱北伐，不但在政治上扩大了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推动了北方人民的起义，而且牵制了数万清军，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天京周围和西征战场的军事压力。

第六节 西征 (1853年5月—1856年4月)

从1853年5月中旬太平军自天京出发西征，到1856年4月石达开由江西率军回援天京，为太平军西征时期。西征的战略意图，在于夺取皖赣，进图湘鄂，控制安庆、九江、武汉等军事要地，以屏蔽天京，并解决天京军民的财粮供应问题。其过程大致可分胜利进军、被迫退却、转败为胜和乘胜反攻四个阶段。

一、胜利进军

(一) 占安庆，围南昌

1853年5月19日，即北伐军出发几天之后，太平天国的领导者又派出春官正丞相胡以晃和夏官副丞相赖汉英，率领战船千余艘、步军二三万人，由天京溯长江西征。

西征军首先占领安徽和州，继经太平、池州，于6月10日占领长江北岸重镇安庆。此后，胡以晃即坐镇安庆，指挥西征战事。赖汉英率检点曾天养、指挥林启容以下万余人进军江西，于13日攻占彭泽，接着连克湖口、南康（今星子）、吴城镇，前锋于6月24日直抵南昌城下。

江西巡抚张芾率兵勇六千余人驻守南昌。太平军围城前夕，新任帮办江南大营军务、湖北按察使江忠源自九江率楚勇一千三百人先期赶到南昌，与张芾共同据城防守，并焚烧城外民房，防止太平军穴地攻城。

太平军进抵南昌外围后，稍事准备，即行攻城，为敌军炮火所阻。江忠源等多次督军出城迎战，并炮轰太平军船只，企图打退太平军的进攻，均未得逞。7月9日，太平军用地雷轰塌城墙，随即冲入缺口。由于江忠源已先督楚勇数百人于缺口处堵击，未能攻入城内。7月28日，太平军再次轰塌城墙，发起冲锋，因遭清军堵截，且受绕出城外的清军背后袭击，攻城又未成功。由于僵持不下，双方都向南昌增兵，准备进一步展开争夺战。

8月初，国宗石祥祯（一作石贞祥）、石凤魁、韦志俊等率增援部队万余人、船只近千艘，自天京抵达南昌城外。赖、石等部联合发起进攻，又未得手，便决定一面围城，一面进攻外围各州县，以孤立南昌清军。于是由曾天养率领一支部队，于8月上旬至9月中旬先后攻占了南昌外围的丰城、瑞州（今高安）、饶州（今波阳）、乐平、景德镇等州县。沿途征集了不少粮

据夏燮《粤氛纪事》卷八第5页载：“时，皖省已移治庐州，巡抚李嘉端奏请飭臬司（按察使）张印塘、副将富忠等督兵守安庆。战守之具未备，贼乘舟猝至，官兵不战而溃，遂退守舒城。”

江忠源自武昌东下赴任，军次九江，得张芾求救书，遂以三昼夜疾驰四百里赴援。

食，用以支援进攻南昌的太平军和接济天京。在进占瑞州时，曾击溃自湖南来援的训导江忠淑所部楚勇二千余人。

8月中下旬，清军各路援军亦陆续到达，计有从江南大营派来的云南兵一千二百人（由总兵音德布率领），从湖南派来的湘勇三千六百人（由知州朱孙诒、训导罗泽南等率领）。8月28日，清援军在南昌守军的配合下，对围城的太平军发起反攻。太平军先则佯败诱敌，继则两翼包抄，将敌击退。此后，双方又处于相持状态。

由于久攻不下，杨秀清决定撤南昌之围，转攻皖北和湖北。9月24日，太平军撤离南昌。

其实，太平军如能审时度势，及早采取围城打援战法，着重歼灭清军援兵，不仅可以改变长期顿兵坚城之下的不利态势，而且可以在不断歼灭援敌的情况下攻克南昌。根据当时双方实力对比以及清军援军到达时间不一等情况，太平军是有可能做到这点的。可惜，太平军南昌前线的指挥者计不及此，只一味强攻坚城，以致钝兵挫锐，并陷入两面应敌的被动处境，以致围城三月，终于被迫撤围。

（二）取九江，克庐州（参见附图三）

太平军自南昌撤围后，兵分两路：一路由石祥祯率领，西取湖北；一路由曾天养率领，回安庆并入胡以晃部，进攻皖北。1853年9月25日，天京派石达开率兵五六千人至安庆，主持西征事宜。

石祥祯等所率太平军约万余人于9月29日攻占九江，留林启容率部分兵力驻守，大队继续西进。署湖广总督张亮基急令前武昌府同知劳光泰统率炮船前往鄂东田家镇（今广济西北）扼守，并派署按察使唐树义前往督师。清军编造巨筏，上置火炮，横列江面，妄图阻止太平军船只西进。10月8日，太平军一举占领田家镇对岸的要隘半壁山，为突破清军江防创造了条件。10月15日黎明，太平军水陆并举，猛攻田家镇清军，半壁山上的大炮居高临下地轰击敌人。守军近万人（连同前一日由南昌回援的江忠源部）死伤逃亡几尽，战船炮位全部为太平军所获。田家镇既破，入鄂之水陆门户洞开，于是，太平军乘胜攻克湖北蕪州、黄州（今黄冈），直趋武汉。当时，新任湖广总督吴文鎔以武昌“官弁仓皇无计，众心涣散”，只得闭城株守。“存城兵千余名，不敷分布”。由于武汉清军兵力空虚，西征太平军于10月20日即轻而易举地第二次攻占汉口、汉阳。为了集中兵力于安徽战场，太平军在汉阳、汉口一带仅停留了半个月，11月6日即主动撤离，由石祥祯、韦

曾国藩：《续陈鄂省前任督抚优劣折》，传忠书局光绪二年版（下同）《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四，第9页。

《剿平粤匪方略》卷六十二，第11页。

志俊等率一部兵力留守黄州、蕲州，主力随即转向皖北。

西征军除以部分兵力留守安庆、九江和黄州等地外，集中了一万余人，由胡以晃、曾天养率领，向安徽北部进军。11月14日占桐城，29日占舒城，斩督办安徽团练、工部侍郎吕贤基，直逼庐州（今合肥市）。庐州当时为安徽临时省城，太平军如攻占该城，不仅可以成为天京的西部屏障，而且可以北出鲁豫，西进湖北，南援安庆。庐州城垣周长三十余里，守城清军不满三百，乡勇不满五千。由南昌跟踪太平军至湖北的新任安徽巡抚江忠源，自汉口径安徽六安，急驰庐州，于12月10日率兵二千七百余进入城内。同时，清廷还从河南陈州（今淮阳）、江苏徐州、安徽定远等地调兵万余增援。江忠源入城后，按照防守南昌的办法布置庐州城守，但城内兵力、物资均不及南昌充足，只得寄希望于援兵的到来。

太平军进抵庐州后，先行围城。从12月12日开始攻城，连攻数日，均未得手。到12月18日，由东关援庐的清军寿春镇总兵玉山等部二千余人接近庐州。太平军迎击于威武门外，阵斩玉山，并歼其所部大半。次日，又击溃由六安出援的总兵音德布等所部清军四五百人。从此，清军其它各部援兵均裹足不前。自陈州出援的陕甘总督舒兴阿所部四千余人，迟至1854年1月4日才进抵庐州西北的冈子集；自徐州出援的新任江南提督和春部一千人，则于1月12日才赶到庐州东北的梁园。但各路援军均不敢逼近城池，因此，太平军得以从容部署攻城。太平军以城外民房为掩护，挖掘地道。江忠源督军从城内对挖，先后将太平军攻城地道破坏九处。太平军虽曾两次炸塌城墙，但均未能攻入。其后，太平军改用新法，“于南门月城之旁，另掘数处，形如曲突，又叠为上下层。戒曰：初发时，闻声不必相应，俾其用力堵之；堵而后发，则无及矣。”1月14日夜，大雾迷漫，咫尺不辨，上层地雷轰发，毁城墙五六丈，守城清军连忙抢堵，不久，下层地雷又发，乡勇争相下城，投奔太平军，清军惊恐大乱。太平军攻击部队乘势由缺口冲入，守军纷纷溃退。与此同时，小南门、小东门方向的太平军也缘梯而上，攻入城内，与清军展开巷战。至15日晨，守城清军全部被歼，知府胡元炜降，庐州城为太平军占领。自广西起一直与太平军为敌的江忠源投水自杀。清廷予救援不力的舒兴阿以革职处分。之后，各路援军全归和春统带。

太平军攻占庐州后，没有乘胜追歼清军援兵，扩大战果，仅留胡以晃率近万人驻守，而将曾天养部调往湖北战场，急于开辟新区。2月20日，石达开又派国宗石达英等率部由安庆过长江，经东流、建德（今东至东北）占领祁门。这样，清军得以逐渐集结了三万兵力，对庐州进行长围久困，使太平军无法与当地的捻军结合起来，扩大占领区，在皖北开创新的局面。这不能不说是西征军作战指导上的一次失策。

（三）进军湖北

1853年底，当西征军集中主力攻打庐州时，留驻湖北黄州等地的太平军基本上采取守势。1854年1月29日，湖广总督吴文镕率兵七千进驻黄州以北二十余里的堵城，并命唐树义督水师扼守上游，妄图攻占黄州。这时，由国宗韦以德、地官副丞相黄再兴、春官又副丞相林绍璋、丞相张子朋等率领的水陆大军已由下游开到，曾天养所率太平军也已由庐州到达黄州，连同原有守军，共约四万人。2月初，正值太平天国天历新年，黄州城内举行祝贺活动，吴文镕以为有机可乘，遂连续三次督兵进攻，但均未得逞。堵城“滨江临壑，三面皆水，（清军）大营十一座，排比屯扎，已犯兵家之忌。”加之连日大雪，清军斗志甚低。太平军派出部队，绕至清军大营之后，荫蔽埋伏，敌人毫无察觉。2月12日，黄州城内太平军全部出动，从正面猛攻清军；同时伏兵齐起，纵火焚烧清军营寨。清军前后受敌，纷纷溃逃，湖广总督吴文镕、总兵德亮、知府蔡润深等皆被杀。唐树义见陆路覆灭，急率水师上驶金口（后被太平军全部歼灭）。

太平军取得堵城之捷后，便乘势沿江发动进攻，于2月16日第三次攻占汉口、汉阳，并进围武昌。同时，又分兵两路，向湖南和鄂北进军。南路军二万余人由石祥祜及林绍璋指挥，直指长沙；北路军万余人由曾天养指挥，进逼荆襄；留下攻武昌者仅万余人。

湖广总督吴文镕被击毙后，清廷立即命荆州将军台涌接任（暂驻德安府——今安陆县），并以青麟为湖北巡抚，率兵千余据守武昌。同时，从四川调兵四千东下援鄂，并一再催促两广总督速调红单船进入长江，以威胁太平军的长江航道和天京安全。

1854年3月至4月，北路太平军连下湖北孝感、云梦、安陆、随州（今随县）、钟祥。5月2日，攻破荆门，准备由此南下，进围荆州。荆州城内仅有旗绿兵丁二千人，适有奉调援鄂的云南兵一部（由游击王国才等率领）路过该地，新任荆州将军官文便截留协守。太平军向荆州进逼时，官文派王国才率兵一千二百人及练勇五百人迎战。5月9日，双方战于龙会桥，太平军稍退，清军随即分三路夹攻。太平军不支，曾天养等率部转趋上游，经当阳，于5月18日攻占宜昌。官文立派副都统贵升等率兵千余前往，会同宜昌镇总兵纳钦等率部反攻。5月27日，太平军弃宜昌，接着连下宜都、枝江，拟再攻荆州。6月8日，在离府城数十里处遭王国才等所部清军堵截，乃南下进入湖南境内，以便与南路太平军会师。

《剿平粤匪方略》卷七十九，第24页。

红单船原系广东航行外海之大商船，由海关发给牌照（红单），故名“红单船”。此类船大者安炮三十余位，小者二十位，可在左右舷和船头三面轮放，射程较远。

（四）挺进湖南

南路太平军水陆并进，挺进湖南，于2月27日占岳州，3月4日占湘阴，7日占靖港，11日占宁乡。这时，新建的地主武装湘军已经组成，太平军南下，受到了湘军的阻击。

1. 湘军的兴起

早在1852年，太平军出广西，进湘鄂，所向披靡，清廷深感绿营和八旗兵已不足用，便饬令各省举办团练，以助“攻剿”。1853年1月21日，因母丧回湖南湘乡守制的礼部右侍郎曾国藩奉命帮同湖南巡抚张亮基督办湖南团练。后来，曾国藩认为团练不足恃，决定组建一种新的军队，这就是“湘军”（也称“湘勇”）。

湘军大体上仿照明朝戚继光的营制，以营为基本单位，直接受“大帅”统辖（后增设统领，各统率若干营）。每营编营官一、哨官四、勇丁五百人，另配长夫一百八十人，合计每营六百八十五人。每哨设八队，火器队与刀矛队各半。火器主要有抬枪、鸟枪。全营有劈山炮队二，直隶于营官。湘军水师筹组的时间略晚于陆师。水师每营编快蟹船一、长龙船十、舢板船十，共二十一，员额为四百四十七人。每只长龙船安炮七门，舢板船安炮四门，均为六百斤至千斤的洋炮。各船还配有火枪、刀矛，以备近战。此外，湘军还设有营务处和粮台，分别管理全军的军务与后勤。

针对绿营兵的流弊，曾国藩在组建湘军时采取了某些改革措施：一是薪饷较高，并专配长夫，自带帐篷，以利于加强训练和作战。二是实行募兵制，采用自上而下的办法，首先选定统领，然后由统领挑选营官，由营官挑选哨弁，由哨弁挑选什长，由什长挑选勇丁，以便相互熟悉和层层控制。勇丁挑选的对象主要是年青力壮的农民。应募者须有人具保，并编造清册，填写籍贯、住址和父母、兄弟、妻子姓名。它实际上是把“连坐法”应用于对军队的统治。这样，在伍时可以防止勇丁逃亡，解散时可以各有所归。此外，曾国藩所选将领除所谓“诚朴”的读书人外，还从绿营中挑选少数精于武艺的将弁为营官，以便训练水陆兵丁，教会他们掌握技艺和阵法。曾国藩还强调“严刑峻法”，并建立严密的稽查制度，以申军纪，同时，向兵士灌输“忠勇奋发”、“尽忠报效”、绝对服从官长等思想，鼓励湘军士卒大肆屠杀起

以上为湘军水师初建时的营制。1856年后，改制如下：裁快蟹船，长龙船减为八艘，舢板船增为二十二艘，全营共有船三十艘（每船炮位如旧），员额增至五百三十二人。

湘军兵将薪饷普遍高于绿营。如陆师正勇（其兵丁分亲兵、护勇、正勇、伙勇等）每月发饷四两二钱，较之绿营各种兵多一至四倍；营官月薪五十两，另办公费一百五十两。待遇既优，各勇除自用外，还可养家，于是视当兵为正当职业，将领也不致随意克扣兵饷，从而减少了官兵矛盾。曾国藩声称：“初定湘营，饷项稍示优裕，原冀月有赢余，以养将领之廉，而作军士之气。”（《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十，第47页。）

义人民，为封建统治阶级卖命。

至 1854 年初，曾国藩已练成湘军陆师十五营、水师十营（拥有战船二百四十只、坐船二百三十只），官弁、勇丁、长夫等共一万七千余人。这支军队实际上是只听命于曾国藩的私人武装，它开创了近代军阀拥兵自重的先例，表明清王朝已经衰朽到难以维护其统一军权的地步。

2. 湘潭、靖港之战

自西征太平军进军皖鄂以来，清廷屡饬曾国藩率湘军赴援。曾国藩以战船尚未办齐、在广东购置的火炮（千余门）尚未解到为由，迟不应命。当西征太平军再次溯江而上，进军武汉时，清廷又催促曾国藩率湘军出湖南，迅抵武汉，以阻遏太平军的攻势。曾国藩随即复奏，坚持必俟粤炮解到方可起程，并提出必先扫清湖北江面方可援皖，必力保武昌上游方可进战的方略。

1854 年 2 月 25 日，曾国藩督率全部湘军分水陆两路自衡州起程，到湘潭集结，随后开赴长沙。3 月上旬，陆路湘军自长沙开赴靖港、乔口，阻截南下的太平军。由于湘军陆续北上，太平军难以抗衡，因而一度放弃岳州等处，自湖南撤回湖北。4 月初，太平军加强兵力之后，由湖北蒲圻方向重新发起进攻，7 日再克岳州。曾国藩在湘军“陆路既已失利，水军亦无固志”的情况下，不得已“乘风上驶，退保省城”。太平军乘胜进至乔口、靖港等地，逼近长沙，并在 4 月 21 日、22 日于靖港击败曾国藩派出的湘军水师。鉴于长沙防守严密，南路太平军决定由石祥祜率部分兵力扼守靖港，由林绍璋率主力近二万人由陆路绕经宁乡，疾趋长沙西南数十里的湘潭，以便南北夹击，围攻长沙。22 日，林绍璋所率太平军大败扼守宁乡的三营湘军（共一千八百人），歼其营官三人及勇丁五百余名。当补用副将塔齐布率湘军一千三百余人驰援宁乡时，太平军已由间道直赴湘潭，并于 24 日占领了湘潭城，对长沙湘军后路构成严重威胁。林绍璋等督饬太平军于城北赶筑木城，防敌进攻，又收民船数百只，编组水营，控制湘江江面。

4 月 25 日，塔齐布率部赶到湘潭城外，营官江忠淑等率部二千六百名继至。塔齐布认为，太平军“每用以守为战、反客为主之法，若不及时速剿，俟贼营垒既定，攻克为难”，于是立即对太平军展开猛攻。太平军出城迎击，双方在湘潭北郊连日激战。塔齐布令兵勇闻炮即伏，炮止即进，直冲太平军营垒。面对湘军的疯狂进攻，太平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由于初到湘潭，扎营未稳，且又孤立无援，渐呈难以抵御之势。

27 日，曾国藩又派湘军水师总统、知府褚汝航等率水师五营驰援湘潭，在湘江内与太平军水营展开激战。湘军水师凭借船炮的优势，往返冲击。由

参见曾国藩《沥陈现办情形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二，第 23—25 页。

曾国藩：《岳州战败自请治罪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二，第 44 页。

曾国藩：《会奏湘潭靖港水陆胜负情形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二，第 52 页。

民船仓卒组建的太平军水营，难以抵挡湘军水师的进攻，三天之内被毁大小船数百只，伤亡逾千人。

由于连日接战不利，加之太平军内部新老战士之间相互埋怨，甚至发生械斗，林绍璋等决定留兵一部守城，自率大队向湘江上游转移。29日，在击退湘军的进攻后，立即集中船只，装载财物，乘风上驶。次日午间抵达下澧司时，不意为湘军水师追及，因拒战失利，便弃船登岸，由陆路折回湘潭。这时，湘军已在湘潭城外设下伏兵。5月1日，当守城太平军战士缘梯而下，准备接应城外太平军入城时，湘军伏兵骤起，将出城之太平军战士砍死，乘势夺梯登城，打开城门。大队湘军立即冲入，夺占了湘潭城。自下澧司折回的太平军见城已失守，只得分道撤退：林绍璋率部北返靖港，另一部经醴陵东走。湘潭之战，太平军伤亡和逃散甚众，损失惨重。

此前，曾国藩得悉湘军在湘潭水陆初胜，即于4月28日亲率水师五营（大小战船四十只）、陆勇八百人，由长沙进袭靖港，企图使太平军首尾不能相顾。当天中午，南风骤起，水流迅急，湘军战船顺风闯入靖港，遭太平军岸上炮火猛烈轰击，指挥船被击伤，各般连忙降下风帆，到靖港对岸之铜官渚躲避。太平军立即出动二百余只小划船，对湘军水师发起攻击，毁敌船十余只。湘军水勇不支，纷纷弃船上岸。这时，坐镇白沙洲（距靖港二十里）指挥的曾国藩，急率陆师向靖港方向增援。但湘军陆勇见水师失利，又见太平军大批出动，便纷纷后退，曾国藩执剑督战，也不能遏止。靖港一战，湘军水陆皆败，战舰损失三分之一，炮械损失四分之一。曾国藩羞愤交加，两次投水自杀，皆被随员救起，最后狼狈逃回长沙。

太平军虽在靖港获胜，但无法抵偿湘潭之战所遭受的损失。湘潭失利的直接原因，首先是对战斗力较强的湘军尚缺乏了解，因而在思想上和军事上都缺乏与强敌作战的准备；其次是孤军冒进，立足未稳，遭敌猛攻，措手不及；再就是临时编组起来的水营，抵挡不住经过训练和装备有洋炮的湘军水师，以致连连失利，影响了整个作战。

西征军自1853年从天京出发，到进军湘潭，前后不足一年，先后攻占了安庆、庐州、九江、汉口、汉阳、岳州等重镇，有效地保障了天京上游的安全和粮食物资的供应，取得了重大胜利。但战线拉得太长，兵力过于分散，且不懂得巩固既得阵地，只顾长驱直进，以致既未能有计划地大量歼灭敌人，骤遇强敌时又不能集中优势决战决胜。此后不久，西征军被迫由进攻转入防御，在湘军的进攻下，节节后退，几至不能遏止，对整个西征作战影响甚大。

湘潭、靖港之战，湘军损失也很严重。曾国藩承认：水师仅存湘潭五营二千余人，陆师仅存湘潭与留防平江之勇二千余人。因此，急需招募兵员，修造战船，购置枪械，进行休整补充。太平军方面，自湘潭战败后，不得不

参见曾国藩《靖港败溃自请治罪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二，第62页。

于5月4日自靖港等地退守岳州。后由林绍璋率部西向，连克湖南龙阳（今汉寿）、常德、桃源。6月中旬，林部与由湖北南下的曾天养部在常德会师，后乘船越洞庭湖回到岳州，于是西征前线的兵力才得以相对集中。

南路太平军在湘潭失利后，率军围攻武昌的韦志俊等恐湘军长驱北上，湖北难保，便将分散于鄂北各地的太平军调回，并力进攻武昌城，而由石祥祜、林绍璋分军活动于通城、岳州、常德等地，牵制和阻遏湘军。当时，武昌城内清军由于被围日久，饷绌粮尽，巡抚青麟束手无策；总督台涌仍然株守德安府，不敢南下救援；荆州将军官文则受北路太平军牵制，无暇东顾。在此情况下，太平军终于在6月26日攻克武昌，青麟等侥幸突围，绕道逃往荆州。在攻城战斗中，年仅十八岁的太平军将领陈玉成率五百壮士，奋勇当先，表现非常突出。清廷以武昌失守，将台涌革职，青麟军前“正法”。

二、被迫退却

（一）岳州争夺战

湘军经过两个多月的休整补充后，战斗力又得到恢复。1854年7月上旬，曾国藩以二万之众，自长沙北上，水陆并进，再次对太平军发动进攻。水路以水师总统褚汝航等率水师四营二千人进泊岳州南六十里的鹿角，扼岳州太平军南进之路。陆路以署提督塔齐布所部为中路，增派知州罗泽南、魁联之湘勇二千人助，由新墙直趋岳州；以道员胡林翼所部为西路，由常德向北推进；以同知林源恩、江忠淑等部为东路，出平江，取道通城、崇阳，直逼武昌。湘军以湖南为大后方，其兵员、粮饷的筹集与供应事宜，均由湖南巡抚骆秉章和左宗棠等负责，基本上无后顾之忧。

7月16日，当塔齐布率陆师自新墙向民州前进时，曾天养率部迎战不利，仍退守岳州。23日，太平军水师在东洞庭湖君山、雷公湖一带遭湘军水师伏击，损失不少船只。太平军水陆连败，形势十分不利，遂于25日主动放弃岳州，退守岳州以北二十余里之城陵矶。

湘军进占岳州之后，太平军决定乘其立营未稳，组织反攻。7月27日，曾天养等督战船四百只，在陆路配合下反攻岳州。湘军分五路迎战。太平军水陆皆败，失战船七十六只，炮二百八十余门，伤亡逾千人，曾天养只得率余部退守临湘。7月30日，韦志俊率部自武昌来援，与曾天养、林绍璋等率战船五六百只，再次反攻岳州。湘军水师迎击于城陵矶。开始胜负未分，后由于湘军水师营官杨载福率舢板绕至太平军水师之后，乘风纵火，太平军战船被焚百余只，伤亡千余人，不得不撤出战斗。

8月8日，曾国藩亲率总兵陈辉龙所部广东水师四百余人自长沙进抵岳州（道员李孟群所部粤桂水师一千人不久也由长沙开到）。8月9日，陈辉龙督队进击太平军。出发前，曾国藩告以“下游水急，进易退难，如遇南风，

不必开仗，且沿江港汊，虑有埋伏，获胜后仍勿穷追”。陈辉龙深以为然。及至城陵矶，与太平军相遇，双方前锋开始交战。此时，南风忽起，湘军水师船只顺流而下，难以自控。曾天养见此情景，令大队战船埋伏于旋湖港，另出小舢板诱战。湘军水师中计，陷入重围，进退两难。陈辉龙见风势愈大，急欲收队，但恐前队有失，不得不亲自赶往救援，由于坐船笨重，激战中搁浅。太平军将士蜂拥而上，当即阵斩陈辉龙。湘军水师总统褚汝航率船救援，也被太平军击毙。同时被歼的还有同知夏銮、游击沙镇邦、千总何若澧以下数百人。陈辉龙一营船炮尽失，其余各营亦损失不少战船。曾国藩闻报，“伤心陨涕”，哀叹经营多时的船械一天之内损失将半。

8月11日，曾天养率兵三千由城陵矶登岸，准备据险扎营，牵制湘军北上，不意塔齐布率兵猝至，来势凶猛。年近花甲的曾天养单枪匹马冲入敌阵，直奔塔齐布。塔连忙躲闪，仅伤坐骑，而曾天养反为湘军所伤，落马牺牲。塔齐布乘势挥军冲击，太平军因主将阵亡，且战且走，从水路撤回，伤亡数百人。曾天养骁勇善战，夙有“虎头军”之称。此次作战，其勇敢精神诚属可嘉，但作为一军主将，脱离部队，单骑陷阵，则是一种鲁莽行为。曾天养阵亡后，太平军在韦志俊率领下，于城陵矶一带与敌相持十余日，接战五次，败多胜少，遂于8月25日撤往武汉。

（二）放弃武汉

太平军撤离城陵矶后，湘军水陆并进，直指武汉：水师于9月4日占嘉鱼，15日进抵武昌西南六十余里的金口；陆师由塔齐布等率领，9月5日从岳州出发，因沿途受到太平军阻击，迟至10月6日才抵达武昌南六十里的纸坊（今武昌县）。曾国藩于10月2日抵金口，不久，与塔齐布、罗泽南等共同商定了进攻武汉的计划：先以水师控制江面，隔断武昌与汉阳之间的联系；以陆师塔齐布部四千人由纸坊进攻洪山，罗泽南部三千人由金口进攻武昌花园，副都统魁玉、已革总兵杨昌泗率荆州兵四千三百人进攻汉阳。

太平军于6月26日克武昌后，由韦以德、石凤魁、黄再兴等率军约二万人防守。三个多月来，在外围修筑了大量防御工事。于花园一带立大营三座，掘深沟宽二丈，长约三里，沟的内侧立木城，实以沙土，中开炮眼，沟外侧立木桩，交互连钉，桩外密布竹签，环以荆棘。木城之内，又有砖城内壕，安炮百余门。汉阳的防御工事也相当坚固。

10月12日，清军开始总攻。当日，曾国藩督水陆两军自金口沿长江三路齐下：李孟群等率水师为中路，其前队闯过盐关，直抵鹦鹉洲，出现于太平军水师之后；当盐关太平军战船回援鹦鹉洲时，湘军水师后队又至，对太平军水师实行前后夹击，烧毁其战船三百余只。罗泽南部合荆州派来的李光

荣部川勇共四千人作为右路，进攻花园。他们分路扑向太平军营垒，纵火焚烧，太平军不支败退。魁玉等所率的荆州清军为左路，进攻汉阳虾蟆矶，冲进土城，并破鹦鹉洲太平军营垒。同日，塔齐布部湘军也进扼武昌城东的洪山。

13日，湘军水师直下武昌塘角等地，又焚太平军战船三百余只，前锋进至青山。罗泽南等部破武昌鲇鱼套附近太平军营垒六座。汉阳方面，魁玉、杨昌泗部毁太平军晴川阁木栅及大别山（即龟山）木垒。至此，武汉江面无太平军船只，城外无太平军营垒，武汉三镇暴露在湘军的直接威胁之下。太平军守将石凤魁、黄再兴等（当时韦志俊、石祥祜、韦以德等已东返天京）匆忙决定放弃武汉，于14日晨开始撤离。撤退过程中，武昌太平军在城东的洪山遭湘军塔齐布部截击，损失千余人；泊于汉水中的太平军水师战船千余只，因来不及下驶，被湘军焚烧殆尽。

武汉地处天京上游，南控湘赣，北扼荆襄，它的失守，对西征战局的影响甚大。武汉失守的主要原因有三：首先，当太平军在城陵矶阻击湘军时，武汉方面一再派出援军，损失精锐不少，使防守武昌、汉阳的兵力逐渐减少。其次，自曾天养阵亡后，西征战场前线缺乏适当的统帅人物，负责驻守武昌的国宗石凤魁，“粗通文墨，不谙军务”，协助防守的地官副丞相黄再兴，系办文案出身，同样不长于军事，而石达开则一直远离前线，鞭长莫及，无法进行有效的指挥。再次，西征太平军自湖南败退后，士气大挫，一时失去了与湘军作战的信心。在湘军水师前锋刚刚占领金口时，国宗韦以德即托故先回天京；待湘军水师进至武汉江面并战败太平军水师时，武昌太平军仓皇撤离，驻防汉阳、汉口的太平军也随之弃城而走。此外，曾国藩注意到了沿江作战的特点，先以优势的水师从中路突破，取得江面主动权，将两岸太平军分隔开来，以便陆路各个击破，这也是设防坚固的武汉之所以迅速易手的原因之一。

（三） 田家镇、半壁山防线被突破

湘军占领武汉后，声名大噪。清廷赏曾国藩兵部侍郎衔，办理军务。曾国藩于得意之余，即筹划大举东犯，并决定以夺取九江为第一目标。他与新任湖广总督杨霨商定了—个水陆并进，夹江而下，首先突破太平军田家镇、半壁山江防，进而夺占九江的三路进军计划。其兵力部署是：南路由新任湖南提督塔齐布和知府罗泽南分统湘军兵勇沿长江南岸进攻鄂东大冶、兴国（今阳新）；北路由杨霨督陕西提督桂明率绿营兵进攻蕲州、广济（今蕲春东南）；中路以水师顺江而下，由参将杨载福、同知彭玉麟率部先发，曾国藩与李孟群率后队继进。预定三路会师于田家镇，总兵力约万余人。

太平军方面，杨秀清已于10月15日将湖北军事委托给燕王秦日纲统理

（秦奉命巡查河道，当时已到九江），命其在湖北田家镇、半壁山一线加紧设防。太平军在田家镇至蕪州一段四十里之江岸修筑了一些土木城，安置炮位；在田家镇与南岸半壁山之间横架铁链二道，两链相距约十余丈，铁链之下排列小船数十只，配以枪炮；在半壁山扎大营一座、小营四座，山下挖掘三四丈宽的深沟，内侧建立木栅、炮台，外侧密钉竹签、木桩。为了加强该处防御，杨秀清还专门派人从天京送来一座木籬，作为江中堡垒。此时，从武汉退回和从下游来援的太平军总数又达数万，号称十万人。他们设防虽较严密，但在作战指导上却采取消极防御的方针。

太平军浮筏为营图

1854年10月底至11月初，清军自武汉分批出发。自武昌起程的南路湘军分为两支：一支由塔齐布率领，经武昌县（今鄂城）趋大冶；一支由罗泽南率领，经金牛镇趋兴国。11月11日，两支湘军分别陷大冶、兴国。不久，罗泽南部进扎半壁山下，塔齐布部进扎半壁山东南十里之富池镇。

半壁山孤峰峻峙，俯瞰大江，北麓尤为陡峭，形势险要，是太平军重点守备之地。曾国藩认为，“先攻田镇对岸之半壁山，夺其要隘，则铁锁（链）一岸无根，当易拔去。”11月20日起，双方于半壁山进行了十分激烈的攻防战，太平军作战不利。23日，秦日纲亲自督军二万，与罗泽南等部湘军再战，复大败，伤亡数千人，余部退至田家镇，半壁山随即失陷。湘军派百余人缒崖而下，将横江铁链砍断。适国宗韦志俊、石镇仑、韦以德等自芜湖率援军赶到，24日配合秦日纲督军自田家镇分路渡江，进攻占据半壁山之敌。鏖战竟日，太平军各路俱败，石镇仑、韦以德等千余人阵亡，秦日纲和韦志俊率余部退回长江北岸。次日，太平军又将江中铁链钩联于南岸半壁山下。

湘军水师东下时，太平军检点陈玉成部将敌前锋阻截于蕪州。半壁山被湘军攻陷后，陈玉成于11月29日令水营突围下驶，于是湘军水师得以顺流而下。12月1日，杨载福与塔齐布等商讨进攻田家镇的计划，鉴于太平军江防坚固，确定将战船分为四队：一队专管斩断铁链；二队专管攻击太平军炮船；三队待铁链破除后直趋下游，焚烧太平军船只；四队守卫老营，防太平军袭击。12月2日，湘军战船出动，塔齐布督同罗泽南等率陆师六千人，排列南岸，以助水师声威。湘军水师傍南岸急桨而下，直至铁链之前，“以洪炉大斧，且熔且椎，须臾锁断”。当太平军炮船前往救护时，湘军水师第二队随即上前发炮轰击，毁太平军炮船二艘。待湘军水师第一队将江中铁链破坏后，其第三队舢板船飞桨下驶，太平军水师阵势遂乱，纷纷败退。湘军舢板船疾驶武穴（今广济）、龙坪一带，从下游纵火焚烧太平军战船。时值

木籬外有木城，中搭板屋、望楼、营垒，密架枪炮，籬上铺沙，籬中贮水，以防火攻，实际上是一座水上活动堡垒。

曾国藩：《拟先攻半壁山破贼横江铁锁片》，《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四，第8页。

曾国藩：《官军攻破田家镇烧尽逆船收复蕪州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四，第35页。

东南风大作，太平军上游之船无法下撤，被烧毁不少。12月3日，秦日纲、韦志俊等自焚田家镇营垒，率部东退黄梅。至此，太平军苦心经营的田家镇、半壁山江防被湘军彻底突破。

太平军从湘潭作战失利到田家镇、半壁山防线被突破，以水师的损失最为惨重，前后有近万艘船只被敌军焚毁、击沉，从而使湘军水师得以在天京上游江面横行无忌。这不仅直接影响了西征战场上的陆路作战，而且使天京受到愈来愈大的威胁。

三、转败为胜

（一）九江之战

湘军攻占田家镇、半壁山后，水师前锋在彭玉麟率领下于12月8日进至九江江面。这时，太平军主力大部集中于长江北岸，清军仅凭魁玉、桂明的部队无法取胜，曾国藩乃命南路之塔齐布、罗泽南所部湘军于12月9日渡江。曾国藩亦于次日抵田家镇，指挥北岸的作战。当日，太平军冬官正丞相罗大纲也由江西饶州率军近万人渡江至九江对岸之小池口，支援秦日纲等部，抗击清军的进攻。12月20日至31日，太平军先后与敌军战于鄂东双城驿、黄梅、濯港、孔垄驿，接连失利，只得退入安徽境内。

1855年1月2日，罗大纲率部渡江，退守湖口。这时，石达开已带领胡以晃等自安庆抵湖口，曾国藩也由田家镇进抵九江城外。双方主帅俱临赣北前线，战事逐渐由江北移向江南。

湖口位于鄱阳湖入长江口之东岸，依山傍水，形势险要。湖口之西对岸为梅家洲，再西五十里，即为古城九江。石达开等鉴于湘军气势正盛，水师更占优势，便决定扼守要点，伺机退敌。具体部署是：石达开坐镇湖口；林启容仍率部守九江；罗大纲率部守梅家洲。

为了集中力量进攻九江，湘军加紧从江北向南岸转移兵力。1月6日，塔齐布部从上游琵琶亭渡江，次日移驻九江南门外。8日，新任湖北按察使胡林翼也率黔勇二千赶到，分扎要隘。9日，罗泽南部从下游白水港渡江。曾国藩又调副将王国才所部三千余人作为预备队。这样，围攻九江的清军总兵力达到一万五千人。

九江北枕长江，东北有老鹳塘、白水港，西南有甘棠湖，西有龙开河，湖汊纵横，东南多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太平军守将林启容督军于四周严密设防，东南尤为坚固。1月14日，塔齐布、胡林翼率部进攻西门，三战皆败，死伤甚众。18日，清军发起全面进攻，塔齐布部攻西门，胡林翼部攻南门，罗泽南部攻东门，王国才率兵七百由长江水路登岸攻九华门。太平军沉着应战，待塔齐布部进抵城西时，“众炮齐放，子若飞蝗”。敌人冒死进攻，“奈地险而路曲，难以仰攻”，终未得逞。进攻其它各门之敌，也“因

城上枪炮木石交施，屡次抢登，不能得手”。于是，曾国藩轻取九江的计划宣告失败。

曾国藩攻九江不下，改取“舍坚而攻瑕”的方针，留塔齐布等部继续围攻九江，派胡林翼、罗泽南等率部进驻梅家洲南八里之盔山（今灰山），企图先取梅家洲，占领九江外围要点。太平军守将罗大纲在这里“立木城二座，高与城等，炮眼三层，周围密排；营外木桩、竹签广布十余丈，较之武昌、田镇更为严密；掘壕数重，内安地雷，上用大木，横斜搭架，钉铁蒺藜其上。”

1月23日，清军分路向梅家洲发起进攻。太平军凭借工事奋勇抗击，毙敌数百人，击退了清军的进攻。

（二）湖口大捷

由于清军进攻九江和梅家洲均未得逞，曾国藩等决定改攻湖口，企图凭借水师优势，先击破鄱阳湖内太平军水营，切断外援，尔后再攻九江。

1855年1月3日，当湘军陆师尚未南渡之际，李孟群、彭玉麟即率湘军水师进抵湖口，分泊鄱阳湖口内外江面。罗大纲鉴于湘军水师占优势，难以力胜，决定采用疲敌战法。1月8日夜，“用小船百余号，或二三只一联，或五只一联，堆积柴草，实以硝药，灌以膏油，分十余起，纵火下放，炮船随之。两岸出队千余人，呼声鼎沸，兼放火箭火球”，对湘军水师实施火攻。由于湘军预有准备，未能取得多大战果。此后，太平军常以类似战法袭扰和疲惫敌人，使其“彻夜戒严，不敢安枕”。太平军还在鄱阳湖口江面设置木籬数座，四周环以木城，中立望楼。木籬上安设炮位，与两岸守军相犄角，严密封锁湖口，多次击退湘军水师的进犯。1月23日，湘军水师乘陆师进攻梅家洲之机，击坏太平军设于鄱阳湖口的木籬。石达开、罗大纲等将计就计，令部下用大船载以沙石，凿沉水中，堵塞航道，仅在靠西岸处留一隘口，拦以篾缆。1月29日，湘军水师营官萧捷三等企图肃清鄱阳湖内太平军战船，贸然率舢板等轻舟一百二十余只，载兵二千，冲入湖内，直至大姑塘以上。待其回驶湖口时，太平军已用船只搭起浮桥二道，连结垒卡，阻断出路。湘军水师遂被分割为二：百余“轻捷之船”，二千“精健之卒”，陷于鄱阳湖内；留于长江内者，“多笨重船只，运棹不灵，如鸟去翼，如虫去足”，致

曾国藩：《浔城逆党两次扑营均经击败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四，第75—76页。

曾国藩：《浔城逆党两次扑营均经击败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四，第77页。

曾国藩：《水陆屡胜围逼浔城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四，第71—74页。

曾国藩奏称：“水师之在湖口者，以内河狭窄，贼籬数十丈，横亘江心，籬侧有炮船，籬外有铁锁（链）、蔑缆，层层固护，两岸营墙，百炮轰击，皆以坚守此籬，百计攻之，终不能冲入。”（见《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四，第78页。）

使曾国藩“实觉无以自立”。太平军乘此有利时机，即于当晚以小船数十只，围攻泊于长江内的湘军大船，并派一支小划船队，插入湘军水师大营，焚烧敌船。岸上太平军数千人也施放火箭喷筒，配合进攻。湘军大船因无小船护卫，难以抵御，结果被毁数十只，其余败退九江附近江面。

在湖口大捷的同一天，江北秦日纲、韦志俊、陈玉成所部太平军自安徽宿松西进，击败清军参将刘富成部，占领黄梅。2月2日，罗大纲派部进占九江对岸之小池口。曾国藩以“水师既陷于内河，陆军复挫于小池口”，遂调胡林翼、罗泽南二部由湖口回攻九江，驻于南岸官牌夹。为了给湘军水师以进一步的打击，罗大纲乘势于2月11日率大队渡江前往小池口。当夜三更，林启容自九江、罗大纲自小池口以轻舟百余只，再次袭击泊于江中的湘军水师，“火弹喷筒，百枝齐放”，焚毁大量敌船（其余敌船纷纷逃至武穴以上），并缴获曾国藩的坐船。曾国藩事先乘小船逃走，后入罗泽南陆营，复欲寻死，被罗泽南等劝止。

太平军取得湖口之战的胜利，打破了曾国藩夺取九江、直逼金陵的狂妄企图，开始扭转了西征战场上的被动态势，从而成为西征作战的又一转折点。西征军自湘潭战败后，弃岳州，失武汉，节节退却，直至九江、湖口，形势十分不利。但另一方面，由于清军的进攻，太平军被迫缩短了战线，集中了兵力，加强了指挥，消除了战线过长、兵力分散的弱点。湘军虽然节节胜利，却预伏着种种危机：由于掳获甚多，“饱则思颺”；由于屡胜，骄傲轻敌；由于长驱直进，离后方供应基地越来越远，运输补给日益困难。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石达开等坚守要点以疲惫敌人，并利用有利地形，抓住有利时机，机智果断地分割湘军水师，进而立即主动出击，取得了重创湘军水师的重大胜利，使整个西征战场的形势为之一变。

四、乘胜反攻

（一）再克武昌

西征太平军取得湖口大捷之后，石达开、胡以晃等决定乘胜发起反攻。

2月16日，秦日纲、陈玉成等乘清军后路空虚，率部西进，击溃湖广总督杨霨所部清军万余人于广济。接着，连占蕲州、黄州，于23日第四次占领汉阳，杨霨逃往安陆。韦志俊率部自田家镇渡江，25日进占兴国，不久又进占通山、崇阳、咸宁，与秦日纲部会攻武昌。3月下旬，罗大纲率部复占江西饶州府，不久又回安庆，与皖南太平军范汝杰部会合，进占徽州府（今歙县）等地。

湘军水师自遭太平军打击之后，又于2月20日遭暴风袭击，沉船二十

曾国藩：《水师三次获胜两次败挫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五，第4页。

二只，毁坏二十一只，曾国藩令其余七十余只全数撤往武汉，“名为速剿上犯之贼，实则修整已坏之船”。这时，曾国藩的湘军已被分割于五处：水师之一部开赴武汉整修；一部困在鄱阳湖内，由曾国藩坐镇南昌，亲自督造大船，添募水勇，准备配合江西水师伺机出击；陆师塔齐布部五千人留驻九江外围，准备继续攻城；李元度部三千人留驻湖口外围；罗泽南部三千人往援赣东。此外，胡林翼部二千余人和王国才部三千余人则先后回援武昌。显然，曾国藩所统清军由于兵力分散，已被迫由进攻转入防御，由主动陷于被动。

从3月21日起，秦日纲、陈玉成部太平军围攻武昌。困守武昌的二千清军由新任湖北巡抚陶恩培督率。武昌被围后，清军急抽兵增援。数日内，城外援兵已达万人。4月3日，秦日纲与韦志俊等督军猛攻武昌。城内清军“争缒城走，外兵亦走”，而“水师固不任城守事”，仅“自保而已”。太平军直奔城下，“用缒城绳引而上”，占领武昌城，杀陶恩培等多人（一说陶赴水自杀）。

1855年4月18日，清廷以胡林翼署理湖北巡抚，以李孟群为湖北按察使。胡林翼统率湖北清军，“屯金口，倚水师自保”，并“增募二千六百人，合王国才等军，号六千。”

太平军占领武昌后，陈玉成立即率兵一部进军鄂北，于4月上旬攻占安陆（后又失守）和云梦。5月12日，再次攻克安陆，杨霈退守随州。17日，西安将军札拉芬及副都统常亮在清廷一再督促下，率援军自河南抵随州。31日，陈玉成率军往攻，大败札拉芬等部于随州东南之五里墩，阵斩札拉芬。杨霈经枣阳逃往襄阳。6月11日，清廷将杨霈革职，湖广总督由荆州将军官文接任。14日，又命曾与北伐太平军作战的西凌阿为钦差大臣，督办湖北军务，并从山东抽调镇压北伐太平军的所谓“得胜之师”四千五百人至湖北，一千五百人至河南，加强这些地区的“堵剿”兵力。

6月10日，署湖北巡抚胡林翼督军四千余人分三路反攻武昌，与此同时，王国才率部反攻汉阳，彭玉麟部水师则助攻两岸。太平军略有损失，但击退了敌人的进攻。20日，秦日纲自武昌派太平军绕袭金口，抄胡林翼部后路，迫使胡部回援。其后，双方又多次交战，互有伤亡。9月7日，韦志俊率部自武昌出发，在通城、崇阳等地太平军的配合下，于9月12日攻占金口，同时击败李孟群部水师，迫使其退守新堤（金口西南）。9月18日，湖北太平军自汉阳分兵八路围攻胡林翼和王国才部于汉阳西南之蓼山。清军大溃，经大军山退往新堤。太平军没有乘胜追击，致使胡林翼得以重整旗鼓，卷土重来，实属失策。

曾国藩：《大风击坏战船并陈近日剿办情形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五，第12页。

王闿运：《湘军志·湖北篇》第1页。

（二）转战江西

当西征军在湖北战场上捷报频传之际，活动于安徽、江西边境的太平军范汝杰部，于1855年4月中旬连占安徽婺源和江西弋阳，后又连克江西兴安（今横峰）、上饶、玉山等地。4月14日，湘军罗泽南部三千余人自九江经南昌驰援赣东，于5月6日陷弋阳，12日陷上饶，并在这一带与太平军周旋，直至7月18日才回驻南昌，后又奉命西援武昌。

10月上旬，罗泽南率湘军五千人（除罗部外，曾国藩加拨参将彭三元等部一千五百人随往）由江西义宁州（今修水）进入湖北，于中下旬占领通城、崇阳，直逼武昌。当时，秦日纲已奉命由湖北返回天京；石达开、胡以晃、黄玉昆率领的太平军二万余人正自安庆进援湖北。11月1日，石达开军在武昌县之樊口登岸后，经金牛镇前往咸宁，以阻截罗泽南所率湘军。4日，石达开亲率二万人大败罗泽南部于崇阳壕头堡，彭三元等所部千余人全军覆没。5日，太平军克复崇阳。罗部退至蒲圻西南之羊楼洞，并与胡林翼派去的援军取得了联系。14日，石达开军复通城。

当石达开军进攻崇阳时，韦志俊率军近二万人由纸坊进抵蒲圻。石、韦二人约定分路攻取湖南，抄袭湘军的老巢。但是，石达开不久便改变上述计划，他见湘军全力救援武汉，江西兵力空虚，决定采用“围魏救赵”之策，进军江西，威胁曾国藩的南昌大营，以调动湘军，减轻湖北太平军的压力。石达开把对付罗泽南部湘军的任务交给韦志俊（韦部不久即败退武昌），自率三万人于11月24日折入江西。

12月9日，石达开军进占江西新昌（今宜丰），与从广东北上的天地会起义武装周培春、葛耀明等部数万人会师，声势更壮。接着，分兵连占上高、瑞州、新喻（今新余）、峡江、樟树镇（今清江）等地，威逼南昌。坐镇南昌的曾国藩，因石达开部逼近，于12月下旬急调围攻九江的周凤山部湘军（塔齐布于8月30日暴病而死，由副将周凤山接统九江外围湘军）五千人回援南昌，并调鄱阳湖内水师防守赣江。于是，被敌人围困几近两年的九江得以解围。

鉴于南昌敌军兵力增强，石达开所率各部继续进攻南昌周围各府县，先后占领新淦（今新干）、奉新、分宜、宜春、吉水、永丰等地，以切断南昌清军与外围的联系，断绝其后方供应。

1856年（咸丰六年）1月11日，湘军周凤山部攻占樟树镇。2月9日，由武汉经衡州潜行至江西星子的道员彭玉麟也率内湖水师赶到樟树镇。22日，湖南巡抚骆秉章派补用知府刘长佑、同知萧启江分别率部自醴陵、浏阳增援江西，3月18日占萍乡，准备继续东进。“樟树镇者，西近瑞（州）、临（江），东接抚（州）、建（昌），（赣江）两岸之关键，省城（南昌）

之咽喉”。因此，曾国藩“用全力扼守樟树镇，以保东岸，以卫省垣”。有鉴于此，石达开集中兵力，从3月22日起，向樟树镇发起攻击。24日，太平军四路围攻，尽破周凤山所部湘军营垒，杀敌千余。周凤山率残部逃奔南昌。曾国藩惊恐万状，再次奏请调回罗泽南所部湘军，力言“罗泽南在鄂，一时尚难得手”，“与其顿兵坚城，攻遥遥无期之湖北，又不如移师腹地，救岌岌将殆之江西。武汉两岸，三万余人，即无罗泽南一军，亦尚足敷防剿；江省西南与湖南、广东接壤，若不迅速殄除，实系三省无穷之患”。

石达开率军由湖北转战江西，先后攻占数十座城镇，使西征战场上出现了一派大好形势。但是，正当南昌指日可下，曾国藩“呼救无从”、“魂梦屡惊”之际，洪秀全、杨秀清等从西征战场大量抽调太平军回救天京。4月，石达开率部二万人经江西安仁（今余江东北）、万年（今万年西）、乐平出江西境，取道皖南，回援天京。太平军江西军务由卫天侯黄玉昆主持（后由韦昌辉接替）。此后，江西太平军基本上停止了进攻，从而给了困处南昌的曾国藩以绝路逢生的机会。太平军的西征作战，至此也就告一段落。

太平军历时三年的西征，经过浴血奋战，终于占领和保住了天京上游的安庆、九江、武汉三个重镇，以及安徽、江西、湖北的部分地区。这不仅在军事上使天京有了可靠的屏障，而且在经济上保证了天京的粮食供应，为尔后坚持更艰苦的斗争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西征作战之所以出现由胜到败和转败为胜的曲折过程，既有其客观原因，也与双方前线将领的作战指导密切关联。西征之初，太平军连战皆捷，便产生了轻敌速胜思想。武昌未下，即急于分兵，北攻荆襄，南下湘岳，将仅有的三四万军队，分向三处作战，结果南路军在湘潭骤遇强敌受挫，被迫节节后退，整个战局为之变坏。直至湖口之战，太平军集中了兵力，加强了指挥，并利用了湘军指挥上的错误，才得以转败为胜。

太平军在西征作战指导方面所产生的一些失误，自然与太平天国的领导者在定都金陵之后所作出的战略决策有关。仅以数万兵力，就想一举夺取皖、赣、湘、鄂四省，明显地存在着战略目标过大与兵力不足的矛盾。在轻敌思想支配下，必然产生分兵冒进的错误。而西征总指挥部又设在安庆，远离前线，不能及时准确地了解情况，实施正确有力的指挥，使多路分兵的后果更为严重；加之某些前敌将领缺乏独当一面的指挥才能，因而自湘潭战败后，便节节败退，几至不可收拾。转入反攻后，仍未克服多路分兵的缺点，虽然在湖北、江西战场上取得了不少胜利，但击溃敌人多，歼灭敌人少。由于以上种种失误，以致未能给尚处于初建阶段的湘军以彻底歼灭的打击，终于使这支凶狠的地主武装得以不断发展，成为尔后致太平军以死命的劲敌。

曾国藩：《会筹各路堵剿情形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七，第14页。

曾国藩：《调罗泽南回援江西片》，《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七，第21页。按：石达开军攻占瑞州后，曾国藩即奏请调回罗部，清廷未予同意，告以“俟武汉克复，酌量催调”。（参见上书同页。）

第七节 一破江北江南大营 (1856年2月—6月)

1853年5月以后，太平军的精锐部队分别调往北伐、西征战场，天京附近兵力大为减弱，以致经常受到江北、江南大营清军的威胁。1854年7月，清廷从广东所调的五十只红单船陆续驶抵镇江一带江面，太平军的“龟船”和部分营垒相继被其击毁，对天京的水上运输威胁甚大。1855年，形势更趋严重。继北伐军于当年5月全军覆没之后，天京西翼重镇太平府和芜湖又于7月被清军攻占。11月，皖北重镇庐州失陷，天京的东方屏障镇江及其对岸的瓜洲，也屡遭清军进攻，使天京受到日益严重的威胁。好在自1855年初起，西征战场转败为胜，太平军又重新夺回了武汉以及湖北、江西部分地区，湘军陷入了兵分数处，被动挨打的局面。这就使天京当局有可能从西征前线抽调大军东援，摧毁江北、江南大营，改善天京处境。

太平军击破江北、江南大营之战，历时四月有余。整个作战过程大致分为打通天京与镇江的联系、攻破江北大营、击败镇江外围之敌、攻破江南大营四个阶段。

一、打通天京与镇江的联系

清军于1853年5月就开始围攻金陵下游的咽喉要地镇江。1855年4月，江苏巡抚吉尔杭阿在镇压了上海小刀会起义之后，率清军七八千人到达镇江外围，加紧对镇江的围攻。镇江城内米粮、火药渐感缺乏，形势十分严重。所以，太平军调兵回援后，首先东援镇江。

镇江城内有太平军约万人，守将为检点吴如孝。太平军东援时，由吉尔杭阿统领的镇江外围清军兵力已增至万余人，分别驻扎于城西南之九华山和城东之京岷山一带，另由提督余万清率兵一部驻于下蜀街，总兵虎嵩林率兵一部驻于高资，准备阻截由天京东援的太平军。

1856年初，冬官正丞相陈玉成，地官副丞相李秀成等奉命自皖西率部返回天京。2月1日，秦日纲、陈玉成、李秀成等率太平军数万人自天京分两路东进：一由天京东北的观音门沿江至栖霞一带，直趋镇江；一由神策门至紫金山东面的仙鹤门，以为掩护。清军一面在仙鹤门一带迎战，一面由镇江方面派兵防堵。双方连日接战，不分胜负，后相持于龙潭、下蜀之间。镇江守将吴如孝得知天京派兵东援，曾多次派兵出城接应，均被清军堵回。

为了打破僵局，秦日纲等商定由陈玉成率少数精兵于夜间乘小船顺长江

“龟船”系太平军的一种大型船只。据周长森《六合纪事》载：太平军“联巨筏为四牌，上施楼橹，建了台，中载粮糗，四围障以牛皮，巨槳数十，名曰龟船”。（《太平天国》第五册，第155页。）

“舍死直冲到镇江”，“与吴如孝计及抽军由内打出”，以便东西两面夹攻清军。4月1日晨，秦日纲等率大军由仓头一带向东直进，清军迎战。至午间，战斗正酣，先一日抄小路迂回至下蜀清军后路的李秀成所率三千人突然发起攻击。清军腹背受敌，阵势大乱。这时，陈玉成、吴如孝也率镇江守军赶到，两支太平军胜利会师。次日，太平军又大败吉尔杭阿等部清军，连破敌营十六座，直抵镇江，屯扎于金山、金鸡岭、九华山脚，与九华山的吉尔杭阿大营对峙。

太平军会师镇江后，连夜调集船只，载大部军队由金山渡江至瓜洲，另留夏官又正丞相周胜坤一军扼守仓头后路。

二、攻破江北大营

1853年底，太平军为筹组北伐援军而放弃扬州之后，瓜洲一带仍由赖汉英等率兵一部驻守。由于这一带地势平坦，驻该处的太平军全恃木城、深壕，引水环绕防守，多次击退江北大营清军的进攻。1854年秋，琦善病死于扬州军中，清廷以江宁将军托明阿继任钦差大臣，而以陈金绶、雷以誠帮办军务。清军为防止瓜洲太平军北进，西自仪征的新城，东至运河边的施家桥，筑长墙一道。后为了进攻瓜洲，又在长墙以南，从八里铺向东西两侧延伸，加筑土墙一道，绵亘四十余里。土墙筑成后，江北大营也前移至八里铺，并沿土墙修筑营盘和炮台各二十余座。

1856年4月2日，吉尔杭阿派人向江北大营通报了太平军将渡江北上的情报，但未引起托明阿等的重视。当晚，秦日纲、陈玉成、李秀成等率大军渡江，到达瓜洲。4月3日拂晓，太平军对土桥发起猛烈进攻，清军大败。秦日纲等督军乘胜猛进，连破虹桥、朴树湾等清军营盘。敌人望风披靡，争相逃命，溃散大半，炮械旗帐尽弃，托明阿等逃奔三汊河。太平军一鼓作气，次日又大败三汊河之敌，连破敌营一百二十余座。清军余部千余人退守秦家楼、蒋王庙一带。托明阿仅带数十骑连夜逃往扬州东北的邵伯镇。5日，太平军乘扬州城防空虚，兵不血刃地再克扬州。至此，经营了三年之久的江北大营被太平军一举摧毁，万余清军作鸟兽散。

秦日纲等率军北攻扬州，主要目的在于征集粮食，以济镇江、瓜洲守军的急需。因此，在攻破江北大营并完成粮食征集任务后，为了回军天京进攻江南大营，随即率部南返，仅留少数兵力驻守扬州，致使这个江北米粮集聚要地又于4月17日被清军江南大营所派援兵及江北大营的败兵再占。

秦日纲等本欲率军自瓜洲南渡，因得悉据守仓头的周胜坤部被清军所败，由南岸返回天京之路已被切断，乃于4月14日率兵自扬州西进，前队于16日攻占浦口，准备由此渡江南返。但就在当天，钦差大臣向荣派总兵

张国梁率兵勇二千四百名由南岸栖霞附近之石埠桥渡江，配合北岸清军于4月22日攻陷浦口，27日又进占江浦，致使太平军由浦口南渡之路被阻。秦日纲等只得于28日折而东返，经仪征至三汊河，并在此休整二十余天，于5月27日由瓜洲渡江，屯驻金山。于是，大江以北仍仅有瓜洲一地为太平军所据守。

清廷因扬州之败，将托明阿等革职查办，任命副都统德兴阿为钦差大臣，统率江北诸军。

三、击败镇江外围之敌

秦日纲等率太平军南渡之后，5月29日攻占黄泥洲，并乘胜猛攻高资清营，拟打通回京之路。吉尔杭阿闻警，自九华山大本营率队往援。6月1日，太平军大败高资清军，并击毙吉尔杭阿（一说吉自杀）。3日，太平军围攻九华山，清军见主帅已死，不战自溃，三十余座营盘全部瓦解，提督余万清负伤后逃往京岷山大营。6日夜，太平军从地道攻入京岷山清军西营，守敌早已溃逃。次日，太平军继续进攻东营。由于镇江告急，向荣派署江宁将军福兴和总兵张国梁率马步兵三千人自龙潭出发，经上塘、河阳绕至镇江以东的丹徒镇，于6月10日向围攻京岷山的太平军进攻。秦日纲等见防守龙潭的清军主力已前来镇江，不积极打击授兵，反而尽弃九华山营垒，于13日经高资、下蜀、龙潭返抵天京东北的燕子矶、观音门，给镇江的防御带来了不利影响。

四、摧毁江南大营（参见附图四）

当秦日纲等率军东援镇江之际，石达开率领的二三万太平军于5月2日占领安徽宁国府（今宣城），11日克芜湖，18日进攻秣陵关。向荣见江南大营受到威胁，急忙派总兵张国梁率部前往阻截。

这时的形势对太平军十分有利。江南大营原有兵力二三万人，由于太平军东援镇江和进攻江北大营时向荣已从江南大营抽兵往援，石达开部取道皖南回京时，向荣又分调清军数千进行防堵，因而其部队被迫分布于孝陵卫、镇江、广德、溧水、宁国等宽广的地区，各处兵力都很薄弱。向荣在奏折中诉苦说：“臣军精锐，尽已调出，存营不满五千，除去疲病守营，出队仅一千余人……。”向荣为了要求迅即增兵，难免夸大其词，但江南大营兵力空虚，确是实情。

为了调动敌人，石达开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法，令其南路部队于6月13

向荣：《派兵赴高资严防内犯并请派兵助剿折》，《太平天国》（八），第623页。

日攻占溧水。“溧水咫尺东坝，接连溧阳，均系入苏常要道”。而屏蔽苏、常，是江南大营的主要任务之一，太平军攻占溧水，向荣认为“大局攸关”，立即调兵遣将：令江长贵部一千四百人由句容前往堵截，“先遏内犯之路”；令明安泰部“星夜拔队，由湖熟赶往援剿”；并由大营抽调亲军千名、义勇五百名“先往助仗”，随后又令得力干将张国梁选带精兵，“驰往统领督剿”，“迅图克复”。这样一来，天京附近的清军兵力更形空虚。

秦日纲等率军回抵燕子矶、观音门后，本欲进入天京，但东王杨秀清见清军江南大营已危如累卵，严令他们必须攻破孝陵卫江南大营后方准入城。陈玉成、李秀成等进京当面向杨秀清申述：“向营久扎营坚，不能速战进攻。”杨秀清厉声说：“不奉令者斩！”于是陈玉成等“不敢再求，即而行战”。

太平军选定孝陵卫东北的仙鹤门为主攻方向，西北的龙脖子（地保城）为助攻方向。6月17日，秦日纲、陈玉成、李秀成等率部自燕子矶移营仙鹤门。天京太平军一队数千人越过龙脖子，另一队七八千人自神策门、太平门出城，占据大小水关及冯家边一带，离仙鹤门数里筑垒，与秦日纲军相呼应。向荣派总兵王浚统带马步兵二千人前往仙鹤门防堵。18日，双方接战，未分胜负。当天，另一队太平军三四千人自龙脖子冲出，摇旗呐喊，牵制和吸引清军注意力。同日，石达开军北支队也赶到仙鹤门、尧化门一带，筑垒数十处，前锋抵达紫金山东面的黄马群，切断了江南大营赴仙鹤门的必由之路。向荣见大营危在旦夕，急令张国梁抽带兵勇千余名由溧水星夜赶回大营，并从丹阳、秣陵关调兵一千三百人回援；同时，严令王浚等“加意固守待援”，密令都司冯子材带广勇五百名，“多带火弹，夤夜潜赴黄马群”，焚烧太平军新筑各垒，以便“与仙鹤门之营通气”。

6月19日拂晓，太平军四五千人直扑仙鹤门敌营，接着又出动数千人分七八队进行包抄，王浚等部清军溃退。与此同时，龙脖子方面的太平军也出动二三千人，排立山脚，向荣不得不从大营抽兵六百前往抵御。当天，张国梁率兵一千二百名赶至大营，但慑于太平军的声势，不敢应战，只是连夜在青马群（黄马群南）一带筑垒，妄图阻止太平军的进攻。

6月20日晨，各路太平军发起总攻。仙鹤门方向的太平军多路齐出，将敌营团团围困；另一路太平军二三千人翻过紫金山，从后路直插清营。与此同时，天京城内又派数千人出通济门，直扑七桥瓮。向荣亲率大营兵勇一千二百名赶赴七桥瓮，名为抗击，实则为逃跑作准备。这时，紫金山上又一支太平军四五千人由灵谷寺下山，攻破满洲马队营盘，纵火焚烧；同时，洪武

向荣：《溧水失守片》，《太平天国》（八），第633页。

向荣：《溧水失守片》，《太平天国》（八），第633页。

《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494页。

向荣：《金陵大营失陷退守丹阳折》，《太平天国》（五），第638页。

(今光华门)、朝阳(今中山门)等门太平军亦分路出击,连下清军营寨二十余座,进而攻破孝陵卫大营。清军大溃,死伤副将以下千余人。向荣、张国梁等连夜败走淳化镇,21日又经句容逃往丹阳。至此,威胁天京达三年之久的清军江南大营也被太平军彻底摧毁。

摧毁江南大营之后,杨秀清即令秦日纲统军追击残余清军,韦昌辉主持江西军政,石达开前往湖北,解武汉之围。

秦日纲、陈玉成、李秀成等率部于6月27日占句容,7月3日进抵丹阳城外,与清军相持月余。8月9日,向荣恐清廷治罪,自杀于丹阳营中(一说忧郁而死),钦差大臣由江南提督和春继任。

太平军先后攻破江北、江南大营,打破了清军对镇江的围困,拔掉了威胁天京的两个钉子,大大改善了天京的处境。太平军这一重要的军事行动,是集中了各战场的主力进行的。它虽然取得了相当大的胜利,但从战争全局来看,在进攻时机的选择上并不十分恰当。因为,在西征军正由节节退却转入胜利反攻的时候,骤然将主力抽出,使湖北、江西战场停止了对敌人的进攻,特别是放过了处于垂败状态的曾国藩湘军,这不能不说是指导上的失策。此外,太平军在作战过程中大都是打的击溃战,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不多;特别是在击溃江北大营和解镇江之围的作战中,都放过了追歼逃敌和攻歼援敌的有利战机,因而江北大营不久就又恢复,镇江则仍处于敌军包围之中,并于次年年底被清军攻陷。

自1851年初金田起义到1856年夏季天京解围,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也遭受了几次大的挫折。从战略指导上看,在占领金陵之前,太平军基本上是集中兵力向着一个战略方向实行进攻的,而其所选定的战略方向,是关系着敌人的要害而又是敌人防御薄弱的方向,是可以得到广大群众支持和易于取得人力物力补充的方向,因而能比较顺利地打破清军的围追堵截,长驱直进,势如破竹,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并迅速壮大了革命队伍。占领金陵之后,迅速攻占镇江、扬州,切断北京的粮运孔道,取得拱卫天京的屏障,这一决策也是正确的。但洪、杨等对跟踪包围自己的敌军却未及时予以歼灭,而听其建成江南、江北两座大营;同时,违背集中兵力的原则,分兵北伐与西征,冀图以有限的兵力,在两个互不联系的战略方向上同时取胜,以致一支军队全军覆灭,另一支军队也遭受很大挫折,使整个战局陷入被动地位(如果没有西征军的湖口之捷,则局势将会迅速恶化)。这是太平天国领导者在定都金陵之后滋长了骄傲轻敌情绪的结果,也是缺乏通观和驾驭全局能力的表现。军事战略上的这种失策还是可以改正和弥补的,而革命领导集团内部自相残杀,才是致命的。1856年秋开始的天京内讧,终于导致革命形势的急转直下,太平军从此在战略上一步步地陷入了被动应付的不利地位。

第三章 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6年10月—1860年11月)

1856年，正当太平军与清军在长江中游及天京外围激烈搏斗，各地各族人民武装起义风起云涌，严重威胁着清王朝封建统治的时候，英国侵略者向中国发动了新的武装进攻，第二年扩大为英法联军的侵华战争。侵略者发动这次战争的目的，在于攫取比《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更大的殖民特权。它实质上是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年）的继续和扩大，因此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这次侵华战争的直接出面者是英国和法国，卖力支持和趁火打劫的则有沙俄及美国。它们狼狈为奸，相互配合，以战争手段迫使既自大又软弱的清王朝作出让步，满足其侵略要求，进而彼此勾结，共同镇压以太平天国为主的人民起义。因此，“第二次鸦片战争就是中外反革命结合过程的具体表现”。

第一节 英法等国企图扩大在华殖民特权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十余年间，英、法、美等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迫切要求向外侵略扩张，以便寻找新的市场和原料产地。英国资产阶级原以为凭借《南京条约》所规定的不平等的通商关系，可以迅速打开中国市场，获取巨额利润。但是，由于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然居于统治地位，在沉重的封建剥削下，亿万贫苦农民购买力很低，以致洋货经常滞销。同时，英国对华鸦片走私贸易的急剧增长，也直接排挤了其它商品的销售。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中国人不能同时既购买商品又购买毒品；……而增加鸦片贸易是和发展合法贸易不相容的”。然而，贪婪的英国资产阶级既想尽量扩大鸦片贸易，又想大量倾销商品，因而迫切要求中国增辟商埠，开放长江和内地贸易，减轻洋货转输内地的税收，以实现其攫取更多殖民特权的目地。

1853年太平军定都南京以后，中国出现了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政权与清王朝对立的局面，清王朝的统治不稳。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列强对太平天国革命一开始就怀有敌意，但慑于太平军的胜利进军，不敢轻易进行武装干涉，加之对太平天国抱有一定的幻想，因而暂时打起“中立”的旗号，静观中国政局的发展。1853年和1854年间，英、法、美等国驻华代表在太平军占领区频繁进行活动，发现太平天国毫无媚外的表示，并坚决拒绝输入鸦片。他们意识到中国人民不可侮，要想进一步攫取殖民特权，唯一办法是以武力迫使清廷屈服，然后再和它勾结起来，共同对付太平军。可是，当时英、法正竭力对付沙俄在近东的扩张，不可能马上发动武装进攻来迫使清政府进一步出卖国家主权，因此，它们联合美国，利用清王朝面临的国内危机，在1854—1856年间向清政府进行了全面修改《南京条约》、《黄埔条约》和《望厦条约》的交涉，企图通过外交手段达到其侵略目的。

1854年初，英国驻华公使包令勾结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和美国公使麦莲，联合向清政府提出“修约”要求，其中包括开放中国沿海和内地各城市、长江自由通航、鸦片贸易合法化、废除进出口货物的子口税、外国公使常驻北京等等。他们还以协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军为诱饵，说什么只要同意修约，“自当襄助中华，削平反侧”。同时又威胁说：“否则奏明本国，自行设法办理。”

以咸丰帝（清文宗奕訢）为首的清朝统治集团，虽然由于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而对外国侵略者心存畏惧，但仍力图维持自己的“大国体面”，不愿意放弃闭关自守政策，不希望外国侵略势力深入中国内地，更害怕外国公使驻京，损害其封建体统。他们意识到太平天国是危及其统治地位的“根本之

马克思：《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24页。

《怡良奏接见美使麦莲据云如准其赴扬子江一带通商即助清攻太平军》，《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中华书局1979年版，下同）第一册，第286页。

患”，希图“借师助剿”；但又对外国侵略者存有戒心，甚至害怕他们和太平军“联合”起来，推翻其封建统治。因此，清廷决定采取“坚守成约”的方针，拒绝了“修约”的要求。英、法、美未达目的，叫嚷要诉诸武力。但当时英、法正与俄国进行克里米亚战争，无力在中国开辟新的战场，美国也因国内局势不稳，不可能发动侵华战争，“修约”问题便暂时地搁置起来。

1856年，美国新任驻华公使巴驾勾结英、法驻华公使，再次要求清政府“修约”。侵略者软硬兼施，一方面扬言“各国条约章程，必求更改，否则恐致生事”，另一方面又表示愿将便于在内河作战的蒸汽炮艇卖给清政府，帮助清廷镇压农民起义武装。这时，咸丰帝从1854年底1855年初英法军队协助清政府镇压广东天地会和上海小刀会起义等事实中，看到外国侵略者确有援助清廷镇压农民起义军的意向，因而态度有所松动，但仍坚持原订条约的“大段断无更改”，只同意“择其事近情理无伤大体者”变通一二条，“以示羁縻”，拒绝全面“修约”。英、法、美鉴于外交讹诈失败，决心用武力来达到它们的目的，而这时克里米亚战争已以英、法获胜而告结束，于是，便积极准备发动新的侵华战争。

英国是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罪魁祸首。它通过第一次鸦片战争，获得了侵华经验，认为以武力迫使清王朝屈服是轻而易举的事。这种自信，促使它进行新的军事冒险。早在1849年，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就曾给驻香港的英国公使发出如下训令：“……只要形势需要，英国的军事力量能够毁灭广州城，叫它片瓦不留，从而使该城居民受到最厉害的惩罚。”这次新的侵华战争的挑起和扩大，以巴麦尊为首的英国内阁的侵略意旨又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法国也想扩大对华经济侵略，特别是不满足于《黄埔条约》中关于只在通商城市设立天主堂的条款，力图通过使用武力取得深入内地传教的合法地位，以实现其利用宗教进行侵略的野心，因而成了英国发动第二次侵华战争的主要帮凶。

美国对华贸易当时尚有逆差，其商业地位决定了它对清政府尽量保持伪善的温和态度。它一面支持英国侵华，以便援例均沾侵略利益，一面积极表示愿意扶助清廷镇压人民起义。

沙俄一贯怀有极大的侵略扩张野心。早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它就非法侵占中国黑龙江的庙街和库页岛等战略要地，并继续将侵略魔爪伸入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和西北边疆。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后，沙皇俄国企图从土耳其、巴尔干半岛、黑海地区进入地中海和大西洋的计划无法实现，便把侵略

《怡良等奏美英欲更改约章请敕叶名琛设法交涉杜其北来折》，《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二），第451页。

《廷寄》，《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二），第466页。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第159页。

目标转向东线，加紧侵略中国。它愿意与英、法握手言欢，支持它们的侵华行径，以便从中渔利。

正由于英、法、美、俄在侵华问题上存在某种程度的一致性，因而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尽管各怀鬼胎，并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实际上紧密配合，结成了一条侵华联合战线。

当时，英、法等国军队的数量和组织体制等和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相比，没有多大变化。如 1855 年时，英军总数约二十万人，其中：步兵一百零三个团，约十二万人；骑兵二十六个团，约一万人；炮兵一万二千人，火炮约六百门；海军五万八千余人，各种舰船五百余艘。此外，还有国民军六万人左右。当时的法军总数近六十万人，其中：步兵三十九万八千人，内有基干步兵团一百个，猎兵和非洲兵等四十余营；骑兵八万六千余人，六十个团；炮兵约七万人，十七个团，火炮约一千二百门；海军有战舰一百七十一艘，其中主力舰二十五艘。与四十年代初期相比，英法军队在武器装备方面有了明显的改进。其步兵已装备有米涅式、李恩飞式和兰开斯特式线膛步枪，提高了射速、射程和命中精度。火炮也由滑膛炮改为线膛炮，由实心弹发展到榴霰弹，提高了射击精度，增大了杀伤面积，射程增加了近千米。海军舰艇方面，英国的蒸汽舰已超过三分之一，舰速由八节以下增至十节以上，排水量、续航力、攻击力都有提高。此外，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还制成了一种适于浅水航行、舰炮射程远的蒸汽炮艇。军事技术条件的这些改进，增强了英法等国实现其殖民扩张政策的军事力量。

第二节 清廷实行对内镇压对外妥协政策

在英法等国准备发动新的侵华战争的时候，清王朝正被太平军打得焦头烂额，处于内外交困的窘境。尽管它对英法等国为攫取更大殖民特权而进行的“修约”活动等存有戒心，但为了维持其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根本政策仍然是对内镇压、对外妥协，即力求和外国侵略者妥协相安，以便集中力量（乃至借助外国力量）镇压人民革命。在这种对内对外总的方针政策指导下，清政府对于应付外敌入侵缺乏足够准备，沿海防备相当松懈。

当时，湘军已经兴起，但由于与太平军交战的绿营兵大量溃散，因而清军在数量上并未增加，而且绝大部分都用于镇压以太平天国为主的国内人民起义，用于边海防的军队为数甚少。对于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遭到破坏的海防设施，战后进行了修复和扩建工作。鉴于虎门为广东海防咽喉，清政府对该要塞的设防予以特别关注。除在原址修复和扩建了威远、靖运、镇远、大虎等炮台外，还将横档和永安两台扩建为一座大炮台，在巩固炮台遗址附近添建了南北两台。另外，鉴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军在下横档登陆的教训，新建了下横档炮台；并在威远炮台右侧山腰上，新建了威远山腰炮台；于镇远炮台左侧山腰上，新建了镇远山腰炮台。上述修复、扩建或新建的十二座炮台均用三合土筑成。安设的大炮数量有所增加，但质量并无多大改进，只是将固定的木制炮架改为能使火炮升降、旋转的滑车绞架，以便调整射击方位和距离。炮台前后挖有壕沟和掩体，并于后墙上开了炮洞、枪眼，便于对付敌之侧后抄袭。其它各地的沿海炮台也多少有些改进。但总的看来，海防设施变化不大，沿海防备仍然十分松懈。

早在 1850 年，就有人提出对于英国可能进行的新的侵略宜及早防范。清廷一方面认为应“于无事之时，为有事之备”，一方面又提出“总期不动声色，慎密筹防，断不可稍有泄漏，致启疑衅”。闽浙总督刘韵珂甚至认为：备战“风声一播，夷人定启猜疑，将来首先张皇之地，即为首先纷扰之地，是防夷而适以招夷，未免失计。”有的督抚则认为海防已臻完善，不需加强。如两广总督徐广缙等把广东水师吹得天花乱坠，说什么“风涛耐于惯习，炮火熟于点放，船只长于驾驶，器械、火药在在极于精良”，认为外国侵略者不敢进攻广州。还说什么“现就广东地方情形而论，内河外海，炮台林立，分驻台兵数千名，若得文武同心，士卒用命，即使深入，何能径出。”上述畏敌和轻敌两种错误思想，都严重地影响对外敌入侵的防范，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时，清朝约有八旗兵二十万、绿营兵六十万，另有湘军三万余人。

《廷寄》，《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一），第 45 页。

《刘韵珂等又奏陈福建海口防务情形片》，《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一），第 85 页。

《徐广缙等又奏广东海防情形片》，《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一），第 102 页。

《徐广缙等又奏广东防务情形片》，《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一），第 103—104 页。

妨碍沿海战备的加强。

由于清廷仍然闭关锁国，妄自尊大，不采纳任何先进的军事思想和军事技术，不进行丝毫实质性的改革，军事上始终处于停滞落后状态。步兵除冷兵器外，仍然使用土制鸟枪、抬枪。火炮也无多大改进，并且依然没有专门的炮兵部队。除虎门要塞外，大多数炮台的火炮仍采用固定木制炮座，所有火炮都用火绳点火发射，射速慢，射程小（最远不过千米），而且命中率低。水师战船仍为木制的风帆船或划桨船，每船装备数量不多的数百斤至千余斤的火炮。1856年，新造炮船三百余艘，装备了从外国购买的火炮二百门，但主要用于镇压太平军。

第三节 英国制造借口，挑起战争 (1856年10月—1857年1月)

一、“亚罗船事件”

第二次鸦片战争是英国以所谓“亚罗船事件”为借口首先发动的。1856年10月8日，广东水师在广州海珠炮台附近码头检查装有走私货物的“亚罗”号船，并逮捕了船上两名海盗和十名有嫌疑的中国船员。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为挑起事端，胡说“亚罗”号是英国船，并造谣说中国水师在该船捕人时，曾扯落船上的英国国旗，有损英国的权利和荣誉，向广州当局提出赔礼道歉、释放人犯等无理要求。

“亚罗”号是中国人苏亚成于1854年8月建造的商船。苏亚成非法弄到一张港英执照，并雇用了一个叫亚罗的外国人在船上工作，便称“亚罗”船。1855年6月，该船转卖给另一中国商人方亚明。方又领取了一张自当年9月27日起有效期为一年的港英执照，并雇用一名英国人为名义上的船长。该船雇用的水手中隐藏着海盗，他们凭借港英执照作掩护，从事鸦片走私和抢劫等犯罪活动。广东水师上船搜捕时，该船执照已经过期，而且船上根本没有悬挂英国国旗。逮捕船上海盗，纯属中国内政，英国根本无权干涉，因此，两广总督叶名琛拒绝了巴夏礼的无理要求。然而，英国驻华公使包令和巴夏礼等竟以此为借口，蓄意扩大事态。英国驻香港海军司令西马糜各厘立即命令驻港海军捕捉中国船只，进行无理挑衅，决计挑起新的侵华战争。

二、英军进犯广州

对于英国侵略者的蓄意寻衅，负责筹办“夷务”的钦差大臣、两广总督叶名琛竟然无动于衷。他曾大量屠杀广东起义人民，对迫在眉睫的外敌入侵却不进行任何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当时，广东清军总数约七万四千人，其中八旗兵五千六百余人，绿营兵六万八千余人。广州城内外约有清军一万三千人。城郊建有炮台十座，每台防兵二十至六十人不等。珠江内河一带除修复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被毁的十六座炮台外，又新建了六座，共计二十二座。防守城郊和内河沿岸三十二座炮台的兵力共约二千余人。但由于叶名琛毫无战备观念，不采取任何防御措施，“惟日事扶鸾降乩，冀得神祐”，

叶名琛于1850年（时任广东巡抚）镇压过英德境内的广东天地会起义，1852年升任两广总督后，又于1854—1855年间在英、法、美侵略者的支持下镇压广州附近各府县的天地会起义群众，屠杀十余万人，严重摧残了广东人民的反侵略力量，给英法联军侵略以可乘之机。

《骆秉章奏密陈英人侵入广州胁迫官员情形并摘抄粤省来函呈览折》，《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二），第645页。

因而“亚罗船事件”发生后，虎门要塞及广州清军都没有及时转入临战状态。

1856年10月23日，英国海军上将西马糜各厘率军舰三艘、划艇十余只、海军陆战队约二千人，向虎门口开进，揭开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序幕。英军的企图是：以武力胁迫叶名琛屈服，乘机进入广州城。

当英舰强行闯入时，广东水师提督吴元猷因事先未加防范，又未接到叶名琛的命令，不敢下令开炮拦截。虎门各炮台守将有的等待观望，有的未战先逃，防兵纷纷溃散。因此，英舰未受任何抵抗即顺利驶过虎门要塞，进入内河。

英军舰船突入珠江内河，直接威胁着广州的安全。当日上午，英舰开始进攻猎德炮台，守军奋勇还击，双方展开炮战。叶名琛接到战报后，仍以为英军不过是虚声恫吓，竟然说：“必无事，日暮自走耳。”并下令“敌船入内，不可放炮还击”。猎德等炮台防兵被迫停止抵抗，致使英海军陆战队顺利登陆。当晚，英军舰船进泊广州城西南的十三洋行码头。

第二天，英舰沿珠江南水道下驶，进攻广州河南凤凰冈等炮台。防兵“遵令走避”，炮台被占，大炮被毁。在部属一再要求下，叶名琛才勉强同意派兵一千五百人防守北门外的四方炮台。25日，英军又攻占海珠炮台，五十门大炮全部落入敌手。至此，珠江内河一带的主要炮台均被英军攻占。

10月27日，西马糜各厘除集中三艘军舰的炮火外，还利用海珠炮台的五十门大炮，轰击广州外城，并以总督衙署为主要目标，企图胁迫叶名琛屈服。28日下午，英军继续炮击，并派海军陆战队登岸，纵火烧毁靖海门外的民房，延及城楼。29日中午，英军以猛烈炮火将外城城墙轰开二丈多宽的缺口，并击毁督署。下午，英海军陆战队登岸，约有二三百人从缺口攻入外城。清军参将凌芳率抚标兵英勇抵抗。两小时后，凌芳中弹牺牲，抚标兵退入内城。南海县大浦乡团勇主动增援，杀敌数十人，终因武器简陋，势不能敌，亦退守内城。英军因兵力单薄，未敢深入，便将靖海门、五仙门及附近民房尽行烧毁，于当日傍晚撤回军舰。这时，叶名琛才派武弁梁定海、谭蛟等率兵千人，前往被毁的猎德炮台防守。

自10月31日起，英军连续炮击广州城，但仍未达到入城谈判的目的，便于11月6日派出军舰三艘，沿珠江主航道东进，炮击位于竹横沙的东定炮台。该台有炮三十六门，守军约七八十人。在台外的江面还停泊着广东内河水师的红单船二十三只。英舰发起进攻后，炮台防兵开炮拒敌，水师战船也主动参战，击中一艘英舰，毙敌百余人。但终因弹药不继，水师战船又先后被敌舰击毁，东定炮台遂失陷。10日，英舰三艘、划艇两只再次轰击猎德炮台。这时，该台除有防兵千人外，台后还有陆路乡勇应援。但因火炮射程

华廷杰：《触藩始末》，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以下简称《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一册，第165页。

近，打不到敌舰，而敌之舰炮却能击中炮台，致栏石碎飞，伤守兵甚众。随后，英海军陆战队在炮火掩护下登岸，绕道抄袭炮台后路。当时，梁定海和谭蛟正在台后村庄中赌博消遣，闻警仓皇逃遁。守台兵受到英军前后夹击，又无人指挥，便一哄而散，猎德炮台再次失陷。

11月12日，英舰为打通广州与香港的联系，解除后顾之忧，便沿珠江东南水道南返，从侧后袭击安有二百门大炮的横档炮台。守台兵四百余人与敌展开炮战。一小时后，英军陆战队从炮台西侧登岸，由西、北两面攻击。防兵不支，纷纷溃散。英军遂占领炮台，掠获全部大炮。翌日，英军又攻占横档东岸的威远、镇远和靖远炮台。

英国侵略者仅凭三艘军舰、十几只划艇和不超过两千人的兵力，竟敢闯入设防严密的虎门海口，直抵广州，无疑是一种冒险的军事行动。当时，防守虎门要塞与广州的清军八倍于敌，结果不但没有击败敌人，反而先后丢失大小炮台十余座。英军摧毁了总督衙门，并一度突入广州外城，尽管未能达到入城谈判的目的，但其军事冒险竟获得了成功。这种异常情况的出现，主要由于叶名琛昏庸愚昧到了极点。他先则抱着侥幸心理，主观地认为英军不敢动武，因而在“亚罗船事件”后仍不进行备战，使英舰得以乘虚闯过虎门，进入珠江内河。敌舰向珠江内河炮台发起攻击后，他依然坚持不抵抗主义，以致出现了战争史上罕见的只挨打不还手的怪现象。最后，虽然被迫还击，但因准备不足，指挥不当，加上各台守兵过少，火炮落后，弹药不足，终被敌人各个击破，造成重大损失。

三、广东军民的英勇抗战

与叶名琛的不抵抗主义相反，广东人民和部分爱国官兵，目睹侵略者的种种暴行，激起了无比的愤怒，采取各种形式，机智勇敢地打击敌人。

1856年10月，英国侵略军开始进犯广州时，广州市民便相约剿杀敌人，反英揭帖随处可见。12月，群众满怀义愤，放火烧毁了城郊十三洋行商馆，迫使侵略者全部逃回船上。

英军虽然攻占了珠江内河及虎门的主要炮台，但由于沿江军民不断采用夜战近战袭击敌舰，使侵略军无法保障水路交通安全，与香港的联系经常受到威胁。12月22日，英国“提斯特尔”号邮轮拖着一只满载从广州抢劫来的珍宝玉器的划艇，企图经虎门口驶往香港。半夜，于虎门口内突然受到上百只中国划艇的拦击，便开足马力向出海口方向直驶，不料又被另一队中国划艇截住，不得不抛弃拖曳的划艇，突围而逃。30日，该邮轮又从广州驶往香港，广东乡勇十七人化装潜入船上，于中途杀死船主等十一人，将邮船开到岸边捣毁。1857年1月4日下午，广东水师调集约三百余艘船只，从不同方向围攻珠江江面上的三艘英舰。战斗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广东水师舰船才分头退入小河汊内。与此同时，香港及其附近地区人民也曾自动组织对英国

侵略者实行封锁等斗争，反抗英军的入侵。

在广东爱国军民的反抗和打击下，英军被迫于 1857 年 1 月 20 日退出珠江内河，撤往虎门口外，等待援军的到来。

四、清廷“息兵为要”的方针

英军撤出虎门后，叶名琛向咸丰帝谎报军情，吹嘘“防剿英夷水陆获胜，现在夷情穷蹙”。处于内外交困境地的咸丰帝，早就希望结束对外战争，以便全力镇压几乎遍及全国的农民起义。英军窜入珠江炮击广州时，他就声称“此次已开兵衅，不胜固属可忧，亦伤国体；胜则该夷必来报复，……当此中原未靖，岂可沿海再起风波”。因此，当他接到“水陆获胜”的谎报后，立即谕令叶名琛与侵略者议和，“以息兵端”。咸丰帝主张息兵媾和的另一重要原因，则是国库空虚，军饷难筹。他在 1857 年 4 月 23 日的上谕中说：“当此中原多故，饷精艰难，叶名琛总宜计深虑远，弥此衅端，既不可意存迁就止顾目前，又不可一发难收复开边患。”此外，咸丰帝认为英军攻打广州，无非是提出更多的利益要求，而不会推翻他的封建统治，因此谕令叶名琛，如果英国新任使臣到广州谈判，只要条件不甚苛刻，“即应以礼相接”，以期两国息兵和好。6 月 15 日，正当英国远征军源源向香港集结的时候，咸丰帝在叶名琛《密陈近日夷情》的奏折上作了批示，明确提出了“息兵为要”的方针。批示中虽有“仍当密为防范，勿存轻视之心”等语，但最后强调的则是“总宜息兵为要”。这一妥协求和的错误方针，助长了外国侵略者进一步武装侵华的野心。

《廷寄》，《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二），第 499 页。

《廷寄》，《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二），第 516 页。

《廷寄》，《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二），第 521 页。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 535 页。。

第四节 广东军民抗击英法联军的进犯 (1857年12月—1858年1月)

一、英法联军的组成

为了扩大侵华战争，英国巴麦尊内阁于1857年3月强行通过了一项增加军费和增援远东英军的提案。4月20日，巴麦尊任命原驻加拿大总督额尔金及其弟普鲁斯为正副全权专使，率特别外交使团来华。同时，从本土和毛里求斯、新加坡、印度等地共抽兵二千九百余人，组成远征军（以阿希伯纳姆为远征军海军司令），开赴中国。英国还照会法、美、俄等国，约其联合出兵。

当时，法国正在加紧侵略越南。法皇拿破仑第三等认为，和英国联合侵华，既可以换取英国对其侵略越南的赞同，又可以在中国捞到好处，因而欣然接受了英国政府的邀约。接着，法国政府以所谓“马神甫事件”为借口，打着“为保卫圣教而战”的旗号，任命葛罗男爵为特命全权专使，率领一支法国远征军开赴中国，并训令其远东印度支那舰队司令里戈·德热努依里海军少将率舰队配合葛罗的行动。

美国本想通过侵略战争扩大其在华特权，猎取更大的利益，但由于其南部和西南部正在开展废除奴隶制的斗争，国内政局不稳，因此在接到英国的照会后，表示美国的全权代表愿意与英法代表一致行动，但不直接出兵。

沙俄趁英国挑起新的侵华战争之机，进一步加紧其侵占中国北方领土的罪恶活动，同时，派海军上将普提雅廷出使中国，以帮助清廷镇压太平军为诱饵，要求割让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和中国西部的大片领土。交涉失败后，普提雅廷悻悻而去，径赴中国南方，与英法代表合谋侵华。

1857年7月初，英国特使额尔金抵达香港。他的主要使命是：迫使清政府赔款和“在广州以及其它口岸完全履行几个条约的条款”，并同意英国公使驻京及修改各种条约等。英国外交大臣克拉兰敦给他的训令称：如果清廷拒绝英国的要求，就立即使用武力，采取以下一项或几项行动，即：封锁白河；占领扬子江口大运河的入口处；占领舟山群岛；封锁芝罘和其它中国口岸；切断大运河通过黄河的出入口；在广州上游登陆，占领城垣上方的高地，并切断其供应；在广州城的上方安置一支部队。额尔金遵照英政府的训令，与包令、西马糜各厘等进行了谋划。包令等一致主张首先给广州以打击，迫使叶名琛屈服，从而消除同清廷谈判的困难。额尔金接受了包令等人的建

1853年，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非法从广州潜入广西西林县，披着宗教外衣，进行侵略活动。他吸收地痞流氓入教，勾结当地土豪，无恶不作，激起当地人民群众极大愤慨。1856年2月29日，新任西林知县张鸣凤逮捕马赖及不法教徒二十余人，后判处马赖死刑。这就是所谓的“马神甫事件”，又称“西林教案”。

参见《克拉兰敦勋爵致函额尔金勋爵》，《第二次鸦片战争》（六），第83—84页。

议，决计先犯广州，取得讨价还价的条件，再向中国勒索。但因印度的人民起义（1857—1859年）正在蓬勃发展，额尔金于7月16日亲率其远征军一部赶赴印度（9月下旬才返回香港），因此，进犯广州的计划未能立即实行。

10月中旬，法国特使葛罗抵达香港。英法特使及双方海军司令等经多次协商，确定英法组成联军，采取一致行动，首先攻占广州，尔后北上白河。10月底，美国新任驻华公使列卫廉到达香港，与英法公使会晤。11月初，沙俄公使普提雅廷也由天津窜到香港，正式加入了以英国为首的侵华集团，为英法武装侵略中国出谋划策。

12月上旬，英法侵略者拼凑了一支由五千六百余人组成的侵华联军（其中法军一千人），集结于香港、澳门地区，加紧进行战争准备。

二、英法联军陷广州

在清廷“息兵为要”的方针指导下，叶名琛不仅不加强广州的防务，反而大肆裁撤团练兵勇。广州人民烧毁十三洋行商馆之后，叶名琛竟下令把所有团练乡勇赶出省城，原陆续聚集于广州周围的三万余兵勇，凡非坚守要隘者，全部被裁；陆路壮勇原约一万余人，被裁撤十分之几，所存者不及二千人。广东内河水师战船大部损失，非但不予添造，反而大加裁撤。虎门要塞被英军破坏的几座炮台，既不修整，也不重调水师驻守。直至获悉英国远征军开抵香港时，他才仓卒抽调部分兵力在珠江水路要隘布防，并派八旗兵防守广州城及城北炮台。

1857年12月12日，英、法公使分别向叶名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入城、修约和赔款，并限十日内答复。对于英法等国相互勾结以及迫在眉睫的战争形势，叶名琛仍然茫无所知。他认为英国孤立，为法、美所不齿，并轻信谣传，说什么英国女王已命令其在华官员力求与中国“好释嫌疑，以图永久相安，毋得任仗威力，恃强行事。……断不准妄动干戈”，认定英国不会再行开战。尽管英法公使已发出最后通牒，叶名琛依然不做任何战守准备。

在英、法公使发出最后通牒的同时，英法联军舰队便从香港出发，进犯虎门。因未遭广东水师的任何拦阻，故得以迅速突入珠江内河，兵临广州城下。12月15日，数十艘敌舰集结于珠江主航道上，集中舰炮火力轰击与广州城隔江相望的河南地方。接着，敌海军陆战队登陆，顺利地占领了该地，为攻打广州城夺得了立足点。

20日，联军舰队进泊广州五仙门外的珠江水面。额尔金和葛罗分乘炮艇从香港赶到。次日，他们与两国海军司令在法规上召开作战会议，决定于24日正午再次照会叶名琛等，限其在四十八小时内交出广州城，并将军队全部撤到城外三十华里的地方，否则武力攻取。

《叶名琛奏英法二使递来照会已据理回复折》，《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二），第618页。

与此同时，英法侵略者完成了攻击广州的作战计划。计划规定：

1.27日至28日夜间，联军工兵连和爆破连登陆并占领二沙尾岛靠航道的登陆点。

2.28日拂晓开始，联军舰队的一百二十门大口径炮同时向城墙开火，在西南角、东南角和正南三处打开缺口，并以持续而缓慢的射击压制守城清军。

3.28日晨，海军陆战队登陆，分三路进攻广州城。中路由斯特罗本泽少将指挥英军和一部分法国水兵，主攻东固炮台，占领后派出云梯队乘夜抵近城墙，架设云梯；左路由里戈·德热努依里海军少将指挥法军，阻击从东门和郊区增援的清军；右路由西马糜各厘海军上将指挥英国水兵，阻击从城北各炮台支援的清军。

4.29日晨，全部大炮集中轰击城墙，摧毁城上的工事，尔后攻城。

ewc MVIMAGE,MVIMAGE, !50000061_0172_1.bmp}

在英法联军兵临城下的威胁面前，叶名琛对战守问题仍漠然置之。26日，其部属纷纷建议添调兵勇，加强广州防务，他却以敌军不过是恐吓逼和为由，拒不采纳。番禺县令李星衢、南海县令华廷杰请求招募两县乡勇数千人，防备突然事变，叶竟说什么“谁添兵，谁给饷”。广州绅民有的自告奋勇，愿意自备粮饷军械，守城杀敌，叶名琛一概不准。27日晚，联军工兵连、爆破连占领二沙尾，攻城迹象已十分明显。就在这时，叶名琛却要全城文武官员到督署为他祝寿。他迷信扶乩，宣称乩语告知，十五日（12月30日）后便可无事。

12月28日晨6时起，三十二艘联军舰艇（英二十五艘、法七艘）的一百余门大口径火炮同时炮击广州城。叶名琛逃至内城粤华书院。清军乱成一团。广州城内大火熊熊，督署也成为一片废墟。

炮击开始后不久，英法联军约四千人，分别从二沙尾以及猎德炮台与东固炮台之间登陆。中路约二千人进攻东固炮台。驻防广州东门外的清军千总邓安邦率东莞勇一千人奋勇抵御。他们士气高昂，分散隐蔽于竹林和灌木丛中或坟墓后面，以各种火器打击敌人。防守东固炮台（有炮三十一门）的约七十名清军，在东莞勇的配合下，也发炮轰击登陆的联军。邓安邦统一指挥东莞勇与炮台守兵，同超过自己一倍的敌军鏖战大半日，最后在弹药耗尽和得不到外援的情况下，才被迫于日暮时放弃东固炮台。当晚，联军以舰炮及东固炮台的大炮继续轰击广州城。

29日晨6时，占领城东一带的联军在炮火掩护下，向城东北运动。防守城北五座炮台的总指挥、乍浦副都统来存率旗兵一部，坚守四方炮台。联军“冒死扑台，为长蛇阵直进，将近二千人”。守台兵居高临下，发炮抵御，毙伤不少敌军。联军进攻炮台受挫，便转而攻城。斯特罗本泽指挥中路英军第59团，成散兵队形攻击小北门；西马糜各厘指挥右路英军水兵攻击大北门；里戈·德热努依里指挥左路法军攻击东门。广州守军依托城上工事阻击

敌人。不久，联军中路主力攻入小北门。守城清军纷纷溃散，致使敌军迅速占领了观音山，控制了城内的制高点。接着，联军右路和左路部队相继攻占了大北门和东门。城墙上的清军退入城内，与敌展开巷战。下午 2 时以后，全城战斗停息。30 日，广东巡抚柏贵和广州将军穆克德讷在广州西北城墙上竖白旗投降，在侵略军的威逼下，强令撤出城内兵勇。

1858 年 1 月 5 日，叶名琛为联军所俘，被押往印度加尔各答，次年在囚禁中毙命。这是他坚决执行清廷“息兵为要”方针的可耻下场。联军占领广州后，组成以巴夏礼为首的“联军委员会”，投降卖国的柏贵等在侵略者的监督下继续“任职”，为敌效劳。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由外国侵略者用大炮制造的第一个地方傀儡政权。

三、广东军民继续打击敌人

在英法联军的蹂躏下，广州遭到了空前的浩劫。侵略军烧杀掳掠等暴行，激起了广东军民的英勇反抗。具有抵抗外来侵略传统的三元里一带群众，重建和扩大了原来的社学组织，募勇团练，并联络南海、番禺两县人民，在佛山镇成立团练总局，集义勇数万，坚壁清野，与侵略军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东莞、花县、顺德等县人民，也纷纷组织团练武装打击侵略者。广州城外军民实行秘密分散的游击战，每于夜间以壮勇数百人，分路潜至城下，鸣锣呐喊，向城内施放火箭，惊扰和打击敌人。城内市民则经常三五成群地埋伏在侵略者出入之处，出其不意地袭杀敌人。1858 年 2 月 18 日，佛山团练武装数万人，决定反攻广州，被柏贵破坏。但爱国军民的反抗怒火是扑不灭的，伏击和袭扰敌军的行动接连不断。6 月 3 日，侵略军千余人分两路进攻广州城外的团勇：一路进攻驻榕树头的东莞勇；一路进攻驻三宝墟的新安勇。东莞勇在邓安邦率领下奋力迎战，毙敌军官一人，迫使敌军逃窜。新安勇与敌军激战数小时，毙伤敌军百余人。随后，东莞军民向侵略者发出挑战书：“我东莞勇，现驻榕树头，尔外人敢到此与我打仗，定杀尔片甲不回。”

6 月 6 日，巴夏礼亲率英军千余前往，结果遭到伏击，死伤甚众，巴夏礼也几乎被俘。侵略军胆战心惊，龟缩城内，不敢轻易再出。佛山团练总局还发动香港大罢工，号召在香港、麦高（澳门）等处为外国人教书、办理文案以及雇工杂役人员，概行辞职回家，使洋人各项经济活动陷于停顿。香港同胞还以极其秘密巧妙的方法劫杀英人，使其不得安宁。

第五节 英法联军第一次北犯 (1858年4月—6月)

一、联军策划北犯，清廷置若罔闻

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后，额尔金、葛罗等又在香港密谋策划，确定联军舰队先开往上海，威逼清廷签订新约；若不能达到目的，便北犯白河口，对清廷直接施加压力。美、俄公使完全赞同英、法的图谋。

1858年2月，英、法、美、俄公使分别照会清政府，要求于3月底以前派全权代表到上海举行谈判，否则，即向白河口进发。3月底，侵略者的要求遭到了拒绝，四国公使便决计率领由香港集中到上海的英舰十余艘、法舰六艘、美舰三艘、俄舰一艘，分批北上。

对于侵略者贪得无厌的野心，清廷缺乏清醒的估计。广州沦陷后，仍认为英法只是借端要挟，不会继续入侵，因而命令柏贵“以情理开导”，劝说侵略者退出广州，然后“相机筹办”。同时，任命刑部右侍郎黄宗汉为钦差大臣和两广总督，由京赴粤，与英法侵略者进行谈判。另一方面，咸丰帝接受某些人的建议，要柏贵等借助广东绅民之力，利用各地团练乡勇将联军逐出省城和内河，“使知众怒难犯，……不致诛求无厌”。不久，咸丰帝接到两江总督何桂清关于英、法、美、俄四公使欲赴天津的奏报。但他仍然置若罔闻，不立即采取对策，直至3月21日，才谕令直隶总督谭廷襄等“于海口各要隘，不动声色，严密防范”，以防意外。

二、联军进逼大沽，清军仓卒布防

1858年4月20日，英、法、美、俄四国公使在白河口外会齐，24日即分别照会清政府，要求派全权大臣在北京或天津举行谈判。英、法公使竟限令六日内答复其要求，否则即采取军事行动。美、俄公使则打出“调停”的旗号，劝告清廷尽快会谈。与此同时，联军舰队陆续驶抵大沽口，随即进行了进攻大沽炮台的各种准备。他们派出侦察船，探测水深，侦察海口的地形和炮台设施等；派遣侦察人员化装登岸，侦探清军部署；派舰艇抢劫民船商船，掠夺财物粮食；在水边立标打靶，进行临战训练，并对清军巡洋哨船鸣枪挑衅等等。

大沽口是天津的门户，近口三十余里有拦江沙一道，称为“口外之险”，大船不便航行。海口南北两岸建有炮台四座（北岸一座，南岸三座），仅有守兵七百人。海口距大沽村五六里，距天津一百八九十里，中间有新城、葛

《廷寄》，《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二），第638页。

《廷寄二》，《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二），第667页。

沽，为商船进口后停泊之处。谭廷襄认为，敌军“长于水，而不长于陆，狡猾性成，未必肯舍长就短”，因而提出了“设防仍以水路为主，兼备炮台后陆路”的方针。4月19日，谭廷襄与直隶提督张殿元、布政使钱忻和等率兵约八千人，并携带神机营大炮，仓促前往大沽口设防。其部署是：谭廷襄率督标各营驻防海神庙（大沽东、西二村之间），张殿元率提标兵一部防守北岸炮台，天津镇总兵达年率镇标及提标大沽协兵防守南岸各炮台，钱忻和总办粮台，清河道崇厚总理营务处。雇募海船、盐船四十余只，于海神庙前搭浮桥一座，便于两岸联络，协同作战。此外，清廷还调派刑部左侍郎国瑞、护军统领珠勒亨、副都统富勒敦泰等率京营马步各队及火器营、健锐营兵二千余人，携炮三十门（内有万斤大炮数门），赶赴海口，统归谭廷襄节制。谭便令国瑞率马队五百人驻新城以东离海口十五里处；令珠勒亨率马步兵千余人、富勒敦泰率火器营五百人守海口北岸及新河，均作为南北两岸炮台的后路接应。

三、联军大沽登陆，清军抗战失利

英、法、美、俄公使照会清廷后，咸丰帝令谭廷襄与其谈判，要求英、法、美公使返回广东，听候黄宗汉办理，俄使则仍到黑

龙江等处会办。他把希望寄托在打出“中立”旗号的美、俄公使的“调处”上，企图以美、俄牵制英、法。经过多次交涉，清廷的希望完全落空，侵略者决心使用武力迫使清廷屈服。

截至5月19日止，陆续驶抵大沽口外的英、法、美等国舰船共约三十艘。当日傍晚，联军“斯莱尼”号、“复仇者”号等十六艘舰艇和二十余只舢板，载海军陆战队约二千人，驶入拦江沙内，待命行动。美舰和俄舰各一艘相继跟进，为英法联军壮胆助威。

5月20日上午8时，额尔金和葛罗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让四国公使前往天津，并限令清军在两小时内交出大沽炮台，否则武力占领。在此以前，联军拟定了如下攻击计划：首先以六艘炮艇分成二队，同时发炮攻击南北两岸炮台；然后，两支登陆部队分别向南北两岸发起攻击。第一支由四百五十七人（英军二百八十九、法军一百六十八）组成，攻取北岸炮台；第二支由七百二十一人（英军三百七十一、法军三百五十）组成，攻打南岸炮台。

《谭廷襄奏筹办天津海防情形折》，《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二），第670页。

据清廷称：“陆续驶到火轮船二十九只，艇船三只”。（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三册第791页。）据奥利芬特称：当时在白河内外的英国舰船和炮艇有十五艘、炮一百八十五门、兵力二千零五十二人；法国舰船和炮艇十一艘、炮一百六十四门、兵力六百人；美国舰船三艘、炮一百门；俄国轮船一艘、炮六门。（见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第582页。）

20日上午10时，联军两队炮艇开入口内，同时轰击南北两岸炮台。当时，北岸炮台由游击沙春元率部防守；南岸的主炮台由总兵达年和游击德魁率部防守，左炮台由都司讷勒和等率部防守，右炮台由游击陈毅等率部防守。四座炮台的防兵已增加到三千人，大炮二百余门。面对敌人的进攻，各台守兵奋起还击，击沉敌舢板四只，毙敌近百名。法炮艇“霰弹”号遭到重创，艇长被打死，十一人被打伤。与此同时，守军从海口施放了约五十只火船、火筏，顺流而下。联军舰队立即派小艇将火船、火筏拨开，保护两队炮艇继续轰击炮台。接着，口外的联军旗舰“斯莱尼”号及其它主力舰只的大口径火炮也向炮台轰击。北炮台的三合土顶盖被

1858年5月，英法联军炮击大沽口炮台

击毁，南炮台炮墙亦被轰塌，有的火炮被炸坏。守台兵遭敌炮轰击，伤亡甚众。11时，联军的两支陆战队乘舢板强行登陆，向炮台接近。守军冲出炮台，与敌展开白刃格斗。他们的顽强抗战精神使敌人大为震惊。连目击此次战斗的一个美国人也承认：“中国兵械虽不甚精，而兵弁大都忠勇”。正当炮台防兵与敌艰苦鏖战之际，谭廷襄、钱忻和等却从大沽村乘轿逃跑，致使士气大挫。当敌陆战队进至炮台附近时，后路清军不仅不及时增援，反而讹传前军失利，以致兵勇惊溃。炮台守兵孤军奋战，沙春元、陈毅等中弹牺牲，各炮台遂相继失守，所有火炮、器械，全被敌军掠获。联军陆战队占领南北两岸炮台后，其炮艇沿白河驶向东沽，烧毁浮桥，占领东、西大沽二村。

这次作战，大沽清军数倍于敌，但仅仅接战两个多小时，四座炮台全部落入敌手。其所以如此，主要是清廷动摇不定，缺乏抗战决心。当联军从上海北上时，咸丰帝一面命令在天津、大沽暗地设防，一面又令谭廷襄等“平心静气”地与侵略者“理论”。前线指挥官谭廷襄虽然奉旨设防，但也根本没有打的决心，战前既无周密的防御计划，战时又不亲临前线指挥，危急时刻则带头逃跑。大沽炮台的陈旧落后，也直接影响了战斗的进行。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驻守虎门的关天培就采用增减木垫的办法调整火炮的射程，可是，大沽炮台连这样的土办法也未采用。固定在炮架上的火炮无法调整射程，结果，敌舰趁落潮时发起进攻，各炮台发射的炮弹便大多成为远弹，不能命中目标。加上仍然采用老式的木制炮架，一旦遭敌火箭攻击，木架着火燃烧，火炮随之滚落地上，无法继续射击。此外，炮台后路部队畏缩不前，有的望风而逃，也加速了炮台的陷落。

四、联军威胁津京，迫签《天津条约》

5月24日，谭廷襄逃回天津，张殿元等各率所部退守天津城外。英法联军炮艇八九艘溯白河而上，于26日驶抵天津城下。不久，四国公使也率主力舰只赶到。侵略者宣称，如清廷不立即派全权代表前往天津谈判，就先取天津，再攻北京。

谭廷襄在大沽炮台失陷后立即声称：“统观事态，细察夷情，有不能战、不易守、而不得不抚者”。当联军兵临天津城下时，谭更加惊恐万状，认为“时势危急，战守两难”，唯一出路是向侵略者妥协求和。咸丰帝以天津逼近京城，急忙于5月28日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赶赴天津议和。

从6月4日起，桂良等与英、法、美、俄代表进行了多次交涉。在英法代表骄横要挟下，桂良等被迫接受了全部要求，分别于6月26日和27日签订了中英《天津条约》和中法《天津条约》。条约的主要内容是：公使常驻北京；增开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湾（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扩大领事裁判权；对英赔款四百万两，对法赔款二百万两；修改税则等等。条约规定第二年在北京交换批准书。

当桂良等与英、法代表谈判时，美、俄公使扮演“调停者”的角色，玩弄阴谋诡计，竟抢在英、法之前，诱逼清廷分别于6月13日和18日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和中美《天津条约》。在中俄《天津条约》签订以前半个月，黑龙江将军奕山在沙俄武力威胁下，与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签订了非法的《璦琿条约》。通过这个条约，沙俄侵吞了中国黑龙江北岸、外兴安岭以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第六节 英法联军第二次北犯 (1859年6月)

一、上海修约谈判

《天津条约》签订前后，清廷内部在是否全部接受侵略者的要求方面存在很大分歧。桂良等以英法联军“枪炮迅利”、“直隶库款支绌”、“天津以北，道途平坦，无险可扼”、“国家内匪未净，外患再起，征调既难，军饷不易”等为由，主张迅速订约，以期息兵停战。吏部尚书周祖培等则反对接受侵略者的全部要求，特别不同意外国公使驻京，认为公使“一入京师，则一切政令必多牵制”。咸丰帝一贯害怕外国公使驻京，只是由于侵略者兵临天津，京畿难保，为顾眼前利益，才被迫同意订约的。因此，当英法侵略军于1858年7月陆续南撤后，其态度又有改变。他深感大皇帝的尊严受到损害，特别是对外国公使驻京颇感不安，于是，要桂良等利用去上海同英法代表谈判通商章程之机，以全免进口税为交换条件，取消《天津条约》中关于公使驻京、内河通商、内地游历及赔偿军费等条款。10月4日，桂良、花沙纳到达上海，经过多方哀求，额尔金才故作让步姿态，答应英国公使驻于北京以外的地点，但可定期或按公务需要前往北京。于是，桂良等分别于11月8日和24日与英、法代表签订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主要内容是：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将鸦片改名“洋药”；一般进出口货物，一律只征5%的关税；洋货运销内地或输出土货，一律只征2.5%的子口税；海关税务邀请外国人“帮办”等等。

二、清廷加强大沽防务

英法联军南撤后，咸丰帝接受惠亲王绵愉等人关于“天津海口一带，急应妥为布置”的建议，谕令以镇压太平天国北伐军而得宠的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会同礼部尚书瑞麟（署理直隶总督）前往天津一带，加强海口防务。僧格林沁率京营及东三省蒙古马队各一部，自通州到达天津后，便会同瑞麟亲往海口查勘，决定加强大沽、双港等地的设防。同时，奏请清廷分别从吉林、黑龙江、绥远、直隶北部和京城抽调兵力前往天津地区，并重新恢复直隶海口水师。到1859年3月，大沽口共有兵丁三千名。僧格林沁等恐新募兵丁

《桂良等奏对外不可战者五端英法要求可从权允准折》，《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三），第982页。

《周祖培等奏外使驻京八害折》，《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三），第954页。

署直隶总督瑞麟《请复设天津水师以重海防折》称：“查直隶海口水师，自道光元年裁撤之后，现在海口大沽两营，仅止额设陆路弁兵一千六百余名，本形单薄。……惟有复设水师，方可捍卫海疆。”“拟请

“难期得力”，“将京旗京营官兵抽出八百名，拨赴海口，分扎两岸炮台，即于新募兵丁抽出八百名，饬赴双港屯扎”。此外，尚有副都统成保所率的哲里木盟马队五百人驻新城；头等侍卫布尔和德、二等侍卫舒明安所率的昭乌达盟马队五百人驻新河。整个大沽海口地区共有防兵四千人。

经过重建的大沽口炮台，由四座增至六座，每台守兵约四百人。海口南岸炮台三座，高自三丈至五丈不等；北岸炮台二座，一高五丈，一高三丈。各炮台的高度、宽度和厚度均较前有所增加。另在北岸石头缝地方新建高三丈的炮台一座，作为后路策应。六台共安设火炮六十门，其中有一万二千斤大铜炮二门、万斤大铜炮九门、五千斤铜炮二门、西洋铁炮二十三门。所有炮台周围均坚筑堤墙，堤墙之外开挖壕沟，竖立木桩。又在海口排列三道拦河铁链，配置铁钺，安设木栅，连成巨筏，以便拦阻敌舰。僧格林沁督饬各营官兵，“排列队伍，燃放炮位，严密设防”。

鉴于距天津三十余里的双港地势较高，河身狭窄，便于拦击敌人，僧格林沁等特在该处沿河两岸设兵营九座，驻兵六千人，修建炮台十三座，安设一万二千斤以下大小铜铁各炮八十一门。对于从大沽至山海关一线众多的海口，也本着“择要分布”的原则，分别在北塘海口、丰润的涧河口、乐亭的清河口和老田沟、昌黎的浪窝口和蒲河口以及山海关内的白塔岭、秦皇岛、小河口等处，部署了相应的兵力。其中北塘有一千六百人，山海关有三千人。另外，天津道府及沿海各县，还招募了团练乡勇共五万余人。

三、英法联军再次北犯

《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政府仍不满足于从中国攫取的种种特权，叫嚷“条约中有关商务的条款不能令人满意”，蓄意利用换约的时机，重新挑起战争，向清廷勒索更多的权益。

1858年11月，英国以普鲁斯接替包令为驻华公使。1859年3月，英政府训令他将对华事务管理总部由香港迁往上海，尔后视情况在北京设立使馆，并拒绝清廷可能提出的阻止公使进京换约的任何企图。普鲁斯来华途中，在锡兰（今斯里兰卡）与从中国回国的额尔金共同议定了以一支雄厚的舰队“护送”公使进京的计划。4月26日，普鲁斯抵香港，6月6日到达上海。随后，与法国驻华公使布尔布隆等进行密谋。双方都拒绝同等候在那里的清朝全权大臣桂良、花沙纳会晤，决定再次北犯大沽，“不惜用武力来打

设立水师兵二千名，步兵八百名，马兵二百名，统共三千名，除海口大沽两营原设弁兵一千六百余名抵补外，计增兵一千三百余名。”清廷准予复设，并谕知黄宗汉、庆瑞等，于闽、粤两省“抽调大号战船艇船各二只，备齐器械，派员管带来津，以备操演”。参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三），第1112—1114页。

《僧格林沁等奏驻扎海口员弁兵丁数目折》，《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四），第1305页。

开白河的大门，并继续向京城挺进”。美国新任驻华公使华若翰也决定随同英、法公使北上，进京换约。

6月20日，三国公使到达大沽口外，与17日即已到达的英法联军舰队会合。

英法联军舰队由新任侵华英军海军司令贺布少将率领，共计舰船二十一艘。其中有英国“复仇”号等蒸汽舰七艘、炮艇十艘、运输船二只，载海军陆战队、工兵队一千二百余人，法舰“迪歇拉”号和蒸汽供应船“诺尔扎加拉”号，载海军陆战队约百人。另有“托依旺”号等美国舰艇三艘，随同行动。

6月21日，普鲁斯把打通白河口的任务交给贺布。在此以前，贺布已派人知照清军，要求将安设在海口的铁钺、木筏等尽行撤去。清军未予理睬。联军舰队便连日进行侦察、破障，并抢劫商船、渔船，鸣枪发炮，恣意挑衅。

四、清军大沽抗战获胜

早在1859年春，僧格林沁得悉外国公使执意要进京换约的消息后，就向咸丰帝提出了如下防御建议：“倘夷船一二只驶进海口，谨遵训示，由地方官派员迎至拦江沙外，与之理论”；“设三五只以上蜂拥而至，是决裂情形已露，自未便专恃羁縻。……似宜以拦江沙内鸡心滩为限，……设竟闯入鸡心滩，势不得不慑以兵威，只可鼓舞将士，奋力截击，开炮轰打”。咸丰帝基本同意这一建议，令僧格林沁“相机酌办”。不久，僧又提出：大沽海口布置均已周密，公使进京“不特不可令其经由，且不可令其窥伺”。

他建议让公使由北塘登岸，从陆路进京。这一建议也得到了咸丰帝的同意。

6月22日，咸丰帝得知英法联军舰船陆续驶抵大沽后，立即谕令僧格林沁严守海口，但“勿遽开枪炮，以顾大局”。同时，令新任直隶总管恒福等照会英、法公使，指定他们由北塘海口登陆，进京换约，不能随带兵船武器，不得多带随从人员。可是，侵略者并不理睬清政府的要求，坚持要以舰队沿白河上驶，武装护送公使进京。他们骄横地声称：“定行接仗，不走北塘”。大沽炮台的防兵在直隶提督史荣椿及大沽协副将龙汝元等督率下，早就不动声色地监视着敌人舰船的动向，“炮台营墙不露一人，各炮门俱有炮帘

[法]科尔迪埃：《一八六一年中国之征》，《第二次鸦片战争》（六），第191页。

1859年3月25日，清廷根据直隶总督庆祺建议，命令僧格林沁：如英使北上天津，即派员迎至大沽口拦江沙外，与之理论，勿令驶入内河。（参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四册，第1329页。）

《僧格林沁奏复陈筹备机宜折》，《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四），第1337页。

《僧格林沁等奏大沽海口布置周密不可令洋人窥伺片》，《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四），第1355页。

《恒福奏洋人骄傲寻衅请派大员办理折》，《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四），第1456页。

遮挡，白昼不见旗帜，夜间不闻更鼓”。

6月25日拂晓，贺布率联军舰艇十三艘，从拦江沙内距炮台约十三公里的水域向海口开进，炮艇都停泊在离铁钺不远的水面。海军陆战队已换乘从海湾抢劫来的帆船，待命行动。工兵队被配属到各炮艇上，分别组成特种小队，准备执行射击炮洞的任务。贺布的作战计划是：炮艇冲过横江铁链，在炮台的上方占据一个位置，以便两面夹攻；然后，在舰炮火力掩护下，海军陆战队从正面登陆，迅速夺取炮台。

联军舰队在完成开进任务后，贺布便派英舰“负鼠”号和几艘炮艇强行拆除海口铁钺和木栅，开辟通道。这时，大沽海口两岸的清军怀着愤怒的心情，注视着敌人的行动，并作好了一切战斗准备。下午3时左右，海口第一道障碍物被拆毁，贺布立即令

“负鼠”号导航，旗舰“鸬鸟”号及其余舰只随后跟进，向横锁海口的铁链进逼，并发炮轰击两岸炮台。炮台守军忍无可忍，立即开炮还击，由于“围墙深厚，尚足抵御”，且“各炮台口门，适当夷船，与之相对轰击”，守军炮火得以充分发挥威力。史荣椿、龙汝元指挥南北两岸炮台集中火力轰击贺布的旗舰。交战不久，联军旗舰“鸬鸟”号舰长拉桑上尉等多人被打死，贺布也身负重伤，改乘大型汽艇“鸬鹚”号继续指挥战斗。

激战至下午4时，参战的联军舰艇差不多全被击伤。旗舰“鸬鸟”号被击毁，舰上的四十名水手仅一人跳水逃脱。炮艇“茶隼”号和“庇护”号被击沉，“鸬鹚”号等几艘炮艇搁浅，贺布被迫逃到法舰“迪歇拉”号上。这时，史荣椿、龙汝元又指挥炮台守军集中火力轰击搁浅的炮艇，将“鸬鹚”号击毁。守台将士越战越勇，史荣椿、龙汝元等奋不顾身，亲自督战，不幸相继阵亡。

当战斗激烈进行之际，美国远东舰队司令达底拿乘快艇前往战区，看望受伤的贺布。在返回停泊水域时，遭到清军炮火的袭击，达底拿幸免于死，但陪同他的美国旗舰“托依旺”号的副舰长被打伤，舵手被打死。他目睹英法联军的惨败情景，认为贺布“已经无法逃脱并退出这场绝望的战斗了”，遂派“托依旺”号从集结地域开进战区，去拖曳搁浅的炮艇，以便让英国舰艇重新投入战斗。他还命令美国水兵登上英国炮艇，参加作战，从而彻底撕下了“调停人”的假面具。

《僧格林沁恒福奏英人等到津后两方情形折》，《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四），第1439页。

参见[英]费舍《在中国服役三年的个人记述》，《第二次鸦片战争》（六），第196页。

《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奏查明接仗击毁英船俘获人物并守军伤亡各情形折》，《第二次鸦片战争》（四），第103页。

[美]达底拿：《致海军部长艾萨克·托塞》（1859年7月4日），《第二次鸦片战争》（六），第211页。

下午5时，贺布仍不认输，下达了登陆作战的命令。英军勒蒙上校率联军陆战队千余人，分乘帆船、舢板二十余只，由美舰“托依旺”号和联军的两艘炮艇拖曳，至海口铁钺以外不远的水面集结，尔后在舰炮掩护下，向海口南岸强行登陆，企图先夺取南岸的三座炮台。南岸炮台外为一片泥泞地，并有三道水壕。侵略军登岸后，一方面遭到炮台炮火的杀伤，一方面要在没膝的泥泞中艰难地匍匐爬厅，处境甚为狼狈。这时，僧格林沁立即调集火器营等的抬枪队和鸟枪队前往攻击，北岸炮台也发炮支援。联军登陆部队死伤枕藉，不得不停止前进，潜伏于沟壕中和土堆后面。黄昏时分，侵略军利用夜暗“伏地抢进”，炮台守军施放火弹、喷筒，借着亮光瞄准射击，杀伤敌人。联军陆战队只有少数人爬到了炮台下面的第一道壕边，但由于步枪已塞满泥浆，几乎都不能使用，运来的便桥又太短，无法架设，云梯也大都折断，无法攀登。守军集中火力向隐蔽在壕沟边的敌军射击，终于迫使其向海口撤退。直至半夜，联军陆战队余部才陆续爬上舰艇，撤出战场。

激战一昼夜，联军遭到惨败，不得不再次南撤。此次参战的十三艘英军舰艇中，有六艘丧失了战斗力，有四艘被击毁或击沉。参战英军约一千二百人，死伤五百七十八人。参战法军约六十人，

1859年，英法联军再次进攻大沽，被守军击败。图为大沽炮台

死伤十四人。联军惨败的原因，客观上由于兵力不足（其参战兵力仅及清军的四分之一），但主要是由于骄横轻敌，情况不明。贺布错误地估计形势，以为仍象上年一样，大沽海口设防简陋，清军斗志不高，不足为惧。联军发起攻击前，虽然进行了侦察，但因清军隐蔽良好，无法窥探虚实。在情况不明及骄傲情绪支配下，贺布制定的作战计划，必然带有很大的盲目性，以致水陆攻击均未得逞，夺取炮台的尝试终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清军在这次抗击作战中仅伤亡三十二人，大沽炮台只遭到轻度破坏。这是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军队抵抗外国侵略军所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利。这次胜利表明，尽管清军军事技术落后，战斗力不强，但在保国御侮的激励下，广大士兵和下层官弁还是能够勇敢抗战的，只要指挥得当，预有准备，是能够打败装备有洋枪洋炮的外国侵略者的。此次获胜的原因，还由于清政府接受了上次大沽作战失利的教训，在英法联军南撤之后，一面与之谈判，一面加强了战备，特别是改善了大沽海口的设防。此外，统筹津沽军务的僧格林沁亲临前线；史荣椿、龙汝元等将领沉着应战，待敌舰接近后，突然开火，集中轰击联军旗舰，使敌指挥失灵；南北炮台守军主动协同配合，打击登陆之敌；人民群众积极支援，等等，对于保障这次作战胜利，也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第七节 英法联军第三次北犯 (1860年4月—11月)

一、英法扩大侵略，清廷疏于戒备

联军惨败的消息传到伦敦，英国资产阶级立即叫嚷要对中国实行“大规模的报复”。伦敦《每日电讯》报公开扬言：“大不列颠应攻打中国沿海各地，占领京城，将皇帝逐出皇宫”，“应该教训中国人重视英国人，英国人高出于中国人之上，应成为中国人的主人”。还声称在夺取北京之后，要永远占领广州，把它变为英国在远东的商业中心，以便“奠定新领地的基础”。

1859年9月，英政府举行了四次紧急内阁会议，在巴麦尊的策划下，决定再次扩大侵华战争。同伦敦一样，巴黎也煽起了新的战争狂热。虽然英、法两国曾因意大利问题等弄得关系紧张，而且两国在扩大侵华后究竟打到何等程度、各出多少军队等问题上也一度分歧很大，但经过协商，最终还是达成了协议，决定继续联合侵华。

1859年11月，英、法两国政府分别再次任命额尔金、葛罗为特命全权代表，并分别以陆军中将格兰特、陆军中将孟托班为英、法远征军总司令，组成一支新的侵华联军。其中英军约一万八千人，法军约七千人。

1860年春，格兰特、孟托班分别率英、法舰队驶达上海集结，随后即开始第三次北犯。4月21日，联军占领舟山。5月27日，英军占领大连湾，6月8日，法军占领烟台，完成了对渤海湾的封锁。此后，联军即以大连湾和烟台两处作为进攻大沽口的前进基地。

关于联军的战略企图，英国陆军大臣赫伯特曾于1859年11月26日训令格兰特：为了使英国在中国的通商口岸的商业利益不致受到影响，这次军事行动应尽量局限于清廷；英国远征军可以从北直隶湾和白河登陆，如攻占海口炮台后仍不能使清廷屈服，则沿白河进攻至天津，有可能强迫中国皇帝妥协。法国政府对葛罗也发出了类似训令，要求法国远征军“在白河进行登陆，然后再向天津进军，并在那里巩固自己的阵地”。英法两国再次扩大侵华战争，并非要推翻清王朝的统治，相反，它们都害怕太平天国革命的发展导致清王朝的覆灭。它们的目的是迫使清廷“赔礼道歉”，互换和履行《天津条约》，并勒索更多的战争赔款。

转引自马克思《新的对华战争》，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42—43页。

1859年夏，法国与撒丁王国（当时意大利诸国中最强大的一国）结盟，共同对奥地利作战（撒丁王国将萨伏依和尼斯割给法国，作为报酬），在意大利境内接连击败奥军。然而，法皇拿破仑第三不久就出卖盟友，单独与奥皇签订和约（其中规定威尼斯地区继续属奥），引起意大利和英国的极大不满。

参见《第二次鸦片战争》（六），第246页。

[法]科尔迪埃：《一八六〇年中国之征》，《第二次鸦片战争》（六），第258页。

1860年7月9日和11日,额尔金和葛罗分别乘军舰抵达大连湾和烟台。美使华若翰和新任俄使伊格纳切夫也随同北上,再一次打出“调停者”的旗号,企图从中渔利。7月19日,英、法公使和两国侵华陆海军司令等在法旗舰上召开作战会议,根据贺布的建议和俄使伊格纳切夫提供的关于北塘毫无戒备的情报,决定从北塘登陆,并决定两国舰队于7月28日在北塘河左岸入口处宜于停泊的地方集结,经过现地侦察,再决定登陆和入侵的方式。7月26日,英、法舰队于渤海湾会齐后,向北塘方向开进。英军出动各种舰船一百七十三艘,兵力一万零五百人,其中有装备精良的骑兵一千人和炮兵两个中队。法军有舰船三十三艘,兵力六千三百人。29日,联军舰队在大沽口与北塘口之间距海岸约十三公里的海面集结,并完成了对北塘海口的侦察以及登陆地点的选择。

从清军大沽获胜到联军第三次北犯渤海湾,有近一年的时间,清廷既不了解英法侵略者的动向,也不认真加强防务,只顾致力于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当时正是太平军二破清军江南大营前后)。在英法联军已经封锁渤海湾的严峻形势下,咸丰帝仍认为海口布置周密,联军上年进攻受创,“未必不心存畏忌”,此次再来,“实则以兵胁和”而已。因此,谕令僧格林沁、恒福等,“总须以抚局为要”,“不可因海口设防严密,仍存先战后和之意”,以免“虽图快于目前,而贻患于将来”。这既表明他对海口设防盲目乐观,也表明他把对付外敌侵略的侧重点放在“抚”上,而不是立足于“战”。僧格林沁在取得大沽反击作战胜利后,同样产生了骄傲轻敌情绪。他认为侵略军遭此挫败,“非处万全,必不肯轻动”,“即使该夷舍命报复,现在营垒培厚加高,密布大炮,各营官兵无不奋勇,足资抵御”。为了让英、法等国公使从北塘登陆进京,他竟撤掉北塘的守备,专守大沽口。熟悉北塘一带地形的山西道监察御史陈鸿翊认为,英法联军如从北塘登陆,必北阻驻营城(北塘河北三十余里)之清军,南攻大沽北炮台后路。他向咸丰帝建议:调回从北塘撤走的部队和大炮,并将驻营城的清军移驻北塘,严为防守。山东道监察御史林寿图也指出,“北塘弛防非计,宜层层设伏,以策万全”。然而,僧格林沁等一意孤行,拒不恢复北塘设防,这就为侵略军的登陆作战造成了可乘之隙。

二、联军北塘登陆,大沽天津陷落

早在1859年9月,贺布吸取大沽惨败的教训,就向英国海军部建议:要便于攻取大沽炮台并向北京前进,最适宜的登陆地点是北塘。(参见蒋孟引《第二次鸦片战争》第189页。)

《廷寄》,《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六),第2053页。

《僧格林沁奏办理抚局当刚柔相济折》,《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四),第1522页。

陈衍:《闽侯县志》卷六十八,《第二次鸦片战争》(一),第619页。

1860年8月1日,格兰特和孟托班率联军舰艇三十余艘、陆战队五千人,驶抵北塘口,趁该处守备空虚,顺利登陆,并占领北塘镇。接着,后续部队相继登陆。驻守大沽口的僧格林沁,没有及时抽兵反击,仅“饬派马队遥为屯扎”,且“不得先行迎击”,以致坐失战机。北塘被占,咸丰帝感到事态严重,急令恒福妥善筹办和议。8月7日,恒福照会英、法公使,要求约定时间地点举行谈判。额尔金、葛罗复照拒绝,并无理要求清军交出大沽炮台。

8月12日拂晓,联军万余人从北塘出发,中途分左、右两翼,向新河一带前进。上午9时,驻守新河的清军马队二千人,主动向联军出击,企图分割敌军右翼部队,并将其驱往新河东北的沼泽地带,尔后加以歼灭。联军集中炮火轰击清军马队,并派出陆战队七百人迎战。清军马队见联军出战的兵力不多,便冒着敌人炮火继续冲锋。联军随即变换队形,以步兵合围清军马队,而以骑兵为预备队。清军马队陷入重围,战不多久,便伤亡近四百人,只得突围。联军骑兵立即追击,在大部歼灭清军马队之后,乘胜占领了新河。

8月14日凌晨4时,联军由新河向塘沽逼进。塘沽与大沽相距八里,仅一河之隔,是大沽口北岸炮台侧后的重要屏障。清军在塘沽筑有周长近四里的围墙,墙高七米,上面开有枪眼、炮洞。当时,塘沽由副都统克兴阿、侍郎文祥等率部驻守,连同从新河撤来的马队,总兵力约三千人。凌晨6时,联军进抵塘沽近郊,停泊在白河上的水师战船立即开炮拒敌。双方炮战半小时,清军水师战船被迫撤走。7时半,联军炮轰塘沽,随后在炮火掩护下,发起总攻。塘沽守军发炮还击,奋力抵抗。双方激战两小时,守军伤亡很大。9时半,联军分兵一部泅水从苇塘迂回到塘沽侧后,守军腹背受敌,力不能支,退至大沽北岸炮台,塘沽遂为联军攻占。至此,大沽口北岸炮台的侧后完全暴露在敌军面前。

联军攻占新河、塘沽后,其舰队便集结于大沽海口,准备与逼近大沽北岸炮台的陆战队水陆协同,夺占大沽。此时,清统治者已丧失了保卫海口的信心。僧格林沁声称“能否扼守,实无把握”。咸丰帝非但不严令他坚守大沽炮台,反而说什么“天下根本,不在海口,实在京师。若稍有挫失,总额带兵退守津郡,设法迎头自北而南截剿,万不可寄身命于炮台”,公然要僧格林沁放弃大沽海口,保命逃跑。他还相继谕令恒福等照会英、法公使,要求息兵议和,并告以清廷已派使臣前来迎接公使,“进京换约,以期永敦和好”,但遭到侵略者的拒绝。

8月21日清晨5时,联军集中所有野战炮和舰炮火力,猛烈轰击大沽北

《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奏英法兵轮驶至北塘情形并照会美使转约英法二使入京换约折》,《第二次鸦片战争》(四),第448页。

《硃谕》,《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六),第2083页。

《廷寄》,《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六),第2089页。

岸炮台。北岸炮台总指挥乐善（新任直隶提督）督率炮台守军开炮拒敌。由于各炮台的弹药库陆续中弹起火，守军炮火逐渐稀疏下来。上午8时以后，炮战停止，联军万余人分为二支（左翼为英军、右翼为法军），向石头缝炮台发起冲锋。乐善督率守军用鸟枪、抬枪和长矛、弓箭等奋勇杀敌。9时许，由于炮台被炸，乐善阵亡，守军大部牺牲，石头缝炮台陷落。其它两座炮台的守军也“以难以描述的勇猛精神，寸土必争地进行防御”，抗击敌之进攻，直至炮台陷落为止。这次战斗，清军损失近千人；联军也付出了巨大代价，死伤四百余人（法军二百人、英军二百余人）。

僧格林沁见北岸炮台失守，认为南岸炮台“万难守御”，便按咸丰帝的旨意，于当晚尽撤南岸守军，向天津退却。恒福随即在南岸炮台挂起免战白旗，把三座炮台拱手交给了侵略军。

英法联军占领后的大沽炮台

联军控制大沽炮台后，便由贺布率炮艇五艘、海军陆战队八十余人为先头部队，溯白河长驱直入。这时，逃到天津的僧格林沁又以必须与敌军“野战”，而不能“株守营垒”为借口，命令双港及天津一带防军一律撤退，加上从大沽地区撤出的清军，总计一万七千余人（其中马队七千、步队万余），退至通州（今北京通县）一带。

由于天津地区完全撤防，白河两岸亦无清军阻击，贺布率领的五艘炮艇于8月24日顺利驶达天津城郊。接着，联军后续部队陆续抵达，不费一枪一弹即占领了天津城。

三、联军侵入北京，迫签《北京条约》（参见附图五）

（一）外交谈判的破裂

联军侵占大沽炮台后，咸丰帝极度惊恐，急派大学士桂良为钦差大臣，赶赴天津，会同直隶总督恒福（亦授予钦差大臣头衔）向英法侵略者乞和。

1860年8月31日，桂良到达天津。英、法公使提出必须全盘接受1858年的《天津条约》、增加赔款、增辟天津为通商口岸等先决条件，方可议和。桂良等被迫答应全部要求，从9月2日起，与英、法代表巴夏礼等举行会谈。侵略者提出停战的主要条件是：赔偿军费，先付给两国现款各三四百万两；撤走通州守军，以便两国公使各带兵千人进京换约，并由巴夏礼随带数十人先行入京，察看沿途及京中住房；增辟天津为通商口岸，立即开市贸易等。咸丰帝感到停战条件过于苛刻，认为公使进京“拥兵而来，显怀莫测”，因

[法]布隆代尔：《一八六一年远征中国记》，《第二次鸦片战争》（六），第280页。

而谕令桂良等“莫顾决裂”，拒绝侵略者所提无理要求。9月7日，硃谕军机处和王大臣绵愉、载垣、端华、肃顺等，表示要与英法“决战”，并提出决战时机“宜早不宜迟”，“趁秋冬之令，用我所长，制彼所短”。同时，令军机大臣等迅速调兵前赴通州，“以资攻剿”。

英法联军在天津

英法侵略者由于所求不遂，便中断谈判，决计进犯北京。9月10日，联军先头部队三千余人，自天津向通州方向前进。在此之前，咸丰帝得悉英、法公使坚欲带兵径赴通州的消息，“决战”的决心又开始动摇，急派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取代桂良等为钦差大臣，由通州前往天津，与侵略者继续谈判，企图挽回“抚局”。载垣、穆荫接连照会英、法公使，先则要求联军退回天津，然后进行谈判，继则请求侵略者止于河西务，在通州进行会谈。额尔金等考虑到联军进军北京，需补充大量军需物资，因此，表示愿意在通州举行会谈，以便争取时间，进行作战准备。9月14日，联军先头部队抵河西务，着手筹建兵站。与此同时，额尔金派巴夏礼等到达通州。谈判中，巴夏礼除坚持原先提出的条件外，又增加了互换和约时须面见皇帝亲递国书，以及将张家湾的清军全部撤退等苛刻要求，以致通州谈判于17日彻底破裂。9月18日，咸丰帝再次下谕与侵略军决战，并令恒福等“广集民团，多方激励”，“一闻张家湾开仗，即令津郡民团截其后路，痛加剿洗”。

（二）张家湾、八里桥之战

9月18日，联军先头部队自河西务越过马头，推进到张家湾附近。僧格林沁得悉通州谈判破裂，便按照载垣等的通知，将巴夏礼等一行三十九人扣押送京，并严阵以待，准备迎击敌人的进攻。

当时，清军在通州一带的部署是：僧格林沁的督师行营设在通州与张家湾之间的郭家坟，由他统率的马步兵一万七千人，驻扎于张家湾至八里桥一线，扼守赴通州及京师广渠门（今建国门）的大道，其中驻张家湾的兵力仅有步兵千人。副都统格绷额督带马队三千人驻于张家湾的东面和南面。署直隶提督成保率绿营兵四千人防守通州。原驻防通州的礼部尚书瑞麟所统京营万人及副都统伊勒东阿督带的马步队四千人防守八里桥，作为僧军的后援。僧格林沁还派副都统克兴阿统带察哈尔马队一千人，防守张家湾西南的马驹桥；又令总管那马善统带祭哈尔马队一千人，防守马驹桥东南的采育，以防敌军从马头直接西进，绕道趋京。总计通州地区的防军达三万余人。另外，

《硃谕》，《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六），第2233页。

《廷寄三》，《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七），第2318—2319页。

副都统胜保率京营五千驻齐化门（今朝阳门）以东的定福庄，以便声援僧、瑞两军，保卫京师。

18日中午，联军向张家湾阵地发起攻击。僧格林沁挥军抵抗，给敌以重大杀伤。当调派马队抄袭敌军时，联军炮队突然发射火箭数百枚，以致“马匹惊骇，回头奔驰，冲动步队”，清军阵势顿时混乱，马步兵自相践踏，纷纷溃退。僧格林沁率所部退守八里桥，驻防通州的绿营兵也慌忙随僧军撤走。联军占领张家湾，并乘胜追击，一举占领郭家坟和通州城。

21日凌晨4时，联军从郭家坟一带向八里桥推进，骑兵在前面探路。八里桥位于北京城东二十余里，是由通州入京的咽喉之地。清军利用八里桥周围的灌木丛林，临时构筑了战壕和土垒。自张家湾一带撤退的僧军与从通州撤退的绿营兵抵达后，总兵力达三万人，其中马队近万人。上午7时，联军分东、西、南三路对八里桥清军阵地发起攻击。东路为雅曼指挥的法军第1旅；西路为格兰特直接指挥的英军；南路为科林诺指挥的法军第2旅，担负主攻八里桥的任务。由于此次作战以法军为主，故由孟托班担任总指挥。

战前（9月19日），清廷曾告谕僧格林沁等：“拿获奸细，据供：逆夷用兵，马队在前，步卒在后，临阵则马队分张两翼，步卒分三层前进。前层踞地，中层微俯，后层屹立，前层先行开枪，中层继之，后层又继之。我军若迎头轰击，马匹一经受伤，必然惊溃，惟有斜抄横击，轰毙必多等语。夷情凶悍，深知兵法，是在该大臣等审度形势，妥筹应敌，以操必胜之权。……若仅用正兵与之相角，恐夷人诡谲，不足以尽其变。”清廷还一再强调必须派出马步劲旅，绕至敌后，于夜间轮番出击，使其自相惊扰，进退两难。但是，僧格林沁等未予重视。

为对付联军的攻击，僧格林沁和瑞麟商定，令马队首先出击，尔后以由定福庄移至八里桥的胜保所部迎击南路联军，瑞麟部迎击东路联军，僧部迎击西路联军。所有步队均隐蔽在灌木林中和战壕里，待机杀敌；马队则向联军的左翼到右翼的宽大正面实施反冲锋。战斗打响后，清军马队立即冲向前去。他们奋不顾身，齐声大呼杀敌，用长矛和弓箭迎击敌人，企图冲乱和割裂敌人的战斗队形。一部分骑兵冲至离敌人四五十米的地方，有的冲到敌军指挥部附近。激战一时许，毙伤敌军千余人。但是，清军马队因遭到据壕作战的联军步兵密集火力的阻击和敌炮霰弹的轰击而大量伤亡，被迫退却。随后，南路的法军第2旅将大量炮弹倾泻在八里桥上，使胜保部遭到重大伤亡。当法军第2旅的两个前卫连冲到桥边时，守卫石桥的清军与敌军展开肉搏战。后因胜保中弹受伤，遂率军退至定福庄。法军追至，胜保又率军逃往北京。在胜保部与南路敌人战斗的同时，僧格林沁指挥马队穿插于敌人的南路与西路之间，企图分割敌人，尔后以步队配合胜保部包围南路之敌。由于胜

《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奏英军来扑迎击失利退守八里桥折》，《第二次鸦片战争》（五），第84页。

《廷寄三》，《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七），第2327—2328页。

保所部败退，僧格林沁的企图未能实现，遂与西路之英军展开激战，双方伤亡甚众。上午9时，英军分兵一部向于家卫（今于家围）进攻，企图抄袭僧军后路。僧格林沁甚为惊恐，便“于酣战之际，自乘骡车，撤队而逃”，以致军心动摇，纷纷退至齐化门以东的皇木厂。迎击东路敌军的瑞麟部则“于未阵之前，先已溃散”，致使法军第1旅顺利地占领八里桥以东的几个村庄，并协同法军第2旅攻占八里桥。瑞麟部也逃至皇木厂，与僧部会合，后又一齐退至齐化门。中午时分，联军停止前进，迅速占领八里桥附近的咸户庄（今咸宁侯庄）、三间房、于家卫一带地方。

张家湾、八里桥之战，是关系到北京安危的关键性一战。英法联军由海口孤军深入，战线拉长，兵力相对分散，粮弹供应困难，加之人地生疏，又失去了舰炮优势，存在许多不利因素。清军在兵力上占有较大优势，且地形熟悉，通州平原地带便于马队驰骋冲杀，同时，又有大量人民群众和团练乡勇积极开展敌后活动，具有战胜敌人的有利条件。但战斗的结果，却是清军节节败退，溃不成军。究其原因，首先是由于清廷的和战不定。从天津陷落到八里桥之战，咸丰帝忽而主和，忽而主战，时而不准清军“衅自我开”，时而又要清军“相机进剿”，朝令夕改，出尔反尔，使得前线将领无所适从，严重影响其抗战的决心和战备。其次，在兵力部署和作战指挥上存在不少失误。僧格林沁把马步一万余人分散配置在从张家湾到八里桥纵深约二十里的大道两侧，前沿阵地的兵力异常单薄，又没有控制必要的预备队。因此，当联军向张家湾发起进攻时，该处没有足够的兵力迎战，以致一开始就处于不利态势。当马队遭到联军炮火袭击而冲乱步队时，又没有采取严厉措施，制止溃乱，稳住阵脚。在八里桥战斗中，没有集中兵力先打对八里桥威胁最大的南路敌人，又不汲取新河作战的教训，仍令骑兵从正面冲击敌人，而不采取向敌后侧击的战法，都是很不当的。此外，僧格林沁在战况紧急、军心动摇的情况下，不是坚定沉着，督队奋战，反而随军溃退，直至率先逃跑。瑞麟拥兵近万，竟也不战而逃。所有这些，都必然导致战斗的迅速失败。

（三）联军侵入北京

张家湾、八里桥败北的消息传到北京，清廷极为震惊。咸丰帝立即撤去载垣、穆荫钦差大臣的职务，以其六弟恭亲王奕訢为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留守北京，“督办和局”，并谕僧格林沁竖立白旗，知照英、法“停兵待抚”，自己却于9月22日带着皇妃等逃奔热河。

奕訢是个“畏夷如虎”的软骨头，他认为形势危殆，战守两难，如“尚

赘漫野叟：《庚申夷氛纪略》，《第二次鸦片战争》（二），第10页。

赘漫野叟：《庚申夷氛纪略》，《第二次鸦片战争》（二），第10页。

《廷寄三》，《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七），第2337—2338页。

有一线可为，不惜委屈迁就”，就是说，除了屈膝求和，别无它路了。他照会英、法公使，要求停战谈判。联军经张家湾、八里桥战斗，伤亡很大，部队疲惫，兵员粮弹均需补充，因此同意恢复谈判，借以做好进攻北京的准备。谈判近半个月，并无结果。联军却争取了休整时间，然后开始了向北京城的进攻。10月5日，其先头部队向城北安定门、德胜门附近逼进。6日，联军近千人抄至德胜门土城外。僧、瑞两部已成惊弓之鸟，“马队则望影而逃，步队亦闻风而窜，以致逆夷如入无人之境”。坐镇圆明园的奕訢、桂良等急忙逃往常新店（今长辛店）。联军接着由黄寺、黑寺直趋西北，进攻圆明园。僧、瑞两部向京城西南溃逃，守园的步军统领中营官兵约二千人也逃散一空。侵略军进入圆明园后，大肆抢劫珍贵文物和金银珠宝，并放火焚烧殿宇及附近民房。

北京是金、元、明、清四朝的都城，经过历朝特别是明、清两朝的不断修建，已成为一座坚城。当时城上安设大小火炮数千门，外城、内城均挖有较为宽深的护城河。城内尚有八旗骁骑营、护军营、左右两翼前锋营、步军营、内火器营等满汉军十三万三千余人，仓谷钱粮均有储积。城外又有由胜保统率的各省已经赶来的勤王之师六千五百余人及都统绵勋、伊勒东阿统带的马步万余人。同时，内地诸省的勤王之师，还在陆续赶来。尽管事先缺乏防御准备，但只要文武大员具有誓死坚守的决心，认真筹划战守之策，激扬士气，稳定人心，是可以据城一战的。侵略军指挥官孟托班也承认：“对这样的城市进行围困，特别是在全然没有攻城大炮的情况下，就很可能旷日持久。”无奈留守京城的大臣们均以为“城不可守”，完全丧失了抵抗的信心，根本不进行抗击准备。于是英法侵略者乘战胜之余威，照会清廷，限令于10月13日中午将安定门交给联军把守，否则即行攻城。城内的清廷大臣们不敢违抗，如期开门揖盗。英法联军遂不折一矢，不损一兵，安然进入北京外城。

（四）《北京条约》的签订

英法联军进入北京外城后，随即于安定门城墙上安设大炮，对准内城、紫禁城。10月17日，英、法公使再次照会清廷，要求于23日签字换约，并借口俘虏问题，要求赔偿英国白银三十万两、法国二十万两，限期付款。奕訢全部予以答应。10月18日，联军再次闯进圆明园，在洗劫一空之后，为

《奕訢桂良文祥奏巴夏礼已提出住于高庙城内战守皆不足恃折》，《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七），第2382页。

《胜保又奏僧瑞各兵万难振作现待新兵到来暂扎天宁寺片》，《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七），第2426页。

《孟托班将军，八里桥伯爵回忆录》，《第二次鸦片战争》（六），第296页。

销毁罪证，竟把这座世界闻名的壮丽宫苑放火烧毁，各种精美建筑和无数珍贵文物化为灰烬。其后，侵略军又劫掠了万寿山、玉泉山、香山等处的大量金银珠宝与历史文物，并焚烧了许多著名建筑物。

侵略军的残暴罪行，激起了北京人民的无比愤慨，他们纷纷拿起武器抗击敌人。一次，英军一百多人骚扰西郊谢庄，当地群众在猎户冯三保率领下，拿起简陋的武器，坚守石寨、土堡，连续两次打败侵略军的进犯。联军出动五六百人，企图报复。当敌人接近谢庄时，冯三保的女儿冯婉贞率领埋伏在离村四里处的青少年猎手，“挟刃奋起”，与敌人近战搏斗。侵略军猝不及防，纷纷败退。

与人民的英勇抗战相反，清廷完全屈服于英、法侵略者的武力威慑，于10月24日和25日，分别与英、法侵略者签订了中英《北京条约》和中法《北京条约》。中英、中法《天津条约》批准书亦同时互换。中英、中法《北京条约》的主要内容有：（1）承认《天津条约》完全有效；（2）辟天津为商埠；（3）准许外国侵略者在中国拐骗、贩卖人口出洋做苦工；（4）割让九龙司为英国殖民地；（5）交还以前没收的天主教堂，并听任法国传教士在内地各省租买土地，建筑教堂；（6）赔偿英、法的军费各增加到八百万两。10月28日，咸丰帝批准《北京条约》。英、法侵略者从中国攫取了更多的殖民特权后，便于11月9日先后将军队撤出北京，结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英、法威逼清廷签订新约之后，沙俄公使再次借口“说合”有功，逼迫清廷于11月14日与之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不仅迫使清政府承认了《璦琿条约》的内容，而且把上述条约规定的由中俄“共管”的乌苏里江以东约四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一口吞掉；并强行规定中俄西段边界的走向，把中国的内湖斋桑湖和特穆尔图淖尔（今苏联伊塞克湖）硬指为界湖，为进一步侵吞我国西部领土制造“根据”。此外，还强迫清廷开放喀什噶尔（今新疆喀什市）为商埠，准许俄商于中国的库伦（今蒙古乌兰巴托）、张家口等地进行免税贸易。

美国公使因国内爆发南北战争，当联军在北塘登陆时，应召回国，未及趁火打劫。但事后借口“利益均沾”条款，照样掠取了许多新的殖民特权。

第八节 清军战败的原因及其影响

一、清军战败的原因

（一）清政府实行对内镇压人民起义、对外妥协投降的反动政策

英法侵略者为了扩大在中国的殖民特权，进行了历时四年的侵华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由于它们既要尽量扩大殖民特权，又要保存清政府为其效力，所以不得不把军事进攻的目的限制在迫使清政府承认其所提侵略要求的范围内。英法两国领土不大，兵力有限，既要在欧洲争霸，又要向全球扩张，还要镇压殖民地人民的反抗，不可能集中大量兵力侵华（四年之间，侵华军由二千余人逐次增至二万余人）。它们同中国远隔重洋，运输补给困难。加以英法之间存在矛盾，只是在侵华利益上暂时一致。而中国又如此之大，决非区区数万之兵可以占领。因此，它们只能借助外交上的阴谋诡计和威胁恫吓，利用清政府的昏庸怯懦，以有限的军事进攻，达到其攫取更大殖民特权的目地。

中国在这场战争中有许多有利的条件。首先，反侵略战争的正义性，能够激发爱国军民的极大义愤。其次，清军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而且在本土作战，补给容易，地形熟悉，又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援，处于以逸待劳的有利态势。大沽清军第二次抗登陆作战获胜表明，只要具有坚定的抗战决心，进行充分的准备，采取符合敌我情况的战法，加上正确的作战指挥，侵略军是完全可以打败的。但是，由于清王朝政治上腐朽反动，不仅不能利用有利条件，而且采取了对内镇压人民、对外妥协投降的反动政策，从而导致了战争的失败。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民在清王朝残酷剥削压迫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爆发了以太平天国为主的农民起义战争，使清王朝陷入了摇摇欲坠的危境。英法侵略者趁火打劫，乘机发动侵华战争，以达到其既迫使清政府屈服，又保住清王朝统治的殖民主义目的。清政府从维护其封建统治阶级的特权出发，采取了适应英法等外国侵略者需要的卖国政策，在英法军事胁迫、政治讹诈面前，不惜丧权辱国，谋求与侵略者妥协，换得对人民起义的镇压，保住其反动腐朽的统治，因此，自始至终坚持对外“息兵为要”的方针。

依据对外“息兵为要”的方针，清廷在兵力使用上，注重对内镇压，放松对外御侮。据不完全统计，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用于镇压太平军、捻军、天地会和西南各民族起义武装的军队约有四十余万人，而用于抗击英法联军的军队则仅二十余万，其中不少是未经战阵的京营禁旅和临时从东北等地抽调来的部队。他们“初经行阵”，经不起洋枪洋炮的打击，以致往往

“望尘而靡”。在海防战备方面，除广东虎门地区外，沿海各省的海防均甚薄弱，炮台陈旧，一攻即破。此外，派往沿海各省的督抚大员，有的消极避战，有的临阵脱逃，虽有某些将领和军民英勇抵抗，终究形不成统一的抗战力量，更无法发展成为象恩格斯当时所期望的普遍开展的人民战争，致使侵略军得以使用有限的兵力，长驱直入。尤有甚者，正当北方战事未艾之际，上海的买办官僚竟向英法侵略军求援，并雇用美国流氓华尔组织“洋枪队”，联合进攻太平军。这是清政府卖国政策的必然结果，也是导致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武器装备落后，作战方法笨拙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英法侵略军已装备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如发射圆锥形弹丸的线膛后装步枪，和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出现的线膛后装火炮以及便于浅水航行的蒸汽炮艇等），而清军的武器装备，却与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没有区别（仍是鸟枪、抬枪和发射球形弹丸的前装炮及冷兵器），加之炮台构筑仍是露天式的，经不起英法军的火箭和霰弹轰击。至于内河水师，由于船小炮小，二三百只战船竟打不沉敌人的一艘炮艇。

随着武器装备的改善，英法军队的作战方法也有所变化。在克里米亚等战争中，欧洲各国军队基本上都采取散兵战，并更加重视炮兵的炮火准备，以保证步兵的冲击奏效。骑兵除用于侦察外，经常用于对敌人的翼侧和后方进行出其不意的突击，和扩张步兵所取得的战果。海战方面，除了继续运用水陆协同配合、迂回侧击等战法外，还采用了以吃水浅的炮艇绕过对方要塞，配合大型战舰实施夹击等战法。这些战法，英法军队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大体上都运用了，并取得成效。

清军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既没有认真研究侵略军的作战特点，也没有探求克敌制胜的新战法，而是固步自封，保守老一套的战法。不少将领始终认为侵略军长于水战而短于陆战，因而一直忽视加强陆地纵深设防。水战方面，第一次鸦片战争已经证明，利用火船、火筏等原始方法对付以帆力为主的敌舰，尚且收效甚微，而此次仍用这种老办法对付运转灵活的蒸汽炮艇，显然更难奏效。前线将领中，如叶名琛、谭廷襄等固然纯属军事上的门外汉，就是颇受咸丰帝器重的僧格林沁，也同样墨守成规，不能因敌因势制宜。他既不善于使用正兵，更不善于使用奇兵，又不虚心采纳正确意见，以致大沽失守，一败再败。他虽是骑射出身，却不会灵活地指挥骑兵作战。这次战争中的骑兵作战，是近代史上中国骑兵与欧洲骑兵第一次交锋。由于僧格林沁没有根据武器装备敌强己弱，战场情势敌人侧后暴露等特点，首先使用步兵与敌接战，待敌进攻队形出现混乱时，再使用骑兵冲击，更没有大胆使用骑

《胜保奏请将城守布置并飞召外援以资夹击折》，《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七），第2359页。

兵绕击敌人侧后，断敌交通线，袭敌后方及炮兵，以致虽有优势的骑兵，不但未能充分发挥其作用，反为敌人所败。

（三）不敢依靠和支持人民群众抗击侵略者

中国人民，特别是遭到侵略军铁蹄蹂躏的广东和津京地区的人民群众，为了保卫社稷和家园，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用各种形式打击敌人，使侵略者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可是，和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一样，人民群众不屈不挠的反侵略斗争，得不到清政府的支持。本来，统治阶级中的某些人，从第一次鸦片战争时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以及后来反对英国侵略者进入广州城的斗争中，看到了人民群众是制服侵略者的可靠力量。当受到侵略军再次严重威胁时，就连咸丰帝也曾下令动员民众抗击侵略者。可是，他们又害怕群众发动起来之后危及其反动统治，因而总是多方束缚群众的手脚。另一些人，则公开把人民群众看成比侵略者更为危险的敌人。叶名琛在战前曾下令血腥屠杀广东起义群众十余万人。谭廷襄则叫嚷“从来御外以靖内为先”。1858年英法联军占领天津前夕，天津的一些铺户、船民、盐民等要求彼此联络，共御外侮，桂良等竟把这种正义行动说成是“民情汹汹”，“盗贼四起”，并进行压制。统治者依靠装备落后、战法笨拙的政府军打不赢外国侵略者，又不敢让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参加抗战，结果只有走丧权辱国、妥协投降的道路。

二、第二次鸦片战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第二次鸦片战争对中国社会所造成的后果，比第一次鸦片战争更为严重。由于战败，清政府被迫作出全面让步，完全满足了外国侵略者所提出的种种无理要求。公使驻京，使侵略者得以逐渐影响和操纵清政府的活动；大批新的通商口岸的开辟，使外国侵略势力扩展到沿海各省和深入长江中游；鸦片贸易的合法化以及有关通商、海关、税率的各种规定，使中国对于外国的经济侵略更加难于抗拒；允许在中国内地传教，加深了列强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并为传教士进行非法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英国强租九龙、沙俄割占东北大片土地，使中国的领土完整遭到极大的破坏。总之，这次战争的失败，使中国社会加深了半殖民地化的程度，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更加深重的苦难。

在战争中，侵略军不仅攻占了两个重要省城，而且兵不血刃地侵入了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心脏北京，皇帝逃出都城，“天朝大国”的虚弱本质暴露无遗，这就进一步助长了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扩张野心。

这次战争以后，清朝统治者公开与外国侵略势力勾结起来，共同镇压农民起义武装。1861年11月，咸丰帝在热河病死后不久，继位的同治帝（清穆宗载淳，年仅六岁）的生母叶赫那拉氏勾结奕訢等人，发动宫廷政变，夺

取了最高统治权。她进一步执行勾结外国侵略者的政策，公开实行“借师助剿”的方针，企图依靠外国侵略者的军事力量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而英、法、美、俄等国为了确保通过两次鸦片战争签订的各种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种种殖民特权，也乐意帮助清政府镇压中国人民起义。在中外反动派进一步勾结的情况下，太平军和捻军等起义武装的处境变得更加困难了。

第四章 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后期）

（1856年9月—1866年2月）

第一节 天京内讧后的战争形势

1856年，太平军继西征战场转败为胜之后，又先后攻破了威逼天京数年之久的江北、江南大营，太平天国革命再次出现了有利的形势。可是，与此同时，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内部危机日益加深，洪秀全与杨秀清之间，杨秀清与韦昌辉、石达开之间的矛盾越来越表面化，终于在当年秋天发生了可悲的天京内讧。这是太平天国战争史上最大的转折点。

总揽宗教、政治、军事三权于一身的杨秀清，成了太平天国领导集团之间各种矛盾的焦点。他有出色的政治和军事才能，但“自恃功高，一切专擅”，以致天王洪秀全“徒存其名”。太平军一破江北、江南大营之后，杨秀清先则将北、翼、燕诸王立即分派离京，继则假托“天父神旨”，公然逼迫洪秀全封他为“万岁”。洪秀全迫于杨秀清的权势，当面应允，暗中则采取措施，伺机铲除杨秀清。

当时，北王韦昌辉在江西战场，翼王石达开在湖北战场，燕王秦日纲在丹阳前线。9月1日夜，韦昌辉率三千余人从江西秘密赶回天京，随即对东王府发动突然袭击，于次日晨将杨秀清及其家属、近臣全部杀害。接着，韦昌辉又对杨秀清的部属进行了大屠杀，太平军将士和群众二万余人罹难，在天京造成了严重的恐怖。10月初（一说9月中旬），石达开从湖北赶回天京，责备韦昌辉滥杀无辜。不料韦昌辉又想加害于他，石达开便连夜逃出天京，其家属则被韦昌辉全部杀害。于是，石达开从安徽、湖北等地调集四万大军，集中于安徽芜湖、宁国府（今宣城）一带，准备回京讨韦。

韦昌辉的大规模屠杀和擅专朝政，激起了天京内外太平军将士和群众的极大愤慨。在此情况下，洪秀全下诏将韦昌辉处死，同时被杀的还有参与大屠杀的燕王秦日纲等约二百人。事后，洪秀全派人将韦昌辉等人的首级送安徽宁国府交石达开验看，并召其回京辅政。约11月底，石达开回到天京，延续两个多月的天京内讧，至此暂时告一段落。

石达开是东、西、南、北、翼五王中的仅存者，加之智勇兼备，在太平军中夙有声望，并为清军将领（包括曾国藩）所畏惮。因此，由他辅政，受到天京军民的拥护和欢迎。但是，内讧的阴云并未因此消散。洪秀全从天京大变乱中错误地汲取教训，自此之后，他只信任洪姓族人，排斥异姓。他在委托石达开辅政后不久，又加封其长兄洪仁发为安王，次兄洪仁达为福王，

张德坚：《贼情汇纂》，《太平天国》（三），第46页。

太平天国封王之后，天王洪秀全称“万岁”，东王杨秀清称“九千岁”，西、南、北、翼各王依次递减一千岁。

并让他俩与石达开同主朝政，以牵制和监视石达开，最后并有图害之意。石达开既无法施展其才能，更害怕遭到与杨秀清相同的命运，便于 1857 年 5 月底离京出走。

石达开被迫出走，实际上是天京内讧的继续。由于天京内讧和石达开从天京及其它地区带走大量部队，太平天国的元气大伤，整个战争形势也随之急剧逆转。

在江苏战场，江南大营的击破和向荣的死去，曾使清军遭到沉重打击。但由于天京内讧，给了敌人以重整旗鼓的机会。1857 年 7 月 16 日，清军攻陷句容，12 月 27 日又攻陷镇江和瓜洲，太平军守将吴如孝逃回天京。1858 年 1 月，清军恢复江南大营，再次围困天京。

在湖北战场，由于石达开东返天京，清军加紧围攻武昌。太平军守将韦志俊因困守已久，又不见援兵到来，加之其兄韦昌辉在天京被处决，丧失了坚守的决心，遂于 1856 年 12 月 19 日放弃武汉。武汉一失，鄂东各州县随之不守，太平军的湖北根据地全部丧失。

在江西战场，湘军于 1857 年 10 月 26 日攻陷湖口和梅家洲，被太平军分割二年多的湘军内湖与外江水师得以重新会合，这一带的长江水面又被湘军控制。1858 年 5 月 19 日，九江城被新任浙江布政使李续宾所部湘军攻破。驻守该城近五年的太平军将领林启容率部进行了英勇的巷战，一万七千名将士全部牺牲。

太平天国虽然处于十分严酷的形势之下，但由于以下种种原因，没有发展到迅速崩溃的地步。

第一，当时全国仍处在革命高潮之中，北方的捻军、南方的天地会，以及西南各族人民的起义战争，正在蓬勃发展，方兴未艾，使得清王朝顾此失彼，忙于招架，客观上给了太平天国革命以很大的支援。

第二，1856 年 10 月，英、法等资本主义列强，为了在中国攫取更多的殖民特权，悍然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虽然实行妥协求和政策，但也不得不以很大的注意力和相当一部分兵力去对付外国侵略者，于是相对地减轻了对太平军的压力。

第三，石达开虽然离京出走，但他率军远征东南各省，吸引了一部分清军兵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清军对天京方面的压力。

第四，活跃在安徽战场的陈玉成和李秀成所部太平军，积极进击，顶住了清军沿江东下的势头。先是李秀成被围于桐城一带，势孤力单，后于 1857 年 1 月初与陈玉成在枞阳商定了破敌之策，确定对包围桐城之敌采取大包抄。1 月中旬，陈玉成自宁国渡江北上，占无为、巢县，转攻庐江，然后直

《翼王石达开出走告示》称：“去岁遭祸乱，狼狽赶回京，自谓此愚衷，定蒙圣鉴明；乃事有不然，诏旨降频仍，重重生疑忌，一笔难尽陈。疑多将图害，百喙难分清”。（见《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 93 页。）

《石达开自述》称：“洪秀全……有谋害达开之意，旋即逃出金陵。”（见《太平天国》第三册第 781 页。）

趋桐城。李秀成也率部出城，与陈玉成部协同，夹攻桐城外围之敌。2月24日，大败福建提督秦定三等所部清军，并乘胜于27日攻克舒城。3月初，太平军克六安，接着挥师北上，与捻军胜利会师。捻军接受太平天国的领导后，在淮河中游向清军展开积极进攻，牵制和削弱清军兵力，使陈玉成得以率军进入湖北，在鄂东地区转战经年，阻扼鄂军东犯，稳住了皖北太平军根据地。

正是这些客观条件，使太平天国得以继续坚持革命战争。

第二节 石达开率军远征与最后失败 (1857年5月—1863年6月)

1857年(咸丰七年)5月底,石达开自天京出走,率领听其指挥的数万部队,在苏皖交界处的铜井镇渡江,途经无为,于6月中旬抵达安庆。一路上,他到处张贴布告,阐明离京出走的原因,并表示要继续忠于太平天国的事业。石达开出走后,天王洪秀全曾派人将“义王”金牌一道及合朝文武要求他返回天京的表章送达安庆,争取他回朝辅政。这时,石达开应从太平天国的全局利益出发,立即返回天京,与洪秀全同心协力,共挽危局;即使暂不回朝,亦应协同在江北的陈玉成部对清军进行反击,或进军江南,打击围困九江等地之敌,以解天京上游之危。但石达开不顾全局利益,竟南进江西,招集旧部,独立进行新的远征。

一、进军江西

1857年10月初,石达开率部离开安庆,由安徽建德(今东至东北)进入江西,在景德镇会集各部,分路南进,经乐平、万年(今万年西),于10月21日占领安仁(今余江东北)。11月10日,石部与由闽入赣的杨辅清等部(约四五万人)会师于贵溪,联合攻城未下,遂西走东乡,于11月底到达抚州,与原驻该处的余子安部会合。12月初,派兵一部经进贤、丰城,西援临江(今清江西南)和吉安。吉安位于赣江西岸,1856年冬即遭湘军围困。石部到达之前半月,东岸的吉水已落入湘军手中,故要解吉安之围,须先攻下吉水。石部对吉水先后发起三次进攻,均为湘军所败。这时,石达开听取元宰张遂谋的意见,决定放弃西援临江和吉安的计划,准备东进浙、闽。1858年(咸丰八年)1月初,石部经永丰、峡江、新淦(今新干)退回抚州。原驻江西各地的太平军,也陆续前来会合。2月26日,石部由抚州东进,3月19日败清军于上饶,进围广丰。因久攻不下,于4月15日撤围,经玉山入浙江,占领江山。杨辅清部则仍入福建,与石部分道而进。

石达开部南进之初,太平军在江西的兵力仍占很大优势(约十余万人),如坚持西援吉安、临江,给湘军以沉重打击,即可在江西开创新的局面。无如石达开轻率地放弃西援计划,东进浙江,结果继1858年1月22日临江失陷之后,九江、抚州、吉安等地也于同年夏秋先后失守,以致江西局势急转直下,使天京上游太平军的作战增加了困难。

具体数目不详。据《陈凤曹禀六安州总制》称：“翼王见天王疑忌实深，故私自出京，誓不回去，随后络续随翼王而出京者，官员兄弟约有五、七万人，将来天京必定空虚”。（见近代史资料增刊《太平天国资料》——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6页。）

元宰系石达开出走后新置的官职之一。

二、转战闽浙

石达开率军占领浙江江山后，从4月20日开始，自统大军围攻衢州（今衢县），另由国宗石镇吉率兵一部连占常山、开化、遂昌、松阳（遂昌东南）、处州（今丽水）、缙云、永康、武义、云和、宣平（遂昌东）等州县，控制了浙西南大片地区，牵制了相当数量的清军。

石达开部由江西东入浙江时，江南大营清军正在围困天京，清廷判断石部入浙的主要意图是抄袭苏常，回救金陵，于是命在湘守制的曾国藩（曾于1857年春由江西返湘奔父丧）统率在赣湘军，东援浙江。其实，石达开并无回救金陵之意，在衢州久攻不克的情况下，于7月14日撤围南行，越仙霞岭南趋福建。石镇吉部也奉命由浙入闽。8月中旬，石达开与石镇吉、杨辅清、杨义清等部会师于福建浦城。但杨辅清、杨义清随即率部返回江西，脱离石达开，后取道皖南回援天京。

8月底，石部继续南进，于30日攻占建阳，不久又西占邵武。石达开的战略目标是经赣南、湘南西入四川，因此，9月22日又撤离邵武，分军两路前进：石达开自统大军于10月中旬抵达福建汀州（今长汀），18日占领江西瑞金；石镇吉等率部直趋赣南，于江西新城（今黎川）为湘军刘长佑部所阻，不得已退回福建，经建宁、宁化到达汀州。此后，石镇吉等也率部脱离石达开单独行动（后经广东、湖南进入广西，1860年4月在广西百色被清军消灭）。

曾国藩自受命统兵援浙之后，7月中旬离湖南湘乡，8月底到达江西南昌，9月中旬抵赣东河口镇（今铅山）大营。随着石达开部向南推进，曾国藩又于10月中旬移驻江西建昌府（今南城）。

12月2日，石达开部由瑞金南进会昌，后经安远、信丰，于1859年（咸丰九年）1月3日攻克江西南安府（今大余），11日又克崇义。

当时，陈玉成、李秀成两支太平军主力，先后取得了二破江北大营和三河镇歼灭战的胜利，杨辅清部已攻克江西景德镇，长江南北又出现了太平军较为有利的形势。但石达开部却孤军南趋，“势乱而无纪，气散而不整”，战斗力已大不如昔。曾国藩命道员张运兰部由赣东之建昌驰援景德镇，命道员萧启江部四千余人继续尾追石部。萧部于2月18日进至南康，随即向南安府逼进。月底，石部弃南安、崇义，进入湖南境内。

三、围攻宝庆

石达开部由江西进入湖南后，于1859年3月2日占桂阳（今汝城），

曾国藩：《陈明石逆情形片》，传忠书局光绪二年版（下同）《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十，第35页。

中旬连下兴宁（今资兴）、宜章、郴州（今郴县）、桂阳州（今桂阳）、嘉禾，准备取道湘西进入四川。

湖南是湘军的后方老巢。石达开率领号称二十万人（实约十余万人）的大军由江西大举入湘，不仅震动了湖南当局，也影响了各地湘军的军心。湖南巡抚骆秉章等急忙从本省各地征调兵勇赶赴湘南防堵，湖北巡抚胡林翼还从湖北派兵往援。

石部攻占郴州、桂阳州后，本欲北攻衡州（今衡阳市），由于清军在常宁、耒阳一带防堵，乃转兵西向，由嘉禾经宁远北上，从4月6日开始围攻永州府（今零陵），因连连受挫，只得撤围，分兵两路北趋宝庆府（今邵阳市），于5月10日和24日先后到达宝庆城外。

宝庆是湘南重镇。太平军抵达时，清军已作了布防：城东由总兵周宽世部和道员赵焕联部防守，城南由副将田兴恕部驻守；城西的资江则由水师巡防。

石达开到达宝庆后，设大营于城南十里之澄水桥，傅忠信部配置于城东十二里之泥湾，赖裕新部配置于资江西岸之神滩渡，从东、南、西三面构成对宝庆城的包围。直至6月中旬，才切断北面通道，完成合围。

石达开部太平军所遗铁炮

从6月下旬开始，清军各路援军陆续抵达宝庆外围。25日，知府刘岳昭率部抵达城东四十里的洪桥。7月4日，道员刘长佑亦率江忠义、刘坤一所部到达宝庆城北三十里的严塘。两路援军自东北方向节节推进。不久，胡林翼从湖北派来的道员李续宜所率湘军五千余人（共十一营）也经益阳、兰田（今涟源）、新化进抵宝庆，使宝庆地区的清军总数达到近四万人。7月24日，奉命总统宝庆东路军务的李续宜与刘长佑等于高家冲（距城九里）商讨解围之策。刘长佑认为“东路势厚，且岩壑幽邃，不可用武”，李“乃定计由北路进攻”。

石达开得知清军援兵大至，于7月25日督率各部包抄清军高家冲大营，与敌大战于蓝江铺、清水塘等处。27日，李续宜趁东路鏖战之际，率所部自高家冲西渡资江，在水师配合下，攻陷了太平军在田家渡至清水塘一带的营垒和哨卡。28日，西路的赖裕新所部太平军向北路湘军发起反击，又被李续宜等部击败，伤亡数千人，遂纷纷撤至资江东岸。西线既破，宝庆城内外的清军得以联成一气。此后十余日内，双方休战对峙。

8月10日，清军再次发起进攻，前锋推进到贺家坳、龙王桥一线。石达开鉴于清军兵力已厚，宝庆难以攻克，决定改变进军路线，南下广西，乃于13日一面派兵进攻贺家坳的湘军营垒，以掩护退却，一面命宰制陈亨容等率

部南趋新宁，准备退路。8月14日晚，石部全线撤离宝庆外围，经白仓（今邵阳县南）南趋东安（今东安西南）。8月22日，各部由东安、新宁分别退入广西境内。

宝庆之战是石达开自天京出走以来所进行的规模最大历时最久（三个月）的一次作战。结果劳师费时，撤围而去。究其原因，一是敌已有备，而且援军大至，兵力相当雄厚；二是长途转战，部队攻击能力减弱；三是没有及早合围，尽快发起攻击；四是没有在城北部署打援兵力，阻止敌人增援。

石达开部从江西进入湖南，既属过境入川性质（这里姑且不论其入川是否可取），就应师行间道，不攻坚，不恋战，力求行动迅速，争取早日入川。可是，由于贪攻永州、宝庆，结果迁延时日，使清军得以在湖南集结兵力，实行围堵，从而丧失了进军四川的时机。

四、回师广西

石达开率军退入广西后，经兴安、义宁（今灵川西）、永福等地，于10月15日轻取庆远府（今宜山）。由于清军兵力不足，没有立即进逼，石部得以在此安然度岁，进行休整补充。但庆远一带是人口稀少的贫瘠山区，大军（由于沿途扩充，此时约有二十余万人）久驻于此，军需给养发生严重困难，因而士气低落，军心涣散，不断发生分化。1860年（咸丰十年）1月，先有傅忠信、谭体元等率部出走，继有郑乔等所率“花旗”部（即1855年底于江西参加太平军的原广东天地会部分起义武装）离桂返粤。不久，又有余忠扶部杀余入黔。由于敌军逼近，石达开于5月底弃庆远，率部南下，后进驻宾州（今宾阳东北）、武缘（今武鸣）一带。同年秋，彭大顺、童容海、朱衣点等又率部东走（后在江西会合复由广东北上的郑乔等部，众达二十万，1861年9月在江西河口镇并入李秀成部，重归天朝）。

鉴于众叛亲离，良将精兵尽去（当时仅剩万余人），石达开一度产生隐退的念头，但无安身之处。在无可奈何之中，他只得勉力支撑。幸好当时新任广西巡抚刘长佑等部清军正集中兵力进攻陈开领导的大成国起义军，为石达开继续在广西活动和重整旗鼓提供了机会。1861年（咸丰十一年）8月下旬，大成国的京城秀京（即桂平）失陷，不久陈开被俘遇害，其余部约三万人即投奔石达开麾下。于是，石达开的队伍得以扩大，号称十万，但战斗素质已远不如前。为开创新的局面，石达开决定重新打起远征四川的旗号。不久即率全军离开广西，北进湖南，伺机西入四川。

五、辗转入川

陈开是广东天地会起义军首领，1855年率部转移到广西，攻占浔州府（今广西桂平），建立“大成国”。

1861年10月下旬，石部自桂北进入湖南，进攻绥宁（今绥宁西南），后沿湘黔边境北进，经靖州（今靖县）、会同、沅州（今芷江）、泸溪、永绥（今花垣）、于1862年（同治元年）1月底经龙山进入湖北来凤，2月中旬又经湖北利川进入四川境。

在石部入川以前，清廷除责令新任四川总督骆秉章饬令川东镇道督率兵勇严密堵剿外，又责令湖广总督官文、新任湖北巡抚严树森督饬在防将弁，会同新任湖南巡抚毛鸿宾等所派各部，实行“三面兜剿”，企图将石部一举歼灭于湘鄂川黔边界。由于四川清军主力未能及时赶到川东前线，清廷的上述计划未能实现。

石达开率军入川后，于1862年2月20日占领川东石砭厅（今石柱）。因北有大江阻隔，只好沿长江南岸向西推进。4月上旬攻涪州（今涪陵）不下，5月上旬攻綦江又不下，乃西走合江，入贵州仁怀厅（今赤水），复折入四川，于5月26日占叙永，6月16日克长宁（今珙县东）。由于沿途扩军，石部总数又达十余万。不久，各地清军赶到，北进之路受阻，不得不折而东走，于8月中旬再经贵州仁怀厅境趋建义、黔西，10月20日进围贵州大定府（今大方）。这时，一度曾随石镇吉行动的宰制曾广依部也来会攻，但终未攻克大定。于是，石达开率部西走毕节，入云南境；为了牵制清军，派宰制李福猷会同曾广依率部南走水城、郎岱（今贵州六枝西南），然后西入云南。

石部进入云南后，又分兵三路入川：宰辅方元祥等率数万人从川边屏山县进入，东趋叙州府（今宜宾市）；宰辅赖裕新率二三万人经昭通、东川（今会泽），西渡金沙江，北攻四川宁远府（今西昌），“使官兵不能兼顾”；石达开自率本部大军由镇雄北进四川，于11月18日占领筠连，22日进占高县，并前出到横江镇、双龙场、玉黄楼一带，与方元祥部夹横江为营，伺机由横江顺流而下，抢渡金沙江，进图叙州府。不久，李福猷、曾广依部也前来会合。四川总督骆秉章为阻止石部入川，急调各路清军密集横江两岸：先调云南提督胡中和及总兵何胜必、萧庆高督军由犍为驰赴叙州以南，“相机截剿”；继调总兵唐友耕部由江安疾趋庆符，按察使刘岳昭部由綦江驰赴长宁、珙县。云南巡抚张亮基在叙州闻警，也派参将杨发贵率部赴安边铺（叙州西南）协防。12月下旬，清军连续向石部发起进攻，双方互有伤亡。1863年（同治二年）1月1日，清军进逼横江镇，同时大败横江西岸的方元祥部。1月8日，清军又大举进攻双龙场。石达开挥军迎敌，将清军击退。此后，

赖裕新所部太平军于1863年3月进抵宁远地区后，屡被清军所败。3月23日，再败于越嶲（今四川越西）一带，赖裕新阵亡。余部由郑永和统率北走，于5月中旬到达陕西汉中，与扶王陈得才所部太平军会师。

《石达开自述》，《太平天国》（二），第781页。

参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三百二十八，第30—31页。

战事呈胶着状态。1月30日，刘岳昭、胡中和等再次率部猛攻双龙场。由于石达开的部将郭集益等暗中通敌，石部大败，伤亡惨重，不得不于次日全部撤离四川，复入云南，驻扎于昭通一带。

六、石达开部的覆灭及其教训

1863年3月，石达开决定兵分两路，再次进军四川。自统西路，沿金沙江西行，伺机渡江北进；李福猷统率东路，绕道贵州北上入川。

3月24日，李福猷率队分路入黔，一由镇雄趋毕节，一由昭通趋威宁、水城。5月初，全部由仁怀东趋遵义。5月底，又自遵义、桐梓一带东进，经绥阳抵婺川（今务川）。7月，自婺川西攻正安不下，乃入四川境。8月下旬，经酉阳、彭水，进至黔江。

石达开于5月12日率三四万人自云南昭通进入四川宁远府境。四川总督骆秉章与布政使刘蓉早已沿大渡河严密布防：署雅州府（治今雅安）知府蔡步钟就近募勇，配合总兵唐友耕等部扼守北岸安庆坝至万工汛大小渡口；松林地（今石棉西北）土司千户王应元率“土兵”扼守松林河，并调胡中和部驻扎于化林坪（今泸定南）一带，以为声援；都司谢国泰部守猛虎冈，控制通打箭炉（今康定）之路；邛部（今越西东北）土司岭承恩率兵控制越嵩大路各隘，以逼迫石部“入夷地小径”，然后“从后路包抄”。清军如此层层设防，对不熟悉当地地形而又孤军深入的石达开部来说，几如陷阱。

石部由宁远北进时，侦知越嵩大路有敌军扼守，便以“土人”为向导，绕经冕宁，抄小路北上，直抵大渡河边的紫打地（今安顺场）。紫打地在崇山峻岭之中，大渡河横亘于前，松林河及察罗河分隔左右，又逢大雨，河水骤涨，敌军严守对岸渡口，石部实难飞渡。石达开只得命令部队搭棚驻扎，赶造船筏，准备强渡。5月21日，以四五百人强渡大渡河未成，船筏全毁，伤亡甚众。后决定西渡松林河，冀由泸定桥直趋天全，因遭土司王应元等部的阻击，西进计划又告落空。嗣后，清军四面逼攻，石部弹尽粮竭，陷入绝境。石达开曾致书王应元等，许以重金“买路”，但遭拒绝，乃于6月3日令所部分两队突围。一队抢渡大渡河，一队抢渡松林河，均未成功。他见大势已去，令妻妾五人、幼子二人投河自尽，自带五岁幼子石定忠及宰辅曾仕和等四人于6月13日前往清军营垒，幻想牺牲自己，保全部众。岂知反动派决不刀下留情，他们将石部所剩七千余人全部处死，并将石解往成都。8月6日，石达开于成都从容就义，时年三十三岁。

进至黔江的李福猷部得悉石达开在大渡河全军覆没的消息，乃放弃入川会师的计划，东入湖南永绥，然后沿湘黔边境南下，经会同、绥宁重入广西，于10月9日攻占龙胜。10月17日，又经兴安东趋灌阳。此时，李福猷与其

参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三百四十七，第15—16页。

弟李福忠发生分裂。李福猷自率一部由灌阳东入湖南道州、江华，活动于粤桂边境，年底被清军消灭。李福忠则率部经湖南城步、通道入贵州，后在湘桂黔边区坚持斗争，直至 1871 年 8 月失败。

石达开于 1857 年率部出走后，行程数万里，进行了历时六年的远征，最后终于在四川大渡河畔全军覆没，这个历史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石达开率军他走，不符军心民意。随着其错误行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加上孤军远征，困难越来越大，广大将士感到前途渺茫，以致分化和投敌事件层出不穷，直至在广西境内发展到众叛亲离的地步。

石达开率军远征的目标是进入四川，这是他在起义初期就提出过的进军方向。四川是清王朝的战略要地之一，又利于割据，倘能入据该省，实行正确的方针政策，反抗清王朝的统治，对全国革命自然是有利的。但石达开在当时形势下，以其所处的战略位置（远离四川），不依靠革命势力强盛的江、浙、皖、赣，而孤军远征四川，胜利的把握是不大的。在进军过程中，石达开在作战指导上又缺乏一个正确的方针，东奔西走，强攻坚城，以致劳师费时，给了敌人以部署防御的时机。经过广西大分化之后，老部队所剩无几，而清廷已调骆秉章及万余湘军加强了四川的防御，石达开不能根据变化了的情况，放弃进军四川的计划，改取联合西南各族人民起义军共同反清的方针，以积聚力量，等待时机，再图大举，而是不顾主客观情况，执意进川，结果一败再败，造成全军覆没的可悲结局。

石达开在太平天国前期战争中不愧为著名的战将，但自率部脱离天京之后，孤军冒进，没有后方的支持，没有友军的配合，成了流寇式的草莽英雄。尽管一度拥有号称数十万之众，却没有打过多少象样的胜仗，一直摆脱不了被动的处境，最后终于陷入绝地，被数量有限的清军和土司部队所歼灭。石达开这位“绝世英物”，竟成了清军的俘虏，这决不是什么“恶运使然”，也不是偶然发生的不幸，而是他政治上不顾大局，军事上实行流寇主义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第三节 二破江北大营与三河镇大捷 (1858年8月—11月)

石达开出走后，安王洪仁发、福王洪仁达掌握了太平天国的军政大权。由于他们毫无军政才能，朝中文武大臣不服。1857年10月，洪秀全改以蒙得恩为正掌率，陈玉成为又正掌率，李秀成为副掌率，代替安、福二王执政。次年，洪秀全又提拔了一些年青将领，恢复了早期的五军主将制，封陈玉成为前军主将，李秀成为后军主将，李世贤为左军主将，韦志俊为右军主将，蒙得恩为中军主将兼正掌率，掌理朝政。这些措施，对稳定政局起了一定作用。然而，在军事上，太平天国当时面临的形势仍然是十分严酷的。继1857年底镇江、瓜洲失守之后，1858年1月，江南大营的清军进扎天京高桥门、龙脖子，进逼秣陵关；江北大营则于1858年春移驻天京对岸之江浦、浦口，会同江南大营，缩小对天京的包围圈。同年5月，九江失守，天京的西面屏障安庆也受到湘军的直接威胁。直至同年9月和11月太平军取得二破江北大营与三河镇大捷之后，形势才为之一变，基本上扭转了天京内讧以来太平天国在军事上萎靡不振的局面。

一、枞阳会议

为解天京之围，李秀成于1858年3月底请命出京，途经芜湖，与其弟李世贤商定，“一人敌南岸，一人敌北岸”。不久，李秀成自率部将陈坤书等五千余人，分别由芜湖和东梁山渡过长江，齐集含山，于5月8日再克安徽和州（今和县），接着又连占全椒、滁州（今滁县）、来安。

由于天京被围日紧，南郊板桥、大胜关已被敌攻陷，七桥瓮、印子山、雨花台也处于敌军的直接威胁之下。李秀成日夜焦虑，在全椒加紧操练部队，准备先扫清江浦、浦口之敌，以安定天京人心。6月5日，他率兵五千余人自全椒进扎江浦大刘村，拟取道桥林进攻江浦、浦口。次日，江北大营统帅德兴阿督军万余进攻大刘村。时适大雨滂沱，太平军疏于戒备，以致寡不敌众，初战失利，损失千余人，新旧营垒十三座尽失。这使李秀成意识到，单凭一军之力，难解天京之围，于是行文各路将领，约定在安徽枞阳举行会议，共商救京办法。

8月上旬，李秀成与陈玉成、李世贤等将领于枞阳商定：先由陈玉成、李世贤等率部攻克安徽庐州（今合肥市），然后由吴如孝率部在庐州东北一

《蒙时雍家书》载：“正掌率二千岁，爵同王位。……掌握重权，总理国事”。见《太平天国》（二），第756页。

参见《洪仁玕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553页。

《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498页。

带活动，牵制胜保所部清军，陈玉成则率主力速进滁州东南的乌衣镇一带，会同李秀成部全力进攻江北大营。

枞阳会议使李秀成、陈玉成等人“各誓一心，订约会战”，并制定了较正确的作战方针，为再破江北大营以解京围奠定了基础，因而在太平天国后期战争历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二、再克庐州与二破江北大营

1858年8月11日，陈玉成、李世贤、吴如孝三部联合行动，由舒城三河镇向庐州逼进。当时，新任安徽巡抚翁同书尚未到任，庐州城内仅有清军数千，由副都统麟瑞督率驻守，另由新任安徽布政使李孟群带勇万人驻守南郊。8月23日晨，太平军两万余人从西、南两个方向直逼城垣。清军未及交锋，即纷纷惊溃（李孟群部西逃六安）。当天中午，太平军即进占庐州城。

太平军再克庐州，清廷上下为之震动。咸丰帝立即任命胜保为钦差大臣，督办安徽军务，所有皖境各军均归节制。同时，谕令湖广总督官文从沿长江东下的鄂军中分派劲旅，赴援庐州；谕令德兴阿从江北大营中酌拨马步官兵，前往庐州“协剿”。清廷严令胜保及各路将领务必将庐州即日收复。

太平军的主要进攻目标并非庐州，而是江北大营，因此，未等清军援兵赶到，陈玉成早已挥军由界牌直趋滁州，于9月中旬抵乌衣一带，与自全椒进抵该处的李秀成部会师。在此之前，吴如孝按约率部自庐州北进，占店埠镇（今肥东）及其东北之梁园，进逼定远，以牵制胜保军。

当时，江北大营统帅德兴阿拥有兵勇一万五千余人，以浦口、江浦之间的陡冈、安定桥、小店（今永宁镇）一带为重点，分驻于西至江浦石碛桥（今桥林）、高旺，东至瓜洲、三汊河，北至来安、施官集的广大地区内，绵延二百余里；长江内则有水师巡船往来游弋，以资接应。战前，德兴阿得意地说：“各路马步兵勇，或多或少，择要分布，有警则奋勇向前，贼多则添拨援应；海全一军驻扎石佛寺，无论何处紧急，皆可策应。”他认为攻守都有把握，但作战结果表明，清军的这种分散部署，正好给了太平军以各个击破的极好机会。

李秀成、陈玉成两部太平军会师乌衣之后，众达数万，与江北大营清军相持。9月26日，德兴阿派出部队由小店进攻乌衣。太平军奋起迎战，大败清军，歼敌三四千人。27日，太平军乘胜向小店发起猛攻，击败由江南大营来援的总兵冯子材部五千人。陈玉成部于是冲破清军陡冈军营，直下浦口，在从九袱洲渡水前来的太平军配合下，再次大败敌军，并将浦口一带的清军营垒全部烧毁。清军见后路被袭，阵势大乱，纷纷夺路而逃。德兴阿先逃六合，后由水路逃往扬州。陈玉成部随即于29日占领江浦。至此，江北大营

再次被摧毁，清军前后损兵万余人。太平军攻破江北大营之后，恢复了天京与江北的联系，保障了对天京的供应。同时，大大地鼓舞了士气，为夺取三河镇大捷创造了条件。

二破江北大营之后，李秀成率部东进，于10月4日占仪征，9日占扬州。清军不战而逃，德兴阿北逃邵伯镇。15日，江南大营帮办军务张国梁率兵六千余人由镇江渡江北援，李秀成以兵力单薄，于21日弃守扬州，继又退出仪征。在李秀成率部东进的同时，陈玉成率部由浦口北攻六合，由于道员温绍原据城死守，直至24日才攻克。

江北大营惨败后，清廷将德兴阿革职，并决定撤去江北大营建制，江北军务由江南大营统帅和春统一节制。

三、三河镇大捷

1858年5月，浙江布政使、湘军悍将李续宾率部攻陷九江后，湖广总督官文、湖北巡抚胡林翼等即拟订“东征计划”，准备乘胜东援安徽。不久，李续宾即率部渡江，返回湖北。同年8月，太平军攻克庐州，官文便命令“李续宾迅速进兵，攻克太湖，即乘势扫清桐城、舒城一路，疾趋庐州，会图克复，兼扼贼匪北窜”。所以，当陈玉成、李秀成部挥师东向，进攻江北大营时，江宁将军都兴阿和李续宾等即率兵勇万余人自湖北东犯安徽，9月22日陷太湖，然后分兵为二：都兴阿率副都统多隆阿和总兵鲍超所部进逼安庆，李续宾率所部湘军北指庐州。

李续宾部于9月27日陷潜山，10月13日陷桐城，24日陷舒城，接着指向舒城东面五十余里的三河镇，准备进犯庐州。

三河镇位于界河（今丰乐河）南岸，东濒巢湖，是庐州西南的重要屏障。该镇原无城垣，太平军占领后，新筑了城墙，外添砖垒九座，凭河设险，广屯米粮军火，接济庐州、天京，因而在军事上、经济上都居重要地位。时太平军守将为吴定规。

10月24日，陈玉成刚克六合，即接到湘军大举东犯安徽的报告，便毅然决定回兵救援。并启奏天王，调派李秀成部同往。

11月3日，李续宾率精兵六千进抵三河镇外围。11月7日，

分兵三路向镇外九垒发起进攻：义中等六营进攻河南大街及老鼠夹一带之垒；左仁等三营进攻迎水庵、水晶庵一带之垒；副右等二营进攻储家越之垒。李续宾则亲率湘中等二营为各路后应。太平军依托砖垒顽强抵抗，大量杀伤敌人，但由于己方伤亡亦众，便放弃镇外九垒，退入镇内。

《剿平粤匪方略》卷二百零一，第39页。

参见胡林翼《胡文忠公全集》（世界书局版）上册，第284页。

在湘军进攻三河镇外围的当天，陈玉成率大队赶到，扎营于三河镇南金牛镇一带。11月14日，李秀成也率部赶到，驻于白石山。至此，进抵三河镇一带的太平军众达十余万人，军势大壮。

在太平军强大援军的威胁下，李续宾的部将曾建议退守桐城。但李一意孤行，认为“军事有进无退，当死战”，竟于11月15日深夜派兵七营偷袭金牛镇。次日黎明，当行至距三河镇十五里的樊家渡王家祠堂时，与陈玉成军遭遇。太平军且战且走，将敌人诱至设伏地域。当时大雾迷漫，咫尺莫辨，湘军偷袭部队经太平军勇猛冲杀，死伤过半，队伍星散。李续宾闻报，亲自率兵四营往援，连续冲锋数十次，均不得入。驻扎于白石山的李秀成部闻金牛镇炮声不绝，立即赶往参战；驻守三河镇的吴定规也率部出城合击清军。李续宾见势不妙，逃回大营，并传令各部坚守待援。实则这时守垒的湘军有的已经逃散，有的被太平军阻截在外，因而有七个营垒迅速被太平军攻破。接着，李续宾的大营也被太平军包围。他督军往来冲突，终不得脱，当夜被太平军击毙（一说自杀）。之后，太平军继续围攻负隅顽抗的残敌，至18日，全部肃清。这一仗，太平军一举消灭湘军精锐近六千人，是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后期一次出色的歼灭战。

陈玉成、李秀成于三河大捷之后，即乘胜率部南进。时舒城之敌已退守桐城，陈、李两部便共同往攻，于11月24日夺取该城。都兴阿所部清军于太湖与李续宾部分军后，即进逼安庆，10月15日攻占安庆北面门户集贤关，继而配合杨载福部水师，围困安庆。及至李续宾大败于三河镇，接着舒城、桐城又被太平军占领，都兴阿恐太平军从侧后抄袭，遂于11月27日撤安庆之围，经石牌（今怀宁）退驻宿松。太平军随即克复潜山、太湖二城，扩大了占领区，改善了安庆的防御态势。

湘军三河镇之败，主要原因是孤军犯险。李续宾仅率八千余人自湖北东犯，入皖之后，连陷四城，处处分兵驻守，结果，“兵以屡分而单，气以屡胜而泄”。进至三河镇后，仅剩六千人，当太平军大队赶到时，已无阻援之兵可派。加之李续宾刚愎自用，拒不接受部将关于退守桐城的建议，终于全军覆灭。对于湘军的这次惨败，咸丰帝闻之“不觉陨涕”。曾国藩“哀恸填膺，减食数日”。胡林翼则哀叹说：三河败后，“军气已寒，非岁月之间所能复振”。又说：“三河败溃之后，元气尽伤，四年纠合之精锐，覆于

李滨：《中兴别记》，《太平天国资料汇编》第二册下，第663页。

湘军三河之败，其被歼人数说法不一。曾国藩《复左季高》谓“此次歼我湘人殆逾六千”，《复刘霞仙》则谓“歼我湘人殆近六千”。（以上见传忠书局光绪二年版《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七第8页、第23页。）然胡林翼称：李续宾进至三河时，“所带不过五千人”。又说：“三河、桐城僨事，实亡五千人。”（以上见世界书局《胡文忠公全集》上册第284页、下册第698页。）此处姑从曾说。

《剿平粤匪方略》卷二百一十，第26页。

《剿平粤匪方略》卷二百一十，第27页。

一旦，而且敢战之才，明达足智之士，亦凋丧殆尽。”可见此战对清廷和湘军的打击是极为沉重的。

太平军之所以能打这样漂亮的歼灭战，主要由于决心正确果断，兵力集中，战术比较灵活。当湘军进抵舒城、三河时，陈玉成果断地决定兼程回援，并奏调李秀成部同往，形成了兵力对比上的绝对优势。在对敌发起进攻时，太平军采取正面迎战与伏击、抄袭相结合的战法，各部之间密切协同，主动配合，迅速分割包围敌人，打得湘军前后左右不能相救，终将李续宾及其所部彻底歼灭。

通过三河大捷，太平军粉碎了湘军东犯的图谋，保卫了皖中根据地，对鼓舞士气，稳定江北战局，保证天京安全和物资供应，都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胡林翼：《复胜克斋钦使》，世界书局《胡文忠公全集》下册，第 694 页。

杜文澜《平定粤寇纪略》称：三河镇之战，湘军与太平军相比，“不及二十分之一”。（《太平天国资料汇编》第一册，第 121 页。）清廷《上谕》称：此战，李续宾“以五千兵勇，当十余万之贼”。（世界书局《胡文忠公全集》上册，第 290 页。）

第四节 二破江南大营与东征苏常沪 (1860年2月—8月)

太平军于1858年下半年取得二破江北大营与三河镇大捷两次重大胜利后，战争形势有了较明显的好转。1859年洪仁玕到达天京后进行的某些革新，又使太平天国的政治局面有了某种程度的改进。正是这些条件，促成了1860年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与东征苏常等一系列军事行动的胜利。

一、二破江南大营作战方针的提出

1859年6月，当石达开率军围攻湖南宝庆时，清廷为阻止太平军入川，曾命曾国藩亲自统兵前往四川扼守。8月，石部自湖南退入广西后，清廷又命曾国藩暂缓入川，改援安徽。10月，曾国藩与官文、胡林翼等共同制订了一个“四路图皖”的计划，准备再次进攻安徽。同年底，曾国藩自湖北移营安徽宿松，胡林翼移营安徽英山，向皖西太平军根据地步步进逼。

在天京对岸，当1858年冬陈玉成、李秀成会师三河镇之际，留守滁州、全椒的李秀成部将李昭寿（原系捻军，后加入李秀成部）被钦差大臣胜保招抚，于11月1日献城降清。1859年2月底，与李昭寿关系密切的江浦守将薛之元又投降清军。不久，浦口等地也落入敌手。这样，皖北与天京之间的联系又被隔断。为了打通联系，陈玉成、李秀成于1859年3、4月间曾先后两次率军进攻江浦、浦口，但均未得手。其后，陈、李两军转战于六合、仪征、扬州、天长、盱眙、来安、滁州间，企图诱使清军分兵，乘隙夺回浦口、江浦。直到11月间，在击败署湖北提督周天培等部清军后，才占领浦口，并围攻江浦，稍解天京之围。此后，李秀成率军留守浦口一带，陈玉成则率军返回皖西战场，对付东犯之湘军。

1859年4月，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由香港抵天京，颇为洪秀全所器重，不久即被封为“开朝精忠军师顶天抚朝纲干王”。洪仁玕总理朝政后，撰写了《资政新篇》等著作，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提出了一些改革措施，使太平天国的领导力量有了某种程度的加强。但洪仁玕的被重用，引起了一些“老兄弟”的不满。洪秀全便加封前军主将陈玉成为英王，加封李秀成为忠王，使这一矛盾基本上得到了解决。但在同年10月，又发生了右军主将韦志俊于皖南池州（今贵池）降清的事件；幸其部将纷纷反对，被他带走的人马不多。

综观1859年的形势，太平天国既出现了新的希望，也存在不少困难，特别是天京仍处于江南大营清军的包围之下，总的形势依然相当严酷。

曾国藩奏称：进兵安徽，须分四路。“南则循江而下：一由宿松、石牌以规安庆；一由太湖、潜山以取桐城。北则循山而进：一由英山、霍山以取舒城；一由商城、六安以规庐州。”（见《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十一，第24页。）

面对上述情况，李秀成一再向洪秀全“强奏”，要求率军离开浦口，设法攻打江南大营，以解京围。这一要求最后得到了洪秀全的应允。关于如何解围问题，李秀成与洪仁玕进行过三次面商。洪仁玕认为：“此时京围难以力攻，必向湖、杭虚处，力攻其背。彼必返救湖、杭，俟其撤兵远去，即行返旆自救，必获捷报也。”李秀成同意这一计谋，便与洪仁玕共同确定了如下作战方案：（一）由李秀成、李世贤率部“伪装纓帽号衣，一路潜入杭、湖二处”，攻敌之所必救，以吸引和调动江南大营清军；当出现上述情况时，立即放弃浙江杭州和湖州（今吴兴），由小路回师天京，围攻江南大营。（二）由英王陈玉成执行“虚援安省”的任务，在皖北实施佯动，以掩护江南之作战行动。整个作战由李秀成负责组织实施。

二、奔袭湖杭与回师天京（参见附图六）

1860年1月底，李秀成将镇守浦口的任务交给部将黄子隆、陈赞明后，即前往芜湖，召集将领会议，说明天京被围的危急形势，宣布攻杭救京的计划，明确进军路线和各将领的任务。2月10日，李秀成率陈坤书、谭绍光、陆顺德等部二万余人到达南陵，后经清弋江镇和马头镇，绕过宁国府，于24日攻占广德，留陈坤书、陈炳文率部守城，以备接应，自率谭绍光、陆顺德、吴定彩等部轻装疾进浙江。为掩护李秀成主力的进军，李世贤率部由南陵经泾县，进占旌德、太平（今太平东），留新任右军主将刘官芳在这一带活动，自率大军东入浙江，29日与李秀成部会师于安吉（今安吉北）。3月4日，李秀成、李世贤两军大败清军于长兴西南的虹星桥，并进占长兴。然后分军为二：李世贤率部佯攻湖州，以牵制清军；李秀成则率领精兵六七千人冒充清军，日夜兼程进袭杭州。

3月11日，李秀成所率精兵进至杭州城外。时杭州城除满营外，仅有兵勇二千八百余名。19日太平军轰塌清波门城垣，由一千三百五十人组成的先锋队立即冲入城内，攻占杭州，杀死浙江巡抚罗遵殿等多人。惟杭州将军瑞昌等踞守的满城，未能攻下。

江南大营统帅和春得知太平军入浙，即于3月10日派总兵张玉良等率兵二千由六合往援。咸丰帝深恐失掉浙江这个财赋之区，严令和春增调劲旅赴浙（后又命和春兼办浙江军务）。和春只得遵旨加拨援兵，江南大营“先后调援者不下一万三千人”，统归张玉良率领。太平军攻陷杭州四天之后，即3月23日，张玉良所率援兵才到达杭州城外。

李秀成见调动江南大营清军的目的已经达到，便于3月24日在城内遍插旗帜以为疑兵，连夜撤出杭州，率军疾驰北返。28日过临安，循天目山走

《洪仁玕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553页。

《剿平粤匪方略》卷二百三十六，第22页。

小路北趋孝丰（安吉西南），4月4日抵广德。4月8日，于安徽建平（今郎溪）召开了有辅王杨辅清、侍王李世贤（4月3日率部由湖州撤围西返）、右军主将刘官芳、定南主将黄文金、平西主将吴定彩、求天义陈坤书等参加的军事会议，共同商定了解救天京之围的详细计划。会后，即分东西两路进援天京。

西路由杨辅清、黄文金等率领，从安徽宁国府东面的洪林桥一带出发，于4月12日占江苏高淳，18日占溧水（浙江提督郑魁士败走镇江），23日占秣陵关。29日，分兵两支：一由杨辅清、黄文金率领指向雨花台，一由刘官芳、陈坤书率领进逼高桥门。

东路又分左右两翼：右翼由李世贤率领，于4月13日占领溧阳，15日攻宜兴，16日迫常州，以牵制东面清军，尔后回师西向，于23日占领句容。左翼由李秀成亲率本部，经溧阳进占赤山（句容西南）。27日，李秀成部自赤山、李世贤部自句容分进合击淳化镇（今江宁东），次日大败帮办江南大营军务、江南提督张国梁部清军，克复该镇。

当李秀成率军回师天京之际，在皖北执行佯动任务的陈玉成、吴如孝等率军由全椒南下，于4月底渡江，经江宁镇抵板桥、善桥一带。

三、摧毁江南大营

清军江南大营于1858年初重建后，统帅和春设大营于沧波、高桥两门之间。不久，强征数万民夫，于天京城外挖掘深阔各约丈余的长壕，绵亘百余里，经年始成。1860年1月底，李秀成离浦口后，江南大营清军水陆并进，攻陷了浦口沿江一带太平军垒卡二十余座，并于2月1日占领江浦和九洑洲，进一步围困天京。

4月底，各路太平军抵达天京外围，众达十余万人，在扫清清军外围据点后，随即准备总攻江南大营。总攻部署是：李世贤部自北门洪山、燕子矶，李秀成部自尧化门，刘官芳、陈坤书部自高桥门，杨辅清部自雨花台，陈玉成部自善桥方向，五路并进。天京城内的太平军则由城内出击，配合援军夹攻清军。

5月2日，太平军发起总攻。是日天气晴朗，但从当晚开始降雨，连日不止，太平军冒雨连续进攻。

5月4日，陈玉成部于上河镇、毛公渡一带搭造浮桥数道，进攻天京西南清军营垒外墙。城内太平军也纷纷出击。5日，陈玉成部突破敌军在天京西南所筑长壕。当天，城内太平军抛掷的火罐落入清军副将雷安邦营内，引

1859年6月4日，和春奏称：“此时金陵围攻，自城北之上元门至西路之三汊河、乐心寺江干止，共长一百三四十里，大小营盘约一百三十余座，兵勇约四万有奇。”（《剿平粤匪方略》卷一百九十五，第5页。）

起火药轰发，该部随即外逃。附近清军闻之大惊，也纷纷撤出营外。太平军乘敌人混乱之机，前后夹攻，半日之内，将江南大营西半部的五十余座营垒全行攻破，歼灭清军总兵黄靖以下数千人。张国梁闻西路有变，率兵往援，见营盘已失，只得仓皇退回，破坏上方桥，企图固守小水关以东各营垒。太平军突破敌西南长壕，内外会师，重围已解，士气更高，便连夜乘胜猛攻。清军军营四处火起，江南大营总部所在地小水关大营也被攻破，和春等率残部经石埠桥乘船逃往镇江。江北及九洲洲一带清军也随即逃遁。于是，重建后围困天京两年多的清军江南大营又被摧毁。太平军缴获了大量枪炮、火药、铅子，以及白银十余万两。

二破江南大营，是太平天国战争史上最为“得意之笔”。洪仁玕、李秀成等正确地选择杭州作为“攻敌必救”的目标，调动和分散江南大营清军的兵力，然后回师急攻，内外夹击，使数万清军陷入被动挨打地位，这一着是颇为成功的。

太平军在此次作战中不仅有变内线作战为外线作战的正确方针，而且有周密的计划。在进军浙江和回攻江南大营之先，都召开了作战会议，统一了各将领的认识，明确了各自的任务，因而在作战过程中能做到齐心协力，所向披靡。确如李秀成所说：“如欲奋一战而胜万战，先须联万心而作一心。”

此战成功之处，还在于集中了优势兵力。清军江南大营，筑有号称“万里长壕”的坚固工事，即使在分兵援浙之后，仍拥有较为雄厚的兵力。为歼灭这股清军，太平军集中了天京周围可能集中的十余万军队，因而在四五天之内，即彻底摧垮了和春、张国梁苦心经营了两年多的江南大营。

洪仁玕、李秀成等在作战指挥上比较灵活，注意了主攻、助攻、掩护、佯动相结合。进军浙江时，由陈玉成部在皖北佯动，以迷惑和牵制敌军；由皖南进军杭州时，先则由李世贤部分兵活动于旌德、太平一带进行掩护，继则由李世贤率军进攻湖州进行牵制，以保证李秀成部进攻杭州的胜利；由浙江回师天京时，一度派出一支部队进占溧阳，摆出东攻苏常的架势，以迷惑敌人，保障进攻江南大营之战的顺利进行。

在这次作战中，太平军也有不足之处。主要是作战目标只图解围，因而进攻江南大营时，既未注意切断敌军的退路，又未能在敌退却时迅速组织截击和追击，虽然攻破了大营，但仅毙敌三五百人，基本上打了个击溃战。由于太平军只注意迅解京围而没有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因此和春、张国梁等逃至镇江后，又得以收集残兵败将二万余人，防守镇江和丹阳。

许瑶光：《谈浙》卷三，《太平天国》（六），第594页。

《李秀成自述》称：“和、张军死者三、五千人，散者多也，散下稣[苏]常”。（见《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508页。）*

四、东征苏常

1860年5月11日，洪仁玕、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杨辅清、刘官芳等在天京庆贺解围作战的胜利，并商议下一步进兵之策。陈玉成主张救援安徽。李世贤主张南取闽浙。洪仁玕和李秀成则主张先取长江下游，他们认为：“为今之计，自天京而论，四〔西〕距川、陕，西〔北〕距长城，南距云、贵、两粤，俱有五六千里之遥。惟东距苏、杭、上海，不及千里之远。厚薄之势既殊，而乘胜下取，其功易成。一俟下路既得，即取百万买置火轮二十个，沿长江上取。另发兵一支，由南进江西，发兵一支，由北进蕲、黄，合取湖北。则长江两岸俱为我有，则根本可久大矣。”洪秀全采纳了洪仁玕、李秀成关于先取苏常、后攻天京上游的主张，命令李秀成率军东征苏常，并限期一个月完成任务。李秀成会同李世贤、杨辅清、黄文金等联合东进。与此同时，陈玉成率部渡江往攻扬州，以牵制江北清军，使其不得南渡救援苏常；刘官芳等则率部折回皖南，屏障天京西侧。

5月15日，东征大军数万人由天京出发，当天占领句容，19日大败清军于丹阳城外，并攻占该城。清军死伤万余人，湖北提督王浚等被击毙，和春等逃往常州，张国梁在逃跑时于丹阳南门外落水溺死。

太平军攻克丹阳后，继续追歼溃敌。5月22日，开始逼攻常州。当时，由浙江折回的总兵张玉良驻扎常州城外，所部不满万人。由于两江总督何桂清未战先逃，清军“胆气愈寒”，只顾劫掠，毫无斗志。26日，太平军攻克该城，和春逃至苏州西北的浒墅关，愧惧交集，自杀身死。张玉良率残兵退守元锡。5月30日，太平军占领无锡，张玉良等败退苏州。6月2日，太平军进抵苏州城下，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在内应和群众的配合下，太平军轻取苏州城，杀江苏巡抚徐有壬、署按察使朱钧等多人，收降清军五六万，并缴获大批洋枪洋炮。

在李秀成、李世贤、杨辅清等部进攻常州的同时，陈玉成督军进逼扬州，因作战失利，旋即挥师西向，于6月2日再攻安徽全椒，中旬又撤围南返天京。

东征太平军占领苏州后，即向周围扩大战果：李秀成分兵一部继续东进，于6月间连占昆山、太仓、嘉定、青浦，7月1日攻克松江；李世贤部于6月13日攻克吴江后，继续南进，于15日攻占浙江嘉兴，准备进军杭州；杨辅清部也于6月中旬一度占领浙江长兴，后经江苏宜兴西入皖南。

太平军在苏州的军营

《洪仁玕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553—554页。

《李秀成自述》称：“天王严诏下颁，命我领本部人马去取常、稣〔苏〕，限我一月肃清回奏。”（见《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508—509页。）

太平军自 5 月 15 日从天京出发，在一个半月内，即占领了长江三角洲除上海等以外的大部地区，取得了开辟苏常根据地的重大胜利。太平天国将这个经济上最富庶的地区置为苏福省，建立了地方政权，鼓励发展生产和贸易，使之成为尔后数年间源源供给天京财粮的重要基地。

五、进攻上海

太平军攻占苏常之后，李秀成决定乘胜进图上海。他认为：“今有挑选勇将千余，勇兵数万，势如山岭之坚”，攻取上海，“犹如囊中取物”。其实，进攻上海，不仅有军事问题，而且有外交问题，情况十分复杂。

上海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列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1843 年《虎门条约》又规定，英国可在上海设“居留地”，即所谓“租界”。其后，美、法租界亦相继设立。租界自设“工部局”，不受中国当局治理，俨然成了“国中之国”。至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上海已成为中外贸易的主要商埠。因此，外国侵略者必然竭力将它控制在自己手中。

当太平军进军苏常，兵锋渐渐逼近上海时，英法侵略者即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亟谋对策。当时，第二次鸦片战争尚未结束，过往上海的英法侵略军甚多，英法公使有恃无恐，便于 5 月下旬居然以维护商业为名，宣布“保卫”上海。与此同时，以道

华尔率领的洋枪队

员吴煦和上海巨商杨坊为首的一批买办官僚，一方面向英法积极求救，一方面雇用美国流氓华尔出面组织“洋枪队”，公然与太平军为敌。6 月初，华尔在上海募得外籍水手、流氓二百余人，经过短时间的训练，便于 7 月初进袭刚被太平军陆顺德部攻占的松江。华尔本想利用黎明进行偷袭，但洋枪队均系无赖之徒，抵达城外仍酗酒喧哗，走漏了风声。太平军严阵以待，当敌人接近城墙时，伏兵骤起，奋力攻击。洋枪队大败，华尔率残部狼狈逃回上海，不得不重新组建。7 月 16 日，洋枪队在七千名清军的配合下，依仗洋枪洋炮，攻陷了松江。8 月 2 日，华尔又率洋枪队三百人，携大炮二门、小炮数门，进犯青浦，并有清军万人（由参将李恒嵩率领）在后接应。此时，李秀成已率精兵自苏州来援，守军斗志倍增。因此，洋枪队虽然在炮火掩护下一度登上南城，终因众寡悬殊而败退，共计死伤一百人（三分之一），华尔

也五处受伤，全部火炮及炮船均被太平军缴获。华尔裹伤赴沪，补充兵员和军械后，又回到松江。8月9日，洋枪队和清军再犯青浦，太平军兵分两路，冲出城外进行包抄，迫使其丢下枪炮，逃往松江。李秀成督军追击，于8月12日夺回松江，并决定乘胜进攻上海。

在此以前，洪仁玕和李秀成在外交方面进行过一番努力。李秀成曾于6月下旬致书英国驻华公使，说明进取上海之必要，阐明太平天国的对外政策，表示愿与各国友好往来，并邀请他来苏州面商。其后，洪仁玕也致书英、法、美各国驻上海领事，告以他将于苏州与各国公使会晤。但英法侵略者决心以武力阻挠太平军接近上海，因此，其驻华公使对李秀成、洪仁玕发出的照会，竟未予拆阅，拒不答复。

由于英法侵略者如此无理，李秀成等决定乘战胜洋枪队之余威，夺取近在咫尺的上海。这时的上海，人口三十余万，驻有清军万余人，英法军二千人左右。8月16日，太平军由青浦、松江两路并进，前锋于17日进抵上海西南的七宝、虹桥一带。18日，李秀成再次致书上海各国公使，声明太平军到上海后，不扰外人，并请悬挂黄旗，以便识别。随后，李秀成仅率随从三千人亲抵徐家汇，准备去“接收”上海。李秀成对外国侵略者决心与太平军为敌这一情况估计不足，加上寄希望于驻沪两广兵勇的投诚内应，故有如此轻率之举。当天，风雨大作，太平军随即占据附近之罗家湾。蔡元隆、郜永宽两部进至上海城外之九里桥，大败清军。于是，李秀成督军直逼上海县城西、南两门。正准备入城之际，突遭英法军的猛烈射击。太平军未予还击，只是摇手示意，请勿放枪，要求通话；但侵略者不予理睬，继续射击。太平军前进受阻，伤亡数百人，只得后撤。19日，太平军再次抵近县城，又遭英军射击，依旧未予还击。20日，后续太平军三万人进至上海城郊，李秀成督军由西门外转向英租界，于跑马场附近又遭英军袭击。同时，停泊在苏州河中的两艘英舰也发炮轰击。在此情况下，太平军只得后撤徐家汇。

太平军多次进攻受阻，且发觉内应无望（准备起事的两广兵勇事前即被江苏巡抚薛焕镇压），乃于8月24日撤离上海。当时，张玉良所部清军反攻嘉兴甚急，守将求援，李秀成便率全军往援。

洪仁玕、李秀成决定进攻上海，以为可以轻取，反映出当时太平天国的领导者对外国侵略者的本质和外交斗争的复杂性缺乏认识，因此，在没有调集足够兵力，进行必要准备与合理部署的情况下，便贸然行动，把希望寄托在列强的中立和清军内应的配合上，结果两者落空，唾手而得上海的愿望顿成泡影。这样，不但长了敌人的志气，而且耽误了以后攻鄂救皖的时间。在

《李秀成自述》称：此战，“杀死鬼兵六、七百人，得其洋枪二千余条，得其大炮十余条，得洋庄一百余口，得其舟只数百余条”。（见《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511页。）按：这些数字有所夸大。

1860年7月上旬，李秀成曾接到部属禀报：“尚[上]海有两粤兵勇三千余人，情愿投诚前来。”（参见《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186页。）

英法侵略者尚未撕下“中立”外衣，并未主动向太平军进攻的情况下，太平军本应暂缓进逼上海，在占领苏常之后立即回师西进，集中力量打击对自己威胁最大的湘军，发展和巩固天京上游的根据地。果如此，则尔后形势的发展将会有所不同。

第五节 安庆会战 (1860年9月—1861年9月)

安庆是天京上游的重要门户，它的得失，对太平天国后期战争的全局关系极大。按照1860年5月天京军事会议作出的决定，太平军东取苏常，是为“合取湖北”准备条件；而“合取湖北”，实际上又是为了保卫以安庆为主的安徽根据地（最终是为了保卫天京）。所以，从1860年9月以后，尽管战场很宽，烽烟遍及大江南北，但从全局来看，争夺安庆乃是战局的重点所在。安庆争夺战持续了一年之久，成为直接关系到天京安危的一场大决战。

一、双方战略意图与部署

江南大营崩溃后，清王朝将镇压太平天国的希望进一步寄托在曾国藩及其湘军身上。早在1860年春，湘军即在鄂军配合下大举入皖，推进到宿松、太湖、潜山、霍山一线。太平军进行二破江南大营作战时，湘军正积极准备继续东犯，进围安庆。同年6月8日，当李秀成等率军东征时，清廷以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赏加兵部尚书衔，令其“即统率所部兵勇，取道宁国、广（德）、建（平）一带，径赴苏州，相机兜剿，以保全东南大局”。但曾国藩认为，要保江南，必须先控上游，因而对于咸丰帝的谕令，他总是强调兵力不敷而消极拖延。曾国藩认定安庆为必争之地，“目前关系淮南之全局，将来即为克复金陵之张本”。因此，令其弟曾国荃率湘军近万人相继进扎安庆北面的集贤关，于城外开挖长壕二道，前壕用以围城，后壕用以拒援。但在咸丰帝的一再催促下，曾国藩不得不将围攻安庆的任务交给曾国荃，自率万人（半数以上为“新募之卒”）于7月初自宿松开赴长江南岸，月底立大营于皖南祁门，摆出一副东进苏常的架势。实际上，曾国藩心有成算，他把湘军主力和战将留在安庆周围，自己进至江南，不过是为了应付清廷，并牵制南岸太平军，以掩护北岸湘军夺取安庆。

1860年8月10日，清廷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所有大江南北水陆各军，统归其节制，随后，又接连催促他体察情形，进兵江浙。曾国藩以“皖南安则浙江亦安”为由，拒不应命，其战略意图仍

顾祖禹在《读史方輿纪要》中称：“安庆者，金陵之门户也。”（中华书局1955年版，卷二十六，第1218页。）

《剿平粤匪方略》卷二百三十八，第6页。按：当时苏州已被太平军占领，但清廷尚未得报。

曾国藩：《通筹全局并办理大概情形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十一，第43页。曾还认为：安庆“为武昌、九江之门户也，水师得此城，则有所依附以为根本也，以绝金陵贼粮之源，以杀江、淮各贼犄角之势也。”（《书札》卷十）

然是千方百计夺取安庆。同年9月，湘、鄂军已深入安徽腹地：在江北，副都统多隆阿率鄂军万余人进攻桐城，提督杨载福率湘军水师破枞阳、攻池州，与围困安庆的曾国荃部声势相联。在江南，道员张运兰率湘军四千由徽州（今歙县）取道旌德进援宁国府；总兵鲍超部湘军六千余人攻泾县；道员李元度也率新募之湘勇三千余人自湖南开抵祁门。曾国藩则坐镇祁门调度指挥。

对太平天国来说，安庆同样是生死攸关的必争之地。1853年2月，太平军自武汉进军金陵时，曾攻克安庆，旋即弃守。同年5月，太平军自天京西征，于6月10日再占安庆，即设西征军大本营于此。从那时起，安庆就成为仅次于天京的政治、军事中心。自1858年夏九江失陷之后，安庆就成了天京上游唯一的重要屏障。安庆一旦有失，湘军便可直窥天京，严重威胁太平天国统治中心的安全。

按照1860年5月天京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一俟下路既得”，即应“沿长江上取”湖北。由于安庆已为湘军所困，救援安庆便成了太平军的当务之急。同年9月下旬，天京最高当局决定再次采用“围魏救赵”之计，即按原定方针进军湖北，以期安庆不救自救。根据这一目标确定的进军部署是，兵分五路，江南江北并进：陈玉成率军从长江北岸西进，经皖北入鄂东；李秀成率军从长江南岸西进，经皖南、江西进入鄂东南；杨辅清、黄文金率军沿长江南岸趋赣北；李世贤率军经徽州入赣东；刘官芳率军攻祁门曾国藩大营。以上五路中，李秀成和陈玉成两路取大钳形攻势，预定次年春会师武汉，占领湘、鄂军的后方基地，以调动围攻安庆之敌；后三路主要是牵制皖南和江西湘军，并伺机歼敌。每路兵力少者数万，多者十余万。

二、“五路救皖”计划的落空（参见附图七）

（一）陈、李“合取湖北”半途而废

1. 陈玉成部的作战行动

陈玉成是救援安庆的积极倡议者。他于9月30日率军自天京北渡，10月10日即占领皖北定远之炉桥，14日西围寿州（今寿县），15日又分兵一部攻六安。20日从寿州撤围南走，一方面加强进攻六安的兵力，一方面进攻舒城，但均未奏效。11月26日，陈玉成联合捻军龚得树、孙葵心等部（共约十余万人），进至桐城西南的挂车河一带，扎营四十余座，试图直接救援安庆。12月5日，陈玉成部遭到多隆阿部鄂军万余人的进攻，稍有损失。以

咸丰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1861年4月8日），曾国藩致书曾国荃称：长江南岸各路太平军大约有李秀成、李世贤、杨辅清、黄文金、刘官芳五大部，每部“多者十余万，少者亦八九万”。（见光绪己卯年传忠书局刊《曾文正公家书》卷七，第25页。）

后，连续数日闭垒不战。12月10日，多隆阿部与新任安徽按察使李续宜所部湘军近万人（屯于新安渡）向陈玉成部联合发起进攻，南北夹击。正酣战间，都司雷正绾率领的步队七营、副都统温德勒克西率领的马队，“均由后路抄出”。“诸路并进，枪箭齐施，……围杀三时之久”。陈玉成部遭敌围攻，伤亡数千人（孙葵心也伤重身亡），损失惨重，不得不北走庐江，进行休整。1861年1月初，陈玉成又派兵一部进攻枞阳，被湘军水师总兵李成谋和游击韦志俊（太平军降将）所部击退。至此，陈玉成企图直接救援安庆的努力完全失败。

1861年2月，南岸的李秀成部已由浙入赣，正向西挺进中。陈玉成便按照“合取湖北”的既定方针，开始向湖北进军。2月26日，他先遣捻军孙葵心余部前往河南固始、汝阳（今汝南）等处，以牵制清军，掩护入鄂之师，然后于3月3日亲率数万大军西进。中旬，连下霍山、英山和湖北蕲水（今浠水）、黄州府（今黄冈）。22日，陈玉成在黄州府会见了英国参赞巴夏礼。巴夏礼借口维护英国的商业利益，危言耸听地“劝告”陈玉成不要进攻武汉。陈玉成果然上当，决定中止向武汉进军。除留赖文光率部驻守黄州府外，分兵数路，于3月下旬至4月中旬先后占领湖北蕲州、黄安（今红安）、德安府（今安陆）、孝感、黄陂、随州（今随县）、云梦、应城、麻城等地，但大都旋取旋弃。由于曾国藩等坚持“但求力破安庆一关，此外皆不遽与之争得失”的方针，鄂省后方空虚，因而太平军分兵攻取各地时，如入无人之境。当时，武汉及其附近的清军仅有一万人左右，如果陈玉成决心果断，坚决进军武汉，是有可能达到预定目的的。无如陈玉成一时失策，轻信外国殖民主义分子的讹诈，以致功亏一篑，铸成大错。1861年4月下旬，陈玉成鉴于安庆被围日紧（其眷属俱被困城中），又不见李秀成部如期入鄂，遂决计放弃“合取湖北”的计划，亲率所部东下，复直接驰援安庆。

2. 李秀成部的作战行动

1860年9月下旬，李秀成率部解嘉兴之围，班师苏州后，接到天王洪秀全令其提师赶赴上游的诏书。他随即将苏福省的军政事务交给陈坤书接任，

《剿平粤匪方略》卷二百五十六，第23—24页。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于1858年6月被迫与俄、美、英、法签订《天津条约》，增开汉口等十个通商口岸。1861年2月间，巴夏礼等随英国驻沪海军司令乘战舰西上汉口调查开埠事宜，事毕东返时，过黄州府上岸会见陈玉成等。

巴夏礼在给上级的报告中写道：我“劝告他（按：指英王陈玉成）不要计划攻汉口，因为无论叛军占据哪个我们设立租界的大商埠，没有不严重地损坏我们的商业的，因此他们的军事行动必须不与我们的商业活动相冲突。”“我再三向英王解释：‘……汉阳是彼此相关的武汉三镇之一，三镇组成一个巨大的贸易场，……太平军夺取其中任何一个城市，难免不损坏整个大商港的贸易，因此，我奉告你们必须远离该埠。’”（见《历史教学》1957年4月号第33—34页。）

曾国藩：《谕曾纪泽》，世界书局仿古字版《曾文正公全集》（四），“家训”第20页。

自率大军于10月初旬回到天京受命。

10月下旬，李秀成率军自天京出发，经安徽太平府（今当涂）、芜湖、繁昌、南陵、石埭（今广阳），于12月1日越羊栈岭进占黟县，离曾国藩的祁门大营仅六十里。正在进攻休宁的湘军鲍超、张运兰两部（共约万人）见后路被断，急忙回师反攻。2日，太平军稍却，退守黟县北面的卢村。3日，又与鲍、张两部战于休宁柏庄岭，阵亡数百人（曾国藩谓“毙贼四千余人”）。尽管李秀成部进入黟县对曾国藩震动极大（他当即给曾国荃等写了遗嘱性的书信），但李秀成根本无意进攻祁门，只图过境，因此，既受阻于湘军，便率部改道徽州，过屯溪，到婺源，继又折入浙江境内，在常山过年。

1861年2月中旬，李秀成部自浙江进入江西，经玉山、广丰、广信府，于3月中旬进攻建昌府未克，下旬进攻抚州府又未克，乃南趋崇仁、宜黄，4月4日又由乐安北占新淦，次日进占樟树镇（今清江）。由于赣江水涨及清军和地方团练的防堵，未能过江，便沿江南进，于19日自吉水一带渡过赣江，20日占吉安。22日，弃城北进，5月2日攻临江府不克，继续北上，连下奉新、瑞州府（今高安）、武宁、新昌（今宜丰），于30日占领义宁州（今修水）。6月上旬，分三路进入湖北：右路由武宁北攻湖北兴国州（今阳新）；中路由义宁州北攻通山；左路西攻通城。鄂东南一带群众约三十万人争相加入太平军，使李秀成部兵员大增，号称五十万。

李秀成部进入鄂东南后，前锋于6月中旬一度占领武昌县（今鄂城）。此时，李秀成接到赖文光发自黄州府的禀报，得知陈玉成部早已回师东援安庆，他对攻鄂本不甚积极，便于7月上旬令所部撤出湖北，折入赣西北地区。就这样，太平军又一次失去了一举夺占武汉的良机，两路“合取湖北”的计划至此彻底落空。

（二）杨、黄进军赣北失利

太平军攻克苏常之后，杨辅清率部经江苏宜兴进入皖南，于1860年6月23日占领广德，29日弃之，进攻宁国府。曾国藩根据清廷命令，于9月中旬派张运兰部湘军由祁门取道旌德前往救援。与此同时，李世贤部亦自浙江进入皖南，协同杨辅清围攻宁国府，终于在9月26日再次攻下该城。

同年12月初旬，杨辅清部自宁国府循长江南岸西进，于12月8日开始围攻建德。15日，与自芜湖西来会师的定南主将黄文金部数万人共同攻下该城。建德是曾国藩祁门大营与江北之间的交通孔道。建德一失，祁门与江北

《李秀成自述》称：过羊栈岭“是欲由移[黟]县出休宁县”。“此处俱是山高路小，一塞不能别行，我非是欲争此处，实上湖北……”。“当即改道，不由移[黟]县，由岳[箬]岭到徽州，过屯溪上婺[婺源]，到常山过年。”（见《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514页。）*

湘军主力之间的联系受阻，因此，曾国藩急忙派副将唐义训等率部往攻。太平军猝不及防，建德于12月28日复陷敌手。其后，杨辅清率部退回宁国府。在此以前，黄文金和营天义李远继等率部进入赣北，于12月20日攻占彭泽，22日李部占景德镇东北的浮梁，24日黄部攻湖口不下，次日南占都昌，李部则由浮梁西占饶州府（今波阳）。以上所占各地除饶州府外，不久即被湘军攻陷。

1861年1月5日，黄文金、李远继率军二万余人自饶州分数路东攻景德镇。由于左宗棠督军力拒，未能得手。7日再攻浮梁，又为左部击退。2月18日，湘军鲍超部（1月8日自皖南休宁经祁门来援）和左宗棠部与黄、李两军战于景德镇西北的洋塘谢家滩。湘军分三路进攻，太平军也分三路抗击，双方鏖战四小时之久。由于平分兵力，太平军伤亡甚众，黄文金等只得率余部退回建德境内，一部占据县城，大部据守金家村、黄麦铺一带。3月7日，鲍超商请皖南镇总兵陈大富率部列阵于建德城外，牵制城内太平军，自率所部湘军及左宗棠军一部，分三路向黄麦铺发起进攻。太平军再次失利，建德县城也于当日失守，遂被迫继续东撤，退到芜湖休整。

黄文金等率军进入赣北，“连陷数城，意在断祁门之粮路，解安庆之重围”。由于进攻景德镇和浮梁受挫，复有洋塘及黄麦铺之败，以致计划落空。

（三）击破曾国藩祁门大营良机的丧失

1860年9月下旬，李世贤部协助杨辅清部攻下皖南宁国府，随即南下，于10月6日攻占绩溪。10月8日，李世贤等督率四万余人进攻徽州，大败新任皖南道李元度所统湘军三千人及来自祁门的湘军援兵三千余人，于次日占领该城，12日又占休宁。10月16日，李世贤突然率部由徽州折回浙江，似欲牵制浙江清军，掩护刘官芳等部的行动。10月20日，李部占浙江严州府（今建德东）。11月下旬，又北占临安、富阳，一度进逼杭州，旋又北攻湖州。12月7日，因攻湖州不克，又西进皖南徽州，后与刘官芳部联络，作战于祁门附近地区。12月底，李世贤部自休宁逼近曾国藩祁门大营。刘官芳部则自北路破禾戌岭、羊栈岭，入黟县卢村，向祁门进逼，后为湘军鲍超部所败，退出羊栈岭外。1861年1月4日，李世贤部也被湘军张运兰部击败，退守黟县东面的兰田。6日，李世贤又分兵两路猛攻黟县东南的渔亭，仍未得手。

1860年6月，清廷命兵部郎中左宗棠只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准其返湘募勇六千名。同年11月初，左宗棠率所募湘勇自长沙经南昌开抵江西景德镇一带，屏蔽曾国藩祁门大营后路。从此，左部成为曾国藩所统湘军中的一支劲旅。

曾国藩：《官军破贼黄麦铺饶九境内肃清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十三，第25页。

刘官芳部退出羊栈岭后，屯于石埭一带。2月15日，探知鲍超部自大营援景德镇，便分兵二路，攻破祁门北面的大洪岭（距祁门六十里）和西北的大赤岭（距祁门八十里）。次日，西路进至距祁门四十里的历口，给曾国藩以极大震动。17日，太平军继续向祁门进逼，前锋进至离祁门仅十八里的石门桥，但遭到湘军副将唐义训部的伏击，败退至大赤岭外。

李世贤由于进攻祁门未果，乃于3月8日进占婺源，准备绕道江西，切断皖南湘军粮道，伺机反攻祁门。22日，败左宗棠军王开琳等部于婺源甲路，4月9日攻占景德镇，阵毙总兵陈大富等多人。左宗棠率部退走乐平，李世贤即传令东攻祁门。4月15日，李世贤在东进途中闻留驻江西的部队遭到左部反击，便不分主次，立即回军进攻乐平。在此以前，左宗棠“饬各营傍乐平县城东南，加修外壕，周十余里，令南乡团练入城固守，以作疑兵”，湘军则分守外壕。4月22日午刻，当李世贤部逼近外壕时，湘军“排枪轰击”。太平军“屡却屡前”，奋勇环攻，与敌相持至夜，并利用城外烧毁未尽的民房“穴墙开炮”，但终未攻克。23日，李世贤拟集中兵力攻敌一隅，乃调主力由城东北绕攻城西，予敌以大量杀伤。不意湘军以攻为守，分三路越壕出击，拚死力战，太平军不支撤退，于高桥阻于小溪，人马“自相蹈藉”，伤亡甚众。由于进攻受挫，李世贤随即率军东返浙江。于是，李世贤部和刘官芳部所担负的进军赣东和攻击曾国藩祁门大营的任务都未能完成。

本来，1860年底至1861年初，曾国藩祁门大营已陷于太平军的四面包围之中：西南的浮梁、景德镇一带有李远继部；东北的黟县山岭间有刘官芳等部；东南的休宁一带有李世贤部；南面有李秀成部方抵婺源。曾国藩势孤力单，岌岌可危。他在信中哀叹：“自十一月来，奇险万状，风波迭起。文报不通者五日，饷道不通者二十余日。”特别是李世贤部攻占景德镇之后，皖南湘军米粮无继，曾国藩感到“无日不在危机骇浪之中”。他曾移营休宁，亲自督军进攻徽州，企图打通浙江粮道，又告失败。在绝望中，他不得不写下遗书部署后事。其幕僚们也都惶惶然不可终日。及至左宗棠部湘军败李世贤部于乐平，曾国藩才感到“心绪略舒”，宛如绝路逢生。当时，皖南湘军不过三万人，其中半数为新募之勇，战斗力不强，而太平军在皖南的兵力总数一度十倍于敌，如果天京最高当局实行统一计划、统一指挥，及时协调前线各军的行动，对曾国藩的祁门大营步步紧逼，不断缩小包围圈，力求将其全歼或给以歼灭性的打击，则对整个战局将起重大的影响。可惜，各路太平军非但没有统一的作战指挥，而且根本没有会攻祁门大营的计划，以致

转引自曾国藩《官军破贼乐平鄱景浮乐一律肃清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十三，第49—50页。

《李秀成自述》称：“侍王李世贤在景得[德]战胜，到乐平一败，失去官军万余。……退由河口而下常山。”（见《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515页。）

曾国藩：《致四弟》，世界书局仿古字版《曾文正公全集》（四），第181页。

曾国藩：《致澄沅季弟》，光绪己卯年传忠书局刊《曾文正公家书》卷七，第26页。

丧失良机，使曾国藩及其湘军逃脱了在皖南覆灭的命运。

三、安庆的失守

（一）战前态势

自 1860 年夏初湘军围困安庆以来，守城太平军约二万人在谢天义张朝爵、受天安叶芸来率领下，坚守城池，以待援兵。

1861 年 4 月下旬，陈玉成弃鄂回皖，率军三万人由黄州等处经宿松、石牌，于 4 月 27 日进至安庆集贤关，逼近围城的曾国荃部湘军。4 月 29 日，陈玉成与城内守将叶芸来分别率部扎营于城东北的菱湖南北两岸，连夜筑垒十八座（北岸十三、南岸五），并以小艇沟通两岸联系。与此同时，天京当局鉴于“合取湖北”以救安庆的计划未能实现，决定由干王洪仁玕、章王林绍璋自天京率兵直接救援安庆；定南主将簧文金也率部自芜湖西援。1861 年 5 月 1 日，洪仁玕、林绍璋等会合桐城、庐江一带的吴如孝部，共二万余人，进至安庆北面的新安渡、横山铺、练潭一带，连营三十余里，谋与陈玉成部会师，共解安庆之围。曾国藩惊呼：“所有安庆官军曾国荃等各营，城贼扑之于前，援贼扑之于后，势殊危急。”他决心投入更大的兵力，与太平军决战于安庆，声称“贼以全力救安庆，我亦以全力争安庆。……迅克安庆，大局乃有挽回之日，金陵乃有恢复之望”。于是，一场争夺安庆的殊死搏斗展开了。

5 月 10 日，曾国藩自祁门移营至长江边上的东流，就近指挥；同时，将鲍超部六千人自景德镇调往江北（5 月 15 日抵石牌）。坐镇太湖的湖北巡抚胡林翼也调总兵成大吉部五千人赴援安庆。为对付陈玉成和洪仁玕、林绍璋南北两路援军，胡林翼提出了一个“南迟北速”的作战方针。他说：“打璋（林绍璋）、玕（洪仁玕）宜速，打狗（对陈玉成的诬称）宜迟、宜持重，（集贤）关内外无米粮，迫而蹙之，彼必求战，彼求战而我应之，必大捷。”

（二）直接救援安庆失利

5 月初开始，太平军与敌人在安庆城外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1 日，陈玉成及叶芸来部与湘军曾国荃部及杨载福部水师战于菱湖，未分胜负。2 日，多隆阿以所部近万人（4 月 30 日由挂车河进至安庆北面的高河铺）分四路向练潭和横山铺猛扑。太平军营地不坚，旋被攻破。驻新安渡的太平军一万余

曾国藩：《近日军情片》，《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十三，第 54 页。

胡林翼：《致曾观察》，世界书局《胡文忠公全集》下册，第 993 页。

人前往救援，多隆阿以三营步兵迎面对战，以五营步兵从侧翼攻击，以马队绕到后面攻击。太平军前后受敌，伤亡甚众，洪仁玕、林绍璋、吴如孝率余部退守桐城。3日，自芜湖来援的黄文金部太平军七八千人及捻军二万余人赶到，扎营于桐城东南的天林庄一带。6日，黄文金会同洪仁玕、林绍璋、吴如孝等督率三万人，分兵两路，主力直趋新安渡，一部（约五六千人）进攻鄂军挂车河老营。多隆阿由高河铺调步队十三营驰援新安渡，并调驻挂车河的记名副都统金顺率马队往援。待太平军接近新安渡时，多隆阿部从左右两翼进行包抄，金顺则率马队绕至香铺街，从后路截击。太平军以为中了埋伏，纷纷败退，撤回天林庄。进攻挂车河的太平军也被协领穆图善等部清军击退。黄文金等部为多隆阿部所阻，无法与陈玉成部会合，便撤出天林庄，退至桐城东面的孔城镇。

陈玉成见洪仁玕等所率援军受阻，而湘军总兵鲍超、成大吉两部又将来到，知安庆解围不易，便于5月19日留部将刘瑄琳、李四福、朱孔堂等率部据守集贤关内外各垒，自率马步五六千人绕道赴桐城，以便与洪仁玕等会商进军事宜。多隆阿闻讯，即派兵追击，使负责断后的黄金爱部太平军伤亡千余人。

5月20日，陈玉成抵达桐城，与洪仁玕、林绍璋等会晤，商定于23日分三路进攻挂车河之敌：陈玉成率四千人出挂车河之左，洪仁玕率七千人自江家桥由中路进攻，林绍璋、孙葵意率太平军和捻军共万余人由棋盘岭出挂车河之右。多隆阿事先得到了上述情报，决定“乘其布置未定，先发制人”，当即派出马队多起，分路设伏。24日黎明，太平军发起进攻，多隆阿亲率马步各营，“分兵五队，扬旗而出”，前三队三路迎战，后两队为预备队，“列队不动”。正酣战间，多军伏兵从太平军后方冲出，太平军阵脚遂乱，纷纷后退。多军乘势进击，太平军伤亡较众，不得不退回桐城。

在此以前，湘军援兵鲍超、成大吉两部共万余人已于5月20日抵达集贤关外，并立即进攻关外赤冈岭的四座太平军营垒，被刘瑄琳所部击退。此后，湘军改变战法，在赤冈岭附近修筑炮台数十座，从6月2日开始，不断对赤冈岭四垒实施轰击。8日，太平军三垒被毁，守将李四福、朱孔堂以下千余人或战死或被俘，惟刘瑄琳所在的第一垒仍顽强抵抗。9日，成大吉部奉调回援湖北（当时李秀成部正向鄂东南进军），鲍超部继续围攻刘瑄琳部。当日午夜，刘瑄琳等冒死向北突围，鲍超率马步兵追击。由于溪水泛涨，突围北走的太平军大多被湘军擒杀，刘瑄琳也被敌人俘虏，肢解处死。赤冈岭四垒守军（共约四千人）均系太平军精锐，此次全部被歼，使陈玉成部的战斗力大受影响。

7月1日，太平军平西主将吴定彩部（由苏北来援）自菱湖北向湘军发起攻击，被同知曾贞干所部击败。7月8日，曾国荃督军对菱湖南两岸的

十八座太平军营垒发动进攻，太平军因接连受挫，士气低落，以致数千人出降（结果均被杀），吴定彩率残部退入安庆城内。至此，安庆完全成了一座孤城，战局更加被动。

（三）安庆失陷及其教训

太平军继“合取湖北”间接救援安庆的计划落空后，直接派兵解围的努力又告失败，安庆城内守军被围年余，粮食告罄，出城降敌者与日俱增，形势极度恶化。

陈玉成在进攻挂车河受挫后，6月下旬于皖北无为会晤杨辅清，约其出兵共解安庆之围。7月下旬，杨辅清率部自宁国府出发，渡江后，经无为西进，会合陈玉成部，绕经六安、霍山、英山、宿松，于8月6日攻太湖不下，取道小池驿、黄泥港东趋清河、三桥头、高楼岭，直至马鞍山，由南面威胁挂车河多隆阿部营垒。与此同时，林绍璋、吴如孝率六七千人，自桐城西趋挂车河，黄文金率五六千人，自吕亭驿一带绕至姬公庙、麻子岭，以为策应。多隆阿自率马步各营迎战林、吴两部太平军，并派总兵雷正綰率队迎击黄文金部。8月7日，双方鏖战三小时，太平军不支，退入桐城。其后，太平军以一部驻桐城，牵制多隆阿军，以大部趋安庆，进攻湘军围师之背。8月21日至24日，陈玉成、杨辅清等部约四五万人，陆续进抵集贤关内，在关口、毛岭、十里铺一带扎营四十余座，安庆城内的太平军也列阵于西门一带，遥相呼应。25日和26日，陈玉成、杨辅清等督军向曾国荃部湘军后壕发起进攻，轮番冲锋，西北方向的进攻尤为激烈。曾国荃督率各营坚守营壕，待太平军逼近时，枪炮齐发，使太平军伤亡甚众。8月28日至9月2日，太平军每夜都对敌营进行袭击，并在菱湖北岸陆续建起了十余座营垒。9月3日夜，又发起猛烈进攻，同时用小船运米入城，但被湘军水师全部抢去。城外太平军无法攻破湘军的包围圈，城内太平军米粮枯竭，军心进一步涣散。

9月5日凌晨，湘军于北城用炸药轰塌城墙，纷纷登城，攻入城内，会同长江水师，南北夹击，滥肆屠杀。守城太平军全军覆没，叶芸来、吴定彩殉难，张朝爵乘船突围，不知所终。

安庆失守，标志着自1860年9月开始的太平军“五路救皖之策”的彻底失败。从此，太平天国后期战争形势更加恶化。洪仁玕说：“我军最重大之损失，乃是安庆落在清军之手。此城实为天京之锁钥而保障其安全者。一落在妖手，即可为攻我之基础。安庆一失，沿途至天京之城相继陷落不可复守矣。安庆一日无恙，则天京一日无险。”

在长达一年的安庆会战中，太平军动员了数十万兵力，与以湘军为主的清军进行了反复激烈的搏斗，最终归于失败，教训极为深刻。从战略上看，

《洪仁玕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555页。

太平军处于一种被动保守地位，为安庆一城的得失所左右，被迫同敌人进行战略性的决战，失掉了独立自主地组织使用自己力量的自主能力。同时，在会战指导上又犯了一系列错误。

第一，主要将领缺乏一致而坚定的决心。除陈玉成积极主张救援安庆外，其他主要将领李秀成、李世贤、杨辅清等，对于“五路救皖之策”的态度并不十分积极，以致西进的行动相当迟缓。当安庆极度危急之际，拥众数十万的李秀成由鄂返赣后，不主动配合陈玉成等部进攻安庆外围之敌，竟率部东返，更是严重影响了整个战局。

第二，主要将领决心不果断。陈玉成率部进入湖北后，竟轻信巴夏礼的讹诈，中止进军武汉，以致功败垂成。李秀成率部逼近武昌时，同样不坚决果断地夺取武汉，见陈玉成部东返，便折回江西。陈、李两部长途跋涉，徒劳往返，丧失了战场上的主动权。其实，尽管曾国藩和胡林翼都声称不论武汉能否保住，决不撤安庆之围，但如果陈、李两部坚决执行会攻武汉的既定方针，进而积极向湘、鄂腹地发展，直捣湘军和鄂军的老巢，还是能够调动安庆围敌的。李秀成部逼近武昌时，先则有成大吉部由安庆前线回援，继则有胡林翼自太湖率部沿江西上，亟援武昌，就是明证。

第三，缺乏集中统一的指挥。太平军最高当局虽有“合取湖北”以救安庆的总的战略意图，但既无详细的作战计划，又不指定前线最高指挥官，以致各路将领基本上处于各行其是的状态。李秀成、李世贤、杨辅清、黄文金等部虽然同属江南战场，但也互不统属，以致不能协调一致地给危如累卵的曾国藩祁门大营以歼灭性的打击，最后反被敌人各个击败。在江北战场，后期集中了较多的部队，身居要职的干王洪仁玕也一度亲临前线，但同样没有摆脱各自为战的状态，因而始终未能突破敌人的包围圈，解安庆之围。

第四，作战指挥主观急躁，不能根据敌人的特点采取适宜的战法。曾国荃等根据曾国藩不攻坚，不出战，坚守勿撤，长期围困的指示，一直深沟高垒，静待战机。太平军方面，则由于安庆被围日久，陈玉成等解围心切，作战指挥上表现出急躁莽撞。太湖、潜山未下，就攻桐城挂车河之敌，桐城外围之敌未除，又攻安庆围敌，结果徒劳兵力，一处也未能攻下。太平军没有稳固的后方，也没有可靠地控制通道，因而供应得不到保证，难以持久作战。敌军见其“意在速战”，于是采取“深沟高垒，姑作如不欲战之状”，“待其逼近求战，而后从容应之”的方针，使太平军屡攻受挫。陈玉成等不注意认真侦察和研究敌人的作战企图，不能针对敌人坚守长围和积极增援的特点，采取相应的对策。只是从迅速解围的愿望出发，多次仓促发动进攻。结果安庆之围未解，解围之兵先溃，终至城陷军灭，彻底失败。倘若能审时度势，有计划有准备地集中优势兵力（当时太平军在数量上占有优势），使用一部兵力以围制围（从围敌外面筑垒包围），主力则集中打援，力求调动敌

人，于运动中包围歼击之，待大量歼灭援敌而又疲困了围敌之后，再内外夹击，则安庆会战的结局可能大不相同。

第六节 李秀成部回师江浙与再攻上海 (1861年7月—1862年6月)

1861年7月中旬，李秀成中止进军武汉，率部由湖北退入江西义宁州和武宁一带后，竟置安庆和天京上游的严重局势于不顾，倾全力回师江浙。加之天京最高当局对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出现的中外反动势力进一步勾结起来共同镇压太平军的新形势认识不清，在李秀成部攻占杭州之后，决定再次进攻上海，最后上海未下，湘军却乘势进逼天京，以致太平天国革命战争的形势迅速恶化。

一、攻占浙江

1861年4月，李世贤部在江西乐平战败之后，即回师浙江，于5月初占领常山、江山，而后分路东进，连占遂安（今淳安西南）、寿昌（今建德西南）、龙游（今衢县东）、金华。6月，又连占遂昌、松阳、处州、永康。7月下旬，一度占领严州。9月底，前锋进抵诸暨、东阳一线，浙江西部和中部的广大地区已在太平军的控制之下。

同年7月19日，从湖北退入江西义宁州和武宁一带的李秀成部进占靖安，逼近南昌。曾国藩在东流闻讯，急调原拟援鄂的鲍超部七千人由宿松南渡长江，经九江驰援南昌。8月14日，李秀成率部由瑞州府进向临江府。24日，鲍超率部经瑞州南下，李部随即东渡赣江，屯于樟树镇一带。27日，李部分三路沿赣江北攻南昌，在丰城为鲍部所败。李秀成不敢恋战，于30日率部东趋抚州府，围城多日不克，而鲍部将至，乃于9月8日撤围东走。16日，在河口镇一带会合自广西东返的石达开旧部汪海洋、朱衣点、童容海等部及天地会众共约二十万人。之后，李秀成便率领号称七十万人的大军，进入浙江。

10月5日，李秀成部开始围攻浙江衢州，不克，11日撤围东走，过兰溪北上严州，与正在围攻该城的李世贤部会合。随后，李秀成率部北进，连下新城（今富阳西南）、临安，于20日占领杭州西面的余杭，进逼省城。接着，陆顺德部自富阳东进，于10月27日占萧山，11月1日占绍兴。未几，李容发（李秀成之子）、李容椿（李秀成之侄）也率部赶到绍兴，协助守城。至此，李秀成部完成了对杭州的包围。11月4日，李秀成督令陈炳文、童容海等率部攻占城外要点馒头山，连破望江、候潮、凤山各门外清军营盘，切断了守城清军与外部的联系。7日，广西提督张玉良率兵万余自上游援杭，

据陈学绳《两浙庚辛纪略》称：太平军围困杭州，“号称百万，……但于各城外通途隘口，深沟固垒，隔绝往来，攻之则枪炮雨下，使不能近，而于富阳、余杭坚筑数营，以拒援师。盖逆料城中食尽必溃也”。（见《太平天国》第六册，第623页。）

被太平军击败（张玉良也于 21 日被击毙）。从此，清杭州将军瑞昌、巡抚王有龄、提督饶廷选等率兵数万人困守孤城，食粮渐趋枯竭。12 月 10 日，武林、钱塘、清波门外的各营清军投降太平军。29 日，清军兵勇纷纷溃散，太平军各部乘势缘梯而入，打开凤山、候潮、清波等门，大队入城，占领杭州。王有龄等自杀，布政使林福祥、总兵米兴朝等被擒。杭州既破，李秀成命暂停进攻满城，允许杭州将军瑞昌率部退走。瑞昌顽抗，李秀成乃于 31 日下令攻破满城。瑞昌以及副都统杰纯、关福等自杀。

在李秀成部进攻杭州的同时，李世贤部于 10 月 20 日再克严州，随即向浙东发展，连占嵊县、新昌、上虞、天台、奉化、慈谿（今宁波市西北）、镇海、仙居、台州（今临海）、黄岩、太平（今温岭）等府县，对宁波形成包围之势。宁波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开辟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太平军进逼宁波，外国人甚为恐慌，多方进行干预。11 月 28 日，英国驻华海军司令贺布从日本赶回上海，即派军舰一艘开赴宁波，企图阻挠太平军的进攻。同日，驻宁波的英、美、法领事会商保护外人办法，并派人前往余姚、奉化会晤太平军主将黄呈忠、范汝增。黄、范均答允入城后保护外国人生命财产的安全，但同时指出，外国人不得援助清军。12 月 9 日，太平军分南北两路向宁波推进，守城清军纷纷溃逃，因而未遇任何抵抗即占领了宁波府城。

二、再攻上海（参见附图八）

（一）李秀成部挺进上海与英法联军进攻太平军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外国侵略者为了攫取不平等条约中规定的开埠、赔款、割地、内河航行、海关特权等一系列侵略权益，希望中国有一个象清王朝那样既软弱无能而又相对稳定的政权；而清王朝也早已意识到太平天国是其致命的威胁，迫切需要借助外国侵略者的力量来镇压太平军。中外反动势力这种反革命利益的一致性，成为它们相互勾结起来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客观基础。1861 年 3 月，英国驻华海军司令贺布曾向天京当局提出太平军不得进入上海、吴淞三十英里之内的无理要求。天京当局经过反复斟酌，同意了上述要求，但以当年为限，期满作废。年底，英国方面又派人到天京要挟，天京当局明确予以拒绝。

1862 年 1 月 7 日，即太平军攻克杭州后的第八天，李秀成督令谭绍光、郜永宽、李容发等部向上海进军。与此同时，原驻苏州一带的太平军也在刘肇均率领下，经嘉定进逼宝山、吴淞。至 1 月 20 日，各路太平军分别占领了青浦、奉贤（今上海市奉贤县奉城镇）、南汇、川沙。西路前锋抵达宝山县吴淞镇一带，东路前锋抵达高桥镇，基本上完成了对上海的包围。

清廷认为，上海“僻处一隅，于用兵固为绝地，而海关为饷源所出，自

应亟筹保护。”当时，上海由江苏巡抚薛焕等统带四万兵勇驻防（城内只有八千人），多数为残兵败将，战斗力不强。而这时湘军正欲进逼金陵，也难以抽兵增援上海。清廷渴望英法侵略者给予援助，于是，同治帝（清穆宗载淳）谕令薛焕等：“与英法两国迅速筹商，克日办理，但于剿贼有裨，朕必不为遥制。”

2月13日，驻沪英法侵略军头目会商防务，大致确定：由英军防守英、美租界，兼守北门及附近城墙，由法军防守法租界和上海县城。其时，英、法驻沪海陆军为数不多，各约九百余人；但就在当天，英军一部由天津开至上海，使其实力得到加强。此外，以华尔为头目的洋枪队经过改组，已扩至一千二百人，仍以松江为基地。不久，英法侵略者公然以太平军进军上海影响租界的供应和贸易为借口，明目张胆地与清军一起向太平军进攻。他们首先企图肃清距上海百里之内的太平军据点，并根据其兵力不足而火力较强的特点，决定采取集中力量逐个攻占的方针。

2月21日，英国驻华海军司令贺布率水兵三百五十人，携带六磅火箭炮一门，法国驻华海军司令卜罗德率法军一百六十人，携带野战炮二门，华尔率洋枪队五百六十人，搭乘轮船炮艇，自上海开抵吴淞口登岸，在清军配合下，向驻于高桥镇的太平军发起进攻。当时，高桥镇由数百名太平军“老兄弟”及数千名新战士防守，他们以简陋的武器，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由于敌军火力较猛，最后被迫撤退。侵略军攻下高桥后，即交由清军防守。

2月28日，贺布率英国水兵和水手三百五十人、炮兵三十五人（携榴弹炮四门、野战炮一门），卜罗德率法军二百人（携榴弹炮二门），另有洋枪队七百五十人，由上海搭乘十一只轮船，溯黄浦江而上，开抵上海以南约五十里的闵行镇，3月1日黎明在南岸登陆，向肖塘镇进攻。太平军凭垒抵抗，使华尔七处受伤。终因侵略军火力猛烈，太平军工事被毁，难以守御，不得不放弃肖塘后撤。3月14日，进攻泗泾的太平军又遭侵略军攻击，被迫撤退。

李秀成在苏州得知进攻泗泾受挫后，对进攻上海的计划作了如下调整：由驻青浦的李明成（李秀成之弟）等首先“合兵力攻七宝”，然后进攻泗泾，得手后，“于沿江连营，以为相持固守之计”；陈炳文率部由青浦南面的天马直取松江，并由李明成派兵助攻；松江攻克后，交李明成等驻守，陈炳文部则“赴吴淞口相地安营，屯兵驻扎，以逸待劳，而为缓步进兵之计”；刘肇均部“由嘉定境出野鸡墩，于吴淞江、黄渡等处安扎营盘，深沟高垒”。总的方针是：“四面云屯，将上海包围定叠”，以待敌人“内中自变”，“乘机计取”，“缓步进兵”，避免强攻。

七宝与泗泾是由上海去松江的必经之地，太平军一旦攻占，就可切断松

《剿平粤匪方略》卷二百九十四，第9页。

《穆宗实录》卷十五，第56页。

《忠王李秀成给忠逢朝将刘肇均谕》，《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202页。

江与上海之间的通道，使松江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因此，当太平军准备进攻七宝时，敌军方面也决定发动进攻，以防止太平军攻占上述两处。当时，原驻天津的英军已调至上海，使驻沪英军总数达到近三千人。侵略军实力倍增，气焰更为嚣张。

4月3日，贺布率一千四百九十七名英军（携大炮九门），卜罗德率四百一十名法军（携大炮四门），另有“常胜军”一千二百人，在侵华英军司令士迪佛立统一指挥下，由上海出发至七宝，次日凌晨乘大雾弥漫向王家寺太平军营垒逼近，前队进至距大营仅六十码的地带。驻守王家寺的太平军约四五千人，大营以木栅围筑，实以泥土，外有深沟环绕，相当坚固。上午8时45分，侵略军开始以大炮三面环攻太平军营垒。双方交战约半小时，太平军不支，被迫撤退。接着，侵略军又转攻泗泾方向的龙珠庵太平军营垒，遭到迎头痛击，死伤七十余人。5日，侵略军全部出动，向龙珠庵发起猛烈攻击。此处约有八千太平军据守，在武器装备远占优势的外国侵略军疯狂进攻下，不得不撤出阵地。至此，太平军攻占七宝、泗泾的计划落空了。

4月17日，侵略军二千四百余人又分乘英法军舰，溯黄浦江而上，对上海东南四十里的周浦进行袭击。太平军猝不及防，弃垒东走川沙。

（二）嘉定、青浦相继失陷

正当外国侵略军在上海附近疯狂进攻太平军之际，曾国藩应江苏官绅之请，将原拟派往镇江以威胁天京的李鸿章所部淮军六千五百人调往上海。在七艘外轮的接运下，从4月5日起分三批由安庆出发，5月2日全部抵沪。淮军的到来，给太平军进攻上海增加了新的困难。

李鸿章的淮军

在淮军赴沪期间，英法侵略军头目贺布、士迪佛立、卜罗德等于4月22日共同商定了进一步进攻太平军的计划，决定立即占领嘉定、青浦、南桥（今上海市奉贤县城）等地。

4月27日，侵略军近四千人携火炮三十门，在李恒嵩所部清军五千人的配合下，自上海向嘉定发动进攻，在南翔鹤查山为太平军所败。29日，侵略

由华尔洋枪队扩编改名而成的反动武装。1862年3月，清廷赏华尔以总兵衔，扩编其洋枪队，并改名为“常胜军”，由苏松太道吴煦督带，记名道杨坊会同华尔管带。

1861年冬，道员李鸿章在曾国藩的保荐下，于皖北家乡募集合肥、六安一带团练武装数营，次年2月到达安庆，以曾国藩拨给的湘军水陆数营为基础，编成一支新的封建军阀武装，共约六千五百人，号称“淮军”。其编制、训练、薪饷等均仿照湘军章程。1862年抵沪后，李鸿章不断扩充部队，大量购置洋枪洋炮，雇用英法军官，使淮军成为清军中最早使用洋枪洋炮的部队，并逐渐成为太平军的劲敌之一。

军用大炮轰毁控制嘉定水道的两座营垒，太平军败退。侵略军随即包围嘉定，采取“围三阙一”的部署攻城：由英法军攻南门；“常胜军”攻西门；清军攻东门；虚留北门，以清军设伏。守城太平军五六千人，非但没有城防大炮，连抬炮、火绳枪等火器也为数极少，大部为竹矛等冷兵器。5月1日晨，侵略军大炮齐发。太平军牺牲数百人，不得已留百余人坚守南门，掩护全军由北门退出，嘉定遂陷。退出北门的太平军遭清军截杀，又牺牲二千人，损失惨重。

5月6日，侵略军与清军近万人（内英法军二千六百一十三人、华尔“常胜军”一千八百人、清军数千人）携大炮四十门，由上海出发进攻青浦。12日，敌军用大炮将城墙轰开两个缺口，随即冲锋。守城的太平军约四千人依托城上工事，冒着枪林弹雨顽强抵抗，终因寡不敌众，被迫撤离城墙。敌军乘势蜂拥入城，青浦县城遂陷。太平军牺牲约千人，二千人被俘。

5月17日，英法军二千六百余人和“常胜军”二千余人自青浦出发，向南桥太平军进攻。新任署理江苏巡抚李鸿章也派参将程学启等率淮军自浦东南汇、周浦前来，会同外国侵略军作战。南桥是个小镇，太平军守军不满千人，但周围筑有较坚固的防御工事。当天下午，敌军先用大炮轰击两小时，然后冲向土墙。这时，隐蔽在土墙后的太平军突然用抬炮、火绳枪和少数欧制武器猛烈射击，将卜罗德击毙，并打退了敌人的冲锋。当敌军再次炮击和冲锋时，太平军才撤出南桥镇。

5月20日，敌军又攻占南桥镇南面的柘林。21日，太平军主动放弃奉贤县城。此时，敌军获悉太平军正反击嘉定，于是匆忙撤回上海。

（三）李秀成率军反攻半途而止

嘉定、青浦等地相继失守，李秀成感到局势严重，便亲率精兵万余人，自苏州出发，进行反攻。

反攻作战首先从太仓开始。此前，在外国侵略军向嘉定、青浦进攻的同时，江苏巡抚薛焕就派知府李庆琛率兵五千余人，进扎太仓东门外板桥地方，准备伺机夺占太仓。1862年5月14日，李秀成到达太仓，次日开始与清军接战。17日，清军大败，死伤过半，李庆琛也被击毙。此战，太平军缴获不少洋枪和大炮。

李秀成率军击败太仓清军之后，即分兵进逼嘉定、青浦。嘉定由英法军四百人和清军参将熊兆周部据守。士迪佛立、格尔森等英法侵略军头目得知嘉定被围，即率兵千名，携炮十三门由上海驰援。25日，侵略军在南翔遭到阻击。26日，士迪佛立等分兵五百人突入嘉定城，救出被围英法军，逃回上海。嘉定重新为太平军占领。

围攻嘉定的同时，陈炳文、郜永宽部太平军进围青浦，但不久又被调往嘉定助战。5月28日，李秀成以嘉定既克，便会同陈炳文等部共二万五千人

转攻青浦，并乘胜连占泗泾、七宝等要地。青浦驻有“常胜军”千人和英军六百人。华尔曾几次率兵由松江往援，都为太平军所阻。6月9日，青浦敌军冒死突围，逃回松江，但“常胜军”副领队法尔斯德被俘（后被华尔以大批军火赎回）。

太平军于5月底开始围攻松江。由于久攻不下，李秀成于6月17日撤松江围，督率谭绍光、陈炳文、郜永宽等部五六万人进逼上海。首先围攻扎于新桥的淮军程学启部营垒，进至法华寺、徐家汇、九里桥一带。由于程学启部拚死抵抗，太平军反复冲杀，营垒终未能破。18日，李鸿章督率参将张遇春、郭松林等部三路驰援，与太平军激战于九里桥、虹桥等处，结果太平军不支，退回泗泾。这时，李秀成已接到洪秀全回救天京的诏旨，遂放弃泗泾、塘桥等处营垒，将嘉定、青浦、太仓等处的防务交由谭绍光负责，自率大队回到苏州，与各将领会商救京之策。

李秀成亲率精兵反攻上海之敌，虽未能攻下上海，但收复了嘉定、青浦，给了英法侵略军和“常胜军”以应有的打击。外国侵略军数量有限，侵占的地方越多，其兵力就越分散，这就使太平军能够以数量上的优势和勇敢精神，弥补火器落后的短处。太平军攻克嘉定、青浦，曾使英法侵略军为之丧胆。李鸿章奏称：“西兵为贼众所慑，从此不肯出击”。左宗棠也说：“夷人之畏长毛，亦与我同，委而去之，真情毕露”。这就打破了英法侵略军和洋枪洋炮不可战胜的迷信，也证明了太平军只要善于在战争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是能够找到一套对付洋枪洋炮的战法，并进而夺取洋枪洋炮，以武装自己，战胜敌人的。

当然，太平军第二次进攻上海，在战略上是失策的。上海是中国的领土，太平军自然完全有权攻占；但是，在湘军正准备席卷金陵，天京面临严重威胁的情况下，从战争全局考虑，太平军当以集中力量对付湘军为宜。另一方面，这时第二次鸦片战争已经结束，中外反动派已勾结起来镇压太平军，再次进攻与外国侵略者利益攸关的上海，正好为他们直接配合清军作战提供了口实。

除了战略决策错误以外，太平军在作战指导上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决心不果断，兵力不集中等。当英法侵略军赤膊上阵，公开进攻太平军时，李秀成不是增兵反攻，而是继续采取“缓步进兵之计”，寄希望于敌人“内中自变”，“乘机计取”，结果事与愿违，希望落空。太平军虽发起过两次较大规模的进攻，但每次参战的兵力不过三五万人，数量上不占绝对优势，这就很难给装备上远占优势的敌人以致命性的打击。

李鸿章：《西兵退出嘉定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一，第20页。

转引自曾国藩《议复调印度兵助剿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十六，第29页。按：“长毛”是对太平军的诬称。

第七节 太平天国革命战争的最后失败 (1862年5月—1866年2月)

一、西线军事形势的恶化

1861年9月湘军攻占安庆后，曾国藩随即由皖南东流进驻该城，筹划进军金陵和围歼太平军的有关事宜。他决定先行肃清沿江一带的太平军，以巩固后方，即实行所谓“欲拔根本，先剪枝叶”的方针。曾国藩后来申述其理由说：“用兵之道，可进而不可退，算成必兼算败。与其急进金陵，师老无功而复退，何如先清后路，脚根已稳而后进。”因此，1861年9月上旬以后，湘军除趁安庆之胜先后夺占池州、铜陵、无为及其东北的运漕、东关等重镇外，暂时停止进攻，休整部队，增募兵勇，调整部署，为进军金陵进行多方面的准备。

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最高领导集团，在安庆失守以后，基本上处于束手无策的状态，听任湘军从容备战，眼看着西线军事形势恶化下去。由于安庆失守，陈玉成受到革职处分，以致“心烦意乱”，“坐守庐城”。杨辅清、黄文金等各路援军则陆续撤回皖南。以后，陈玉成为了“广招兵马，早复皖省”，除派马融和及捻军首领张乐行率部进至淮河以北外，继又派出扶王陈得才、启王梁成富、遵王赖文光、祐王蓝成春等率部远征河南、陕西，这就使皖北本已不多的兵力更形单薄。远征军派出不久，新任荆州将军多隆阿即会同钦差大臣袁甲三等率清军围攻庐州。在此情况下，陈玉成于1862年2月23日接连发出书信，向各方求援，要陈得才、马融和、张乐行等返庐“面议一切军机”。可是，这时陈得才等已进入河南，张乐行、马融和等正在督军围攻安徽颖州府（今阜阳）。而且，这些信件全部被清军截获。于是，庐州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5月13日，陈玉成放弃庐州，率兵三千余人北走寿州，打算联络苗沛霖，再作良图。不料苗沛霖已被钦差大臣胜保招抚，陈玉成一入寿州城，即被逮捕，不久被解往胜保军营，6月4日在河南延津遇害，年仅二十六岁。陈玉成是太平天国后期的主要将领之一，

曾国藩：《遵旨通筹全局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十五，第34页。

参见《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521页。

《赖文光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558页。

《英王陈玉成命沃王张洛行派兵来接书》，《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200页。

苗沛霖是安徽凤台县（今寿县）的一个落第秀才，1855年受命督办团练，后来势力不断发展，官至道员。1861年初，因与官绅不睦，据地自守，于10月攻破寿州城，俘安徽巡抚翁同书。这时，太平军失安庆，处境困难，乃派人与苗联络，并封其为秦王。苗假意表示愿与太平军、捻军合作，但私下仍与清方来往，并于1862年3月正式被钦差大臣胜保招抚。及至庐州被困，苗沛霖即按照胜保令其诱捕陈玉成的指示，派人佯请陈玉成前去寿州，共同进攻开封。陈玉成为其所惑，以致被捕牺牲。

英勇善战，屡立战功。他的牺牲和庐州的失陷，不仅使太平军在皖北的防务瓦解，并使整个西线形势更加急转直下。

二、十三王回援天京失利

（一）清军之大举东犯

1862年1月30日（同治元年正月初一日），清廷命曾国藩为协办大学士，仍统辖苏、赣、皖、浙四省军务。曾国藩受宠若惊，立即进一步筹划以东征金陵为主要目标的全盘军事行动。其部署如下：新任江苏布政使曾国荃率湘军二万（后陆续增至五万）自安庆沿长江北岸直趋金陵；同知曾贞干率湘军四五千由池州沿长江南岸进攻芜湖；兵部侍郎彭玉麟等率湘军水师沿江而下，配合两岸陆师的进攻，兼负运输接济任务；提督鲍超率所部湘军数千人由赣入皖，经青阳攻宁国府；安徽巡抚李续宜率所部湘军万余人进援皖北颍州；荆州将军多隆阿率鄂军二万余人围攻庐州；浙江巡抚左宗棠率所部湘军及部分赣军、浙军共约二万余人全力进攻浙江，牵制李世贤部太平军；署理江苏巡抚李鸿章率淮军六千五百人会同外国侵略军进攻上海周围李秀成部太平军，尔后西进。以上共计八路，前四路为直接进攻天京的兵力。此外，尚有道员张运兰等部湘军数千人扼守皖南婺源一带，并为“游击之师”，防止浙江太平军入赣，以固徽州后路。同时，协攻庐州的袁甲三、防守江浦的李世忠、扬州的都兴阿、镇江的冯子材等部，也归曾国藩节制。曾国藩仍驻安庆指挥。

1862年3月15日，曾国荃率新募的湘勇八千人抵达安庆，24日即率全军自安庆出发，沿长江北岸东下。与此同时，皖北、皖南、浙江等地战事也进一步展开。各地太平军在敌人的全面进攻下节节后退。截至5月中旬为止，巢县、含山、和州、繁昌、南陵、青阳、石埭、太平、泾县、庐州等地均被清军攻陷。

5月18日，曾国荃率军十五营自西梁山渡江，会同水师攻占当涂，20日会同曾贞干占领芜湖，26日进驻江宁镇板桥，旋占秣陵关、大胜关、三汊河。30日，彭玉麟督水师八营占头关、江心洲、蒲包洲，进泊金陵护城河口，曾国荃则督陆师直逼雨花台，距城不及四里。曾贞干所部湘军占领芜湖后，不久也前往金陵，与曾国荃部会师。从此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处于湘军的直接威胁之下。

（二）十三王回救天京

洪仁玕称：“英王一去，军势军威同时堕落，全部瓦解，因此清军便容易战胜”。（《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555页。）

湘军迅速进抵天京城下，使洪秀全等甚为吃惊，因为他们虽然估计到湘军“必顺流东下进攻天京，但从未准备彼等能突如其来如是之速”。因此，洪秀全一日三诏地催促李秀成迅速回援。李秀成只得停止进攻上海，回到苏州，于6月22日召集各将领分析形势，商讨救京之策。他认为曾国荃所部湘军“由上而下，利在水军，我劳其逸，水道难争”，加之湘军近来屡胜，其势正锐，因而“不欲与战”，决定等两年之后，湘军“兵久而必无斗战之心，然后再与其战”。于是，先将苏州的财物、米粮、军火全部解送天京，以利固守；同时，派李明成率兵一部赶回天京，加强防务。

1862年7月，天京外围的形势更趋严重。7月11日，西南屏障宁国府城为鲍超部攻陷。16日，保王童容海率部袭取广德，杀李世贤部守将马桂功后，宣布降清。杨辅清、洪仁玕率部约二万人自皖南退至江宁淳化镇一带，回援天京，于7月20日约城内守军夜袭湘军军营，被湘军击退。

8月6日，李秀成在苏州再次召集各将领会商救京事宜。正在这时，洪秀全又遣人催促李秀成迅速援京，并申斥说：“三诏追救京城，何不启队发行？尔意欲何为？尔身受重任，而知朕法否？若不遵诏，国法难容！”李秀成在洪秀全严诏催逼之下，只得抽调兵马，于9月14日由苏州出发，回援天京。

此次由李秀成督率回救天京的将领共有十三王，领兵十余万人（号称六十万），到东坝会齐后，分路进扎方山、板桥一线。与此同时，陈坤书等率四万人进至安徽太平府，拟攻金柱关，断敌芜湖之援；杨辅清、黄文金等则分路进逼宁国府城，以牵制鲍超部湘军。

（三）天京外围的激战

10月13日，天京外围的攻守战正式开始。李秀成督率援军与天京城内守军相配合，对围城湘军之东西两翼发起猛攻。湘军坚壁固守，俟太平军攻近，突以排炮轰击。太平军闻炮则伏，炮停即起，昼夜不停地进攻敌人。15日，西路太平军数千人冲上江心洲，抄敌营后路，拟断敌运道。曾国荃令连夜构筑十数垒，与太平军对峙于洲上，以保运道畅通。18日至21日，东路太平军集中洋枪洋炮猛攻，湘军固守营垒，拚死顽抗。22日，太平军“负片板蛇行而进”，并“束草填壕”，步步进逼。曾国荃见势危急，亲自督战死

《洪仁玕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555—556页。

《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524页。

童容海本石达开部将，于广西脱离石部，“万里回朝”，1861年于江西河口镇归隶李秀成。次年初，童擅杀统将，复与杨辅清有隙，遂向鲍超洽降，因遭部属反对，最后只带走万余人。

《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524—525页。

拒，被太平军击伤面颊。23日，李世贤自浙江率三四万人赶到，加强了东路攻势。太平军连日猛攻，更番迭进，并“用箱篋实土于中，排砌壕边，明防炮子于上，暗凿地道于下”，准备穴地轰毁敌垒。湘军先以火箭集中射击，继挑“锐卒”进行反击，破坏太平军的地道作业。与此同时，湘军发现太平军西线营垒散而不坚，有隙可乘，遂于27日实施三路反击。太平军猝不及防，被毁营垒十二座，伤亡颇众。

11月3日，太平军并力进攻东路，用火药轰塌曾国荃雨花台大营附近的湘军营墙两处，随即“乘隙直上，万弩齐发，排炮雷轰，踊跃争先”，纷纷冲入缺口。但湘军早有准备，地道轰发之后，立即从营中冲出，并力抢堵拦击。太平军往返冲杀达五六次之多，终不得入。次日，西路太平军决长江之水，冀断敌粮运。湘军水师出动舢板，驻守双闸，配合陆师保护运道。东路太平军则继续挖掘地道，向敌进攻。湘军以对挖的办法进行破坏，每挖通一处地道，或熏以毒烟，或灌以秽水，或以木桩堵洞口，使太平军的地道连连失效。

11月26日，李秀成、李世贤等以围攻雨花台曾国荃军营月余不下，不得已下令撤围。李世贤率西路退秣陵关，旋退东坝小丹阳；李秀成率东路进入天京。至此，十三王回援天京的作战完全失败。

李秀成此次带领十三王回援天京，在兵力对比上占压倒优势，在武器装备方面，据曾国荃称：“贼之火器精利于我者百倍之多，又无日不以开花大炮子打垒内，洋枪队多至二万杆。”其言难免有所夸张，但当时太平军的火器优于围城的湘军是可能的。所不足者，湘军拥有水师，能控制长江水道，太平军则无可奈何。整个而言，太平军之所以久攻不克，既有湘军善于筑垒顽抗及太平军缺衣少粮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指导上的失误。

1861年冬，湘军因兵力不足，暂时停止了攻势，但洪秀全等并未抓紧时机加强西线的防御，使曾国荃部湘军得以迅速窜至天京雨花台。即使这样，当时曾国藩远在安庆，鲍超部被牵制于宁国府一带，左宗棠部远在浙江，多隆阿部为对付入陕的太平军正调赴陕西途中，因而曾国荃部显系孤军深入，再加湘军疫病流行，“曾国荃金陵营中，病者亦逾万数”，因此，当时曾国荃部水陆各营虽有近三万人，能作战者不过六七千人。故对太平军来说，仍是重创甚至全歼敌人的好机会。但由于天京当局事先没有准备，直至湘军

曾国藩：《缕陈金陵各营苦守情形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十七，第28—29页。

曾国藩：《缕陈金陵各营苦守情形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十七，第30页。

曾国荃：《致郭嵩涛书》，世界书局影印本《八贤手札》第248—249页。

《李秀成自述》称：湘军“营壕深垒，木桩叠叠层层，亦是甲兵之利，营规分明，是以连攻数十日未能成效也，因此之由也”。又说：“亦因八月而来，各未带冬衣，九、十月正逢天冷，兵又无粮，未能成事者此也。”（见《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526页。）

曾国藩：《近日军情片》，《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十六，第76页。

兵临天京城下，才仓卒调兵，及至各路援军赶到，敌人已深沟高垒，以逸待劳，增加了反击作战的困难。

李秀成率领十三王回救时，面对已经修有坚固工事的湘军，未能很好地配合城内守军设法先予敌以消耗，再进行有准备的围攻，而是一到天京外围就连日轮番攻击，企图速胜，结果钝兵挫锐，力屈罢攻。另外，没有正确地选择好主要攻击方向。进至天京的湘军立营于江边至雨花台之间的狭长地带，其西面是水师与陆师的结合部，又是粮运孔道。李秀成如果将主要兵力置于西路，首先断敌水路与陆路的联系，绝其粮源，进而集中兵力攻歼西路之敌，动摇雨花台大营，则取胜的机会还是存在的。

三、“进北救南”计划的落空

由于未能击败曾国荃部湘军而解天京之围，洪秀全对李秀成“严责革爵”，并要他“进兵北行”。至于北进的企图，据湘军缴获的太平军文件透露：太平军过江之后，将由舒城、六安趋霍山、英山、麻城、宋埠，然后兵分两路，夺取黄州与汉口，以调动长江南岸之敌北援，下游之敌上援，冀解天京之围。其基本策略仍然是“围魏救赵”之计。

1862年12月1日，李秀成遵照洪秀全“进兵北行”的指令，命林绍璋、洪春元、郜永宽、李容发率领第一批部队数万人自天京下关渡至九袱洲，隐蔽于芦苇丛中，准备北进。8日起，太平军一面猛攻浦口江南提督李世忠（即叛将李昭寿）各营，一面昼夜赶渡。渡江后，于18日占领安徽含山，19日占巢县，21日占和州，以后又连占铜城闸、运漕镇和东关等要地，并在这一带等待主帅李秀成及后续部队的到来。

当时，曾国藩已识破太平军北进企图。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指出：李秀成“往年以偏师攻破浙江，分官军之势，而以全力攻扑金陵老营。此次或以攻甯和、含、巢、庐，效往年破浙之故智，而以全力再攻弟营（按：即雨花台曾国荃军营）与金柱”。曾国藩一面指示曾国荃坚守大营，一面纷调援军入皖，堵截太平军。

1863年2月27日，李秀成会同陈坤书、吴如孝等率领第二批部队数万人（一说三十余万，号称五十万）渡江。陈坤书等率部绕江浦西进和州、含山。吴如孝率部进攻李世忠大营，并于3月22日占浦口，4月3日占江浦，从而恢复了天京与江北间的通道。

3月31日，李秀成进抵巢县，准备取道无为州西进。由于三个多月来曾国藩已从各地调集了万余援军进入皖北，使太平军西进遇到很大困难。4月19日，太平军自巢县进抵无为州的石涧埠，围攻湘军道员毛有铭、按察使刘

参见曾国藩《近日军情片（同治二年三月二十七日）》，《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十八，第45页。

曾国藩：《致沅弟》，光绪己卯年传忠书局刊《曾文正公家书》卷八，第57页。

连捷部。敌军凭垒坚守待援，太平军进攻多日未下，乃于5月4日撤围西走。7日攻庐江不下，8日攻舒城又不下，于11日进逼六安。时六安城内仅有粮台道员曾广翼、知州何家聪率两营兵据守。但由于敌军拚死力拒，太平军连日攻城都未得手。当时正值青黄不接，粮食奇缺，加之敌军堵截甚严，李秀成被迫放弃原定进军计划，于5月19日撤六安之围，折往寿州，随即东返，6月2日进入天长县境。留守和州、含山、巢县一带的太平军也先后放弃上述各地，退守江浦、浦口。

在李秀成率军北进的同时，天京当局曾命皖南的刘官芳等部由徽州、宁国出发，古隆贤等部自太平、祁门出发，黄文金等部自青阳、石埭出发，三路同时西进，以与李秀成部相策应。但由于上述三路太平军对敌打击不狠，对湘军后路的威胁不大，曾国藩仍可从皖南抽调兵力救援皖北，而李秀成率军到达六安之后，又遇难即退，半途折回，致使洪秀全关于出击敌后，挽救天京危局的计划归于失败。

这时，淮军和“常胜军”已自上海西进，并攻陷了太仓、昆山，正准备围攻苏州。天京方面，曾国荃所统围师已增至三万余人，并于6月13日占领了聚宝门外各石垒。因此，洪秀全急令李秀成速回天京。16日，李秀成率部离天长，经六合，趋浦口，于20日经九袱洲南渡抵京。太平军将士冒着清军的炮火逐日南渡，前后历时十二天，被击毙和饿死者甚众，渡至南岸进入天京城内者总数不及一万五千人。6月25日，清军水陆配合，攻陷江浦、浦口，30日陷九袱洲，太平军又损失二万余人。至此，长江北岸完全为清军所占。

“进北救南”的作战行动，非但没有达到解救天京的目的，反而损失精锐数万人，使太平军的实力进一步遭到削弱。从此，天京解围的希望变得更加渺茫了。

四、苏南诸城的失陷

（一）常熟、太仓争夺战

1862年9月，李秀成率十三王回救天京后，李鸿章所部淮军在英法军、“常胜军”配合下，乘机进袭在上海附近的太平军，于10月24日攻陷嘉定。11月3日，谭绍光组织反击，与淮军、“常胜军”（此时华尔已被击毙，“常胜军”由美人白齐文统领）战于黄渡、四江口、白鹤港一带，后因作战失利，退守昆山。

1863年1月16、17日，太平军常熟守将骆国忠等杀死忠于太平天国的将领二人和兵士五百余人，投降清军，并于19日袭占了常熟北面的福山港。当时，李秀成已由天京来到苏州，闻讯后立即与谭绍光等率军讨伐常熟叛军，企图一举夺回该城，严惩叛徒；同时，派会王蔡元隆（李秀成之婿）入

守太仓，以防内变（早已通敌的太仓守将钱寿仁旋即率二千余人出城降于淮军并改姓名为周寿昌）。

由于太仓仍在太平军手中，淮军无法从陆路救援常熟，李鸿章便调派“常胜军”五百人，取道水路往援。因福山港已被太平军占领，“常胜军”于2月5日到达时，不得登岸。为此，李鸿章又饬令总兵程学启纠集清军万余和“常胜军”二千余人进攻太仓，企图打通往援常熟的陆路通道。2月14日，当敌军进至南码头时，凭河据守的太平军依托工事英勇阻击。“常胜军”以洋枪和炸炮（开花大炮）猛烈射击，太平军被迫退入城中。15日上午，“常胜军”头目奥伦督军用大炮轰塌南门城墙，淮军立即渡过浮桥冲锋，城内太平军伏兵骤起，用千余洋枪火力封锁城墙，大量杀伤敌人，打垮了敌人的进攻。接着，蔡元隆督令守军从西、南两门冲出，将敌人赶往望仙桥一带。“常胜军”伤亡百余人，外国兵头亦伤十余人，一时难期力振。该军即于二十九日（16日）退回松江”。其后，李鸿章又先后派提督黄翼升、道员潘鼎新、总兵刘铭传等率水陆师赴援常熟，均未得逞。

4月5日，新任“常胜军”统领戈登会同黄翼升、潘鼎新等率兵近万人，攻占了福山港。常熟城内的叛军立即出城接应，与淮军、“常胜军”会合。太平军围攻常熟七十余日，终未能下，谭绍光（李秀成已于2月22日返回天京）不得已于4月6日下令撤围。

淮军和“常胜军”占领常熟之后，李鸿章又饬令淮军加紧进攻太仓，并派员入城策反。太平军守将蔡元隆将计就计，约定于4月26日“献城”。届时，淮军统领李鹤章（李鸿章之弟）率领一千五百人前往受降，及抵城边，太平军伏兵骤起，淮军大量被歼，李鹤章也险些送命。5月2日，戈登率领“常胜军”二千八百余人（内有英军五百余名）协同淮军猛攻太仓，蔡元隆部经顽强抵抗后撤出。淮军入城后大肆屠杀，遇害者万余人。

5月4日，淮军及“常胜军”共约二万余人乘胜进犯昆山，守将刘肇均等率所部一万二千人依托坚城阔壕，顽强抵御。不久，李鸿章亲临昆山督师，他根据戈登的建议，于5月30日与戈登同乘英军提供的“海生”号战舰，率军一举攻占昆山西面的正仪，然后回军东向，会同围攻昆山的淮军击败谭绍光所率太平军援兵。昆山太平军见后路被袭，次日即有七八千人向西撤退。戈登率炮船跟踪追击，太平军损失严重。6月1日，太平军全部西撤苏州，昆山遂陷，枪弹制造厂随之落入敌手，使尔后的军械供应发生极大困难。

（二）苏州、无锡相继失守

李鸿章：《进攻太仓援剿福山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三，第2页。

戈登根据昆山全城有河流围绕，惟有一路沿浏河西通苏州的地形特点，建议首先夺取昆山西面的正仪镇，以切断昆山与苏州的联系，动摇昆山太平军的守城决心。

敌军既得太仓、昆山，便准备进攻太平天国苏福省的首府苏州。李鸿章分析：苏常为金陵根本，物产丰富，太平军必死守力争；江南多水，进攻不易；归其统率的清军兵力仅四万余人（包括添募和收降之众）分布于常熟至金山卫之间的广阔地区内，能直接用于进攻苏州的兵力有限。因此，他决定采取“规取远势，以翦苏州枝叶，而后图其根本”的方针，并拟定了一个“以剿为堵”的三路进攻计划：中路从昆山直趋苏州，由程学启部担任；北路从常熟进攻江阴、无锡，由李鹤章及总兵刘铭传部担任；南路从泖淀湖攻吴江、平望、太湖，切断浙江太平军进援之道，由总兵李朝斌率所部太湖水师十营担任。此外，由黄翼升率淮扬水师往来策应，“常胜军”则驻昆山为总预备队，“专备各路游击援应”。

鉴于苏南形势危急，刚由皖北回到天京的李秀成于7月7日到达苏州，布置防守事宜，不久又返回天京。当时，谭绍光在苏州主持苏南军务，他雇请数十名外国人，教练炸炮，以增强太平军的防守能力。

7月7日，北路淮军分三支向江阴进攻，太平军在江阴、常熟之交的顾山、北、长泾一带节节阻击。直至8月下旬，淮军才进抵江阴城下。9月13日，江阴失陷。北路淮军既得江阴，李鸿章便令刘铭传驻扎青暘镇，副将周盛波部和总兵郭松林部分别进驻无锡芙蓉山与缙山，道员张树声等部进驻张泾桥以为后援，李鹤章则督小队往来调度，准备集中力量攻取无锡，以配合中路、南路军合击苏州。9月24日，郭松林部进占无锡东面的东亭镇，前锋抵达无锡南门外。

7月26日，中路淮军因南路李朝斌所部水师尚未开到，改变直取苏州的计划，会同戈登率领的“常胜军”等向吴江开进。29日进抵吴江城下时，太平军守将开门出降。吴江为浙江太平军援救苏州的必由之路，该城失陷，苏州的南路援绝。

由于苏南形势日益恶化，经李秀成再三恳请，洪秀全允其再次离开天京前往苏州，但限期四十天回京。9月23日，李秀成抵苏州，本欲召集各镇将商讨对策，以求“会司并进”，“合力解京围、解省困”。但常州守将陈坤书、无锡守将黄子隆均未应约前来，也未发兵会师，李秀成只得将驻苏州的郜永宽等部调往苏州、无锡交界处，与无锡郊外的李世贤部相衔接。自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李秀成督军连日向围攻无锡的李鹤章、刘铭传等部淮军发起进攻，交战于后宅、梅村、坊前、安镇一带。面对太平军的进攻，淮军“先以坚壁勿战挫其气，继风滚营并进遏其锋”，加之驻守无锡、常州的太平军没有很好地进行配合，因而淮军得以“稳扎稳打”地对付太平军。而中路淮军和“常胜军”则由浒墅关一带抄袭李秀成部后路，使其无法集中力量进攻围困无锡之敌。因此，李秀成部出击半个月，非但未能击败苏州、

《忠王李秀成致护王陈坤书书》，《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257页。

李鸿章：《苏州无锡连获大胜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五，第4页。

无锡外围之敌，反而损失不少兵力。

苏州城四面环水，太平军凭河修筑长墙，墙内又筑石垒、土营数十座，南自盘门，北至娄门，联络一气。城内穴地为屋，上面覆板堆土，以御炮击。由于太平军设防相当坚固严密，因此，程学启、戈登率部围攻两月，进展甚微。11月27日，敌军在护城河上偷架浮桥，调集炸炮，水陆配合，越河进攻。经过激战，城外东、南、西三面的防御工事全被毁坏，敌军直薄城下。李秀成

太平军在苏州保卫战中，用俘获敌人的“飞尔复来”号船攻击清军水师

见苏州城危，于11月30日撤离，由谭绍光坚守危城。此时，郜永宽等发生动摇，私下与敌议降。淮军以生擒李秀成或斩杀谭绍光为条件。12月4日，郜永宽等八人将慕王谭绍光杀害，开城降敌，苏州城遂为敌所占。几天之后，郜永宽等八人均被李鸿章处死。12月12日，无锡失守，黄子隆被俘，不久遇害。淮军攻陷苏州、无锡后，遂分兵两路：一路进窥浙江嘉兴，一路准备进攻常州。

（三）常州失陷

12月15日，李鸿章到达无锡，对进攻常州作了部署。接着，提督刘铭传率部抵达常州西北的陈都桥、羊头桥、西施桥，前锋进抵孙村，与常州城仅一河之隔；总兵周盛波等部从无锡出发，经戚墅堰进抵常州城东十五里的擂鼓桥、白家桥，前锋抵三里桥一带。与此同时，常州西北奔牛镇的太平军守将邵志纶投敌，西路交通受到很大威胁。

1864年2月，戈登率“常胜军”自昆山出发，经无锡攻宜兴，以截断浙江太平军北援之路。3月2日，宜兴失守；8日，溧阳守将降敌，常州南路被敌截断。

3月8日，太平军常州守将陈坤书曾会合自句容、丹阳来援的林绍璋、陈承琦等部援军，对奔牛镇之敌进行反击，结果失利。于是，陈承琦、李容发等率部自常州循江东进，15日攻江阴未下，17日攻常熟又未下，乃于18日占福山，20日又往攻无锡。李鸿章大为震动，急调郭松林部和“常胜军”回救，并从常州外围调李鹤章部回守无锡，调张树声等率三千人驻扎江阴南面的青暘，从嘉兴前线调郑国魁水陆三营驰援常熟。

3月下旬，清援军赶到常熟外围的顾山、王庄一带，与太平军展开激战。太平军被迫撤常熟之围，退至江阴境内。31日，陈承琦部于江阴东南的华墅袭击回援的“常胜军”，使其“全队八百人覆没”。太平军缴获洋枪四百余杆。4月11日，李鸿章督令各路援军对华墅进行反扑，太平军予敌以重大杀伤后退回常州、丹阳。

太平军陈承琦、李容发部深入敌后作战，打乱了淮军的进攻部署，迫使李鸿章不得不从前线抽调部队回援，减轻了对常州等地太平军的压力。可是，这支部队深入敌占区后，仍热衷于围攻城市，并与回援之敌进行正面对阵，而没有坚持游动作战，因而最后仍难免被敌人击败。

淮军在肃清突入江阴、常熟、无锡境内的太平军之后，又聚集于常州外围。4月22日，淮军水陆协同，攻占了常州西南的陈渡桥，太平军通金坛、丹阳之路均被切断。23日，常州城外的要点尽失，太平军全部退入城内。27日，大南门、小南门和北门城墙被淮军轰塌数处，太平军顽强抵抗，多次击退敌之冲锋。后淮军在城壕外构筑长墙，移近炮位，并在晚间于护城河上偷架浮桥。5月10日，淮军发起总攻，以大炮对准旧缺口猛烈轰击。至11日，南城、北城各被轰塌十余丈，淮军由缺口冲入。太平军与突入之敌展开激烈的巷战，淮军付出了重大代价才占领常州城。陈坤书被俘后惨遭杀害。

4月25日，提督鲍超部陷金坛。5月13日，提督冯子材部陷丹阳。至此，苏南各城全部被清军攻陷。

五、浙江战场的失利

当各路湘军节节东犯、曾国荃部兵临天京城下时，镇守浙江的太平军李世贤、黄呈忠、范汝增等部，也受到来自东西两面敌军的夹击。

浙东方面，清军与英法侵略军勾结起来，于1862年5月10日攻陷宁波。8月2日，洋将马惇率“常胜军”一队自上海到达宁波，会同“常捷军”进犯余姚，威逼绍兴。9月，黄呈忠、范汝增部对敌发起反击，进占慈谿，威胁宁波。“常胜军”统领华尔奉李鸿章之命，率千人自上海赴宁波，于21日攻占慈谿。在这次战斗中，华尔受伤丧命。1863年3月，浙东的中外反动联军再次发起进攻，于3月15日占领绍兴，20日占萧山，前锋直抵杭州城下。

浙西方面，新任浙江巡抚左宗棠于1862年2月中旬率部由皖南进入浙江后，不久连占开化、常山、遂安、江山等地。同年5月31日，左宗棠由江山进至衢州，所部湘军进至汤溪、兰溪一线，威胁金华。从6月起，李世贤部在龙游、汤溪、兰溪一线对左宗棠所部湘军进行了顽强的反击战。同年秋，浙江布政使蒋益澧率湘军近万人由广西到达浙江，增强了左宗棠的兵力。而太平军方面，由于曾国荃部围困天京，李世贤奉命回援，留浙的太平军兵力减少。于是，左宗棠乘机督军于同年冬对浙西太平军发起新的攻势。1863年1月2日陷严州，2月28日陷汤溪，3月1日陷龙游、兰溪。3月2

“常捷军”系清政府勾结法国侵略者组成的反动武装，又称“花头勇”、“中法混合军”。1862年7月，募集中国士兵约千人（后扩至一千五百人，最多时达三千人），装备洋枪、洋炮，由法国军官训练，以法驻宁波舰队司令勒伯勒东为统领，宁波海关税务司法人日意格为帮统。1864年10月15日解散。

日，太平军弃守金华。接着，旬日之间，湘军又连陷武义、永康、东阳、义乌、诸暨、桐庐，3月24日开始进攻杭州西南的富阳。

富阳是湘军进攻杭州必经之地。“县城背江面山，右阻一溪，形势完固”，太平军占领杭州之后，即“于此修筑城垒，雉堞一新”。湘军蒋益澧部自3月下旬开始进攻富阳以来，屡为太平军守将汪海洋部所败。直至9月20日，才在“常捷军”千余人的协同下攻占该城。湘军既占富阳，便沿钱塘江直逼杭州。同时，分兵趋余杭（杭州西），企图切断杭州太平军的后路。双方在杭州、余杭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

1863年底，苏南战场的军事形势严重恶化，苏州、无锡落入敌手。淮军除进攻常州外，分兵一支南入浙江，进攻杭州东北的重镇嘉兴。嘉兴附近的平湖、乍浦、海盐、澉浦、海宁、桐乡等地的太平军守将纷纷投敌叛变。1864年3月25日，嘉兴失守，坚守杭州的太平军陷于敌人的三路围击之下。

3月28日，湘军在“常捷军”的配合下，对杭州发起猛攻，用大炮轰塌凤山门城垛约三丈，乘势涌入，后被太平军全部逐出。30日，敌军向武林、钱塘、凤山、望江、清泰等门发起猛攻（以武林门为主攻方向），太平军坚决抗击，给敌以重大杀伤。当天晚上，陈炳文等率部北走德清，杭州于次日晨落入敌手。同日，汪海洋弃余杭北走，余杭亦失陷。

4月14日，李世贤会同陈炳文、汪海洋、黄呈忠、陆顺德等，自德清抵浙西昌化，拟离浙入皖。杨辅清、黄文金等留守湖州。至此，浙江全省基本上为湘军占领。

太平军在浙江转战三年，给了敌人以沉重打击，但由于缺乏不间断的集中统一指挥，各部行动不能协调一致，加上后期士气低落，有的将领投敌叛变，终于在中外反动派的联合进攻下失败了。苏南与浙江根据地的丧失，使天京的东南屏障不复存在，军需和粮食供应断绝，进一步陷入了被动局面。

六、天京的陷落

湘军于1863年6月底攻破九洑洲，控制了长江北岸以后，鲍超部自江北南渡，扎营神策门（今中央门）外沿江一带。9月，曾国荃部攻占了天京城东南的上方桥和城西南的江东桥。11月上旬，又连续攻占了城东南的上方门、高桥门、双桥门、七桥瓮以及秣陵关、中和桥，太平军在紫金山西南的要点全部失守。中旬，湘军又攻占了淳化、解溪、龙都、湖熟、三岔镇；侍郎彭玉麟、提督杨岳斌（即杨载福）的水师和鲍超部又攻占了天京东南要地高淳、东坝。下旬，溧水太平军守将降清。从此，天京城南百里内再无太平军踪迹。

11月25日，巡抚曾国荃及提督萧庆衍部进扎城东孝陵卫。这时，天京

左宗棠：《水陆各军攻剿大胜见（现）筹办情形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四，第38页。

城只有太平门、神策门尚与外界相通，危在旦夕。

12月20日，李秀成自丹阳回到天京，次日即向洪秀全建议：鉴于湘军壕深垒固，围困甚严，天京内无粮草，外援难至，不如“让城别走”。洪秀全厉声斥责说：“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具[惧]之有。……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与[于]水，何具[惧]曾（妖）者乎！尔怕死，便是会死，政事不与尔干，王次兄勇王执掌，幼西王出令，有不遵幼西王令者台朝诛之。”当时，可供洪秀全选择的只有两种可能：或者死守天京，与孤城共存亡；或者让城别走，摆脱被围的困境，收集各支太平军，重整旗鼓，另作良图。权衡利弊，后者才是太平军唯一的出路。因为，当时天京尚未完全中断与外面的联系，突围仍有可能；更重要的是这时散布于各地的太平军尚有数十万之众，在洪秀全的号召下，把他们集中起来，统一指挥，重振军威，实行正确的战略战术，仍有可能打出一个新的局面。可是，由于洪秀全迷信愚昧、刚愎自负已经到了无可挽救的程度，断然拒绝了李秀成“让城别走”的建议，致使太平天国革命事业丧失了最后的一线希望。

1864年2月28日，湘军攻占了紫金山巅的天保城。3月2日，曾国荃部进驻太平门、神策门外，对天京形成合围。

曾国荃部合围金陵之后，曾于3月14日用云梯攻城，但未得逞。4月开始，在朝阳、神策、金川门外挖掘地道十余处，准备轰塌城墙。太平军一面组织力量从城内对挖，进行破坏，一面构筑月城，以便城墙轰塌后继续组织抵抗。

1864年（同治三年）6月1日，天王洪秀全病逝（一说自杀），终年五十一岁。此后，天京人心愈加不安。五天之后，全朝文武扶幼天王洪天贵福即位，一切军政事务统归忠王李秀成执掌。

7月3日，湘军攻占紫金山地保城（即龙脖子），从而可以居高临下监视城内的动静。湘军在龙脖子山麓修筑炮台数十座，对城内日夜轰击，压制太平军的炮火，掩护其攻城准备工作的进行；同时，在龙脖子山麓与城墙间大量填塞芦苇、蒿草，上覆沙土，高与城齐，为攻城铺平道路，还在附近距城十数丈处日夜挖掘地道，准备攻城。半个月后，湘军攻城准备工作基本就绪。

李秀成见湘军攻城在即，于7月18日深夜，选派千余人伪装湘军，冲出城去，企图破坏太平门附近的地道，结果被湘军识破，退回城内。

7月19日晨，湘军担任主攻任务的部队齐集太平门外。午刻，地雷轰发，城墙被轰开很大缺口，湘军蜂拥而入。太平军纷纷以枪炮还击，虽给敌人以重大杀伤，但终未能堵住缺口。湘军由太平门入城后，兵分四路向纵深进攻：中路由副将王远和等率领，直插王府；右路由按察使刘连捷率领，直插神

策门，与由神策门缘梯而入的朱南桂部会合后，西趋狮子山，夺取仪凤门；中左路由道员彭毓橘等率领，直插通济门；左路由提督萧孚泗等率领，夺取朝阳门、洪武门。朝阳等门失守后，驻守西南各门的太平军开始动摇，提督罗逢源等部乘势自聚宝门攻入，总兵李金洲等部自通济门攻入。与此同时，提督黄翼升也率水师各营夺占中关，乘胜猛攻滨江之垒，会同道员陈湜等部夺取了水西、旱西两门。及至傍晚，天京全城各门均为湘军夺占。

李秀成于19日凌晨自太平门败退后，即回到天王府，独带幼天王一人，由数千文武护送，奔向旱西门，企图由此突围出城，结果为陈湜部所阻，只得转上清凉山。入夜，折回太平门，伪装湘军，由缺口冲出，向孝陵卫方向突围。不久，李秀成与幼天王失散，便分道奔逃。曾国荃派七百名马队追击。21日，在淳化镇俘获列王李万材，在湖熟镇一带追杀章王林绍璋和幼西王萧友和等。22日，李秀成也在方山附近被俘。7月28日，曾国藩自安庆到金陵，令李秀成书写供词。8月7日，李秀成写完供词，即被杀害，年仅四十岁。

湘军于大肆抢劫之后，将天京城内某些建筑物付之一炬，以消灭罪迹。全城一片火海，一直燃烧至26日。城内所有太平军将士，或在战斗中牺牲，或被湘军杀害，或聚众自焚，十余万人无一降者。湘军围城两年有余，前后死于疾病者万余人，战死者八九千人，同样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七、太平军余部的继续奋战与最后失败

天京的陷落，标志着太平天国的失败。但是，分散在长江南北各个战场上的数十万太平军，继续高举太平天国的旗帜，英勇顽强地抗击着敌人的进攻。

在长江以北活动的主要是自西北回援的太平军。1864年2月，远征西北的陈得才等部太平军为救援天京，决定由陕西南部分三路东下：北路由陈得才、蓝成春、赖文光等率领，由宁陕出镇安、山阳、商州（今商县）；中路由梁成富率领，由石泉、汉阴出兴安府（今安康）、郧阳（今湖北郧县）；南路由马融和等率领，由西乡出紫阳、砖坪（今岚皋）、平利、竹山。三路太平军相约于南阳、襄阳一带会齐。北路按预定路线东进，中路和南路则为清军阻截，亦转由北路出陕。4月下旬，在河南西南的淅川一带先后与捻军陈大喜、张宗禹两部会师，众至数十万，声势甚壮。不久，梁成富部又折回陕西，主力则由陈得才等率领，由新野入湖北，经枣阳、随州、应山、黄陂，于6、7月间进抵黄安、麻城，受到湖北提督成大吉部的阻截，未能进援天京。当得知天京陷落后，军心动摇，战斗力大不如前，8月下旬，这支部队在麻城一带分兵两路：一由陈得才等率领，东入安徽；一由赖文光、张宗禹等率领，北入河南。之后，又一起转战于鄂皖地区。11月上旬，在安徽霍山黑石渡为清军所败，马融和率众数万降清，蓝成春被叛徒出卖殉难，陈得才

见大势已去，服毒而死。余部在赖文光率领下，与捻军合编，经过整顿，又成为一支很有战斗力的部队，坚持与清军战斗到 1868 年。

长江以南的太平军，开始以浙江湖州和江西为基地，后转至福建、广东，至 1866 年失败。

1864 年 7 月，从天京突围出来的幼天王洪天贵福在江苏东坝与率兵来迎的洪仁玕相遇，随即回到皖南广德。8 月 13 日，洪仁玕至湖州，准备与黄文金等坚守城池，左宗棠部湘军、李鸿章部淮军围攻湖州甚急，守城太平军顽强作战，数次大败清军，但南门守将陈学明于 8 月 26 日向清军投降，形势对太平军极为不利。洪仁玕、黄文金等不得已于 27 日夜弃湖州退往广德，29 日夜，护幼天王离广德走宁国、昌化。途中，黄文金受伤牺牲，洪仁玕护幼天王经开化、常山等地，于 9 月 22 日入江西玉山，企图与先期入赣的李世贤、陈炳文及汪海洋等部会合，再入湖北会合陈得才部，重振太平天国大业。不期李世贤等部已转移至赣、粤、闽三省边界地区，洪仁玕率部追赶，10 月 9 日在石城杨家牌遭敌袭击，幼天王与洪仁玕等被冲散。洪仁玕北走广昌，在白水镇被俘。幼天王逃至石城荒山中，25 日亦被敌军搜获。11 月 18 日，年仅十六岁的幼天王在南昌被凌迟处死。五天之后，洪仁玕亦于南昌遇害。

在洪仁玕部入赣之前，已有三批太平军突破清军重围进入江西。1864 年 2 月 4 日，李世贤、谭星、林正扬等率军八万人自江苏溧阳突围，经安徽广德、宁国入浙西昌化。李世贤以宜兴、溧阳紧急，折回赴援。谭星等突破清军的重重封锁，于 2 月 26 日自浙江开化入江西玉山，进向广信。此为第一批入江西的太平军。3 月上旬，溧阳太平军守将吴人杰率部降清，李世贤随即率部进入浙江，于 6 月中旬会同弃守杭州、余杭的陈炳文、汪海洋各部自德清经昌化入皖南，4 月下旬进至江西德兴、玉山一带。此为第二批入江西的太平军，共约二十万人。第三批为刘肇均、朱兴隆、林彩新所率部众约三万人，5 月初自常州、丹阳出发，经浙江昌化、安徽宁国、婺源入江西德兴、弋阳。沿途遭清军堵截，损失很大，林彩新落水牺牲，刘肇均率残部与李世贤部会合。

二三十万太平军入赣，统治阶级视为“腹心大患”而全力专注。曾国藩、左宗棠等急忙从江苏、浙江和湖南等地陆续抽调湘军往援江西。7 月中旬，督办江西皖南军务的新任陕甘总督杨岳斌和提督鲍超又率水陆湘军二万人到达江西，使在赣清军总数达到五六万人。

进入江西的二三十万太平军一直在赣江以东和赣闽边境活动。李世贤部攻抚州不下，6 月底占宜黄、崇仁，与据南丰的谭星部相联络。陈炳文、汪海洋部则占据金溪、东乡等地。太平军对抚州形成包围之势。7 月 16 日，杨岳斌到达南昌，立即与巡抚沈葆楨指挥清军向太平军展开进攻。8 月 5 日，鲍超所部湘军大败汪海洋部于抚州东南的许湾镇。陈炳文惧战，弃东乡、金溪，并于 13 日率部六万余人（内洋枪队七千余人）向鲍超投降。16 日，汪

海洋等占新城，旋因鲍超部追至，弃城走南丰、石城、瑞金。在此期间，李世贤部受到敌军的猛烈攻击，先后弃崇仁、宜黄、南丰，经广昌、宁都、雩都（今于都）、信丰、大庾（今大余），于9月17日越梅岭关入广东，后游击于粤赣边境。10月4日，李世贤部占广东镇平（今蕉岭），后入福建，于14日占漳州。陆顺德部则于9日占福建永定，15日占龙岩。同日，汪海洋亦率部自江西瑞金进入福建汀州（治今长汀）境内。

由于太平军余部会集闽南，闽浙总督左宗棠不得不由杭州赶赴福建督师。所部湘军二万余人分三路入闽：西路由帮办福建军务刘典等率领，由江西建昌入汀州；中路由提督黄少春等率领，由衢州经江山，取道浦城、建宁府（今福建建瓯）南下；东路由提督高连升率领，由杭州赴宁波，乘英轮由海道抵福州。

12月1日，李世贤部在漳州万松关大败署福建陆路提督林文察部和水师总兵曾玉明部清军，毙林文察等约千人。17日，刘典率部自连城南下，汪海洋、谭体元、李远继等部大败敌军于连城南面的新泉一带。

左宗棠鉴于冒进失利的教训，改取“渐逼渐进”的战术，以高连升、黄少春部六千六百人攻漳州，康国器、刘明珍部四千五百人攻龙岩，刘典、王德榜、王开琳等部一万八千人攻汀州、连城。1865年1月26日，署汀州镇总兵关镇国在副将方耀所率广东清军的配合下，占领了永定县城。2月19日，康国器部攻占龙岩，陆顺德部败走漳州。这样，在漳州的李世贤部与在汀州、连城一带的汪海洋部之间的联系被切断。刘典和署福建按察使王德榜等部连续向汪海洋部进攻。2月22日新泉一战，汪海洋部大败，精锐损失几半。3月1日，又败于南阳，遂向龙岩、南靖、永定一带转移，沿途屡遭清军堵截，损失惨重。

清廷为加强镇压福建太平军的兵力，又从江苏调派提督郭松林率淮军八千（均装备有洋枪）由海道去福建，3月31日抵厦门。4月11日，李世贤率部自漳州主动出击，遭到郭松林部的反击，伤亡三、四千人。5月15日，郭松林、高连升、王德榜指挥淮军和湘军攻破漳州，李世贤率部巷战，伤亡万余人，力不能支，突围撤走。16日，陆顺德亦弃南靖。5月26日，李世贤、陆顺德等部于永定塔下又为刘典和康国器部清军所败，损失约二万人，次日又有三万余人投降清军。李世贤所部损失殆尽，只身逃出，陆顺德则率余部入粤，占镇平，走平远。

汪海洋部太平军也接连失利。4月22日，该部败于南靖、永定、龙岩间，六千余人牺牲。漳州失陷后，汪海洋、李远继等部与康国器部清军战于永定，损失很大，后于6月10日由上杭经武平入广东镇平。

李世贤昼伏夜行，于8月19日至镇平，入汪海洋军营，不意四天之后竟为汪海洋刺死，年仅三十二岁。

汪海洋因内部不和擅杀李元茂（李世贤叔）等，此时畏罪不安，复遣人刺死侍王李世贤。

8月29日，陆顺德、林正扬部占广东长乐（兴宁西南）。9月20日，林正扬执陆顺德，献城降清。

9月28日，镇平为高连升等部攻占，汪海洋部经平远入江西定南、龙南，又为清军席宝田部所败，复折入广东，占和平、连平。12月初，经龙川抵兴宁，8日攻占嘉应州（今梅县）。此前，清廷曾命左宗棠赴广东督师，并节制各路清军。1866年1月15日，左宗棠抵广东大埔，檄调鲍超、刘典、高连升、康国器、黄少春、王德榜诸部三四万人，在二万余粤军的配合下，对嘉应州实行四面包围。1月28日，汪海洋在督率所部反击清军时中弹受伤，2月1日牺牲，年三十六岁。余部由谭体元统领，弃嘉应州南走。后在黄沙嶂山中迷路，被清军追及，谭体元力竭坠崖牺牲，部众或战死或投降。至此，除与捻军合编的赖文光所率部众尚在坚持斗争外，太平天国革命战争终以失败而结束了。

第八节 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失败的教训

历时十五年、遍及十七省的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其规模之浩大，战事之激烈，内容之丰富，影响之深远，为农民革命战争史上所罕见。太平天国的英雄们在这次战争中坚忍不拔，英勇奋斗，不仅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而且勇敢地抗击了外国侵略者的武装干涉，揭开了中国人民反封建反侵略的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极其光辉灿烂的一页。

太平天国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国，虽已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封建经济基础仍然根深蒂固。由于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资产阶级，也没有无产阶级，因此，太平天国革命本质上依然是一场旧式的农民革命运动，它不可能完成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范畴的种种任务。然而，革命的声势如此波澜壮阔，革命的纲领和政策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农民战争都要完备的太平天国革命，最终遭到失败，其原因和教训是值得认真探讨的。

历史上任何一次人民起义，在开始时，它的力量总是弱小的。如果起义的领导者主观指导正确，就能逐渐壮大自己，最终战胜强大的敌人。太平天国革命时期的清王朝，控制着全国政权，拥有八九十万军队和雄厚的人力物力资源，特别是1860年以后，中外反动势力互相勾结，共同镇压人民起义，给太平天国革命战争造成了更大的困难。尽管如此，由于太平军的力量也相当强大，而且顺应人心思变的潮流，如果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不是在主观指导上存在许多错误，是有可能取得革命战争胜利的。这里着重从政治和军事两个方面对太平天国领导者所犯错误加以探讨。

一、政治方面的失误

（一）没有形成能统筹全局和团结一致的坚强领导核心

太平天国起义初期，虽然形成了一个以洪秀全为首的六王领导核心，但内部存在着广东、广西等派别和较为明显的宗教迷信色彩。建都金陵后，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之间不仅宗派情绪有所发展，而且迅速滋长了享乐腐化思想，争权夺利，终于导致最高领导集团内部的相互残杀，产生了最大的领导危机。

天京内讧以前，洪秀全未能善处矛盾，事后又没有正确汲取教训。他不是大胆地选拔和重用有威望有才能的将领，组成新的领导核心；相反，却增加了疑忌心和宗派情绪，开始搞家天下。石达开被迫出走以后，天京的军政大权操于洪氏家族手中，引起不少将领的埋怨和不满。到了晚期，洪秀全不得不依靠陈玉成、李秀成等有作为的年轻将领支撑危局，但对他们同样不是真心信任，竟滥封诸王，致使陈、李不能发挥统一指挥的作用，结果助长了

分散主义，甚至出现了分崩离析的局面。没有一个能够统筹全局的有权威的领导中枢，对前线也就不能实施集中统一的指挥调度。清军则相反，由开始时的多头指挥逐渐改变为由曾国藩集中统一指挥。这是太平军在后期战争中经常失利，并最终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未能制定一套适合时宜的政策和策略，形成革命的大联合

洪秀全等用拜上帝教的形式，创立了一套以朴素的平等思想为内容的农民革命理论，对于发动农民群众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他们硬要人们只拜“独一真神”“皇上帝”，企图用在中国社会中没有群众基础的外来的宗教迷信代替旧有的宗教习惯，不仅一般群众难于接受，而且造成了与以中国社会旧有宗教为号召的其它各种起义组织的隔阂。当时，在太平天国革命影响下，全国掀起了革命的高潮，但是太平天国基本上没有能把各地的起义武装团结起来，形成广泛的革命的大联合。

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反对某些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封建思想和文化，对于解放农民的思想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他们自身却不能冲破封建思想和旧礼教的罗网，在建都金陵以后，竟将封建等级和世袭制度以及“三纲五常”等与神权相结合，作为巩固其政权的工具，结果日益走向封建化，并愈来愈严重地脱离了群众。

太平天国对清王朝的坚决斗争精神，给受压迫受剥削的农民带来了鼓舞和希望。但在斗争过程中，没有把打击的矛头集中在清王朝以及依附于它的大地主大官僚身上，而是无区别地把中小官僚以及清军中的下级官弁等也列为“妖”类而加以打击，因而不利于分化瓦解敌人，进一步扩大自己的队伍。

此外，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为农村制定的绝对平均主义的土地政策，为城市制定的取消商品交换的政策，以及拆散家庭、男女分居的社会生活制度，虽然后来作了改变，但已造成不良影响，为敌人进行反对太平天国的恶意宣传提供了可乘之隙。

上述种种不合时宜的政策和策略，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革命大联合的形成，而没有革命大联合，自然难以推翻当时还比较强大后来又得到资本主义列强支持的清王朝的反动统治。

（三）不善于罗致人才，缺少谋士

洪秀全等太平天国的领导人中，有的虽有一定的文化，但毕竟阅历不深，知识有限，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都知之不多，缺乏全面地分析形势和制定正确的政策与策略的能力。但只要他们能象历史上某些起义领袖那样，广招贤士，虚心求教，是可以弥补自己的知识和领导经验不足的。可惜，太平天国的领导者没有采取积极措施，寻求更多胸怀韬略的有识之士，使他们为

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出谋献策。定都金陵后，洪秀全日益滋长保守和封建迷信思想，最后竟发展到“信天不信人”的荒谬地步，当然更谈不上礼贤下士、网罗人才了。而没有招纳和培养一批有才能的政治家、战略家，这不能不是太平天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军事方面的失误

（一）忽视军队的提高与巩固工作

金田起义时，洪秀全等对部队规定了严格的纪律，并实行圣库制度，以保证部队的供给和将士的清廉。太平军内部还有一套教育训练制度，使部队的军政素质不断提高，因而能以少胜多，打破清军的围追堵截，发展革命的大好形势。

早期的太平军还注意发挥各类人员的特长，及时组建新的部队。如由挖煤工人组成的“土营”，在城市攻防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船户组成的“水营”，在攻占武昌和进军金陵的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在建都金陵之后，太平天国的领导者却忽视了部队的提高和巩固工作。由于对控制长江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忽略了加强水师的建设，没有将战船和运输船分别编组，不注意改进战船和船炮的技术性能，加强战船的作战训练，以提高水师的作战能力。因此，在西征作战中遭到惨重损失，丧失了水上控制权。此外，在已经具备条件的情况下，没有及时组建“马队”和“炮队”等新的兵种。这些，都影响了战斗力的进一步提高。

天京内讧后，太平军的元气受到很大损伤。后来吸收了大批新战士，游民和散兵不断增加，部队的成分远不如以前纯洁。面对这种情况，太平天国的领导者没有重视部队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以致军政素质和战斗力明显下降。后期的不少战斗，太平军虽在兵力上占有明显的优势，却屡为清军所败，除了作战指挥方面的原因外，与部队的战斗力下降也是直接有关的。

随着太平天国在政治上日趋腐化，将士中的离心倾向和悲观失望情绪也逐渐发展，以致后期率众叛降事件不断发生。这对太平军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是很大的削弱和打击。

（二）战略决策屡犯错误

太平军出广西，越湖南，攻武汉，取金陵，威震中外。在这种情况下，清王朝必然加紧调兵遣将，全力堵截和进剿。而当时太平军的兵力还很有限，受“围剿”的态势尚未改变，也没有建立起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战略基地。可是，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却陶醉于初步取得的胜利，对彼己力量对比作了错误的估计，因而实行军事冒险主义，作出了不符合客观条件的既北伐

又西征的战略决策，在无法实施战略协同的两个方向同时出击。结果，北伐军全部覆灭。西征军也付出了重大代价，虽然占领了武汉、九江、安庆和其它部分地区，但未能在天京上游建立起连成一片的根据地。这种战略决策上的错误，使太平军损失惨重，坐失了有利的发展时机和战略上的主动权。

此后，太平天国的领导者在军事上开始由冒险变为保守，一系列大的作战行动都是围绕保卫天京而进行的。虽然取得了攻破江北、江南大营的胜利，并乘胜开辟了苏南根据地，但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仍然未能客观地分析形势，认真研究敌情，确定主要打击方向，以致在战略决策上又接连犯了几次错误。

当时，苏浙方向的清军由于兵力薄弱，基本上采取守势，上海的外国侵略者尚未撕下“中立”的外衣，因此，对天京的威胁主要来自上游的湘军。太平军只有在西线集中兵力，击败湘军，才能争取战略上的主动权。可是，当李秀成部攻占苏南大部县城，取得人力物力补充后，不是立即回师西进，而是继续向上海发动进攻，直至湘军大举进犯时，才将主力转向西线，而此时已失先机之利。在安庆解围作战中，陈玉成、李秀成两部，又未能根据湘军兵少和后方空虚等弱点，坚决攻取武汉，横扫两湖、江西，切断湘军补给线，打乱其进攻部署，以争取主动。嗣后，江北诸军为救安庆而被迫决战，江南主力（李秀成部）则回师江浙，再攻上海，形成了兵力分散，各自为战的不利局面。

安庆失守后，洪秀全株守金陵，坐待敌人来攻。他既不迅速调集兵力迎战湘军，也无长远决策，听任战局自流发展。直到天京被围，才赶忙催军救援，致使战局陷入危殆。最后，在只有弃城别图一线希望时，仍顽固地坐以待毙，终至完全失败。

在战略决策方面，老奸巨猾的曾国藩显得略高一筹。他根据历史经验，认为要打败太平军，必须首先占领天京上游的战略要地安庆，然后逐步东进。为了实现这一计划，他甚至以种种借口违抗清廷关于分兵援救苏、常的命令，坚持集中兵力围攻安庆，并终于达到了目的。太平天国的领导者既不认真研究敌人，也不努力提高自己的战略修养，以致战略指导上逊于敌人，这也是军事上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

（三）兵力分散，各自为战，缺乏集中统一的指挥

建都金陵以后，太平军在三河镇大捷以及攻破江北、江南大营的作战中，注意集中优势兵力和实施统一指挥，因而取得了重大胜利。但在不少次作战中，不是由于兵力不集中，就是由于指挥不统一，因而造成失利。缺乏统一指挥，各自为战，从而导致作战失利的明显战例，是安庆会战。当时，参战的太平军在兵力上占有数倍于敌的优势，但是，对于这样大的作战行动，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不仅没有指定最高前线指挥员，而且江南的四路部队

也无统一指挥，结果形成各打各的，甚至想打就打，想走就走，徒有兵力优势而形不成拳头，不能在有决定意义的方向上给敌人以致命打击，反为少于自己的湘军击败。之所以如此，前期主要由于骄傲轻敌，企图速胜；后期主要由于没有有权威的最高统帅和滋长了分散主义。

曾国藩在取得湘潭、武汉之战胜利后，也曾犯过分兵冒进的错误，吃过被太平军分割、围困的苦头。但他以后汲取了教训，基本上采取集中兵力于天京上游，并在作好充分准备之后才逐步推进的方针，从而取得了较好的战果。而太平军在碰了许多钉子之后，却始终没有改变分兵作战的状况，因此不但不能更有效地歼灭敌人，反而被敌人各个击破。

（四）偏重于城市攻防战，忽视在机动作战中大量歼敌有生力量

在太平天国后期战争中，除石达开部走上流寇主义道路外，长江两岸的太平军主力主要是进行城市攻防战，不重视在野战中歼灭敌人有生力量。长于攻城是太平军的一个优点，但围绕几个主要城市同敌人反复争夺，特别是把天京作为一个最大的包袱背了起来，为保卫天京而不惜牺牲和消耗，牵动全局，使自己处于被动地位，造成亡军亡城的严重恶果，实为一大失策。究其原因，主要是在取得一定胜利后，滋长了享乐思想，政治上也就日趋保守。同时，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不懂得城市保卫战必须与野战相配合，不懂得只有不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根本变化，才能有效地保卫城市，而消极地保卫城市，必然落得个人地两空。

由于不重视野战歼敌，在攻城和解围作战中，往往在城外死守营垒，以阻援敌，而不是创造战机伏击、袭击援敌；在进攻敌人营垒时，往往只注意正面强攻，不注意侧后迂回包围，致攻破敌营后，不能及时截歼逃敌，打不了歼灭战，使敌人得以散而复聚，重新构成威胁；在防御作战中，往往单纯依托阵地进行正面阻击，或节节退守城镇，与进攻之敌拚消耗，不注意设伏诱敌，或从敌后袭扰、牵制敌人；在敌人分路进攻的情况下，不愿主动放弃一些次要城镇，集中兵力于机动位置，出其不意地围歼敌之一路，再及其余，以各个击破敌人。不注意学习野战歼敌战法，是太平军军事上的一大缺陷。

太平天国革命战争虽然失败了，但这次战争的影响是巨大的。它激励着中国人民再接再厉地向封建主义和外国侵略势力进行英勇顽强的冲击，从而为中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奠定了基石。

第五章 捻军起义战争 (1852年11月—1868年8月)

在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和推动下，苦难深重的中国各族劳动人民，纷纷举行武装起义，反对封建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与剥削，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波澜壮阔的革命高潮。其中，规模和影响较大，坚持斗争时间较长，在军事上有一定意义的，有兴起于豫皖苏鲁边的捻军起义战争，两广天地会领导的大成国起义战争，上海小刀会起义战争，贵州各族人民起义战争，云南回民起义战争，川滇李永和、蓝朝鼎起义战争和陕甘回民起义战争。这些起义战争，对太平天国革命战争起了直接和间接的配合作用，有的在太平天国失败后仍然坚持着斗争。对于这些起义战争的始末及其经验教训，在本章和下两章中，将分别进行叙述和探讨。

捻军起义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仅次于太平天国革命战争的一次农民起义战争。它前后历时十六年，战场遍及安徽、河南、山东、江苏、河北、陕西、湖北、山西等省。由于捻军纵横驰骋于中原大地，与太平军南北呼应，顽强地打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牵制了大量清军，因而有力地支援了太平军的革命斗争。不仅如此，捻军还与太平军有着密切的组织关系。在它接受太平天国的领导以前、以后和太平天国失败后，三个不同阶段各有其不同的情形和特点。为此，本章基本上按上述三个阶段来叙述捻军起义战争的发展过程。

第一节 捻军的兴起 (1852年11月—1855年8月)

十九世纪初，在安徽、河南、山东、江苏、湖北等省的某些地区就有捻党的活动，而以安徽北部的亳州（今亳县）、雒河集（今涡阳）、蒙城、宿州（今宿县）、颍州（今阜阳）和河南东部的永城等地尤为活跃。当地的一些贫苦农民和无业游民，为饥寒所迫，自发地结成一个个分散隐蔽的集团，进行反抗封建压迫，寻求生活出路的斗争。在皖北一带的方言中，称一部分、一支、一股为“一捻”，因而习惯地把这种分散活动的小集团称为“捻子”。

皖北河流纵横交错，具有较好的运输和灌溉条件。但长期以来，特别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由于清政府和地方官吏日益腐败，水利失修，河床淤塞，每遇大雨，便洪水横溢，泛滥成灾。1841年至1844年间，黄河连续三次决口，洪水经涡河奔腾下泻，使亳州、蒙城一带几度成为泽国，不少人流离失所，生活无着。1851年和1852年，又是久雨成灾，以致饿殍遍野，甚至出现以死人肉充饥等惨不忍睹的景象。然而，当地的官吏不但不采取抢险赈灾、休养生息等措施，反而勾结豪绅、地主，强迫农民照旧完粮纳税，并通过放高利贷、兼并土地等手段，敲骨吸髓地盘剥农民。苛捐杂税多达数十种，连耕畜、农具、树木、房屋、家禽，以至婚丧嫁娶等都要纳税。官府横征暴敛，凶狠异常，“差役横行，甲于他省”。

残酷的压迫与剥削，迫使皖北广大劳动人民进一步地起而反抗。许多城镇的农民和失业的手工业者、船夫、码头工人以及被裁撤的兵勇，纷纷结捻而起，开展“打粮”、“吃大户”、抗粮抗差和杀富济贫的斗争。由于皖北的亳州、雒河集、蒙城、寿州（今寿县）、宿州以及河南的永城、夏邑处于安徽、河南、江苏三省交界，属于“三不管”的地方，统治力量比较薄弱，这就为捻党的活动提供了客观有利条件。此外，皖北一带有不少人结捻进行贩盐活动，组织了不少保运私盐的武装集团，和盐巡作斗争。这些集团经常往返于皖北各地，甚至远及河南、山东、江苏三省，与那里的人民发生联系，对当地的捻党起义起了推动作用。

1851至1852年，太平天国在广西起义并向两湖胜利进军，影响所及，使北方捻党活动更趋活跃。“河南之归（归德府，治今商丘）、陈（陈州府，治今淮阳）、南（南阳府，治今南阳市）、汝（汝宁府，治今汝南）、光（光州，治今潢川），江苏之徐（徐州府，治今徐州市），山东之兖（兖州府，治今兖州）、沂（沂州府，治今临沂）、曹（曹州府，治今菏泽），所在有之。而安徽之凤（凤阳府，治今凤阳西）、颍（颍州府，治今阜阳）、泗（泗

黄钧宰：《金壶七墨》，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捻军》——以下简称《捻军》——第一册，第378页。

州，治今泗县）为甚，凤、颍所辖蒙、亳、寿为尤。”当时，比较著名的捻党起义武装有：河南南阳的乔建德和李大、李二部；安徽合肥的高四八和寿州的程六麻子部等。在豫皖交界处，有张乐行、龚得树（龚得）等于 1852 年 11 月以雒河集为中心聚众起义，而与张乐行有联系的永城冯金标、亳州朱洪占、蒙城胡元众、寿州刘洪立、宿州李殿元等十八人也各自率众起义，号称“十八铺”，并推张乐行为其总首领。此后，捻党起义武装多以“捻军”称之。

1853 年夏，太平天国北伐军先后占领凤阳、蒙城、亳州，进而占领豫东重镇归德府。当时，安徽、河南和江苏北部又有一批捻党举旗起义，和蒙亳地区的起义武装一起配合太平军作战。其中比较大股的有：永城的苏添福部和李月部，夏邑的王贯三、宋喜元部，固始的任二皮、刘疙瘩部，阜阳的李士林部，霍丘、固始边界的李昭寿、薛之元部，确山的雷六部等。此外，山东的曹县、城武（今成武）、菏泽、嘉祥、郓城等地捻党也都爆发了起义。这些起义武装，有的参加了太平军，有的给太平军当向导，有的单独攻城夺地。从此，揭开了轰轰烈烈的捻军反清战争的序幕。

当时，捻军的斗争还处于初始阶段，其活动的主要目的仍然是为了解决生活问题，缺乏明确的政治纲领和远大的战略目标。各支捻军即使在同一地区，也互不统属，分别由“趟主”（首领）带领，各自独立行动。“居则为民，出则为捻”，处于半农半军状态。另外，不少地区的捻军，有的为时不久即被清军镇压（如雷六等部），有的叛变投敌（如李士林等部），有的时降时反（如李昭寿、薛之元等部），而豫皖交界的张乐行、龚得树、苏添福等领导的捻军，则逐渐发展成为坚持反清斗争的主力。

《剿平捻匪方略》（以下简称《平捻方略》）序言，第 2 页。

1853 年 2 月，张乐行和“十八铺”的首领，曾受安徽巡抚周天爵招抚，并镇压过定远捻军陆遐龄部，这是一个洗刷不掉的过错。但张乐行自 1853 年 4 月脱离周天爵节制后，基本上能积极领导捻军进行反清斗争，并坚持和太平军联合作战的正确方针，直至 1863 年被俘就义。从他的一生来看，功绩大于过失。

第二节 转战皖豫边，与太平军南北呼应 (1855年9月—1857年2月)

一、雒河集会盟

1853年初，清廷命工部侍郎吕贤基督办安徽团练，给事中袁甲三为帮办。同时，起用前广西巡抚周天爵为安徽巡抚，带兵千余分驻宿州、颍州。因兵力不足，安徽清军对捻军基本上采取守势。10月，周天爵病死于颍州，旋由袁甲三负责安徽军务。袁手中兵力很少，便加紧筹办团练，驻守临淮关一带。河南方面，巡抚陆应谷拥有的兵力也很少，临时调集的数千清军，在商丘宋家集被太平天国北伐军打得溃不成军。10月，陆应谷被清政府撤职，遗缺由山东按察使英桂继任。英桂接任后，既要防止进至湖北的太平军北上，又要镇压豫北的“联庄会”军，也无法集中兵力攻捻。这就给豫皖边捻军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1854年3月，太平天国北伐援军由皖北进入豫东，张乐行、苏添福等部捻军配合太平军攻克永城县城，受到当地人民热烈欢迎。太平军北上后，负责办理归、陈二府团练的太康知县祝塏纠集豫东各县团练，进攻苏添福的家乡永城苏平楼，并乘机侵入亳州境内，烧杀抢掠。当地人民极为愤慨，纷纷参加捻军，保卫家园，一举打败了祝塏的团练和永城的地主武装“老牛会”，继又进攻蒙城等地的地主武装，于是捻军的声势日益壮大。1855年初，龚得树率领亳州捻军进入河南夏邑，与当地捻军王贯三部联合作战。这些行动，取得了两方面的成果：一是有力地打击了地主武装；二是使一些捻军领袖通过战争实践逐渐认识到了联合起来的必要性。

1855年秋，豫皖边的捻军首领齐集亳州的雒河集，举行了著名的“雒河集会盟”。会上，公推张乐行为盟主，并决定建立五旗军制，推举了各色旗的总首领：黄旗由张乐行自兼，白旗龚得树，红旗侯士维，黑旗苏添福，蓝旗韩奇峰（又称韩老万）。五旗之外，还有各种镶边旗和八卦旗、花旗、绿旗等。会后，张乐行发布告示，痛斥清政府地方官吏“视民如仇”，残酷搜刮民脂民膏，阐明起义的目的是为了“救我残黎，除奸诛暴，以减公愤”，并宣布“禁止抢掠，严缉奸淫”，“贫民衣粮，不准扒运”。此外，还制定了行军作战条例十九条，以严明军纪。

雒河集会盟，对捻军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会盟，多少改变了一部分捻军互不从属，各自为战的局面，为进行较大规模的作战提供了条件。

关于雒河集会盟时间，《涡阳县志》、《亳州志》、《永城县志》、《湘军志·平捻篇》等所记各异。据罗尔纲考证，应为1855年秋。

《捻军盟主张乐行的布告》，翦伯赞等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上册，第247页。

详见江地《初期捻军史论丛》（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244—245页。

由于制定了不侵犯群众利益的纪律，得到了群众的拥护，有利于依靠群众坚持斗争。但这时的捻军没有固定的编制，大旗之下的小旗，人数自几十人至数百人不等。旗中的成员也不固定，这次跟这一旗出战，下次可以跟另一旗出战，内部组织很松散。特别是各旗捻军基本上是按地域和宗族、亲戚关系结合起来的，因而彼此之间有很大的排外性，严重影响了在组织上和作战行动上的集中统一。在武器装备上，仍然十分简陋，除少量鸟枪、土炮外，主要是刀矛等冷兵器，加之各旗捻军并非脱产的专门武装，缺乏必要的训练，因而战斗力不强。由于皖北地势平坦，适于战马驰骋，所以捻军一开始就有少量骑兵。作战时，往往步兵在正面冲阵，骑兵从两翼包抄。这种作战形式，当对付装备较差、数量不多的清军和团练乡勇时，尚能奏效。

二、积极进攻守备薄弱之敌

雒河集会盟后，捻军很快发展到五六万人，斗志更加高昂。而这时皖北、豫东的清军兵力仍较薄弱。在豫东，只增加了道员张维翰率领的清军一千八百余人；在皖北，除原周天爵、袁甲三所部二三千人外，其余为颍州知府陆希湜、亳州知州绣纶率领的少量清军和团练乡勇。张乐行、龚得树、苏添福等捻军首领便乘此有利时机，发起进攻作战。

1855年9月27日，张乐行、苏添福等率三万余人首先打败陆希湜部于庙集，继败张维翰部于亳州东面的泥台店。随后，挥师北入河南，攻破夏邑，并西攻马牧集（今虞城），乘胜进围归德府城。正在进剿豫北“联庄会”的河南巡抚英桂急忙派遣驻陈州的道员王建泰等率部往援。张乐行等闻讯后，即转旗南返，于11月7日攻占安徽蒙城。

捻军四处出击，引起了清廷的不安。当时安徽巡抚福济和江南提督和春所部清军正被皖南的太平军所牵制，无力北顾。清廷遂提升曹州总兵武隆额为湖南提督，令其从山东南下，统辖总兵兴庆、道员张维翰、游击武全等所部清军数千人 and 地方团练，对付十倍之众的捻军。这时，捻军正集结重兵围攻亳州，河南按察使余炳焘率乡团万余人，于12月7日乘虚袭占了捻军根据地雒河集。张乐行等随即撤围亳州，率部沿涡河南下，旋又折向东北，在麻种集打败由徐州来援之清军兴庆部，进而围攻河南永城，迫使余炳焘乡团撤出雒河集而驰援豫东。张乐行等主动从永城撤围，于17日与武隆额部和乡团战于麻种集，首先将乡团击溃，进而包围武隆额部。激战约四小时，武隆额部大溃，军火尽弃，经马牧集向归德城逃跑。捻军乘胜攻占夏邑，再围归德府城。清政府斥责武隆额“怵怯无能”，将其撤职，命英桂急赴归德，督办豫、皖、苏三省剿捻事宜。同时，命江北大营派遣侍卫伊兴额、协领德昌率马队五百名取道滁州（今安徽滁县）入豫，命总兵朱连泰统带兖州、徐州清军千余人进驻亳州，均归英桂调遣。英桂还调南阳总兵邱联恩部及都司保英部约三千人驰援归德，使豫皖边的清军总兵力增至万余人。张乐行等得

悉清军援兵纷纷赶至，便率部返回雒河集。

1856年3月，张乐行等集中四五万人，再次分路进攻豫东清军，分别击败参将成龄、道员张维翰等部，并包围归德城。这时，归德城内清军甚少，英桂惶恐不安。但捻军未能乘此有利时机，一面加紧围城，一面待机攻歼前来解围的清军，也没有抽调兵力分别攻歼豫东溃败的清军和地方团练，而是又一次撤回雒河集，使豫东清军获得了喘息整顿的机会。

张乐行等返回雒河集不久，又率部南下作战。4月15日，配合宿、怀、凤地区的捻军任乾、夏白部围攻涡河与淮河交汇处的怀远城。该城由总兵郑魁士部千余人及乡勇驻守。捻军轮番攻击，一度由城西南方向冲进城内，焚毁清军营盘，重伤郑魁士，击毙参将以下多人。后因蒙城等地的清军赶来增援，捻军便从城内退出。这次作战虽未最后攻占怀远城，却取得了重创清军的胜利。不久，捻军主力北返雒河集。

三、雒河集争夺战

1856年3月下旬，清政府令袁甲三随同英桂剿办河南捻军，后又“屡降旨”，令豫军进攻雒河集。英桂认为：“雒河周围三四百里皆贼党屯踞，须渐次疏通，免为所袭”。据此，他确定了分进合击、稳步前进的作战方针。其部署是：以袁甲三、邱联恩等部为主力，从亳州以北向东南进攻，以傅振邦、伊兴额等部从永城、宿州向西南进攻，夹击雒河集。由于捻军事先缺乏防御作战的准备，因而一开始就陷入了被动不利的地位。

4月25日，清军傅振邦部四千余人和伊兴额马队千余人，从宿州向永城东四十里的茴村发动进攻（步队从两翼包抄，马队从正面进攻），捻军六千余人迎战。激战数小时，捻军损失二千余人，向南败退。初战失利后，张乐行命韩奇峰、苏添福等部三四万人进至宿州西北的濉溪口（今濉溪）和永城苗村桥一线阻击清军。4月30日，清军以傅振邦、伊兴额部奔袭濉溪口北面的丁家楼，捻军损失二千余人。接着，苗村桥方向的捻军也被清军击溃。其后，清军又乘胜占领了宿州的铁佛寺、临涣集等捻军据点。

当宿州方向的清军向南推进时，英桂命亳北方向的清军同时发起进攻。5月13日，邱联恩等部与捻军战于亳北之界沟获胜；22日再战于界沟南面的小柰集，又获胜；接着于5月31日与驻亳州的袁甲三等部会合，然后沿涡河向东南进攻。6月8日，捻军二万人在亳州东南的翟村寺地区阻击袁甲三、邱联恩等部清军。激战半日，被清军击败。其后，捻军主力又在翟村寺东南四十里的白龙王庙一带沿涡河两岸列阵阻敌。张乐行、韩奇峰率黄、蓝两旗在涡河北岸，龚得树、王贯三率白、黑两旗在涡河南岸，掘壕立栅，用车辆树木堵塞路口，冀图阻止清军的进攻。袁甲三派出马队抄袭捻军后

路。捻军腹背受敌，不得不再次撤退。清军乘胜推进，于6月19日攻占雒河集。

雒河集失守后，张乐行、龚得树、苏添福等捻军首领，为了调动敌人，毅然率部南下，于7月16日乘虚袭占了淮河流域的商业重镇三河尖（颍上西），获得了大量物资，补充了大批人员，士气复振。英桂害怕捻军西占河南的固始、光山，即移营陈州，就近调度，并令邱联恩部由雒河集移驻固始，袁甲三移驻颍州。河南的一些地方武装也纷纷向豫东南集中，准备拦截捻军西进。张乐行等乘清军南调，蒙亳一带守备空虚之际，便以船只满载大批胜利品沿淮河东行，在汪家集登岸后，经蒙城向雒河集挺进，于8月24日重返雒河集，处决了当地反动地主豪绅与乡团头目，为死难的将士和群众报仇雪恨。

捻军北返后，袁甲三、邱联恩等随即率部尾追，再次向雒河集进攻。9月10日，在亳州西面的十八里铺作战中，捻军黑旗首领王贯三不幸牺牲，部众伤亡二千余人，余部退往雒河集。张乐行等仍然冀图用外线出击的办法调动敌人，解雒河集之围。于是将捻军分为两路，一路东攻江苏的萧县、徐州，一路西攻太和等地。由于没有攻克要地和痛歼敌人，未能达到调动敌人的目的。11月28日，雒河集再次为清军攻占。张乐行等率捻军主力东撤，经曹市集退守临涣集。清军崇安等部追及，与捻军隔浍河对峙。崇安以连日进展顺利，疏于戒备。11月30日夜，龚得树率勇敢善战的敢死队，分四路袭击崇安军营。清军仓促应战，慌乱溃逃，西窜二百余里，退往亳州城。但是，捻军后来在庙集、尹家沟、赵旗屯等地的作战中接连失利，无法扭转被动局面。有鉴于此，张乐行、龚得树、苏添福等除留部分捻军在皖北坚持斗争外，率领主力再次南下淮河流域，于1857年2月中旬重占三河尖等地。此后，捻军开始了与太平军联合作战的新时期。

捻军从雒河集会盟到再次南下淮河流域，在一年半的时间内，随着参战清军的兵力由少变多，经历了由进攻作战转入防御作战的变化。在进攻作战期间，由于清军兵力薄弱，捻军“进退绰如，纵横跌宕，所向无前”，处于主动有利的地位，部队也迅速发展至十余万人。但这一时期的作战，除给少数清军和地主武装以歼灭性打击外，多数打的是击溃战，清军的有生力量没有受到重大损失，团练乡勇反而有所发展。在整个淮北地区，出现了捻军占领区与地主武装所控制的圩寨犬牙交错的局面，一些实力不大的捻军圩寨，不断遭到清军和地主武装的围攻。捻军的数量虽然迅速扩大，但组织程度和战斗力基本上没有多大改变和提高，战术上也没有多大改进，只注意击溃敌人而不注意追歼溃敌。这些，都给后来雒河集的防御作战带来了困难。在防御作战中，只有张乐行、龚得树、苏添福等几支捻军主力从正面阻击清军，其余分散的各支捻军只顾据寨自保，极少配合作战。当时，在永城、夏

邑、亳州、蒙城、宿州地区有许多旗色不同、人数不等的捻军，如果他们积极主动地从侧后袭击和牵制清军，势必使敌分散兵力，顾此失彼，即使集中了兵力，也因有后顾之忧，不敢放开手脚向雒河集推进。张乐行、龚得树、苏添福等在未能阻止清军进攻的情况下，没有与清军死拚硬打，而是跳出包围圈，进攻三河尖等清军必救之地，从而调动了敌人，保存了有生力量。这是捻军初期作战中的成功之处。

第三节 接受太平天国领导，与太平军并肩战斗 (1857年3月—1864年11月)

一、主力南下淮南与太平军联合作战

张乐行、龚得树等捻军首领鉴于在淮北屡战失利，南下三河尖后仍然受到清军的沉重压力，迫切希望取得太平军的支持和帮助。而太平天国继1856年内讧之后，石达开又率部出走，太平军的力量受到很大削弱，也迫切需要团结友军，共同对敌，因此，洪秀全决定实行联合捻军的方针，使其“能掌北门锁钥”，成为“南国之屏藩”。正是这种共同需要，促成了两支农民起义军的联合。

在捻军第一次占领三河尖时，双方曾商谈过联合作战问题，因敌人进逼，捻军很快回师北上，故未能实现。1857年3月初，捻军自三河尖南围霍丘。在击败道员金光箬所率八百清军后，即由龚得树、苏添福率部南下迎接太平军。这时，太平军陈玉成、李秀成部在解桐城之围后，乘胜占领了舒城、霍山、六安，便北上会合捻军。两军在霍丘、六安交界处胜利会师。经过协商，捻军以“听封而不能听调用”为条件，接受太平天国的领导。张乐行被封为征北主将，其他捻军将领也各有封号；部队蓄发易帜，但仍然保持原有的领导系统和制度。为适应联合作战的需要，双方互派代表，随时联络会商。

(一) 转战三河尖、正阳关

两军会师后，太平军和捻军各有十万左右，士气旺盛，军威大振，立即在淮河沿岸发起攻城作战。太平军薛之元等部和捻军张乐行部围攻河南固始城；太平军陈玉成部和捻军韩奇峰等部于3月11日攻占霍丘东北的正阳关，13日东进包围寿州城；太平军李秀成、李昭寿部和捻军龚得树、苏添福部于3月18日占领霍丘城，后又北渡淮河，围攻颖上城。

清廷得悉捻军南下后，曾多次谕令豫、皖清军扼要堵截，防止其与太平军会合。在此前后，清廷还调整了攻捻前线的统兵将领，加强进攻起义军的力量：察哈尔都统西凌阿被召回北京；崇安被革去总兵职务；因围攻北伐太平军不力而被革职的胜保，又被授予副都统衔，并署理河北镇总兵，帮办攻捻事宜。此外，还命山西汾州营参将保衡、直隶密云都司马翰忠率部开赴安

安徽科学院历史研究室：《张乐行传》，《安徽史学通讯》1959年第六期，第60页。

薛之元、李昭寿原为霍丘、固始边界地区的捻军首领，1854年投降清道员何桂珍，1855年12月在安徽英山杀死何桂珍后，归附太平军李秀成部。

薛之元、李昭寿原为霍丘、固始边界地区的捻军首领，1854年投降清道员何桂珍，1855年12月在安徽英山杀死何桂珍后，归附太平军李秀成部。

徽亳州，听候调遣；命徐州副都统德勒格尔率领马队南下怀远；命英桂将在湖北遣撤的陕甘官兵截留河南，参加攻捻。胜保抵达亳州后，即与英桂、袁甲三等会商，确定了首先防止捻军主力重返雒河集，“再行相机节节进剿”的作战方针。据此，由袁甲三督饬总兵朱连泰部约三千人及亳州地方团练于亳州一带，进剿留驻淮北的捻军；胜保以颍州为基地，率马步三千余人进攻南下的捻军，另有王庭兰、金光箸等部约二千人归其统辖，在淮河流域配合作战；负责三省剿捻事宜的英桂率河南清军千余人驻太和等地，策应胜保部，并保护清军后方粮道。

胜保因兵力过单，一再奏请清廷调兵支援。清廷责备他“由亳至颍，尚未与贼见仗，而调将请兵纷纷不已，……驻守颍州，不思急挫贼锋”，命令他“赶紧进兵，不得再有耽延”。胜保只得硬着头皮率部南下。当时，太平军和捻军正三路出击，强攻坚城，以致力量分散，给了胜保以可乘之机。胜保于3月中旬南下后，首先集中兵力解固始之围。张乐行、薛之元等部因连日围攻固始不下，又见清军援兵赶至，便于3月下旬撤回三河尖。围攻寿州的陈玉成、韩奇峰部遭到金光箸部清军顽抗，也主动撤围（韩奇峰部退守正阳关，陈玉成部回守六安）。李秀成、龚得树等部于22日包围颖上后，虽几次轰塌城墙，但始终未能攻进城内。而胜保在解固始之围后，便率部回救颖上。在此情况下，李、龚所部也于5月3日撤至淮河南岸。至此，捻军和太平军第一次联合作战，未能取得理想的战果，即告结束。

捻军和太平军联合后出现的一个新情况，就是捻军在淮河流域的作战常常受到太平军长江中游战场形势的影响。由于安徽战场上的太平军既要抵御从湖北东进的湘军，又要牵制天京外围的清军，经常流动作战，而捻军基本上战斗在淮河流域一带，因而出现了捻军与太平军时而联合作战，时而单独作战的情况。为了阻击从湖北东进的湘军和鄂军，陈玉成于5月12日率数万太平军和部分捻军进入鄂东地区作战（9月中旬才折回皖境，驻太湖、潜山一带）。李秀成部则驻六安、霍山一带，随时准备东进，对付天京外围之敌。于是，在淮河沿岸独立作战的捻军，便采取守势，收缩兵力，挖壕筑垒，集中力量防守三河尖、正阳关、霍丘等据点。

太平军离开淮河沿岸后，胜保乘机向捻军发动进攻，第一个目标就是三河尖。三河尖周围河渠纵横，捻军跨河而阵，清军步骑兵不易展开，难于强攻。胜保便实行围困战法，控制通向三河尖的水陆通道，强令居民提前割麦，并在出产硝磺的地区设卡稽查，严禁出境，以断绝捻军的粮弹接济；同时，实行政治攻势，瓦解捻军士气。捻军坚守了六十余日，终因粮弹不济，于6月16日撤出三河尖，沿淮河东下正阳关。其后，由韩奇峰率部驻守正阳关，张乐行、龚得树则率部转移至霍丘。

胜保占领三河尖后，决定集中兵力先攻正阳关，得手后再攻霍丘。为防

止正阳关、霍丘捻军西进固始，他命总兵邱联恩等会同王庭兰和固始知县张曜等扼守固始东部地区，自率步马数千人进攻正阳关，并令金光箬由寿州率炮船西进，配合进攻。金光箬见清军云集，有恃无恐，竟于6月25日首先攻关，结果遭到捻军伏击，兵败溃散。金光箬因坐船被捻军炮火击中，落水淹毙。这一仗打击了清军的气焰，使胜保所部不敢接近正阳关。8月，连降骤雨，河水猛涨，关外的捻军据点先后被清军攻占，关内粮食缺乏，形势危急，韩奇峰派人向霍丘求援。张乐行、龚得树率部往援正阳关，胜保趁霍丘城内捻军兵力空虚，派人收买了守城头目张金桂，旋于8月29日将该城占领。这时，扼守正阳关的捻军粮食已尽，只得杀马充饥，加之瘟疫流行，军民饥病而死者日增，处境异常困难。后李秀成从六安派出的援军五六千人赶到，击败关外清军，于10月12日接应关内捻军冲出重围，沿淠河南下，撤至六安。

（二）控制淮河中游

由于驻守镇江的太平军遭到围攻，天京外围形势吃紧，李秀成部于1857年10月中旬由六安、舒城一带东进救援。张乐行等率捻军一部配合太平军打通进军道路，待太平军绕过庐州（今安徽合肥市）以后，便又返回六安。11月，龚得树率部击败安徽布政使李孟群部清军，占领独山镇。李孟群率部反扑，占领霍山。后驻潜山、太湖的陈玉成部太平军前来支援，李部慌忙退走。

这时，捻军中的地域观念和宗派观念抬头，领导集团内部发生了意见分歧。蓝旗旗主刘永敬、刘天台等主张返回淮北家乡；张乐行、龚得树等则主张继续留在淮南，配合太平军作战。前一种意见对于联合抗清的大局显然是不利的。但张乐行、龚得树在处理内部分歧时，采取了错误的做法，竟于12月间将刘永敬、刘天台杀害，致使矛盾激化。不久，蓝旗首领刘天福、刘天祥、刘天月等率部由六安返回淮北，其他旗首如任乾、陆连科等也率部陆续北返宿州地区。从此，捻军便分别在淮南淮北两个战场作战。

1858年2月，太平军陈玉成部联合捻军韩奇峰等部约五万人再次围攻固始。守城团练顽强抵抗，胜保和李孟群也分别率部前往解围。捻军和太平军依托土垒，一面挖地道炸城，一面阻击援军。但战斗持续了两个多月，未能破城和击退援军。不久，湖北的清军又开始向东进攻，太平军和捻军遂于4月6日从固始撤围，返回六安。胜保和袁甲三分别率部由固始、正阳关向六安方向集中，伙同李孟群部围攻六安。这时，陈玉成部已向湖北进军，无力东顾；李秀成部正在皖东一带与清军鏖战，也无法西援。5月24日夜，六安捻军正同情军激战时，早被胜保收买的捻军头目许原如、杨邦本等偷开城门，清军蜂拥而入，张乐行、龚得树等率守军勇猛拚杀，突围出城。

六安失守后，张乐行、龚得树等乘淮河沿岸清军兵力空虚，沿淠河北上，

渡过淮河。6月2日，在先行到达淮北的捻军配合下，一举攻占淮河北岸要地怀远城，全歼守军数百名。这时，集结在徐州以南、怀远以北的捻军有苏添福、李允、李大喜、张隆、任乾、陆连科等部约八万余人。他们以怀远为基地，沿淮河东进，在当地捻军张隆等部配合下，于6月14日攻克临淮关，道员黄元吉所部清军千余人突围西逃。15日，捻军攻占凤阳府县两城，三千余名团练作鸟兽散。

捻军攻占怀远、凤阳后，切断了清军的水上交通，并使淮南北两岸的抗清力量链接了起来，成为淮北清军南下的重大障碍。于是，太平军得以专力打击天京东西两面的清军，捻军也更便于与太平军配合作战，战略上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

1858年9月，龚得树率部分捻军南下，协同太平军吴如孝部围攻定远城，牵制了部分清军，配合陈玉成、李秀成部太平军取得了击破江北大营的胜利。

1859年3月，陈玉成部在庐州西面的官亭击溃李孟群部清军后，乘胜东进，于同年夏先后攻占安徽天长、盱眙，进攻滁州、来安，迫使钦差大臣胜保所部退守盱眙东北的蒋坝，切断了驻定远的安徽巡抚翁同书与胜保部的联系。捻军龚得树部万余人遂由怀远南下，配合太平军吴如孝部再次围攻定远。定远的东西粮道分别被捻军和太平军切断，翁同书在“官军久已绝食，兵勇皆啖草根充饥”，“待援不至，待饷不来”的情况下，于7月17日弃城逃往寿州，所部纷纷溃散。捻军占领定远后，进一步扩大了淮南的控制地区，与庐州太平军的辖区联成了一片；同时打击了捻军内部在李昭寿、薛之元叛变后出现的投降暗流，逼使曾想献出凤阳和临淮关降清的张隆重又换上捻军的旗帜，不敢公开投敌，暂时稳定了内部。

（三）重返淮北

捻军控制淮河中游，切断了安徽清军的粮饷通道，加上淮北的捻军四出活动，引起了清廷的震惊。1859年10月底，清廷命袁甲三署理钦差大臣，接替胜保督办安徽军务，并告以“怀远一城居凤、颍之交，久为贼踞，亟宜迅图攻克，与翁同书一军合而为一，以便进攻淮南，兼顾北路”。与此同时，胜保趁捻军主力集中于淮南，淮河北岸的怀远守军力量减弱之机，督令副都统穆腾阿和总兵滕家胜等率清兵三千余人乘机进攻怀远。从定远、庐州派出的捻军和太平军援军被阻于淮河以南。张乐行在外援无望的情况下，为

1858年8月31日（咸丰八年七月二十三日），清廷再次任命胜保为钦差大臣，督办安徽全省军务，由安徽巡抚翁同书帮办。

《平捻方略》卷六十一，第17页。

《平捻方略》卷六十九，第11页。

保存实力，于11月8日退出怀远，率部南渡淮河，退守临淮关和定远。清军占领怀远后，立即折向临淮，在北岸扎营。胜保亦折回距临淮关三十余里的张家沟大营，以便就近督攻临淮，后又进至距临淮关十五里的三汊沟驻扎。12月4日，袁甲三到达胜保大营，接署钦差大臣职务，并将大营移往张家沟。袁甲三迅速集结兵力，并将苗沛霖练勇八千人调往临淮，总兵力由三千余人猛增至一万余人。1860年1月上旬，袁甲三乘捻军配合陈玉成部太平军在潜山、太湖一带与湘军作战之际，督水师炮船和马步队进攻临淮关，连日发炮轰击，将关内炮台击毁。守关捻军与清军激战两昼夜，伤亡甚众，被迫于1月10日南撤定远。

1860年1月下旬，清廷对攻捻部署又作了调整：革去胜保钦差大臣的职务，调往河南，督办该省攻剿事宜，以副都统关保为其帮办；命云南提督傅振邦督办徐、宿一带攻剿事宜，以总兵田在田为帮办；袁甲三仍署理钦差大臣，督办皖省军务，除巡抚翁同书仍为帮办外，加派副都统穆腾阿帮办军务。

袁甲三在占领临淮关后，又督军围攻凤阳。张乐行率部往援，在凤阳南梁家冈遭苗沛霖团练和穆腾阿马队袭击，损失五六千人，被迫后退。2月13日，守卫凤阳县城的捻军首领张隆被袁甲三部总兵张得胜所诱擒。次日，守卫府城的首领邓政明为求活命，缴出全部枪炮马匹，并将十四名拒不投降的捻军将领捆送敌营杀害，致使凤阳府、县两城相继丢失。

清军攻占怀远、临淮、凤阳三城后，打通了淮河的航道，隔断了淮北捻军和淮南捻军及太平军的联系，张乐行、龚得树等在淮南只据有定远一个孤立据点，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5月16日，袁甲三派兵夜袭定远，毁城外营垒九座。6月1日，龚得树率捻军一部出敌不意攻占定远以东的来安，企图调动袁军，但未达目的。定远捻军只得坚守待援。8月初，清军对定远形成合围。后太平军陈玉成部和吴如孝部分别从天长、庐州来援，捻军白旗旗主孙葵心也由河南固始率万余人赶来支援，夹击袁甲三部。袁见捻军和太平军势众，害怕造成“全军坐困，终成溃裂”的危险局面，便慌忙将所部清军从定远撤退至淮河北岸。可惜太平军和捻军没有乘胜追击，将其歼灭。

定远解围后，捻军和太平军转攻凤阳、寿州，均未奏效。随后，龚得树、孙葵心率数万人随陈玉成部南下，谋解安庆之围。12月10日，太平军和捻军与敌大战于桐城西南之挂车河一带，孙葵心不幸牺牲。1861年3月，龚得树也在湖北罗田松子关中炮身亡。孙葵心在脱离张乐行领导期间，曾企图降清，但未成事实。后来转战河南、山东，屡败清军；返回淮南后，重与太平军协同作战，最后把鲜血洒在太平天国的战场上。龚得树是捻军中仅次于张乐行的重要首领，不仅作战勇敢，“所领黑旗队泉猛耐战，势与张落刑（乐行）相埒”，而且较有政治头脑，是坚持与太平军联合作战的核心人物，

《平捻方略》卷八十三，第35页。

杜文澜：《平定粤寇纪略》，《太平天国资料汇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71页。按：1855

他的牺牲，是捻军的重大损失。

1861年9月安庆失守后，陈玉成率部退守庐州，旋又遭清军围困。捻军在定远的孤立据点也难于长期坚守下去。而当时淮北捻军的力量还相当强大，河北、山东等省人民起义此伏彼起，陈玉成为了“广招兵马，早复皖城”，再援天京，先派太平军马融和部北上，继派捻军首领张乐行等率部北渡淮河，后又派扶王陈得才、遵王赖文光、启王梁成富、祐王蓝成春等率部向西北远征。张乐行和苏添福等将定远据点移交给太平军后，于12月间率全部人马返回淮北颍上地区。至此，捻军和太平军在淮河沿岸的联合作战宣告结束。

二、淮北捻军向河南、苏北、山东出击

张乐行、龚得树等率捻军主力于1857年春南下与太平军联合作战后，淮北只有少数捻军就地坚持斗争。1858年初，蓝旗等捻军从六安返回淮北，兵力骤增，声势复振。以后，各旗捻军进一步挖壕筑垒，依托圩寨，抗击清军和团练的进攻，并经常伺机袭击清军据点，使当时负责江苏、安徽、山东三省“剿匪”事宜的袁甲三发出了“兵疲粮尽，势处万难”的哀叹。同年底，袁甲三向清廷建议由河南、山东出兵南下，与皖北清军联合攻剿淮北捻军。清廷表示同意，令新任河南巡抚恒福、山东巡抚崇恩“各就本境防军遴员统率，并力进剿，捣捻巢穴，以保北路完善之区”。1859年初，袁甲三进一步提出豫军由亳州东进，山东军由永城南进，本部诸军由宿州西南进的分进合击计划。清廷令崇恩、恒福将要隘严为布置（防止捻军绕袭其后），即行发兵合剿。崇恩对此提出异议，他认为出境远征，有三不可胜：一是捻军众清军寡，地广数百里，难于合围；二是捻军以逸待劳，清军进攻则守垒不出，清军退却则伺机出击；三是如果清军日久不克，则饷缺兵哗，必为捻军所乘。清廷坚持原案，催促山东、河南迅即出兵合剿，但议未果行，淮北捻军便开始分道出击了。

（一）北舞渡、马埠、野猪冈歼灭战

1859年3月上旬，捻军二万人在孙葵心、刘添福等率领下，集中于太和市集，佯称西攻河南禹州（今禹县）。正驻鹿邑的总兵邱联恩（统率豫军六千余人）立即派兵防守豫皖交界的沈丘（今沈丘城）。3月14日，捻军突然进至河南商丘南面，次日分三路出击：一路进据商丘、宁陵交界的观音

年捻军建立五旗军制时，龚得树系白旗首领，此处“黑旗队”似为“白旗队”之误。

佚名：《山东军兴纪略》，《捻军》（四），第35页。

佚名：《山东军兴纪略》，《捻军》（四），第41页。

堂；一路西攻睢州城（今睢县）；一路由沟香集进占宁陵县城。21日，三路联合攻下睢州城，全歼知州王联升所率乡团，继又分兵西攻杞县。邱联恩急率三千余人赴援，与捻军战于睢州东南的张公堡。捻军失利，于23日退出睢州，经太康东北的杨庙西进吕潭一带。3月25日，捻军南下围攻西华城。26日，邱部追至，捻军又撤围西走，一部驻鄆城东南的五沟营，主力驻舞阳以北的北舞渡。邱联恩命参将穆特布率部分清军往击五沟营捻军，自率三千人于3月29日赶到北舞渡。捻军早在该地沿沙河两岸设防，步队配置在吃虎桥附近，马队分扎两翼，操刀持矛，严阵以待。是日下午，邱联恩将步马分为三队，向吃虎桥进攻。捻军步队坚决抗击，两翼骑兵突起，将邱部紧紧包围。黄昏发起总攻，捻军将士们呼啸猛冲，刀劈矛刺，将被称为“邱老虎”的邱联恩杀死于吃虎桥头。邱的部将二十余人同时毙命，三千人马大部被歼，少数逃往许州（今许昌市）。捻军携带大批胜利品，经西华、商水、项城等地返回淮北。

1860年春，捻军首领孙葵心、刘天祥、王怀义等率淮北捻军三四万人，分两路再次向河南出击。一路经夏邑、虞城到达山东单县地区后，又西入豫境，进至禹州、密县等地；另一路经鹿邑、柘城进击太康、通许，直指开封。胜保和前任河南巡抚庆廉匆忙布置城守。4月7日，捻军与胜保部在离开封二十五里的白酒店遭遇，作战失利，折向陈留。当捻军二三万人由尉氏、鄆陵、扶沟等地东返时，其先头部队于5月4日在柘城、太康交界的马埠（今马铺）与奉命拦截的总兵王凤祥、副将王庆长等所部三千余人遭遇，被迫后退十余里。此时后队人马赶到，便整顿队伍，进行反击。敌军大部被歼，王凤祥、王庆长等被杀。于是，捻军胜利重返淮北。清廷责胜保“剿贼不力，畏葸无能”，将其调回北京，改由巡抚庆廉督办河南军务，副都统关保仍为帮办。

庆廉督办河南军务后，鉴于在防豫军不满四千，其余皆系统勇，加上关保两营，总计不过一万数千人，而张乐行、龚得树、孙葵心、王怀义、姜台凌等各部捻军不下数十股，每股各有数万人不等，宿、亳、蒙、怀、庐、寿一带及豫省边界所在皆有，便向清廷提出由豫军与袁甲三、傅振邦部清军合力攻剿，并由苗沛霖部练勇驻扎萧县、永城边境，“力扼西北，进剿东南”的作战方针，得到清廷的批准。但就在这一方针提出不久，捻军又一次越过豫军防线，向河南大举出击。

1860年8月，蒙亳地区大雨成灾，捻军粮食供应发生困难，而河南秋收在望。捻军首领刘玉渊、雷彦、宋喜元、苏添才等便率四万余人，由亳州再次挺进河南。8月21日，捻军进攻薛庙清军大营，关保由鹿邑派兵往援。捻军立即绕攻鹿邑东关，迫使清军回顾城防，后在五里庙与敌军交战，杀游击罗忠保等多人。9月15日，捻军兵临陈州城下，因清军防守较严，便直薄周

参见《平捻方略》卷八十二，第6—10页。

家口镇（今商水）。后因清军来援，南下商水（今旧商水）、上蔡、汝阳（今汝南）等地。庆廉命总兵承惠率八千余人追击，并令游击孙之友部为后援。但孙部为雷彦所率捻军牵制，无法前进。9月20日，承惠部进抵汝阳城南三十五里的野猪冈。捻军事先在此布阵，清军多次进攻，均被击退。激战间，一部分捻军迂回至大石桥，切断了清军的退路，正面的捻军又将清军分割为二，展开白刃格斗。结果，承惠等十余名清军将佐及大部士卒被歼，捻军再次取得了重大胜利。在北京的胜保后来哀叹：“野猪冈之役，全军遇伏，精锐胥亡，元气遂不可复。”清廷因无正规军可派，只得命河南团练大臣毛昶熙等整顿和加强河南乡团。

（二）袭占苏北重镇清江浦

1860年2月，捻军首领李大喜、魏希之、张宗禹等率步队二万余人、马队万余人，在江苏萧县保安山集中后，佯攻碭山，摆出北进山东的架势，忽又挥戈东进，在徐州越过黄河故道，经邳州（今邳县北邳城）再长驱南下，于18日占领桃源（今泗阳南），然后直趋苏北的政治中心和商业重镇清江浦（今清江市）。当时，河道总督庚长、漕运总督联英等正置酒观戏，昼夜不辍，闻捻军将至，才仓皇派兵堵御。2月21日，捻军击败都司德兴部清军三百人，乘胜进抵清江浦，庚长等逃往淮安。清廷闻清江浦失守，急忙调兵往攻。捻军在获得大量钱粮物资后，于3月5日撤离清江浦，返回淮北。

（三）进军山东，三败僧军

捻军在出击河南、苏北同时，还不断深入山东境内，打击清军。1860年9月下旬，张敏行、姜台凌等率四万余人由宿州北进至山东峄县（今峄城）、兰山（今临沂）等地。10月下旬，捻军又进至山东鱼台、金乡、巨野等地，26日直逼济宁城。旋又分兵三路：一路经汶上北进东平的戴庙，又经梁山南下占领巨野，后由定陶、曹县返回淮北；一路经滋阳（今兖州）北占宁阳，进围泰安不克，由大汶口南下曲阜等地；一路东北经泗水，转至新泰，攻占蒙阴，复由沂水、莒州（今莒县）、日照南下至赣榆、郯城地区。三路捻军在获得大量粮食牲畜后，胜利返回淮北。

清廷害怕捻军由山东进入直隶，危及京畿安全，便于1860年11月5日，即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不久，命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仍任钦差大臣）统带清军一万余人（内马队三千五百人、步队二千人、绿营兵五千人），由直隶开赴山东剿捻，命文渊阁大学士瑞麟以侍郎衔帮办军务。清廷规定僧军的任务是，“前往剿办北路各匪，先由河间一带，次及山东、河南，权其缓急，

以次进剿”。12月17日，僧格林沁率部进驻济宁。

僧格林沁率部南下山东后，袁甲三曾向他指出：“河南之兵名为万余，多系新募，宿、徐之兵本不满万，近因饷缺，大加裁汰，所存无多，山东之兵又不能越境会剿，此贼所以到处窜突，如人无人之境也。”并向僧建议：“以山东兵为中路，由曹、单直趋虞、夏，以河南兵为右翼，以徐、宿兵为左翼，声势联络，互相策应。步步为营，与民寨相犄角，逐渐而进，不求速效。”僧格林沁没有采纳袁的建议。他急功近利，孤军在山东境内作战，因而屡战屡败。

僧军进驻山东不久，亳东捻军四万余人（其中马队万余）在刘玉渊等率领下，又一次进入山东，经鱼台、金乡北上。僧格林沁急忙率骑兵二千余人前往追击，于12月25日由嘉祥驰赴巨野。时值大雪，军行甚疲。26日，僧军在巨野东南的羊山集与捻军接战。僧格林沁率主力从东面进攻，瑞麟率部从西南进攻。捻军分路抵御，首先将僧格林沁部击退，进而包围瑞麟部，将副都统格绷额等击毙。瑞麟突围逃到离金山二百余里的汶上。僧格林沁溜回济宁后，参劾瑞麟突围后“不在巨野扎营，复越过嘉祥、济宁退至汶上，……以致后路官兵涣散，实属怯懦无能”。清廷革去瑞麟侍部职衔，饬令回旗，改由镶蓝旗蒙古都统西凌阿、工部右侍郎国瑞帮办僧格林沁军务，并将原先革职的副都统伊兴额和徐州镇总兵滕家胜的步骑三千人交僧调遣。不久，清廷又将陕西巡抚谭廷襄补授山东巡抚，令其带领步骑兵一千五百名增援山东。

僧格林沁在羊山集战败后，下令从河南的考城（今兰考东北）至山东鱼台的南阳湖长四百七十余里地段，浚壕筑垒，由曹、单、荷、城四县民团分段扼守，郟、巨、济、金、嘉、鱼六县民团闻警协守，企图遏阻捻军北上。但捻军向山东的进攻并未因此受阻。1861年1月底，捻军首领赵浩然、张敏行、李成等率黑、蓝、白三旗四万余人，由砀山、虞城进入山东，接着分兵两路：一路向曹县南部游动，一路进入巨野东南六十余里的羊山集。2月2日，僧格林沁及副都统舒通额分率骑兵包抄羊山南麓的捻军，捻军即北上嘉祥之纸坊，又南下至金乡以西、城武以东地区，后又北上菏泽东北之关李家庄，筑垒布阵，准备坑击追击的清军。2月20日，僧格林沁不顾部队连日奔驰和饥疲不堪，下令分南、北、中三路进攻。捻军以逸待劳，步队居中，马队从两旁抄袭，号角四起，奋勇迎战。清军南路的黑龙江马队及陕甘步队首先溃退，接着中、北两路也纷纷败逃。此战，捻军歼灭清军近千人，缴获枪炮马匹甚多。

僧军败讯接连传到京城，清廷斥责僧格林沁“奔驰数日，率饥疲之卒，

《平捻方略》卷八十四，第30页。

袁甲三：《上科尔沁亲王僧》，《捻军》（五），第203—204页。

《平捻方略》卷九十，第3—4页。

当方张之寇，后路既无援兵，左右亦少策应，以致为贼所乘，勇往虽有余，惜尚未能持重也”，并告诫他“总不宜轻进，再蹈覆辙”。同时，命袁甲三委派得力将领与田在田、伊兴额等“合力兜剿，牵制后路”，使捻军“有所顾忌，不敢径行北趋”。但是，捻军很快又深入山东腹地，迫使僧格林沁不得不再次率部迎战。同年3月，数万捻军突入曹、巨、郟境，挥戈北上，由东平之戴家庙、安山等处渡过运河。僧格林沁令副都统伊兴额及徐州镇总兵滕家胜率二千余人追击。捻军在汶上、东平之间的杨柳集利用村落布置伏兵，待机歼敌。3月17日，先在卧虎山与清军接仗，佯装败退，待清军追至杨柳集时，捻军伏兵四起，将敌人层层围裹。伊兴额、滕家胜几次突围，均未得逞，终被捻军斩杀，僧军伤亡惨重，溃不成军。

捻军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三败僧格林沁军，狠狠打击了僧军的嚣张气焰。此后，捻军利用“甚雨泥淖，高禾蔽野”的有利条件，与敌人周旋，使其“疲于奔救，刍粮不继，士马疲羸”。僧格林沁无可奈何地对其部下说：“不能再与野战，惟当严固直北藩篱。”便命西凌阿回军济宁，力扼北路，自统全军扼东平之安山，凭河而守。于是，捻军在山东的活动区域日益扩大，一度进逼省城济南，山东巡抚谭廷襄龟缩城内不敢出战。捻军又转至胶州半岛，到达福山、烟台沿海地区。外国侵略者以军火接济清军，英、法海军还在烟台地区参与了屠杀捻军的勾当。

淮北捻军挺进河南、苏北、山东，推动了当地人民的武装起义，使上述地区先后爆发了捻党首领陈大喜领导的汝宁起义，郟永清领导的商丘金楼寨白莲教起义，苏皖边的幅军起义，菏泽地区的长枪会起义，曲阜、邹县、泗水等地的文贤教起义，鲁西的白莲教起义（其中宋景诗的黑旗军发展最快）。这些起义武装和淮北捻军互相配合，给清军和地方统治机构以沉重打击，客观上支持和配合了淮南的捻军和太平军。但是，由于淮北捻军向外出击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取生活资料，虽然歼灭了相当数量的敌人，但主要是击退敌人的追击和堵截，没有有计划地寻歼更多的敌人。特别是由于一再外出作战，致使淮北的基地反而有所缩小。在这期间，一些重要捻军首领如宋喜元、任乾、陆连科、李大喜等的圩寨，相继被清军和苗沛霖团练攻占，任乾、陆连科、李大喜等先后牺牲，这就给尔后进行的保卫淮北基地的作战造成很大困难。

三、退出淮北，与西北太平军并肩战斗

1861年底，张乐行率领捻军白定远返回淮北后，进驻颍上，次年（同治元年）1月中旬开始，与太平军马融和部、原在颍州的捻军姜台凌部以及苗

《平捻方略》卷九十一，第25页。

佚名：《山东军兴纪略》，《捻军》（四），第60页。

沛霖的团练 共同围攻颍州城 ,将安徽布政使贾臻困于城中。不久 ,胜保(1861年春曾奉命驰赴直隶、山东 ,督办防剿事宜)奉命由豫入皖 ,以解颍州之围 ,苗沛霖又接受招抚 ,配合清军袭击捻军和太平军。捻军、太平军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 ,于4月中旬撤离颍州 ,退入太和境内。5月中旬 ,陈玉成撤守庐州 ,率太平军三千余人北走寿州时 ,被苗沛霖诱捕 ,解送颍州胜保军营。尚在淮北的张乐行、马融和得此凶讯 ,率部往救 ,因被清军击败 ,未能成功。后清廷得悉陈得才、赖文光等率领的西北太平军已兼程向南进发 ,前来搭救 ,遂于6月4日将陈玉成杀害于河南延津县。陈玉成牺牲后 ,马融和率部西走河南 ,投奔西北太平军 ;张乐行则率部返回雒河集 ,同其他捻军一起 ,与夹攻淮北的清军展开了一场血战。

(一) 雒河集失守 ,余部退出淮北

庐州失守 ,陈玉成牺牲 ,太平军在皖南的根据地丧失殆尽 ,使淮北捻军的处境更加困难。不久 ,僧格林沁率马步数千南下 ,并于1862年6月26日攻占了河南商丘县马牧集以南的金楼寨 ,镇压了白莲教起义军。原来对付皖南太平军的李续宜、袁甲三等部也转旗北上 ,协同僧军以及豫、苏、鲁清军共同对付淮北的捻军。

8月2日 ,清廷向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湖广总督官文、安徽巡抚李续宜、湖北巡抚严树森、河南巡抚郑元善、河南团练大臣毛昶熙、署漕运总督吴棠等文武将领发出了大举进攻淮北捻军的谕令。其具体部署是 :僧格林沁部马步两万余人和李续宜部湘军万余人 ,南北对进 ,夹攻雒河集 ;袁甲三因病开缺后 ,其所部二万人由李续宜派员统领 ,从怀远向北进攻 ;吴棠扼守江苏清河、淮安 ,并由僧格林沁拨兵若干 ,并力扫荡邳州、宿迁、海州 (今连云港市西南)、沭阳一带 ;由僧格林沁派员接统总兵田在田所部 ,防守南北要冲徐州、宿州地区 ;郑元善出新蔡 ,毛昶熙出归德 ,配合僧军向东进攻 ;官文、严树森派兵深入豫境 ,由正阳、息县援应 ;皖、豫等省的团练 ,分别协同各路清军进攻。

8月20日 ,清廷把各路攻捻清军统交僧格林沁调遣 ,不但令其统辖山东、河南军务 ,而且授权调遣直隶、山西和蒙、亳、徐、宿的防兵 ,节制直隶、山东、河南、山西各省督抚提镇以下各官 ,集军政大权于一身。鉴于僧军以往多次失利的教训 ,清廷告诫僧格林沁“务宜逐渐进取 ,步步为营 ,不可孤军深入”。

张乐行等捻军首领在清军发动大规模的进攻面前 ,未能避实就虚 ,把捻

苗沛霖因与官绅不睦 ,希图割据 ,1861年春开始据地自守 ,同年10月破寿州 ,后“占地数百里 ,有众十余万”(见《捻军》第二册第364页)。苗见太平军和捻军声势浩大 ,故一度与之合作。

《平捻方略》卷一百六十 ,第14页。

军主力转移到山东或河南，结合当地农民起义军，袭击清军的后方，或攻敌必救之地，以调动和分散敌人；而是“悉其五旗首，集众二十万，陈雒河”，依托圩寨打防御战，使自己处于被动挨打的不利地位。

10月18日，僧格林沁由河南夏邑移大营于黄仲集（今商丘南），随即分兵向亳州以北的庐庙、邢大庄发起攻击。捻军首领李廷彦率部抗击，因寡不敌众，坚守了十余天，庐庙、邢大庄先后失守。李廷彦被诱捕杀害。接着，僧格林沁命翼长全顺、承先、苏克金、恒龄和总兵常山保等率部南下，分别占领了丁花园、王路口、颜集、五马沟、岳楼、高阁、八里庄等圩寨。清军占领亳北地区之后，僧格林沁又于11月初督师进攻亳东地区。黑旗首领苏添福在刘集率部坚守圩寨，抗击清军。清军发炮猛攻，寨内房屋多被炸塌，苏添福于11月6日率部退守蒋集。20日，马村桥捻军来援，遭国瑞部清军阻击；随后，张乐行也由庙集率部驰援，27日在下张桥遭到清军翼长舒通额、苏克金部骑兵袭击，败退涡河南岸。以后，张乐行等部捻军又多次往援蒋集，均为清军所败。12月20日，捻军首领陈万福突围南走，其弟率部投降清军。1863年1月底，僧军攻占涡河南岸的韩楼，2月23日又攻占马村桥，苏添才率捻军余部退守雒河集。

一系列战斗的失利和圩寨的丢失，引起捻军队伍中某些动摇分子的叛变投敌。在僧军进攻亳北时，黑旗首领宋喜元等投敌叛变，并无耻地带领清军攻打捻军。2月26日，僧军包围张家瓦房，赵浩然又率部投降。随后，宿州、蒙城的一些捻军首领也纷纷投敌。接连数次率部进军大半个山东的捻军首领刘天祥，也向宿州知州英翰屈膝投降，充当清军鹰犬。但是，绝大多数捻军将领和战士，没有被僧军的猖狂进攻所吓倒，仍奋不顾身地与清军展开圩寨争夺战。

这时，苗沛霖根据僧格林沁“剿捻立功”的指令，从背后袭击捻军，占领了一些捻军圩寨，进而配合僧军向雒河集推进。

张乐行在清军重兵围攻的艰危情况下，为了分散敌人的兵力，命张宗禹率部突围，由太和、颍州入豫东南与陈大喜等部会合；自己则率部东走宿州，拟北上与早已进入山东、苏北一带的李成、任化邦（又名任柱）等部会合，因在符离集遭清军阻拦，便又折回雒河集。

3月16日，僧格林沁移大营于亳州涡河北岸的庙集，随即命舒通额、苏克金等部向捻军发起进攻，于19日占领尹家沟、雒河集。张乐行等率部南走。20日，张村堡（今利辛西北）一战，捻军死亡将士一千余人。21日，再次失利，又伤亡二千余人，韩四万、刘玉渊、苏添福、苏添才等被俘遇害。3月23日夜，张乐行仅率二十余人逃至蒙城、宿州交界的西洋集，为叛徒李家英等出卖，不幸被捕，押往僧格林沁军营。不久，张乐行及其子张喜、义

张瑞樾：《两淮戡乱记》，《捻军》（一），第287页。

《平捻方略》卷一百七十一，第4页。

子王琬儿等被清军杀害。姜台凌、孙葵文等向清军乞降，结果仍被处死。

捻军在这次防御作战中，由于实行消极防御，结果受到了严重的挫折，不仅丧失了蒙、亳基地，而且张乐行等许多捻军重要首领以及将士二万多人英勇牺牲。蒙亳一带的捻军圩寨几乎全被摧毁，当地人民惨遭祸殃。雒河集到处是断壁残垣，一片凄凉景象。但是，捻军并没有被完全消灭，突围出去的张宗禹、任化邦等部以流动作战方式，继续坚持斗争。

（二）转战豫、鲁，调动打击清军

张宗禹、李成、任化邦等部捻军从蒙亳地区突围之后，分别转战于河南、山东等地，结合当地农民起义军，积极打击清军。

张宗禹等部捻军与豫东南捻军陈大喜部会合，活动于新蔡、汝阳、息县、罗山、光山一带。新任河南巡抚张之万命总兵张曜、余际昌率军追剿。1863年4月初，张宗禹、陈大喜率部进入湖北，总兵余际昌率豫军五千余人越境追击。捻军经麻城、罗田、蕲水（今浠水）进至蕲州、广济（今蕲春东南）一带。后由于湖北清军竭力堵截，而余际昌部豫军已撤回河南，捻军遂回军北上，于5月中旬复入河南，由光山、罗山、息县等地渡过淮河，5月26日在正阳县方寨设伏，重创跟踪追击的豫军，毙余际昌及游击以下官兵三十九人，使该部清军死伤过半。这一胜利，大大鼓舞了捻军士气，增强了坚持斗争的信心。

李成、任化邦等部捻军在山东幅军、教军等农民起义武装的配合和支援下，活动于兰山、费县、沂水、蒙阴、泗水等地，并进入曲阜、泰安，逼近省城济南。山东巡抚谭廷襄惶恐不安，忙向清廷告急：“东境外匪与内匪交讧，实属弗遑兼顾”，“贼边马已至汶、宁，湖路可达东平，山路可逼省会，事机危迫”。当时活动于鲁西堂邑、冠县、馆陶（治今馆陶东北）、临清、高唐等地的宋景诗黑旗军，也威胁着清廷畿辅重地。这就迫使清廷不得不急调僧格林沁军由淮北返回山东。僧军转回山东后，在新任山东巡抚阎敬铭率领的防军配合下，疯狂地镇压各支农民起义军，使淄川的刘德培起义军，邹县、泗水、曲阜交界的文贤教军，以及宋景诗黑旗军都遭到重大损失。宋景诗在刘贯庄战败后，便参加了捻军。

当僧军于4月底北返山东后，蒙亳地区转入地下的捻军又纷起活动，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清斗争。与此同时，苗沛霖再次叛清，于5月初占领颖上、怀远、寿州，围攻蒙城。不久，张宗禹、陈大喜等亦率军从豫南经颍州回到雒河集，惩办了出卖捻军领袖、为虎作伥的叛徒，并夺取了敌人的粮台，打

佚名：《山东军兴纪略》，《捻军》（四），第77页。

僧格林沁在攻占雒河集后，令苗沛霖“散练归农”，苗对此极为不满，加之其后台胜保被逮问罪，便于1863年5月初再次叛清，据地自保。

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了当地人民的斗志，不少人踊跃参军。

蒙亳一带捻军的重新活跃以及苗练的再次反清，使正在围攻太平天国首都天京的曾国藩颇有后顾之忧，急忙上奏清廷，请求僧军再次南下进攻淮北。1863年11月9日，僧格林沁遵旨由直隶大名率军南下，经河南许州于11月下旬进抵安徽蒙亳地区，设大营于高炉集（今涡阳东南）。

张宗禹等得知僧军再次南下，即主动撤离雒河集，西走河南。僧军占领雒河集、西洋集一带后，便于12月6日向正在围攻蒙城的苗练发起进攻。在僧军和蒙城清军的夹击下，苗练四处败逃，苗沛霖在乱军中被杀。以剿捻起家、作恶多端的苗练武装从此烟消云散。清军在重占蒙亳地区后，大肆平毁圩寨，收缴武器。为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控制，清廷把雒河集改为涡阳县，在县北的龙山镇驻扎一营清军，以防捻军再起。随后，僧军奉命进入河南，追击捻军。

（三）与西北太平军并肩作战，突破重围

张宗禹等率军西走河南后，准备进入陕西与西北太平军会合。这时，由扶王陈得才统率的西北太平军为解天京之围，正在东返途中。1864年4月下旬，陈部在河南西南部的淅川、内乡等地先后与捻军张宗禹、陈大喜、任化邦等部会师，众达数十万，随即分四路向东南进发。清廷为阻止西北太平军和捻军援救天京，令僧格林沁的马队及鄂军、豫军、皖军竭力拦击。不久，聚集于鄂、豫、皖交界地区的清军不下十万人。

太平军和捻军在东进过程中给了拦截的清军以应有的打击，但本身也受到一定损失。当得知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于7月19日失陷之后，“人心离散”，士气大挫，尽管后来在河南的罗山、光山和湖北的蕲水等地几次击败清军，但这些局部胜利并未改变被清军围追堵截的不利局面。11月5日，安徽霍山黑石渡一战，太平军和捻军损失惨重。接着，马融和等屈膝投敌，蓝成春被俘遇害，陈得才服毒自杀。其后，赖文光、邱远才等部太平军和张宗禹、任化邦、陈大喜等部捻军先后进入河南，经过合编和整顿，迎着险恶的局势，再接再厉地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

1857年到1864年，是捻军反清战争的关键时期。由于实行了与太平军联合作战的正确方针，张乐行、龚得树等部捻军主力得以控制淮河中游，镇守淮河腹地；淮北捻军的积极出击，也牵制了相当的清军，从而使淮南战场保持相对稳定，陈玉成、李秀成部得以在湖北和天京外围的往返征战中不致有后顾之忧。这些都是具有很大战略意义的。

这一时期，由于清军在安徽以及河南、山东、江苏等省的兵力比较薄弱，而捻军数量众多、占地较广，这就为捻军进一步壮大自己和扩大占领区提供了客观有利条件。1859年秋，河东河道总督黄赞汤、河南巡抚瑛瑛、前山东巡抚崇恩在给清廷的奏折中指出：“皖捻滋事以来，窜扰河南、江南、山东

三省，蔓延愈广，裹胁愈多，而攻剿数年，迄难扑灭者，则以官军兵分力弱，不足制其命而捣其巢也。”进而指出：“近日定远不守，捻、粤联为一片，南抵安庆、舒、桐，北通滕、峯、曹、单，东界徐、宿、青、阳，西邻归、陈、光、固，纵横千余里之内，实已民贼不分，而翁同书一军仅保寿州，胜保一军扼扎蒋坝，岌岌乎无驻师之地，徒恃傅振邦、关保两军，以区区之师，当数十股凶悍之众，前后左右，纷至沓来，虽毕力进攻，亦岂能制贼死命？”

这些描述说明了当时捻军确实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但是，为什么时隔不久，捻军在淮南战场和淮北战场的作战均遭失利，最后不得不撤离蒙亳基地，突围他走呢？从作战指导方面考察，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是雒河集会盟后，实际上没有建立起真正集中统一的领导和作战指挥。捻军主力南下六安后，张乐行、龚得树对内部的意见分歧处理不当，更增加了各股捻军的离心倾向，以致难于集中兵力对付进攻之敌，给了清军以各个击破的机会。

二是不重视歼灭清军的有生力量。淮南捻军在淮河中游占领几个城市后，便分兵守点，消极防御，不注意在流动作战中歼灭敌人，结果所占据点反被数量虽少但能集中兵力作战的清军各个攻占。淮北捻军热衷于向外出击以获取生活资料，丧失了更多地歼灭清军的有利时机；特别是没有把侧重点放在消灭盘踞淮北的清军上面，使自己有个稳固的后方，以致当僧军南下向雒河集等地大举进攻时，处于非常不利的被动境地。

三是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蒙亳地区的各支捻军仍然据寨自保，各自为战，没有统一的防御部署和作战指挥，最后终于被清军各个攻破。张乐行等退守雒河集后，企图以武器装备低劣、内部组织很不严密的捻军与清军打堂堂正正的阵地战，而不是及时跳出清军的包围圈，这是很大的失策。后来，在节节失利的情况下，决定一些部队突围出走，才保存了一部分有生力量，得以继续坚持斗争。

第四节 与太平军余部合编，继续坚持反清战争 (1864年12月—1868年8月)

一、高楼寨歼灭战(参见附图九)

(一) 捻军和太平军余部的改编

天京陷落以后，全国革命形势走向低潮。在这危难之际，捻军和太平军余部，没有被清军的血腥镇压所吓倒，而是不畏艰难险阻，继续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成为继太平军之后的抗清主力军。

1864年11月下旬，遵王赖文光和淮王邱远才两部太平军二三千人，于鄂北地区与张宗禹、任化邦、陈大喜、牛宏升、李允、张禹爵等部捻军二万人会合，扶王陈得才余部及其他一些被打散的太平军、捻军将士，也陆续前往集中。接着，他们在豫、鄂边境进行了合并和改编，组成了一支集中统一的新捻军。捻军首领张宗禹、任化邦等“誓同生死，万苦不辞”，并共推赖文光为最高领袖；赖亦毅然负起领导责任，“以期复国于指日”。赖文光沿用太平天国的年号和封号，称张宗禹为梁王、任化邦为鲁王、李允为魏王、牛宏升为荆王、张禹爵为幼沃王。军队沿用捻军的编制，仍以五色旗区分，下分大旗小旗。但也作了一些变动，如将一些小旗改编成营，在任化邦率领的部队中，就有内五营和外五营的建制。

通过整编，提高了部队的军政素质，有利于继续坚持斗争。在政治上，明确以复兴太平天国为斗争目标；在领导上，加强了集中统一，隶属关系明确了，组织较前严密了；在军事上，根据捻军骑兵较多和北方地势平坦等特点，决定“易步为骑”，增加骑兵，减少步兵，在步兵中也增加马、骡、驴等牲口，加强了部队的机动能力；在作战方式上，随着骑兵的增加，发展了快速流动，盘旋打圈以疲敌，声东击西以误敌，设伏围裹以歼敌等灵活的战术，成为一支“善战善走”的部队。但是这次改编，没有解决部队主要行动方向和建立革命基地等重大问题，这对于以后的作战影响很大。

清军方面，自黑石渡之战后，某些将领滋长骄傲情绪，认为太平军、捻军已是“屡败之众”，只要“僧格林沁就近调度，必能就地殄除”。同时，派系矛盾突出，特别是曾国藩、李鸿章的湘、淮军与僧格林沁的满蒙旗兵之间，表现尤为明显。就在黑石渡作战之前，僧格林沁连吃败仗，日益暴露出这位王爷的无能。清廷为了支撑这支“王牌”军队，调两江总督曾国藩及其湘军前往湖北东部参战。曾国藩却以“大帅三人(按：指曾国藩、僧格林沁、

《赖文光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558—559页。

尹耕云：《豫军纪略》，《捻军》(二)，第172页。

《平捻方略》卷二百二十三，第32—33页。

官文)屯驻四百里内,恐群盗轻朝廷”为由,拒不应命,只愿派部分湘军归官文调遣。黑石渡之战后,清廷又下令抽调部分湘、淮军(湘军刘连捷部和淮军刘铭传部)给僧格林沁,以加强攻捻兵力。曾国藩、李鸿章都以种种借口拖延部队的调动。而盲目自大的僧格林沁,则认为所谓之湘、淮军“守则有余,战则不足”,拒绝湘、淮军的支援,仍然妄想独吞攻捻的“胜利果实”。清军之间的这种矛盾,对于捻军来说,无疑是十分有利的。

(二) 邓州、鲁山大败僧军

12月初,僧格林沁亲督翼长恒龄、成保及副都统常星阿等部进抵湖北枣阳,旋即西进。12月7日,赖文光等督军败僧军于襄阳,然后挥军北上,进入河南邓州(今邓县)境。赖文光、张宗禹等选择邓州西南的唐坡,挖壕筑垒,部署兵力,准备迎击僧军。12日,僧军分左、中、右三路发动进攻。捻军将士首先打败僧军右路步队,然后从侧后抄袭敌人的中、左两路,大败僧军。僧格林沁退入邓州城。捻军与太平军余部合编后接连取得胜利,士气复振。

12月13日、14日,捻军围攻邓州城未下,便北攻南阳府(今南阳市),旋又西趋镇平,复北经南召至鲁山。僧格林沁率部取道郟县,于1865年1月6日进抵宝丰,堵截捻军北上山西,西进陕西。1月中旬,捻军与僧军交战失利,由鲁山西走。僧格林沁恐其北上洛阳,率部经汝州(今临汝)前往洛阳堵截。后探知捻军集聚于嵩县西北一带,便于1月下旬由洛阳取道宜阳,进至永宁(今洛宁)东面的韩城镇。捻军随即经伊阳(今汝阳)折而往南,返回鲁山。僧格林沁便督队由韩城镇经宝丰县的大营镇奔向鲁山。这时,捻军已在离鲁山十余里的地方布好阵势,待机歼敌。1月28日,僧格林沁命恒龄率骑兵在左,常星阿部居中,成保部在右,同时向捻军阵地冲锋。捻军佯败,将敌军诱过水(今沙河),然后回军猛击,并以马队从后抄袭。僧军大恐,营总富克精阿、精色布库等率部先逃。捻军乘势奋勇杀敌,先后毙敌翼长恒龄、营总保青、副都统舒伦保、营总常顺等多人。僧格林沁在总兵陈国瑞援救下,才幸免于死。

僧格林沁在鲁山大败之后,气急败坏,暴跳如雷,将首先败退的富克精阿、精色布库等在军前处决,借以镇慑所部。他决心猛追捻军,寻机报复。

(三) 盘旋打圈,疲惫僧军

鉴于清军防守严密,捻军只得放弃入陕计划,决定在河南境内与僧军继

王闳运:《湘军志·平捻篇》,第7页。

《平捻方略》卷二百二十四,第18页。

续周旋，伺机歼敌。

鲁山获胜后，捻军经叶县北走襄城、禹州，复经长葛、新郑，转入尉氏县境。捻军游骑四出，边马直抵河南首府开封城下，城内清军一日数惊，附近各州县官吏慌作一团。1865年2月11日，跟踪尾随的僧军到达尉氏县城，捻军已南下鄢陵。僧军先头部队三千余人孤军冒进，当追到鄢陵县北阎寨坡时，捻军得知追军兵力单薄，便以少数部队诱敌，大队回马力战，将其击溃。2月13日，僧格林沁率大队赶到，亦为捻军所败。僧军连战皆败，损兵折将，不得不在鄢陵休整，仅派出部分兵力跟踪捻军。2月中下旬，捻军由临颖、郾城南下，攻西平，围汝阳，僧格林沁只得于3月5日亲督马队南下。捻军见僧军追来，便挥军南下，进攻信阳州城南关，待敌军到达信阳时，又举旗北上，经确山、遂平、西平到达郾城，然后攻扶沟，入睢州境。3月29日，捻军自河南考城进入山东境内。

两个月来，僧格林沁尾随捻军之后穷追不舍，从豫西、豫中、豫东、豫南一直追到山东，行程数千里，所部被拖得精疲力竭，“将士死亡者数百，军中多怨言”。他自己也“寝食俱废，恒解鞍小憩道左，引火酒两巨觥，辄上马逐贼”。清廷曾告诫僧格林沁“未司一意跟追”。老奸巨猾的曾国藩看出了这样追击的危险性，指出：“兵法忌之，必蹶上将。”但僧格林沁刚愎自用，并未从失败中汲取教训。

（四）高楼寨全歼僧军

1865年4月初，捻军进入山东后，经曹县、定陶、城武、嘉祥、汶上、宁阳进入曲阜。时僧军仍紧追不舍，山东巡抚阎敬铭也派布政使丁宝楨率本省防军进入兖州，妄图夹击捻军。为了继续疲惫敌军，捻军北趋宁阳、东平。途中击败总兵范正坦部后，继续北上东阿（今东阿南）、平阴、肥城，威胁省城济南。僧格林沁率军追至东平，丁宝楨部则进抵泰安北面的张夏镇。捻军见敌有备，便南下宁阳、兖州、邹县、滕县、峄县，旋经兰山、郯城进入江苏的赣榆、海州、沭阳。5月3日，又由邳州返回山东郯城，西走峄县，在临城（今枣庄市西薛城）附近击败丁宝楨部后，北上宁阳、汶上。5月10日由汶上以西的袁家口渡过运河，进至范县（今河南范县东）南面的罗家楼、濮州（今河南濮城）东南的箕山一带，最后进至郯城西北的黄河水套地区。

黄河水套是1855年（咸丰五年）黄河在河南省考城县属的铜瓦厢决口以后，在濮州、范县以南和郯城西北一带形成的一个河汊众多的地区。捻军进入该地区后，荫蔽在那里的许多被清军击败的山东各地起义军的失散人

佚名：《山东军兴纪略》，《捻军》（四），第85页。

《平捻方略》卷二百二十六，第27页。

《涡阳县志》，《捻军》（二），第105页。

员，纷纷参军，使捻军人数又众达数万。而这时僧军已被捻军拖得疲惫不堪，僧格林沁本人也因“辄数十日不离鞍马，手疲不能举缰索，以布带束腕系肩上驭马”。就在这种情况下，捻军与当地起义人民一起，在菏泽的高楼寨一带，布下了歼灭僧军的天罗地网。

从菏泽县城到黄河南岸（约四五十里）有一条经吴家店、高

楼寨的大道。高楼寨北面，有许多道防堵黄河泛滥的河堰，河堰上下柳林密布，捻军主力就埋伏在高楼寨以北的村庄、河堰和柳林中。1865年5月17日，僧格林沁牵军追至菏泽之西、高楼寨之南的解元集地区。捻军派出少数部队迎战，且战且走，诱使僧军步步向高楼寨地区深入。18日中午，僧军进至高楼寨，顿时号角齐鸣，声震原野，埋伏在那里的捻军将士们奋勇出击，挺矛持刀，袒臂鏖战。僧格林沁分兵三路：翼长诺林丕勒、副都统托伦布等率左翼马队，总兵陈国瑞、何建鳌各领本部步队，是为西路；副都统成保、乌尔图那逊等领右翼马队，总兵郭宝昌率本部步队，是为东路；副都统常星阿、温德勒克西等各领马队，是为中路。捻军亦分三路迎战。西路鏖战二小时左右，捻军稍却。适中路捻军将常星阿部清军击溃，立即支援西路捻军向敌人发起反击，将西路清军歼灭。与此同时，东路捻军亦将敌军击溃。在后督队的僧格林沁只得率残部退入高楼寨南面的一个荒圩。捻军乘胜追击，立将该圩团团围住，并在圩外挖掘长壕，防止敌人突围。当夜三更，僧格林沁率少数随从冒死冲出，当落荒逃至菏泽西北十五里的吴家店时，被一青年捻军战士砍死在麦田中。

高楼寨之战，捻军全歼僧格林沁的蒙古马队，使清军的精锐骑兵损失殆尽。副都统成保奏称：“我军失利后，马步兵勇收集无多”。曾国藩也说：两年来僧军屡挫，捻军“夺官马至五千余匹之多，自此不可复制”。薛福成在《科尔沁忠亲王死事略》中称：“陈国瑞所部步队四千覆溃几尽，国瑞仅以身免，……总兵何建鳌、内阁学士全顺，皆死于阵。”这次作战，是捻军在抗清斗争中取得的一次重大的胜利，也是运用运动战取胜的一个典型的战例。捻军发挥快速流动作战的特长，牵着僧军盘旋打圈，使其精疲力竭，同时伺机反击，消耗敌之兵力，挫伤其士气，最后在地形和群众条件都对捻军有利的地区，一举全歼穷追之敌。僧军方面，由于僧格林沁盲目轻敌，一味穷追，后方供给不继，部队饥疲交加，士气日益低落，加上得不到豫、鲁清军的有效配合，遂为捻军提供了打歼灭战的有利条件。

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捻军》（一），第14页。

《平捻方略》卷二百三十一，第6页。

曾国藩：《致郭筠仙中丞》，《捻军》（五），第273页。

薛福成：《庸盦内外编》，《捻军》（一），第356—357页。

二、粉碎曾国藩“以静制动”的攻捻方略

（一）曾国藩“以静制动”的攻捻方略

僧格林沁军覆灭后，清廷深恐捻军渡过黄河，北攻直隶，威胁京畿，从1865年5月下旬开始，进行了一系列新的部署：命两江总督曾国藩携带钦差大臣关防，统领所部各军，前赴山东，于北面驻扎“督剿”，继又令其督办山东、河南、直隶三省军务，所有三省旗绿各营及地方文武员弁，均归节制；命直隶总督刘长佑驻军大名一带，扼守黄河天险；催调提督刘铭传所部淮军迅速北上，“力固畿南门户”；命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率领经英国人训练的天津洋枪队，进驻景州（今河北景县），堵截捻军；命署两江总督李鸿章于所部各军内拨派精锐若干，由上海乘轮船前往天津，增援直隶；命醇郡王奕环统领京城旗绿各营，“密筹布置”，守卫北京。

曾国藩在接到清廷的命令后，一方面故作姿态，力辞节制直隶、山东、河南三省之命，并以种种理由拒绝迅速北上，以免仓促上阵，重蹈僧格林沁全军被歼的覆辙；另一方面积极进行作战准备，并向清廷提出了新的攻捻方略。他认为捻军骑多步少，行动迅速，“飘忽靡常”，因而主张重点设防，“以静制动”，即所谓“各练有定之兵，乃足以制无定之贼”。后来他又一再重申采取这种攻捻方略的必要性，声称“细观贼情，已成流寇行径，若贼流而官兵与之俱流，则节节尾追，著著落后。……虽终岁奔波，终无大损于贼”。强调要在捻军“必经之途，驻扎重兵”，“变尾追之局，为拦头之师，只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据此，曾国藩提出如下具体方案：由他坐镇徐州，负责捻军经常出没的四省十三府州（即安徽庐州、凤阳、颍州、泗州，河南归德、陈州，山东兖州、沂州、曹州、济宁，江苏淮安、徐州、海州）的攻剿事宜，四省的其它地区则由各省巡抚负责。四省分别以临淮、周家口、济宁、徐州为“老营”，驻扎重兵，多储粮草弹药，以为重镇。他认为这样一来，就可做到“一省有急，三省往援。其援军之粮药，即取给于受援之地，庶几往来神速，呼吸相通”，“四省有首尾相应之象，而诸军无疲于奔命之虞”。

曾国藩煞费苦心制定的攻捻方略，其用心非常狠毒。但是，这一方略并不能解决地广兵少的矛盾。且不说捻军可以避免这十三府州的重点设防区，即使在上述重点设防区内，捻军依然可以在乡村纵横驰骋，摧毁地主民团的圩寨，并伺机伏击由城市出援的清军。此外，清军重兵集中于主要城市，广

曾国藩：《遵旨赴山东剿贼并陈万难迅速情形折》，传忠书局光绪二年版（下同）《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二十二，第38页。

曾国藩：《钦奉谕旨复陈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二十二，第68页。

曾国藩：《贼众全萃皖境先赴临淮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二十二，第57—58页。

大地区的兵力就相对薄弱了，加上奉调北上的湘军、准军与各省防军之间矛盾重重，使捻军仍有继续流动作战的条件。

1865年6月18日，因镇压太平天国“有功”而被封为“一等毅勇侯”的曾国藩，在清廷的一再催促下，离开金陵，沿运河北上，踏上了镇压捻军的反革命征途。

（二）捻军继续流动作战

高楼寨之战后，山东清军兵力空虚，仅有丁宝楨所部三千人扼守济宁，“能守而不能战”，而捻军新胜，士气大振，兵强马壮，“纵横自便”。如果捻军此时不失时机地挥军北上，不但济南指日可下，而且可以更加沉重地打击清军，开创新的局面。但是，当时由于捻军首领们对尔后的进军方向“争言不决”，有的主张“先陷济南”，有的主张“北趋直隶”，有的主张“渡黄由豫入陕”，以致在近半个月的时间里，数万部队徘徊于黄河以南、运河以西的菏泽、曹县、城武、定陶、郟城、巨野、濮州、范县、金乡、济宁地区，虽然队伍有所发展壮大，但较长时间无所作为，失去了乘胜进攻的良好时机。及至得悉“京师有备”，自知难以渡河北上，赖文光等才于6月1日率部自汶上袁家口等处渡过运河东进。由于此时济宁、济南等地清军防守已经加强，捻军随即回到运河以西的嘉祥。这时，张宗禹已率部南下安徽，赖文光、任化邦等便接踵南下，谋与张宗禹等会合，恢复蒙亳一带的捻军基地。

张宗禹、赖文光等部捻军先后返回蒙亳地区后，即向当地清军发起进攻，相继占领了一些集镇和圩寨。6月18日，捻军攻占高炉集，切断驻涡阳（即雒河集）的安徽布政使英翰所部的粮道。6月21日，捻军三四万人乘胜进围涡阳城。这时，奉调开往徐州的总兵易开俊部清军三千人已行抵蒙城，曾国藩也于6月30日到达江苏清江浦。英翰接连请援于曾国藩，曾即命提督黄翼升率所部水师由高良涧（今江苏洪泽县）入洪泽湖，沿淮河西上，命总兵周盛波等部由徐州赴宿州以援蒙亳，命提督刘铭传部自济宁驰回徐州“以拯皖北之危”，自率部分湘军进驻临淮关。接着，漕运总督吴棠命总兵姚广武率部由濉溪口、临涣集出发，河南巡抚吴昌寿命总兵张曜、宋庆两部豫军由商丘出发，安徽巡抚乔松年命总兵张得胜、副都统克蒙额等部皖军由颍上、太和出发，驰援被困于涡阳的皖军，对捻军形成包围态势。捻军久攻涡阳不下，粮药将尽，在各路清军步步逼近的情况下，不得不于7月25日撤围，西走河南。

捻军分南北两路深入豫境：北路由张宗禹等率领，经商丘、柘城、太康、

《平捻方略》卷二百三十一，第2页。

佚名：《山东军兴纪略》，《捻军》（四），第96页。

扶沟、鄢陵、许州、襄城、郟县、宝丰、鲁山，南走南阳府；南路由赖文光等率领，经沈丘、淮宁、周家口、西华、临颖、郾城，复折往东南，趋西平、上蔡等地。

曾国藩在捻军分两路进入河南后，仍坚持其专办十三府州攻剿事宜的方针，他认为张宗禹一路已进入豫西，“万难追及”，而赖文光一路进入陈州，属于十三府州，便派刘铭传等部跟踪追击。9月23日，曾国藩自临淮移营徐州。其时，赖文光一路捻军已由河南新蔡进入安徽阜阳县西部的瓦店集、迎仙集一带，刘铭传等部淮军以及豫军、皖军等正从周家口、徐州、颍州、固始等地压来，妄图多面夹击，一举消灭捻军。10月1日，凹张寨一战，捻军失利，赖文光及时率军撤出，由周家口北趋西华、太康、睢州，从考城入山东，活动于曹县、定陶、郟城、菏泽等地。

曾国藩唯恐捻军进入山东半岛富庶地区，便一面命驻防济宁的潘鼎新部淮军扼守运河，一面命总兵张树珊的步队、副都统色尔固善的马队以及徐州的清军北上山东，跟踪捻军；并从苏南调总兵杨鼎勋、郭松林等部进驻宿迁、徐州，以为后援；还命刘铭传、周盛波两部淮军分别进驻周家口、归德，防备捻军南下。清廷对曾国藩在山东围堵赖文光部的部署虽感满意，但对进入豫西的张宗禹部却忧心忡忡，认为该路捻军“不西趋秦境，必北扰晋疆”，而曾国藩所率清军多在东路，实有鞭长莫及之势。为此，拟命李鸿章率总兵杨鼎勋等部驰赴河洛一带，进剿张宗禹部，兼顾山西、陕西门户。接着，又令正在赣南镇压太平军余部的鲍超所部湘军赶赴豫南。曾国藩深知，如果李鸿章督师豫西，必然从东路将淮军调走，使他失去依恃，于是上奏清廷，建议暂勿令李鸿章赴河洛。清廷采纳了他的意见。

就在反动派频繁调兵之际，赖文光等已率捻军由山东进入江苏丰县、沛县、砀山、徐州一带，取得粮食和兵员补充后，又西进河南，于11月底与从鲁山、宝丰东进的张宗禹所率捻军会师于扶沟，随即西趋襄城、叶县、舞阳一带。

（三）曾国藩“以静制动”方略的彻底失败

捻军不断深入河南流动作战，而湘、淮军一般只守据点，不积极攻剿，使新任河南巡抚吴昌寿兵饷两绌，一筹莫展。他在给清廷的奏报中，一方面诉说“豫省军务种种棘手，势处万难”，另方面对曾国藩名为督办三省军务，实仅株守十三府州之地，表示不满。12月14日，清廷谕令曾国藩“统筹全局，前往应援”，并告诫他“未可株守一隅，致误事机”。与此同时，曾

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捻军》（一），第23页。

《平捻方略》卷二百四十四，第10页。

《平捻方略》卷二百四十六，第21页。

曾国藩也因捻军主力全部进入河南，不得不对其攻捻方略进行一些改变，表示“不复拘泥十三府州之说”。他一面坚持仍在济宁、徐州、临淮、周家口四处驻扎重兵，以备“迎头截击”，一面令李昭庆部淮军万余人奔赴河南，与原驻周家口的刘铭传部淮军万余人“同作两支游兵，仿照僧格林沁之法”，与捻军“纵横追逐，使之不得休息”。曾国藩还准备将其大营由徐州移往周家口。

在曾国藩尚未变更部署以前，捻军即已分路疾驰南下：赖文光等率部自临颖、郾城走西平、遂平、确山、正阳、罗山、光州；张宗禹等率部自襄城、叶县走裕州（今方城）、唐县（今唐河）、邓州。1866年1月，捻军各部先后进入湖北，赖文光一路在麻城、黄州（今黄冈）一带活动，张宗禹一路在襄阳、枣阳一带活动。1月18日，赖文光、任化邦部乘清军提督成大吉部哗变之机，发起进攻，成大吉仅率少数清兵从麻城逃往淝口。捻军遂占黄陂等地，威胁武汉。2月18日，捻军又于黄陂东南的街埠一带大败清军，毙总兵梁洪胜等多人。

捻军在鄂东连打两次胜仗，湖广总督官文急忙请求援兵。曾国藩命总兵喻俊明等率水师驰赴武汉，令刘铭传率所部淮军由周家口驰赴湖北黄州，令浙江提督鲍超率所部湘军进驻豫、鄂交界地区，听候调遣。当援鄂清军刚到湖北，捻军又甩掉敌人北上，经河南进入山东。4月11日，张宗禹部在安兴寨（今菏泽东北）击败总兵杨飞熊部八营清军，13日，又在龙垵集（今巨野西南）大败总兵王心安部八营清军，20日，在郟城西北的柳条圈又败潘鼎新所部淮军。26日，赖文光部也到达郟城境内，两支捻军重又汇合。

4月29日至5月7日，捻军三次抢渡黄河、运河均未成功，遂又分兵两支南下：张宗禹等率部走河南虞城、宁陵、归德等地；赖文光等率部南进江苏丰县、砀山、邳州、宿迁等地。6月15日，两支捻军在徐州汇合，旋又分开。张宗禹部由丰县、砀山走河南虞城、宁陵、睢州、杞县，又南下太康、陈州，从周家口渡过沙河，由郾城西进；赖文光部走安徽宿州、怀远，渡过涡河趋凤台、太和，然后入河南境内。捻军一直在曾国藩所圈定的重点防区内往返穿插，流动游击，使其“以静制动”的方略彻底失败。

（四）曾国藩“聚兵防河”计划的完全破产

“以静制动”的方略破产后，曾国藩于1866年夏又提出了“聚兵防河”的方略，企图以此遏阻捻军的流动。经与直隶总督刘长佑、山东巡抚阎敬铭面商，确定了运河、黄河的设防部署：在运河防线上，从济宁长沟到山东、江苏之交的韩庄，由潘鼎新部防守；韩庄以下由杨鼎勋部驻防；长沟以上至黄河由山东军防守。在黄河防线上，范县豆腐店以西至东明、长垣由直隶军

曾国藩：《宁陵扶沟等处胜仗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二十三，第28页。

防守，豆腐店以东的张秋、东阿一带由山东军防守。捻军渡过沙河进入豫西南后，曾国藩又设沙河、贾鲁河防线。沙河地段：从周家口到槐店（今沈丘）由刘铭传部防守；槐店到正阳关由乔松年部皖军防守；正阳关以下系淮河，曾国藩派水师和皖军防守。贾鲁河地段：从周家口到朱仙镇由潘鼎新、张树珊部防守；从朱仙镇北四十里到开封，又北三十里到黄河南岸，没有河流，由李鹤年的豫军构筑堤墙防守。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跨鲁、豫、皖三省的三角形防线。此外，为了攻守结合，又命鲍超、刘秉璋、杨鼎勋、刘松山、张诗日所部为“游击之师”，跟踪追击捻军。

曾国藩“聚兵防河”的主要目的，先则企图阻止捻军进入山东、江苏，在捻军渡过沙河以后，则企图将其局限于豫西南的多山地区，使之不能发挥骑兵的优势，然后集中兵力聚而歼之。显然，这种设防漏洞仍然很多。首先，由于清军内部存在着派系矛盾，曾国藩难于做到统一指挥，特别是经常受到淮军头目李鸿章的掣肘。其次，曾国藩的“防河”战线太长，势必造成兵力分散，处处防守薄弱。此外，还有不少人曾对曾国藩的防捻计划持反对意见，认为“宜于速剿，不必为防河之谋”。

就在曾国藩紧张地部署河防时，捻军发觉了清军的诡计。9月中旬，赖、张两支捻军在河南禹州、许州一带会师，侦知朱仙镇以北堤墙尚未筑成，随即经尉氏、中牟北上，决定跳出河防圈。9月24日，捻军先示形于开封以北的黑堽，佯作抢渡黄河的态势，然后急速南下进至开封南的芦花冈，乘夜击溃豫军，再次突入山东境内。

沙河、贾鲁河防线被捻军突破后，曾国藩自称“闻信之余，实深焦愤”，不得不承认防线太长，兵力不足，称“防守沙河、贾鲁河，本系策之至拙者”，但又声称“无奈马队远不如贼，……专恃步队追剿，断不能制流寇，不得已乃出于防河之下策”。不管曾国藩如何巧于言词，事实是由他主持攻剿捻军一年零五个月，“毫无成效”。为此，清廷决定换马，12月7日，改任李鸿章为钦差大臣，节制湘淮各军，专办剿捻军务。曾国藩则回任两江总督。

三、东捻军转战湖北

（一）捻军分为东西两支

捻军冲破沙河、贾鲁河防线，进入山东菏泽、曹县、巨野、金乡一带地区后，于10月上旬抢渡运河未成。这时，淮军潘鼎新部已进抵济宁，刘铭传部进入城武、巨野，刘秉璋、刘松山、张树珊等部也先后到达山东，进入

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捻军》（一），第47页。

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捻军》（一），第46—47页。

《平捻方略》卷二百六十一，第30页。

运河防区，对捻军实施包围。捻军随即回军西向，于10月13日进入豫东地区。

两年以来，捻军纵横驰骋于苏、鲁、豫、皖、鄂数省，取得了歼灭僧格林沁和粉碎曾国藩“以静制动”的攻捻方略等一系列胜利。但是，由于长期不停顿地流动作战，没有一个可以立脚的基地，部队得不到休整，粮食、弹药的补充十分困难，同时又得不到任何友军的支援，战略上的被动态势日益明显。捻军领袖赖文光等深感“独立难支，孤军难立”，试图改变这一不利态势，遂决定将捻军一分为二，由张宗禹、张禹爵、邱远才等率部分捻军西进陕甘，联络那里的回民起义军，“以为犄角之势”，是为西捻军；由赖文光、任化邦、李允等率部分捻军留在中原地区，与敌周旋，是为东捻军。

（二）东捻军转至湖北与李鸿章的攻捻方略

1866年10月下旬，东捻军三万余人在赖文光、任化邦、李允等率领下，由河南中牟返回山东，拟攻破运河防线，进入较为富庶的运河东部地区，以扩充兵员和筹集粮饷。后因在郓城东北的袁家口、开河、安山等处几次抢渡均未成功，而淮军刘铭传、潘鼎新等部又已跟踪返回山东，为避免遭敌围攻，便南下江苏丰县、沛县等地。不久，复入山东，再次进攻运河防线，又没有成功。其后，赖文光、任化邦等遂放弃进入运河东部地区的计划，决定向湖北转移，拟渡过汉水，进占荆州、宜昌，然后主力入川，并留一支部队于湖北以为声援，以一支部队入陕西与西捻军

取得联络。“倘各路皆不得手，……则共趋秦中”，联合回民起义军，在陕西建立基地。这一计划，得到东捻军广大将士的拥护。1866年12月初，东捻军由山东进入河南，下旬进入湖北。

清军方面，李鸿章鉴于曾国藩所确定扼守的“贾鲁河、沙河地段太长，人力难齐，终办不成”的教训，提出了将捻军“蹙之于山深水复之处，弃地以诱其人，然后各省之军合力三四面围困”的“扼地兜剿”方略，并准备采用“离间”、“招抚”等伎俩，妄图从内部瓦解捻军。

1867年1月，李鸿章调集不下十万部队，分“堵击之师”和“兜击之师”，在河南、湖北集中。其部署是：在北部，命李昭庆部二十余营驻河南信阳，扼捻军北上的通道；在西部，命鲍超三十二营由南阳移驻襄阳，豫军总兵宋庆十营、副将蒋东才六营扼守枣阳，荆州将军巴扬阿统领提督蓝斯明、水师

《赖文光自述》，《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上册，第250页。

陈昌：《霆军纪略》，《捻军》（一），第257页。

李鸿章：《谢署钦差大臣沥陈大略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清光绪三十四年印行，下同）卷十，第57页。

总兵左光培扼守汉水沿线；在东部，命新任安徽巡抚英翰、总兵张得胜等率皖军分扎六安、霍山一带；在南部，由湖广总督官文驻守武昌，彭玉麟统领水师驻守黄州。上述各部清军均为“堵击之师”。李鸿章又命刘铭传、刘秉璋、周盛波、张树珊等部淮军共三十余营，由豫东南分道入鄂，和新任湖北巡抚曾国荃统领的郭松林、彭毓橘、伍维寿、熊登武等部湘军共三十余营，组成“兜击之师”。李鸿章等妄图一举消灭捻军于鄂东地区。

（三）罗家集、杨家河两败敌军主力

东捻军进入鄂东北不久，即由麻城南下黄陂，接着进至滠口，威胁武昌。随后，折而向西，连克云梦、应城，进攻德安府（今安陆），旋又经宋河镇入京山，南占天门县。提督郭松林率领九营湘军尾追而来，捻军采取兜圈子的战术疲惫敌军。郭松林不顾士卒疲劳，紧追不舍。1867年1月11日，郭松林分兵三路向钟祥东面的罗家集进攻，捻军的步马队早已设伏以待。待敌发起攻击时，捻军首领任化邦率部正面接战，李允统领马队从两侧包抄，赖文光率部袭敌后路，将清军四面包围。激战半日，歼灭清军二千余人。郭松林身中七枪，被捻军生擒，因伤重不能行走，被弃掷路旁，幸免于死。

罗家集胜利后，东捻军在钟祥与旧口之间结筏抢渡汉水未遂，便东走应城、云梦。淮军周盛波、张树珊等部在后尾追，捻军仍采用打圈战术，伺机歼敌。1月26日，捻军在德安府杨家河东岸屯扎，淮军总兵张树珊所部六营孤军追来，渡河进击。捻军佯装败退，张树珊恃勇轻进，被捻军分割包围。激战至深夜，捻军阵斩张树珊及副将刘登朝、郭有容等数百人，使李鸿章的淮军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

（四）尹澧河先胜后败

东捻军两败敌军之后，士气高昂，声威大振。为了实现西进川陕的战略目标，先后在旧口、丰乐河、流水沟及王家集、霸王山等处抢渡汉水，但均为清军所阻，被迫回到旧口地区。

就在东捻军抢渡汉水的半个月中，清军各部已分别向旧口方向集中，准备围歼东捻军于旧口地区。其部署是：湘军彭毓橘、谭仁芳、熊登武、刘维楨等部驻九里冈、永兴、皂市、天门一带，屏蔽东路；豫军蒋东才等部驻茅茨畈，扼守北路；淮军刘秉璋、周盛波等部扼守京山，李昭庆部由信阳移驻宋河镇；以淮军主力刘铭传部万余人由北而南，湘军主力鲍超部一万六千余人自西向东，夹击捻军。赖文光等见清军来势迅猛，便率军退守尹澧河（今永隆河）一带，准备与清军决战。

2月19日拂晓，刘铭传为了争功，自行改变与鲍超军共同进攻的计划，提前由下洋港向尹澧河抢先发动进攻。他见捻军扎营于司马河（今天门河）

对岸，便留二三营兵力护卫后路辎重，以十七营兵力渡河攻击。捻军以步队正面阻击敌军，以千余马队向北绕袭敌军后路。刘铭传恐后路兵单，辎重难保，便抽出步队三营、马队二营加强后路，自率十二营兵力分三路进攻。捻军亦分三路迎击：任化邦敌左路，牛喜敌右路，赖文光、李允敌中路。任化邦率部全力围攻刘盛藻的左路军，“刘盛藻鏖战多时，渐不能支”。刘铭传恐左路有失，忙从中路抽出黄桂兰、张士元、李锡增三营兵力往援。在捻军的锐利攻势下，刘盛藻部过河溃逃，李锡增则中枪丧命。接着，任化邦率部转援牛喜部，将右路淮军一举消灭，击毙总兵唐殿魁、记名总兵田履安、副将吴维章等。捻军左右两路取胜后，任化邦、牛喜便率部与赖文光、李允部一起围攻刘铭传亲自督率的中路军。捻军将士挥刀斩杀，淮军一败涂地，退至司马河彼岸。刘铭传失魂落魄，与其部将、幕僚“俱脱冠服坐地待死”。

可是，正当捻军追过司马河，即将歼灭刘铭传所部淮军时，鲍超率所部湘军从旧口由西向东侧击杨家河捻军侧背。杨家河与尹澧河同在司马河东岸，相隔十余里。赖文光在鲍军进入杨家河后，没有仔细侦察敌情，便仓促率领中军步队向鲍军冲锋。但鲍军阵势严整，左、中、右三路，每路八九营兵力，分主攻和策应，稳扎稳打，步步前进。激战两小时，捻军中军步队受挫，虽有马队驰前接应，但后路又为鲍军马队截断，于是军心动摇，阵势大乱，由胜转败。又因连日下雨，河港水深，道路泥泞，捻军慌不择路，阵亡和溺死者近万人。杨家河、尹澧河等处数百村庄据点，全被鲍军占领。

尹澧河之战，虽然歼灭了刘铭传所部淮军半数以上，但东捻军自己也遭到惨重损失，伤亡万余人，被俘近万人，损失马匹数千和辎重无数，不但元气大伤，而且使西进的计划受挫。尹澧河之战最后遭到失败，首先是由于东捻军在取得罗家集、杨家河两次胜利后，产生了骄傲轻敌情绪，对于在武器装备上占很大优势的敌军没有予以足够重视，以致在与刘铭传部作战时，竟没有派出相当数量的部队，对近在旧口的鲍超部进行警戒，特别是当鲍部来袭时，赖文光等不作周密部署，仓促反击，结果受挫。其次，捻军在作战不利的情况下，缺乏坚韧顽强的意志，稍遇挫折，就撤离战场。此外，尹澧河一带河汊纵横，使捻军骑兵的活动受到限制。鲍超说：这次“擒斩溺毙之多，则由彼之先失地利耳”。

（五）被迫放弃入川计划

东捻军在尹澧河战败后，余部即北上河南，从唐县、桐柏东走信阳、罗

李鸿章：《铭军尹澧河挫败片》，《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十一，第14页。

薛福成：《庸盦内外编》，《捻军》（一），第366页。

陈昌：《霆军纪略》，《捻军》（一），第259页。

山、光山，然后经湖北麻城、黄冈、蕲水、蕲州、广济，进入安徽西南边境，因遇淮军刘秉璋、周盛波部阻击，又折回湖北蕲州一带。这时，湘军彭毓橘部驻扎于蕲水。3月23日，东捻军由兰溪、董家河一带沿浍水河北上时，彭毓橘亲率湘军十三营由六神港至溪潭坳堵截，捻军将其击败，阵毙总兵彭光友，并乘胜包围六神港，取得了击毙彭毓橘以下营哨各官三十余名和歼敌三千余人的胜利。

之后，东捻军又西经孝感、应城、京山等地抵达汉水东岸，在旧口至岳口一带筹船结筏，希图西渡汉水，为清军炮船所阻，未获成功。后经钟祥北上枣阳、随州（今随县），5月初进入河南桐柏、信阳境，因遭淮军周盛波、刘铭传部截击，由平靖关折回湖北应山，旋又东走黄安。5月14日，捻军在黄安的王家冈设伏，大败刚从河南光州赶到麻城的淮军杨鼎勋部，杀总兵张遵道。接着，捻军再次进至汉水东岸，由于刘铭传和鲍超部相继追来，不得不放弃西渡汉水进入四川的计划，经枣阳北上，拟从河南西进入陕，与西捻军会合。

四、东捻军在山东被围及其最后失败

（一）进军山东半岛

1867年5月下旬，东捻军进入河南新野、邓州、镇平、内乡一带，还来不及休整补充，淮军刘铭传等部就分别从枣阳、襄阳跟踪追来，豫军宋庆部和淮军周盛波等部也分别由南阳、唐县前来堵截。而当时捻军内部对于行动方向问题意见不一。赖文光、任化邦等本主张进军西北，但从山东郓城、梁山地区参军的将士认为山东连年丰收，粮食充裕，而陕西连年战乱，粮食缺乏，极力主张东进山东。赖文光、任化邦等为了尽快摆脱敌人的包围，同时，“恐西路山多，难于翻越”，也就改变主意，采纳了东进山东半岛的意见。

6月上旬，东捻军由考城进入山东曹县，疾趋郓城，甩掉尾追之敌，于6月12日晚直逼运河，以一部强攻沈口，吸引附近各段守河清军驰援；以另一部袭击由山东军防守的比较薄弱的戴家庙一带防线，于次日黎明突破。当时天旱水浅，捻军全部三四万人涉水过河，进入运河东部地区。

东捻军进入山东腹地后，日行百余里，忽东忽西。新任山东巡抚丁宝楨虽督军尾追，只能望尘兴叹。6月19日，东捻军东走章丘，后经邹平、寿光等地进入胶东半岛，6月底兵锋直指烟台。道员潘霁勾结英法侵略者联合防守烟台，通商大臣崇厚则从天津派出洋枪队渡海增援。

胶东半岛虽然比较富庶，但捻军进入这三面濒海的地区，易被清军包围，而东捻军首领们虑不及此，最终招致失败。

（二）李鸿章坚持“扼地兜剿”方针

东捻军突入山东后，清廷令李鸿章从河南移营山东，“择要驻扎，居中调度”。李鸿章根据刘铭传、潘鼎新等将捻军“挤入登（州）、莱（州）海隅，趁势围逼”的建议，立即奏称：“断不敢谓蹙贼海隅之议遂有把握，但与其任令长驱各省，流毒无穷，似不若诱令盘旋偏隅，得办且办”。6月30日，李鸿章抵达济宁，随即以刘铭传部由济宁、泰安、莱芜径趋青州（今益都）为中路，以潘鼎新部由潍县（今潍坊市）、昌邑赴莱州（今掖县）为北路，以总兵董凤高、沈宏富马步十五营由郯城、兰山进莒州为南路，“三路兜截而前，欲逼（捻军）入登、莱绝地，会合（山）东军相机扼堵”，“扼之于胶莱河一带，使其不能复出”。不久，李鸿章又声称：“欲灭此贼，计惟有觅地兜围之一法”，“与其驰逐终年”，“不如弃一隅以诱之”，“与其往复运东”，“不如专弃登、莱以扼之”。他决定“先固守局而后进兵”。

其具体部署是：以运河为外圈，胶莱河为内圈，进行布防。决定调皖、豫、鄂、苏和直隶的清军，分段防守运河，在西岸修筑长墙，并以部分兵力就东岸旧墙修缮炮台，“犄角护守”。鉴于胶莱河是扼捻军西突的咽喉，决定配以重兵，以一营守三里，在近三百里的地段上，共部署兵力近百营，由淮军主力刘铭传、潘鼎新、董凤高、沈宏富、王永胜等部及豫军宋庆等部和丁宝楨的山东军划段防守，并筑长墙壕沟于河西。同时，以黄河为北部防线，由崇厚和刘长佑负责防守；以江苏北部的六塘河为南部防线，由漕运总督张之万和由浙江北援的部队共同防守。此外，另派部队跟踪追剿。

（三）东捻军突破胶莱河防线

1867年7月中旬，东捻军正在福山、宁海（今牟平县）一带就粮，得知清军在胶莱河西岸修墙筑垒，分段扼守，才急忙回军西向。7月31日，赖文光、任化邦等率军自即墨向胶莱河南部的麻湾口发起攻击，但未能突破，只得转兵北上。8月6日，又向淮军潘鼎新部驻防地段的新河突击，仍未成功。后侦知胶莱河北段入海处沙滩无兵驻守，而潍河北段自下营至海口一段只有已革山东军总兵王心安部二千余人驻防，且“营垒初成，河墙未筑”，便于8月19日集中兵力从这一地段的海神庙等处发动进攻，歼灭了王心安所部清军，进入潍县、昌乐，然后由安丘、临朐疾驰南走。李鸿章费尽心机策

李鸿章：《行抵归德布置大略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十一，第42页。

李鸿章：《行抵济宁筹防运河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十一，第45页。

李鸿章：《陈明办贼大致暂难亲赴前敌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十一，第48—49页。

周世澄：《淮军平捻记》，《捻军》（一），第161页。

划的“扼守胶莱之策”，成为画饼。清廷大为震惊，将李鸿章、潘鼎新交部议处，丁宝楨革职留任。

胶莱河防线被捻军突破后，李鸿章将防守胶莱河的各部清军调至运河防线，并将大营由济南（8月下旬由济宁抵济南）移至台庄（今台儿庄），居中调度。当时，多数清军将领对防守运河丧失信心，特别是丁宝楨表示坚决反对，他说：“今胶防隳守，运河之防非独无补于事，抑恐有碍大局”。曾国藩也悲观地说：“胶莱三百余里尚难堵御，沿运千有余里更觉毫无把握。”清廷则明确指出“河防不可恃”。李鸿章面临朝野的谴责和攻讦，仍然认为扼守运河虽没有十分把握，但舍此别无良策。他在9月19日的奏折中说：捻军“正急欲出运”，“若先撤运防，是示贼以弱也。守运各军早夜修防，尚无疲倦，较穷年追逐者劳逸饥饱略殊。忽令守，又忽令不守，是使军心惶惑也。”“今使罢运防而另有制贼之法，臣必速罢，若更无可制贼，似不若得守且守，能战即战，尽人力以待事机。”李鸿章继续加固河防，后来还组织了三支各拥有万人以上的“游击之师”，紧追捻军。

（四）东捻军的最后失败

东捻军虽然突破了胶莱河防线，但仍局处于运河与胶莱河之间，由于地域狭小，无从发挥流动作战的长处，粮食也日益缺乏。赖文光、任化邦等为摆脱遭十余万清军拦阻追击的不利局面，决心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但缺乏明确的方向，行动慌乱。先是由莒州、日照南下江苏赣榆、沭阳等地，企图抢渡运河和六塘河。由于清兵防守严密，进军受挫，遂于10月初复入山东，并派人由间道入陕，向西捻军求援。11月初，东捻军突至章丘，准备北渡黄河，又被清军水师所阻。在寒冷缺粮的情况下，东捻军只得东走乐安（今广饶）、寿光、潍县就粮，刘铭传部淮军尾随其后。11月12日，东捻军在潍县松树山仓促应战，结果大败，损失惨重。赖文光、任化邦等只得率军南下江苏，拟再次抢渡运河和六塘河。11月19日，当刘铭传部尾追至赣榆时，捻军再次进行反击。由于淮军绕袭后路，捻军复大败。鲁王任化邦被叛徒潘贵升枪杀，使东捻军元气大伤。任化邦是捻军重要首领之一，英勇善战，尤其擅长指挥骑兵作战，他与赖文光一起，勇谋结合，带领捻军屡败湘淮军，为敌人所畏惧。他的牺牲，是东捻军的重大损失。

赖文光在任化邦牺牲后，率部折回山东，继续战斗，企图突破清军的围困，但因连遭失利，力量大减，加上饥寒交迫，人困马乏，士气日益低落。

《平捻方略》卷二百八十二，第18页。

曾国藩：《复李少荃宫保》，《捻军》（五），第333页。

李鸿章：《不罢运防片》，《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十二，第9页。

12月，当赖文光率军北上，徘徊于寿光、昌邑、潍县避敌就粮时，刘铭传、郭松林、潘鼎新等部又相继追

捻军首领赖文光的战刀

来，东捻军屡战屡败。12月24日，东捻军在寿光的北洋河与弥河之间的滨海地带与清军背水决战，结果惨败，伤亡近二万人，被俘近万人，精锐丧失殆尽，首王范汝增等壮烈牺牲。之后，赖文光率余部四五千人由昌乐南下诸城、日照，走江苏赣榆、宿迁。12月31日，在抢渡运河失败后，即转兵东向，前队于次日夜由沭阳城南张家湾突破了六塘河防线，进入清江浦境内，但后队未及渡河即被清军歼灭。渡过六塘河的捻军由于不断遭到清军堵击，减员愈来愈多。1868年1月5日，余部千余人在扬州东北的瓦窑铺被道员吴毓兰部淮军击败，赖文光不幸被俘。至此，东捻军最后失败。赖文光在太平天国失败后，领导捻军继续坚持反清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被俘后，他严词拒绝敌人的劝降，英勇不屈，就义于扬州城外，表现出崇高的革命气节，不愧为农民革命军的一个杰出领袖。

五、西捻军转战陕西

（一）灞桥大捷

1866年10月捻军分为东、西两军后，西捻军约有三万余人（一说五六万人），以“前进甘陕，连结回众”，建立新基地为目标，在张宗禹、邱远才、张禹爵等率领下，由豫东经许州、洛阳、陕州（今三门峡市西）、阌乡（今灵宝西北），于11月9日进入陕西华阴县境。

自1862年西北太平军和滇川农民起义军入陕后，有力地支援了当地回族人民的大起义。之后，由于西北太平军援救天京离陕，而清廷又抽调多隆阿、刘蓉等部入陕，回民起义军遂遭到镇压，余部退入甘肃，与当地回民起义军一起坚持反清战争。西捻军的入陕，大大鼓舞了陕甘回民起义军，他们纷纷在甘肃的宁州（今宁县）、泾州（今泾川）等东部地区袭击清军，配合西捻军在陕西的作战。这时，署理陕西巡抚刘蓉正率一万四千余名湘军在陕甘交界处堵击回民起义军。当他得悉捻军入陕后，感到形势严重，忙向清廷告急说：“西回东捻，两路同窳，欲防则无迎击之旅，欲剿则无守隘之兵”，请求速派援兵。

清廷在西捻军入陕前，已改命左宗棠为陕甘总督、乔松年为陕西巡抚，西捻军入陕后，又命鲍超率所部湘军入关追击。可是，左宗棠借口筹备粮饷，停兵湖北，踌躇不前；鲍超则通过曾国藩转奏清廷，沥陈入陕有“米粮之难办”、“饷银之难解”等等困难，要求“俟马队练成，陕省米粮转运等事布

置周妥，再行入关”。鲍超所部湘军虽然战斗力较强，但抢掠成性，西北地瘠民贫，自然难于满足其掳掠的欲望。清廷只得改令提督刘松山部湘军替代。清军援兵不能很快入陕，为西捻军的作战提供了有利条件。

西捻军进入陕西华阴后，立即西进华州（今华县）、渭南。刘蓉不得不将清军东调，对付捻军。11月14日，提督刘厚基率兵三千余人由渭南东进，在赤水镇与捻军遭遇，一触即溃，败退渭南。25日，知府唐炯指挥湘军各营，分兵三路再次发动进攻。捻军设伏于华州敷水东面的树林里，又大败湘军，斩杀七八百人。

西捻军初战获胜后，便于12月中旬乘胜西进，14日前锋进抵西安东面的灞桥镇。清军回顾省城，捻军却又折向东南，接连占领蓝田县属的泄湖、蓝桥等地。为了调动西安清军，后又佯趋商州（今商县）、雒南（今洛南）。清军果然东向追击，西捻军遂又北走渭南，并虚造东攻潼关的声势。当湘军北上堵截时，捻军又迅速西进，摆出攻打西安的架势，并在灞桥十里坡左右村庄设下伏兵，布好口袋，等待敌军的到来。

1867年1月23日，当疲惫不堪的湘军追至临潼东北的新丰镇时，捻军派少数部队与敌接触，且战且退，把敌军诱至十里坡。待记名提督杨得胜、总兵萧德扬、提督刘厚基、道员黄鼎等部敌军相继闯进伏击圈后，捻军诱敌部队立即回马反击，埋伏在十里

坡左右的马队同时出击，左右包抄，将湘军四面包围。时值风雪交加，湘军士卒冻饿，无心作战，枪炮又被雨雪沾湿，影响点放。捻军勇猛冲杀，展开白刃格斗，不到半天时间，阵斩总兵萧德扬、提督杨得胜、萧集山、萧长清、布政使衔候补道萧德纲等湘军将领，歼灭敌军三千余人，收降数千人，取得了入陕以来的一次大胜仗。这是捻军运用流动战术，先诱敌跟追，拖垮敌人，然后设下埋伏，出敌不意地围歼敌人的又一成功战例。

（二）捻军、回军联合作战

灞桥之战后，清廷将刘蓉“革职回籍”，命新任陕甘总督左宗棠督办陕甘军务，并催促总兵刘松山部湘军和郭宝昌部皖军兼程入陕。当时，西捻军已乘胜进入西安东门外的三府洼、西门外的火神庙、南门外的小雁塔、北门外的红庙，包围了陕西省城。与此同时，甘肃东部的陕甘回民起义军亦东进陕西，与西捻军声势联络。巡抚乔松年依托西安高厚的城墙固守待援。2月初，湘军刘松山、李祥和部及淮军张锡嵘等部到达西安郊外。2月10日，西捻军向敌发起进攻，激战数小时，阵斩张锡嵘，但最后为刘松山部湘军所败，退守秦渡镇、花园铺、梁家桥一带据点。西捻军围攻西安月余，未能攻克，

打援又遭失利，遂撤离西安，沿渭河南岸西走，3月24日在郿县以西渡过渭河，进入扶风、岐山交界处的益店，与由凤翔东来的回民军取得联系。

西捻军和回民军共同拟定了作战计划：捻军东攻同州（今大荔）、朝邑，回民军进攻西安。但正当捻、回军准备分路东进之际，总兵郭宝昌部皖军已从三原向咸阳西进，刘松山等部亦已渡过渭河，向捻军、回军逼近。4月19日，临平镇（今乾县西南）一战，捻、回军失利，被迫改变原定作战计划，一同经三原、富平向蒲城、同州前进。5月初，两军扎营于同州北的许庄一带，

横亘二十余里。刘松山率部赶来，捻、回两军将其包围，杀死副将胡理明等多人，毙伤清兵甚众。5月下旬，捻、回军又挥师西进，从兴平南渡渭河，再次进攻西安。清军紧闭城门，固守待援。5月27日，刘松山、郭宝昌等部援兵赶到，捻军在西安城南的山门口、木塔寨等处作战失利，损失较大。张宗禹遂率军东走蓝田，继又转战于临潼、渭南、华州一带。

西捻军与回民军取得联系后，由于有着共同的反清目标，因此能够互相配合作战，对于清王朝在陕西的统治造成了严重的威胁。但是，由于阶级的局限性，尤其是民族、宗教信仰等不同，在政治上未能建立起巩固的联盟，在军事上也没有统一的指挥机构，处于时离时合的状态，没有达到捻军与太平军那种程度的联合。

（三）左宗棠进攻捻、回军的方略与部署

1867年2月22日，清廷授陕甘总督左宗棠为钦差大臣，专办陕甘军务，以按察使刘典为帮办。左宗棠在清廷的一再催促下，率楚军近二万人，从6月中旬开始，分三路陆续入陕：左宗棠亲率一万一千人由樊城北上，西入潼关，以防西捻军东返河南；刘典率军三千余人由樊城进荆紫关，经商州进入蓝田，阻拦西捻军南下湖北；提督高连升率军四千由樊城溯汉水西上，于蜀河口登陆，防止西捻军由陕入川。早在入陕之前，左宗棠就确定了进攻捻、回军的方略。他认为“以用兵次第论，非先捻后回不可，非先秦后陇不可”。

从左宗棠的入陕兵力有限，西北地瘠民贫，粮饷运输补给困难，捻军、回军又缺乏紧密联系等情况来看，左宗棠的上述作战方略，是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

7月19日，左宗棠抵达潼关，所部诸军也先后入陕，即以主要兵力对付西捻军，以部分兵力对付回民起义军。其具体部署如下：以先期入陕的刘松山所部老湘军、郭宝昌所部皖军、刘厚基所部湘军和高连升所部楚军共二万一千余人，为“剿捻之师”（高连升部为回民起义军所牵制）；以帮办刘典

左宗棠：《答杨石泉》，《捻军》（六），第108页。

所部楚军和黄鼎所部川军共八千余人驻陕甘边界，为“剿回之师”；其余楚军万余人，分驻凤翔、宜君、华州、华阴、渭南、临潼等地，策应各军，为“兼讨回捻之师”。左宗棠企图割断回民起义军和西捻军的联系，把西捻军围困在渭河北岸的泾、洛两水之间，将其歼灭后，再向回民起义军进攻。

（四）西捻军转移陕北

左宗棠率军入陕后，在陕清军兵力增至约四万人，装备有洋枪洋炮。西捻军虽有数万之众，但除老弱妇孺外，能战之兵只有万余人，在数量和武器装备上都居于劣势。当时，西捻军正盘旋于蒲城、富平、三原、泾阳一带。这一地区南有渭水，西有泾水（今泾河），东有洛水（今洛河）、黄河，北面则是山区，很不利于捻军骑兵的纵横驰骋。为了摆脱左宗棠所部各军的包围，西捻军决定向陕北转移。

10月上旬，左宗棠与刘典、刘松山、李祥和、郭宝昌、高连升等进一步“商议方略”，策划将捻军消灭于泾水、洛水之间的具体部署。西捻军见各路敌军日逼，便于10月24日由蒲城东南一带北上白水，以马队猛攻渭北山区的清军，突破包围圈后，向中部（今黄陵）、洛川进军，进入陕北地区，使左宗棠的围歼计划顿成泡影。

陕北高原塬、梁、峁、沟、壑相间，人民生活十分贫困。西捻军进入这一地区，作战和补给都遇到不少困难，但毕竟摆脱了敌人的围攻，加之当地清军力量比较薄弱，便于休整。其次，陕北是回汉农民起义军主要活动地区，可以得到他们的帮助和支援。再次，即将进入初冬季节，黄河冰冻，一旦左宗棠的重兵追来，可以渡河入晋。所以，在当时的形势下，捻军北上陕北，对于保存自己和尔后的行动，还是比较有利的。

西捻军进入陕北后，甘肃东部和南部的回民起义军仍积极向东发展，配合作战。10月底，西捻军一部进攻鄜州（今富县）不克，北攻甘泉。11月上旬，一部进占安塞，主力活动于宜川、延长之间。刘松山、郭宝昌“思催队紧追”，便率部由中部东渡洛水，向宜川进发。11月14日，回民起义军在中部大贤村截击尚未渡洛的刘松山部后队，杀其部将李祥和。11月17日，西捻军北占延川，进向清涧，接着于22日配合回民起义军占领绥德州（今绥德）。

西捻军在陕西的活动，促进了这一地区革命形势的高涨。12月3日，左宗棠在奏折中惊恐地说：“捻自南而北千有余里，回自西而东亦千有余里”，“现在局势艰危，州县城池叠陷”。可是，就在这时，张宗禹收到了被困于山东的东捻军求援的急信。为了实践“誓同生死，万苦不辞”的誓言，张宗禹等决定立刻离开陕北，去援救自己的战友。

左宗棠：《捻逆连陷州县回逆猖獗自请严议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二十三，第29—30页。

六、西捻军的覆没

(一) 挺进直隶

张宗禹等原拟率军南出潼关，由河南转赴山东援救东捻军。

后来又决定进军河北，威胁京畿，把清军吸引到自己周围，以达援救东捻军的目的。这个类似围魏救赵的计划，在当时来说，还是可取的。可惜东捻军很快失败了，结果西捻军非但未达目的，反使自己陷入清军的重重包围之中而不能自拔。

1867年12月上旬，张宗禹率西捻军二万余人由绥德急速南下，于17日进到宜川境内的黄河西岸。当晚，张禹爵率五百人为先锋，张宗禹率大队随后，乘北风大作之际，在宜川东面壶口一带履冰抢渡黄河成功，乘胜占领了山西吉州（今吉县）、乡宁，接着南下河津，围攻稷山县城。

这时，刘松山、郭宝昌等部清军已渡河跟踪追击。为了迷惑和摆脱敌人，张宗禹等决定率捻军北上，佯作进攻太原之势，便于12月24日撤稷山之围，由绛州（今新绛）北进临汾、洪洞。当刘松山、郭宝昌等部清军亦跟踪北上时，西捻军突然转兵南下，途经曲沃、绛县，于1868年1月初越过中条山，进至河南济源城下。河南巡抚李鹤章急忙调兵驰援，并从山东迅速调回张曜、宋庆两部豫军。张宗禹立即率军经修武、新乡、汤阴、临漳，于1月27日渡过漳河，进入直隶境内。接着，经磁州（今磁县）、鸡泽、隆平（今隆尧）、新河北上，于2月1日在束鹿所属的周家庄渡过滹沱河，复经定州（今定县）、望都北进至保定、满城一带。

西捻军突然出现在直隶南部，使清廷慌了手脚，连下谕旨，调兵遣将，防卫京师，于是各地“勤王”之师接踵赶来。山东巡抚丁宝楨率军进入直隶雄县一带，河南巡抚李鹤年率军抵磁州。已从陕西出潼关进入山西南部的左宗棠也率部于2月15日抵达直隶获鹿，接着，扎大营于定州。清廷仍任命他为前线总指挥。李鸿章因未能总揽攻捻大权，心怀不满，借口休整，行动稍缓，经清廷严诏催促，才命潘鼎新、周盛传、周盛波、善庆、郭松林、杨鼎勋等部先后进入直隶景州、安平。此外，安徽清军也进入直隶；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率洋枪队布防天津；直隶总督官文率部往援保定；连警卫圆明园的马队也调往涿州（今涿县）防剿。集结在直隶中部、南部的清军共约十余万人。为了弥合左宗棠与李鸿章间的矛盾，清廷于2月底命恭亲王奕訢为大将军，左宗棠、李鸿章为参赞大臣。各路统兵大臣及督抚等均归恭亲王节制，

据《涡阳县志》记载：西捻军破绥德后，“得任怀（化）邦告急书，将出潼关赴东拈（捻）。有老翁教宗禹曰：‘不可！官军聚山左，河北必虚。吾引兵出彰（德）、怀（庆），逾大名，直犯畿辅，官军必回军宿卫，则东围不战自解矣。’宗禹从之。”（见《捻军》第二册第107页。）

以一事权。

西捻军的行动确实调动了清军，但也使自己陷入了孤军作战的困难局面。2月5日，西捻军于满城为道员余承恩部所败，东南走祁州（今安国）、饶阳。2月中下旬，西捻军在饶阳、献县一带活动时，即陷入了湘军刘松山、郭松林部，淮军杨鼎勋部，皖军郭宝昌、程文炳部，豫军张曜、宋庆等部的包围之中，3月16日，捻军因连日奔驰，疲惫不堪，疏于戒备，结果在饶阳东北一带遭清军袭击，部队伤亡很大，特别是邱远才、张禹爵两员为敌人所害怕的战将同时牺牲，使士气大受影响。

（二）转战豫鲁

为了摆脱敌人重兵围困，张宗禹率军南走，于3月18日从晋州（今晋县）西南的桃园、相古村等处渡过滹沱河，后经宁晋、新河、巨鹿，于3月23日在成安渡过漳河，进入河南，然后经滑县、新乡、获嘉进至清化镇（今博爱）。在这里，捻军进行了短暂的休整，把步兵全部改为骑兵，使部队行动更加迅速，同时，伐竹为矛补充军械物资。

这时，淮军已赶到豫北，李鸿章正想北依太行山，南据黄河，实施其围困计划，幸好张宗禹等已经察觉到“怀、卫一带，阻山（太行山）面河（黄河），地势至狭，恐被围困”，很快离开清化镇，东出延津平原。4月1日，在封丘大败湘军刘松山部、皖军郭宝昌部，重伤郭宝昌，毙记名提督周盈瑞。4月12日，又与潘鼎新、杨鼎勋、郭松林等部战于滑县，杀淮军提督陈振邦、副将刘正同等。之后，经浚县、内黄、直隶清丰、南乐之交进入山东莘县。活动于东昌府（治今聊城）一带的沧州下洼、高家口盐民起义军数千人，在其首领高岩率领下，参加了捻军，并充当向导，引导西捻军于4月17日从东昌府南李海务渡过运河。4月下旬，经德州、沧州，兵锋指向天津。

西捻军临近天津后，恭亲王奕訢即命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率洋枪队加强防卫，命绥远城将军定安、副都统富和、提督郑魁士各率所部增援天津；命侍郎恩承、副都统玉亮所部赶赴武清（今杨村）设防；并无耻地指使崇厚通知英国、法国炮船协同防守天津。

西捻军在独流镇、杨柳青等处用船搭桥抢渡运河，因遭洋枪队密集炮火封锁，无法前进，遂于4月末南下山东就食。

（三）最后覆没

西捻军进入山东海丰（今无棣）、阳信、武定（今惠民）地区后，虽然便于解决粮饷问题，但从地形上看，这一地区东濒大海，南有黄河，西有运

河，易被敌人围困。当时张宗禹等早已得到东捻军失败的消息，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及时率部跳出清军重兵集结的直鲁边区，向敌人守备比较薄弱而又适于骑兵作战的地区转移。张宗禹等之所以虑不及此，除了急于解决部队的粮食问题外，主要是轻敌思想作怪。他们认为清军虽“千里连营”，但指挥不统一，等到“秋高马健”时，只要振臂一呼，就可突破清军的河防。正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没有及早突围，脱离险境，结果造成全军覆没的悲惨结局。

这时，清军各部十余万人，先后到达运河东部的直鲁地区。清廷命李鸿章为前线总指挥，调度各军。李鸿章按照其“设长围以困之”的“就地圈制”计划，作了如下部署：北面，将沧州以南的捷地坝挖开，引运河水入捷地减河，并沿河兴筑长墙，由崇厚洋枪队和潘鼎新部防守，阻扼捻军再次北上威胁京津；西面，于张秋一带引黄河水入运河，并沿运河赶筑长墙，由河北、山东、安徽等省清军分段负责，附近州县的民团协防，又调总兵丁长春部水师炮船进驻德州，加强水面巡逻，严密防守；南面，封锁黄河各渡口，将船只一律调至南岸，由山东地方官吏带队把守；东面，严禁渔船下海，防上西捻军渡海而走。同时，调战斗力较强的湘淮军为“游击之师”跟踪追击。

5月中旬，张宗禹由于不知沧州捷地坝已被挖开，且有重兵把守等情，仍然企图强渡捷地减河北上，结果受阻而返。下旬，张宗禹又率军抢渡临清、东昌等处运河，仍为驻防清军所败。为了摆脱追军和出敌不意，捻军东进海丰。5月29日，疾驰至直隶东光的下口镇再次抢渡运河，由于丁长春部水师及该处清军把守严密，仍然无隙可乘，不得已又南返山东。

西捻军被围困在方圆六七百里的地区内，忽而北上，忽而南下，几次抢渡均遭失败。虽然把清军拖得疲累不堪，甚至李鸿章、左宗棠等也因未能完成清廷下达的一个月内消灭捻军的任务而被“交部议处”，但整个形势对西捻军愈来愈不利。由于连续下雨，河水猛涨，道路泥泞，使以骑兵见长的捻军行动更加困难，而清军的炮船却更便于行驶，配合步队围攻捻军。同时，李鸿章又实行“缩地围扎”的方针，把捻军压缩在马颊河以南、徒骇河以北的高唐、商河、惠民等地的狭长地带，并进一步施展“招抚”伎俩，加上当地地主豪绅实行坚壁清野，强迫村民搬入堡寨，使捻军的食宿发生困难。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下，捻军士气日益低落，以致接连发生投敌事件。

7月16日，西捻军在直隶吴桥（今吴桥东）遭周盛波、周盛传部伏击，伤亡千余人。26日，与郭松林、潘鼎新部战于山东商河东北的沙河镇，被杀被俘三四千人，张宗禹也中弹受伤。31日，在济阳玉林镇、鸿福寺与豫军张曜、宋庆部和淮军潘鼎新部发生激战，因地处黄河弯曲部，骑兵行动不便，结果又遭惨败，将士阵亡六七千人，损失马匹上万，輜重丢弃殆尽，张宗禹率余部突围。威震一时的西捻军，至此已成强弩之末。

8月4日，张宗禹率领余部在德州的桑园、二屯、老君堂等处抢渡运河，均未成功。8月15日，在东昌的李海务口再次抢渡，又被清军所阻，退往茌平西南广平镇。8月16日，在向东北方向转移途中，与刘铭传、郭松林、潘鼎新、袁保恒、张曜、宋庆等部遭遇。经过激战，张宗禹的爱子张葵儿、兄张宗道、弟张宗先等数千捻军将士全部英勇牺牲。太平天国灭亡后，领导捻军坚持抗清斗争达四年之久，被称为“沉静好谋”的新捻军重要首领张宗禹，率领十八骑突围而出，来到徒骇河边，“穿秫凫水，不知所终”。

西捻军在徒骇河边的覆没，标志着捻军起义战争的最后失败。

第五节 捻军起义战争的经验教训

一、捻军起义战争的经验

捻军之所以能坚持长期的战争，客观上是由于 1864 年以前清廷把主要军事力量用于对付太平军，只用一部分力量对付捻军和其他起义武装，使捻军的生存和发展获得了比较有利的条件；主观上则是由于捻军本身具备不少优点和特点，并在斗争过程中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

（一）具有前仆后继的斗争精神

捻军的基本成员是身受封建主义剥削和外国资本主义压迫而陷入苦难深渊的贫苦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劳动人民。他们对统治阶级怀有刻骨的仇恨，因而具有前仆后继、奋不顾身的斗争精神。在十余年的斗争中，涌现出许多举家从军，“父兄死而子弟代”，英勇不屈，坚持斗争的动人事迹。正是这种不怕牺牲的斗争精神，支持着广大捻军将士不畏险恶的环境，不顾一次又一次的挫折和失败，以刀矛等原始武器与装备洋枪洋炮的清军进行坚决的斗争。特别是太平天国失败后，革命形势处于低潮的情况下，仍能“披霜踏雪，万苦不辞”，继续坚持斗争达四年之久。

（二）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

捻军纪律严明，每到一地，非但不扰民害民，而且将地主豪绅的财物分给贫苦群众，所以能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与支持，使自己得以“因地为粮”，“夜不扎营，散住村庄”。不仅如此，一些著名的战斗，如高楼寨、灞桥、罗家集之战，都是在人民群众支援配合下取得胜利的。清军则相反，“兵勇所到之处，肆行抢掠，民间被害甚深”，因而激起人民的反对。一些地方甚至构筑堡寨，抗拒清军，使清军难于筹集粮食，影响行军作战。曾国藩、李鸿章等竭力推行“筑圩”、“查圩”和坚壁清野政策，千方百计隔绝捻军和人民群众的联系，这从另一方面说明了捻军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是密切的。捻军之所以能坚持长期斗争，是与人民群众的支援分不开的。

（三）实行与太平军联合作战的方针

陈昌：《霆军纪略》，《捻军》（一），第 236 页。

曾国藩：《致沅弟》，《曾文正公家书》卷十，第 44 页。

《平捻方略》卷三百，第 31 页。

由于地域的接近和斗争的需要，自 1857 年开始，张乐行、龚得树、苏添福等所部捻军与陈玉成、李秀成所部太平军实行联合作战，实践证明，这一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对捻军来说，当雒河集等地被清军占领后，由于得到太平军的支援，得以在淮河沿岸重新立定脚跟，坚持斗争达四年之久。对太平军来说，捻军在淮河沿岸的活动，牵制了自淮北南下的清军，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北部屏障的作用，使太平军陈、李两部得以比较放手地分别对付由湖北东进的湘军和天京外围的清军。正是由于互相配合作战，使安徽战场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局面。在此期间，捻军还向太平军学习了构筑防御工事等方面的技术，提高了防御作战能力。清将胜保颇为惊奇地说：捻军“挖壕筑垒迥异从前，非有粤逆消息暗通，安能如此诡譎”。袁甲三也说：“数年以前之贼，不知沟垒可恃，专心以野战为强。自咸丰七年以后，皆知深沟高垒，以守为战，而攻剿愈觉费手。”太平军方面，陈玉成、李秀成部在安徽战场上，也注意运用捻军迂回运动战法，打了一些漂亮仗。太平天国失败后，捻军张宗禹、任化邦等部，与赖文光、邱远才所率的西北太平军余部决定合为一体，组成一支统一的新捻军，这一决策也是非常适时和正确的。如果不实行整编，各自独立作战，将很难坚持斗争达四年之久。

（四）实行大规模的运动战

捻军和太平军整编后，决定易步为骑，实行大规模的运动战，这是与敌情、地形和武器装备等条件相适应的。当时，清廷已把主要精力用来对付捻军，先是派遣僧格林沁的精锐骑兵，后又调集装备新式枪炮和数量上占优势的淮军和湘军，在豫、皖、苏、鲁、鄂等省的地方军配合下，实行合围兜剿。而捻军兵力少，武器装备低劣，又是孤军作战。如果实行阵地防御作战，显然是非常不利的。在这种情况下，捻军领导者决定把部队全部改为骑兵，充分发挥骑兵在平原旷野地区纵横驰骋的特长，实行运动战，以己之长，击敌之短，避敌之长，补己之短，使清军的枪炮优势难以发挥，同时也弥补了捻军武器装备方面的劣势。实行运动战的结果，使捻军在战略被动中取得了战役战斗上的主动权。捻军的这一作战形式，与同时期的农民起义武装的偏重于城市攻防作战相比较，都要高出一筹。尽管后来东、西捻军先后遭到失败，但是，如果不实行机动灵活的运动战，而是实行堂堂正正的阵地战，无疑将会失败得更快。

二、捻军起义战争的教训

《平捻方略》卷二十五，第 10 页。

袁甲三：《袁端敏公集》，《捻军》（五），第 203 页。

捻军起义战争为什么最终失败了呢？除了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外，就政治军事方面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政治眼光短浅，组织松散，形不成集中统一的领导和指挥

捻军的成员基本上是农民小生产者，既有反抗压迫剥削的一面，又有保守落后的一面。他们所在的家乡，经济文化十分落后。捻军首领中除张宗禹等个别人外，都没有文化知识，在斗争过程中又不注意学习和提高自己，也没有注意吸收懂得韬略和善于出谋划策的知识分子参加。因此，他们的政治眼光比较短浅，未能充分反映当时农民阶级的愿望和要求，明确提出推翻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建立农民政权的政治纲领和远大目标，并教育动员广大捻军将士和农民群众为此而奋斗，而是长期局限于解决眼前的局部的经济利益，这就必然影响到建军、作战和内部团结等一系列问题。正由于捻军首领们不能在斗争中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不能把军事斗争提高到推翻清朝反动统治、建立农民革命政权的高度，不能更广泛地团结群众，争取友军，不断壮大自己的队伍，因而不可能最终战胜强大的敌人，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捻军“装旗”出征，主要是为了获取钱粮物资，目的既达，便返回故乡，各自归家。这种“居则为民，出则为捻”的状况，不仅在初期普遍存在，后来淮北各支捻军向河南、山东、江苏出击过程中，仍然表现得相当突出。这就影响了革命军队的建设和作战能力的提高，并丧失了许多有利的作战歼敌时机。

捻军不仅受小生产者狭隘性和无组织、无纪律性的影响，而且还受到宗族和地域观念的束缚，这既是它不能与太平军达成真正的联合（“听封而不能听调用”）的主要原因，也是它本身组织松散的根源所在。各种不同旗色的捻军，长期以来“各统其众，各居其巢”，独立战守，互不统属，互不协同配合。有的则时合时分，分多于合。雒河集会盟，反映了一些捻军首领认识到联合作战的必要性，对于改变分散状态起了一定作用，如张乐行、龚得树、苏添福等几支不同旗色的队伍，长期共同行动，协同作战，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但是，作为盟主的张乐行却提不出实行集中统一领导的有效措施，甚至在处理内部矛盾时简单从事，以致始终未能把淮北的各支捻军统一起来，无论进攻还是防御，都不能在统一的部署下，协调一致地行动。捻军的数量虽多，却形不成有力的拳头打击清军，这是一个致命的弱点。雒河集的几次失守，许多捻军圩寨的被各个攻破，以致最后无法在淮北家乡立足，都与此有着直接的关系。就是在后期，虽然统一了组织和领导，但仍然存在

着时分时合、松散不团结的旧习。

从 1853 年至 1857 年初，捻军的力量发展很快，而当时清廷的主要兵力正忙于对付太平军，只用很少一部分兵力对付捻军，清军在豫、皖、苏、鲁边界地区，只能固守少数据点，形势对捻军非常有利。如果当时有几支比较有战斗力的捻军，实行集中统一的领导和指挥，对固守孤立据点的清军或长围久困，或一面围城一面打援，或把清军诱出城外，寻机加以歼灭，则将大大有利于尔后的作战。这一时机的丧失，无疑是非常可惜的。

（二）缺乏建立根据地的思想

捻军虽然经常活动于淮北的雒河集、蒙城、亳州、宿州、颍州，河南的永城、夏邑、虞城、鹿邑，山东的单县、鱼台、金乡、曹县，江苏的砀山、丰县、萧县等地，但始终没有使这些地区联成一片，建成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根据地。当时建立根据地的客观条件是具备的，但由于捻军的不少重要成员参加过贩运私盐和一开始就热衷于外出“打粮”等活动，因而容易产生流寇主义思想，认识不到建立根据地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以致白白地丧失了几个有利时机。一是从起义到 1857 年前，没有趁清军力量薄弱之机，在起义地区建立农民政权，着力于摧毁清军的少数据点，消灭地主团练武装。二是当胜保、袁甲三等率清军南下淮河流域进攻张乐行、龚得树等部捻军时，淮北的捻军在向河南、山东、江苏出击的过程中，打了几个漂亮的歼灭战，使当地的清军力量更形薄弱，人民的起义不断发生，但没有与当地的起义武装和人民群众相结合，建立起新的根据地。尤为失策的是，捻军首领们对淮北家乡团练武装的日益嚣张和捻军所占地区不断缩小的严重情况，竟熟视无睹，结果在僧军和团练的联合进攻下，遭受重大损失，被迫离乡他走。在后期，捻军实行运动战，虽然歼灭了被清廷“倚为长城”的僧格林沁军，以后又屡败湘、淮军，但由于没有根据地作依托，部队长期不停顿地流动作战，得不到必要的休整补充，虽然拖累拖垮了不少敌人，而自己也陷入了困难的境地，终于在优势敌人的围堵下，遭到失败。

（三）战略指导和作战指挥上的失误

捻军领导者在战略指导上的最大失误之一，就是在后期将部队分为东、西两支。当时，捻军在数量上居于劣势，又处于优势清军的围攻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分出一支部队前往远离中原战场的西北地区，使两支部队之间无法配合作战，既分散和削弱了自己的力量，又给清军造成了各个击破的机会。根据当时的战场形势，捻军应该集中兵力，而绝不应分散兵力，最多只能实行近距离的分兵，即以一部分兵力用于牵制据守点、线的清军，主要兵力用于寻找机会，逐一围歼尾追的清军。坚持实行这种战法，积以时日，尚

有可能改变战场上的被动不利局面。如不用此策，则应集中兵力，及早入陕进川，利用当地的山险，人民的支援和清军兵力薄弱等有利条件，开辟一个新的地区。这样，坚持斗争的时间可能会更长一些。赖文光曾率太平军到陕西活动，当清军围攻天京时，终因距离过远而无法救援。但他没有接受这一教训，仍然决定分兵入陕，而且还认为这样可以造成“犄角之势”，实在是缺乏战略眼光的表现。

捻军领导者始终把解决粮食问题看得重于一切，这也是不妥当的。淮北捻军只顾外出“打粮”，而不顾家乡的安危；后来的东、西捻军，也因就粮于富庶地区，而不顾敌情、地形等其他重要条件，结果误入绝地，被敌所困，加速了自己的败亡。这都是战略指导上的失误。

捻军领导者在作战指挥上的失策也是不少的。在初期，捻军曾多次包围归德城，由于武器装备低劣，没有强攻坚城，这是对的。但不懂得利用围城达到伏击援军的目的，往往一闻援兵到来，不管是多是少，便撤围他走。在与太平军联合作战时期，捻军攻占了几座城市，便由流动作战转为分兵守点，当清军进攻时，采取单纯防御的方针，结果被动挨打，所据城市逐一丢失。当曾国藩、李鸿章等实行“聚兵防河”，“扼地兜剿”时，捻军设法突出清军的包围圈是正确的，但在突围作战中，缺乏计划性，表现得惊慌失措，盲目地东闯西突，以致渡河作战一再受挫。如果指挥员镇定沉着，一方面对尾随的清军杀几个回马枪，使其不敢紧追不舍，一方面作好渡河作战的侦察和船筏等物资的准备，找到清军河防的薄弱环节，采取声东击西的办法迅速抢渡，或集中兵力强行渡河，还是有可能突破清军的运河、黄河等防线的。当时，捻军中流传着“不怕打而怕围”的说法，这既反映了捻军敢于同清军近战拼搏，又反映了捻军对清军的围堵存在着恐惧心理。正是这种恐惧心理，导致了渡河突围作战的无计划性。张宗禹虽然一度表现为骄傲轻敌，但当几次突围受挫时，马上转为丧失信心，盲目行动，最后造成西捻军的全军覆灭。

（四）忽视部队内部的纯洁工作

捻军中的叛变投敌事件不断发生，与其他农民起义武装相比，是颇为突出的一个问题。如六安、霍丘和凤阳府县两城，均因有叛徒内应而相继丢失；当僧格林沁军进攻雒河集时，竟有一批捻首率部投降，使捻军的力量大为削弱，淮北地区很快被清军占领；主要捻军首领张乐行、任化邦均死于叛徒之手。这种现象之所以发生，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捻军的成份比较复杂，为数不少的游民无产者不断涌进队伍中来，甚至一些中小地主也“纠众而捻”。这些人在清军剿抚兼施，特别是形势恶化的情况下，容易被反动势力收买，

李鸿章：《复曾相》，《捻军》（六），第65页。

动摇变节。二是捻军的主要首领张乐行本人就曾受过清朝官方“招安”，虽然后来坚持斗争到底，但由于本身的污点，必然影响其理直气壮地与投降倾向作斗争。三是一些主要捻军首领用人不当，不懂得纯洁和巩固部队内部的重要性。作为一个农民起义的领袖，不仅要有不畏艰难险阻，与反动统治阶级斗争到底的坚强革命精神，而且必须善于用人选将，擦亮眼睛，随时注意清除混入革命队伍中的“蛀虫”。当然，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是很难做到的。

此外，捻军对团练头子苗沛霖等人缺乏应有的警惕。在阶级矛盾激化，清王朝的统治发生危机的情况下，出现象团练头子苗沛霖这样的两面派人物，是不足为怪的。但是，苗所代表的始终是地主阶级的利益，他所梦寐以求的是建立一个封建割据的独立王国；他与清王朝之间不过是狗咬狗的矛盾，但与人民之间却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而且一开始就是进攻捻军起家的。农民起义军对待这种人物，当他开始联合清军进攻捻军的时候，就应该坚决予以打击，特别是当其羽毛未丰的时候，应决心将其消灭，或分化其内部。只有这样，才能发动群众，扩大占领区，消除心腹之患。当苗的实力已经强大，难于一下子把他消灭，并在表面上愿意联合反清时，捻军和太平军可以与他采取某些联合行动，共同对付进攻的清军。但必须时刻防止他反戈相击，背后插刀，避免处于腹背受敌措手不及的困境。由于张乐行、陈玉成等政治警惕性不高，缺乏对付两面派的斗争策略，结果上当吃亏。这也是不容忽视的历史教训之一。

第六章 天地会起义战争

天地会系清代民间秘密结社之一，大约始创于乾隆年间。最初活动于广东、福建沿海地区，后来逐步扩大到长江流域各省及广西一带。因“拜天为父，拜地为母”，故名天地会，又称“三点会”、“三合会”等。天地会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因明太祖年号洪武，故对内称“洪门”。其支派有小刀会、红钱会、哥老会等名称。各派独立活动，互不统属。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天地会在两湖、两广一带多次发动武装起义。太平天国金田起义后，各地天地会纷纷响应，发动反清武装斗争，如 1853 年黄德美等领导的福建小刀会起义、林俊领导的福建红钱会起义、何贱苟领导的湖南天地会起义、刘丽川领导的上海小刀会起义，1854 年陈开和李文茂等领导的广东天地会起义（大成国起义）、朱洪英和胡有禄领导的广西天地会起义（升平天国起义）等。本章仅就其中军事上较有特色的上海小刀会起义战争和大成国起义战争分别予以叙述。

第一节 上海小刀会起义战争 (1853年9月—1855年2月)

一、起义的爆发与发展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上海成为“五口通商”的口岸之一。从此，上海及其附近各县人民，深受封建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双重压榨，日益陷于贫困破产的境地。早在明末清初，这一地区的棉纺手工业就相当发达，生产的土布畅销各地，成为劳动人民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但是，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和英、美等国棉纱、棉布的源源输入，土纱、土布的销售日益受到排斥。上海开市三年以后，松江、太仓的土布市场消减大半，某些以纺织为业的农村，甚至陷入无纱可纺的境地。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中国的纺织业在外国的这种竞争之下受到很大的危害，结果就使社会生活受到了相当的破坏。”上海是中国沿海“商贾云集，帆樯如织”的重要商业城市，水上交通历来比较发达，但自对外通商以后，外国轮船穿梭往返，逐渐排挤了长江和沿海一带木帆船的航运，使大批船夫失业。

与此同时，清政府为了填补鸦片战争的巨大消耗和大量赔款，满足封建官僚的挥霍浪费，不断加重对劳动人民的剥削。作为清政府主要财政收入的漕赋、地丁税普遍加重。鸦片战争期间，上海一带地区的漕赋已经很重，而战后又增加了二三倍。地主对农民的地租剥削也不断加重。一亩田最多能收米三石，少的不足二石，但地租额竟高达一石五斗。农民每年的收获所剩无几，终岁过着啼饥号寒的悲惨生活。

面对封建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的残酷压榨，上海及其附近各县的劳动人民不断进行反抗。1848年，失业的漕船水手一万三千人在青浦集会示威，反对外国殖民者的侵略。1849年，嘉定农民冲进县城，开展反对大户和米商囤积居奇的斗争。在上海，则掀起了反抗外国侵略者为开马路、造洋房、建跑马厅而强迫人民迁移的斗争。1852年，青浦农民在当地小刀会首领周立春领导下进行抗粮斗争，烧毁官府的催粮船，并冲进县衙，活捉知县余龙光。苏州知府钟殿选率清军千余前往镇压，被数千农民用锄头、木棒击退。与此同时，嘉定、太仓、松江、南汇等县人民也不断掀起殴官、拒差、焚毁仓衙等斗争。这种日益高涨的反抗斗争，成了上海小刀会起义的先声。

上海小刀会由广东、福建、浙江和上海等七帮联合组成，会员以小刀为标志，对外用“义兴公司”为代号，首领有刘丽川、李咸池、陈阿林、林阿福、潘起亮等。刘丽川原籍广东香山（今中山县），初在家务农，后赴香港谋生，于1845年加入天地会，1849年到上海为一家外商洋行当通事（翻译），不久辞去这一职务，抄录医书，为人治病。由于刘丽川仗义疏财，名望渐高，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页。

加之上海小刀会中以粤帮人数最多，势力最大，他遂成了该会的总领袖。小刀会的成员有贫苦农民、手工业工人、船夫、搬运工人和城市贫民、游民等。当上海及附近各县农民和失业水手等展开反抗斗争时，小刀会的组织有很大的发展。1853年3月，太平军攻占南京，上海及其附近各县的官僚、豪绅惊恐万状，刘丽川等便趁机积极准备武装起义。他们一方面组织小刀会众加紧练习枪棒，一方面乘苏松太道吴健彰等通过福建、广东、宁波、上海等七会馆联名捐资和招募团练之机，派会员打入敌人内部，在反动武装中发展革命力量。随着青浦、嘉定一带农民反抗斗争的日益发展，上海小刀会起义的条件也就日趋成熟。

1853年8月17日，嘉定县南翔农民在该地小刀会首领徐耀领导下，发动武装起义，一度占领县城，捣毁县署，驱逐知县，放出被监禁的群众。之后，徐耀与青浦县的周立春联合，并取得上海小刀会的协助。9月5日，在周立春的领导下，发动第二次起义，再次占领嘉定县城。起义军纪律严明，获得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整个形势对上海小刀会的起义十分有利。同时，刘丽川等又得知吴健彰企图把四十万两白银运走，作为进攻太平军的军饷。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小刀会便毅然改变原定于冬季起义的计划，决定于9月7日乘上海城内举行祭孔大典的机会，提前发动武装起义。当日清晨，头包红巾，腰缠红带，手持武器、旗帜的上海小刀会起义军在守城卫兵的内应下，以突然行动从北门冲入城内，与城内会员会合，经过短时间战斗，即攻入县衙，杀死了知县袁祖德。接着，又占领炮台，包围了苏、松、太兵备道衙门。吴健彰“象一只哀怜的小狗一样乞求饶命，拿出了他的官印”，成了起义军的俘虏。但是，美领事金能亨却出面请求刘丽川“加意优容，准吴健彰还里”，并由外国人帮助吴乔装逃出上海县城。吴健彰奔赴镇江后，便请兵围攻上海，成了镇压起义军的刽子手。

起义军占领上海后，即以文庙为总指挥部，依据天地会“反清复明”的宗旨，建立了“大明国”。公推刘丽川为“大明国统理政教招讨大元帅”，李咸池为平胡大都督，陈阿林为左元帅，林阿福为右元帅，潘起亮为飞虎将军。其他首领也封以将军、先锋等名号。刘丽川等发布告示，揭露清朝官吏的种种罪恶，表明起义的目的是推翻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同时，严申军纪：“不听号令者斩，奸淫妇女者斩，掳掠财物者斩，偷盗猪狗者斩。”起义军的主张和行动，得到群众的拥护，不少人自带刀矛参加革命队伍。

刘丽川、周立春为巩固革命政权，扩大革命势力，立即由上海、嘉定分兵出击，于9月9日占宝山，10日破南汇，13日克川沙，17日占青浦。从9

[法]高龙倍勒：《江南传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二版《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以下简称《史料汇编》）第880页。

《刘丽川致各国领事函》，《史料汇编》第18页。

《平胡大都督李示》，《史料汇编》第5页。

月5日起，在十二天内，起义军即攻占了六座县城，声威大振。起义军原拟乘胜占领太仓，向苏州方向发展，后因苏州的天地会起义组织遭清军镇压，而进攻太仓又为清军所阻，故折回嘉定，转取守势。为了取得太平天国的领导与支援，刘丽川等遣专使携带给天王洪秀全的公文，分由水陆两路前往金陵，要求天京当局速派大员前往上海主持军政大事。同时，宣布上海小刀会起义军是“太平王的部属，在太平王的指挥下一致行动”，革命政权“奉行太平王的法令”，并于9月下旬改用太平天国年号，竖立太平天国旗帜，刘丽川也改称“太平天国统理政教招讨大元帅”。

这时的小刀会起义军，包括嘉定、青浦两县起义军在内，总数万人左右。这些初起的义军由于没有战斗经验，武器又多为小刀长矛，仅有少数鸟枪，因而战斗力较弱；但是，他们凭着勇敢的革命精神，却能屡败清军。

二、上海城市保卫战

（一）起义军退保上海

起义军占领上海等县城后，不仅影响江浙漕粮的海运和清军江南大营军饷的供应，而且使江南大营清军有腹背受敌的危险，因此，引起清廷及江苏督抚的震惊。他们急忙从各地抽调兵员，捐资募勇，企图一举消灭小刀会起义军。在周立春等率众第二次占领嘉定后，钦差大臣向荣即从江南大营清军中派出刑部主事刘存厚、云南参将秦如虎统兵一千六百名，前往苏州，归两江总督怡良调遣。上海小刀会起义后，怡良随即调兵六百五十名，由署理江苏按察使吉尔杭阿统带，署江南提督和春也由镇江分兵六百，交游击长桂率领，另由吴县知县丁国恩带勇一千三百余名，前往围堵。不久，向荣又抽调官兵一千人，由新任总兵虎嵩林管带前往增援，并由江南大营帮办、署江苏巡抚许乃钊节制围攻起义军的各部清军（共计五千余人）。

清军的作战方针是首先夺取上海附近各县，最后集中力量进攻上海县城。1853年9月20日，丁国恩部兵勇由太仓向嘉定进逼，潜伏在嘉定城内的地主豪绅乘机纠集反动武装充当内应，配合进攻。起义军与敌人进行了激烈巷战，于22日撤离县城。之后，一部分在嘉定以西农村坚持斗争，一部分在徐耀、周秀英（周立春之女）率领下，经南翔退入上海。周立春在掩护部队撤退时，力竭被俘，于苏州英勇就义。22日至27日，青浦、宝山、南汇、川沙的起义军也在清军和地主武装的进攻下撤离县城，退守上海。从此，开始了上海县城的保卫战。

《北华捷报》第164、163期，《史料汇编》第62、57页。

以上参见向荣《上海、宝山等县失守由许乃钊带兵往剿折》，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七）第219—220页。

许乃钊在清军攻占上海附近各县之后，便于 10 月纠集各路清军及上海附近各县的地主武装进逼上海，北面推进到苏州河，在新闻一带建立北营，南面推进到黄浦江下游的卢家湾、小马桥一带，建立南营，以钳形态势夹击上海城。另有红单船多艘，扼守吴淞口，并在黄浦江游弋。

这时，起义军虽然已由万余人减至数千人（有说三千人），且困守孤城，但上海城高墙厚，并储有一定数量的粮弹，因而士气高昂，决心固守待援（等待太平军的到来），与清军斗争到底。为了粉碎敌人的围攻，他们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政治上，反复宣传推翻腐朽的满清政府和铲除贪官污吏的革命主张，拘捕扰乱社会秩序的不法分子和混进城内的奸细，以鼓舞和安定士气民心。经济上，宣布豁免地方捐税，动员各铺户照常贸易，并派人秘密从常熟一带购运米粮进城，实行配给制度，保障军需民食。军事上，大力动员群众参加战斗，并设女将军和“孩兵局”；在高大建筑物上开凿枪眼，各要地增设炮台，于城外深挖陷坑，设置铁蒺藜，并控制城东黄浦江及城郊的水陆要道；用土办法自制火药、子弹，并通过购买和动员散勇上缴等办法多方补充枪支弹药。外交上，严正宣告起义军“与太平军已属一体，今日之中华实已与外邦并驾齐驱”，并斥责美国侵略者暗助清军，要求各国恪守中立。

上海小刀会起义军战士

（二）挫败清军的水陆夹击

1853 年 10 月初开始，围城清军连日从陆上水上向上海城内发炮轰击，并不断发起进攻，均被起义军击退。10 月中旬，围城的清军增至八千余人，加上乡勇，共约二万人，并调集了水师战船数十艘。

11 月 9 日，吴健彰以战船一队，混在外国军舰中间，发炮轰击东门外董家渡炮台。起义军不动声色，待敌船驶离外国军舰后，突然发炮还击，击沉清军战船一艘，重创两艘。这时，另一队清军战船开到，集中火力炮击起义军的五艘战船，将其全部击毁。随后，敌战船上的清兵登陆，企图占领东门外的炮台。起义军英勇抵抗，将其击退。

在城东作战的同时，清军约三千人向上海县城的北门发起攻击。起义军沉着应战，待敌人缘梯登城时，突然开火，使清军伤亡惨重。清军攻城失败后，纵火焚烧东门外的民房，并大肆抢劫。一天之内，烧毁房屋不下一千五百余幢，从江边到城墙，人烟稠密的商业区，仅剩下一些破壁颓垣。

此后，清军又不停顿地向县城进攻，并在城北宁波会馆墓地上筑起一座高与城齐的炮台，整天向城内开炮；吴健彰的战船也继续轰击城东起义军的炮台，企图切断城内至江边的通道。由于久攻不下，清军决定改取太平军常

《刘丽川致各国领事函》，《史料汇编》第 17 页。

用的“穴地攻城法”，在城西秘密地挖了一条通向城脚的地道。1854年2月6日晨，引爆火药，轰塌西面城墙，二千余名清军从缺口冲入。起义军立即点燃火药袋和火罐，并用喷筒喷射火焰，封锁缺口。清军一片混乱，纷纷后退。飞虎将军潘起亮率二百人乘势冲出城外，追杀清军，缴获大炮十二门和许多抬枪，胜利返回城内。清军遭此挫败后，从3月到4月，基本上没有大的进攻行动。起义军则多次主动出击，摧毁清军的营垒、炮台，杀伤不少敌人，迫使其全部退出南郊，初步改善了防御态势。

5月25日凌晨，清军又将小南门城墙炸开一个缺口，二百名清军尾随几名外国兵冲入城内。起义军奋起反击，毙敌四十人，将敌军逐出城外。配合清军进攻的外国战船，也被起义军击伤一艘，击沉两艘。以后，清军又多次挖地道攻城，均被起义军击退。

（三）抗击中外反动派的联合进攻

小刀会起义武装占领上海县城后，标榜“中立”的英、美、法侵略者，想利用这个机会，要挟清政府对它们在上海的侵略特权作出更大的让步，然后帮助清政府镇压起义军。当时的外国租界位于县城以北的洋泾浜地区，英、美、法领事以避免清军和起义军的炮火毁坏租界建筑物为由，曾禁止清军从北面进攻起义军，并对清军采取威胁态度。1854年4月4日，英、美军队以清军侮辱、袭击租界外侨为借口，向驻于泥城浜（今西藏中路）的清军发起进攻，清军不战而退。事件发生后，许乃钊立即派员向英、美领事求和，第二天又派吴健彰出面“陪罪”，作出了“租界不可侵犯”的保证。不久，许乃钊、吴健彰又接受英国领事阿利国的建议，由英、美、法三国领事各指派税务司一人，组成所谓“关税管理委员会”，控制海关。6月29日，与三国领事签订“上海海关征税规则”九条，从而开创了出卖中国海关主权的先例。外国侵略者通过“泥城之战”，在租界地位、海关控制权等问题上获得了满意的结果，随即撕下“中立”的假面具，公开与清军勾结起来，镇压上海的起义军。6月中旬，英、美、法三国领事就达成协议，决定以武力强迫起义军退出上海城，将县城交给清军。

同年7月，清廷以“许乃钊督师上海，日久无功”，将其革职，吴健彰也被拿问，由吉尔杭阿升任江苏巡抚，节制围攻上海县城的清军。清廷令吉尔杭阿立即“督率各路兵勇，迅速筹攻，务将沪城克期收复”。吉尔杭阿接任后，不断驱使清军挖地道、埋火药，爆炸上海城墙。有的坑道被起义军灌水破坏，有的虽爆炸成功，但始终未能攻入城内。7月24日，清军在城南的一次爆炸中，竟自毙官兵五十名。起义军趁势反击，“孩兵局”的少年战士在战斗中表现出了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吉尔杭阿见上海久攻不下，便步

许乃钊、吴健彰的后尘，求助于外国侵略者。他通过买办分子杨坊及其亲信吴煦奔走活动，征得外国侵略者的同意，于10月至11月底，筑成一条东起黄浦江边、中经陈家木桥直至洋泾浜北岸护界河的围墙，断绝县城与租界的交通，使起义军无法假道租界得到粮食与军火的供应。

在日益严酷的形势下，起义军中的少数不坚定分子（如李咸池、林阿福等）或者出走，或者降敌。但刘丽川等仍然不畏艰险，率部坚持斗争。12月上旬，起义军连续出击，摧毁了北门外的清军营垒，并于城外构筑炮垒，轰击围墙，以图打破敌人的封锁。

1854年12月6日，法国舰队司令辣厄尔蓄意寻衅，借口起义军的炮火将危及外国人的安全，竟要起义军拆除洋泾浜南岸的炮台。这一无理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了起义军的严词拒绝。12月9日，法国战舰“高尔拜”号悍然开炮轰击县城和小东门炮台达两小时之久。14日，法国侵略者正式向起义军宣战。1855年1月6日晨，法国侵略军四百人伙同清军一部向上海北门发动进攻。法舰“高尔拜”和“贞德”号以及领事馆附近的大炮同时猛轰，将城墙打开一个缺口。接着，二百五十名法军首先突入城内。英勇顽强的起义军在潘起亮率领下，立即发起反击，使敌人前进受阻。法军慌忙打开北门，数千清军蜂拥而入，同样被起义军击退。有的清军来不及从城门逃走，直接由城墙往下跳，死伤甚众。此次作战，上海小刀会起义军共毙伤法军数十名、清军二千余名，取得了反击中外反动派联合进攻的辉煌胜利。从此，法军不敢力攻，惟配合清军加紧围城。

（四）弃城突围与最后失败

起义军英勇奋战，虽然粉碎了敌军多次进攻，但由于长期困守孤城，兵员、弹药的补充越来越感到困难，粮食问题更是难以解决。从1855年初起，城中粮食几尽，军民饥饿而死者与日俱增。2月16日，清军轰塌小南门城墙，冲入城内，法军也发炮助战。起义军忍着饥饿奋勇拚杀，再次迫使清军退出。尽管如此，起义军终因内无粮弹、外无援兵，势难继续坚守，便于2月17日（咸丰五年正月初一日）夜分路突围，约定到镇江与太平军会师。

起义军出城后，有的被清军截杀，有的散入租界。刘丽川率部由城西南冲出后，次日黎明到达上海西郊虹桥附近，与清军遭遇，在战斗中英勇牺牲。只有潘起亮和少数起义军突出重围，到达镇江，参加了太平军（1861年底太平军攻克宁波后，潘起亮以功封“衡天安”任海关主官，后随太平军余部转战赣、闽，1866年在广东牺牲）；另一部分突围后，于1855年冬参加了江西天地会起义军。还有部分起义军散入南翔、浦东农村，在以后太平军进攻上海时，积极配合作战。

三、起义的意义与教训

上海小刀会起义，是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鼓舞下掀起的一次反抗清朝封建统治和外国侵略者的武装斗争，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我国近代史上一次比较有名的城市武装起义。它发生在我国沿海的重要商业城市和资本主义列强主要侵华据点之一的上海，不仅使清王朝的财政收入受到严重影响，而且予外国侵略者以沉重打击。起义军占领上海期间，外国资本家的“商业陷于停顿”，鸦片贸易“连续的不景气”，整个贸易额不断下降，以致引起侵略者的极度不安。

起义军占领上海县城后，坚持奋战了十七个月，迫使江苏清军既要对付天京的太平军，又要对付上海的小刀会起义军，处于两线作战的不利态势。清廷由于兵力不足，不得不从江南大营先后抽调部队数千人，参加围攻上海的战斗。所以，小刀会起义军坚守上海城，直接配合了太平军的作战。他们不仅英勇地抗击了清军的围攻，而且毫无畏惧地抗击了外国侵略军的进攻，又一次显示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外国侵略者的革命精神。

起义军最后终于失败了，从军事上看，主要是长期困守孤城的结果。上海县城虽然城墙比较高厚，但城内居民不多（起义前约有二十余万人，起义后因不断外流，最后只剩下三四万人），且东濒黄浦江，北有外国租界和苏州河，西、南多河浜，地势低洼，无高山屏障，地理条件也很不利。嘉定、青浦、川沙、南汇、宝山等县的起义武装均被清军镇压，城市的斗争无法得到附近农村的支援，势必陷于孤立。城外有数倍于己的清军包围，外国侵略军也近在咫尺。在这种极为不利的形势和条件下，起义军长期坚守上海孤城，显然是战略上的失策。

刘丽川等所以坚守上海城，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寄希望于太平军的援助，认为“纵本城面临困难，我南京太平天王决不忍坐视不救”。但事实上，太平军占领金陵之后，由于同时分兵北伐、西征，还要对付江南、江北大营清军对天京的威胁，根本无力东顾，不可能给小刀会起义军以及时有力的支援。刘丽川等在待援无望，而自己的实力尚较雄厚的时候，本应毅然作出决定，弃城突围，迅速转移到围城清军的侧后，以及清军兵力薄弱的苏南农村，逐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发展壮大自己的队伍，开辟一个新的游击根据地，或主动向南京方面靠拢，与太平军密切配合作战。这样做，无疑地要比困守孤城主动得多，有利得多。这次起义的教训证明，城市的起义，如果没有附近农村的起义武装密切配合，是难于取得胜利的；同时也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武装起义爆发后应采取坚决进攻方针的极端重要性。

《北华捷报》第 197 期，《史料汇编》第 424 页。

《上海怡和洋行致香港总行的信》（1855 年 1 月 1 日），《史料汇编》第 505 页。

《刘丽川致各国领事函》，《史料汇编》第 17 页。

第二节 大成国起义战争 (1854年6月—1864年5月)

一、广东天地会发动武装起义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对外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对内加紧压榨，鱼肉人民，社会危机更趋严重。广东在鸦片战争中首当其冲，受害最深，战后分担的战争赔款又最重，因而对人民的剥削压迫更为残酷。随着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越来越多的贫苦农民和失业的手工业者、小商贩、船民、无业游民等加入天地会组织，走上反清斗争的道路。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尤其是1853年定都金陵的伟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广东天地会会众，终于在1854年夏爆发了较大规模的广东天地会武装起义。

1854年6月10日（一说6月8日），东莞天地会首领何六等率众在东莞县石龙镇起义，17日占领县城，揭开了广东省城附近天地会起义的序幕。起义队伍很快发展到三万余人，拥有船六百余只。7月5日，佛山天地会首领陈开在佛山石湾附近的大雾冈发动起义，随即占领南海县属的佛山镇（今佛山市）。接着，李文茂、甘先、周春等在广州北郊的佛岭市、陈显良等在城东燕塘、林洸隆等在省河（珠江）南岸纷纷聚众起义，关巨和何博奋等也率领珠江船户起而响应，迅速形成了对广州的包围。起义者头裹红巾，或腰缠红带，自称“洪兵”，又称“红兵”。

武装起义的烽火迅速燃遍广东全省，数月之内，攻克了四十余座府、州、县城，并先后形成了几个中心地区。在广州附近地区，除陈开、李文茂等外，还有陈金刚、练四虎、侯陈带、林大年、陈吉、梁楫、刘观秀、陈松年、吕萃晋、冯坤等分别领导了花县、三水、清远、顺德、龙门、新会、鹤山等县的天地会起义。在西部的肇庆地区，陈荣、伍百吉等率众起义，于8月5日在水勇内应下，一举攻占肇庆府城（今肇庆市）。在北部的韶州地区，首先由英德县的陈义和、乐昌县的葛耀明发动起义，后与其他起义军一起，三次围攻韶州府城（今韶关市）。在东部的潮州、惠州地区，由陈娘康、郑游春、吴忠恕、翟火姑等领导的起义军，积极活动于惠来、潮阳、澄海、普宁、揭阳和归善（今惠阳）、博罗等地。此外，嘉应州、高州、廉州府属各县也都有规模不等的起义。各地的起义军，大股有数万人，小股有数千或数百人，但由于没有统一领导和缺乏作战经验，为时不久，多数被清军和地主豪绅组织的团练各个击败。有的如周春、翟火姑、葛耀明等部分别于1855年和1856年转移至湖南、江西，参加了太平军，成为太平军中的“花旗”。有的如陈金刚部流动于湘、粤、桂边境地区。而陈开、李文茂等领导的起义军，先则围攻广州，后转移至广西，建立起“大成国”政权，在广西天地会起义武装配合下，坚持了较长时间的反清战争，成为当时遍布全国的各族人民起义队伍中一支重要的反清武装力量。

二、围攻广州之战

（一）双方作战部署

1854年7月，陈开、李文茂等率众起义后，立即相互配合，开始了围攻广州的作战。其部署情况是：陈开部以佛山镇为据点，由南向北进攻；李文茂部以佛岭市为主要据点，以萧冈、龙潭观等为辅翼，直逼北门；陈显良部以燕塘为主要据点，以三宝墟为后应，进攻东门；林洗隆部驻省河南岸，牵制清军；关巨、何博奋的水军截击清军内河水师，断绝其水上交通。各路起义军的总兵力号称二三十万，实际约有十余万人，没有统一和正规的编制。部队除装备部分鸟枪、火炮外，大部分为刀矛等冷兵器。

两广总督叶名琛、广东巡抚柏贵等因城内兵力空虚，立即关闭城门，并采取如下应急措施：将派至与湖南、江西、广西交界地区的绿营兵四千余名调回省城，与八旗兵一千三百余名共同防守炮台和水陆要隘；令各地豪绅地主从速组建团练，并以“优给口粮”、“加倍给予工价”等办法从省城、香山、新安、东莞、新会、潮州等地先后雇募乡勇二万七千余名，增添内河战船数百只，选雇水勇、炮勇一万六千余人，配合八旗、绿营作战（同年秋，守城的兵勇、团练增至五万多人）；奏请清政府速从福建、湖南等省调兵来粤会剿；组成以大买办伍崇曜为头子的“筹饷局”，后又无耻地乞求港英当局出兵救援。随着兵力的增加，叶名琛、柏贵与广州将军穆特恩、右翼副都统托恩东额会商，作了具体的防御部署：参将卫佐邦率所部绿营分驻东路和防守保厘炮台；千总黄大荣、熊应荣率绿营及部分团练驻守小北门外各要隘；游击曾廷相、参将济山率绿营及部分团练驻守城北各要地；游击陈定邦率部分绿营、炮勇分守耆定、拱极、保极等炮台；协

领来存、王镇雄及佐领格绷额等率八旗守卫北门外永康炮台；游击陈国辉、水师把总王显等率绿营反团练一部驻守城西的西山寺、泥城等处；协领托云全、太承恩、国荫等率八旗及部分团练分守老城；副将怀塔布率广州协绿营防守新城。叶名琛等每日登越秀山五层楼（镇海楼）亲自指挥。上述部署，以城北为重点，其次为城东和城西，同时加强炮台的守卫。

（二）迫使清军转入防御

7月18日叶名琛等为了先发制人，派出副将崔大同、游击洪大顺率绿营兵三千余人，欲进攻北路起义军的据点江村。李文茂等闻讯，决定依托佛岭市周围的有利地形，伏击敌人。清军进至佛岭市前时，忽遇滂沱大雨，火药、火绳尽被淋湿，只得在山坡扎营。埋伏在周围的起义军突然冲上山坡，与清

军展开白刃格斗，杀死崔大同、洪大顺等。清军大量被歼，余皆溃散。起义军缴获大批军械物资，取得了初战的胜利。

7月20日，起义军分三路进攻广州东、西、北各门，被清军击退。7月26日，叶名琛等派出兵勇约五千人再次对北路起义军的据点牛栏冈发起进攻。李文茂一面组织起义军进行正面阻击，一面派千余人绕至清军背后，袭击敌人。经过激战，起义军再次将清军击退，一直追到离广州城仅十里的三元里，又一次取得了胜利。

此后，起义军乘胜转入进攻，兵锋直逼广州城下。叶名琛等不得不采取“只守为战，严密设防”的方针，依托城垣和炮台进行防御作战。

（三）攻城作战一再受挫

从8月初至9月初，北路、东路和西路起义军，连续发起攻城作战（有时一路单独进攻，有时两路或三路同时进攻），企图先夺占炮台，进而攻入城内。由于清军拚死抵御，起义军进攻一再受挫。例如，8月3日，北路起义军数千人冒着狂风暴雨，从三元里绕至飞鹅岭，进攻永康、耆定炮台。守台清军发炮拦阻起义军的进攻道路，接着，千总熊应荣率部从正面迎战，游击陈国辉、千总黄大荣率部从三元里进行侧击，迫使起义军后撤。8月17日，东路起义军猛扑距东门五里的保厘炮台。清军同样以部分兵力从正面迎战，以部分兵力从“旁径绕出，夺据要隘”，前后夹击，将起义军击退。8月29日，起义军十余万人从东、北两个方向同时发起进攻，亦未获胜。9月2日，北路起义军又兵分两路出击：一路由三家店至飞鹅岭进攻白云庵，一路向三元里方向进攻。结果，进攻白云庵的起义军遭到两路清军的截击，前进受阻；向三元里方向进攻的起义军进至流化桥时，遭到永康、耆定、保极、拱极和越秀山各炮台清军的炮击，也只好再次后撤。

起义军在连续攻城作战中既不能正确估量主客观条件，又不讲求战术，一味盲目硬攻，忽视侧翼保障，结果，不但没有攻占一座炮台、一个据点，反使自己遭到不小的伤亡，进攻能力日益减弱，给尔后作战带来了很不利的影响。

（四）起义军被各个击破

广州清军虽然击败了起义军的多次进攻，但叶名琛仍感兵力不足，顾此失彼，“攻剿则兵分而见寡，堵守则路歧而难防，策应维艰，战守非易”，决定采取集中兵力“专注一处，先行扫荡”，然后并力进攻他路的作战方针。

清军的第一个进攻目标是东路起义军。其部署如下：参将卫佐邦率所部绿营及部分团练为中路，出东门直攻燕塘；千总马超亮率城东团练乘船至东

涌登岸，先占簔箕村，然后从右侧进攻燕塘；把总黄镛和县丞郑锡琦分率东莞、潮州兵勇从左侧进攻燕塘；外委赖永清率安邑团练为后应。各路清军于9月7日晨突然向燕塘发起攻击。起义军仓促应战，力不能支，只好突围外撤。一部分由陈显良率领从瘦狗岭撤至新造，另一部分撤至佛岭市。清军攻占燕塘后，将所有草房百余间全部烧毁，实行残酷的烧杀政策。

东路起义军战败后，李文茂北路起义军失去了左翼屏障，便由进攻转入防御，并采取如下防御措施：加强各据点间的联系，主动配合作战；在主要据点周围挖壕筑垒，配置火炮、抬枪，在山坡、田埂、交通要道插上竹签，撒布蒺藜；在有树林的山坡上暗设火炮，布置伏击阵地。

叶名琛在取得东路作战胜利后，即集中东、北两个方向的部队，进攻北路。鉴于北路起义军数量多，据点密布，他决定采取“先分其势，复截其援”，“逐一剿洗”的方针，即首先围攻靠近省城的几个较小的据点，然后进攻主要据点。9月22日至10月1日，清军先后攻占了棠夏、沙涌、三家店、瑶台等起义军据点。10月11日，清军向义勇祠进攻时，突遭分散在附近各乡的起义军截击，被迫后撤。为此，决定首先分路“清剿”东北、西北各乡小股起义军。至10月21日，十三乡的起义军均被击溃。这时，北路起义军尚有佛岭市、萧冈、龙潭观、牛栏冈等重要据点，彼此呼应，互为犄角。迨至11月3日，上述据点也逐一被清军攻占，起义军伤亡重大，余部退向石井、石门等处。

清军攻占北路起义军主要据点后，即采取水陆夹击战术，进攻西路起义军。至1855年1月中旬，石井、石门以及附近各乡的起义军均被击败。起义军首领何六、周春、甘先等率部北上，参加围攻韶州的战斗，后又退入湖南；李文茂则率部转移至南海县的九江。

正当清军疯狂进攻北路起义军之际，英国侵略者接受叶名琛的请求，于12月13日公开派遣舰队，闯入珠江，充当清军镇压起义军的后援。叶名琛有恃无恐，便立即进攻省河以南的起义军。但由于省河港汊纷歧，东连狮子洋，西连佛山镇，起义军水军出没无常，曾于大黄滘、新造等处大败清军水师，使清军的“堵剿倍形吃紧”。这时，候补道沈棣辉提出了先破佛山的建议，他认为佛山是起义军的重要据点，是辎重和精锐的集结地，佛山一破，其余便可一战而定。叶名琛接受了这一建议，命沈棣辉统一指挥陆路兵勇近万人，战船百余只、水勇三千人，连同原驻佛山附近的兵勇四千七百余名，向佛山进攻。

当李文茂、陈显良等起义军勇猛攻打省城之际，佛山陈开起义军竟被南

叶名琛等奏：《省城北路获胜焚毁贼巢乡处等由》（咸丰四年九月初四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

叶名琛等奏：《沙湾等处匪船叠剿获胜由》（咸丰四年十一月初四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

海县的大沥、梯云、扶南、太平四堡九十六乡的团练阻止了北进的道路，以致数万起义军偏处佛山，无所作为。沈棣辉在进攻佛山前，察看了各处地形，决定先破与大沥团练对峙的桥头、谢遥村等据点。1854年12月25日至1855年1月14日，清军将佛山外围的据点全部攻占。沈棣辉鉴于佛山道路盘旋，街巷纷歧，事先绘制地图，分发各营，使部队熟悉进攻的街道，明确各自的攻击目标。1月27日，清军分十三路同时进攻佛山镇，起义军首尾不能相顾，纷纷突围。陈开率部向南海县的九江退却，后与李文茂部会攻三水县城不克，遂一齐西进肇庆，与伍百吉部及由广西东下至肇庆的梁培友部会师，进行休整。2月下旬，南路起义军的主要据点也全部失守。至此，长达半年多的围攻广州之战，以起义军失败而告终。

广州解围后，叶名琛下令“凡普通匪者，吏民格杀勿论”，对广东人民进行血腥镇压。全省受害者约在百万以上，仅广州一地就有十万余人惨遭屠杀。英国军舰也参与围捕退到海上的起义军，几乎把所有北里湾和石浦港的起义军船只击沉，并伙同清军成批地捕杀起义军战士。

广州城墙高厚，四周炮台环列，构成坚固的防御体系。刚刚兴起的天地会起义军，虽然人数众多，但组织松散，武器装备差，战斗力不强，而且没有城内居民的响应，在这种情况下，强攻坚城，显然是不明智的。广州城虽然处于起义军四面包围之中，实际上是围而未死。叶名琛等仍能通过水路，在英、美、法殖民主义者的帮助下，将军需民用物资运进城内，支持其持久作战，并最终挫败了起义军的进攻。半年多的围攻广州之战，起义军不仅消耗了很大力量，而且丧失了向敌人统治薄弱地区发展革命势力的有利时机。

三、转移广西，开辟以浔州为中心的根据地

（一）占领浔州城，建立大成国

陈开、李文茂率部到达肇庆不久，就面临清军从西江上下游夹击的不利形势。1855年4月13日，广西按察使张敬修部攻占了德庆城。5月中旬，广东盐运使沈棣辉部攻占了九江、三洲等据点，并于羚羊峡外击败起义军的水军。21日，乘大雾迷漫之际，抢占起义军的羚羊峡炮台，战船冲过峡口，直驶肇庆。

面对上述形势，陈开、李文茂等接受对广西情况非常熟悉的梁培友的建议，决定放弃肇庆，向广西转移。在广东各地起义军已遭清军和团练的血腥镇压，武装起义已转入低潮，而广西的天地会起义又仍很活跃的情况下，此种战略性转移自然是正确的。当时，广西比较大股的起义武装，桂西南有以

薛福成：《书汉阳叶相广州之变》，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28页。

吴凌云为首的起义军，桂东南有以黄鼎凤和范亚音为首的起义军，桂东北有以张高友为首的起义军，永淳（今峦城）、横州（今横县）一带有李文彩为首的起义军，苍梧县有罗华观起义军，湘、桂边有陈永秀、黄金亮起义军。此外，还有活跃在各地的许多小股起义军。至于广西的清军，自太平军兴起并向湘鄂地区转进后，主要用之于对付太平军，留下的部队不多，广西地方当局不得不依靠团练来对付各地起义武装。陈开、李文茂等毅然率领起义军向革命势力比较活跃，反动势力比较薄弱的广西进军，对于保存和发展自己，无疑是十分有利的。

1855年5月下旬，陈开、李文茂、梁培友、区润、梁昌等率战船千余艘，溯西江扬帆直上，在德庆冲破张敬修部水师的堵扼，越过封川，进入广西。在进攻梧州不克后，即西走藤县，过平南，进据大黄（湟）江口，于6月5日直薄浔州府城（今桂平）。浔州城三面临水，起义军战船分泊南、北两河，发炮轰城，步军则在东、西两门外扎营安炮，从陆路进攻。浔州知府刘体舒督率清军、团练闭门坚守。起义军在屡攻不克的情况下，一面派兵控制交通要隘，一面在城外筑墙设垒，阻击清军的援兵，切断城内的粮饷接济，实行长期围困。7月23日和8月28日，起义军两次采用穴地攻城法轰塌南门城墙，但缺口很快被清军封闭，未能突入城内。

广西巡抚劳崇光因无兵可调，贵县勇练的增援亦为起义军所阻，只得把希望寄托在业已进至梧州的张敬修身上。可是，张敬修所部不仅兵力有限，而且士气低落，并需换乘适应浅水作战的战船，筹措欠发的粮饷，因而进展十分迟缓。叶名琛不得不于8月中下旬先后增派参将尹达章率浅水船八十只、兵勇三千名，已革知县谢效庄率团练千余名，加强张敬修部，令其立刻水陆并进，解浔州之围。9月21日，清军战船驶至石咀时，被扼守大黄江口的起义军击败，纷纷逃回梧州。

浔州城内的清军粮尽援绝，士气更加低落，起义军便于9月27日乘机发起总攻，由南城登梯缘墙，一举攻入城内，俘杀了知府刘体舒和桂平知县李庆福等人。

占领浔州城后，陈开等宣布建立“大成国”，改元“洪德”，改浔州城为“秀京”，并蓄发易服，颁发制度，分官设守，开炉铸钱（称“洪德通宝”），开始进行政权建设。为了防御清军进攻，在城外修筑土城二道，在东门外的三角咀修筑炮台，在沿江两岸筑垒设营。

（二）攻占武宣、平南

浔州城的攻克和大成国的建立，大大鼓舞了广西各地起义军的士气，陈、李起义军开始成为广西各支起义军的中心，出现了一派大好形势。

广西巡抚劳崇光鉴于广西兵单饷竭，只得采取消极防堵的方针，其部署如下：提督惠庆率绿营千人，与右江道黄辅相等所率绿营分驻武宣、蒙墟，

防堵起义军北上柳州；新任署浔州知府张鹏万驰赴平南与署知县李载文等招集溃散兵勇、团练，防堵起义军东进；左江镇总兵色克精阿率部驰赴横州，防堵起义军西进。

起义军攻占浔州后，立即发起了攻势作战。10月初，李文茂、梁培友等率军数万，攻占浔州西南的贵县县城，当地起义军首领黄全义、黄鼎凤和活跃于横州、永淳一带的李文彩率部参加大成国起义军。不久，李文茂又挥军进攻浔州东北的平南县。由于平南清军防守坚固，以致从1855年10月中旬至翌年2月，久攻不克。清军乘机攻占平南以西的一些沿江据点，并从广东陆续调来援兵，向浔州推进。在此情况下，李、梁等一面以部分兵力在大黄江口一带依托有利地形扼阻广东清军的水陆援兵；一面毅然率部北上，于1856年4月15日夜一举攻陷武宣城，毙浔州协副将福格、守备朱锦兰等多人。起义军袭占武宣，不仅威胁象州、柳州，而且威胁蒙墟清军的安全，打乱了清军进攻浔州的部署。此后，梁培友率水军南返浔州，李文茂率部继续北上，于5月7日攻占象州。李文茂联络荔浦张高友起义军，于7月进攻柳州。劳崇光忙调桂林和浔州附近的清军、团练前往增援。起义军进攻柳州受挫，张高友率部退守象州，李文茂于8月率部返回浔州。

梁培友率水军南下后，准备再攻平南。6月17日至23日，连日大雨，江水猛涨，清军设置于大黄江口下游的拦河铁链被急流冲断，岸边的炮台多被淹没，陆路各营也因洪水阻隔，彼此不能应援。梁培友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于6月26日一面派兵围攻清军陆上营垒，一面集中战船数百只，顺流连檣而下，火攻清军水师。清军广东水师的一百余只战船被烧毁殆尽，张敬修、尹达章以及候选知府谢邦瑞、已革肇庆千总柯维和兵勇四百余名被击毙。起义军打了一次漂亮的水上歼灭战。接着，起义军水陆并进，围攻平南，于8月29日攻克县城，击毙和俘虏李载文等多人。在围城期间，起义军水军还在藤县的白沙击毁由广东水师千总苏海率领的战船三十余只，缴获米船百余只，一度进抵梧州城外。起义军攻占武宣、平南后，又于10月初拔除了威胁浔州的清军据点蒙墟，提督惠庆败退石陇。

起义军进入广西后，经过一年多的作战，占领了浔州府属的广大地区，初步开辟了以浔州为中心的根据地，开始在广西立定了脚跟。这些胜利的取得，客观上由于广西清军兵力薄弱，而起义军能得到广西起义武装的积极配合，主观上则由于李、梁等起义军首领能在作战中注意集中兵力，乘敌之隙，出敌不意。起义军虽然取得了很大胜利，但与广西清军和团练的力量对比，仍然处于劣势，根据地还很不巩固。

（三）夺取柳州、梧州、南宁

1856年10月，陈开召开了起义军将领会议，分封诸王：李文茂为平靖王兼陆路总管，梁培友为平东王兼水路总管，区润为平西王，梁昌为定北王。

陈开自称镇南王，不久又改称平浔王。此外，还分封了公、侯、元帅等职官。会议还确定：由李文茂率部北攻柳州，梁培友率部向东发展，区润、梁昌率部向西发展，陈开则坐镇浔州。部署既定，各王便分别率部向北、东、西三个方向发起攻城作战，以便进一步扩大以浔州为中心的根据地。

1. 北攻柳州之战

1856年11月，平靖王李文茂率水陆两军由象州北上，再次进攻东、西、南三面临水的柳州城。11月11日，起义军战船直驶城下，步兵则占据了铜鼓、长塘、欧阳等据点。12日，起义军向东门、北门外清军营盘发起进攻，清军不支，退入城内。起义军占据了城外各要隘，完成了对柳州城的包围。

柳州城仅有游击韩凤所部二千余人及右江道孙蒙、参将汤遇珍所率的少数部队固守待援，而这时陈永秀、黄金亮、张高友部起义军，正积极活动于兴安、灵川、永福地区，威胁省城桂林。劳崇光一面调兵防守桂林，一面催令道员张凯嵩由庆远（今宜山）率部驰援柳州。张凯嵩收罗绿营一百五十名和团练三千名，于12月3日进驻与柳州城隔江相望的二都。同月21日，提督惠庆也由石陇率绿营近千人赶到该处。因兵力有限，并受到柳江南岸起义军的牵制，张、惠二部清军均滞留二都，不敢渡江作战。而起义军的围城作战正日益加紧，曾于1857年1月2日炸塌城墙一段，虽未能突进城内，却给守军以极大震惊。劳崇光催促驻二都的清军迅速渡河增援。1月8日，惠庆率部渡江。他自知难于解围，便约韩凤由城内出击，内外夹攻。但韩凤龟缩城内，拒不出战。起义军一面阻击惠庆援军，一面加紧攻城。这时，城中粮食已尽，兵丁饥饿难忍。3月14日，韩凤率亲兵二百余名企图突围逃跑，刚出城门，就被起义军击散，韩凤仅率少数人逃往桂林。15日，李文茂乘机挥军攻入城内，歼灭了其余守军，击毙孙蒙、汤遇珍等，胜利地攻占了柳州府城。惠庆见柳州已失，慌忙向桂林撤退。

占领柳州后，起义军乘胜攻占了柳城（今柳城南）、罗城、庆远、融县（今融水），控制了柳州、庆远二府所属各州、县，打开了通向贵州的道路，并与贵州苗民起义军取得了联系。李文茂坐镇柳州（改称龙城府），建立平靖王府，设丞相、都督、将军等职，所占州、县派部将分任知州、知县。在军事上，将起义军编为前、后、左、右、中营，此外尚有御林军、常胜军、长生军、祷天军等番号。在经济上，注意恢复生产，发展商业，并自铸“平靖胜宝”钱币，俨然自成一统。

2. 东取梧州之战

平东王梁培友拟首先肃清平南县属的地方团练，保障后方安全，然后东攻梧州。1857年4月3日，梁培友率部从平南县大乌墟出发往攻廖洞村团练，不幸中炮牺牲。起义军失去了一名得力将领。之后，陈开亲自统率梁部继续东进，于5月30日占领藤县后，率战船千艘顺流东下，直抵梧州，在活动于苍梧一带的罗华

观起义军配合下，发动了进攻梧州城之战。6月22日，起义军抢占了梧州城外浔江和桂江汇合处的三角咀，居高临

下，炮击梧州城。接着，占领了梧州对岸的戎墟镇（今苍梧县），水军战船还控制了广东封川至德庆间的江面，从而封锁了水陆交通，完成了对梧州城的包围。

梧州城内有按察使黄钟音、知府陈瑞芝、副将蒋福长等统带的潮勇、香山勇一千二百余人，加上当地团练，共三千人左右。叶名琛得悉梧州被围后，一面令肇罗道张承修、肇庆知府史朴加强肇庆方向的防御，一面派广东陆路提督昆寿率绿营五千人、水师守备苏海率战船九十余只，增援梧州。起义军水军在数量上占有优势，一面在梧州城外游弋，发炮环攻，一面积极打援，主动进攻广东援军。7月28日，起义军水军在广东都城（今郁南县）江面对正在逆水上驶的广东水师发起突然袭击。苏海所率的战船不是被击毁、击沉，就是缴械投降，苏海也当了俘虏。昆寿所率绿营也遭到起义军有力的打击，被迫向肇庆溃退。从此，梧州城内守军陷入了孤立无援的绝境。

梧州被围日久，城内粮食渐罄。劳崇光先在桂林采办粮食，准备由桂江南运梧州，但因中游的平乐县已被杨西安起义军占领，运输受阻；后又令怀集、贺县团练从陆路开辟粮运通道。叶名琛也令肇庆知府史朴、高要知县黄家仁率兵练千人向梧州运米，但水陆要隘均被起义军控制，以致粒米片薪未能进入城内。至9月中旬，城内粮米颗粒无存，每天饥饿而死者达数百人。陈开得悉这一情况后，命令部队奋勇攻城，于9月27日夜一举攻入北门。在广东镇压起义军颇为卖力的潮勇等这时也完全丧失了战斗力，被歼千余人，除陈瑞芝乘乱逃脱外，黄钟音、蒋福长等都当了俘虏。起义军占领梧州后，将该城改名秀江府。

3. 南宁不战而得

定北王梁昌、平西王区润、定国公李文彩所部起义军，于1857年2月和4月先后占领了永淳、横州两县，恢复了李文彩起义时的根据地，受到当地壮、汉人民热烈欢迎。5月27日，梁昌、区润、李文彩率部四万余人、战船数百只沿邕江水陆并进，往攻南宁。驻守该城的左江镇总兵色克精阿等慑于起义军的声威，率文武官员事先出城走避，起义军不战而得南宁城。

占领南宁后，梁昌、区润率部西攻百色不克，又折回南宁；李文彩率部东攻灵山，后又折回横州、永淳。在此前后，隆国公黄鼎凤率部攻占了宾州（今宾阳东北）、上林等县，活动于容县、岑溪地区的荣国公范亚音率部攻占了北流，进围郁林（今玉林），在南线也取得了重大胜利。

自1855年9月占领浔州至1857年9月占领梧州为止，起义军经过两年鏖战，先后攻占府、州、县城数十座，控制了大半个广西，队伍发展到数十万人。起义军在这一时期的攻城作战，克服了起义初期不顾主客观条件盲目强攻的缺点，在广西清军缺乏机动力量的情况下，改用长期围困的方针，以较小的代价取得了较大的胜利，反映出作战指挥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

四、被迫转入防御，根据地日益缩小

(参见附图十)

正当起义军不断发展进攻之际，形势发生了较大变化。首先，太平天国经过 1856 年内讧以后，元气大伤，使清政府得以腾出较多的力量去镇压各地各族人民的起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湖南巡抚骆秉章应劳崇光的请求，派候选知府蒋益澧率湘军一千六百人，段莹器率祁勇一千人，江忠浚率楚勇千余人，共三千六百余人，在蒋益澧统一指挥下，于 1857 年 6 月中旬进入广西，配合广西清军进攻正在威胁桂林的陈永秀、黄金亮起义军，9 月占领了全州、兴安、灵川等县，进入桂林城。陈永秀、黄金亮部被迫转移，分别参加了活动于粤、桂边的陈金刚部和柳州的李文茂部。其次，起义军占领梧州后，广东当局加紧添制和改造战船，抽调部队，雇募壮勇，积极进行收复梧州、浔州的准备。再次，南宁城于 1857 年 10 月 3 日，竟被色克精阿等纠集的数千团练所攻占，梁、区仓促率部东撤，退入灵山（后来梁、区发生内讧，梁昌在合浦被团练所擒，区润被其部下杀害）。由于上述种种不利情况，大成国起义军被迫由进攻转入防御，逐渐丧失了战场上的主动权，以致形势急转直下，开始由胜利走向失败。

（一）会攻桂林计划落空

1857 年 12 月，当蒋益澧所率湘军和平乐、贺县一带进攻陈金刚、陈永秀起义军时，陈开、李文茂没有主动支援，而是准备以陈开为东路、李文茂为西路，会攻桂林。

1858 年 1 月，李文茂由柳州率部北上，占领永福。2 月，李文茂率万余人进驻桂林西南六十里的苏桥镇，并在此等待沿桂江北上的陈开部的到来。可是，当陈开部于 4 月抵达平乐县时，由昆寿指挥的粤军已由肇庆向梧州开进。5 月，陈开部遭到已经占领平乐的湘军的攻击，前进受阻。梧州是两广咽喉要地，粤军一旦攻占梧州，西进则可直接威胁浔州，北上则可与湘军夹击正在平乐一带的陈开部主力。陈开在北进受阻、梧州告急的情况下，立即率部南返，保卫梧州。这样，进攻桂林的任务完全落到了李文茂所部身上。

当李文茂屯兵苏桥，威胁桂林的时候，蒋益澧所率湘军虽已增至五千余人，但兵力分散，桂林仅有二千余人。为防止李文茂部进攻，蒋采取不时调换部队防地、布设疑兵的办法，迷惑对方。并由右江道张凯嵩纠集团练进攻庆远，牵制李部。李文茂未作周密侦察，不知湘军的虚实，结果万余人长期滞留苏桥，不敢进攻，丧失了打击湘军和地方团练的有利时机。陈开率部南返后，蒋益澧便命令驻平乐的湘军折回桂林，并秘密调动一千五百人绕到苏桥后面，于 1858 年 5 月下旬开始对李文茂部实行前后夹击。李文茂不幸负伤，便率部撤出苏桥，后退守柳州。起义军进攻桂林的计划宣告失败。

（二）梧州失守

当李文茂与湘军作战失利，向柳州撤退时，在梧州与粤军作战的起义军也节节败退。

此次进攻梧州的粤军，由广东巡抚江国霖和提督昆寿亲自编组。他们认为，过去几次作战失利，主要是“选勇未精，配船无法”，以及进攻时机选择不当，必待“西水未涨，东风当令之时，水陆并进，步步为营，方能得手”。

。据此，他们得到署理两广总督柏贵同意后，抽调外海、内河水师，根据战船大小、火炮轻重、行驶快慢，分别编为前、中、后三队。即以能装载四五千斤火炮的红单等大型船六七十只为前队，能装载二三千斤火炮、桨多人众，转棹方便的扒船五十只为中队，能装载一千斤火炮、行驶快速的湖南麻阳舢板船一百只为后队。前队主要发挥火炮射程远的优势，便于先发制人；中队既可掩护前队，又便于进退；后队可以在前队、中队的炮火掩护下，迅速接近对方，实行近战。陆路方面，兵力增至一万余人，一半掩护水师溯江前进，一半专门进攻陆上起义军的据点。此外，还督令沿江各县团练于西江两岸配合作战。部署就绪后，粤军于4月19日趁江水尚未大涨、水流较缓之际，由昆寿统一指挥，从肇庆西上，往攻梧州。

起义军对粤军的兵力和进攻部署缺乏了解和研究，仍然袭用过去的老办法，在封川江面集中战船二三百只，于4月29日顺流下驶，直冲敌阵。当驶至德庆的春牛坪江面时，预有准备的广东水师前队首先发炮，击沉起义军前队战船数只。起义军水师右营安国公李发、先锋李明中炮牺牲。这时，粤军水师中队扒船向两翼展开，后队麻阳舢板船在炮火掩护下迅速接近起义军战船，枪炮齐放，岸上的兵勇也配合作战。经过激战，起义军不少战船被击沉、击伤，人员伤亡也不断增加。在危急情况下，起义军自焚战船十余只，利用烟雾掩护，转棹撤回封川江面。起义军在封川添筑炮台，并由梧州增兵四五百人，准备堵击粤军；还联络广宁、怀集等地起义军南下抄袭粤军后路，进行牵制。但水、陆部队不久即被敌击败，广东水师扬帆直驶梧州。5月30日晨，起义军的主要据点戎墟被苍梧、西宁的数千名团练攻占。梧州城守军面临两面受敌的不利形势，遂于30日深夜撤至城外。粤军占领梧州后，便停止了追击。

（三）柳州陷落

蒋益澧所部湘军在苏桥击败李文茂部后，便乘胜向柳州逼进。李文茂派其弟李文辉率部扼守白沙江口，扎竹为筏，横锁江中。白沙江口是洛清江和

江国霖奏：《广西剿匪获胜克复梧州由》（咸丰八年四月二十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

柳江的汇合处，李文茂以为守住这一咽喉要地，湘军水师便难于攻取柳州。然而，蒋益澧事先摸清了李文茂的防御部署，湘军由桂林乘坐麻阳船驶抵雒容（今鹿寨西南）后，不再下驶，而是于夜间拖船上岸，由陆路抬运至柳州城附近的洛垢下水，出其不意地直逼柳州。1858年6月24日，李文茂以为白沙江口已经失守，便慌忙从柳州撤退。蒋益澧占领柳州后，立即分兵两路，一路追击李文茂，一路进攻李文辉。驻守白沙江口的李文辉部因孤立无援，大部溃散。李文茂部先后在柳城、融县反击湘军失利，便转入贵州东南部，与苗民起义军配合作战。8月，在围攻黎平失败后，旋又折回广西融县一带。11月，李文茂不幸病故于怀远（今融安北）山中，余部由陈戊养统领，仍归陈开指挥。

柳州、梧州之所以失守，除了清军兵力增加这一原因外，主要由于起义军由一味进攻而被迫转入防御作战，丧失了措置裕如的能力。李文茂从苏桥撤退后，在兵力上仍占有优势，如果沉着冷静，集中力量对南进之敌进行一二次歼灭战，仍然有可能变被动为主动。陈开部在梧州方向的作战中，在兵力上也占有相对优势，同样由于事先缺乏防御准备，对粤军的进犯虽然进行了节节抗击，但因仓促应战，以致难于阻止准备比较充分的敌人的进攻。

五、秀京沦陷，起义军余部坚持斗争

梧州、柳州等地相继失守以后，大成国起义军受到很大削弱，根据地也缩小了很多，原来的五王只剩下陈开一人，形势已非常不利。但当时大成国尚据有十多个州、县，拥有水陆两军十余万人。此外，还有陈金刚和罗华观等起义军分别活动于贺县和苍梧下郢一带，构成犄角之势。以后，又有石达开部进入广西活动。因此，在兵力对比上，起义军仍占有优势。如果陈开等能够客观地分析形势，采取正确的决策，还是有可能扭转不利局面的。但是，由于主观指导上的原因，这种可能非但未能实现，而且每况愈下，最后终于失败。

（一）作战指导一再失误

蒋益澧所统湘军占领柳州以后，由于炎夏酷暑和水土不服等原因，病员日益增多，不得不分驻柳州、庆远一带治疗休整，就地清剿起义军余部。昆寿所率粤军在攻占梧州以后，因梧州至浔州三百余里的浔江滩多流急，原有的战船过大，难以上驶，需换船添兵，筹措军费。所以，湘、粤两军都停止了进攻，出现了一个短暂的战争间隙。这正是陈开起义军补充休整队伍，加紧准备防御作战的有利时机。但是，陈开没有这样做，因而为以后的防御作战带来了严重的困难。

1858年11月，蒋益澧率湘军主力进攻贺县的陈金刚起义军。陈开乘柳

州守备空虚之际，率兵一举袭占了柳州，并恢复了柳城、融县等地，收容了李文茂余部。这一作战行动是正确的。但是，在攻占柳州等地之后，陈开没有及时转旗东向，配合陈金刚部夹击正在回援柳州的湘军。当时，陈开、陈金刚都拥有数万之众，湘军不过五千余人，如两军实行左右夹击，完全有可能消灭敌之一部或大部。陈开却未能抓住这一有利战机，也没有加强柳州等地的防御，而是率主力南下浔州，接着东攻梧州。梧州一带的粤军有兵勇万余人、战船三百只，1859年3月下旬，又得到副将杨超所率拖罢船二十余只和把总钟春元所率步兵一千人的增援，水陆防御都比较坚固。4月2日，陈开率战船三百余只，在罗华观部千余人配合下，发动了对梧州的进攻。4月14日至16日，连续攻击梧州外围的三角咀、白云寺等据点，结果均未攻下，战船和兵员却遭到不少损失，以后不得不退回浔州。这一作战行动说明，陈开没有认清当时决定广西战局的主要环节，因而不能正确选定打击对象和作战方向，并采取灵活的战法。

1859年7月，原石达开部将石镇吉率部由广东进入广西，8月围攻桂林未下，转移至宾州。稍后，石达开军二十余万人又进入广西，于10月中旬占领庆远城。湖南巡抚骆秉章立即抽调正在湖南休整的广西布政使刘长佑部湘军十八营八千人、萧启江部湘军九营四千五百人进入广西。尽管如此，湘军在数量上仍居于劣势，如果大成国起义军与太平军密切协同，联合作战，仍然有可能争取战场上的主动权。但由于彼此互争领导权，没有形成统一的革命力量，给湘军造成了各个击破的机会。

当石镇吉部撤围桂林转移至宾州以后，刘长佑一面令蒋益澧再次率部对付贺县的陈金刚部起义军，保障湘军的翼侧安全；一面自率湘军主力趁江水未涨之时，于1859年12月发动了进攻柳州之战。面对湘军和团练共数万人的围攻，守卫柳州的数千起义军顽强抵抗，固守待援。陈开几次从浔州派水军北上援救，无奈水浅滩多，沿途又遭团练堵击，始终未能抵达柳州城下。1860年1月31日，湘军炸开东北城墙，攻入城内。起义军牺牲二千余人，损失战船二百余只，柳州再次失守。

1860年3月，刘长佑率部进攻柳城。陈开不是配合柳城守军侧击刘军，而是再次进攻柳州城。刘长佑率部及时回援，陈开率起义军与敌人苦战三十余日，虽然使湘军受到较大损失，但自己的有生力量也损失不少，不得不于4月中旬再次退守浔州。

这时，石镇吉部太平军已在百色一带被敌人消灭。石达开部太平军则由于不断分裂他走而大量减员，石达开不得不于5月底弃庆远，率余部偏处广西南部的宾州、武缘（今武鸣）一带。在这种情况下，湘军、粤军便加紧了进攻浔州的准备。为了解除后顾之忧，刘长佑、蒋益澧等决定首先进攻据有贺县、怀集等县的陈金刚部和下郢一带的罗华观部。7月，贺县、怀集失守，陈金刚率万余人走开建（怀集西南），下苍梧。9月，湘军围攻下郢，罗、陈等部因得不到陈开部的配合，作战一再失利。11月，罗华观部退入浔

州，陈金刚部南走广东信宜。在此期间，据有荔浦、永安（今蒙山）的张高友起义军向清军投诚。这样，陈开部起义军便成了孤军，而湘军却打通了桂林至梧州的水陆交通，与粤军联成一气，造成了进攻浔州的有利条件。

（二）秀京落入敌手

1861年2月，已升任两广总督的劳崇光与记名按察使蒋益澧、广东陆路提督昆寿等在广州策划进攻浔州的部署，决定裁撤所有不适于在浔江作战的红单船等（用以保卫梧州的四艘除外），另行添置扒船、巡船、舢板船等共一百三十只，以便对付起义军的水军。劳崇光等鉴于过去广东水师“在平南、藤县、德庆等处四次败绩，屡覆全军”的教训，认为“非大队陆勇与水军相辅，断难进兵”。为此确定如下进攻部署：由总兵李扬升率水师溯浔江上驶，蒋益澧率湘军七千余人沿浔江两岸西进，作为进攻浔州的水陆主力；由候补道刘坤一率湘军一部从柳州出象州、武宣，由北而南，配合进攻浔州；由署郁林知州邹德淳和署左江道吴德征分别纠集团练，堵扼起义军南下和西走的道路；并令平南、桂平县的团练随时策应水陆各军，充当向导。此外，还命记名道刘式恕统率练勇数营、铜底大船四艘守卫梧州城，以防起义军偏师绕袭，并就近筹集军火粮饷。至4月上旬，清军进攻浔州的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

陈开在多次进攻失利后，也作了一些防御准备，如加紧铸炮造船，增调水陆两军加强平南和象州的防御，准备抗击来自梧州和柳州的清军。但因仓促从事，为时已晚。

4月17日开始，蒋益澧陆续派出部队夹江西行，为广东水师打通前进道路。至8月初，湘军攻占了藤县至平南的起义军所有据点，扎营平南城东。8月12日，起义军万余人主动袭击湘军营垒，激战数日，毙敌数百名。18日下午，起义军战船四百余只顺流而下，鼓角齐鸣，支援步兵作战。面对起义军的强大攻势，蒋益澧惊恐不安。他登高东望，从望远镜中看到水师快要赶到，便下令连夜移营后退，与水师靠拢。19日黎明，李扬升率全队水师驶抵平南城东二十里的丹竹，得悉起义军战船飞桨下驶，立即传令各船收缆下帆，准备迎战，并将巡船、扒船等九十余只排列北岸，舢板四十余只驶泊南岸，形成犄角之势。部署刚完，起义军大队战船即“结队而来，纵横满江，炮声震动山谷”。李扬升命令各船一齐发炮。起义军水军毫不畏怯，继续顺流下冲，击伤广东水师战船二三十只，毙伤不少水勇。李扬升急忙调派部

劳崇光奏：《筹派水陆大军进攻浔州艇匪由》（咸丰十一年四月二十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

劳崇光奏：《官军克复浔州府城出力请保由》（咸丰十一年八月十三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

分扒船驶往南岸，实行两面环攻。战斗正酣，忽然东风大作，起义军战船处于逆风顺流、进退两难的不利地位。李扬升乘势令各船挂帆上驶，进行近战，抛掷火箭、火罐、火弹，毁起义军战船数十只。接着，起义军的火药船又被击中起火，顿时浓烟蔽江，起义军被火烧死和落水淹死者不计其数，有的凫水上岸，也大部被清军截杀。此次水战，起义军伤亡近万，战船大部被俘被毁，仅有少数逃脱。在水战的同时，支援水军作战的陆路起义军也遭到湘军和团练堵击，伤亡惨重。

丹竹一战，起义军水陆精锐大部丧失。败讯传出，浔州城内及其它各地起义军的士气大为沮丧。蒋益澧、李扬升率水陆两军乘胜直趋浔州，桂平县的团练数千人也闻风而动，直抵浔州城下。当时浔州城内虽有守军数千人，但军心涣散，已无坚守的决心，竟被团练攻破城门。起义军虽进行了巷战，但湘军大队人马已随后赶到，难于挽回败势。8月21日夜，陈开率部撤离浔州城，向贵县退却，准备投奔石达开，詎料这时石部已由贵县退至横州。9月2日夜，当陈开等泊舟于横州东北的大滩时，不幸被赖联桂等所率团练俘获，后被押回浔州城，英勇就义。至此，经营了六年多的以浔州为中心的根据地，除贵县等少数据点外，已全被清军占领。

（三）起义军余部继续战斗

浔州陷落和陈开牺牲以后，一部分起义武装和李文彩的壮族起义军约三万人投奔石达开，不久即撤离广西；另有约四万人由隆国公黄鼎凤统率，就地坚持斗争。

1861年9月，蒋益澧率部进攻贵县，黄全义开城投降。黄鼎凤则率领部众以覃塘为根据地，高举恢复大成国的旗号，坚决抗击湘军的进攻，并企图重占浔州。12月3日，黄部大败湘军于兰田村。1862年（同治元年），趁蒋益澧所部湘军调赴浙江之机，于6月重占贵县城，进而攻占了通向浔州的要隘蒙墟，前锋抵达距浔州城仅十余里的岭头铺。广西巡抚刘长佑因浔州告急，即将桂林的防务交给布政使张凯嵩办理，自率五营湘军奔赴浔州。6月15日，刘长佑部进攻岭头铺，起义军据险抵抗，打退了进攻之敌。8月，黄部退守贵县，分兵据守太墟、龙岩、登龙桥、覃塘、平天寨等据点。10月28日，当刘长佑进攻登龙桥时，黄鼎凤分兵两路，一路南攻陆村、横岭，牵制进攻之敌，一路北取大墟，威胁清军后路，保住了登龙桥据点。当月，清廷任命刘长佑为两广总督，张凯嵩为广西巡抚，刘坤一为布政使，并接替进攻起义军的前线指挥任务。1863年，张凯嵩又调七个营增援刘坤一（于5月下旬到达贵县）。刘坤一在援兵到达后，便分兵三路，对黄鼎凤部发起进攻。7月6日占桥墟，10日占登龙桥和贵县城，18日占龙岩，8月11日占覃塘，黄鼎凤率万余人退守最后一个据点小平天寨。

小平天寨石壁陡立，地势险要，起义军早在山顶修筑了三道围墙，安设

大炮，并筑有碉堡等防御工事，凭险固守。1864年2月至4月，刘坤一部连续多次仰攻，都被起义军击退，部队伤亡惨重；又在大平天寨架炮轰击，未能奏效；施展招抚伎俩，也没有得逞。于是改用开挖长壕、长围久困之策。但刘坤一认为湘军一万数千人被长期牵制在那里，劳师糜饷，终非善策。后来发现后山尚可攀缘而上，便派兵一部于5月24日深夜悄悄爬上后山，埋伏于碉堡附近。25日凌晨发起攻击，伏兵将火罐、火弹纷纷投进起义军的碉堡。起义军遭到突然袭击，不知所措，纷纷弃堡入寨。26日，刘坤一组织湘军分四路发起总攻。黄鼎凤在危急情况下，竟于28日和军师周竹歧自投刘坤一军营，希图保全起义军的生命。5月30日，湘军攻破小平天寨，起义军被俘、被杀近千人，逃出者亦大部被俘。黄鼎凤等起义军首领后被刘坤一杀害。

至此，在广西坚持了十年之久的大成国起义武装全部失败。不隶属于大成国的起义武装也相继败亡：转战湘、粤、桂的陈金刚部于1863年9月在广东失败；活动在广西太平府的吴凌云余部于1865年由广西退入越南；其他较小的起义武装，有的降敌，有的溃散。轰轰烈烈的两广天地会起义战争又一次遭到清军的残酷镇压。

六、起义的历史意义与失败原因

（一）起义的历史意义

这次起义战争，是历次天地会起义战争中规模最大、给清政府的打击最沉重的一次，自有其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起义武装在广东一度攻占了四十余座府、州、县城，几占全省之半；在广西控制了梧州、潯州、平乐、庆远、柳州、南宁、思恩七府的三十多个府、州、县城。起义军所到之处，都在政治上、经济上打击了地主阶级和当地的反动统治。特别是被清政府视为南方可靠后方和粮饷主要供应地的广东，自从起义武装控制了兩广的许多地区和水陆要隘，阻塞了通往省城的交通以后，严重影响了厘金和各种捐税的收入，而军费开支却急剧增加，因而出现了饷银匮乏的困难局面，不得不请求清政府从山西、陕西、四川等省调拨饷银，协济兩广军队。在军事方面，起义武装不仅牵制了兩广地区的一万余名清军（不包括临时招募的兵勇）和千余只战船，还牵制了从福建、湖南等省调来的清军二万余人。根据兩广地方当局大大缩小了的数字统计，起义军毙、伤、俘清军最少在万人以上，击沉、击毁和缴获战船五六百只。这就在实际上支援了太平天国和其它各地各族人民的起义战争。

（二）起义失败的原因

这次起义战争终于失败，从军事方面讲，主要有以下原因：

1. 没有形成统一的领导核心，基本上各自为战，互不协同

作为秘密会党的天地会，向来具有山堂分立，互不统属的弱点，这次起义后，又吸收了大量无业游民和流氓无产者，使这一弱点更加突出起来。在反清作战中，各股起义武装之间基本上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时合时分，分多于合。每遇敌人进攻，往往彼此观望，缺少主动配合。如围攻广州之战时，虽有“以陈开为盟主，远近听其号令”之说，实际上既无统一的指挥，又无统一的作战行动。李文茂、陈显良等部在省城的东、北部与清军激战近四个月，而佛山的陈开与省河以南的林泚隆等所率部队，都没有采取积极的作战行动，打击和牵制清军，使其得以集中兵力，先北后南，将起义军各个击破。进入广西浔州以后，虽然封了五王，陈开坐镇秀京，实际上各王并不完全听从陈开的号令。李文茂攻下柳州后，未经陈开同意，就自行封官设吏，开炉铸钱；柳州失守以后，不向浔州退却，而拉着队伍远走贵州。梁昌、区润在南宁失守以后，也不向浔州退却，擅自跑到广东的灵山。这些情况说明了领导集团之间的不统一，没有全局观念。至于当地的起义武装，有的虽然接受了大成国的封号，实际上只是松散的联盟关系，并不能由陈开实行统一的领导和指挥，更谈不上主动配合作战，这就给敌人提供了各个击败的机会。

2. 只顾进攻，不顾防御

起义军勇于向清军进攻的精神是可贵的。但任何军队不能只顾进攻，不顾防御和退却。尤其是处在敌人战略包围的情况下，不能不十分注意防御问题。只有审时度势，在主客观条件有利于进攻时，不失时机地进攻；不利时，则毫不犹豫地转入防御，才能争取主动，避免被动。起义军围攻广州城是明显的错误，但能适时向统治力量薄弱的广西转移，使战略的退却和进攻结合起来，则是明智之举。进入广西之后，趁该省清军力薄饷绌之际，及时实行进攻作战，很快发展了革命力量，也是正确的。但是，当全国起义高潮开始低落，湘军进入广西，粤军厚集兵力准备进攻梧州，梁昌、区润所部从南宁退避广东，形势开始发生了不利于起义军的变化时，陈开、李文茂没有及时准备防御作战，仍然冒险进攻桂林，无疑是很大的失策。结果，苏桥作战失利后，很快陷入被动不利的局面，李文茂由轻敌变成了畏敌，由冒险进攻变成了退却逃跑，使大成国起义军的力量受到重大削弱。陈开在南宁、柳州、梧州相继失守，敌情日趋严重的情况下，仍然没有进行防御作战的准备，而是继续进攻柳州、梧州，打了许多消耗战，最后在湘、粤、桂军联合进攻下，丧失了还手的能力，不得不慌忙从浔州撤退。还应指出，大成国起义军在进攻作战时，偏重于攻取府、州、县城，不重视通过机动作战，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也是指挥水平不高的表现。起义军进入广西后，曾四次予广东水师以歼灭性的打击；在攻取浔州、柳州、梧州等城时，水陆配合，严密包围，主动打击援兵，取得了夺取坚城，一次歼敌数百人至千余人的胜利。但是，后来在柳州、梧州方向，与湘军、粤军作战中，打了不少失多于得的消耗战。

在广州外围作战时，李文茂曾运用伏击战术，取得了两次歼灭清军数百人的胜利。但到广西以后，这种战术几乎弃置不用了，以致丧失了不少歼敌良机，影响了战场形势继续朝着有利于起义军的方向转化。

3. 只注意根据地的扩大，不注意根据地的巩固

陈开、李文茂在广西最富庶的腹地地区建立根据地，使起义军既能解决粮食问题，又能利用江河纵横的地理条件，充分发挥水军的威力，对于坚持起义战争，起到了重要作用。与另一些长期流动作战，忽视建立根据地的天地会起义武装比较起来，是颇为高明的一着。但是，陈开等只注意扩大根据地，而不注意巩固。如没有广泛地发动和组织群众，配合起义军打击、瓦解为虎作伥的团练武装，以致团练在根据地内仍然广泛存在，连秀京所在地的桂平县也不例外；没有在根据地的主要城市、水陆交通要冲和重要山寨构筑必要的防御工事，屯积粮食和武器弹药，做好防御作战的准备。由于忽视了这些工作，所以根据地的面积虽然不小，但很不巩固，当清军向根据地进攻时，不能更好地发挥战略基地的作用。

4. 偏重于扩大部队，忽视巩固提高

大成国起义军最多时众达数十万，数量是相当可观的。但就整个部队来说，由于组织松散，缺乏正规的编制和集中统一的领导，缺乏严格的训练，尤其是缺乏有勇有谋的军事将领，因而部队的战斗力不能很快提高，步军尤弱于水军。起义军不仅在与战斗力较强的湘军作战中很少取胜，就是在与战斗力很差的广东绿营兵作战中，也多次打了败仗。尤为突出的是，驻守南宁的梁昌、区润的数万部队竟败于数千团练手中；陈开派出的解柳州之围的援军也因遭团练阻击而无法接近柳州。这说明起义军的战斗力和顽强精神，还是不够的。此外，在部队的巩固方面，也存在着明显的弱点。某些起义领袖如梁昌、区润因个人利害矛盾，发生了内讧。某些起义领袖如黄全义、陈戊养等在革命处于低潮时，竟率部投降清军。只注意扩大部队，不注意巩固提高部队，是不少农民起义武装的共同弱点，山堂林立、成份复杂的天地会起义武装，在这方面显得更为突出。这不仅不能使部队从不断战斗中得到提高和加强，而且成为最终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七章 西南、西北各族人民起义战争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初期，在太平天国革命和捻军起义的影响下，贵州、云南、四川、陕西、甘肃等地的苗、彝、回、汉等各族人民也相继举起反清斗争的义旗，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西南、西北各族人民武装起义的高潮。本章仅就其中规模较大、时间较长的贵州各族人民起义战争、云南回民起义战争、川滇李永和蓝朝鼎起义战争、陕甘回民起义战争分别予以记述。

第一节 贵州各族人民起义战争 (1854年3月—1872年11月)

一、起义的爆发

贵州是个多民族的省份，有汉、苗、布依、侗、彝、水、回、仡佬、壮、瑶等十多个民族。由于地处云贵高原东部，土地贫瘠，交通闭塞，经济落后，在清王朝封建统治下的贵州各族人民，过着十分悲惨的生活。

雍正、乾隆时实行“改土归流”后，贵州名义上废除了土司统治，实际上形成了“土流并存”的局面，各族人民遭受流官和土司、汉族地主和本民族地主的双重压迫。“土司、通事挟其诈力，剝剥无已。一切食米、烟火、丧葬、嫁娶、夫马供应之费，无不取之于苗民。……借事勒索，不倾其家不止，而苗民之生机绝矣。”少数民族地区大量肥田沃土被屯军侵占，官吏、地主、商人、高利贷者也以种种残酷手段榨取财物，掠夺土地。少数民族农民失去土地，被赶进深山老林。所耕之田，皆山头地角，收获很少，往往劳累一年，全家不得温饱，甚至“终日采芒为食，四时不能得一粟入口”，“而差徭采买，仍出于原户”，以致“当秋冬催比之际，有自掘祖坟银饰者”。

在残酷的封建统治和剥削下，贵州各族人民已经难以活下去了。“犯法可以除死，忍饥则将立毙”，为了生存，只有起而反抗。

1854年3月，布依族人杨元保领导本族农民在独山的丰宁上司起义，揭开了贵州各族人民起义的序幕。起义军先后向都匀、荔波、独山等地进军，因遭清军和团练围攻，被迫退往广西。当年5月，杨元保被俘遇害，起义失败。

同年9月，汉族斋教（白莲教支派）领袖杨凤（隆喜）和参加过杨元保起义的舒裁缝，领导群众在桐梓县九坝起义，一举攻占桐梓县城，创建“江汉”政权，改九坝为赛波府。杨凤被推为都督大元帅，舒裁缝为皇帝。他们发布文告，声讨清王朝的罪行，提出了“复明灭清，吊民伐罪”，“扫清四海，杀尽八旗，以除暴虐，以安民[良]善”的战斗口号。不久，起义军攻占仁怀，人数发展至二万以上，建立了以赛波府（九坝）为中心，包括桐梓、仁怀和遵义城郊的根据地。后又分兵进攻绥阳、正安、黔西，席卷黔北，威逼贵阳。云贵总督罗绕典率滇军入黔镇压，因作战失利，惊吓而死，起义

改土归流系明、清两代在贵州、云南等省少数民族地区废除世袭土司，改行有一定任期的流官统治的一种政治措施。它有利于加强对边远地区的统治，也加强了边远地区各族人民和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

《平定贵州苗匪纪略》卷四十，第8页。

胡林翼：《论东路事宜启》，世界书局版《胡文忠公全集》第635—636页。

《杨隆喜告示》，《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1期。

军声势大振。1855年1月，兼署贵州提督的四川提督万福率川军入黔，向起义军根据地进攻。起义军作战失利，南走黔西，接着采取流动作战，转战于都匀、平越（治今福泉）等府州的广大地区；因遭川、滇、黔三省清军和地方团练围追堵截，力量损失很大。4月22日，起义军在石阡葛彰司战败，杨凤身负重伤，自刎而死。余部由舒裁缝率领，进入铜仁府、松桃厅，又由思南府回到遵义府境。6月2日，舒裁缝战败被俘，惨遭杀害，起义失败。

杨元保和杨凤、舒裁缝领导的两次起义虽告失败，但他们在贵州广大地区播下了革命的种子，推动了各族人民的起义。因此，“歼除首要之捷甫奏，而上下游之变蜂起”。在黔东南，台拱（今台江）苗民在张秀眉、包大度等领导下首先发难。接着，潘新简领导水族农民起义于荔波县九阡，姜映芳领导侗族农民起义于天柱县执营乡，潘名杰领导苗民起义于麻哈州（今麻江）坝芒，罗光明领导汉族农民军活动于都匀、八寨（今丹寨）一带。在黔北，白莲教领导的汉族农民相继起义。同时，又先后爆发了黔西南回民起义和黔西北苗民起义。这些起义汇成一股洪流，冲击着清王朝在贵州的反动统治。

二、起义的胜利发展

咸丰初年，清王朝倾全力镇压太平军，在贵州的军事力量比较薄弱。贵州绿营兵额设三万六千余名，因调赴湖北等地与太平军作战，所存无几，而且战斗力极弱。杨元保等起义之后，与贵州相邻的云南、四川、湖南等省先后派兵入黔，但为数不多，且多在边境一带活动。这种情况，为起义军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一）苗军控制黔东南地区

1855年4月30日（咸丰五年三月十五日），张秀眉和包大度、李鸿基等人在台拱首举义旗，黄平、清平等地苗民起而响应，起义很快扩展到整个黔东南苗民聚居地区。起义军股数众多，互不统属，各自为战。张秀眉主动与各地起义军联合，积极向清军进攻，很快就占领了台拱、黄平、清平、丹江（今雷山北）等地清军的大部分汛堡。7月16日，张秀眉指挥苗民起义军智取岩门司，毙署古州厅（治今榕江）同知彭汝玮、署龙里县知县陈毓书等多人。接着，起义军又相继攻占了施洞（镇远南）、重安驿（今重安江）

罗文彬：《平黔纪略》卷二，第2—3页。

岩门司位于清水江北岸，依山傍水，易守难攻。清军凭险死守，苗军久攻不下。张秀眉亲临指挥，下令苗军向清水江南岸佯退。清军见苗军先头部队已到达对岸，便打开城门，企图逃跑。张秀眉急令苗军回师猛攻，趁敌人慌乱之际，杀进城去，全歼守军三百余人。

等地。“岩门失而黄平危，施洞失而镇远危，重安失而驿道塞”。这些军事要点的占领，对清军造成很大的威胁，使其占据的城市更加陷于孤立。清军因补给线被切断，粮饷短缺，以致“草根树皮剥食殆尽，子余之众，骨立菜色，守既无力，逃亦无路”。于是，各地苗军乘机进攻困守城市的清军，10月23日克丹江厅城，12月6日克下江厅城（今从江西）。1856年，苗军更加壮大，先后攻克了永从（今黎平南）、凯里、施秉、清江（今剑河）、台拱、黄平、清平等厅州县城和军事要地，歼灭了大量清军和地主团练武装，并经受了战斗考验和锻炼，提高了军事素质。

咸丰帝对贵州的局势大为恼火，以“剿办不力”，“调度无方”等罪名将云贵总督恒春、贵州巡抚蒋霁远“革职留任”，命贵州提督孝顺“督办全省军务”。

1857年初，苗军又主动出击，以扩大胜利。在黔南方面，杨大六、金干干、柳天成等领导的苗军与罗光明、潘新简领导的汉族、布依族、水族起义军活动于都匀、麻哈、独山一带，不断向清军进攻，迫使贵州提督孝顺困守都匀城一隅，一筹莫展。3月，起义军数万人合攻丁家山营，孝顺亲自督战，兵败自杀。其后，新任贵州提督佟攀梅以数千之众，株守麻哈州城。1858年2月，清廷以“拥兵株守”的罪名，将佟革职，“仍留军营差遣委用”。3月7日，苗军金干干和柳天成部攻入麻哈城，歼敌二千余人。已革提督佟攀梅、署知州何铤等文武官员悉被击毙。起义军乘胜南下，于3月14日攻占黔南最大的城市都匀，毙署知府高廷英等数百人。总兵巴扬阿连夜向贵定逃窜，起义军跟踪追击，直至贵定瓮城桥，于是龙里告急，省城贵阳震动。

贵州苗民起义军用过的铁杈

在东线，早在1856年底，苗军即挺进到湘黔边境的锦屏一带。1857年春，苗军进图镇远府，在镇远附近与援黔川军参将蒋玉龙部对峙。1858年2月，蒋玉龙补授贵州提督，离镇远赴思南镇压号军。苗军乘机进攻镇远府卫二城。镇远府城东、西、北三面依山，南临镇阳江（今阳河），卫城与府城仅一水之隔。1858年9月，苗军包大度部北攻卫城。署知府吴登甲率川军和练丁抗拒。10月5日，苗军趁川军因饷乏擅自向思南溃逃之机，一举攻占镇远卫城，并连夜渡江直扑府城。清军兵练惊恐四散，署知府吴登甲、署知县杨淮等均被击毙。苗军随即占领了湘、黔大道上的军事要地镇远城，控制了镇阳江、清水江等水路交通线，使黔东南苗军和其它民族起义军同黔东北号军的占领区联成一片，各部起义军得以互相支援，配合作战。

经过三年多的起义战争，至1858年底，苗军基本上控制了东起湘黔边、

罗文彬：《平黔纪略》卷二，第5页。

罗文彬：《平黔纪略》卷二，第8页。

西至贵阳城下的黔东南大片地区。

（二）号军建立根据地和围困贵阳

号军是白莲教支派灯花教组织的起义武装，因用不同颜色的头巾裹头（号褂和旗帜颜色亦各不相同），有红号、白号、黄号等名称。

贵州东部白莲教组织比较普遍。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清王朝令各地举办团练，白莲教徒即利用办团练的合法地位，公开发展武装，准备起义。1855年11月，铜仁府举人徐廷杰、梅济鼎聚众起义，突入铜仁府城，刘世美和田宗达、吴灿奎等也分别起义于江口和印江，是为红号。不久，起义失败，田瑞龙、包茅仙等继起，坚持斗争。1858年1月，年近八旬的白莲教教主刘义顺和油匠何冠一等在思南府城北面的鹦鹉溪率众起义，称为白号。3月，杨和风、贺济洋、胡胜海在安化（今思南）、婺川（今务川）一带分别起义，称为黄号。

号军攻破了不少城市，但均弃而不守，只占据一些险要的堡垒，往来游击。新任贵州提督蒋玉龙虽奉命率川军由镇远前往思南等地镇压，但见号军势盛，驻军于偏刀水（今凤冈南琊川）大营，坚壁自守。1859年11月，白号军攻占偏刀水川军大营，增修营垒，据为根据地。蒋玉龙退至遵义城东要隘三渡关。11月17日，白号军攻克湄潭县城，接着乘胜进捣三渡关，大败清军，兵锋直逼遵义近郊。

1861年4月，城头盖（今思南西）号军经由文家店渡过乌江，占据荆竹园（今思南西南）等地。荆竹园周围数十里环山拱卫，峭壁悬崖，形势险要，黄号便以此为根据地。不久清军由思南来攻，号军以攻为守，主动出击，逼攻石阡和思南府城，使敌人顾此失彼。号军荆竹园根据地在斗争中逐渐巩固起来。此外，余庆轿顶山，瓮安玉华山、平越尚大坪，也是黄号军的重要根据地。

刘义顺虽为白莲教老教主和各部号军的共同首领，但实际上并不能统一指挥互不统属的各部号军。这种状况，成为号军继续发展的障碍。因此，刘义顺等推举冒充明代皇帝朱氏后裔（冒名朱明月，一作朱民悦）的遵义人张保山为秦王（又称朱王），并继续采用杨隆喜的“江汉”年号。不久，又立朱明月为嗣统真主，铸印铸钱，并提出了“灭此胡党，宏我汉京”的政治口号。刘义顺自封为大丞相，以下有王、公、侯、乡正、元帅、将军、千里等职，分别拥有武装。此后，号军各自为政的局面虽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但各部之间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互相支援，互相配合，有的还与苗军等友军联合行动。

1863年，罗光明部起义军占都匀，苗军潘名杰部据贵定，号军何得胜部占开州（今开阳），彼此联合作战，对贵阳实行长期围困。清军将领哀叹：“我军若右出都匀，则罗光明据其前，（潘）名杰袭其后，左出平越，则（何）

得胜据其前，（罗）光明、（蓝）三寿袭其后，都难得志。若中出贵定图麻哈，则（潘）名杰据其前，罗、何左右夹击，更难得手。数年来贼踪不常，我军无可如何”。12月，潘、何联军在贵阳以北黑石头大败赵德昌部清军，进逼贵阳。“附郭一带，烽火相望，阖城皆惊”。但贵阳城池坚固，又有重兵防守，起义军一时难以攻下，潘名杰、何得胜部遂时分时合，活动于城周各地。其后虽数次攻城，终未能下。

在此期间，号军活动地区逐渐扩大，除黄号何得胜部在贵阳附近活动外，白号势力发展到遵义、大定（治今大方）二府的广大地区。1864年和1865年，先后攻下桐梓、仁怀、黔西、大定、正安等城，整个黔北地区都成为号军的势力范围。

（三）黔西南回民军和黔西北苗民军的节节胜利

1858年12月，黔西南普安厅（治今盘县）回民在张凌翔、马河图等领导下起义，后队伍迅速壮大，并粉碎了兴义府（治今安龙）署知府胡霖澍的多次进攻。兴义府的回、汉、布依、苗等族群众纷纷起义响应。

1859年秋，张凌翔联络张福田（回族）、涂令恒（汉族）、陆王松（布依族）、杨树森（苗族）等部起义军围攻新城（今兴仁），并设伏全歼前往救援的团练。困守新城的清军闻援兵溃败，加之粮饷匮乏，水道又被起义军截断，军心离散。11月28日夜，清军兵练开城取水，埋伏在城下的起义军乘机攻入城中，占据新城。

新城三面环山，形势险要，为黔西南的军事要地。张凌翔、马河图等便以此为根据地，建立了大元帅府。张凌翔为大元帅，马河图为副元帅，总理全局。另设都督、将军、都统、参军、中郎将、营长、先锋、队长等职。张凌翔、马河图一面派人与太平军和云南回民起义领袖杜文秀联系，一面在新城扩建城垣，修碉挖壕，准备长期坚守。

1860年，太平军曾广依部由广西进入黔西南，牵制了大量清军兵力，使回民军得到了较大的发展。1861年，回民军由新城向周围清军发动进攻。4月，攻占贞丰州城。7月1日，攻入普安县城，因城中无粮，旋即退出。1862年1月，在苗族群众的配合下，回民军攻占册亨城。4月，张凌翔率军攻克兴义府城。9月，回民军再次攻克普安县城，10月1日攻占普安厅城，11月15日攻占安南（今晴隆），11月20日攻占兴义县城。至此，黔西南兴义府和普安厅所属广大地区均为回民军占领。

当各族起义军在黔东南、黔北和黔西南各地蓬勃发展的时候，在黔西北也爆发了农民起义。1860年5月，苗族农民陶新春利用一万四千余苗、彝、

罗文彬：《平黔纪略》卷十，第11页。

罗文彬：《平黔纪略》卷十，第25页。

布依族群众在韭菜坪（今赫章县境）举行降仙大会的机会，发动起义。起义军一举摧毁三个土司衙门，攻占黔西北要隘七星关，控制了黔、滇、川三省的交通咽喉。1861年2月，清军参将李有恒指挥湘军、滇军和团勇各一部向七星关进犯。陶新春率苗军坚守月余后，主动撤向毕节县西北的猪拱箐。猪拱箐地处滇黔边界，地势险峻，自然条件非常优越。苗军在此修建房屋，开垦耕地，在险要关隘修筑营垒，派兵据守。不久，李有恒从七星关进至猪拱箐东南峰顶山下，多次进攻未逞。同年夏，太平军曾广依部经由大定府北上，李有恒闻讯，慌忙回守毕节。陶新春率领起义军积极配合太平军围攻毕节县城，为太平军筹集粮食，充当向导。李有恒龟缩城内不敢出战。由于长期未能攻克毕节，加之太平军翼王石达开已率领大军到达四川东南，曾广依决定率部入川与之会合。6月19日，太平军从毕节撤围，拟取道黔西、仁怀、桐梓等地前往四川，陶新春便率苗军和太平军伤员退回猪拱箐。

1863年，石达开部将李福猷率太平军经过黔西北，陶新春将其迎至猪拱箐休整。在太平军的帮助下，苗军整顿了队伍，逐步建立起各种制度，加强了军事训练，提高了部队的军事素质。在斗争中，苗军的领导核心逐步形成，陶新春自任统兵元帅，周国瑞（汉族，太平军成员）、基哉先生（彝族）为军师，陶三春、杨应再、熊万顺、杨八、张项七、张项八（均为苗揆）、罗么大（布依族）等人为将军，顾朝礼为经略，此外还设有掌柜、宰辅、巨帅、礼师等职。这样，黔西北苗军逐渐壮大，猪拱箐根据地日益巩固起来。

陶新春部苗军以猪拱箐为根据地，活动于贵州大定、黔西、威宁、毕节以及云南镇雄、彝良、大关、昭通和四川边界地区，与各族起义军互相配合，不断打击清军。1864年，黔北号军向贵州西部发展，先占仁怀县城，11月13日又占黔西州城。贵西道沈西序令署大定知府刘正朝率军从大定赶往黔西救援。岩大五领导的苗、彝、布依族联军与黔北号军乘大定空虚，于12月14日袭占大定府城。陶新春率部由猪拱箐来到大定府城，与岩大五及号军领导人共同商定，分区作战，互相配合。由于陶新春部苗军与黔北号军、岩大五部苗军等密切配合，主动向敌人进攻，清军往往不战而溃。

至此，各族人民起义的烽火燃遍了贵州全省，使当地的统治阶级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清政府也为之忧心如焚。

三、起义军转入防御作战

（一）清军的谋黔方略与湘军三路“进剿”的破产

1864年7月，太平天国天京陷落，全国革命形势转入低潮，但杜文秀领

1863年，水城厅一带的苗族、彝族、布依族农民以哥老会的形式，组织反清斗争，起义军与由黔东南转战至黔西的苗军岩大五部取得联系，联合攻占大兔场（今纳雍县城）。

导的云南回民起义和贵州各族人民起义仍在蓬勃发展。1865年3月，清廷以“江浙肃清，东南底定”，令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就滇、黔两省“妥为区划”，“不以地属边陲，稍存漠视”。4月，曾国藩奏称：“滇省于天下为最远，黔省于天下为最贫。……谋滇当以蜀为根本，即以筹饷责之四川总督；谋黔当以湘为根本，即以筹饷责之湖南巡抚。蜀之南多与滇邻，湘之西多与黔邻，进剿即所以自防，势有不得已者，义亦不得而辞。惟既令其专谋一方，则不能兼顾他省。”曾国藩提出的川、湘两省各谋一方，“谋黔当以湘为根本”的方略，得到清廷的认可，但由于这时太平军余部还在福建等地活动，湖南当局尚需预防太平军由福建经江西入湘，暂时还无力大举援黔。

1866年初，南方的太平军余部均遭失败，清王朝便调集湘、黔、川、滇、桂等省大量清军，向贵州各族起义军大举进攻。早在1865年，四川总督骆秉章即派刘岳昭率湘军六千五百人援黔，先后攻占了正安州城和绥阳县城。1866年初，清王朝一面令已升任云南巡抚的刘岳昭率湘军向黔西、大定、毕节一带进攻，一面令湖南巡抚李瀚章筹划进黔事宜。李瀚章系曾国藩的老部下，李鸿章的胞兄，与湘军的渊源甚深。湘军攻陷金陵后，大批被裁撤的湘军官兵回到原籍，李瀚章从中选练兵将二万余人，分三路向贵州“进剿”：新授贵州布政使兆琛负责黔东军事，于湖南辰州府（治今沅陵）、沅州府（治今芷江）招集旧部五千人，编为“龙武军”十营，进驻贵州镇远，督同贵州黔军与湘军分途“进剿”，是为中路；已革浙江按察使、原湘军统领李元度与总兵王永章、候选知县李光燎等率兵六千人，由湘西麻阳（今麻阳西南）进驻贵州铜仁，向号军进攻，是为北路；总兵周洪印原率二十营湘军计万余人防守湘黔边界，待李元度等进至铜仁后，即由天柱直趋清江、台拱，与中路湘军成犄角之势，合攻黔东南苗军，是为南路。

面对清军的进攻，苗、号等起义军互相支援配合，利用当地山深林密的自然条件，节节阻击，迟滞和打击敌人。虽然起义军处于防御地位，但黔东南苗军采取“深入疾归”的战法，插入湘西敌后，袭扰湘军后方，牵制敌人，配合了号军等起义军的斗争，终于粉碎了敌人妄图一举消灭黔北号军和黔东南苗军的阴谋。

1866年夏，李元度等率部自铜仁向号军根据地分进：李元度、王建章出印江大坝场、何家寨攻大小屯，李光燎自石阡西攻荆竹园。号军在思南南八十里的高家田进行防御。由于大小屯号军首领投敌，形势突然逆转，高家田号军被迫撤退，荆竹园便暴露在敌军面前。为了救援号军，包大度等率领一支苗军由镇远进至铜仁，于12月1日猛攻府城，迫使北路湘军回援。当敌军迫近时，苗军迅速撤离铜仁，转向湘西。1867年1月，苗军由湘西回到铜仁，在离府城二十里的马脚岩击溃湘军罗建章部，毙参将周洪福，迫使李元

《穆宗实录》卷一百三十一，第30页。

曾国藩：《通筹滇黔大局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传忠书局1876年版）卷二十二，第8—9页。

度等再次回援。由于苗军的支援和配合，号军顶住了敌人的攻势，守住了荆竹园根据地。

在北路湘军向号军进攻的同时，兆琛率中路湘军由玉屏、青溪沿镇阳江西进，总兵周洪印率南路湘军由天柱西进，向黔东南苗军发起进攻。苗军依托险要地势节节抗击，并派兵袭击湘军后方粮路和驻地。湘军进展缓慢，迟至1866年11月，周洪印部才进至邛水（今三穗）以西的下德明、横坡地区，企图与兆琛部联络一气，共同向台拱地区进攻。12月，苗军以四五千猛攻龙西坡湘军军营，并由高寨绕出敌后，径扑邛水城垣。另一部苗军六七千人深入湘军后方玉屏县，攻击洋坪湘军营地，然后进入湖南，逼近湘西晃州厅（今新晃东北）城，后又直薄沅州府城下，迫使天柱地区的湘军李金榜部回师湘西。1867年2月，清江、台拱地区苗军向东南方向出击，攻克了锦屏县城，威胁南路湘军的后方，周洪印急忙回军湘西。

兆琛、李元度、周洪印等部湘军三路入黔作战，不仅未能消灭号军、苗军，反而招来了苗军经常东进湘西，袭扰湘军后方，使湖南籍和在湖南的官吏大为不满。1867年11月，清政府给予兆琛“先行开缺，交部议处”、周洪印“降为参将”、李元度“降为二品顶戴”的处分，宣告了湘军三路“进剿”计划的破产。

（二）猪拱箐保卫战与黔西北苗军的失败

1866年4月，清王朝令贵州当局厚集兵练，与新任云南布政使岑毓英率领的滇军约期“会剿”猪拱箐。

猪拱箐包括八座大山，纵横数十里，三面峭岩绝壁，仅北面稍缓，由青松梁子可登上山顶。其下为吴家屯，附近有二龙关和大溜口两个要隘，间道可通威宁州海马姑（今属赫章县境）。海马姑距猪拱箐八十里，地势险峻，七星河环绕其下，是苗民起义军的另一个重要据点，与猪拱箐互为犄角。为对付清军的进攻，陶新春领导的苗民起义军一面收缩兵力，一面在根据地内添筑营垒，扼守要隘。附近地区的其它起义军，如号军何大五部，苗军岩大五、祝万春、何玉堂等部都派兵支援猪拱箐和海马姑。

1867年春，岑毓英由云南镇雄州到达贵州毕节，随即督军进攻黔西北苗军根据地。他派一部兵力牵制海马姑的苗军，截断猪拱箐的外援，以主力进攻猪拱箐。3月下旬，滇军攻占吴家屯，然后两面夹击，夺占了二龙关和大溜口等要隘，迫使苗军退回山顶坚守。其后，滇军在猪拱箐半山腰扎营，准备向山顶苗军发动总攻。云南巡抚刘岳昭一面指挥所率湘军进攻平远州（治今织金）牛场苗军，以断绝猪拱箐苗军外援，一面将军火粮饷源源不断地运往滇军阵地，并将滇军后队三千余人调到猪拱箐前线。岑毓英部在猪拱箐苗军阵地周围挖掘壕沟，构筑木城，修筑营垒，连营一百七十二座，把起义军阵地重重包围。岑毓英为彻底孤立猪拱箐苗军，派总兵王丕烈会同贵州地主

武装向红岩尖山进犯。王丕烈驱使土目伪装苗军援军，混入起义军阵地，与清军里应外合，于6月21日占领了红岩尖山。从此，海马姑与猪拱箐的联系被敌切断。

苗军与清军对峙数月之久，军火、粮食极度缺乏，形势日趋危急。更为严重的是，在革命高潮时迫于形势参加起义的土目，这时大都动摇，纷纷投敌。岑毓英等还根据少数民族“连袂踏歌，此唱彼和，以传心事”的习俗，编写瓦解起义军斗志的歌词，让清军中的苗、彝族士兵“遍山环歌”，致使起义军“闻歌而逸去者万余人”。

7月20日晨，清军利用起义军哨兵轮换吃饭之际，发动总攻。潜伏在起义军内部的投敌分子“导官兵自其守处入”，清军大队束草填壕，攻入起义军阵地。经过激烈战斗，陶新春率领起义军余部退到山顶继续抗击。中午，清军发射火箭，焚烧山顶的房屋和棚帐。起义军和敌人展开最后的肉搏战，许多人壮烈牺牲，陶新春、熊万顺、周国瑞等人力尽被俘遇害，猪拱箐苗军根据地终于陷入敌手。8月16日，海马姑也被滇军和贵州兵练攻占。苗军首领张项七牺牲，陶三春在突围中被俘。

由于猪拱箐保卫战的失败，苗军队伍大部丧失，黔西北农民起义基本上被镇压下去了。

（三）黔北号军的失败

湘军三路援黔失败后，清王朝对贵州的用兵方略发生了某些变化。1867年秋，太常寺卿石赞清以“贵州全省糜烂，万难自强”，乃上书清廷，提出了“料理黔事，心须川楚合力”的主张。对云南、贵州两省，他认为应“先黔后滇”，“黔省肃清，然后移得胜之师料理滇事”。他分析了黔北号军和黔东南苗军的情形，认为苗军“多坐守巢穴，攻之似易而实难”，号军“飘忽游移，击之似难而实易”，故建议集中湖南、四川、贵州三省兵力，先攻号军，再攻苗军。虽然石赞清的建议为清廷所否定，但他的基本观点却为不少人所接受。因为贵州各民族起义军经常进入四川，危及四川当局的利益，所以四川总督骆秉章早就有“滇事似宜缓图，而黔寇亟应剿办”的意见，并派遣湘军将领刘岳昭等率兵援黔。1867年，骆秉章又奏请以候补知府唐炯率川军援黔。接着，署四川总督崇实奏请由唐炯督办援黔军务，令其先与湘军并力进攻荆竹园，再攻玉华山、尚大坪，认为“号匪既平，苗贼亦必敛而归巢”。1867年11月，清政府令席宝田代替被免职的兆琛总理湖南援

《贵州通志》前事志三十二，第15页。

《贵州通志》前事志三十二，第28—29页。

《穆宗实录》卷一百七十四，第43页。

《贵州通志》前事志三十二，第49页。

黔军务（席宝田首先向荆竹园的号军进攻）。这样，清政府事实上承认并实行了“川楚合力”、“先黔后滇”、先号后苗的方略。

1868年1月初，席宝田率湘军到达贵州铜仁，以一部留防湘黔边界，自率七千余人驰赴荆竹园。1月17日，席宝田与李元度两部湘军会师于三道水（距荆竹园仅八里），随即察看地形，研究进攻计划。荆竹园西临大河，东、南石壁陡立，唯有北面地势稍平，但黄号军防守严密。席宝田决定以步步为营的战术，指挥湘军从北面交替前进。湘军营垒距号军营卡最近的仅数百步。号军多次出卡反击，在湘军洋枪洋炮的轰击下，伤亡很大。27日夜，湘军凭借火力优势，席宝田部攻北卡，李元度部攻东卡，于第二天黎明冲进荆竹园寨卡。号军顽强抵抗，战斗异常激烈。黄号军首领肖继盛、何瑞堂等牺牲，仅有二三千人突围转移到罗家岩。湘军随即攻占罗家岩，守寨号军伤亡殆尽。

2月，席宝田部攻陷轿顶山，黄号兴明王石廷士、大元帅马文祖被俘，惨遭杀害。不久，因苗军攻入湘西沅州，威胁湘军后方，席宝田被迫回军湘西，轿顶山复为号军占领。

与此同时，李元度部湘军向乌江西岸的白号军进攻，并在军事进攻的同时，大搞招降活动。由于军事上接连失利，一部分号军领导人发生动摇，接受招抚，这就加速了白号军的失败，使湘军逐渐攻占了偏刀水的外围据点。3月24日，湘军先向距偏刀水仅四里的觉林寺进攻，遭到号军英勇反击，遂用劈山炮猛轰。这时，早已投敌的孙洪顺从里面接应配合，湘军乘势夺卡，攻入号军营垒。称为嗣统皇帝的号军领袖朱明月突围后被俘。4月初，四川候补知府唐炯和总兵刘鹤龄率川军相继到达偏刀水，占据西、南两面。唐炯、李元度一面派军队截击来援的黄号军，一面乘虚攻占了黄号军的重要据点水源沟等地。清军将偏刀水周围的神仙峰、黄家寨、朱村、拖尾营等堡寨逐次攻占，并在周围挖壕堑、树木栅，派兵昼夜守护，使偏刀水白号军愈形孤立。号军奋力坚守，打退川军、湘军的多次进攻。清军以新式后膛开花炮向偏刀水轰击，号军伤亡渐多。唐炯又派叛徒庞向忠潜往偏刀水号军内部诱降。5月26日，川军、湘军会攻偏刀水，秘密投敌的号军首领向成高暗中打开寨门。在里应外合、内外夹攻之下，偏刀水终于失陷。白号军首领——寄信王田应武、黔阳王何继述、元帅何发喜、军师老教主王礼廷、李长俊等被俘遇害，号军战士七八千人被剃发遣散。偏刀水失陷，标志着白号起义军基本失败，并使黄号军陷于孤立。

川军继续向余庆轿顶山、瓮安玉华山、平越尚大坪等地的黄号军进攻。黄号首领何得胜已于上年10月病死，何妻黎氏统其众，由进攻转为防御，并放弃了与潘名杰苗军的联合。之后，谭超凡（光前）在瓮安自称皇帝，与黎氏发生矛盾，导致武装冲突，自相残杀，使黄号军受到极大削弱。贵州巡抚曾璧光令贵州提督张文德进攻龙里、贵定，牵制潘名杰部苗军，以便唐炯集中力量进攻号军。唐炯采取“剿抚兼施”的方针，将部分投降的号军编入

总兵刘鹤龄军中，令其引导川军前进；策动谭超凡暗约五十九寨黄号军向川军投降，作为内应；根据降众提供的有关黄号占领区的地形和叛徒的献计，制定攻击玉华山、轿顶山和孤立尚大坪的作战方案。7月27日，三路川军同时渡过清水江（乌江支流）。左路邓锜率兵一千五百人和五百降众，从袁家渡渡河，谭超凡率已降清的五十九寨号军与川军配合，于8月7日占领瓮安县城。8日，川军向大轿顶山进攻，号军降众从中纵火内应。黄号军首领石士贵、张义方阵亡，大轿顶山为川军占领。右路总兵唐大有从龙坑渡河，在号军叛徒配合下，于8月7日夜夺占小轿顶山，黄号首领何双富等被俘。中路总兵刘鹤龄从江界河渡河，8月6日夜袭占长安营，逼玉华山而垒。在叛众的煽惑下，黄号军军心涣散，纷纷出降。川军乘势攀藤附葛上山，黄号军文定王陈绍虞乞降，并将拒不投降的王超凡捆献清军，致使玉华山陷入敌手。至此，余庆、开州、瓮安等州县全部为川军控制。

川军攻占大小轿顶山、玉华山后，便合兵会攻尚大坪。唐炯继续采用“剿抚兼施”的方针，将玉华山降众留强汰弱，编为五营。8月14日，唐大有部川军和降众抵达大坂，控扼尚大坪之前，唐炯、刘鹤龄列营于左右。这时，黔军参将唐天佑部也已渡过清水江，攻占王卡，切断了尚大坪的后路。于是尚大坪号军处于川军、黔军四面包围之中。15日夜，川军冒雨袭占岩门关、平果两处要隘，逼尚大坪而垒，并发动政治攻势。8月16日，何黎氏等率号军及太平军数千人投降清军。刘义顺和秦崽崽等数十人由小道突围被俘，后在成都惨遭杀害。

号军最后一个根据地尚大坪的陷落，标志着坚持了十四年之久的号军起义的最后失败。

（四）湘、川、黔军三路进攻黔东南苗军

1867年猪拱箐陷落和黔西北苗民起义的失败，1868年荆竹园失陷和黔北号军起义的失败，使贵州各民族起义军与清军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起义战争转入了低潮，黔东南、黔西南等地的起义军面临着更为艰苦的防御作战任务。

1868年5月，席宝田由湘西沅州还军贵州邛水，于5月19日围攻邛水西南的苗军重要据点寨头。“该处地当山半，三面劈削，一面下临深涧，坚垒重壕，层层环互”，形势极为险要。苗军守将甘保玉亲率苗军主力坚守在前哨阵地钉耙塘。湘军从正面进攻，伤亡惨重。席宝田便改变战术，一面从正面佯攻，一面派部队抄至寨头侧后，从高处袭击苗军。苗军腹背受敌，甘保玉不幸牺牲，寨头终于失守。其后张秀眉、包大度等率苗军数次反攻寨头，均未奏效。后由于席宝田请假返回湖南，湘军便以酷暑为理由，暂停向

苗区进攻。

唐炯在攻占尚大坪黄号根据地后，即率川军南下，进攻苗军。8月25日，川军与黔军参将唐天佑部攻陷平越州城，11月3日攻陷麻哈州城。唐炯利用号军叛徒陈绍虞等，由平越以东沿重安江东进，会合川军总兵刘鹤龄部，于11月28日占领黄平旧州城，12月7日占新州城。

贵州巡抚曾璧光则遣提督张文德率黔军由贵阳东进，连陷龙里、贵定，威逼都匀。都匀地区苗军首领潘名杰投降。余部在杨开国领导下继续战斗，终因寡不敌众，于11月27日撤离都匀。

同年11月初，席宝田又由湖南回到寨头湘军大营，继续向苗军进攻。处于清军包围之中的苗军，一面依托险要山势节节抵抗，一面派兵绕袭敌后。一部苗军进攻邛水东北的青溪、玉屏，并进入湖南，另一部攻击被湘军占领的荆竹园和上河等地，牵制湘军，使其不能全力进犯苗区。金干干也率五千苗军，轻装深入川军后路，袭击其补给线。席宝田、唐炯均感后路空虚，兵力不足，屡请增兵。

1869年，清政府进一步调兵增援贵州。湖南巡抚刘昆遣记名按察使黄润昌、道员邓子垣率万余湘军入黔。1月初，黄润昌进抵贵州青溪。席宝田令黄润昌沿镇阳江西进，令记名提督荣维善由寨头北上，夹攻镇远。3月10日，湘军攻占镇远府卫两城。其后，黄润昌率军西攻施秉，荣维善则率军南下，与沿清水江西进的李光燎、戈鉴部会合，于4月9日攻占清江厅城。接着，席宝田命荣维善由清江、彭芝亮由石阡，分率所部赴镇远，与黄润昌部会合。4月30日，黄润昌、荣维善、彭芝亮等部湘军攻占施秉县城，苗军向西撤退。

（五）黄飘大捷

湘军攻占施秉后，为了迅速打通驿道，并与业已占据黄平、重安、清平等地的川军会合，便乘胜向黄平前进。1869年5月1日和2日，由黄润昌、荣维善、邓子垣等率领的湘军一万八千余人占领苗军重要据点白洗寨（施秉南二十余里）和瓮谷陇（黄平东南四十余里）。瓮谷陇至黄平，中有黄飘（黄平东南二十里）等苗寨，地势奇险，仅有羊肠小道可以通行。当时有人提议停止攻击，但黄润昌、荣维善等因胜而骄，认为“功在指顾”，“若舍之而去，则驿路仍被梗阻，计不如乘胜追之”。5月3日，湘军以荣维善为前队，总兵张宜道为二队，总兵苏元春为三队，邓子垣为四队，黄润昌为后队，由瓮谷陇出发，沿山路鱼贯而行。

尽管由于湘、川、黔军节节进逼，苗军遭受的威胁越来越大，但他们仍然保持着顽强的战斗意志。苗军首领张秀眉令部将包大度率军万余人，在黄飘一带山上设伏，而以小部队前出诱敌。当湘军进入伏击区时，苗军突起，

前阻后截，“山上木石如雨”。湘军争相逃命，但因道路狭窄，人马拥挤，乱作一团，自相践踏，死伤甚众。苗军趁势由山上冲下，喊杀之声响彻山谷。黄润昌为“飞炮”击中头部，顿时毙命。邓子垣企图救护，也被苗军乱刀砍死。荣维善率亲兵二百余人冲出包围圈，沿山东逃，又为苗军包围，全部被歼。

黄飘一战，苗军取得了辉煌的战果，湘军主力荣维善、黄润昌、邓子垣部大部被歼，仅苏元春率数千残兵逃出重围。

黄飘大捷之后不久，苗军又取得了重创黔军的巨大胜利。1869年5月初，贵州提督张文德指挥黔军三四千人分五路从都匀向八寨进犯。苗军奋起阻击进犯之敌，并由金干干率军数千人，绕至平口、吴秀等地，从侧后袭击敌人，阻截敌人粮道。黔军腹背受敌，到达八寨以西四十里的鸡贾河一带时，已无法前进。由于从贵定、独山等地转运的粮食，多在途中被苗军截获，军中无粮，先则杀马为食，继则以草根树皮充饥，士无斗志，纷纷溃逃。7月中旬，张文德迫于形势，率部向独山转移。苗军早在楼山口埋伏重兵，当黔军从高寨坡登上楼山口时，伏兵突起，黔军顿时乱作一团，总兵马永胜、副将何遇春等当场毙命，兵勇死伤枕藉，三四千人全行溃灭。张文德仅带亲兵二十余人徒步经独山逃回省城贵阳。苗军乘胜于7月19日收复都匀府城。

当时的形势对苗军极为有利，如果各部力量团结一致，乘胜向敌人进攻，是有可能进一步变被动为主动的。可惜苗军满足于已有的胜利，除了有限的几次小规模军事行动外，无所作为，从而失去了继续歼敌的良机，给了敌人以休整恢复的时间。

四、起义战争的最后失败

（一）湘、川军继续向苗军进攻

湘军黄飘大败之后，湖南巡抚刘崑极力为席宝田开脱，并从人力物力方面予以大力支援（由湖南增兵万人，又增设援黔营务处，负责转运粮饷）。1870年4月上旬，席宝田率新募湘军回到贵州，进抵镇远以南二三十里的塘头，连同原有在黔湘军，共三十余营，随即部署向施洞口进攻。

施洞口位于清水江南岸，是镇远入台拱的要隘。苗军首领九大白和报南烧率部坚守施洞口，张秀眉和潘老冒也率部前来助守。湘军占据清水江北岸的金钟山，几次抢渡清水江，都被苗军击退。4月15日（三月十五日），是苗族人民一年一度的“吃姊妹饭”节，苗军放松了戒备。席宝田指挥湘军乘机从上下游暗渡，以一部由正面佯攻，一举袭占了苗军的重要据点施洞口，取得了继续向清水江南岸苗区进攻的出发地。但是，席宝田决定先攻清水江北岸，以期与川军会师。5月，湘军相继攻占新城、瓮板、蓑衣坡等苗军据点。6月上旬，又占领了施秉城南苗军重要据点白洗和岩门司。

与此同时，唐炯指挥的川军相继攻占了黄瓢、白堡、瓮谷陇等苗军堡垒，迫使苗军数千人退守叫鸟碉。该碉“宽广三里余，上下四门曲折相通，中有暗河一道，环护碉门，其内门遍开炮眼，势极坚险”。6月10日，川、黔军各一部联合发起进攻。苗军从洞内开枪开炮，大量毙伤敌人。后清军伐树木数万捆，加上硫磺，堆积洞口，乘风纵火。苗军为烟火熏灼，无法作战。27日，清军进入洞内，将五千余人全部杀害。接着，川军与湘军在瓮谷陇会师。至此，镇远至黄平的驿道被打通了，清水江和重安江以北地区全被清军控制，苗军只得退守江南。

清制，客省军队的军饷应由主省供给，因贵州贫瘠，仍由客省供给。号军失败，苗军退至清水江以南，已不能直接对四川、湖南造成威胁，两省的统治者便不愿出钱为他省代劳。湖南巡抚刘昆强调“湖南自援黔以来，岁需饷银甚巨，积欠已多，湘中近日情形，尚须防维补救，自固根本”，提出湘军拟暂缓南图；在此以前，席宝田以天暑疫作为由，返回湘西沅州，将军事付与唐本有等。四川总督吴棠提出，全撤川师，以月饷五万交贵州，由其自办；接着，唐炯以疫重粮竭为由，率川军撤至平越、瓮安一线。清廷不同意停饷撤兵之议，规定客省军队仍由客省供给军饷，但为了解决粮饷困难，允许裁汰老弱。川军因此军心不稳，提督陈希祥部先溃，其它各部继之。贵州巡抚曾璧光以此弹劾唐炯。清廷令贵州提督周达武（原川军将领）率领本部马步勇丁五千九百余人由川入黔，驰赴本任，唐炯各营分别裁撤，于是贵州与湖南、四川的矛盾暂时解决。

1870年10月，席宝田又指挥湘军，采取先攻台拱周围苗军堡垒，后攻台拱，数路分进，昼夜力攻的办法，大举向台拱地区进攻。已有十余年没有遭受清朝官兵和地主豪绅压迫的台拱苗民，为了保卫家园，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斗争。张秀眉、金大五、杨兄洋等，率军沿途阻击，节节抵抗。但湘军用洋枪、洋炮向苗军坚守的山寨轰击，给苗军造成很大伤亡。不久，山丙、凯塘、革夷等据点相继失守，金大五冲出重围，杨兄洋被俘牺牲。张秀眉见无险可守，主动退出台拱城。11月17日，台拱为湘军占领。

1871年春，清军继续向苗军进攻。贵州提督周达武一面指挥黔军向苗军进攻，一面对苗军首领进行诱降。2月，八寨苗军首领闻国兴（即小播五），为高官厚禄所诱，约同独山大河苗军首领唐大焯降清，“自率团众收复八寨、上江、下江、三脚各城”。都匀、麻哈、清平、黄平等城亦先后为黔军攻占。4月，席宝田指挥湘军攻陷丹江厅城，5月，占领苗军的最后一座城市凯里，接着向苗军占据的雷公山进逼。苗军在张秀眉领导下，撤出雷公山，退守丹江、凯里之间的山区。由于天暑瘴发，湘军停止用兵，战争暂处间歇

唐炯：《援黔录》卷五，第22页。

罗文彬：《平黔纪略》卷十七，第12页。

《贵州通志》前事志三十六，第29页。

状态。

（二）乌鸦坡之战与苗军的失败

1871 年秋，清军继续向苗军进攻。11 月，湘军攻占黄茅岭各寨，尽得苗军存粮。张秀眉、杨大六、姜老拉、潘老冒、九大白、包大度、金大五等苗军将领率苗军和群众二十万人，齐集乌鸦坡。乌鸦坡位于丹江、凯里边境，虽然“冈峦环抱，叠隘重关”，形势险要，但苗军除此之外，据点尽失，二十万人据此弹丸之地，不但没有机动回旋的余地，而且粮秣皆缺，形势极为不利。在这生死存亡的严重时刻，以张秀眉为首的广大苗军将士，主张就地坚守，与清军决一死战。李文彩（原为广西天地会起义军首领之一，后投奔石达开）则认为，在此固守，无异于坐以待毙，因而建议“广集苗船，乘春水涨发，引众浮清水江东走，径指洪江，下趋常德，以扰湖南腹地”。李文彩的方案，没有被张秀眉接受。

1872 年春，湘军和黔军分数路向苗军进逼：湘军唐本有、谢兰阶部由凯里南下，攻乌鸦坡西北，龚继昌、苏元春部由开怀南下，攻乌鸦坡东南，戈鉴部由乌溜前进，与龚继昌等部相犄角；黔军则由漫洞进至舟溪，扼乌鸦坡西南。苗军扼守牙塘、乌遂、猴子坳、小坳等数十寨。4 月 19 日，清军发动进攻。苗军用原始武器与装备洋枪洋炮的清军激战十昼夜，清军每攻占一寨，都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4 月 30 日，苗军各寨先后被敌攻破，各部乘雨夜分头突围。张秀眉、杨大六和九大白等率众由乌堡、冷水沟北走，为清军冲散。负责断后的九大白英勇牺牲。张秀眉、杨大六率余部走雷公山。从 5 月 7 日开始，清军开始搜山。姜老拉首先被俘。张秀眉、杨大六退至乌东山时，仅剩四五百人。在力量极为悬殊的情况下，张秀眉、杨大六仍率苗军战士持短刀死战。后战败被俘，于湖南长沙慷慨就义。潘老冒、金大五、李文彩、金干干、包大度等亦被清军俘获。至此，为时十八年的苗民起义战争在湘、川、黔军的联合镇压下失败了。

（三）新城之战与回民军的失败

当黔东南苗军在乌鸦坡等地与湘、黔军苦战时，黔西南回民军也正在兴义府城和新城浴血奋战，反击滇、黔军的联合进攻。

早在 1864 年 10 月，兴义府代理知府孙清彦等策动驻守兴义府城的回民军都督马忠叛变。张凌翔、马河图闻讯，率军讨伐，马忠弃城逃跑。后马忠引导清军向兴义府城反扑，回民军苦战失利，张凌翔、马河图壮烈牺牲。1866 年 4 月，金万照、张定中等设计杀马忠于新城，并再克兴义府城。张、马牺

牲后，起义军失去了核心领导，金万照名为经略大臣，总理全局，但实际上各不相属，力量逐渐衰弱。当时清军主要兵力用于镇压号军和苗军，对黔西南回民军暂取守势，因此，两军处于相持状态。但是，清军加强了对回民军的分化瓦解，有的起义军将领思想动摇，与敌人暗中勾搭。

1871年11月，原驻守盘江北岸的安义镇总兵何世华率领七营黔军，越过盘江上的铁索桥，向回民军进攻。早已暗通清军的谭五受和杨九（杨树森）公开投敌，何世华部顺利地占领了安南县城，不久进至贞丰州城下。12月19日夜，清军四面逼攻，守城的回民军和岩大五部苗军经激烈巷战后退出贞丰州城。撤退途中，岩大五被俘，英勇就义。之后，何世华指挥黔军和团练向占据兴义府城和新城的回民起义军进攻。起义军顽强抵抗，何世华久攻不下，请求增兵。贵州巡抚派记名道吴德溥、总兵文德盛率黔军赴援；云贵总督刘岳昭和云南巡抚岑毓英派云南盐法道沈寿榕、总兵吴奇忠（即吴元彪）等率滇军入黔，与黔军“会剿”起义军。

1872年3月，吴德溥至普安厅，即通知何世华以一部兵力牵制新城回民军，集中力量先攻兴义府。何世华派部占据兴义府城北万寿山。4月，吴奇忠率滇军赶至兴义府，扎营于城南铜鼓山，随即与黔军合力攻城。张福祿、张福荫率回民军在城内坚守，并伺机出去，屡败清军。5月19日，清军挖地道炸塌城墙数丈，起义军用事先准备好的木石迅速堵住缺口。清军进攻失败，遂施用离间计，使中郎将马宗连等人互相猜忌，并暗中向敌人投降。5月31日夜，在马宗连等的内应下，清军攻入城内。回民军二千四百余人战死，张福祿、张福荫投水自尽，兴义府城为清军占领。

兴义府城失陷后，滇军、黔军和团练集中力量向回民军占据的最后一座城市新城进攻。回民军对新城曾花大力经营，使它成为一个城坚粮足的据点；但另一方面，却忽视了城市外围据点的建设。对于敌人的进攻，回民军采取了单纯守城的方针。新城城池高深坚固，回民军在四周险要之处皆修有石碉，各碉之间均有交通壕相通。回民军白天坚守石碉，夜间则主动出击。1872年4月，吴德溥率所部黔军至新城。同年5月黔东南苗军失败后，贵州提督周达武令原镇压苗军的黔军除以一万五千人留守外，全部调赴新城前线，归何世华、钟开兰统领（合计二十营）。不久，滇军亦从兴义府城赶来。清军兵力不断增加，攻城却毫无进展，不得不采用吴德溥军中英国人麦根之策，沿城掘长壕以作久困之计。回民军被围城中，外援断绝，处境十分困难，但在经略大臣金万照的领导下，仍英勇作战，使清军“动辄受创”。

1872年10月底，贵州提督周达武抵达新城前线。他认为尽管滇、黔军多达数十营，团练数万人，但强攻伤亡太大，“以弹丸黑子之地，至擲万众之命以争之，亦殊得不偿失”，乃下令进行“招抚”。他一面让黔军打出“贵州提督周达武”的旗帜向回民军示威，一面派间谍潜入城内，诱降了一

贯动摇的回军首领张定中。11月5日，张定中将金万照骗出城外，让清军捉获，然后回到城中，命令起义军放下武器。清军随即入城，将起义军将士及其家属残酷地加以杀害。金万照被囚送贵阳，英勇就义。至此，黔西南的回民军也最后失败了。

黔西南回民起义被镇压以后，贵州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并没有停止，但就全省范围而言，较大规模的起义战争至1872年底即基本上结束了。这次战争历时十九年，由汉、苗、布依、侗、水、回、彝、瑶、仡佬等各族人民组成的数十支起义军，攻城略地，纵横驰骋在贵州高原上，不但控制了广大的村寨，而且先后攻陷府、厅、州、县城五十余座，捣毁反动政权机构，惩办贪官污吏。在湘、桂、滇、川、黔五省军队的联合镇压下，贵州各族人民起义战争虽然失败了，但它沉重打击了清王朝及其在贵州的封建统治，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影响和意义是相当深远的。

第二节 云南回民起义战争 (1856年6月—1873年5月)

一、起义的爆发

云南地处西南边疆，境内多山，土地瘠薄，各族人民在清朝地方官吏、土司头人和地主豪强的重重剥削压迫下，生活异常困苦。清政府每年向云南征收赋税达白银四十万四千二百两以上，各级地方政府的费用和官吏的“养廉”以及巧立名目的苛捐杂税，随征科派。鸦片战争失败后的赔款，也分摊到云南各族人民头上，使其负担越来越重。

清王朝为镇压人民的反抗，在云南驻有绿营兵近四万人，每年所需俸饷及军械弹药、恤赏等费甚巨，其中半数以上由地丁银中支取，余由江南各省的协饷银补给。太平天国起义后，江南各省自顾不暇，断绝了协饷银的来源，于是云南地方当局进一步横征暴敛。“军费不足，则加赋税；赋税不足，则抽厘金；厘金不足，则逼捐输”。各地团练更是“任意科敛，弊窦丛生”。云南各族人民遭受残酷的压迫剥削，被迫起而反抗，以致“聚众抗粮”、“闭门拒赋”的现象时有发生。

为转移云南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目标，统治阶级不断挑起民族矛盾和民族纠纷。云南是多民族的省份之一，有汉、回、彝、白、哈尼、壮、傣、苗、景颇等几十个民族。除汉、回两族外，清统治者对其他民族统称之为“夷”。回族人数约占全省人口的十分之一二。由于统治阶级的挑拨，回族和汉族之间不断发生纠纷。早在嘉庆初年，就因回汉上层分子争夺厂矿利益，开始发生仇杀。道光朝以后，回汉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械斗和仇杀的次数越来越多，并愈演愈烈。这种情况，使得云南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1855年（咸丰五年）冬，云南临安府（治今建水）的汉族地主恶霸和楚雄府（治今楚雄）回民为了争夺楚雄府南安州（治今楚雄南）石羊厂银矿，发生纠纷。楚雄府知府崔治中等地方官吏乘机施展“暗中挑拨，意在两伤，借邀功利”的伎俩，“见临人（按：即临安府汉人）势强，则召临人杀回人；见回人势强，又使回人以杀临人”，导致事态扩大，矛盾激化，从争吵发展到回汉械斗。

1856年春，临安汉族恶霸煽动汉人入南安州和楚雄府城捕杀回民，“老

马如龙：《晓谕滇垣坤民》，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回民起义》——以下简称《回民起义》——（二），第72页。

岑毓英：《通筹滇事酌拟八条请旨遵办折》，《岑襄勤公奏稿》卷二，第7页。

马观政：《垣十四年大祸记》，《回民起义》（一），第293页。

弱鲜得免者”。楚雄府的汉族官绅也残暴地屠杀回民。临安汉族恶霸等在广通（今禄丰县广通镇）、罗川（今禄丰县西南）、禄丰等地逞凶之后，拟前往省城昆明屠杀回民，回众起而自卫。新兴（今玉溪）回民首领马凌汉率回民千余，在距昆明二十里的小板桥，将临安汉人恶霸打败。这本来是正当的自卫行动，却被统治阶级污蔑为“纠众谋逆”、“阴谋作乱”。云南巡抚舒兴阿和团练大臣黄琮竟“饬各府厅州县聚团杀回”，署布政使清盛也下达了对昆明回民“格杀勿论”的命令。

统治阶级策划的对云南回民的野蛮屠杀，终于迫使回民群众走上武装起义的道路。同年6月，姚州（今姚安）回民首先起事，7月即攻占州城。各地回民相继响应。在滇西，杜文秀起于蒙化（今巍山），蔡发春起于顺宁（今凤庆），杨荣、虎应龙起于鹤庆、丽江；在滇南，马德新（字复初）起于新兴，马如龙起于临安北面的曲江，马凌汉、杨振鹏起于昆阳（今晋宁），徐元吉起于澂江（今澄江）；在滇东，马联升起于曲靖，马荣起于寻甸。回民起义的烽火遍及云南全境。与此同时，汉族和彝、哈尼、白、壮等兄弟民族也纷纷起义。哀牢山区李文学领导的彝族人民起义队伍，一开始就同杜文秀领导的回民起义军并肩战斗。其他起义队伍也或者单独作战，或者与回民起义军彼此支援，相互配合，有的则直接参加了回民起义的行列。这时，虽然民族仇杀事件在不少地区仍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但是以杜文秀为代表的各族人民群众，通过斗争实践，逐步认识到封建官吏和地主武装团练才是回汉仇杀的真正罪魁祸首，是各族人民共同的敌人，从而摒弃民族相仇的偏见，走上了共同反对清朝封建统治者的武装斗争道路。

二、滇东、滇南起义军的反清斗争

以回民为主体的云南各族人民的大起义，极大地震动了清廷。咸丰帝（清文宗奕訖）立即令正在贵州镇压人民起义的云贵总督恒春折回云南，“痛加剿洗”。但自太平天国起义以来，清廷不断征调各省清兵赴江南镇压太平军，云南防军也“半经外调”，所剩清军不敷派遣，顾此失彼。回民起义军正是趁此有利时机，迅速发展力量，开展反清斗争。

滇东、滇南各族人民起义之初，组织比较分散。曲靖、临安、东川（治今会泽）、开化（治今文山）等府和广西州（治今泸西）的许多小股起义军，各自为战，击败了前来“围剿”的清军和地主团练武装，进而主动进攻，围攻敌人盘踞的城市。滇东起义军控制了平彝（今富源）至嵩明之间的大道。徐元吉部回民军则占据了接近省城昆明的澂江府城。随着斗争的发展，各地起义军力量不断壮大，并逐渐从互相支援发展到联合行动。1857年夏，马如

岑毓英：《云南通志》卷一七，第1页。

马观政：《滇垣十四年大祸记》，《回民起义》（一），第294页。

龙、马德新、徐元吉等率领滇东、滇南回民起义军二万人，经晋宁（今昆明市晋城）、呈贡向昆明进发。当时昆明城中清军很少，团练因无人督率，纷纷溃散。云贵总督、云南巡抚和团练大臣等束手无策，只得紧闭四门，等待援军。7月12日，起义军占据距城仅五里的江右馆为大营，分据大树营、王家桥、堡基、马街子、碧鸡关、红庙、西坝等村寨，随即发动对省城的围攻。城内粮源断绝，战守无兵，云贵总督恒春无计可施，自缢而死；巡抚舒兴阿也“引疾乞假”，藏匿家中。

其时，清廷正忙于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无力顾及云南，只得调四川总督吴振械为云贵总督，带川兵二千名赴任。吴振械慑于起义军的声威，一面奏请清廷将“主剿”回民的团练大臣黄琮、窦垵革职，以麻痹回民的反抗意志，一面召请在外省任职的云南籍回族官员回滇，以拉拢和收买回民军首领。滇东、滇南起义军的主要领导人马德新和马如龙都是回族上层分子（马德新是云南回民的总掌教，马如龙则是出身于官宦之家的清朝武生），他们公开声明，起兵“止欲报仇，不敢为逆”，只要当局惩办“倡首灭回者，以服众心，即行解散”。由于他们根本没有触动清朝反动统治的决心，因此，在统治阶级的利诱之下，于1858年春与官方订约，承诺“永不滋事”，并将围攻省城的起义军撤离，散归各地，滇东、滇南起义军第一次围攻省城遂告结束。

三、滇西起义军的胜利发展

（一）大理革命政权的建立

当滇南、滇东回民起义军由于马德新、马如龙等人的妥协遭受挫折的时候，滇西回民起义军在杜文秀的领导下，不断地发展壮大。

杜文秀（1828—1872）字云焕，号百香，云南永昌府保山县金鸡村人，回族。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永昌府汉族地主团练组织“香把会”，在官府的支持和纵容下，大肆残杀回民。杜文秀以家属被杀，未婚妻被掳，于1847年上京控诉，但冤仇终不能伸。失望之余，他逐渐认识了清王朝的腐败，激发起反抗清王朝民族压迫的革命思想。回到云南之后，便在云州（今云县）、蒙化等地暗中组织回民，酝酿起义。

1856年8月，杜文秀乘云南提督文祥率兵离大理赴楚雄的有利时机，在蒙化率众起义。9月7日，杜万荣、蓝金喜在大理府城起义。杜文秀闻讯，立即率起义军前往大理，与当地回民会合，大败清军，毙迤西道林廷禧、太和（今大理）知县毛玉成等。9月16日，大理知府唐惇培败逃宾川（今宾川

《平定云南回匪方略》卷五，《回民起义》（一），第322页。

马观政：《滇垣十四年大祸记》，《回民起义》（一），第295页。

南)，起义军胜利占领大理城。夺据大理的胜利，使一部分起义军首领昏昏然，他们不去组织力量防御清军的进攻，却自恃有功，争权夺利。有的起义军首领抱有传统的民族偏见，任令部众抢掠汉人，引起群众不满。这时，杜文秀挺身而出，组织指挥部众粉碎了鹤丽镇千总张正泰对大理的进攻，并且明确提出：“欲做大事，必须收拾人心，不宜专尚威力。且汉众回寡，尤须重用汉人。”杜文秀的正确主张，得到大家的赞同。由于他“精力强壮，忠直廉洁，素为众人所敬仰”，遂被推举为总统兵马大元帅。10月23日，滇西回民起义军齐集大理校军场，筑坛拜帅。杜文秀以原提督署为大元帅府，组织大理革命政权。授蔡发春为扬威大都督，总各路军事，其他文武官员也各有职称。宣布“遥奉太平天国南京之召号，革命满清”，并通令“改正朔，蓄全发，易衣冠”，以示推翻清朝反动统治的决心。

杜文秀“总统兵马大元帅”印

为了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杜文秀领导下的大理政权制定各种法律法令，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革命事业的方针政策，主要是：

第一，对各族人民一视同仁，平等对待，改善民族关系。还在起义之初，杜文秀就提出了“重用汉人”的正确主张，大理政权建立以后，即实行“不分汉回，一体保护”的方针，对其他民族，也采取同样的政策。杜文秀制定的《管理军政条例》规定：“族分三教，各有根本，各行其是。既同营干事，均宜一视同仁，不准互相凌虐。”这种“无分汉回夷，一以公平处之”的民族政策，改善了大理政权控制地区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得到了他们的拥护和欢迎。

第二，减轻人民负担，努力发展生产。大理政权规定废除丁银（人口税）和其它苛捐杂税，田赋只征粮米；“地方税课，旧有例者，方准抽收。不得私加名目，妄自征收”，以减轻人民负担。同时，大力发展生产。农业方面，发放耕牛、农具，招民垦荒，奖励农耕。对工商业，采取保护和促进的政策，严禁文武官员“以官压市，轻价估买”，积极发展纺织、采矿、制盐等工业生产。随着生产的发展，不但人民生活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而且使起义军有充足的军饷，保证了革命战争的进行。

周宗麟等：《大理县志稿》卷八，《回民起义》（一），第29页。

[法]罗舍：《云南回民革命见闻秘记》（李耀商译），第8页。*

周宗麟等：《大理县志稿》卷八，《回民起义》（一），第29页。

杜文秀：《管理军政条例》，《回民起义》（二），第118页。

《新兴河西纪闻》，《回民起义》（二），第65页。

杜文秀：《管理军政条例》，《回民起义》（二），第112页。

杜文秀：《管理军政条例》，《回民起义》（二），第113页。

第三，制定军事制度，严格组织纪律。起义初期，凡属回民青壮年都要当兵。大理政权建立后，规定回族三丁抽一，五丁抽二；对汉族和其他民族，则分派一定的数额，由其各自出兵。起义军的编制，以十人为什，百人为棚，什有什长，棚有参军或参谋，三五棚有一统领或都统率领，十棚以上有将军或都督统率，将军、都督以上则有大司、大将军、大都督和元帅。一切军机事宜，须集体商酌，最后由元帅裁决。遇有大的军事行动，派出统带官作为元帅代表统率部队，带兵官不论何职，都要服从统带官的指挥。起义军中有严格的军纪和赏罚制度，鼓励将士服从命令，英勇作战。杜文秀还特别强调群众纪律，规定起义军不得“无故下乡，滋扰良民”，或“故意纵放牲畜，践踏田禾”，严禁“毁拆庙宇，扰害民房”，不准“强买估卖”等等。以上规定和军纪，保证了起义军的兵源，统一了帅府的军事指挥，取得了人民的信任和支持，提高了起义军的战斗力。

（二）粉碎清军的多次“进剿”

大理背靠苍山，面向洱海，以上下两关为咽喉，地势极为险要。大理革命政权建立之后，杜文秀领导起义军利用良好的地理条件，修营筑垒，屯集粮草，做好了防御敌人进攻的准备，从而使处于劣势的起义军，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武装“进剿”，保卫了革命政权，并使起义军队伍和控制地区不断发展壮大。

千总张正泰失败之后，清军又多次组织力量向大理进攻。宾川团练头目董家兰和太和县逃亡地主豪绅赵云寿、李根香等人组织“义兴营”团练军，联合败退到鹤庆的张正泰和屯扎姚州的提督文祥所部清军，企图摧毁大理革命政权。1857年夏，文祥指挥清军进攻下关东面的赵州。时值滇东、滇南起义军围攻昆明，滇西起义军便乘机袭击文祥部后路。清军腹背受敌，溃不成军，文祥退回镇南州（今南华），弥渡和云南省（今祥云）为起义军占领。1859年2月，董家兰指挥“义兴营”团练军水陆两路对大理发动突然袭击。潜伏在大理城下的数百名练勇利用夜暗，用棺木装火药将城墙炸开，夺占了东门城楼，但从洱海进攻的团练主力因遇到大风浪，未能按期到达，以致对大理的袭击又遭失败。不久，董家兰因援邓川（今洱源东南）被起义军击毙，张正泰亦因内讧被部下杀死。张董二人既死，所部团练军一蹶不振，陆续被起义军消灭。于是滇西起义军声势大振，乘机向四外发展。统治阶级惊恐万状，以致“是时无敢言复大理者”。

因清军屡败，新任云贵总督张亮基于1860年1月奏请以总兵褚克昌署理云南提督，办理滇西军务。褚克昌率兵西上，经禄丰、楚雄，于3月间至

杜文秀：《管理军政条例》，《回民起义》（二），第118—119页。

徐元华：《咸同野获编》，《回民起义》（一），第283页。

镇南州，接任提督。他一面分兵进攻起义军占据的姚州、大姚，一面率主力继续西进。起义军为了收缩兵力，主动放弃沙桥（镇南西北）、云南驿（云南县东南）等据点，退守云南县城。褚克昌尾追至云南县城下，指挥所部清军进攻县城和弥渡、红岩（弥渡西北）等地。面对褚克昌部清军的大举进攻，杜文秀一面派人发动滇东、滇南回、汉、彝各族人民起义，以牵制清军，一面催调正在进攻缅宁（今临沧）的大都督蔡发春率军回援。同时，致书澂江马德新，请求派兵支援配合，以切断褚克昌部的后路，造成东西夹击的态势。

1858年，滇东、滇南起义军从昆明撤围散归各地之后，当时任巡抚的张亮基即调集清军向回民进攻，回民被迫起而自卫。马德新、马如龙因个人目的没有得到满足，也乘机再次起兵，于是滇东、滇南回民起义军又得到了发展。1860年春，马如龙受马德新之命，率部西援，4月底与李芳园部会合，共万余人，由南安州直逼楚雄。5月3日，攻克广通。5日，在回箐关（广通西南）大败楚雄援军，毙游击高天泽。8日，又在小腰站歼灭楚雄清军千余人，毙千总苏镇东。“楚雄得力将弁，无出高天泽、苏镇东右者，相继败没，兵勇夺气。”5月21日，滇东、滇南起义军包围了楚雄府城。

连败两仗、士气低落的楚雄清军无力阻挡起义军的锐利攻势，楚雄知府杨颢向褚克昌求救。褚克昌正在进攻弥渡、红岩，无兵可派，只得尽撤镇南大营清兵赴援楚雄。6月4日，褚克昌亲抵楚雄府城。马如龙、李芳园指挥起义军昼夜围攻，于6月11日，用地雷轰塌城垣二十余丈，攻入城内。清军一部投降，大部被歼。知府杨颢、副将庆连等被打死，褚克昌逃往镇南。

起义军攻占楚雄，不但切断了清军的后路，而且由于清军官兵的父母妻子多寓居楚雄，以致军心瓦解，无意作战。尽管褚克昌部将杨有才、张玉柱所部清军攻占了弥渡和红岩，却无法摆脱这种不利的困境。而此时滇西起义军又从西面发动了强大的攻势，使清军腹背受敌，更形狼狈。起义军大都督蔡发春于1860年4月底攻陷缅宁后，即率领云州、顺宁、蒙化、缅宁起义军二万余东下，杨德明等也率大理、蒙化起义军八千余人，在云南县与之会合，联合向弥渡、红岩等地进攻。连日交战，清军伤亡惨重，褚克昌得力将领张福保、杨有才、陈开榜、王有才等被打死。褚克昌慌忙从镇南回到云南县大营指挥作战，仍无法挽回败局。清军粮尽兵溃，游击张玉柱、守备孙占魁率部投降起义军，红岩、弥渡先后失守。起义军随即进攻云南县清军大营，并分兵一路，由虎应龙、保文明、桂春亮率领，北攻宾川。这时马如龙率领的滇东、滇南起义军也先后攻占了南安州、镇南州和定远（今牟定）县城，控制了楚雄府全部州县。褚克昌见处在起义军东西夹击之下的云南县清军大营危在旦夕，便以往援宾川为借口，率部撤离，仅留守备周士杰等防守。蔡发春便集中兵力猛攻云南县清军大营，经十几天激战，全歼守敌，接着又转攻宾川。褚克昌扎营于宾川县城以北的太和村。蔡发春率起义军赶到后，首

先占据宾川北山，切断清军粮路，然后实施包围。8月18日，起义军发起进攻，9月9日攻破宾川清军大营，全歼守敌，并杀死褚克昌。褚克昌全军覆灭，云南清军闻风丧胆，“自此愈不敢言西上矣”。

这时的形势对回民起义军非常有利，如果杜文秀和马如龙加强团结，把滇西和滇东、滇南起义军统一起来，或者继续维持一定形式的联合，乘胜出击，扩大战果，则有可能置敌人于死地。但是，马如龙自谓有功，不愿居杜文秀之下，竟率滇东、滇南起义军返回澂江。不久，马如龙等第二次围攻昆明，徐元吉牺牲，围城仅十日即被迫撤围。

在杜文秀的指挥下，滇西起义军迅速扫清了大姚、姚州等地的残余清军，各将领乘胜向滇西各地清军发起进攻。蔡德春到楚雄与已参加了滇西起义军的李芳园会合后，于11月率军攻占了禄丰县和安宁州城。与此同时，陈义、杨德明、马金保、张遇泰等率部攻占了鹤庆、剑川和丽江城；虎应龙、桂春亮率部进攻永北厅（治今永胜）；蔡发春则率部返回云州、顺宁，转攻永昌府（治今保山）。1861年3月，蔡发春、陈义率部由南北两路包围了永昌府城，经数月围攻，于7月底攻克。8月，杨荣、张遇泰克云龙州城（今云龙），姚得胜、保文明、虎应龙克永北厅城。9月，马成克龙陵厅城。10月，蔡发春、马国玺克腾越厅城（今腾冲）。在此期间，滇西起义军还粉碎了署云南提督申有谋进攻大理的阴谋，夺回了被清军一度占领的广通、禄丰等城。申有谋狼狈不堪，率残兵不足千人逃回省城。至此，西达龙陵、腾越、云龙、永昌，东至楚雄、广通、元谋、禄丰，南至缅甸、顺宁、云州，北抵剑川、鹤庆、丽江、永北，滇西二十余厅州县都在大理政权的控制之下。

（三）杜文秀反对投降，坚持斗争

1861年底，马如龙联合昆阳杨振鹏和新兴田庆余部回民军，再次向昆明进发，开始对省城的第三衣围攻。1862年（同治元年）初，云南府所属各州县大都被起义军占据，昆明成为一座孤城。当时，兼署云贵总督的云南巡抚徐之铭迫于形势，改变了一意主剿的态度，一面准备向起义军发动军事进攻，一面派署提督林自清和署澂江知府岑毓英到起义军中“议和”，用高官厚禄引诱他们投降。马如龙认为机会难得，立即拜倒在敌人面前，声言“世受皇恩”，“志在报效，历年汉回仇杀，不得已铤而走险，非敢叛逆，今愿率众投诚”。1862年3月，马如龙、马德新、杨振鹏等人正式向敌人投

徐元华：《咸同野获编》，《回民起义》（一），第283页。

张遇泰系张正泰之弟，张正泰进攻大理失败，为部将所杀后，张遇泰与姚得胜等人赴大理加入了滇西起义军。

《平定云南回匪方略》卷十三，《回民起义》（一），第356页。

岑毓英：《云南通志》卷一九，第25页。

降。为了表示对清朝的“忠顺”，马如龙等亲自到各地说降，胁迫起义军将士解散或撤退，将起义军占据的昆明四周的昆阳、新兴、晋宁、呈贡、嵩明、罗次、易门、富民等城拱手献给清军。他们的叛变行径受到了统治阶级的赏识，清廷授予马如龙“署理总兵”的官职，授予马德新以“二品伯克”之衔。

马如龙、马德新等降清后，杜文秀继续坚持反清斗争，滇西起义军成为统治阶级的心腹之患。马如龙、马德新等人在云南督抚大臣的授意下，接二连三地对杜文秀进行诱降活动。1862年夏，马如龙写信给杜文秀，并派杨振鹏前往大理，一面以高官厚禄诱劝杜文秀投降，一面以军事进攻相威胁。马如龙在6月2日（五月初六日）的信中声称：“如以和为非，则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官处必发兵西向。此时两迤（指滇东、滇南）既和，迤西（即滇西）孤立。前省〔军〕西发，每为东南所扰，故尔无功返。……刻下省垣无南顾之忧，官兵得专西伐之力，则迤西虽有数城之众，恐难敌全省之师。尔时欲迤南赴援，弟等已授职官，宜报朝廷，必无赴救之理。”杜文秀既不为高官厚禄所动，也不理睬马如龙等的恐吓。在给杨振鹏的信中，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官府的所谓和议，“不过因江南未靖，西洋复来，各省纷争，天下鼎沸，暂为缓此急彼。俟彼处稍定，必将举全师以压我境。迨至彼时，〔我兵已散，我将各离，〕始知朝廷包藏祸心，则谋不及施，勇不及逞，嗷嗷待毙，悔之晚矣！”6月下旬，杨振鹏到达大理，杜文秀仍严词拒绝，“坚执不从”。1863年夏，马如龙又派他的亲信马负图到大理劝降，杜文秀斩钉截铁地回答：“马云峰（马如龙号云峰）做马云峰的官，我杜文秀造我杜文秀之反。想我杜文秀归顺，除非黄河水清。不然，万万不能。”1864年，马德新亲自出马，前往大理游说。杜文秀仍然拒绝讲和，说他“看不起那些身为革命领袖，倒反去接受压迫者手下的一点官职”。这铿锵有力的言词，表现了杜文秀与清廷势不两立的坚定立场，粉碎了统治阶级的招降阴谋。

四、滇西起义军东征昆明（参见附图十一）

（一）东征前的形势

1863年6月，清廷调前两广总督劳崇光为云贵总督。劳崇光令署云南提督马如龙防守省城，筹集粮饷军火；令署理布政使岑毓英率军进攻滇西。8月，岑毓英率清军从昆明出发，于11月20日占领楚雄。此后，岑毓英以楚雄为基地，分兵向大理进犯。清军虽先后占领了大姚、永北、邓川、宾川、

马如龙：《致杜文秀书》，《回民起义》（二），第100页。

杜文秀：《复杨振鹏书》，《回民起义》（二），第105页。

马负图：《马负图私记》，《回民起义》（二），第376页。

〔法〕罗舍：《云南回民革命见闻秘记》（李耀商译），第31页。

浪穹（今洱源）、赵州、云南、鹤庆、丽江等地，逼近大理的南北门户上下两关，但岑毓英所率主力却被起义军阻挡于镇南和姚州，无法前进。1864年2月，起义军在上关大败清军，并收复邓川、浪穹、鹤庆、丽江；不久，又败敌于下关，收复云南、赵州、弥渡。杜文秀乘胜派马得才率领援军从弥渡、三街间道插到镇南清军侧后，突然向敌人发起猛攻。清军大败（岑毓英也头部中枪），狼狈逃回楚雄。

粉碎岑毓英部的进攻之后，杜文秀领导滇西起义军乘胜向外发展，南面达于镇沅，北面达于维西。至1866年初，起义军控制了滇西二十三座城市，对清廷在云南的统治造成极大的威胁，于是，云贵总督劳崇光认为，“当以征剿迤西为急”。3月，劳崇光到达昆明，便积极部署对大理的进攻。

经过将近一年的准备，署云南提督马如龙率领兵练八千九百余人，于1867年2月由昆明出发，并指挥督标中军副将杨振鹏、楚雄协副将李维述、参将杨先芝、游击合国安、昭通镇总兵杨盛宗、腾越镇总兵田仲兴、普洱镇总兵李锦文等部清军和地方团练，分数路向滇西进攻。清军虽然兵力不少，但士气低落，特别是其中的回民将领和士兵，大都不愿同滇西回民军打仗，加之遭到起义军的顽强抵抗，兵疲粮缺，进展缓慢。起义军除在各地坚守外，杜文秀又派出部队袭击清军的后路。清军惊慌失措，李维述败于镇南，杨振鹏溃于宾川，杨先芝、合国安溃于姚州，楚雄、大姚两地的清军先后告急。杨盛宗、田仲兴等也因粮饷不继，分别从永北、蒙化、威远等地败退。马如龙见败局已定，遂托病由定远撤军，逃回省城。回民起义军占领定远、大姚之后，进而包围了楚雄。

马如龙进攻滇西及其失败，是一个重要的事件，它对杜文秀的影响极大。在此之前，杜文秀虽然拒绝了统治阶级的诱降，但对马德新、马如龙等的叛徒嘴脸缺乏应有的认识，由于民族和宗教等方面的原因，与他们撕不破脸皮，反而与之达成协议，以楚雄、镇南东西分界，“各守疆界，各行其是”，“不相侵犯，仍通互市”。为恪守协议，杜文秀主张首先巩固滇西，必要时向川、黔发展，以避免与马德新、马如龙发生冲突。尽管由于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云贵总督劳崇光力主“进剿”，清军对大理政权的威胁越来越大，杜文秀仍然不准备向东发展。迨至马如龙进攻滇西，首先毁约，杜文秀才感到如果仍遵前约，无异于作茧自缚，加上这时清廷在云南的统治力量比较薄弱，劳崇光病死后，斩任云贵总督张凯嵩托病逗留四川，新任云南巡抚刘岳昭所率湘军尚在贵州，布政使岑毓英率所部清军赴贵州镇压猪拱箐、海马姑苗民起义未归，仅马如龙率一万五千残兵败将，龟缩省城。因此，杜文秀提议趁机东征昆明，并为绝大多数起义军将领所接受。

《平定云南回匪方略》卷二十七，《回民起义》（一），第408页。

杜文秀：《复杨振鹏书》，《回民起义》（二），第107页。

岑毓英：《云南通志》卷一一，第37页。

为大举东征，杜文秀发布了《帅府布告》、《誓师文》、《兴师檄文》等文件。在《誓师文》中说：“此次出师，本为兴汉，戒勿滥杀。如临其境，如遇其民，各当发明宗旨。但得汉回一心，以雪国耻，是为至要。”“战胜攻取之际，毋肆掳掠，毋贪财货，毋凌妇女。遇官吏顽梗不服者，杀之。良善被挟者，抚之。诸恶元凶，法所必诛，严加惩办，理宜不赦。”同时，传檄全省：“滇南一省，回汉夷三教杂处，已千百年矣。出入相友，守望相助，何尝有畛域之分？慨自满清僭位以来，虐我人民二百年余[于]兹矣。”可恶，妖官“置苍生亦[于]不问，弃黎庶其如遗。甚至汉强则助汉以杀恶，回，回强则助回以杀汉，民不聊生，人心思乱。”“本帅目击时艰，念关民寘[瘼]，不忍无辜之回为汉所杀，更不忍无辜之汉被回所，伤。爰举义师，以清妖孽。志在救劫救民，心存安回安汉。”这些文告，控诉和揭露了清朝统治阶级制造民族矛盾，挑起民族仇杀的罪行，进一步阐明了以反清为主要目标的革命立场，提出了团结回汉各族人民共同进行斗争的方针政策，同时，对起义军规定了严格的群众纪律。这就从政治上打击了敌人，动员和争取了各族人民积极参加东征昆明的战争。

（二）昆明外围的激烈争夺

粉碎马如龙对滇西的进攻并进行必要准备后，杜文秀调集大理、楚雄、丽江、永昌、顺宁、永北、蒙化等地起义军十万余人（一说二十余万），由十八大司统率，分兵四路，向云南省城昆明发起大规模的进攻。其部署如下：北路由大司衡杨荣、大司阉马旭、大司勋米映山率领，从定远出发，占领琅黑等盐井、罗次、武定、富民后，进攻昆明城北；西路由大司政刘诚、大司令马清、大司藩安长兴、大司隶刘纲率领，在占领禄丰、易门、安宁、碧鸡关后，进攻昆明城西；东路由杨威大都督蔡廷栋、大司平马兴堂、大司寇李芳园等率领，从大姚出发，攻占元谋、禄劝、柯渡、杨林等地后，攻昆明城东；南路由大司戎马国春等率领，在占领楚雄、南安、广通等地后，攻昆明城南。杜文秀坐镇大理，指挥各路大军。

防守昆明的清军，是马如龙所部残兵败将，无法与起义军相抗衡。正在贵州与起义军作战的云南巡抚刘岳昭，令业已镇压了贵州猪拱箐苗民起义军刚回到云南的布政使岑毓英“严扼曲靖，控制省城”。岑毓英驻军曲靖，派出一万一千余清军赴援昆明、楚雄等地，企图阻挡起义军向昆明的进军。

十万起义军分路并进，尽管围攻楚雄的起义军暂时受阻，但其余各部进展颇为顺利。1867年9月，起义军占领黑、白、琅等盐井，控制了盐井的税

杜文秀：《誓师文》，《回民起义》（二），第127页。

杜文秀：《兴师檄文》，《回民起义》（二），第131页。

《平定云南回匪方略》卷三十，《回民起义》（一），第420页。

收，断绝了云南反动当局至关重要的财源；随后，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连陷广通、禄丰、南安、元谋、武定、禄劝，切断了楚雄与昆明的联系。楚雄清军孤立无援，军火粮饷皆缺，12月18日，起义军一举攻占了该城。至此，起义军控制了滇西全境，后路毫无牵掣，军锋直指昆明。

1868年2月19日，杨荣等部北路军攻陷富民，西路军占领安宁。20日，上述两路起义军进至昆明城郊：北路军由富民进占昆明西北的团山、大普吉、梨烟村、夏家窑一带；西路军由安宁攻占昆明西面的碧鸡关、高嶂、梁家河、普坪等村寨。28日，南路军攻陷易门。起义军东征的节节胜利，使清军中的许多回族将领备受鼓舞，昆阳杨振鹏、新兴田庆余、澂江张元林、曲靖马天顺、寻甸马世德等，“悉举所据地方响应”，杜文秀均授予大司之职。3月9日、10日，在杨振鹏、田庆余等配合下，南路起义军袭占了晋宁、呈贡，随后即进占昆明城南的西岳庙、五华寺等处。至此，起义军从北、西、南三面包围了省城昆明。护理云贵总督宋延春惊呼：“人心惊惶，省城危在旦夕”。

清廷令云南巡抚刘岳昭率领所部湘军火速由黔入滇，以解昆明之围。在刘岳昭到达之前，防守昆明的署提督马如龙因在城外作战屡败，退入城内，采取“以防为剿”的方针，坚守不出，等待援军。他以“谋叛”的罪名捕杀了总兵合国安等数名回族将领，设立巡防总局，强迫军民日夜登城防守，并以自己和劝捐得来的资财充当军饷，以安定军心。

在有利的形势下，兵力居于优势的起义军不是一鼓作气向昆明城发动猛攻，而是列兵城下，利用附城的寺庙、堡寨，筑墙挖壕，企图凭借坚固的营垒“坐困”清军。这种持久围困的方针，使清军争得了时间，以调整力量、调派援军向起义军反扑。无疑，这对于远离根据地的起义军是极为不利的。而且，起义军虽然包围了昆明，但对城东封锁不严，金马寺至宜良的通道没有完全截断，城内清军仍可由此得到粮食接济以苟延残喘。起义军为阻截岑毓英的援兵，曾准备控制曲靖，由于行动不迅速果断，此计未行，而岑毓英的援军已进到昆明城下，从而使形势变得复杂起来。

1868年3月6日，岑毓英督率三万余清军，由曲靖赴援昆明：游击杨玉科率兵一部绕道四川会理，出奇兵抄袭起义军后路；岑毓英自率主力，进攻昆明城外的起义军。为了达成进攻的突然性，岑毓英扬言师出陆凉（今陆良），实际取道马龙、宜良，于3月14日秘密地进至离昆明七十里的七甸。随即指挥清军由黄土坡、水海子一带向起义军进攻，数日之内即占领了大小石坝、小板桥、官渡等地，切断了呈贡和江右馆起义军大营之间的联系。为了夺回小板桥要隘，扬威大都督蔡廷栋、大司戎马国春会同大司略杨振鹏、大司抚田庆余等率领数万起义军，于3月25日由呈贡猛攻该处清军。清军

周宗麟等：《大理县志稿》，《回民起义》（一），第36页。

《平定云南回匪方略》卷三十二，《回民起义》（一），第428页。

扼守要隘，以逸待劳，顶住了起义军的锐利攻势。待起义军疲惫之时，清军猛然出击，将起义军战败。接着，清军又攻占了昆明城东金马寺、古庭庵、大树营等地。这时岑毓英部副将杨国发等亦在杨林、大板桥等地扎营，准备进攻嵩明、寻甸。这样，就打通了省城东面的通道，保证了城内外清军的粮饷供给。

岑毓英指挥清军继续向江右馆、石虎冈等起义军据点进攻。起义军凭借坚固的工事，顽强抵抗。由于这些据点挖有地窖、交通壕和池塘，清军开花大炮的威力无法充分发挥，因此进攻难以奏效。同时，为了牵制进攻的清军，并重新控制滇东通道，切断清军的粮食补给，驻守晋宁的大司治张元林在击败临安兵练之后，乘胜进攻呈贡清军军营；蔡廷栋、李芳园联合寻甸、嵩明等地起义军，猛攻岑毓英部清军占据的杨林。呈贡、杨林同时吃紧，岑毓英“以杨林为东路咽喉”，只得“先其所急”，于5月7日亲自率部增援杨林。

5月上旬，新任云贵总督刘岳昭率二万余清军由贵州毕节到达曲靖，他认为“心须进攻寻甸，方可早解省围，争保东路”，因而决定亲率所部湘军往攻寻甸，令新任云南巡抚岑毓英配合马如龙解昆明之围。岑毓英在解了杨林之围后，于7月初回到昆明城外距城十二里的响水闸大营，继续向昆明城郊起义军据点进攻。清军以巨大的伤亡为代价，占领了地处呈贡、宜良进省要道上的石虎冈和另外少数几个据点，但由于寻甸、濠江、新兴等地起义军不断供应粮米弹药，围城起义军仍可以凭借工事长期固守，使清军无法解除省城之围。因此，岑毓英决定改变战法，由马如龙坚守昆明，以一部兵力牵制围城起义军，而以主力围攻昆明外围州县的起义军，企图先“去其羽翼”，然后集中力量消灭孤立无援的围城起义军。8月，岑毓英率其主力亲赴呈贡前线，指挥清军作战。这样，连同杨玉科部滇军在内，清军在昆明外围东、南、北三个战场上，与起义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

1. 呈贡、晋宁之战

晋宁、呈贡为昆明以南的重地，在昆阳、新兴等地起义军的支援和配合下，驻守晋宁的大司治张元林、驻守呈贡的大将军马开义各率起义军英勇作战，多次击败敌之进攻。岑毓英到呈贡前线时，正值晋宁和昆阳起义军在击败临安兵练之后，前来救援呈贡，他趁晋宁城内起义军兵力薄弱之机，令署总兵梁士美部偷袭晋宁。8月19日傍晚，梁士美遣其弟梁士伟率军由江川（今江川江城）出发，夜行八十余里，绕过起义军的营垒，于20日凌晨前抵达晋宁城外。守城起义军疏于防守，清军夺门而入。大司治张元林率起义军英勇反击，驻扎城外的起义军也入城与之配合，挫败了敌人一举夺占全城的阴谋。岑毓英一面令游击何秀林、王正坤等猛攻呈贡，牵制起义军兵力，一面派游击岑宽德、都司刘重庆等带兵二千六百人由水路援晋宁。梁士伟因在城内进攻受阻，即分兵一部，与援军内外夹攻，占领了晋宁城外四乡。昆阳杨

振鹏率起义军援救，遭水陆两路清军阻截，未能到达。8月底，清军攻占晋宁北面的归化，截断了晋宁、呈贡之间的陆路交通。接着，岑毓英又派总兵马忠等带兵三千名，由归化向晋宁进攻，截断了晋宁通澂江、昆阳的通道。晋宁起义军孤立无援，形势危急，但张元林仍率起义军在城内与敌人相持。

岑毓英见晋宁一时难以攻下，便令何秀林、王正坤日夜不停地猛攻呈贡。尽管晋宁危急，呈贡后路已断，起义军仍英勇奋战，打退了清军的多次进攻。9月29日，岑毓英“传齐各营，填壕而进”。清军四面架梯登城，冲入城内。起义军与清军展开巷战，奋战一夜，大将军马开义等三千余人英勇牺牲，呈贡终于失守。

清军攻占呈贡后，岑毓英即令何秀林率部攻澂江，王正坤率部助攻晋宁，他本人亦驰赴晋宁督战。杜文秀为救援晋宁起义军，派张禧和马天朝率援军万余人前往，扎营于城西南的观音山一带。澂江起义军也前往支援，扎营于城东的盘龙寺。为了阻止援军与城内起义军会合，岑毓英又调派张保和等率兵三千余赶至晋宁。11月2日，清军向观音山进攻，经过激战，起义军受挫，马天朝等牺牲。从澂江前来的援军亦因何秀林部清军进攻澂江而撤走。在晋宁起义军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清军于11月3日发动总攻。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战，起义军弹药告竭，将士一千余人壮烈牺牲，张元林仅率少数人突出重围，转移至澂江。自8月20日清军攻入晋宁城内，至11月4日晋宁失守，起义军与清军在城内日夜交战，相持七十七日之久，充分表现了起义军将士英勇顽强的战斗意志和牺牲精神。

呈贡、晋宁先后失守，澂江日益孤立。张元林在作战中身受重伤，退入城内后，思想动摇，暗中向清军乞降。11月27日黎明，清军乘起义军不备，在张元林接应下，突然攻城。中郎将张鹏程等一千余起义军将士在战斗中牺牲，澂江落入敌手。

清军在南面战场上的胜利，打通了由省城通滇南的通道。岑毓英随即进驻省城昆明，与马如龙一起策划向起义军进攻。起义军由于丢失了呈贡、晋宁、澂江等重要地区，昆明城下部队的侧后暴露在敌人面前，处境十分不利。

2. 富民、武定之战

为了牵制起义军的兵力，截断围攻昆明起义军的后路，杨玉科曾奉岑毓英之命，率领清军数千人，由东川绕道四川会理州，从阿鸡鲁渡口渡过金沙江，进入云南。杨玉科联络当地的团练武装，采取声东击西的手法，于1868年3月相继袭占了大姚县的苴却（今永仁县城）、元谋等地；4月，又占领了武定、禄劝。5月，驻守罗次的征南大将军张遇泰不战而降。随后，杨玉科率清军向富民进攻。

杨玉科部的迂回行动，威胁着起义军的后路。为了改变这种不利局面，杜文秀派大司卫姚得胜等率军数万由大理东援。6月中，起义军由大姚、禄丰、富民三路齐进，分攻元谋、罗次、武定。杨玉科在富民连吃败仗，只好收缩兵力，退守罗次。驻守富民城的大司衡杨荣率起义军尾追敌人，与禄丰

起义军一起进攻罗次城。清军接连失败，杨玉科又被迫率部退守武定。起义军在收复元谋、罗次之后，立即集中兵力于武定方向，迫使岑毓英再次派兵前往增援。杨玉科在武定修筑土城碉楼，妄图扼险顽抗。起义军以湿木柴堆积成比城楼还高的柴楼，上面架设枪炮，轰击城内清军。柴楼遭清军破坏，起义军又挖掘地道，埋设地雷炸城，终于在11月1日占领了武定州城和禄劝县城。

3. 寻甸之战

1868年3月，当滇西起义军进至昆明城郊时，马如龙部将杨先芝、马天顺、马文成等率部倒戈响应，随即东进占领了寻甸和嵩明州城。寻甸、嵩明是昆明东北的门户，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寻甸、嵩明起义军与围攻昆明的起义军互相呼应、配合，对清军威胁甚大。当时，刘岳昭所部湘军仍在贵州，仅总兵李家福率领的少数先遣部队到达曲靖，岑毓英则在昆明城下与起义军激战，均无力顾及寻甸、嵩明。

刘岳昭于5月7日，率军到达曲靖后，经过三个多月的准备，于8月开始督率所部湘军和新募黔勇二万余人，向寻甸进攻。其部署是：总兵李家福率部自马龙进，总兵谢景春率部自沾益进，总兵全祖凯率部自功山进。三路分进合击寻甸。8月9日，李家福部占领了寻甸东北的七星桥。接着，谢景春、全祖凯等部也相继夺占了清水沟、金所等要隘。清军扎营于近城的文笔山、凤凰山、望城坡等处，用大炮不断地向起义军轰击。起义军固守城内，顽强抵抗，清军久攻不下。12月，四川候补道刘岳曙（刘岳昭之弟）率领湘军二千八百名，由贵州到达云南，赶至寻甸增援，但仍无进展。

大司卫姚得胜、大司衡杨荣于攻占武定之后，即转旗东向，于1869年1月21日占领果马，进至寻甸城下。1月30日夜，起义军突袭望城坡清军，敌营中大火突起，全祖凯部四处逃散。次日黎明，总兵谢景春部仓皇撤退，副将贺连璧也弃营逃窜，起义军乘胜占领七星桥、草坝等地。2月1日，起义军向文笔山清军大营发起攻击，清军纷纷败退，逃往曲靖、马龙、沾益等地，寻甸随之解围。

寻甸一战，回民起义军重创了刘岳昭部清军。刘岳昭哀叹：“诸军精锐大半损折，势难裹创复战”。岑毓英也承认：“此次寻甸失利，……全局几至动摇”。

（三）东征的失败

昆明外围东、南、北三个战场的激烈争夺，起义军和清军各有胜负，总的形势是双方处于相持状态。岑毓英进驻昆明后，即派总兵李维述、参将张

《平定云南回匪方略》卷三十六，《回民起义》（一），第452页。

《平定云南回匪方略》卷三十七，《回民起义》（一），第456页。

保和等配合杨玉科部向北线进攻，从 1869 年 1 月中旬到 3 月上旬，先后占领了富民、禄劝、武定、罗次等地。同一时期，杨荣、姚得胜率所部起义军在东线作战。当杨玉科率部进攻武定等地时，杨荣、姚得胜为牵制清军，由滇东向昆明进军。3 月，起义军一举攻占省城东北重镇杨林，清军守将何秀林率部退守宜良。起义军乘胜由长坡向大板桥一带进攻，占据昆明城东小偏桥、十里铺、羊房凹、牛街、兴福寺等地，使省城清军大为震惊。4 月，由马周率领的一支回民起义军也乘激江空虚袭占了该城。

岑毓英慌忙调集杨玉科、张保和、吴永安、徐联魁、李廷标诸部救援省城。起义军由于缺乏统一的领导和指挥，各部之间不能协调一致地行动，因而没能趁此有利时机狠狠打击敌人。岑毓英利用起义军这个弱点，集中兵力向小偏桥一带猛攻。清军采取分割战术，将起义军隔为数段，然后各个击破。经过近二个月的反复争夺，至 6 月初，小偏桥、十里铺、长坡等要地均被清军攻占，起义军伤亡万余人。

起义军屯兵昆明城下一年有余，由于战线过长，后勤供应难于保证，粮食弹药时有短缺，加之传染病流行和频繁战斗，部队大量减员，特别是久攻昆明不克，战斗意志大受影响，士气逐渐消沉起来。清军攻占小偏桥、长坡等地之后，即向杨林进攻。起义军因大量伤亡，于 6 月 11 日撤出杨林。接着，岑毓宝由杨林、杨玉科由昆明合攻嵩明。在清军威逼之下，守将大司寇李芳园、大司平马兴堂挟持杜文秀派到前线监军的女儿蔡杜氏（蔡廷栋之妻）于 6 月 13 日不战而降。在此期间，刘岳昭部将李家福、刘岳曙亦率湘军向寻甸进攻，相继占领了七星桥、文笔山、望城坡等要隘，进逼州城。留守寻甸的大司理马天顺等动摇妥协，在清军剿抚兼施之下，竟于 6 月 20 日率军投降，寻甸、果马等地遂为清军占领。至此，清军完全控制了昆明以东地区。

岑毓英和马如龙坐镇省城，积极准备向围城起义军进行全面反攻。他们除雇请外国人训练清军使用从国外买进的新式大炮外，并调集大量清军回昆明，其中有岑毓英部将岑毓宝和岑毓琦所率滇军、刘岳昭部将李家福所率湘军及马天顺等部降军。1869 年 7 月，清军首先进攻城南起义军阵地。至 8 月初，李家地、老鸦营、大营寺等地均为清军占领。老鸦营距南门外三捷桥清军营垒仅一里左右，是通起义军大营江右馆的必经之路。老鸦营失守，城西起义军和江右馆的联系便被切断。岑毓英一面派副将张保和率部攻昆阳、副将范清率部攻安宁、总兵李维述率部攻广通、副将杨玉科率部攻元谋、副将何秀林率部攻易门；一面施行离间计，使起义军将领不能团结对敌，反而互相疑忌。大司疆段成功粮尽，求借于扬威大都督蔡廷栋和大司令马清，蔡、马二人都不借给。9 月 18 日，段成功遂向清军投降，将城南西岳庙一带二十余处营垒全部献给清军。岑毓英、马如龙乘起义军内乱之机，指挥清军向城南、城西、城北的起义军发动全面进攻。起义军营垒多被攻破，仅存城南江右馆、城北马村、城西土堆三处，但兵力已不足万人。9 月 20 日，岑毓英、

马如龙指挥清军合攻江右馆，起义军总理内阁大监军杨崇章被俘，扬威大都督蔡廷栋、大司徒安文义退守棉花行。马如龙亲临喊话，要求起义军首领“自相擒献”。在敌人的威逼下，蔡廷栋竟将安文义出卖给清军，向敌人屈膝投降。江右馆失守后，城北马村和城西土堆更加孤立。9月21日夜，驻守马村的大司勋米映山率五千名起义军冒雨突围，转移到城西土堆，与大司政刘诚率领的二千名起义军共同坚守。

至此，昆明东、南、北三面起义军阵地完全丢失，元谋、易门、大姚、广通、安宁等地也已失守，尽管城西土堆仍由起义军坚守（12月17日失守），但其后路已被切断，对省城昆明不再有多大威胁。这样，滇西回民起义军从1867年开始的东征就彻底失败了。

东征昆明是杜文秀起义以来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也是云南以回民为主体的包括汉、彝各族人民在内的反清斗争的最高峰。它的失败，是云南回民起义战争由胜利走向失败的转折点。

五、大理保卫战

（一）战前形势

滇西起义军东征昆明失败之后，云南清军和起义军在力量对比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清军已逾十万，而起义军的力量则大大削弱了。占滇西起义军总兵力一半的十万东征大军，是最精锐的部队，几乎完全损失在东征战场上；众多的能征善战的起义军首领，有的作战牺牲，有的死于瘟疫，有的被俘，有的投敌，领导力量大不如前。形势的变化，越来越有利于清军而不利於起义军，因此，云南巡抚岑毓英决定进军滇西。

昆明解围之后，岑毓英和马如龙一面指挥清军继续围攻城西土堆等残存的起义军据点，一面调派部队向昆明外围州县进攻。至1869年10月初，清军相继占领了南安、楚雄、定远等地，进一步稳定了省城的局势。为了进攻滇西，岑毓英派人分赴湖南、湖北、江西、浙江等地，催调协饷，并奏请在重庆设立滇饷总局，以便于转解协饷入滇。总督刘岳昭也于10月7日由曲靖进驻昆明，留总兵谢景春部分防曲靖、马龙、寻甸等处，以保护滇东饷道。

在攻占南安、楚雄、定远等地之后，岑毓英即指挥清军分三路向滇西大举进攻。其部署如下：南路由迤南道张同寿、署普洱府知府许继衡等率领，由普洱进攻威远（今景谷）、缅宁，以牵制大理以南各地起义军；北路由永北厅同知刘昌笏等进攻永北厅城，署维西协中军都司张润等率部自维西进攻丽江府城，以阻止鹤庆、丽江、邓川、浪穹等地起义军南援大理；中路是主力，由杨玉科率部进攻姚州，都司张士进率部进攻镇南，都司钱大川等率部进攻云南县，守备陈定邦等率部进攻宾川，都司王钟祥等率部进攻弥渡，署镇沅州同知尉迟品玉等率部进攻镇沅与景东接壤之马街一带，待姚州得手

后，直攻大理。

为了保卫大理，阻止清军长驱直进，杜文秀采取重点防守姚州、镇南等地，以一部兵力节节阻击的方针。

（二）大理外围的激战

姚州是起义军最早占据并大力经营的城市之一。它东界定远，北接大姚，南连镇南，地理位置极为重要，有大理屏藩之称。为防御清军进攻，起义军加固城墙，并在城外修土城、筑碉楼、挖壕沟，使它成为一座易守难攻的坚固堡垒。1869年10月，杨玉科占领定远后，即率徐联魁、段瑞梅、蒋宗汉、冯长寿等分数路包围了姚州。杨玉科扎大营于龙岗卫，指挥清军昼夜围攻。大司军马金保和大将军蓝平贵、大都督契有明率领起义军依托环城修筑的碉楼营垒，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杨玉科无可奈何地说：“相持数月，射火鸦、翻草龙之技已穷，均不能克。又昼夜迭攻，贼殊死战。……枯索计谋而不得。”12月中旬，清军攻占禄丰后，岑毓英增调总兵李维述部与张士进部合攻镇南。镇南为大理门户，地理位置同样十分重要，起义军“加意布置，以全力据守，猝不可拔”。由于起义军在姚州和镇南两个军事要点顽强抵抗，牵制了清军大量兵力，迟滞了敌人的进攻，为杜文秀组织兵力阻击清军在其它方向的进攻赢得了时间。

南北两路清军进展较为顺利，至1870年初，南路占领了缅宁，北路占领了丽江、剑川。与此同时，中路的刘兴、王钟祥、丁跃龙、段瑞梅、钱大川、陈定邦等部清军（本为牵制起义军兵力的助攻部队）不顾主力受阻于姚州、镇南等情况，突出冒进，先后占领了弥渡、浪穹、邓川、红岩、云南驿和宾川等地，逼近了大理。为了保卫大理，杜文秀派大司衡杨荣率领一支机动部队赴援云南县，并分兵进攻宾川、浪穹、邓川等地清军。由于这些地区的清军孤军深入，兵力不足，这时营垒多陷，纷纷败退。起义军收复了邓川、浪穹、弥渡、红岩、云南驿等地。4月初，杨玉科部清军挖地道炸开城墙进入姚州城内，起义军顽强抵抗，与敌逐点争夺。清军付出了大量代价，才于5月1日全部占领该城。起义军将领马金保、蓝平贵被俘，契有明自焚而死，起义军六千余人壮烈牺牲。在镇南，尽管岑毓英派都司陆得成、林大任率开花炮队增援攻城清军，昼夜轰城，但仍无进展。

岑毓英认为，清军西进缓慢并屡次失利的原因：一是东南尚未肃清，不能集中全部兵力进攻滇西，特别是“澂江、新兴两城，围久不下”，“实为

杨玉科：《从军纪略》上卷，《回民起义》（二），第500页。火鸦为一种火箭，射中目标后使之起火燃烧。

岑毓英：《云南通志》卷一一三，第20页。

省城肘腋之患”；二是军队纪律不严，诸将各不相下。因此，决定加紧对昆明东南回民军的进攻：马如龙亲率兵练与总兵田仲兴部合攻新兴；岑毓英亲率兵练往攻澂江。对进攻滇西的各部清军，则区分任务，各专其责：委杨玉科署鹤丽镇总兵，督办大理、丽江军务；委总兵李维述负责蒙化、赵州、云南军务。杨玉科派段瑞梅、蒋宗汉、徐联魁、冯长寿等各率所部分援邓川、浪穹、宾川、云南。起义军和清军在上述地区展开激烈争夺，各处得而复失，数易其手。

1870年9月3日，北路清军黄世昌、刘昌笏部占领了永北厅城。9月15日，杨玉科联合北路清军攻占鹤庆，接着率军南下，于10月底11月初夺占浪穹、邓川，进攻上关。至此，大理以北各州县尽为清军占领。

在大理东南，起义军和清军争夺也很激烈。1870年9月21日，李维述部终于占领了镇南，随后向云南县进攻。弥渡等地数次为清军占领，起义军又几次夺了回来。1871年5月，起义军大败清军，击毙都司陈定邦，又一次收复弥渡。徐联魁等部进攻下关，也为杨荣部击败，退回宾川。刘岳昭、岑毓英鉴于以上情况，令杨玉科部清军转攻为守，严扼要隘关口，以整训部队，筹集粮饷，待秋收以后继续进攻。

在大理西南，大司空李国纶率部守腾越，大司马杨德明、大可武马年玉率部守永昌，与当地清军相持。鉴于永昌为大理西南屏障，战略地位相当重要，杜文秀令东征时投敌后又逃回的蔡廷栋、段成功各率所部往援。但蔡、段二人不和，纠众相攻。后蔡廷栋遣人刺死段成功，兼并其众，率领大军于1871年6月25日占领永平，对于援救永昌并不积极。在此期间，杨玉科却派蒋宗汉等率军一万增援围攻永昌的参将李凤祥部清军。在蒋宗汉、李凤祥部联合进攻下，永昌城于9月7日失守。

1871年秋，岑毓英复令各部清军同时向起义军发起进攻，于是杨玉科部围攻水平，李维述、杨国发部急攻云南县，企图进而东西夹攻下关。11月，清军在攻占云南驿之后，李维述令参将李栋材率部进攻弥底（蜜滴）、瓦录、天生营等处。这一带是彝族聚居区，彝族起义军领袖李文学接受杜文秀授予的“大司藩”称号，负责镇守哀牢山区。清军攻瓦录逾月不下，李栋材中伏而死。起义军因胜而骄，遭清军袭击，弥底、瓦录、天生营一带遂于12月失陷，李文学突围他走。

1872年春，杜文秀派杨荣、蔡廷栋率援军由南涧、古郎一带攻云南驿等地，欲截断清军后路，但在小桥一带作战失利退回。5月初，清军攻占弥渡、红岩、南涧等地之后，李维述、杨国发遂率清军合攻云南县，5月22日占领县城。杨玉科部清军已于3月4日攻占曲硐（永平南），4月21日占领漾濞，继而进攻下关。当得知李维述等已占领云南县城时，杨玉科立即赶至云南县，部署向赵州进攻。赵州是大理南路咽喉，逼近下关。6月1日，杨玉科

岑毓英：《会筹澂江新兴军务片》，《岑襄勤公奏稿》卷四，第20页。

督率徐联魁等部由云南县、都司周作祥部由洱海东向阳堡南下，两路夹攻赵州。6月4日，杜文秀亲率杨荣、蔡廷栋等万余人由大理下关援赵州，遭清军截击败回。6月8日，赵州陷落，清军进逼下关。

6月9日，杨玉科即指挥清军同时向上下两关发起进攻。其部署是：段瑞梅率部攻上关，都司李应举率部由间道进扎花甸以袭上关之后；徐联魁等率部助攻下关，并由蒋宗汉率部由漾濞越点苍山，偷袭下关侧后；杨玉科率主力从正面进攻下关；守备董良弼率水勇乘船往来于洱海之上，侦察起义军的虚实。上关和下关各距大理数十里，是大理的南北门户。起义军在上下关均筑有石城，城外又筑起数道长垣。驻守上关的是马国玺、马锡晋，驻守下关的是蔡廷栋。由于起义军防守严密，清军无隙可乘，几次进攻都遭失败，杨玉科只得退回赵州城北的汉邑村。他探知驻守下关清风桥和天生桥的董正兴、鲁达二人不是回民，便派人进行分化瓦解，“招其来降，约期内应”。同时，又派出兵士扮作盐贩，混入两关，收买居民，以配合清军的进攻。6月12日，清军又发起进攻，蒋宗汉率部翻越点苍山斜阳峰，鲁达投降，清军抄入关后。幸大司勋马荣耀率援军赶到，截其归路，清军战守失措，狼狈逃窜。杨玉科急派千余清军渡过洱海攻起义军营垒。驻守下关外关的董正兴投降，清军夺占清风桥，进入内关。蔡廷栋和马荣耀被迫退守大理，下关遂为清军占领。同日，上关也被段瑞梅、李应举等部清军攻占。上下两关的丢失，严重地威胁着大理的安全。

（三）大理失陷与起义的最后失败

进入上关、下关的清军达十余万人，大理城内的起义军连同家属老小仅五六万人，力量相差甚大。尽管如此，杜文秀和起义军将士仍然毫不畏惧，为了保卫大理政权，决心与清军战斗到底。

1872年6月12日，清军乘胜从南北两面向大理发起进攻。当南路清军进至离大理城仅一里左右、北路清军经喜洲进至湾桥时，杜文秀命杨荣等率起义军主动出战，予敌人以迎头痛击。清军大败，蒋宗汉等率南路退至太和村，段瑞梅等率北路退至喜洲。正在这时，进攻蒙化的李维述部清军告急，杨玉科率二千五百人往援。大理起义军随即出击，大败蒋宗汉、徐联魁部清军，占领大井旁、砖窑、葭蓬村、重邑村等处。

6月22日，清军攻占蒙化城，李维述率所部向蒙化厅属大小围埂进攻，杨玉科则回到下关，继续部署进攻大理。由于起义军固守营垒，顽强抵抗，清军只得采取步步为营的战术，对大理周围的村寨和起义军营垒逐点攻击。

杨玉科：《从军纪略》下卷，《回民起义》（二），第514页。

由于随时招募，故云南清军数量又有增加。杨玉科自称：“兵则随时招集，饷则因敌所资。”（《回民起义》第二册，第494页。）

起义军浴血奋战，英勇杀敌，杜文秀也经常亲自披甲上阵。但终因兵力不足，武器不如敌人，城外一百余碉楼营垒陆续失守。11月初，清军进至城下，包围了大理城。

起义军在城周围挖有壕沟，壕边修有隐蔽的地下工事数十座，上面覆以泥土，四周砌以砖石，并有地道与城里相通。清军进至壕边时，隐藏在工事里的起义军通过工事的暗孔向敌人射击，清军屡进屡却，死伤颇多。后清军引苍山溪水淹灌地下工事，迫使起义军退回城里。清军随即越过城壕，在城下扎营，并筑起高过城墙的炮台数座，用大炮不断向城内轰击。杨玉科又指挥清军开挖地道，准备炸城。

大理被围日久，情况一天比一天险恶。当时，滇东、滇南地区的起义军已完全被岑毓英、马如龙镇压下去。滇西除大理外，仅腾越、顺宁、云州数地未被清军占领。顺宁、云州等地起义军屡欲赴援大理，都被清军杨萃、尉迟品玉等部阻截，因此，大理完全成为一座孤城。为了早日攻下大理，岑毓英于12月初亲自率军由昆明启程西进。更为严重的是，随着形势的不断恶化，起义军中的投降势力逐渐抬头，内部危机加深。

12月10日，清军地道挖成，炸开东南角城墙攻入城内。起义军顽强抵抗，清军死伤甚众，被迫退出。以后，清军又多处挖地道炸城，攻入城内，起义军拚死反击。至17日，清军终于占领了城内校场、莲花池一带，起义军退至西北半城。20日，清军又到援军五千余人，杨玉科改单从东南一个方向进攻为四面同时进攻，又将开花大炮二十门排列城上，昼夜轰击。起义军营垒碉堡大半被毁，形势十分危急。杜文秀决心与清军决一死战，至万难固守之时，再弃而他走，或率全家老小，投洱海以殉。但杨荣、蔡廷栋思想动摇，暗中向清军求降，并力劝杜文秀出城投敌。杜文秀还收到赵州知州唐澍的劝降信。他考虑到“与其陷万人于锋镝，曷若捐一躯[躯]以救生灵”，遂决意出城“请罪伏诛”，以求“过咎归某一人，法律休波万姓”。12月27日，杜文秀服毒后乘轿子到达杨玉科大营。杨玉科将其头割下，向岑毓英报功。岑毓英急从离大理一百二十里的红岩赶到大理，纵兵血洗大理城。

大理陷落后，岑毓英移兵攻顺宁、云州、腾越。1873年3月，清军攻陷顺宁，4月又占领云州。5月，起义军最后一座城市腾越失守。至此，坚持了十八年之久的云南回民起义完全失败了。

第三节 李永和、蓝朝鼎起义战争 (1859年7月—1865年6月)

一、起义云南，进军四川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鸦片输入量逐年增加，国内种植者亦为数不少。云南是种植鸦片比较多的地方，烟土运往四川等地，“贩者有什佰之利”。滇川交界地区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被裁兵勇和游民等，无以为生，便结为“烟帮”，为烟贩护运走私鸦片。他们既受烟贩的剥削，又受官吏的欺诈。烟帮外出时，通常由管带、队长等率领，并携有刀枪等武器，以资自卫。1857年以后，清政府为了筹措军饷，对鸦片实行“稍宽其禁，听商贸易”，“征收税厘”的政策。1859年，四川省设立厘金局，沿川滇边界设立关卡，对过在货物课以厘金。贪官污吏乘机巧立名目，任意敲诈勒索，以饱私囊；诈取不遂，则诬良为盗，逮捕入狱，施以酷刑，甚至杀害。烟帮因受官吏苛索和迫害，与官府的矛盾日益加剧。当时，石达开部太平军正进军西南，杜文秀领导的滇西回民起义正在蓬勃发展，这就为滇川边境地区的烟帮和其他人民群众开展武装斗争提供了有利条件。

1859年夏，云南昭通府（治今昭通）烟帮中的胡登高、杨刚狗二人被四川宜宾知县汪觐光、千总赵三元拘捕入狱，经烟帮多方营救无效，终被处决，于是，长期积压于烟帮中的对贪官污吏的愤懑一齐迸发出来。不久前在大关牛皮寨聚众起事的昭通烟帮首领李永和、蓝朝鼎等乘间大举，队伍由数十人扩充至数百人，终于在同年7月揭开了以李永和、蓝朝鼎为首的滇川农民起义战争的序幕。

10月初，李、蓝率领起义军六七百人，过老鸦滩（今云南盐津），进入四川，连克筠连（10月3日）、高县（10月6日）、庆符（10月8日），毙庆符知县武来雨。起义军以“打富济贫，除暴安良”为号召，受到四川广大群众的拥护，队伍迅速扩大到数千人。10月11日，起义军渡过金沙江，占领安边镇，军锋直指川南重镇叙州府城（今宜宾市）。10月15日，起义军经柏树溪（今宜宾县）急袭叙州府城，歼清军千总赵三元等数百人。至16日，李永和部已占据了城西真武山和翠屏山，蓝朝鼎部已占领岷江北岸的吊黄楼，控制了成都、犍为等地入叙之水路交通。起义军占领了有利位置，随即围攻府城。

叙州知府英汇和宜宾知县汪觐光等得知起义军来袭，惊恐万状，紧闭城门，并急忙向成都将军兼署四川总督有凤求援。有凤调派三千名清军、由提督万福、按察使蒋征蒲率领往援。起义军在石马溪（宜宾市西北）一带设伏。10月17日，参将高克谦、游击明耀光率前锋千名乘船至石马溪时，见

岸上义军甚少，便舍舟上岸。起义军伏兵突起，清军伤亡甚众，高克谦、明耀光仅率三百残兵逃进叙州城。万福和蒋征蒲不敢接近，分别在离府城数十里的牛喜 和高家场扎营。起义军一面搭造木梯，暗挖地道，百计攻城，一面在城外伏击敌人。11月18日，起义军又在石马溪设伏，将署副将马天贵率领的五百余清军截为数段，全部歼灭。

起义军在叙州城外虽打了几次胜仗，但府城久攻不克。12月初，义军先锋管带唐友耕降敌，将攻城计划泄露给清军，加之此时援叙之清军兵勇已达万余人，形势对起义军越来越不利。为了摆脱被动局面，起义军于12月8日夜主动撤围。李永和率部进入宜宾县青山地区。蓝朝鼎率部沿岷江北上，直趋位于乐山、犍为交界的五通桥、牛华溪、马踏井三角地带的犍乐盐场。

嘉定府（治今乐山市）之犍为、乐山、荣县和叙州府之富顺，井灶林立，是四川最主要的产盐区。川盐收入为清王朝重要财源之一，也是当时四川省“协济”湘军军饷的主要来源。如果起义军占领了犍乐盐场和富顺的自流井、荣县的贡井等产盐区，不仅影响清王朝的收入，而且将使湘军军饷因之告匮。因此，清王朝一面抽调准备用来镇压太平军的萧启江部湘军六千人由湘入川，一面谕令新任四川总督曾望颜对犍为、乐山、荣县、富顺等地几十万盐工“妥为安置，严防勾结”。接着，由甘肃提督郭相忠和陕西副将连庆率领的陕、甘标兵，由四川提督皂升和按察使蒋征蒲率领的督府标兵和重庆镇营兵，川北镇总兵占泰、前湖北宜昌镇总兵虎嵩林、湖北郧阳镇左营游击张万禄、陕西候补知府田良、建昌道鄂惠等人统率的兵勇和地方团练数万人，先后赶到叙、嘉两府和犍乐、白贡盐场一带，防堵李蓝起义军。

但起义军行动迅速，一举攻占了犍乐盐场，获得大量资财，并吸收大批农民、盐工参军。之后，为了避开清军的追剿，蓝朝鼎率领起义军从五通桥竹根滩西渡岷江，南下宜宾县芘州一带。1860年1月7日，蓝朝鼎与李永和合军，突袭犍为县东南的箭板场，将清军都司但玉龙、守备余振海等部二千五百人截为数段，全部歼灭。起义军声势大振，四川提督皂升退守犍为。1月中旬，起义军进攻犍为县城失利，乃东渡岷江，经龙 场进至罗城场附近的铁山地区。

1860年1月23日，是咸丰十年正月初一日。这天雨雪交加，清军躲在营房里过年。趁此机会，起义军二万余人由杨家场隐蔽地进至富顺、荣县，并于26日突然占领了自流井、贡井。井地周围数十里内的物资储备，尽为起义军所有。起义军以贡井天池寺和谢家松林为大营，四处活动；同时，大量吸收盐工、小贩和贫苦农民参军，队伍很快发展到十余万人。

自贡不仅是财赋之区，而且北通省城，地理位置相当重要。为防止起义军北攻成都，清军特别加强了自贡北路的防守，由占泰和虎嵩林等率重兵驻守界牌、程家场一带。

起义军为摆脱清军，决定撤离自贡盐场。1860年3月7日深夜，冒雨从天池寺出发，经柑子坳、秀才坡向川西转移。新任四川提督占泰事先察知起

义军将要撤离，急令各路清军堵截。3月8日黎明，游击张万禄部由桥头铺赶至秀才坡，“拦头截剿”。张万禄赶过豹子山，见打着明耀光旗帜的“清军”被围呼救，便催马下山，前去救援。顿时起义军伏兵四起，当张万禄看清“被围”部队全是起义军时，已陷入重围。结果，张万禄部“全军俱覆，血积成渠，田水尽赤”，张万禄也当即丧命。其余清军不敢紧追，起义军遂沿桥头铺、李子桥西进。

起义军到达五通桥后，清军又接踵而至。为调动和分散敌军兵力，李永和、蓝朝鼎商定：李永和率部坚守懋乐地区，在附近活动；蓝朝鼎率部沿岷江北上，相机向成都进军。蓝朝鼎率军先攻马踏井占泰大营，败该部清军，然后经白马埂进至青城城下，于3月28日一举占领该县城。

四川总督曾望颜深恐起义军进攻成都，早就下令附省州县坚壁清野，无论大小村庄市镇，都要把粮食、货物隐藏起来，并将通往成都的各条小路“一概节节挖断，重重塞关”，大路和各隘口，则“层迭筑起高原土关，其门只可容一人一马一轿出入”。起义军占领青城后，曾望颜“以省垣为根本重地”，急令占泰“迅率所部全军，由井研、仁寿星夜绕道兼程赴省”。

在各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配合下，蓝部义军进展神速。3月31日，占泰尚未赶到成都，起义军已攻克距成都仅百里的彭山。次日，占泰到省，新津渡口又为民团所扼，蓝朝鼎随即调转军锋，分兵两路，攻邛州（今邛崃），占蒲江，克名山。起义军陈兵百丈场、夹门关、平落坝、大塘铺一带，连营数十里，切断了成都与雅州府（今雅安）的通道。

4月25日，蓝朝鼎部撤离名山，夺占金鸡关，接着进围雅州府城。因该城防守严密，起义军围攻多日不克，便转攻洪雅、夹江、峨眉。清军将领以为蓝朝鼎欲南下与李永和合军，急忙派兵拦阻。起义军出敌不意地回军西上，于6月上旬连克荣经、天全二城，屯兵于天全、芦山之间。8月，蓝朝鼎驻军于离成都仅七十余里的崇庆元通场，分兵四出。后进入温江、郫县、崇庆、新津、彭县、什邡、汉州（今广汉）等地。11月，起义军攻金堂不克，遂进入川东。

蓝朝鼎率部转战于川西、川北各州县，发展了队伍，调动了大量清军，减轻了对李永和部的压力。这一时期蓝朝鼎作战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攻而不守，始终没有建立一个可资立足的根据地，歼灭的敌人也不多。

同一时期，李永和驻军五通桥，分兵在附近活动。1860年5月起围攻井研，久攻不克，于9月初撤围。部将张第才（又名张国福）率部进入富顺、宜宾、南溪、隆昌。在隆昌击毙知县萧庆，随后游击于川东南荣昌、大足、铜梁、永川间。李永和屯兵五里浩，分兵转战于川南富顺、宜宾、威远、荣

《富顺县志》卷八，兵防，第4页。

四川档案馆藏《巴县档案》。

曾望颜奏稿，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第3466号卷，第5号。

县、仁寿、资阳、南溪、隆昌、泸州等地。11月，活动于各地的起义军二三十万人齐集富顺、隆昌交界的牛佛渡，连营百余座，活动于百里之外。这时起义军人强马壮，声威正盛，屯兵牛佛渡数月之久，清军“无一兵一勇过而问津者”。

12月23日，张第才部义军占领永川，进入川东的蓝朝鼎部也前往会师。不久，蓝朝鼎部攻克荣昌，后经大足、铜梁等地北上围攻遂宁，两月未下，遂沿涪江北上，连克太和镇（今射洪）、射洪（今射洪西北）二城，进围潼川府城（今三台）。

二、绵州之战

绵州（今绵阳）在成都东北二百七十里，为省城门户。城东、北两面依涪江，南临安昌河。绵州知州唐炯，因任南溪知县时镇压起义军“有功”而为上司赏识。他刚一上任，就积极部署绵州的防守。1861年4月初，蓝部起义军围攻潼川时，唐炯亲率所部千余黔勇驻扎潼锦交界之福源寺（葫芦溪），并令各乡团勇前往助守，又派州判颜佐才率兵一部扎丰谷井一带，以为后应。

4月29日，蓝朝鼎自潼川撤围，率部直趋福源寺，清军和团勇溃败。起义军没有乘胜追击，而集大军于离绵州城三十五里的丰谷井，使敌人赢得了喘息的时间。唐炯逃回州城后，下令尽烧附郭民房，紧闭城门。5月4日，起义军进至绵州城下，依山沿河修筑营垒，围困州城。在围攻绵州的同时，分兵出击，袭占安县、彰明（今江油南）等地，获取大量物资，运至绵州前线。5月24日，起义军将在涪江巡守的清军二十余只炮船尽数夺获，完全控制了水陆交通。

围攻绵州的蓝朝鼎部有十余万人。绵州城内清军甚少，团勇也为数不多。四川提督占泰率军万余驻于罗江县城，扼入省之路。因此，在兵力对比上，起义军占有绝对优势。但绵州城垣坚固，易守难攻。城垣周七里有寄，高一丈九尺。城外除东面紧靠涪江外，北、西、南三面有壕，宽一丈五尺，深一丈。城壕近城一侧筑有壕墙，壕外置梅花桩。城内存粮极多。鉴于以上情况，唐炯采取了紧闭城门，凭险固守，静以待援的方针。

蓝部起义军屯兵坚城之下，采取了持久作战的错误方针。为阻水灌城，动用大量兵力在涪江、安昌河汇合处修筑堤坝，因流急难以合拢，最后堤坝亦为大水冲毁。从5月初至9月初，起义军在四个多月的时间里，百计攻城，均未得手。在7月的一次伏击战中，起义军曾大败从罗江来援的占泰所部清军，并擒杀占泰；但没有乘胜扩大战果，仍然倾全力攻城。

同年5月26日，前湖南巡抚骆秉章率湘军五千余人溯长江到达四川万

县。这时，李永和部将张第才、何国梁、何兴顺等率三万余人入正围攻顺庆府城（今南充市）。骆部湘军主将黄淳熙奉命率军三千余人由万县舍船上岸，经梁山、大竹直趋顺庆。起义军闻讯，由顺庆沿嘉陵江而下，转攻定远（今武胜）。6月18日，湘军赶至离定远城十五里的姚家店，分三路发起突然袭击。起义军因缺乏准备，仓促应战，伤亡惨重，何国梁牺牲。余部退往二郎场一带，与赶至该处的另部起义军数千人会合。二郎场一带四山壁立，道路盘旋曲折。起义军利用有利地形设伏以待。21日，黄淳熙率部追至离二郎场二十里的万古场，不见起义军踪迹。他求胜心切，乘夜继续追赶。行十余里，至燕子窝，与小股起义军相遇。刚一交战，起义军即退走，黄淳熙下令奋力追赶。追过二郎场，义军伏兵四起，清军被逼处阡陌小滕之间，彼此不能相顾，以致一败涂地，黄淳熙也被击毙。起义军随即转移至绵州，与蓝部义军会合。

骆秉章率后队湘军于6月30日行抵大竹，得悉前线失利，急忙赶往顺庆。他一面令果毅营帮办曾传理代理营务，一面在湘军“随营勇丁”（杂役）中选补士兵，并令在籍道员张由庚、武举傅鸿勋招募川勇。因湘军新败，骆秉章只得暂留顺庆，为进攻绵州做准备。

骆秉章长期与太平军作战，积累了不少镇压农民起义的经验。入川以后，他沿途接见各府县的官绅，搜集起义军的情报。抵顺庆府后，他鉴于蓝朝鼎正率十余万人围攻绵州，李永和正率十余万人围攻眉州等地，并认为蓝部“最为剽悍”，于是制定了一个由北而南，先蓝后李，各个击破的方针。在此以前，骆秉章还针对起义军“散而不聚”、“剿而不留”等特点，和以往清军“锐欲进攻而不能专向一处”，“此剿彼窜，莫收聚歼之功”，“备东缺西，终成流寇之患”的教训，确定了“诱归一处”、“合围会剿”的作战原则。在作战部署上，他决定以新任四川提督蒋玉龙所部，在川南眉州一带牵制李永和部起义军，不使北上，而以湘军为进攻绵州的主力：总兵胡中和等率原萧启江部湘军六千余人由中江县黄鹿镇经杨家店进扎朱家桥，骆部湘军由三台县葫芦溪进扎丰谷井，从南面进攻起义军大营；副将唐友耕所部川军与州判颜佐才新招“黔勇”从西面配合进攻，唐炯则从城里配合湘军行动。另外，在东、北两面加强防守，以防义军入陕。

经过两个月的准备，骆秉章于1861年8月31日亲率后队湘军由顺庆进驻潼川府城。这时，正在围攻绵州城的蓝部起义军十余万人，精锐集中于南门外。蓝朝鼎率主力分驻于东岳庙一带，左军都统吴维之等部驻塔山，前龙

1860年8月，骆秉章奉命督办四川军务，他得知李、蓝起义军声势浩大，乃迁延观望，迟至1861年3月3日才督率湘军九千余人由湖南长沙出发，经水路分批赴蜀。3月22日，骆秉章抵安乡，3月31日抵湖北沙市。当时，陈玉成部太平军正在湖北活动，骆应湖广总督官文之请，留刘岳昭部四千六百余人于鄂，自率黄淳熙等部五千一百人于4月23日由沙市溯长江入川，5月26日进抵万县。

骆秉章：《川省军务疏》，《骆文忠公奏稿》（四川稿，下同）卷二，第5—7页。

军都统徐元柱等部驻榜山，右七营都统卯老伍等部驻十贤堂，“联营六七里，前后相属”。此外，前营副帅訾洪发和左帅营都统戴老么驻西门西山观一带，蓝朝鼎从兄前军副帅蓝朝柱（蓝大顺）驻北门桑林坝、龟山一带，水军都统郑十大耶率战船控扼涪江水路。

9月5日，清军一万九千余人全部出动，分数路向起义军进攻（主战场在城南）。湘军护军营一千六百余人进攻塔山，湘军果毅营三千余人进攻榜山、十贤堂，湘军湘果营（原萧启江部）六千余人进攻东岳庙。起义军奋勇反击。湘果营总兵胡中和部纷纷败退，起义军趁势奋力追赶包抄。但由于塔山、榜山、十贤堂等处的起义军战败，湘军果毅营赶至东岳庙助战，胡部才免于被歼。经过激战，起义军最后虽然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但损失甚大。战后，为了集中兵力，蓝朝鼎率军从东岳庙转移至西山观一带，蓝朝柱从北门龟山、桑林坝一带转移至西门青衣坝，与訾洪发等共同据守。这时起义军仍有八九万人，在西山观、青衣坝一带修筑营垒七十余座，连营二十余里。

9月18日，清军经浮桥渡过安昌河，分三路向起义军进攻：右路为湘军护军营和颜佐才所部黔勇，沿涪江支流直上，牵制青衣坝蓝朝柱部义军；中路为湘军果毅营，从正面向西山观进攻；左路为湘军湘果营，绕攻西山观侧后。西山观山势险峻，不利仰攻。起义军在蓝朝鼎亲自指挥下，奋勇杀敌，有时冲下山坡，与敌人短兵相接，有时退回山顶，以火力杀伤敌人。后因左路清军湘果营由扁堆山经孙家咀、赵家坡绕至西山观后，并攻上山梁，向起义军营垒施放喷筒火箭，抛掷火蛋，阵地上烟焰蔽天，西山观终为清军占领。蓝朝鼎、蓝朝柱率部退往绵竹、什邡、彭县一带。

绵州之战，是李蓝起义战争极关重要的一战。在此之前，起义军一直处于主动地位，清军则处于守势。当时，四川除成都驻有少数旗营外，主要是绿营兵，名义上有二万八千余人，其实多不足额，且分驻各地，兵力极为分散。但是，李蓝起义军没有利用这一大好形势，对迅速发展起来的部队进行整顿训练，以致部队武器装备和军事素质都很差。以这样一支缺乏攻坚能力的部队，顿兵于坚城之下，围城数月之久，这在作战指挥上显然是错误的。而骆秉章所指挥的清军，兵力虽处于劣势，但其主力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湘军。骆秉章采取“合围会剿”的方针，集中全部兵力，发动强攻，速战速决，扬长避短，因而取得了胜利。蓝朝鼎在强敌进攻面前，没有及时果断地率军转移，反而与敌人进行阵地决战，正好中了敌人的圈套，一战损失七八万人，元气大伤，使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此，起义军在战略上由进攻转入了防御。

三、眉州之战（参见附图十二）

骆秉章：《绵州解围疏》，《骆文忠公奏稿》卷二，第30页。

眉州城东临岷江，西接丹棱，南通青神，北连彭山，为省城南面的门户之一。

1861年4月，李永和、卯得兴部起义军先后攻占仁寿、青神，将仁寿县改名为长乐县，青神县改名为安乐县。其后，李永和派周庭光以大督统名义留守青神县城，并分军游击于资州（今资中）、资阳、富顺、宜宾、彭山、名山、蒲江、丹棱、崇庆、大邑等州县，自率大军围攻眉州城。起义军虽然屡次击败围剿的清军，但眉州城却一直没有攻下。

绵州之战失利后，蓝朝鼎经安县南下，所部仅剩万余人。原驻守罗江略坪场的蓝部义军“李长毛”、谢大德之妻“谢寡妇”部二万余人孤立无援，9月23日又受到唐友耕部川军的进攻，即退往绵竹，与蓝朝鼎部会合，后进驻什邡李家碾、河坝子等地。不久，湘军赶至，起义军迅速转移，经彭县、灌县、郫县入崇庆州。10月13日，突遭湘军袭击，再次受损。蓝朝鼎率部退向大邑、邛州。李永和派何崇政率万余人前往迎接。10月20日，蓝朝鼎、何崇政部攻占丹棱县城，与眉州李永和部成犄角之势。

李永和部十余万起义军屯驻于眉州城西南的象耳寺、快活山以至黄中坝、张家坎一带，与丹棱、青神声势相联。主力集结于虎皮塘、松江口及其附近的铁门坎、石灰窑等地，“或于山上筑垒，或就民房立营，皆重堑深壕，至为坚固”。李永和设大营于距松江口不远的刘家祠堂。岷江东岸，由卯得兴率部据守王家场、洪庙一带，并向北发展，控制了水陆交通，切断了米粮出入之道。

骆秉章认为，李永和部围攻眉州府城，威胁成都，而蓝朝鼎部新败，余部与李永和部合并，“亟宜迅筹围剿，迳捣老巢，以收聚歼之功”。于是令四川提督蒋玉龙派川军一部牵制丹棱蓝朝鼎部，防其东援眉州，北走蒲、邛；以全部湘军和部分川军进攻眉州。其部署如下：湘军湘果营六千余人由崇庆州取道将军庙、多悦镇进扎眉州西北的顺和场；湘军果毅营三千余人、护军营二千余人以及副将朱桂秋等三营由彭山进扎眉州以北悦兴场、金鱼山一带，与湘果营联络声势，向眉州西南一带进攻。此外，唐友耕部川军四千余人和总兵黎德盛部二千余人由太和场渡过岷江，进攻东岸起义军，候补知县陈绍惠统带水师炮船沿江下驶，进攻起义军水寨，水陆配合，阻止眉州起义军渡河东走。

11月初，唐友耕部首先到达眉州，接着，湘军各部亦陆续到达。李永和闻讯，即收缩阵地，将岷江东岸的起义军调至河西，加强张家坎、黄中坝的防守，并放弃象耳寺阵地，以加强松江口一带的防守。7日和8日，湘军移

谢大德之妻为起义军中杰出的女将。1861年1月，谢大德在攻遂宁时中炮牺牲，“其妻领其众”。在统治阶级的记载中，谢妻被诬称为“谢花妖”。

骆秉章：《进剿眉州李逆大胜疏》，《骆文忠公奏稿》卷三，第11页。

骆秉章：《剿办略坪获胜蓝逆并趋眉州疏》，《骆文忠公奏稿》卷三，第31页。

营，由顺和场、悦兴场进至眉州城西，准备会攻松江口。正在这时，蓝朝鼎派出何崇政、谢大德之妻率二万余人由万盛场一带进至东瓜场，威胁清军后路。骆秉章决定先打援军。11日，湘军护军营和湘果营分数路进攻，用劈山大炮向东瓜场轰击，迫使何崇政等部弃场退走。

13日，骆秉章令黎德盛、唐友耕会合陈绍惠之水师炮船，由河东王家场进攻张家坎；以湘军果毅营由黄中坝渡河进攻松江口，护军营和朱桂秋等三营与湘军湘果营左右配合，向起义军发起总攻。起义军顽强抵御，奋勇杀敌，击退敌之多次进攻。清军实行迂回包抄，前后夹击，终于占领了松江口，冲入李永和大营，纵火烧毁刘家祠堂和硝药局，数万斤火药爆炸。李永和率部退却，沿路又遭清军截杀，伤亡三万余人。当夜，徐家冲、五里山、张家坎、黑龙场、莲花场、思濠场等处起义军皆退据青神。

李永和虽撤眉州之围，但起义军仍西据丹棱、南占青神。清军如南攻青神，蓝朝鼎部可从丹棱进占眉州、彭山，危及清军后路。因此，骆秉章放弃原定计划，以唐友耕一军进驻青神城北洪化堰，牵制李永和部，防其渡河而东；令湘果、果毅、护军诸营由眉州西进，与川军联合，围攻丹棱。

蓝朝鼎等率四五万起义军坚守丹棱。该城四面依山，树林茂密，南门外有河沟数道，不便进兵；东、西、北三门外均有起义军依山为营，连营四十余座，长壕高垒，鹿角钉板环列，易守难攻。1861年12月初，清军发起进攻，起义军据垒坚守。清军投放火箭喷筒，起义军将垒中棚席等易燃物品尽行撤去。清军多次强攻，起义军“坚伏墙内，炮石纷投”，大量毙伤敌人。清军连攻两天，“计穷力尽，竟不能拔一垒”。强攻失败后，清军改行围困战术，距起义军营垒三四里处，分军扼驻，并规定起义军从何路突出，“即惟该路驻守将弁是问”。12月12日，清军在各要道掘长壕，设木城，出游骑，断粮道，以为坐困之计。为粉碎敌之围困，起义军于当夜从西门冲破川军封锁，突围北走：蓝朝柱率部先行，訾洪发、李长毛、谢大德之妻率部继进，蓝朝鼎亲率后队掩护。清军跟踪追击。13日晨，川军追至麻柳沟，与起义军后队接战。蓝朝鼎且战且退，抢登插旗山，扼险抵御。正相持间，湘军陆续赶到，四面围攻，并从山后爬上山头。蓝朝鼎率众突围，在冲下山时不幸为清军刺中额部，壮烈牺牲。起义军余部由蓝朝柱等率领，经蒲江北上。骆秉章一面令湘军继续追击，一面令蒋玉龙率全部川军回扎思濠场和莲花场，与唐友耕合攻青神。

李永和自眉州退至青神后，与原留守该处的周庭光共同据守，拥有兵力六七万人。围攻青神的清军共约万人左右。因此，在兵力对比上，起义军仍占有很大优势。但李永和新败，仅以保守青神为目的，当清军进攻丹棱的蓝朝鼎部时，竟未积极配合作战。待蓝部放弃丹棱和蓝朝鼎牺牲以后，李永和部面临清军强大压力，战斗意志颇受影响。骆秉章为防其乘虚突围，令蒋玉

龙部川军驻城西、城南，与城北唐友耕部联络声势，令黎德盛等部严密防守岷江东岸，水师炮船则在附近江面昼夜巡哨。12月下旬，起义军几次从城南突围未成。骆秉章急令湘军舍蓝朝柱、訾洪发余部于不顾，回师青神，“以为合围聚歼之计”。1862年1月17日，湘军已由新津折回眉州，李永和趁其尚未进抵青神之机，组织起义军突围。当晚，先由数千人手持灯笼火把，从南门冲出北走，吸引围城清军；李永和、卯得兴亲率数万人，由西南门潜出，以少量兵力攻刘家场清军，大队沿山边小路，静悄悄地行进，从宋家坝、观音滩、象鼻滩等处抢渡岷江。李永和、卯得兴突围成功后，率部返回犍为东北的铁山地区，周庭光则率万余起义军继续留守青神。

铁山地区是李永和部起义军重点据守的地区。这里东连自贡盐场，西接犍乐盐场，不仅物产丰富，而且到处峻岭险寨，易守难攻。1860年春，李永和、蓝朝鼎曾率起义军东渡岷江，第一次进入铁山地区，以后又多次进入该地区活动。起义军在这里开仓济贫，除暴安良，执行了一系列有利于群众的政策和措施，深受群众拥护。

李永和等率起义军余部再次进入铁山地区后，湘军接踵而至。骆秉章一面指令嘉定、叙州两府所属州县派团练防守通向铁山的道路和隘口，断绝起义军的粮食来源，一面令湘军围攻起义军。起义军深沟高垒，凭险固守；同时，分军万余人（由李长毛等率领）驻毛家寺，与铁山相犄角。湘军多次进攻，均遭失败。但由于粮道断绝，起义军无法继续坚守，被迫转移。1862年3月30日，驻守毛家寺的万余起义军经竹根滩、牛华溪、河坝场前往青神，清军派出部分兵力跟踪追击。次日夜间，李永和、卯得兴趁机率部撤离铁山。后为清军所阻，被迫分军：李永和率八九千人暂驻富顺、隆昌间之天洋坪；卯得兴率万人扎宜宾属之八角寨。八角寨距自贡盐场仅一百余里，对其威胁较大。因此，骆秉章以全部兵力围攻八角寨，阻止卯得兴与李永和会合；对天洋坪李永和部，则仅令泸州、富顺、隆昌、荣县等州县的团练进行围攻。5月13日夜，李永和率三千余人离天洋坪，沿途遭团练截杀，损失很大，最后仅率百余人入八角寨，与卯得兴会合。

八角寨林深径仄，山径陡险，山水田纵横。李永和、卯得兴恃险坚守，以致湘军围攻数月，毫无进展。8月，秋粮将熟，湘军逼垒而居，切断了起义军下山收粮之路；同时，增兵一千五百人，并以新运至的大炮不断向起义军营垒轰击。起义军粮断，决定突围。9月6日夜，先以千余人攻朱桂秋营做掩护，李永和、卯得兴等率众潜出，经花古场、大塔场、泥溪、岳坡等地，于9日到达铁山地区龙场。

龙场四面环山，南面为黑虎台，东、北、西三面为环龙山，环龙河流经其西。环龙山下有一山洞，名龙洞。只要在黑虎台附近修筑堤坝，环龙河水即可由龙洞灌入龙场，使之变为泽国。如此绝地，本为兵家所忌。但李永和鉴于该处存粮尚多，决定在龙场据守。

李永和率军到达龙场后不久，清军即严密地包围了该场。骆秉章派出

奸细混入李军，刺探军情，绘制地形图。接着，清军沿场周围挖掘长壕，壕外筑墙；接连水田之处，则编木为栅，筑起数道“木城”墙栅之外，又密布梅花桩。起义军被困重围，“人人有必死之心，困而犹斗，俨然劲敌”。清军围攻月余，未能攻破，骆秉章不得不派四川布政使刘蓉前往督战，刘蓉派人持信前往龙场诱降，李永和等予以拒绝，并率部奋力突围。清军无计可施，竟将环龙河闸断，阻水灌场，给起义军造成极大威胁。10月18日，起义军首领李永和、卯得兴等十余人于猪市坡被俘。次日晚，訾洪发等四千七百余人也惨遭杀害。李永和、卯得兴被解往成都后，英勇就义。

四、起义军余部转战陕西

李蓝起义军由于绵州、眉州两次作战失利，损失极大，蓝朝鼎和李永和又先后牺牲，四川的革命形势转入低潮。起义军难以在四川立足，便相继离开四川，进入陕西。

1861年底蓝朝鼎牺牲后，蓝朝柱、訾洪发等率余部继续北上。在彭县濠阳场遭湘军果毅营袭击，蓝朝柱与訾洪发分军：訾洪发等经川东入川南富顺、隆昌等地，与李永和部会合；蓝朝柱则率部经汉州（治今广汉）高坪铺、德阳孝泉场、安县黄土场，进入江油（治今江油北）、石泉（治今北川西北）交界的太华山中。1862年1月，蓝朝柱率部东走，欲与原在川东活动的起义军会合。另部由邓天王率领，后进入平武山中，因遭清军围剿东走，进入陕西宁羌州（今宁强）境内。

蓝朝柱率百余人经南部入达县、东乡（治今宣汉），与张第才、郭富贵等部起义军会合。1862年2月8日，攻克新宁（今开江），3月5日放弃，南入垫江县境，后与曹灿章部义军合攻垫江县城。因曾传理部湘军赶至，张第才、郭富贵、蓝朝柱等退往涪州（今涪陵）北面的鹤游坪，继经丰都、忠州（今忠县）、万县进入云阳县云安盐场。候选知县易佩绅率湘军由夔州（今奉节）来攻，蓝朝柱率部折往开县。5月24日，蓝朝柱部攻占太平厅（今万源）。6月初，离大平经烟灯垭进入陕西境，一举占领定远厅城（今镇巴），获得大批物资，部队亦得到补充。6月9日起围攻西乡，18日攻入城内，杀知县巴彦善。蓝朝柱乘胜向洋县进军，陕西布政使毛震寿领兵逃跑。7月5日，洋县群众打开城门，迎接起义军入城。

郭富贵一部三千余人在云安盐场与蓝朝柱分兵后，东走大宁（今巫溪），因遭清军袭击，于8月初进入陕西平利县之八仙街。后又转入湖北，连克竹溪、竹山。不久，复折回陕西，攻平利不下，转攻砖坪（今岚皋），破城后缴获一批火药，队伍亦发展到三万余人。郭富贵原准备沿汉江西上，与蓝朝柱会师，因得知回民起义军正围攻西安，遂改变计划，挥军北上，经子午谷，

越秦岭，直趋西安，欲趁机夺取省城。9月17日，进至长安附近的子午峪，为清军胜保部所阻，作战失利，遂西走鄠县（今户县）。这时部队仅剩二三千人，经盩厔（今周至）黑水峪进入郿县（今眉县），在高店镇再次战败，余部千余人向宝鸡、凤县（治今凤县东北）山中撤退。后进入甘肃，攻陷两当，又经徽县走成县，于11月下旬进至阶州（治今武都）境。复转入陕西，克略阳，准备东走洋县，与蓝朝柱会师。中途为清军所阻，遂由宁羌州入川，向川东进军。1863年1月3日，郭富教于巴州（治今巴中）鼎山铺被俘，全军覆没。

蓝朝柱取得洋县后，改洋县为靖川，建立政权，自称“大汉显王”，封蔡昌龄（蓝二顺）为怡王，并在四乡设官，下令安民。起义军纪律严明，深受群众拥护。陕西布政使毛震寿所率川军，屡为蓝部起义军所败。1862年12月，起义军包围汉中府城。蓝朝柱部在陕西异军突起，成为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

1863年初，太平天国扶王陈得才率二十余万太平军再度入陕，连克平利、兴安（今安康）、紫阳、石泉。占据洋县的蓝朝柱派人前往欢迎。双方协议，蓝部义军让出汉中盆地，以洋县西二十里之谢村为界，东归蓝朝柱部起义军，西归太平军。接着，太平军与蓝部共同围攻汉中府城。同年10月，连克汉中府城和城固县城。之后，蓝朝柱率军退出汉中盆地，回扎洋县。不久，蓝朝柱分兵攻占佛坪、留坝、华阳镇等地，设官理事，以稳定后方；自率部分起义军北上，于11月19日占领盩厔城。

盩厔系关中重镇，离西安仅一百余里。起义军占领该城，严重地威胁着省城西安。这时，曾经予陕西当局以巨大打击的陕西回民起义军已遭受严重挫折，统治者非常害怕蓝朝柱与回民起义军结合，使关中地区的革命烈火重新燃烧起来。因此，西安将军多隆阿急从正在镇压回民起义军的清军中抽调穆图善、姜玉顺等马步十六营，由兴平赶至盩厔。多隆阿本人也亲至盩厔指挥清军围攻。蓝朝柱一面向汉中太平军请援，一面组织力量坚守。

多隆阿扎营于距盩厔东门一里的沙河岸上。清军将盩厔城团团围住，所挖地道被起义军破坏，遂改为强攻。时值隆冬，起义军在城墙上放置棉花包，浇水成冰。清军不但难以攀登，而且炮弹落到结冰的棉花上，效力大减。1864年3月4日，清军缘梯攻城，城上滚木擂石齐下，死伤甚众。3月10日，清军以地雷炸城，城墙仅塌数尺。清军攻城数十次，伤亡三千余，仍不得入。

盩厔被围期间，驻留坝太平军接到蓝朝柱求援信后，曾答应派兵救援，但因与留驻洋县一带的蓝部起义军发生冲突，“互相攻击，死伤万计”，终未往援。正在甘肃两当、徽县一带活动的太平军郑永和部（由四川北上的

蓝朝鼎于丹棱突围时牺牲，蔡昌龄袭用“蓝二顺”名号。

刘蓉：《官军大破上元观连克城固洋县两城疏》，《刘中丞奏议》（光绪十一年版，下同）卷二，第32页。

石达开旧部)赶来援救,因在凤县黄牛堡为清军所败,未能到达。从宁陕北上的曹灿章部义军因遭敌军阻截,救援计划亦未能实现。由于援绝,蓝朝柱自3月中旬开始多次组织突围,均未成功。

3月30日,清军再次用地雷炸城,千余人从缺口处抢登,被起义军击退。多隆阿见清军败退,亲登炮台指挥。起义军枪炮齐射,弹中其目。当晚,蓝朝柱率起义军从预先挖好的地道撤出整屋。城内百姓继续战斗,直至4月1日凌晨,清军才得以进城。不久,多隆阿因伤重丧命。4月11日,蓝朝柱于安康紫溪河遇伏身亡。

由于天京危急,陕南太平军撤离陕西,加之新任陕西巡抚刘蓉率领湘军由川入陕,并占据汉中,陕西的革命形势逐步恶化。蓝朝柱部的失败,更使力量对比向有利于清军的方面转化。蓝朝柱牺牲后,曹灿章率部转战于镇安,安康一带,到处遭到清军和团练的袭击,损失甚大。5月22日,曹灿章在鄂县玉皇庙被俘牺牲。长期转战于陕、鄂、豫三省交界地区的蔡昌龄,得知蓝朝柱牺牲,自湖北郧西入陕报仇,因遭清军阻截,游击于镇安、郧西交界之大小心川一带。这时,原石达开部太平军郑永和部仍留在陕西、湖北边境,太平军启王梁成富部亦折回郧西。彼此取得联系后,梁成富和郑永和均率部赴小心川与蔡部会师,总数达到四五万人。因“附省一带,新麦方登,防兵又少”,遂由镇安北趋孝义厅(今柞水),6月6日出大峪口,占领西安以南的尹家卫(引驾回)。后因清军极力防堵,遂转战而西,经郿县入盩厔县境。陕西巡抚刘蓉调集清军采取“东西夹击,节节逼紧”,“布列长围,绝其粮道”的战术,企图将起义军“一鼓聚歼”。与此同时,利用投降人员大搞招降活动。不久,天京陷落的消息传来,起义军士气低落,一部分人滋长了妥协动摇情绪。7月底至8月上旬,蔡昌龄部都统王洪兴、太平军启王梁成富部王克昌和彭学进、石达开旧部郑永和、梁成富部罗启发等先后率部投敌,使起义军人数锐减。但蔡昌龄、梁成富不为所动,顶住逆流,坚持战斗,使刘蓉“不过五六日可期一鼓聚歼”的美梦遭到破产。8月13日夜,起义军趁倾盆大雨,从盩厔焦家巷突围,越秦岭,经洋县、城固、沔县(今勉县)、略阳,于9月初进入甘肃境内。

五、阶州保卫战和起义的最后失败

蔡昌龄、梁成富所部接近陕甘川边境时,仅有四千余人,后有湘军萧庆高、何胜必两部以及参将龚良臣等部二十余营清军追击,刘蓉又飞咨四川总督骆秉章严防四川广元、剑州(今剑阁)各处隘口,并通知甘肃巩秦阶道林之望派兵防守徽县、成县、礼县等地。

刘蓉:《复陈查明伪扶王窜扰情形疏》,《刘中丞奏议》卷四,第42页。

刘蓉:《会奏官军攻克坚堡逆匪败窜南山疏》,《刘中丞奏议》卷五,第21页。

1864年9月初，蔡昌龄、梁成富经白马关入甘肃阶州境。阶州地处甘、陕、川边界，三省统治者各有打算，无法全力对付起义军。萧庆高、何胜必等部被调回四川防守，龚良臣部被派往甘肃河州（今临夏），其余各部分防陕边。由于清军各部迁延观望，起义军得以摆脱追兵，并于9月18日一举攻克阶州城。

蔡昌龄、梁成富以阶州为据点，积极发展力量，很快达到三万余人。起义军在阶州修制器械，广储粮食，增高城墙，并在周围三四十里内修筑数十座堡垒，派精兵扼守各隘口。蔡昌龄等还与盐关回民起义军取得联系，遥相呼应。

陆续前往围攻阶州的清军约计二三万人。由于缺乏统一指挥，有的迟至1865年1月上旬才到达。

战斗首先在阶州外围诸垒进行。虽然起义军的绝大多数是新入伍者，武器很差，又只经过短期训练就参加作战，但表现却极为英勇。当清军小部队单独活动时，起义军以迅疾的行动给敌以突然袭击；如遇强敌进攻，则凭城据垒，深匿不出；清军逼近城垒，则枪炮齐发，杀伤敌人。清军的进攻屡屡失败。不得不改变战术，一面扼守粮道，诱使起义军出战，一面大搞诱降活动，对起义军进行分化瓦解。1865年4月17日，旧城山守军粮尽援绝，先锋杨兴华率百余人投敌，22日，又有三官殿两垒守军六百余名投降。清军逐渐攻占城外各垒，并由北山挖地道直通城边。6月6日黎明，清军用地雷炸塌城墙数丈，趁势冲入城内，起义军与敌展开巷战。蔡昌龄、梁成富率领部分将士退入城南堡垒。清军投掷火弹，堡垒起火，蔡昌龄和梁成富又率百余人从火中冲出，与敌人搏斗。终因寡不敌众，蔡昌龄受伤倒地，为清军杀害；守城起义军也全部壮烈牺牲。梁成富受伤被俘，不久在成都英勇就义。

阶州保卫战的失败，标志着有数十万群众参加的持续六年之久、活动范围遍及滇川鄂陕甘五省的李蓝起义战争的最后结束。

第四节 陕甘回民起义战争 (1862年5月—1873年11月)

一、起义的爆发与发展

(一) 陕西回民起义

继云南回民起义之后,在太平天国革命和捻军起义的影响下,1862年(同治元年)在我国西北的陕甘等地爆发了以回族人民为主的各族人民武装起义。这次起义的烽火遍及陕西、甘肃的大部地区,时间长达十二年之久,成为以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为标志的全国轰轰烈烈的反清革命洪流的一个组成部分。

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以后,长江中下游各省大部为太平军所控制。清王朝为筹集浩繁的军费,镇压太平天国及其影响下的各族人民起义,加紧了对包括西北地区在内的尚未遭受战争破坏的所谓“完善之区”的搜括。陕西除每月向京师解饷银数万两外,还要协济用兵各省的大量军饷。这些负担全部落到了陕西各族人民的头上。随着协饷的加重,正税不够供给,苛捐杂税相继繁兴。贪官污吏乘机敲榨勒索,草菅人命。在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下,人民群众无以为生,被迫“聚众抗官”。1861年,靠近省城西安的临潼就发生过杨生华“聚众抗粮”的斗争。

回族人民不但遭受沉重的封建剥削,而且还遭受残酷的民族压迫。陕西是回民比较集中的地区之一(主要分布在泾水和渭水流域),全省回族人口约百万。在历史上,回汉等族劳动人民杂居,虽然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不同,但都处在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因而在共同劳动和反对封建剥削压迫的斗争中,保持着较好的关系。可是,清朝统治阶级为巩固其封建统治,实行反动的民族政策,极力破坏回汉人民的团结。他们一方面笼络回汉地主阶级和其他民族的上层分子,另一方面极力挑拨各民族间的关系,以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由于采取所谓“护汉抑回”、“以汉制回”的政策,回族人民政治地位低下,备受歧视和侮辱。在经济上,不但回族劳动人民要受残酷的封建剥削,回族地主、工商业者也因与汉族地主、工商业者争夺土地和市场而受到排挤打击,彼此矛盾很大。统治者有意制造和扩大矛盾,诱使汉人中的地主豪绅分子欺压回人。回民告之于官,官府偏袒汉民,“凡争讼斗殴,无论曲直,皆抑压回民”。这样,在回民中逐渐形成一种仇视汉人的心理。回人积怨既久,起而仇杀汉人,清朝统治者便借口保护汉人,动兵杀戮回人。其结果,回汉两族人民往往认识不到他们共同的敌人是清朝统治者,而在两个兄弟民族之间埋下了不和的种子,“日积月长,仇恨滋深”,以致演成回汉械斗和

张集馨：《临潼纪事》，《回民起义》（三），第17页。

仇杀事件。

由于原驻陕西的清军多调赴外省与太平军、捻军作战，为了防止人民的反抗，陕西当局命令各州县大力兴办团练。这些地方武装一般都掌握在汉族地主阶级手里，成为他们镇压人民的反动工具。督办陕西团练大臣张芾，就是泾阳的大地主，做过江西巡抚，因在九江镇压太平军失败被革职留任，1861年回省守制。他是一个大汉族主义者，极力主张镇压回民，这时便用团练来杀害回民群众。1862年5月，进入陕西的太平军扶王陈德才部联合捻军直逼西安，蓝朝柱起义军也已由四川进入汉中，全陕震动。陕西巡抚瑛瑨和团练大臣张芾慌忙调集各地团练往南山堵御太平军；同时，加紧了对回民的迫害。

太平军入陕，给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回民群众带来了希望。当年5月，训导赵权中所属团练中的数百名回勇，不愿和太平军作战，杀死带队的恶霸地主赵炳堃，散归家乡渭南。途中，部分回勇因砍购竹竿与汉人发生争执，被当地团练打死二人。回勇赴华州（今华县）控诉。知州濮垚竟然说：“尔回子与长毛（按：指太平军）勾通谋反，打死一回，即少一贼。”回勇无奈，避居城外秦家村。不久，华州、华阴团练近万人突然将秦家村及附近回民村庄抢劫一空，又四处散发“陕西不留回民，天意灭回”的传帖。渭南、大荔、耀州（今耀县）、富平、同官（今铜川市西北）、高陵等地团练亦纷纷效尤，大杀回民。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华州回民首先起义，渭河两岸的回民争相响应，未经旬日，各处回民俱行激变。从此，声势浩大的陕西回民起义迅速发展起来。

任武、赫明堂是领导渭南、华州、同州（今大荔）一带回民起义的著名人物。他们曾参加过云南回民起义，事败后逃匿渭南仓头镇，秘造武器，待机再起。在这次起义中，他们发动回民群众，杀死训导赵权中等。渭南胥吏洪兴还派人到西安东南太平军驻地尹家卫联系，引导太平军先后攻下渭南城和华州城。后太平军因回救庐州，很快离陕东征，回民军继续坚持斗争，打击地主武装。

面对迅速发展的回民起义，以巡抚瑛瑨为首的陕西文武官员惊恐万状，不知所措，“筹剿无兵”，“不能不暂行抚慰”，派遣官绅分赴各地“安抚”。6月4日，张芾等在临潼油坊街和回民谈判时，无理要求交出任武。回民甚为气愤，将他押往仓头镇，于6月9日处死。这一行动，沉重打击了陕省当局的“招抚”阴谋，显示出回民群众与清统治者斗争到底的决心。

同州府地区回民起义军主要以大荔的王阁村、羌白镇和渭南的仓头镇为据点，向清军展开进攻。6月17日至25日，起义军围攻同州城九昼夜不克，遂撤围西进。29日，各地回民军联合逼攻西安，次日即攻占城西金胜寺，歼

同治二年回民刘恒清的诉状，转引自马霄石《西北回族革命简史》第7页。

易孔昭：《平定关陇纪略》，《回民起义》（三），第249页。

灭大批团练。7月21日，起义军又攻占团练的根据地、距西安仅二十里的六村堡。从此，西安附近的团练武装精税皆尽，守城清军（陕西提督孔广顺所部三千余人）更形孤立。

回民起义的烽火迅速遍及八百里秦川，起义队伍扩大至二十余万。当时陕西回军主要首领除任武、洪兴、赫明堂外，还有马正和、马四元、白彦虎、马生彦、禹得彦、余彦禄、孙玉宝、二河州等。其中有的是富甲一方的地主、商人和阿訇等上层分子。起义军的领导权掌握在他们手中，虽然对发动和组织群众起过一定的作用，但其消极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起义军的武器很原始，主要是菜刀、镰刀、铡刀等家具和农具，再就是用竹竿削制的竹竿枪。象抬枪、火炮之类的火器，开始时为数极少，而且是从敌人手中缴获来的。

陕西回民起义的迅速发展，严重威胁到清王朝在西北的统治。清廷急令荆州将军多隆阿率军入陕，可是他正被太平军牵制在江淮之间，只得又命直隶提督成明率所谓精锐京兵，从山西驰援。1862年8月25日，成明率京兵和豫勇共五千人由朝邑“进剿”，在洛水南岸为回民起义军所败。成明退至朝邑，豫勇逃往大荔。清廷催钦差大臣胜保率军入陕。9月上旬，胜保率军由潼关西进时，就不断遭到回民起义军的袭击。临潼一战，伤兵勇千余人，接着又于斜口镇（临潼西南）遭到起义军的堵截，只得缩回临潼，后绕道进入西安。当时，西安附近的回民军集中于咸阳渭河沿岸，以苏家沟、渭城为根据地，屡败清军。11月上旬，胜保“派兵勇及百姓马步兵共四万余人，大战于苏家沟，……及与回民战，望风逃窜，兵马自相践踏，死者数万”。与此同时，回民军乘胜保军集中于西安，东部兵力空虚之机，于同州一带发动进攻，在敷水镇（华阴西）生擒署潼关协副将哈连升，夺取其营垒军械，并进逼澄城、郃阳（今合阳）、朝邑等地。胜保奉命赶回潼关，与新授西安将军穆腾阿等督军镇压同州一带起义军。由于粮道被起义军切断，军食不足，清军不敢出战。胜保不得不奏称：“陕回族类繁多，贼马过众，此剿彼窜，东突西驰。臣所部兵勇只有一万数千人，……非再添兵万余不能早就荡平。”

清廷以胜保连战皆败，将其革职，解京问罪，改授多隆阿为钦差大臣，督办陕西军务。1863年1月中，多隆阿率部由河南入陕。当时，回民起义军正围攻同州城，突遭多隆阿军进攻，腹背受敌，被迫撤围。多隆阿于同州接受关防，连同胜保诸部，共有兵二万余人。接着，清军集中力量进攻回民起义军的重要据点王阁村和羌白镇。起义军采取游击战法，不断袭击敌军，并用骑兵截击清军运输线，使其饷械皆缺，进攻受阻。多隆阿一面筹备军火粮食，一面派人至王阁村“招抚”。起义军内部组织本来就很松散，领导人之间彼此争权，遇敌“招抚”，矛盾激化，以致相互攻杀，对敌人的进攻却缺

《秦难见闻记》，转引自马霄石《西北回族革命简史》第111页。

《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二十六，第1页。

乏应有的准备。在一切准备就绪以后，清军用突然袭击的方式，占领了羌白镇和王阁村。5月19日，筑有坚固防御工事的另一重要据点仓头镇也被清军攻占，回军遭到巨大挫折。

仓头镇失守后，陕西东部地区的回民军向西转移，集中于泾阳、高陵、咸阳一带。他们与西安地区回民起义军互相配合，共同战斗。当时，陈德才领导的太平军已由湖北竹山县一带再度攻入陕西，占领汉中；蓝朝柱起义军也在川陕边境活动。在这两支革命力量遥相呼应下，陕西回民军加紧围攻西安。甘肃提督马德昭和陕西提督孔广顺等率兵七千余人，困守西安，不敢出战。8月15日，清廷以陕西巡抚瑛棨“但知株守省垣，一筹莫展”，下令将其革职，由四川布政使刘蓉接任（刘蓉未到任前，由按察使张集馨代理）。9月初，多隆阿到达西安，再次施展“招抚”伎俩，派人到回民起义军中诱降。瑛棨也利用西安城中的回绅频繁地在回民军首领中进行“招抚”活动。孙玉宝等经不起利诱，向敌投降。1863年10月初，多隆阿部向回民军发动进攻，13日攻占高陵县城。接着，多隆阿令新任陕西提督雷正綰部由泾阳渡泾而南，总兵曹克忠部渡渭而北，共同扼守咸阳，阻截回民军西退；多隆阿自率主力从高陵渡泾，逼近苏家沟。回民起义军“自渭达泾，纵横十余里，排列旌戟若林，严阵以待”。22日，清军分两路发起进攻。起义军拚死抵御，终因伤亡甚众，从苏家沟和渭城撤退。白彦虎、马生彦、禹得彦、余彦祿率部向西北经醴泉（今礼泉）、乾州（今乾县）退至邠州（今彬县）。其后，一部南下凤翔，与崔伟领导的当地回民起义军联合作战。未几，凤翔、邠州分别为新任甘肃提督陶茂林和总兵曹克忠所部攻占，回民起义军大部退至陇东的董志原。其他回民军也在赫明堂等率领下，经武功、郿县、凤翔、陇州（今陇县）进入甘肃东部地区。从此，陕甘回民起义的中心由陕西转到甘肃，陕西回民起义斗争转入低潮。

（二）甘肃回民起义

陕西回民起义前后，曾派人前往甘肃，联络各地回民，共谋起事。待陕西回民起义发展到陕甘边境时，甘肃各地回民即纷纷起而响应。在很短时间内，起义就扩展到甘肃全境。1864年初，陕西回民军陆续进入甘肃，甘肃回民起义的声势更加壮大。清统治者惊呼：“现在甘肃之平凉、静宁、隆德、安定（今定西），省南之巩昌（今陇西）、秦州（今天水市）、伏羌（今甘谷）、清水，省北之宁夏（今宁夏银川市）、平罗、灵州（今宁夏灵武）、固原，莫不揭竿而起，蜂屯蚁聚，滋蔓难图，绵延地方数千里”。

《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四十七，第15页。

雷正綰：《多忠勇公勤劳录》，《回民起义》（四），第299页。

《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五十四，第3页。

多隆阿准备由秦度陇，镇压甘肃回民起义。他为了解除西征时的后顾之忧，企图迅速攻下由蓝朝柱起义军固守的陕西整屋。3月30日，多隆阿在亲自指挥攻城时为起义军击伤头部，不久死去。清军丧失了主帅，不能锐意西进，减轻了对甘肃回民军和已经进入甘肃的陕西回民军的压力。

1864年5月、6月间，清王朝调福建水师提督杨岳斌充任陕甘总督，刘蓉督办陕西军务，都兴阿督办甘肃军务。陕西提督雷正綰帮办甘肃军务，率同甘肃提督陶茂林及总兵曹克忠等“专讨”甘肃回民军。同年7月太平天国天京陷落后，清王朝得以把镇压太平军的清军抽调到西北来镇压回民起义军，以致“甘省一隅之地，而统兵大员专折言事者，已至八员之多”，兵勇则达七八万人。但这些统兵将领派系不一，各自为政，意见分歧，且他们深恐与回民军硬拚，胜败难保，“不如击之使走，捷报频闻，可为幸功邀赏之地”。所以，清军虽曾攻陷回民起义军占领的固原、盐茶厅（今宁夏海原）、平凉等地，而起义军的实力却未受到大的损失。陕西、甘肃回民军互相配合，采用避实趋虚、飘忽靡常的游动战法，仍打了不少胜仗。

9月中旬，雷正綰正率三十营清军进攻甘肃莲花城（秦安东北），闻知回民军再次攻下固原，便“欲急克莲花城以向固原”。起义军利用莲花城附近山路崎岖、沟壑纵横的有利地形，在山沟内埋伏重兵，另以小队诱敌。待清军进至包围圈时，伏兵齐出。清军乱作一团，千余人被歼，雷正綰脸部也被刺伤。直至11月上旬，雷部才攻下莲花城。其后，雷正綰回军平凉，向固原前进；曹克忠部由莲花城南下，迫使正在围攻秦州的回民起义军撤围南走；陶茂林部则向西进军，于12月中旬攻下金县（今榆中），进入兰州。

1865年1月中旬，回民军计取灵台，雷正綰急忙由开城（固原南）回军东向，夺回灵台。其后，雷部仍北攻固原，直至2月26日方得手。6月，雷部由下马关（今宁夏同心东）经惠安堡、石沟驿北进，曹克忠部由同心城经宁安堡（今宁夏中宁）折向东北，会攻吴忠堡（今宁夏吴忠）西南的金积堡。回民起义军在马化龙领导下，不断袭扰敌军。他们阻截清军运道，并将沿途井泉水窖填塞。清军在金积堡南面十五里的强家沙窝等地被阻将及半月，吃喝艰难，为摆脱困境，乃于7月24日发起进攻；在攻占了回民起义军的几座堡垒以后，因所获无几，士气更加低落。29日，曹、雷两部从东西两面进攻，回民军以一部兵力从正面阻击敌人，另以万余马队从十里外绕至敌后。清军腹背受敌，军心动摇，狼狈逃窜。回民军乘胜追击，毙敌三四千人，并缴获大批军需器械。雷正綰腿中炮弹，曹克忠坐骑受伤，分别率残部退至预望城（今宁夏同心东南）和盐茶厅。

除了回民起义军外，当时在陕甘两省还有两种反清力量：一是饥民武

《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一 一，第19页。

《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一 一，第17页。

杨毓秀：《平回志》，《回民起义》（三），第114页。

装，如董福祥、高万镒、李双良等领导数十万饥民武装活动于甘肃庆阳府和陕西延安府、鄜州等地，张贵领导的饥民武装也众达二十八营之多，在甘肃东部的会宁、静宁、通渭、秦安一带同清军作战。一是哗变的清兵，如陶茂林部、雷正綰部以及兰州的督标兵等都曾发生哗变。饥民武装和哗变的清兵队伍，不仅间接地配合和支援了回民军的反清斗争，有的还和起义军有某种形式的联合，共同打击清军。

甘肃回民起义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四个反清斗争中心：一个是马化龙领导的以金积堡为中心，包括宁夏府和陇东在内的起义地区；一个是马占鳌领导的以河州为中心的回、撒拉、东乡族起义地区；一个是先后由马文义、马桂源和马本源领导的以西宁为中心的起义地区；一个是马文禄领导的以肃州（今酒泉）为中心的起义地区。陇东的董志原，则是陕西回民军的根据地。回民起义军不断向清军进攻，使其文报梗塞，粮饷奇绌，省城兰州处于孤立地位。清王朝在甘肃的统治力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以致陕甘总督杨岳斌在奏折中哀叹：“现在河狄之贼扰于南，平固之贼扰于东，宁灵之贼扰于北，凉肃之贼扰于西，几于剿不胜剿，防不胜防。臣若株守省垣，则饥军终虞坐困；若出省剿办，则根本时虞动摇。外察赋势，内度兵力，实属不敷分拨。”

同年 11 月，捻军首领张宗禹按照赖文光“前进甘陕，连结回众”，以成犄角之势的战略思想，率西捻军三万余众自河南进入陕西华阴、渭南境内。清廷害怕回民军与西捻军联合，急令湘军援陕。曾国藩派提督刘松山统老湘军十八营由河南前往。留陕帮办军务的前陕西巡抚刘蓉（时乔松年为巡抚），一面奏调防守中卫（今宁夏中卫）的穆图善部移驻甘陕交界的泾州（今甘肃泾川），防止回捻合势，一面率三十营清军从陕西西部的陇州、邠州一带东下，专力攻捻。1867 年 1 月 23 日，西捻军在西安灞桥大败刘蓉部清军，取得灞桥大捷后，乘胜包围西安。在甘肃境内的陕甘回民起义军为西捻军入陕及其胜利所鼓舞，也在甘肃发动进攻，六七万回民军在庆阳将清军围困达一月之久，雷正綰部只得杀骡马为食。回民军在甘肃拖住大量清军，并乘刘蓉率部东下之机，由陇东分数路向陕西进军。其中张家川回民李得仓领导的一支回民军，从甘肃华亭进入陕西凤翔府；另一支回民军从甘肃宁州（今宁县）官河镇进至陕西三水（今旬邑）、淳化、宜君一带；马长顺等率万余回民军由董志原、庆阳经洛川进到澄城、韩城、郃阳、朝邑一带。陕北也有回民军和董福祥等领导的饥民武装在活动。

回民起义军由甘肃进入陕西以后，与西捻军协同作战，共同打击清军。他们为西捻军作向导，并为其购买新式枪炮，从物质上给予帮助。

1867 年 5 月初，回、捻两军在同州许庄将尾追其后的刘松山所部老湘军包围，给敌人以重大杀伤后，即挥师西向，进逼西安。5 月 27 日，刘松山等率军赶到，西捻军与清军接战十余次，终于失利。此后，回民军与西捻军虽然各自为战，但仍时离时合，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战略上相互配合的作用。

二、左宗棠入陕及其作战部署

由于杨岳斌对镇压陕甘回民起义束手无策，清王朝不得不另调闽浙总督左宗棠接任陕甘总督。1867年1月，左宗棠从福州取道江西到达汉口，随即进行各项准备工作。2月，清廷又授左宗棠为钦差大臣，催其迅速北上，督办陕甘军务。

左宗棠深知回民军和捻军联合后更加难以对付，因此，他向清廷进陈方略说：“方今所患者，捻匪回逆耳。以地形论，中原为重，关陇为轻；以平贼论，剿捻宜急，剿回宜缓；以用兵次第论，欲靖西陲，必先清腹地，然后客军无后顾之忧，饷道免中梗之患。”又说：“进兵陕西，必先清关外之贼，进兵甘肃，必先清陕西之贼，驻兵兰州，必先清各路之贼，然后饷道常通，师行无梗，得以一意进剿，可免牵掣之虞。”这个方略的核心是“先捻后回”、“先秦后陇”，关键则是“不令捻回合势”。

7月，左宗棠所部楚军近二万人由湖北樊城分三路到达陕西（参见第五章《捻军起义战争》第四节）。按照其“先捻后回”的既定方针，以先期入陕的刘松山所部老湘军、郭宝昌所部皖军、刘厚基所部湘军和新到的高连升部楚军共二万一千余人进攻捻军，以帮办刘典所部楚军和黄鼎所部川军共八千余人驻陕甘边界，对付回民起义军。其余楚军万余人，分驻凤翔、宜君、华州、华阴、渭南、临潼等地，策应各军，为“兼讨回捻之师”。西捻军识破了左宗棠的阴谋，迅速跳出包围圈，在回民军配合下，向陕北挺进。与此同时，陕甘回民起义军仍不断从甘肃进入陕西，与西捻军共同抗清。

10月至11月间，西捻军和回民军取得了连克陕西安塞（今安塞南）、延川、绥德等城的胜利。左宗棠智穷力竭，不得不上奏“自请严议”。可是，由于民族和宗教信仰不同等原因，回民起义军和西捻军的联合没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一直处于“时离时合”的松散状态，既没有统一的组织形式和集中领导，也没有共同作战的长远计划。更由于统治阶级施行分化离间政策，回民起义军的领导权又掌握在上层分子手里，个别回民军首领利用一部分群众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想，有意挑起回民军与西捻军之间的互相攻杀事件，严重地破坏了两支起义队伍的联合，致使左宗棠“不令捻回合势”的方略得以逐步实现。同年12月中旬，西捻军为救援东捻军，由宜川东面的壶口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回民起义军在陕西处于孤军作战的不利地位。虽然这时左宗棠率清军主力入晋追击西捻军，陕西清军大大减少，但由于回民军股数众多，互不统属，未能对清军实行有效的打击。在清军节节进逼下，起义军转取守势，十分被动，以致鄜州、宜君、三水、绥德等地相继失陷。

1868年11月，左宗棠参加镇压西捻军以后回到西安。他以陕西大局已

定，遂加紧进行进军甘肃的各项准备。

第一，整顿部队。驻陕清军，除左宗棠所部楚军外，还有刘松山的老湘军、郭宝昌的皖军、黄鼎的川军等；驻甘清军更为庞杂。这些部队不但待遇差别很大，而且编制很不统一，有的名为一营，实际只有二三百人，有的则多至数倍。为了整齐划一，左宗棠下令淘汰疲弱，一律按楚军的编制加以整顿，统归其指挥。同时，在陕甘就地招募新兵。到 1869 年时，左宗棠和刘典直接统辖的楚军就有步队五十五营、马队十五营，共三万人左右。

第二，诱降饥民武装。在西捻军退出陕西、回民起义军大部转入甘肃以后，董福祥领导的饥民武装仍在陕北一带活动，对清军威胁很大。董福祥与金积堡和董志原的回民起义军都有联系，是左宗棠进攻甘肃的一大障碍。于是，左宗棠在榆林、绥德、延长各驻一军，截断董福祥东渡黄河之路；又派刘松山率部从山西渡过黄河，由绥德西行，直逼董福祥的根据地镇靖堡（今陕西靖边南）。刘松山通过收买董福祥的父亲董世有，诱使董福祥投降。刘松山收其众十多万人，从中挑选精壮，按楚军编制，编为“董字三营”，由董福祥、张俊和李双梁各带一营。董福祥的投降，不仅使回民起义军失去了一支同盟军，并直接威胁到金积堡和董志原的安全。以后左宗棠正是利用董福祥的“董字三营”为前驱，进攻金积堡、西宁和肃州等地的回民起义军。

第三，占据董志原。董志原在甘肃宁州境内的马莲河西岸，纵约一百五十里，横约二百八十里。这里自然条件优越，“地平旷饶沃，可耕可牧”，且“北通灵州，南达陕疆”，扼陕甘两省关键。1864 年以后，陕西回民起义军主要以董志原为根据地，其活动范围延袤三四百里。他们按原来的村寨或教坊关系择地而居，一个大的居住区叫做一营。营既是生产单位，又是作战组织。每营人数不等，多至数万，少则几千。营的领导者主要是阿訇和回族上层人物，也有一些是在斗争中涌现出来的得到群众拥护的农民和手工业者。陕西回民军在董志原共有十八大营，与金积堡回民起义军、陕北董福祥领导的饥民武装都有联系，曾攻陷庆阳、宁州、镇原、平凉等城和五百余个堡寨，并不时进入陕西活动。1869 年 3 月，左宗棠派兵向正活动于正宁（今正宁西南）、邠州的回民起义军进击，回民军作战失利，退回董志原。由于重兵压境，加上伤亡很大，回民起义军决定进行改编，将原来的十八大营合并为四大营，并退出董志原根据地，撤往金积堡。4 月 3 日，回民起义军一部护送家属辎重，分两路向驿马关、北汧河北撤，崔伟、马正和等率领万余人埋伏在董志原，阻击清军，掩护撤退。清军事先得到了情报，待起义军刚刚开始撤退时，即分路猛扑。回民军损失三四万人，由环县、固原两路经下马关退往金积堡地区。清军占据了董志原一带，打通了尔后进军金积堡的通道。

第四，兴办屯田，安定后方。左宗棠认为：“陕甘之事，筹饷难于筹兵，

曾毓瑜：《征西纪略》，《回民起义》（三），第 28—29 页。

筹粮难于筹饷，筹转运尤难于筹粮。”胜保、多隆阿、杨岳斌等人未认识用兵西北的这个特点，一味增兵猛进，结果后方不稳，兵多饷绌，粮运不继，屡遭失败。鉴于他们失败的教训，左宗棠决定实行稳打稳扎的方针。他首先把既占地区巩固起来，就地兴办屯田（分兵屯、民屯两种）。这是左宗棠解决军粮困难，稳定后方的一个重要措施。

第五，拟定“三路进兵之策”。左宗棠决定分三路向甘肃进军：刘松山率部由绥德西进，名义上进攻花马池（今宁夏盐池），实际上指向金积堡，是为北路；李耀南、吴士迈率部由陇州、宝鸡趋秦州，是为南路；左宗棠和刘典率军自乾州经邠州、长武赴泾州，是为中路。三路之中，北路是重点进攻方向；南路暂取守势，目的是牵制河州（今临夏）、狄道（今临洮）的回民起义军，切断其与金积堡之间的联系，并作进攻河州的准备；中路则以协助北路为主，照顾南路为辅。

三、金积堡之战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左宗棠开始向甘肃回民起义军大举进攻，矛头首先指向金积堡。

金积堡在灵州西南五十余里，东通花马池，南通固原，西枕黄河。当地回民起义领袖马化龙是伊斯兰教中新教的首领，世居金积堡，富甲一方。他有智有谋，在回民中有较高的威望。1862年他领导当地回民起义之后，陕甘回民纷纷投奔金积堡，以致势力大振，多次把进攻的清军打得大败。1865年，原多隆阿部将穆图善接任宁夏将军，督办甘肃军务。他采取招降政策，宁夏起义回民举城投降。马化龙虽然也接受了“招抚”，但仍保持相当大的独立性，地方公事及征收钱粮等向皆由他主持，拥有委任参领、协领以至知州等大小官吏和管理军政事务之权。马化龙和他委任的官吏在金积堡地区执行团结汉民和“少杀人”、“重农事”的政策，领导回汉人民兴修水利，增加粮食生产，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比较安定，受到当地群众的信任。左宗棠也承认：灵州一带回民素听马化龙之命，对清政府委派的地方官，极为藐视，“不受约束，官长坐视回众而莫可如何”。当然，马化龙是知道清王朝决不会允许这种状况长期存在下去的。因此，他一方面向清朝地方政府输粮输款，表示“恭顺”；另一方面则在金积地区修仓储粮，筑寨建堡，购马造械，加紧进行防御清军进攻的准备。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马化龙与河州、西宁、肃州等地的甘肃回民起义军保持联系。陕西回民起义军退入甘肃后，马化龙不断在物质上给予帮助，“陕回败则资以马械，陕回穷则助以军粮”。

左宗棠：《料理西征就绪即行赴京陛见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二十八，第24页。

左宗棠：《灵州死事文武各员请恤片》，《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三十三，第35页。

因此，“自灵宁西达西宁，南通河狄，各回民无不仰其鼻息”。

1869年秋，北路清军刘松山部进抵灵州。刘松山一面进行“官军只剿陕回，已抚之甘回安居无恐”的欺骗宣传，一面派兵于9月8日攻占吴忠堡东面的郭家桥。中路清军则由固原、平凉北进，左宗棠本人也由泾州进驻平凉。这样，清军对金积堡形成了大包围的态势。

宁夏地区的回民不受刘松山的欺骗，与陕西回民起义军团结战斗，奋起抗击清军的进攻。当刘松山部从灵州向郭家桥进犯时，沿途回民堡寨“开放枪炮，且傍堡列队，呼杀官兵”，驻守在宁安堡、同心城、预望城等地的陕甘回民起义军也前来助战，清军被阻于吴忠堡一带。为牵制北路清军，灵州回民起义军破坏刘松山部的后方运输线，并趁虚攻占了灵州城。

在南线，马化龙派马万春率起义军一部前往预望城一带，阻击清中路军的进攻。在此之前，白彦虎、杨文治等已率陕西回民起义军从金积堡地区回到预望城、黑城子等地。当清中路军雷正綰部进至上述地区时，经过一番激战，回民起义军作战失利，先后失掉了预望城、黑城子、李旺堡等村堡。杨文治阵亡；陈林、马正和、余彦禄等部起义军退回金积堡；白彦虎、禹得彦、崔伟、马成彦等部起义军则相继撤离固原地区西行，经会宁、安定退往河州。陕西回民军撤离以后，马万春部起义军孤军作战，无法阻止清军前进，以致同心城、韦州堡一带起义的回民大部向清军投降。

中路清军打开金积堡的南面门户以后，于11月中旬先后进至金积堡西南秦渠一带，距金积堡仅十余里。北路刘松山部在中路清军的策应下，又夺取了灵州城，打通了后路。至此，清军完成了对金积堡的包围。

由于回民起义军顽强抵抗，清军的进攻难以得手，刘松山不得不将驻定边、花马池的四营湘军调赴前线。11月末，金运昌所部皖军也进至灵州。从12月起，刘松山和金运昌所部在北，雷正綰等部在南，会攻金积堡。回民军同清军在金积堡外围展开激战。清军采取步步为营的方针，相继攻占了吴忠堡周围和金积堡北面的堡寨。回军伤亡甚众，金积堡的形势逐步恶化；但由于战线缩短，兵力相对集中，加之穆生华率领平凉回民军退至金积堡地区，兵力有所增加。回军依托秦汉二渠，挖壕筑墙，步兵凭墙防守，骑兵则主动出击，忽东忽西，不断袭击敌人，给清军以很大打击。12月11日，总兵简敬临率楚军突入回民军阵地，被回军包围，士卒死伤甚众，简敬临等也被击毙。

金积堡有两个险要的地方：一是西面的峡口，它既是黄河青铜峡口，也是秦汉二渠的渠口；一是东面的永宁洞，它是山水沟（今山水河）通过秦渠涵洞的地方，秦汉二渠在此处会合，北流入黄河。峡口控制着进水口，永宁洞则控制着出水口，这两个地方对金积堡的安危关系甚大。清军一到金积堡

左宗棠：《复陈查明刘松山各情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三十三，第15—16页。

左宗棠：《北路官军连获大胜现筹办理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三十二，第29页。

地区，首先抢占了这两个要口。1870年2月12日，回民军从河西履冰而过，一举夺回峡口。雷正綰、周兰亭、张福齐等率部急攻，鏖战数日，伤亡惨重。19日，周兰亭、张福齐狼狈逃窜，雷正綰被围。左宗棠令黄鼎率部往援，又被包围。后黄鼎和雷正綰虽突围逃出峡口，但已溃不成军。回军乘胜攻占河西广武营堡，并阻截清军粮道。

与此同时，回民起义军在永宁洞一带也积极行动。2月9日晚，起义军千余人从金积东南的胡家堡突然进至秦渠南，占领了石家庄和马五寨几个村堡，抢修防御工事。石家庄在吴忠东南四五里，扼秦渠之要，与下桥永宁洞水口紧接，为双方必争之地。刘松山得知，连夜率部来攻，回民起义军退至马五寨继续抗击。该寨墙厚壕深，刘部连攻不下。2月14日，刘松山中弹，伤重而死。

清军先失峡口，继丧统领，士气顿挫，加之粮运不继，“军中缺粮，……各营兵丁弃甲夜逃”，起义军遂乘机反攻。马正纲率部由宁州、正宁进入陕西三水，马朝元率部由金积堡出宁条梁（今陕西靖边西八十里）。这两支队伍在甘泉会合后，东攻韩城、郃阳，一时陕西吃紧，警报频传。与马化龙有联系的河州、狄道回民军也攻占渭源，直逼巩昌，使甘肃战局为之一变。左宗棠坐困平凉，受到清廷的“严旨斥责”。

这时的形势对回民起义军甚为有利，但由于起义军缺乏统一的领导和指挥，各自为战，不能有力配合，以致未能进一步发展大好形势。相反，再次进入陕西的起义军由于未能建立起可资依托的据点，在清军和民团的围追堵截下，被迫到处流动，有生力量遭到很大损失，最后又纷纷败退甘肃。在金积堡地区，马化龙由于对清军估计不足，又对清政府抱有幻想，没有利用大好时机集中兵力给敌人以致命打击，反而几次向清军“求抚”；在军事行动上，则是分兵四处出击，不能收到应有的效果，几次争夺永宁洞水口均未得手，因而虽然控制了峡口，多次放水淹灌，都未能对清军造成大的威胁。

清军方面，左宗棠一面调集兵力截击进入陕西的回民军，并奏调郭宝昌部进攻花马池、定边（清廷以山西河防吃紧，改调金运昌部前往），以打通金积堡东路粮道；一面令刘松山的侄子刘锦棠接统老湘军，重新组织力量向金积堡进攻。刘锦棠一面加强对永宁洞的防守，一面派兵在黄河两岸夹河筑垒，保护河西运道，逐渐稳住了清军的阵脚。同时，乘回民军出击陕西之际，重新发起进攻，将灵州至吴忠堡之间的堡寨逐一攻占，并夺取了金积堡北面秦渠上的蔡家桥水口，放水淹灌金积堡。9月，刘锦棠和金运昌部攻破东关和南门外回军寨卡数十处，将数千所铺屋尽行烧毁。

为从南面进攻金积堡，左宗棠令黄鼎、雷正綰率中路军夺取了峡口，并攻占金积堡西面汉渠内外二十余座回军垒卡，直逼金积西南洪乐堡。

回民起义军英勇抗击北路和中路清军的猛烈进攻，宁死不屈，“堡寨将

破时，先刃其家属，或掷诸水火，乃解衣格斗，死而后已”。清军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才攻下金积堡周围各堡垒。随后，清军以深沟高垒锁围金积堡，在四周挖掘长壕二道，一防金积堡内回军突围，一防堡外回军来援。壕沟距金积堡半里至三里不等，壕深一丈，宽三丈，壕边筑墙，高达丈余。清军分段驻守：金运昌部驻北面，刘锦棠部驻东、南两面，雷正綰部驻西南，黄鼎部驻西面，徐文秀部驻西北面。

河州地区回民军派出两队兵力救援金积堡，一趋平番（今永登）、镇番（今民勤），一走安定、静宁，均为清军截击，未能到达。

在粮尽援绝的情况下，先是陈林于 1870 年 12 月 31 日率众向黄鼎、雷正綰“求抚”。六天之后，马化龙亲赴刘锦棠营中请降，表示愿以一人“抵罪”。马化龙及其子马耀邦向清军交出各种火炮五十六门、各种枪千余杆，并写信向王家疃庄等地回民军劝降。1871 年 3 月 2 日，清军攻入王家疃庄。刘锦棠随即按左宗棠的预谋，以从金积堡内挖出马化龙藏匿不交的洋枪一千二百余杆为借口，将马化龙父子一并处死。

金积堡是西北回民反清斗争的核心堡垒。马化龙领导回族人民武装起义，打击了清朝统治阶级在西北的统治，客观上支援了当时各地人民的反清斗争。马化龙作为这次回民起义的领袖，自有其一定的历史功绩。但是，马化龙是回族中的上层分子，他的反清同广大回族劳动人民的反清斗争，是有着区别的。马化龙之所以反清，是为了保持和加强其原来的宗教、政治特权和经济地位，并非真要推翻清朝的封建统治。这正是马化龙在领导金积堡起义期间没有提出鲜明的政治口号，并动摇妥协，多次向清军“求抚”的主要原因。

左宗棠虽然杀害了马化龙父子，镇压了金积堡回民起义，却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左宗棠在陕甘指挥的清军，总计十二万人左右。金积堡之战，执行其“三路平回之策”的北路军和中路军的大多数部队都直接参加了作战，其余则用于保护后方运道，如从平凉经固原到灵州的九百余里间，便用了三十余营兵力。在这次作战中，清军“死伤山积，屡失大将”，仅刘松山所部老湘军，营官损失十分之四，官兵死亡千余，因伤致残者达二千余人。左宗棠不得不承认“十余年剿发平捻，所部伤亡之多，无逾此役者。”

四、河州之战

河州在兰州西南，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除回族以外，还有撒拉、

左宗棠：《合围金积堡老巢首逆被创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三十七，第 12 页。

左宗棠：《荡平金积堡及剿办回土各匪出力员弁兵勇汇案请奖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四十，第 12 页。

左宗棠：《答王子寿比部》，《左文襄公全集·书牋》卷十一，第 35 页。

东乡等民族。1862年陕西回民起义爆发时，河州地区回民就起而响应，次年9月攻克狄道城。1864年，马占鳌领导当地回民起义军攻占了河州城。马占鳌是河州牟泥沟河家庄人，先世念经传教，他本人也是阿訇，有一定的号召力。河州回民起义军力量较强，当时的陕甘总督熙麟一时无法镇压，只得派人“抚谕”。1867年9月，河州回民起义军假降，署理陕甘总督穆图善出省受降，几被生擒。从此，河州一直在回民起义军的控制之下，成为甘肃回民起义军的四大基地之一。

1871年初，河州回民起义军乘驻甘南清军范铭部兵变之机，出击会宁、通渭、秦州、清水、两当等地。清廷命左宗棠进攻河州，但由于清军在金积堡之战中死伤甚众，“军心懈弛，将士思归”，左宗棠不敢贸然进兵。

为进攻河州，清军进行了一系列的准备：

第一，加强和整顿甘南部队。甘南清军冗杂，战斗力很差，屡为回军所败。左宗棠入甘时即派吴士迈等率部由陇州趋秦州，以加强甘南防军的力量，这就是执行“三路平回之策”的南路军。1869年底，又派周开锡以翼长名义总统南路诸军。周开锡到秦州后，即着手整顿甘南清军，遭到当地驻军的反对。由于他的暴戾骄矜，激成兵变。后周开锡病死，南路诸军由总理营务处陈湜接统。

第二，准备渡河器材。河州在洮河以西，从狄道、陇西、安定等地用兵，须渡过洮河，所以，左宗棠令清军先准备好渡河用的船只和架桥器材，同时，整修道路，以利部队调动和转运军需、传递文报等。

第三，筹集粮秣。清军进兵时，须经过渭源属境。这里人烟断绝，一片荒芜，粮草无处筹措，左宗棠便派出部队专事转运，令清军在静宁等地储存三个月粮草。河州一带夏粮秋粮分别在7月底和9月底收割，左宗棠遂把进军时机选定在收获季节，以便就地取粮。

1871年7月底，左宗棠认为一切准备就绪，便令四十余营清军分三路进犯河州：中路傅先宗率鄂军从狄道渡河，左路杨世俊率楚军取道狄道南面的南关坪进峡城（狄道南九十里），右路刘明灯率部由马营经红土窑进康家崖（狄道北五十五里）。为防止回军袭击，规定中路以一半兵力留驻东岸，一半渡过洮河修筑堡垒，左右两路则待中路在河西扎稳脚跟以后再行渡河。此外，令提督徐文秀统领后路由静宁进会宁，策应右路。同时，派五营清军分驻河州东南的岷州（今岷县）和洮州（今卓尼东北）两城，并调土司杨元带“番勇”分驻各隘口，均受左路杨世俊节制。又调总兵徐占彪步队八营、马队三营，由中卫经靖远进至会宁西北和安定东北一带，防止河州回民军北进，并兼顾兰州。左宗棠自己也在1871年9月中旬由平凉经静宁抵达安定。

河州回民起义军加紧准备防御清军的进攻。白彦虎等率陕西回民军从固原州一带撤退到河州之后，曾与河州回民起义军一起在洮河西岸修筑了一些堡垒。以后白彦虎等率部前往西宁地区，河州回民起义军又陆续修筑了不少新垒。洮河东岸的康家崖和狄道，是河州回民军的两个出入口。自1870年6

月狄道为清军所占之后，康家崖便成为起义军出入河东的唯一通道。因此，回民军着重加强了康家崖对岸一带的防御。

1871年9月18日，刘明灯、徐文秀两部从安定出发，分两路直插康家崖。清军“每进一处，各派队分支包扫而前”，企图将正在洮河东岸分散活动的回民军一并驱往康家崖，迫其背水一战，达到“聚而歼之”的目的。回军为缩短战线，在洮河东岸进行了心要的阻击，给敌人以杀伤后，即撤往河西，驻扎于离洮河西岸十里的三甲集一带。

刘明灯、徐文秀部占领康家崖后，左宗棠令中路傅先宗部和左路杨世俊部在狄道用渡船搭造浮桥，派十二营清军过河结垒（分别在西坪、三岔河、陈家山顶等地立营），以牵制回民军，掩护右路清军渡河。回军以部分兵力在黑山头、高家集等地筑垒驻守，监视西坪、三岔河、陈家山顶的清军，防其偷袭；主力仍驻三甲集，以对付康家崖清军的进攻。起义军在洮河西岸掘壕数道，并筑有炮台，防守严密。康家崖近岸洲渚纵横，水深流急，人马难越，清军多次抢渡都被回军击退。11月中旬，前福建布政使王德榜率左宗棠亲兵等马步五营，由康家崖东南六十余里的站滩间道过狄道浮桥，与中路、左路清军配合，猛攻黑山头等处。徐文秀、刘明灯部乘机在康家崖、新添铺（康家崖南二十里）等地搭造浮桥，渡过洮河。

清军渡河后，从几个方向会攻三甲集。三甲集虽属狄道，却是河州的第一重门户。但为了诱敌深入，回民军有意放弃三甲集，采取节节阻击的办法，逐渐退至太子寺（今广河）。太子寺在三甲集西南三十余里，为河州总要隘，河州州判即设于此。河州回民起义以来，太子寺成了起义军的重要据点。马占鳌领导回民军环绕太子寺挖掘长壕一道，深约二丈余，宽四丈余，并在险要处设置了许多垒卡，与广通河北岸的许多回民村堡互为犄角。

1872年1月，清军经大东乡和董家山直逼太子寺。回军在火红等处依托有利地形顽强抵抗，打退清军数次进攻。清军损失惨重，转而从南面进攻。回军又在太子寺寨外挖掘深壕二道，并派出小股部队从沙泥渡至河东，袭击清军运粮部队，截夺军粮。清军断粮，只得宰牛马为食。

进攻太子寺的清军四十余营密布于太子寺南面二十余里的新路坡。马占鳌亲自侦察，发现坡上有个稍低的山头没有清军驻守，便于2月12日晚派马海晏率回民军优秀射手数百人乘夜暗潜入新路坡，占领山头。马占鳌又密派千人挑运水和土坯上山，连夜浇水砌墙。当时正是隆冬季节，滴水成冰，一夜之间就筑成光滑坚硬的堡垒三座。第二天，清军发现回军堡垒突然出现在他们的阵地中间，大为震惊。傅先宗立即调派部队，亲自督攻，企图拔掉这个钉子。马海晏沉着应战。他把枪手一分为二，一半持枪射击，一半专装子弹，多次打退清军的进攻。14日，傅先宗亲掌大旗督兵猛攻，被起义军当场打死。清军丧失统领，军心动摇，防守滥泥沟的回民军乘机出击，抄至敌

人后面。清军两面受敌，纷纷弃垒逃跑。徐文秀企图挽回颓势，也被回军击毙。

太子寺一战，清军损兵折将，全线溃退三十余里，而且粮运梗阻，几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面对这一辉煌胜利，多数起义军将领主张乘胜反攻，扩张战果。有的还提出了进攻左宗棠安定大营的具体计划。但是，马占鳌听说左宗棠正在调动军队，又听说西宁回军已降，想借起义军艰苦奋斗争得的胜利作为投靠清朝统治者的资本。他召集起义军将领议事，否定了他们的正确意见，力主向清军缴械投降，说什么“果如诸君所欲，往攻安定大营，即使一战而胜，席卷而东，百二山河，皆为吾所有，谁以一丸泥封函谷关，使关东将帅不复西来？去一左宗棠，将有无数左宗棠在其后。河州弹丸，何能与天下抗？！”他以太平天国虽曾扩展到十三省，攻占过六百余城，最后仍被湘军打败为例，强调“今日之事，舍降别无生机”。随后，马占鳌派他的儿子马安良等人前往安定向左宗棠求降。因兵败而焦虑不安的左宗棠对马占鳌的这一举动喜出望外，但又颇感疑惑，害怕“其中或有别故”。马占鳌为了表示诚意，后又亲向左宗棠“请罪”。马占鳌出卖了河州回民起义的成果，向清军交出骡马四千匹、枪矛一万四千余件，换取了左宗棠对他的赏识。马占鳌投降后，将部队按楚军的编制改编为三旗马队，转过头来镇压西宁等地的回民起义军。

五、西宁之战

西宁在清代是甘肃的一个府治，管辖西宁、碾伯（今青海乐都）、大通三个县和贵德、循化、巴燕戎格（今青海化隆）、丹噶尔（今青海湟源）四个厅。1862年11月，碾伯县地主武装“民团”杀死巴燕戎格回民三人，并扬言要尽洗米拉沟（今青海民和西）回民。巴燕戎格和米拉沟回民联合循化撒拉族，在马文义的领导下起义。马文义，又名马尕三，循化撒拉族人，在回族和撒拉族群众中有一定威望。起义军的力量迅速发展，屡次打败“进剿”的清军和民团，占领了碾伯至享堂（今青海民和北）的大道，截断了兰州至西宁的交通。西宁办事大臣玉通束手无策，只得以所谓“以贼攻贼”的方法，保举循化回绅马桂源署理循化厅同知，其兄马本源署循化营游击，后又保举马桂源署西宁知府，马本源署西宁镇标游击并代行总兵职务，企图利用马桂源、马本源与马文义的亲戚关系，缓和回民的反抗。但是，形势的迅速发展，把马桂源兄弟这样的回族上层分子也卷入了反清斗争的行列。西宁一带名义上仍属清王朝管辖，实际上是在马文义和马桂源的控制之下。马文义死后，马桂源、马本源即成为西宁回民的首领。1870年初，玉通死，豫师接任西宁

慕少堂：《甘宁青史略正编》卷二十三，第31页。

左宗棠：《叠攻太子寺屡胜两挫逆回乞抚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四十一，第9页。

办事大臣。他因害怕西宁回民的革命势力，不敢到西宁任所，而驻营于离西宁尚有三百数十里的平番，西宁镇总兵黄武贤也住在距西宁九十里的威远堡（今青海互助）。西宁周围完全为回民军所控制，成为甘肃回民起义军另一个重要基地。

1872年8月，左宗棠从安定移驻甘肃省城兰州，调刘锦棠所部老湘军进攻西宁。9月初，刘锦棠率步队十八营从平凉进抵碾伯。他为了离间“土回”（指当地回民）和“客回”（指白彦虎、崔伟、禹得彦等率领的陕西回民）的关系，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遂出示晓谕：土回安堵无恐，以便直捣陕回巢穴”。

对于要不要同经河州来到西宁地区的陕西回民军一起抗击清军进攻的问题，西宁回军首领的意见并不一致。金积堡失败后，一种畏惧清军的失败主义情绪在起义军中蔓延滋长，一些领导人意志消沉，思想动摇。当河州之战正在进行的时候，马永福等人就有投降之意。陕西回军崔伟、禹得彦、毕大才等人也曾托在金积堡投降的陈林向左宗棠乞降。只有白彦虎力主抵抗到底。他以马化龙投降被杀的沉痛教训说服了崔伟、禹得彦等人，使他们暂时放弃了投降的念头。9月12日，马桂源密约白彦虎、崔伟、禹得彦等在西宁东关家中召开紧急会议，一致主张西宁回军和陕西回军联合起来，共同战斗，并推举马本源为大元帅，统一指挥各部起义军迎战入侵之敌。

西宁在湟水南岸，东面从小峡到大峡之间八十余里的一段地方，湟水两岸高山对峙，一条岸路宽仅数尺，人马只能鱼贯而行。回民军在该处山上筑起坚固的堡垒，驻兵防守。刘锦棠率领清军刚出碾伯不远，就遭到起义军的迎头痛击。回军利用有利的地形条件，一方面坚守要点，一面派队偷袭敌人，阻截粮道，打了就跑，使清军穷于应付。左宗棠不得不向清廷诉苦：“土回与客回联成一片，每战则弥山塞谷，四出挠我，殊有应接不暇之势。又所需军粮子药运至前敌各营，均须派队往来护送，时有战事，兵力屡分而见单”。从9月中旬到11月中旬，回军与清军接战五十余次。清军损兵折将，不能前进。左宗棠只得增调刘明灯率马步六营驻碾伯西南，专司护送；调杨世俊、吴隆海率马步十一营增援刘锦棠部。同时，加紧进行策降活动。马桂源出城后，留在城中的马永福勾结西宁道郭襄之等汉族官绅闭城据守。马桂源、马本源没有分清主次，用相当大的力量去围攻西宁城，形成两面作战的局面。刘锦棠指挥清军用开花大炮猛攻起义军堡垒。回民军因两面作战，兵力分散，阻挡不住清军的强大攻势，以致大峡至小峡一段隘路逐渐失守。11月19日，刘锦棠部进至西宁，当地回军大部瓦解，陕西回军首领崔伟、禹得彦、毕大才等也率部投降清军，只有白彦虎率领的一部退至大通，与马寿领导的当地回民起义军一起继续坚持斗争。刘锦棠令已投降的崔伟、禹得

左宗棠：《进攻西宁土客各回叠胜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四十二，第12页。

左宗棠：《进攻西宁土客各回叠胜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四十二，第16页。

彦、毕大才等所部回军为前导，北攻大通。

马寿率回民军坚守大通南面的向阳堡。1873年2月1日，清军进攻向阳堡，起义军始则凭堡放枪掷石，继则巷战。清军虽然攻占了向阳堡，但死伤枕藉，仅提督、总兵、副将被击毙者即达十人之多。继向阳堡之后，刘锦棠部又攻占了大通县城。白彦虎仍拒不投降，率众二千余北走，出扁都口（今民乐县南），向肃州退却。

西宁失陷时，马桂源、马本源曾率三四千人退至巴燕戎格。左宗棠命陈湜等率军从河州进攻，同时派马永福前往“招抚”马桂源、马本源的部众，使其纷纷离去。3月2日，在马占鳌的策划下，马桂源、马本源在巴燕戎格东山被俘，后在兰州遇害。陈湜所部清军占领巴燕戎格城后，不久又攻占循化，西宁之战遂告结束。

六、肃州之战

肃州是陕甘回民起义军最后一个基地。1865年初，陕甘回民起义的浪潮波及河西走廊，凉州（今武威）回民首先起义，接着马文禄在肃州起义，占据嘉峪关和肃州城。肃州邻近嘉峪关，西通新疆，是连接内地与新疆的边关重镇。新疆回民在前一年即已起义。清政府为镇压新疆回民起义，急图打通甘新通道，便命正在甘肃的新授乌鲁木齐提督成禄先率兵攻取肃州。由于马文禄和新疆、金积堡、河州、西宁等地的回民军都有联系，力量不断加强，加之肃州形势险要，清军的“进剿”都被回军击败。1868年，成禄和甘肃提督杨占鳌在“招抚”的名义下，与马文禄“媾和”，把肃州交给马文禄管制。

1871年7月，沙俄突然出兵侵占新疆伊犁，声言还要“代收”乌鲁木齐。在这样的形势下，清政府催促成禄迅即出关，并命左宗棠派兵驻防肃州。当时清军正进攻河州，左宗棠认为，“以陇中局势言之，自宜先规河湟，杜其纷窜，然后一意西指，分兵先扼玉关，断其去路，乃策全功。此时兴师远举，尚非稳著。”然而关外形势毕竟紧迫，左宗棠就抽派驻在靖远担任截击河州回军和保卫省城兰州任务的徐占彪部先赴肃州。

徐占彪率十二营川军，从靖远出发，于1872年初进至肃州高台。马文禄得知大队清军前来，便再次起义反清，据城为守。徐占彪留兵一部保护运道，主力继续向肃州城前进。3月，清军夺占了肃州城南三十里的红水坝，并以之为据点，向塔尔湾和肃州外围的其它回民军堡垒进攻，企图逐步占领肃州外围。

塔尔湾在肃州西南二十里，地势较高，回军在此构筑了坚固的堡垒，周围挖壕筑卡，连接东北面黄草坝各村堡，与肃州城互为犄角。7月初，徐占彪令驻城东三仙洞的清军向雷台庙一带发动佯攻，以牵制城中的回民军，他

则亲率五营清军夜袭塔尔湾。防守塔尔湾的回民军顽强抵抗，城内亦派队增援，使清军进攻受阻。徐占彪调开花大炮向塔尔湾一带的堡寨轰击，回军伤亡渐多，塔尔湾和黄草坝一带百余座堡寨先后失守。至8月初，近城的回军墩寨堡垒基本上为清军攻占，回军退入城内坚守。

由于兵力不足，徐占彪多次向左宗棠请求增兵。当时刘锦棠正进攻西宁，亦屡请增兵。左宗棠无兵可派，徐占彪只得把马步各营每营分作两营，在距城半里至一里的地方环城修垒扎营。尽管如此，北门一带仍无兵可驻，不能形成合围。后来，西宁之战渐近结束，左宗棠派陶生林率马步五营赴援，于1873年1月到达肃州。适清政府派往新疆的金顺一军二十营也来到肃州，进扎北崖头，参加围攻。这样，清军就完成了对肃州的合围。

开始，因金顺军刚到，指挥上也不尽统一，清军的合围并不严密。起义军在城西礼拜寺和北稍门一带修筑了堡垒，与城内互相联络配合。因此，回军仍能突破清军的合围出入肃州。2月7日夜，新疆回民派来的援军四千余人和运粮骆驼千余只，就是从北稍门进入城内的。以后，清军陆续把这些堡垒攻破，占领了城西礼拜寺，并在肃州城外挖了长壕，壕外筑起坚厚的炮墙，墙外置木栅，在几个要点上修筑了炮台，完全控制了肃州城出入通道。城内的起义军虽然可以出城，但很难越过清军的长壕和其它工事，从外面来的援军也难以冲破封锁进入城内，以致肃州完全成为一座孤城。白彦虎率领的陕西回民军出扁都口后，经山丹、甘州（今张掖）、高台等地，接近肃州，于4月初进入塔尔湾。白彦虎率众自外面袭击徐占彪的大营，马文禄率部从城里出南稍门夹攻，使徐占彪、金顺部清军伤亡很大。但因敌人防守严密，白彦虎和马文禄都无法突破清军的防线，不能内外会师，白彦虎便放弃与马文禄合作的计划，出走新疆。

这时西宁之战已经结束，除肃州外，甘肃各地的回民起义均已失败。白彦虎出嘉峪关西走后，肃州回民起义军已成孤军。在外援无望的情况下，马文禄为突围西行，出兵攻夺城西礼拜寺。礼拜寺是从肃州出嘉峪关的大路，清军派有重兵驻守，因此争夺非常激烈。回民军经过十昼夜的连续攻击，有生力量损失很大，不得不停止进攻。7月，东关为清军攻占，马文禄再次组织突围。由于清军兵多围紧，又装备有洋枪洋炮，起义军的突围终未成功。

肃州城固壕深，墙高三丈六尺，厚三丈有余，外环城壕，回军不易突围他走，清军也无法攻入。左宗棠只得不断增兵，使围城清军达六十余营。由于久攻不下，左宗棠亲至肃州督战。清军在城外所筑炮台，高出城墙，上安新式后膛炮。金顺军还在城东北角挖了地道，准备炸城。1873年10月6日，清军发起总攻。由于长期被围，城内粮食极度缺乏，起义军只得杀骡马充饥，但仍英勇不屈，严守城防。为防止清军从地道炸城，他们沿城墙横挖地道，使清军的地道往往被发现。他们又在城上加砌横墙，埋伏墙下。当清军越过城壕登至城腰时，城上一声令下，石块纷集如雨，登城清军纷纷抱头回窜。杨世俊曾在河州之战时弃营逃跑，受到降职处分，西宁之战奉命截击白彦虎

又不力，来到肃州后贪图立功。10月10日，他亲自率部登城，刚登上城头，即中弹而死。10月底，刘锦棠奉命率湘军五营和在西宁投降的回民部队到达肃州。清军利用崔伟、毕大才等在城下喊话，告以“死期已至，善自为谋”。马文禄终于经不起敌人的威逼利诱，于11月4日开诚投降。左宗棠将马文禄等九名回军首领和千余名起义军施以酷刑。肃州之战就这样以马文禄的投降和回民大量被残杀而告终。至此，前后坚持了十二年之久的陕甘回民起义战争以失败而结束了。

左宗棠：《克复肃州尽歼丑虏关内肃清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四十四，第7页。

第五节 起义战争的经验教训

在太平天国革命影响和推动下爆发的西南、西北各族人民起义，是当时全国大起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起义，有的与太平军遥相呼应，甚至并肩战斗，有的没有联系，基本上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然而，不论处于何种状态，彼此之间在战略上都起到了直接或间接的配合与支援作用。正是由于太平天国及全国各族人民的大起义，才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

西南、西北各族人民起义，坚持斗争的时间都比较长（少则六七年，长则十九年）。之所以能够如此，首先是由于各次起义都有比较广泛的群众基础，起义的规模都比较大，各族贫苦农民的斗争都比较坚决；其次，太平军和捻军等的积极作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牵制了清军的主要力量，使之无暇他顾，以致边远地区清军兵力单薄，起义武装得以乘机发展；再次，西南、西北地区山高沟深，交通闭塞，人稀粮少，气候条件差，清军“进剿”困难。多次起义战争之所以失败，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清王朝掌握全国政权，并采取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方针；而起义诸军则未能联合起来，形成统一的坚强领导和统一的战略部署，终被清军各个击破。此外，西南、西北各族人民起义战争还有以下一些重要的经验教训。

一、多民族聚居地区的人民起义，必须实行联合各族人民共同战斗的革命政策

西南、西北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由于统治阶级实行反动的民族政策，极力挑拨各民族之间的关系，而各个民族在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等方面也各不相同，因此，清除民族隔阂，改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共同对敌，便成了夺取起义战争胜利的首要条件。

杜文秀是清王朝“护汉抑回”等反动民族政策的直接受害者。由于他能清醒地认识到回汉仇杀的罪魁祸首是清朝政府和封建统治阶级，回汉两族的广大人民群众则都是无辜的受害者，因此，他率众起义之后，致力于改善民族关系，制定并实行了一系列团结各族人民的政策和措施，积极引导回汉等各族人民消除隔阂，联合起来，共同反抗清王朝的反动统治。他还实行“重用汉人”的政策，积极吸收汉人参加滇西起义军。除汉族之外，彝、白、傣、景颇等少数民族人民也大量参加起义军。所以，杜文秀领导的云南回民起义战争，实际是由回民首先起事，由回、汉、彝、白、傣、景颇等各族人民共同参加，联合反抗清王朝的起义战争。这正是它能够不断发展，并取得一系列胜利的重要原因。同样，活跃于贵州高原上的数十支起义武装，也都是以某一民族为主体，又有其他民族参加的多民族的战斗集体。各族起义军相互应援，密切配合，以至并肩作战，乃是贵州各族人民起义战争的突出特点和成功之处。1863年罗光明、潘名杰、何得胜各部起义军对贵阳实行长期围困，

虽非长算，但他们相互配合，“声气相通，互为援应”，却使敌人左右为难，“无可如何”。

与上述情况相比，陕甘回民起义在这个问题上就有明显的不足。陕甘回民起义军的领导权多数掌握在回族上层分子和阿訇手里，他们既没有提出明确的反清政治纲领，也没有提出足以动员和号召各族人民群众共同行动的口号，反而常常把回民群众的反清斗争引导到宗教教派之争和民族纠纷上来。这样，既影响了回民起义军内部的团结，更妨碍了各族反清力量之间的合作；而统治阶级则正好利用矛盾，对起义军进行分化瓦解，从而极大地削弱了反清力量。

二、必须建立一支有组织有纪律的英勇善战的革命军队

要战胜拥有强大武装的敌人，起义者必须首先武装自己，建立一支有组织有纪律的军队，并不断提高其军政素质，使之英勇善战。云南回民起义之后不久，杜文秀即对各地集合起来的部队认真进行整顿，确定部队的编制，建立各级军事组织，制定规章制度，严格军事纪律。经过整顿，滇西回民起义军战斗力大为提高，特别是善于构筑防御工事，具有较强的防御作战能力。围攻昆明时，只有数十人防守的营垒，却能屡挫敌锋，使清军“动损精锐，破一垒难于披一坚城”。晋宁之战，起义军守城六七个月，粉碎了清军的多次进攻，并以顽强的战斗意志，在城内与敌相持两月有余。不少事实表明，杜文秀领导的云南回民起义军是一支较有组织纪律、颇为善战的军队。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李、蓝起义军入川后队伍迅速扩大，在不长的时间里就发展成为拥有三十余万人的起义大军。但其军政素质却没有相应的提高，无论进攻和防守，都不能较顺利地战胜少于自己的敌人。绵州和眉州都久攻不下，而遭到湘军进攻时，又表现防御能力不强，且一败而不可收拾。再如陕甘回民起义军队伍，虽具有较广泛的群众基础，但组织很不严密，平时与老弱妇孺同住一起，行军作战时家属也随同行动，极不利于战斗。贵州各族起义军则多采取“亦兵亦农”的政策，这对于发展生产，减轻人民负担，长期坚持战争，起了积极作用。但起义军没有脱离生产的基干队伍，以致军事行动经常受到农业生产季节性的影响，往往丧失有利的作战时机，且因平时忙于生产，缺乏必要的训练，军政素质得不到提高，因而难以抵挡象湘军这样训练有素而又有实战经验的军队的进攻，致遭失败。

三、必须适应当时当地的敌我条件，采取和创造灵活的作战方法

起义战争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起义之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起义

张涛：《滇乱纪略》，《回民起义》（一），第276页。

军总是不断地受到敌人的“围剿”，而起义军在数量、军事素质以及武器装备等方面，一般又劣于敌人。这种敌强己弱的客观形势，不经过长期的革命战争并大量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是不会改变的。起义战争的领导者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在作战中根据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采取扬长避短、趋利避害、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的灵活的作战方法，才能取得作战的胜利。

西南、西北各次起义战争，起义军在作战上都采取过一些适合当时当地情势的战法。如陕甘回民起义初期，起义军注意“避实趋虚”，经常派出骑兵往来游击。进攻时一般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马队在敌阵中“来往冲突”，使以步兵为主的清军难以招架；退却时立即转入山径僻道，“飘忽靡常”，使清军不知自己的去向。贵州起义军则能利用崇山峻岭、山陡沟深、溪多林密、路径纷歧的地形条件和良好的群众基础，与敌人周旋。清军进攻时，起义军或者分散避入山林，或入险塞固守，使清军想打打不着，想攻攻不破，尔后利用有利时机，袭扰敌人；清军被迫撤退时，则出兵追击，或绕出敌前，设伏以待，使清军顾此失彼，狼狈不堪。特别是当湘军向苗区进攻时，苗军采取“敌进我进”的战法，向湘军后方和清军占领区进军，调动敌人，迫使其回援，更是起到了“致人而不致于人”的作用。李、蓝起义军在“非万不得已不可与战”的原则指导下，以高速流动来摆脱敌人或寻求战机，“往往百里突至”，“所入无不大获”。陕甘和贵州各族起义军还利用山区粮缺、粮运困难的特点，出奇兵于敌后，袭击清军的运输队，阻断清军的粮道，使敌人粮匱援绝、军心动摇，有力地配合了正面部队的作战。

但是，不少起义军对采取和创造趋利避害的灵活战法缺乏明确的自觉的认识，不善于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着眼，积极寻机在野战中歼击敌人，常常注重攻城和守城，而且有不顾主客观条件强攻坚城和死守孤城和堡寨的现象，以致损精耗锐，陷入被动。李、蓝起义军围攻绵州之战和滇西回民军围攻昆明之战，都导致了战争胜败的根本转折。

四、只有形成统一的组织和坚强的领导集团，才能保证起义的胜利

西南、西北各次起义战争，由于民族、宗教、地域等方面的原因，一般都没有形成统一的组织和坚强的领导集团。各支起义军之间或同一支起义军的各部之间，虽然有时能够互相配合，甚至联合作战，但这种关系是不巩固的、暂时的，缺乏组织上的保证。各支起义军基本上是在各自首领的领导下，在各自的地区内单独活动，分军作战，形成股数众多、互不统属、各据一方、各自为战的局面。

这种情况，在起义初期是难以避免的。如果进攻之敌战斗力较弱，又缺乏统一的领导和指挥，起义军各自为战，往往使敌人顾此失彼，难以应付，有利于起义军的发展和壮大。但在起义进一步发展，敌人调集重兵进攻的形

势下，缺乏统一的组织和统一的领导，就无法统一部署，集中力量，有效地打击敌人，且给敌人以各个击破的机会。贵州各族人民起义战争的后期，清军首先切断了苗军和号军的联系，集中力量进攻号军。号军失败，苗军失去了北方强大的友军，内部又不统一，便在优势清军的进攻下，归于失败。李、蓝起义也由于没有在斗争中逐步建立起统一的组织、统一的领导，尤其没有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集团，不能把各支起义队伍团结和统一起来，终于被敌人各个击破。

